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1859—1875年）

上　册

〔俄〕伊·赞·巴布科夫著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1859—1875年）

下　册

〔俄〕伊·费·巴布科夫著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1859—1875年)

上　册

〔俄〕伊·费·巴布科夫著
王之相译　陈汉章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　京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1859—1875年)

下　册

〔俄〕伊·费·巴布科夫著

王之相译　陈汉章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　京

И. Ф. Баб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Й СЛУЖБЕ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1859—1875 г.

С. -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В. Ф. Киршбаума, д. М-ва Финансов,
на Дворц. площ. 1912.

内部读物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

(1859—1875年)

(上、下册)

〔俄〕伊·费·巴布科夫著

王之相译　陈汉章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装

850×1168毫米 1/32　18 3/8印张　430千字
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31　定价：1.75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巴布科夫(1827—1905年)，毕业于巴甫洛夫武备中学和总工程学校，1857年被派往西西伯利亚，历任师参谋长、军团司令部作业部主任、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参谋长，并多次代理草原管区总督职务，1890年退役。

1862年，沙皇政府任命巴布科夫为同中国划分中俄西部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本书是作者对自己从1859到1875年在西西伯利亚活动的追述，主要写他1864年同中国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经过，以及1861年和1862年两次参加塔城谈判、1869年同中国进行实地划界和设置界牌的详细过程。此外，对沙皇政府的有关大臣和西西伯利亚一些总督的活动也作了评论。

巴布科夫是沙皇的宠臣，他竭力推行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是沙皇从西西伯利亚向中国侵略的得力工具，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嘉奖和重用。他写的这本书是沙皇俄国侵略半殖民地中国的又一罪证。

清代中国的西部疆界原在巴尔喀什湖，这不仅有大量中国官方文书的记载，就连沙皇俄国的许多著作和历史地图也都是确认的。本书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一铁的历史事实。

但是，巴布科夫站在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上，在同中国进行的划界谈判中，一面蛮横无理地坚持以沙俄1860年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为“根据”，坚持必须按照沙俄单方面编制的划界草案进行划界；一面叫嚣“军队是外交的后盾”，“必须以实际占领的办法来支持”沙俄“外交上的要求”，以造成“既成事实”。沙皇俄国实际上也正是这样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

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作者在谈到《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以及《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时，竭力污蔑、攻击中国，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对穷凶极恶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等人的强盗行径，百般予以粉饰、美化，大肆鼓吹“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作者还攻击中国人民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反帝、反封建斗争。

巴布科夫这本书是完全站在沙皇政府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上来写的，它所提供的若干历史资料，对于我们揭露沙俄侵华罪行，揭露苏修叛徒集团为沙皇的侵略辩护而伪造历史的卑劣行径，有一定参考价值，特予以翻译出版。

书末原附作者致斯加隆的一封信和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一份报告，因其内容在正文中大体上已有记述，不再译出。

1973年10月

目　次

伊·费·巴布科夫简历……7
前　言……11

第一篇

第一章……13

离开托波尔斯克。　鄂木斯克给我的印象。　官长人员中德国人和波兰人所占的优势地位。　引起军团长加斯弗尔德将军对我不友好态度的原因。

第二章……18

加斯弗尔德将军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最后几年。　1840—1860年时期西伯利亚主管机关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事务管理情况的概要。　占领谢米列欽斯克和外伊犁边区，以及建立科帕尔和维尔内堡垒。　为占有浩罕国的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堡垒，对外楚伊斯克远征的准备。任命齐麦尔曼上校为外楚伊斯克派遣队队长。　攻陷托克马克与皮什彼克和齐麦尔曼返回鄂木斯克。　他与派任的哥萨克军长官克林斯基将军的争吵。　关于西伯利亚哥萨克人的一些叙述。

第三章……48

加斯弗尔德治理西西伯利亚的行政工作概要。　各界人士对这种工作的评价和关于这种工作最广泛的意见和评论。　加斯弗尔德离开鄂木斯克和鄂木斯克各界当时为他举行的庆祝会。

第二篇

第 一 章……69

关于中国与西欧各国的武装冲突。 缔结《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期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概述。

第 二 章……82

《北京条约》和它对于俄罗斯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重要意义。 执行这个条约的规定对于划分俄国与中国国界的关系。 极东划界委员的会议和设置东方国界的界牌。 新任西西伯利亚总督亚·约·杜加麦利将军来到鄂木斯克。 我被派任划定中国西部国界委员。

第 三 章……95

离开鄂木斯克前往塔城。 我与中国委员初期谈判的详细叙述。 使我迫不得已停止这次谈判的原因。 离去塔城前往乌尔扎尔哥萨克村庄，然后经由谢尔基奥波利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城前往鄂木斯克。

第 四 章……111

我在塔城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那里短期居留的成果。根据住在塔城时期的个人观察和我在斯卡奇科夫图书室所找到的著作以及他的指示和讲解，我对中国的初步了解。 阅读这些著作对我产生的印象。 当时在学术界和群众中对中国看法的主要分歧。 关于十七世纪我国向中国派遣的大使。 柯罗文大使的详细分析和迫使他将从来不属于中国的达呼尔与阿尔巴津城让给中国人的情况。

第 五 章……137

来到鄂木斯克和整理我所收集的关于中国国界的材料。动身去彼得堡，留居彼得堡。 返回西伯利亚。

第 三 篇

第 一 章……151

西伯利亚边界从额尔齐斯河向吉尔吉斯草原南部边区逐渐移动的历史概述。 《北京条约》所订与中国西部接

壤的国界的地形概要。

第 二 章……170

关于分布在西部国界上的中国卡伦线。 中国人视察国界和在国界上派驻我国部队的必要性。 我从鄂木斯克出发前往中国国界。 为使中国部队撤离其常设卡伦线退入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地区所采取的办法。 哈布齐贤企图在外伊犁边区东南部潜入我国境内，被普罗岑科大尉所率领的参谋本部队伍所阻止，被迫离去中国常设卡伦线。

第 三 章……180

1862年春季在塔城同中国人开始谈判前国界上的情况。为了预防中国人越过常设卡伦线侵入我国境内的新企图，必须加强派驻国界上的我国部队。 杜加麦利总督对于我的武装占领国界方案的意见。 我向杜加麦利将军呈述对他所提意见的说明。 我在科克苏边界上哥萨克村同我国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的会见。 我从该村出发前往乌尔扎尔边界哥萨克村庄和继续前往塔城。

第 四 章……199

1862年7月在塔城同中国人举行的谈判。 我国委员向中国代表提出的被接受为编制中国西部国界线草案基础的意见。 中国人的过分要求。 迫使我们终止谈判和离去塔城的情况。 1862年举行的谈判所达到的成果。

第 五 章……234

在中国国界进行地形测量工作的概要。 装备特别考察团前往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盆地的必要性。 关于1863年早春季节武装占领国界的命令。 戈卢别夫大尉在鲍罗胡吉尔河谷所进行的侦察。 在鲍罗胡吉尔卡伦中国人对我国军官和护送马队的背信攻击。 基什·穆伦斯基部队官长安东诺夫中尉的死亡。 从伊宁省南部边区出动的我国军队与中国军队的武装冲突。 这种冲突的结果。

第 六 章……250

从斋桑湖至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的黑额尔齐斯河盆地的勘查。 1862年塔城谈判结束后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事宜的形势。 外交部对我国委员在过去谈判中关于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问题的意见。

第 七 章……260

塔城谈判进行缓慢和我国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国界上的武装冲突在北京所产生的印象。 我国驻办公使与中国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因此所发生的交涉。 中国各大臣对我方国界草案的反对意见。 我国驻北京代办格林卡对这种反对意见的漂亮反驳。 我国青年外交家说服摄政王恭亲王和中国各大臣接受完全符合《北京条约》的我方国界草案。 中国各委员表示愿意举行谈判并约请我国委员前来塔城。 我国委员的到来和谈判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结局。

第 八 章……284

中国各委员通过西西伯利亚总督请求我国委员从速前来塔城。 中国各代表显出非常急于结束西部划界事宜，并最后表示同意接受我国的划界草案。 按照同中国人的相互协议用俄文和满文编成俄国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议定书。 1864年9月24日，我们与中国委员的最后一次的隆重会议和在这次会议上互相签订议定书、地图和我们与中国委员互换这些文件。 1864年《塔城议定书》作为《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的意义。

第 四 篇

第 一 章……293

在中国伊斯兰教徒或东干人叛乱时期，不可能于1865年春季开始设置中国西部国界的界牌。 对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境内这次叛乱经过情形的叙述。

第 二 章……310

西西伯利亚行政管理上的改革和设置土耳其斯坦总督。

关于管理吉尔吉斯人的新情况。 这种革新对于吉尔吉斯草原游牧居民的意义。

第 三 章……352

东干人在中国西部叛乱所引起的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沿边地区的不安状况。 我来到谢米巴拉丁斯克和从那里出发前往中国国界。 就地调查我国所属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被察罕·克根属下中国卡尔梅克人毁灭的情况。 我所采取的保卫国界的办法。

第 四 章……358

回到谢米巴拉丁斯克。 编写关于在新并入俄国领域的斋桑边区组织管理，以及保卫国界和移住武装居民的意见书。 按照赫鲁晓夫的命令，我所采取的在谢米巴拉丁斯克拘留中国大臣荣全的措施。 在我管理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时期所采取的关于民政部分的措施。 赫鲁晓夫将军委托我在斋桑湖南部斋桑边区边界地方选定应成为保卫国界驻军据点的地点。 我详细视察斋桑边区的沿边地点和建立嗣后改名为斋桑城的斋桑哨所。 因获得新任命而离开中国国界前往鄂木斯克城。

第 五 章……381

科布多省长提出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问题。 我国政府和北京政府间关于此事所发生的交涉。 我国方面和中国方面任命划定国界的全权委员。 我前往彼得堡为实地进行划分与中国西部的国界事宜。 在彼得堡的逗留和起程前往鄂木斯克。 前往中国国界。 记述我从鄂木斯克前往中国卡伦乌科克的路途情况。 我来到乌科克和同中国委员的会见。 同中国代表荣全和奎昌的谈判迅速的和完全顺利的结束。 他们同意接受我所建议的在《塔城议定书》所详细规定的国界线上设置界牌的一切条件。 我与荣全在乌科克的最后一次会见。 我在乌兰·达巴至塔尔巴哈台山中哈巴尔·阿苏山口的全部中国国界设置界牌的叙述。 克兹尔·阿亚克对斋桑哨所的侵袭。

第 六 章……436
对各种人等关于《北京条约》和《塔城议定书》的意义所持看法的详细分析。
第 七 章……519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中国西部国界的形势。 赫鲁晓夫将军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最后几年。
译名对照表……555

伊·费·巴布科夫简历

步兵上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巴布科夫在1827年生于彼得堡。巴布科夫在巴甫洛夫武备中学和总工程学校（现为尼古拉工程学校和参谋本部专门学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参谋本部，派往高加索独立军团服务。1857年，巴布科夫到西伯利亚任职，担任第二十四步兵师参谋长职务（驻在托波尔斯克）。1859年，巴布科夫被任命为鄂木斯克军团司令部作业部主任；1865年西伯利亚军区成立后，被任命为副参谋长，1869年被任命为该军区参谋长。巴布科夫担任此职直到退役（1890年）为止。在八十年代，巴布科夫曾多次署理草原地区总督职务。

巴布科夫在西伯利亚服务三十多年，执行过国家所委托的好几项重要任务，因而有机会对西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地区进行研究。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关于西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地形测量与天文工作报告中所刊载的巴布科夫论著，就是这种研究的成果。巴布科夫关于吉尔吉斯草原的地理，曾发表过下列的论文：《对吉尔吉斯草原东北地区设置俄国居民点的总意见》、《塔城消息》和《关于巴尔喀什湖及其沿岸地形调查研究的进行情况》。后一论文曾于1866年荣获中央地理学会的银质奖章。

1862年，巴布科夫被任命为同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全权委员，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重大任务。因在前西伯利亚军团管区组织地形调查研究工作并对该项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巴布科夫曾于1863年获得陆军大臣德·阿·米留亭的嘉奖。由于在巴布科夫领导下制成了谢米列钦斯克省的地形图，他曾蒙皇帝奖给金质镶嵌

宝石戒指。

1867—1868年，巴布科夫曾经署理谢米巴拉丁斯克省军政省长职务。当时边区吉尔吉斯人因俄国开始企图将其自主的国家隶属于俄国政权，曾经发生骚动。在现时的斋桑县地方，曾决定建立要塞堡垒。巴布科夫没有建筑堡垒而建立了一座斋桑城，并且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措施就平定了边区。后来证实巴布科夫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于需要确立法纪和权利的吉尔吉斯民族的和平性格是有深切理解的。

1863年，按照巴布科夫的计划组织了所谓斋桑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的轮船“万岁”号第一次出现在黑额尔齐斯河的水面上，达到了与蒙古西部接壤的吉尔吉斯草原的辽远边界地区。该轮通过斋桑湖驶入黑额尔齐斯河，并达到阿克求别天然界线处。因此早在1863年，考察团就已经建立能使斋桑边区与鄂木斯克的直接交通，并沿黑额尔齐斯河航行，同中国进行贸易。

1869年，巴布科夫曾进行勘定从沙宾达巴哈到哈巴尔阿苏之间的中俄国界，而在1883年曾勘定从大阿尔泰山到穆斯套山在萨乌尔山脉中的国界（为执行1881年《彼得堡条约》① 第Ⅷ条和第Ⅸ条所规定的变更1864年《塔城议定书》② 所定的旧界）。1869年进行勘界工作时，巴布科夫曾对交接中国的国界进行了地理上的调查研究。关于这项调查研究的报告，曾在地理学会学报《通报》第Ⅴ卷和第Ⅵ卷上发表；在该学报第Ⅶ卷第二分册上，巴布科夫还发表过《关于南部阿尔泰（或边界阿尔泰）山中通行道路的报告》。

巴布科夫从1860年起任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从1877年起任西

---

① 即《中俄改订条约》，于1881年在彼得堡交换批准。俄文本称为《彼得堡条约》。——译者

② 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此约于1864年在塔尔巴哈台订立。俄文本称为《塔城议定书》。——译者

西伯利亚地理局主任。

从地理局开办时起至巴布科夫最后离开鄂木斯克为止的十二年多的时间内，他主持西西伯利亚地理局的业务，并直接参加了地理局的工作。在任期内，制定了地理局办事《章程》，设立了管理委员会(1882年)，地理局完成了大部分的考察工作。巴布科夫对于吸收工作人员参加地理局业务的关怀，能引起一切看过地理局档案的人的注意。巴布科夫离开鄂木斯克以后，住在距离很远的地方，他不仅没有同地理局断绝联系，而且反而加强了这种联系，1902—1904年地理局的工作报告证明了这种情况。

巴布科夫退职后，前往克里米亚，住在费奥多西亚城，开始撰写他的西伯利亚服务回忆录。他的逝世，使他未能完成已经写了十五年的著作。巴布科夫直到晚年，还非常关心文学、政治，尤其是西伯利亚的生活。巴布科夫的回忆录只写到1875年。关于恩·格·卡兹纳科夫、格·弗·麦谢里诺夫和格·阿·科尔帕科夫斯基诸总督的工作情况，他都未及写出。贯穿着这些回忆录的主要线索，是巴布科夫同伊·伊·扎哈罗夫等一起积极参加的签订《塔城议定书》。

这本回忆录有赖于费奥多尔·罗曼诺维奇·奥斯坦-萨肯男爵的关注协助，得以保持死者撰写的原状出版。巴布科夫于1905年10月21日在费奥多西亚城逝世。

前　言

我在西伯利亚六位总督任内服务三十多年之久。在包括赫鲁晓夫、卡兹纳科夫和麦谢里诺夫在内的四位侍从将军任内担任了参谋长职务。

所有这些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性格、行政才干，以及他们在管理西伯利亚这样广阔地域的各个部门中所获得的见解，都是彼此截然不同的。在对同一个事务具有这样各种不同性格和见解的长官属下服务，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涯中，我常常象是不得不处于斯齐拉和哈里勃达之间（希腊神话中说，斯齐拉和哈里勃达是狭窄海峡两对岸上的两个害人怪物——译者注）。我感到厌倦，并决心退职，甚至对陆军大臣允许将来进一步提升我担任华沙要塞司令职务的盛情建议，也拒绝了。去职之后，我摆脱了，或者更正确些说，彻底避免了各种各样职务上的倾轧、嫉妒、恶意和诽谤，也避开了对我敌视的那些人们傲慢无理的狂妄行为，而这种人的极端渺小有时是用职务上的妄自尊大来掩盖的。

是啊！摆脱了这一切祸害，我可以用我国一位著名诗人的词句来加以表达：

啊，最后！从敌对的营垒里
逃出了我这满身创伤的战士……
从虚伪、背信和欺骗的世界里
终于解救了我这半死余生的人士！

退职后，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因而想到要写出我在西

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录。这种想法，得到了我在克里米亚和敖德萨居住时所结识而为我所敬重的许多人的赞许。因曾执行国家所委托的几项重要任务，并因服务而曾与当时管理军队和广阔西伯利亚边区的一些人员处于密切关系之中，我成为1860年到1890年近三十年来在西西伯利亚所实施的许多政治事件的见证人和参加人，而且很熟悉这个地区行政改革的进行情况和经济生活条件。我关于这些事件和边区管理人员的记载，对于将来阅读我的回忆录的人，或许不是没有趣味的。如果在阅读之余，他们将以同感的心情想起了我，并将以善良的语言来回忆我，那就是对于我的最大的奖励。

第 一 篇

第 一 章

离开托波尔斯克。 鄂木斯克给我的印象。 官长人员中德国人和波兰人所占的优势地位。 引起军团长加斯弗尔德将军对我不友好态度的原因。

1858年6月6日，我被任命为西伯利亚独立军团作业部主任。我前往鄂木斯克，离开曾在该处担任第二十四步兵师参谋长职务两年的枯燥无味的、寒冷的和多沼泽的托波尔斯克，没有什么特别惋惜之意。

在当时，即1858年，我觉得鄂木斯克是一个中等的不大的县城。城内属于私人所有的房屋，大多数都是木料建筑的。当时鄂木斯克还远远没有象它后来所具有的面貌，因为后来由于西西伯利亚总督侍从将军卡兹纳科夫的努力经营，已经建成了许多公家的、私人的良好石质房屋、小公园、剧场等等。鄂木斯克是1716年彼得大帝在位时建立的，而鄂木斯克堡垒是1759年建立的。1838年，在公爵戈尔恰科夫总督任内，已将西西伯利亚的军政和民政管理机关，从托波尔斯克迁往鄂木斯克。由此可见，鄂木斯克差不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具有行政管理中心的作用，这种作用还一直保持到现在。鄂木斯克要塞堡垒位置在额尔齐斯河右岸，在该河与鄂木河右岸河口所形成的三角地带，在我来到这里时，它已失去了任何军事上的意义，不久即被完全撤除。

来到鄂木斯克以后，首先使我有些窘困的——这是高级官长人员中的外族组成人员：按照种族来说，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外国民族，并且多数是异教徒。军团长加斯弗尔德将军、驻在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省军政省长弗里得利克斯将军，两人都是德国人新教徒；要塞司令戴-格拉维将军和我的前任男爵西利维尔格利姆将军，两人都是瑞典人新教徒。军政副省长古特科夫斯基上校是波兰人，派任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事长官克林斯基将军是波兰人，军团部值勤武官克鲁利克维奇少校也是波兰人，炮兵长官维里肯将军是德国人，参谋长金托夫特将军似系立陶宛人。但是不久就被瑞典人克罗伊耶鲁斯把他替代了。因此，在鄂木斯克的社会上又出现了第三个瑞典人，按照俄国籍瑞典人和俄国籍德国人习以为常的办法，他在就职之后，立刻认为必须关怀自己的芬兰同僚们，不久就把两个人安置到当时算是有油水的职位：把阿蒙特少校派任鄂木斯克边防营营长职务，尽管这个瑞典人从来没有在步兵部队服务过，对于步兵队列勤务，特别是对不久以前所颁行的新条令，是一点知识也没有的。在参谋长克罗伊耶鲁斯的庇护下，使阿蒙特在杜加麦利统率军团的全部时期内得以保住职位。但是在新任军团长赫鲁晓夫来到鄂木斯克之后不久，他立即被免职了。另一个芬兰人哈尔特林被派任鄂木斯克军医院监督的职位。我有一个好友西伯利亚人拉夫尔·尼坎诺罗维奇·克卢根，当时曾任参谋总部副总参谋长，后来向我传说，克罗伊耶鲁斯请求任命哈尔特林一事，曾在参谋总部内引起震惊。他向我说，难道西西伯利亚的地方长官真是在鄂木斯克找不出一个能够充任军医院监督的适当武官，而使我们必须从芬兰极北部，几乎是从乌列阿玻尔格调来一个瑞典人哈尔特林！加斯弗尔德自己当时拥有一伙纯粹的德国人。例如，他的副官是勃留门塔利、埃克勃拉特兄弟二人，后来换为弗里得利克斯，又换为弗兰加里。再如在加斯弗尔德属下曾有

作为传令官的临时派任武官：根采和吉尔吉斯人瓦利哈诺夫。

一句话，没有一个具有俄国姓氏的人。因此，我来到鄂木斯克以后，立刻陷入了一种好象是德国人的侨民区。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乍到的新人，感到最奇怪的，是在这个俄国远方的边区里，体现俄国国旗和代表俄国国家本质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人们，乃是德国人和波兰人。

这时，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下面一首著名歌曲："为什么我使西方不称心(俄罗斯应当歌唱)。难道是因为我爱它过了分！我生来具有一颗善良的心，这就是我的全部不幸；每一个什麦尔人在我这里生活得还不自由自在吗？更不用提那些德国人：他们享有一切的优待和尊敬；在俄罗斯他们要啥有啥，有求必应，我对他们挥金如土，我也丝毫不吝奖赏，不管向哪里看，处处都是德国人，要不就是克拉库斯人。"

来到鄂木斯克后，我除了面临着要在德国人长官中间了解情况的困难以外，还由于所形成的不愉快环境，完全出于意外地陷入了同我的长官加斯弗尔德将军不和睦的关系中。为了说明引起这种关系的原因，必须回溯到我离开彼得堡前来西伯利亚的时期。

我被任命为第二十四步兵师参谋长，这个师分布在西西伯利亚总督的管区内，即在托波尔斯克省和托木斯克省，以及西伯利亚吉尔吉斯州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内。这个任命正是发生于决定在我国参谋本部内设立师部参谋长新职以代替旧有师部军需长的时候。当时的参谋本部高级官长：参谋总部军需长男爵维利格利姆·卡尔洛维奇·利文和参谋本部副司长安东·安托诺维奇·斯加隆将军，显然都是曾经积极参加设立这种新职一事的。因此，男爵维利格利姆·卡尔洛维奇，尤其是安东·安托诺维奇·斯加隆，都曾恳切要求我详细写出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工作报告。不言而喻，他们身任参谋本部军官团的首长，都要知道，新设立的职务在我国军

队中将受到怎样的对待，并在何种程度上在实践中表明是一次完全合理的军事管理措施。我往西伯利亚之前，曾到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加隆处拜谢辞行，他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允许尽力协助，在辞别时又表示说，他急切期待我从西伯利亚——他的家乡来信。原来，安东·安东诺维奇是在距离鄂木斯克一百三十八俄里半的安德隆金村出生的。他的父亲是有功勋的和获得乔治十字勋章的将军。他所统率的分布在西伯利亚的各龙骑兵团，在1811年拿破仑进攻威胁俄罗斯的时候，曾被调出西伯利亚，并于1812年编入抵抗法国人的西方各军之一。在西伯利亚各团所参加的最初的一次战役中，即在斯摩棱斯克城的战役中，安东·安东诺维奇的父亲阵亡了。

我不能在来到西伯利亚以后很快地履行斯加隆的委托，即向彼得堡给他写出我对部队所看到的一切，主要是属于我的师部参谋长职务范围内的事务。必须实地观察，然后对于边区和分布在三百一十万零四千平方俄里面积的、差不多等于西欧大陆全部地域的西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广阔地区的师属各部队的情况，进行了解。

我在获得军团长加斯弗尔德批准视察师部各部队之后，于1858—1859年冬季从托波尔斯克出发，前往鄂木斯克、卡英斯克、科雷万、托木斯克、马林斯克[①]、巴尔瑙尔、比斯克、库兹涅茨克、石山口、谢米巴拉丁斯克、谢尔基奥波利和科帕尔，并从该处经由谢米巴拉丁斯克和鄂木斯克返回托波尔斯克。关于视察各部队及其管理机关的结果，我曾报告给该管官长，此外关于我自己的师部参谋长的管理工作，也详细地、毫无隐讳地秘密函报斯加隆，并在密函一开头就提到，我写这封函件，是为了实现离开彼得堡前往西伯

① 即阔吞屯。——译者

利亚以前他对我表示的愿望。显然，我的长官同时是参谋本部军官团中的高级人员，他所表示的愿望，对我来说就等于命令。但是在执行这项命令时，我觉得在上述函件中所叙述的一切情况，是为了使斯加隆知悉，具有机密的性质，从而这种关系只是限于我们彼此之间。使我非常惊异的，是在我发出此函之后，经过很短时间就接到参谋总部军需长侍从将军维利格利姆·卡尔洛维奇·利文男爵的公文通知我说，他已将我的函件呈送陆军大臣，大臣阅后曾命令对我完成师部参谋长职务的有益工作，宣布嘉奖。斯加隆也同样来函通知我，并附带说明，他因我克尽职责和给参谋本部带来荣誉，表示衷心感谢。除了这种意外的情事外，我的函件曾由陆军大臣侍从将军苏霍扎涅特作了极为赞许的批语，发交军团长加斯弗尔德将军，饬令在军团部的命令中宣布对我表扬。当然，加斯弗尔德都照办了，但是用极其抑制的词句发布了命令，只是为了走走形式，而加斯弗尔德本人每遇适宜的机会，就力图对我进行报复，这是因为他获得我的函件是所谓间接而来的。幸而，这种情况没有继续多久，到第二年即1860年，就派来了新任军团长亚历山大·约西弗维奇·杜加麦利。

第 二 章

加斯弗尔德将军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最后几年。 1840—1860年时期西伯利亚主管机关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事务管理情况的概要。 占领谢米列欽斯克和外伊犁边区，以及建立科帕尔和维尔內堡垒。 为占有浩罕国的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堡垒，对外楚伊斯克远征的准备。任命齐麦尔曼上校为外楚伊斯克派遣队队长。 攻陷托克马克与皮什彼克和齐麦尔曼返回鄂木斯克。 他与派任的哥萨克军长官克林斯基将军的争吵。 关于西伯利亚哥萨克人的一些叙述。

古斯塔夫·赫里斯季安诺维奇·加斯弗尔德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最后两年，忙于筹备经费和物资来装备远征军队，以便占领浩罕国的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两堡垒。为了巩固我国统治外伊犁边区吉尔吉斯人的政权，这种措施被认为是必要的，1854年在该边区阿拉图山麓阿拉木图河岸建立了维尔內堡垒，现名为维尔內城。

在叙述派遣远征军越过楚河去攻占上述浩罕的堡垒以前，我认为必须先将西伯利亚主管机关当时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的实际管理情况作一概述。

大家知道，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列普萨河是划分吉尔吉斯草原南部我国属地和当时独立的大汗国和吉科卡门汗国吉尔吉斯各部族的假定疆界线。1847年被认为是大汗国吉尔吉斯人逐渐归化俄罗斯国籍的开始。同年2月17日，皇帝批准了外交国务大臣叙述统治大汗国原则的陈奏。经过许多考虑，认为在中汗国所规定的统治吉尔吉斯人的制度，在大汗国实施是不适宜的。因

此，为了维护秩序和控制新的属民，决定尽力支持最主要族长即各苏丹的权力和势力，这些最主要族长是：休基·阿勃莱汉诺夫、阿利·阿季列夫和加基姆·库拉诺夫（后者在 1850 年为其养子捷泽克·努拉利耶夫所接替）。

为了通过各该苏丹巩固我国对于汗国的势力，曾从校官中间向他们派送了警卫官员。

当时曾任西西伯利亚总督的戈尔恰科夫公爵认为，为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加强布置俄国事务，必须改变最初所拟定的在大汗国保持常备部队的办法，而将第九团哥萨克军全部从比斯克防线移驻草原，借此奠定俄罗斯人定居在帝国这一边疆地区的基础。1848年所开始的哥萨克人迁移，在1850年已经完成。新移来的哥萨克居民都已定居在阿亚古斯、科克佩克丁斯克和科帕尔（现时名为科帕尔斯克城）各堡垒地方。

占领了建立在所谓宗克山谷的科帕尔堡垒以后，我国在吉尔吉斯草原领地的假定界线，最初伸延到卡拉塔尔河，后来就伸延到伊犁河，尽管这个河流在实际上不能认为是边界线，因为已算作我国臣民的大汗国吉尔吉斯人的许多部族都是在伊犁河彼岸游牧的。从实质上说，就连这些吉尔吉斯人的属民关系当时也差不多是名义上的：因为在伊犁河彼岸并没有据点，所以要用驻科帕尔的军队来使我国在外伊犁的属民保持绝对服从，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这次在接受大汗国为我国臣属时，也重复表明了一个由来已久的并为人所共知的真实道理，即接受游牧民族入籍比日后使其保持顺从要容易得多。中国人方面也是这样，由于爱好和平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伊犁（伊宁）地方政权的软弱，他们就不能使边区吉尔吉斯人完全服从自己。总而言之，中国人在乾隆皇帝在位时，于1757年征服准噶尔以后，所获得的对吉尔吉斯人的势力，后来大大失去了其从前的意义。

浩罕人很快利用了大汗国吉尔吉斯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这种变化。三十年代末，穆罕默德·阿里汗在位时，浩罕人在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牧区已经建立了几处不大的堡垒（库尔干），而向大汗国，为了使其服从自己和对吉尔吉斯人征收赋税，已经开始把军队派遣到卡拉塔尔河。该汗在1842年的逝世和他死后在浩罕国所发生的内乱，虽曾削弱了浩罕人在大汗国的权势，但是在塔什干执政者诺尔·穆罕默德在位时权势又重新加强了。

1847年，因我国在锡尔河岸建筑雷姆堡事件，浩罕国王阿勃杜拉·阿穆尔曾派来使节。戈尔恰科夫公爵发了一封信件，由该使节带交当时浩罕国的独裁人物明·班格·穆苏利曼·库尔。在该信件中顺便通知，浩罕人对已归入俄罗斯国籍的大汗国吉尔吉斯人和在我国保护下的吉科卡门人所采取的行动，可能引起我国政府的疑虑，该汗既然珍视俄罗斯的友谊，一定不会容许继续这种我国政府只能认为是破坏友好关系的行为。此外，还曾向浩罕国汗王致送国书，其中声明，只要浩罕政府依照善邻友好关系行事，俄罗斯帝国与浩罕国间的和平与相互和睦关系，将是不可破坏的。但是我国方面对浩罕国政府的所有这种劝告，都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塔什干的执政者诺尔·穆罕默德照旧向大汗国吉尔吉斯人牧区派遣自己的密使，对该民族发布煽动性的号召。浩罕人已经使该民族逐渐倾向到自己方面来了。浩罕人在大汗国吉尔吉斯人中的影响，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从前向游牧人征收赋税之后，他们的军队通常都是撤回自己国境内。但是从四十年代末起，浩罕人开始将卫戍部队留在外伊犁地区他们所建筑的堡垒中过冬了。例如，在1849年，一支浩罕部队曾在卡斯克连河岸托乌楚别克附近的堡垒中留驻卫戍队七十九人，还有十名浩罕人占据了奇利克河上游属于大汗国苏丹鲁斯捷姆所建筑的另一堡垒。

但是，鲁斯捷姆和阿利·阿季列夫苏丹在同浩罕人进行经常交涉的同时，曾经迭次请求派遣俄国部队前来伊犁河彼岸，以便把那些似乎曾向吉尔吉斯人征收过重税的浩罕人从他们的牧区里驱逐出去，并制止各汗国属民之间的内部纷争。

实际上，两个苏丹，特别是狡猾的鲁斯捷姆，都抱有完全另一种企图——他们希望俄国部队留驻他们的游牧区将有助于恢复他们在民众中已丧失的权势。

在大汗国事务中产生的地位不明确的吉尔吉斯人这种两面性的从属关系，必须及早采取相应的办法，使浩罕人离开伊犁河盆地，并在大汗国确立秩序，使吉尔吉斯人对我国政权保持应有的服从。在这种企图之下，我国军队急速占领外伊犁边区就成为必要了。但是，戈尔恰科夫公爵认为这种办法是过早的。按照他的意见，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加强在科帕尔的地位，并巩固自己在谢米列钦斯克边区的组织制度，即加强伊犁河以北地区哥萨克人的定居，以便随时具有作好战斗准备的武装居民。因此，戈尔恰科夫公爵最初甚至禁止在大汗国吉尔吉斯人处供职的警卫官弗兰加里少校在伊犁河彼岸作任何活动，并且命令他避免在吉尔吉斯人内部纷争中作出积极的居间调解，尤其是，总督曾经说明，我们还没有有效地维护我国命令的方法。

但是事件的演进，很快地迫使戈尔恰科夫公爵放弃了他的观望政策，使他不得不采取坚决的行动。

禁止我国军队越过伊犁河，毫无疑义已为吉尔吉斯人所共知的事。吉尔吉斯人利用这种情况和中国在边境岗哨地方守卫力量的薄弱，而且不顾虑同他们不断保持经常交往的浩罕人的反对，就醉心于肆无忌惮地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地劫夺了从中国伊宁前往浩罕的商队。我国政府预料各苏丹将制止他们部族的狂暴任性行动，但这种估计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得到证实：苏丹本身，例如鲁斯

捷姆，曾经参加了掠夺和强劫。

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的这种骚乱情况，因1850年1月得到关于浩罕人打算以更强有力的卫戍部队占领托乌楚别克堡垒的消息而更加复杂化了。这种情况使戈尔恰科夫公爵完全确信，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坚决行动，将浩罕人逐出伊犁河盆地，为此，他打算首先占领和拆毁托乌楚别克堡垒。

从伊犁河盆地逐出浩罕人，在当时我国在穆斯林世界这个边界地区所处的形势下，不容怀疑在政治关系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伊犁河彼岸，在大汗国吉尔吉斯人所占据的土地上建立浩罕人的堡垒，可能加强浩罕人对这些吉尔吉斯人的权势，而动摇俄罗斯国在大汗国的权势。在这种不利于我国的情况转变中，我国将被切断同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的联系，而前往喀什噶尔的商队道路也将会落入浩罕人的掌握之中。因此，尽管戈尔恰科夫公爵力求即使暂时避免在外伊犁边区采取坚决行动，而形势却迫使我们刻不容缓地注定地要深入到中亚细亚去。

决定派往外伊犁边区的远征部队，以参谋本部古特科夫斯基大尉为长官，由步兵五十人、一个哥萨克连和轻炮二门组成。远征部队的目的，是从伊犁河盆地逐出浩罕人和拆毁托乌楚别克堡垒。曾决定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并命令该部队在完成所担负的任务后，即行返回科帕尔。可惜，边界地方长官方面，显然对适当地装备派遣部队和尽量充分地供给到如此辽远草原远征的军队所必需的一切物资和用品，并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首先，派遣部队本身的组成力量是很薄弱的，而两门轻炮在攻击建筑得特别坚固的堡垒围墙时，不能得到什么成效。

总而言之，这样薄弱组成的我国派遣队，从作为唯一据点的和行动根据地的科帕尔堡垒向极为遥远的伊犁河彼岸地方深入进行活动，在显然倾向浩罕人的吉尔吉斯人那种众所周知的轻率性下，

最后在统治人数众多的杜拉托夫部族的苏丹阿利的两面派的行为下和苏丹鲁斯捷姆的迭次被发现的叛变行为下，是极为冒险的。但是对于吉尔吉斯人的这种种背信行为，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但如此，按照某些情况判断，甚至在鄂木斯克大本营内，不仅关于浩罕人，而且关于大汗国的实际情况都没有确切的情报。警卫官的报告，大部分是片断的、表面的、不完全的，所根据的是吉尔吉斯人的空口无凭的陈述，而没有经过实地仔细检验，并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从这种报告中不可能弄清大汗国吉尔吉斯人中间，特别是各汗国最有权势人物的阶级中的当时意向。因此在开始远征之前，弗兰加里男爵曾密报说，浩罕人正忙于内部纷争和同布哈尔人的敌对冲突，将无力侵入外伊犁边区。至于大汗国吉尔吉斯人，似乎已与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结成同盟，并与他们的大牧主订立了协力反击浩罕人的条约。

警卫官这种报告的确实性，显然是极可怀疑的，因为大汗国吉尔吉斯人和吉科卡门汗国吉尔吉斯人，是彼此经常处于敌对关系之中的。

1850年4月4日，远征部队从科帕尔出动。来到苏丹阿利·阿季列夫村庄所在的比扎河河口以后，古特科夫斯基大尉向驻在托乌楚别克堡垒的浩罕卫戍部队官长阿克-库拉发出信件，劝告他将浩罕人从伊犁河盆地撤出，并且不要干涉大汗国的内政。阿克-库拉的复信，尽管是用和平语气写成的，但同时却按亚洲政策的惯用方法，表现为极端的不明确和模棱两可，显然，是以拖延事情和赢得时间为目的。

我国派遣部队转向伊犁河主要河岸之后，立刻显出，大汗国内的人心不安状态，已经具有紧张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期待取得所允诺供给我国部队的运输工具和各种用品。例如，苏丹鲁斯捷姆的儿子阿勃莱，虽早于部队尚

在伊犁河右岸时就已经来到部队，但并没有引导部队直接前往钦基利迪天然地区，而前往通向图尔根河口的奥古兹-乌特湖地方，他保证说，这里已经集合有十一只渡船，而驮运的骆驼和马匹则集合在距离渡口十五俄里的地方。据阿勃莱说，钦基利迪是沼泽地带，不便于渡河。而在部队来到苏丹鲁斯捷姆的村庄以后，阿勃莱则声明说，没有哥萨克兵士的协助，不能收集到骆驼。鲁斯捷姆也推脱说，他由于怕在浩罕人面前暴露俄国政府的意图，关于此事没有预先发出任何命令。同时派遣队开始从各方面得到消息说，许多村庄发生了波动和混乱，而且吉尔吉斯人已经开始武装起来。当时古特科夫斯基大尉就向大汗国一些酋长和头目发出安慰的信件，向他们说明我国派遣部队越过伊犁河，是专为从伊犁河盆地逐出浩罕人，而不会采取反对吉尔吉斯人的任何敌对行动。

4月19日，古特科夫斯基大尉收到经由阿奇凯酋长转来的浩罕司令官阿克-库拉的另一封信。这封信是用比第一封信较高的语调写成的，对这一点，由浩罕人组成的托乌楚别克堡垒卫戍部队从吉尔吉斯人方面所得到的同情响应，是起了不少促进作用的。阿克-库拉在他的来信中肆无忌惮地向古特科夫斯基大尉声明，俄罗斯与浩罕国间从前约定的国界，是无效的，因为现在浩罕国内已是另一个朝代——基普恰克朝在统治，它要把全部穆斯林世界联合在自己势力之下，就是说一方面要把自己的领域扩大到宗克盆地，即到科帕尔，另一方面要扩大到巴彦-阿乌尔。明年即将派遣部队拆毁科帕尔堡垒，汗国军队将由该处深入到科克切托夫地方。

“如果俄国部队官长愿与汗王进行谈判，即可派人前来，他将把他护送到浩罕国去。

“如果俄国官长下令开始军事行动，则卫戍部队也将实行抵抗。”

对于这个信件曾经置之不答，4月19日当日晚间，派遣部队即

行开近托乌楚别克堡垒，在距离半俄里处停止下来。俄国炮火的几次试行攻击表明，堡垒的围墙不论在建筑材料的坚固方面，还是在适应地方条件的建筑方法方面，都能抵御轻炮火力的射击。第二日，队伍从阵地出发，更加逼近堡垒。在我国部队这样移动时，浩罕国卫戍部队曾经进行出击，当即被我军击退，而且浩罕人在急忙退却时曾将他们的一门大炮沉没在池沼里。

从距离堡垒四十俄丈处所发射的炮火再次证实，不但不能摧毁任何一个炮楼，而且不能把防护堡垒入口的墙壁打开缺口。墙壁牢固地抵御住了我方的炮弹射击，炮弹只能把它打穿，但不能使泥土散落。当时古特科夫斯基大尉决定用不加掩护的兵力去占领堡垒。但是可惜这种尝试也没有成功：派出七十五人携带铁锹和斧子前往拆毁入口前面的墙壁，当即遭到强烈的枪火射击，以及掩藏在堡垒内的浩罕人向他们投出的石块、甚至烧红的煤块的攻击。我方部队与被围在堡垒中的人们开始互相射击，而且一个哥萨克兵士的步枪受到堡垒内浩罕人的射击，枪口被打毁了。

托乌楚别克堡垒，无论看来是显得如何微不足道，但是墙壁是用泥土掺毛混合凝固起来的坚硬鹅卵石砌成的，它抵住了我国部队想加以破坏的一切努力，而我国的突击部队必须撤退。优势是在浩罕人方面，他们藏在自己的堡垒墙内，完全避开了我军的射击，同时却完全能够从堡垒的墙壁和炮楼上的射击孔开枪打败我们。

同时，敌视我军的一帮吉尔吉斯人（兵力达四千骑之多），从远处监视我国派遣队的行动，他们看到浩罕人已经击退了我方的进攻并坚守着堡垒，立刻就从后面向派遣队移动，然后从各方面把它包围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并考虑到所获得的关于浩罕国卫戍军增援部队将从皮什彼克方面到来的情报，要继续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来攻占托乌楚别克堡垒，都是不可能的，于是古特科夫斯基

大尉就决定向伊犁河撤退。我方的损失，是死一人伤七人。

派遣队一撤出托乌楚别克附近的阵地以后，吉尔吉斯人就毫不放松地跟踪追击，并从两翼把它包围起来。日落之前，那帮吉尔吉斯人利用自己的人多势众，竟至敢于发动齐攻，从各方面猛扑撤退中的派遣队，但是被三次炮火击退。到了夜间，派遣队停止前进，并以骆驼、帐篷、饼干口袋和用拴马炮绳从炮的前车到弹药箱围起来，而形成了方形阵地。

大炮被安置在方形阵地的四角，哥萨克兵和步兵都分布在方形阵地的各个正面。在阵地中间安置拴在一起的马匹。没有燃起火来，已经到来的黑夜对于队伍的安全也成了一种保证。而吉尔吉斯人却燃起火来，分布在离开我军露营地点三俄里处过夜。

第二天，即4月21日，派遣队把辎重夹在中间，队伍的头尾各有炮一门，并由哥萨克队伍在两侧掩护，前往阿拉木图河。

在阿拉木图附近，在鲁斯捷姆的旗帜下纠合了新的一帮吉尔吉斯人，使原有的人群增加到七千骑，而据另一情报则增加到一万三千骑之多。尽管鲁斯捷姆也曾向古特科夫斯基大尉送来枪弹二粒，作为保证停止敌对行动的表示，但是吉尔吉斯人却千方百计地尽力阻难我国派遣队的继续前进，在部队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物，在上坡和下坡地方挖了壕沟。那时古特科夫斯基大尉就决定，向吉尔吉斯人村庄所在的正北方向前进。

派遣队决定奔新方向前进的行动，迫使大部分人群驰往救护他们的村庄和牲畜，害怕我军的侵袭，而在派遣队中的吉尔吉斯人就自告奋勇引导部队直接前往伊犁河的钦基利迪渡口。自此以后，我国派遣队就顺利地继续进一步的撤退，只是偶然受到吉尔吉斯人的惊扰。

4月25日，派遣队到达伊犁河，并乘哥萨克人用芦苇编扎的八个筏子渡到右岸。在这撤退的全部时期，我方有哥萨克人二人受

伤。吉尔吉斯人的损失则比较大，死亡达到一百五十人之多。

古特科夫斯基大尉的远征表明，叛变的苏丹肯尼萨尔·卡西莫夫在大汗国内造成的骚乱，还没有平息下来，而且在最近时期，由于浩罕人的阴谋甚至变得更加严重了。可以说，从我国派遣队在伊犁河彼岸刚一出现的时候起，大汗国吉尔吉斯人方面，如上所述，就对派遣队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并且不是偶然的，而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原来，吉尔吉斯人已经决定与浩罕人联合起来反抗我方的行动。浩罕人通过在我国派遣队充当向导的吉尔吉斯人的帮助，对于我国派遣队的组成人员、各兵种军队人数、部队为攻占堡垒所拥有的工具，以及行军所预定的必经道路，都能得到最确实的情报。可以确证这一点的，是酋长阿奇凯从派遣队逃跑投向浩罕人和鲁斯捷姆的儿子阿勃莱的叛变，后者曾在我国部队中千方百计力图麻痹我们的警惕性，并延缓派遣队在国内的行动，从而使占据托乌楚别克堡垒的浩罕卫戍军获得时间，来准备防卫和等待从皮什彼克前来的援军而加强力量。已经诱引吉尔吉斯人许多部族来追随自己的大汗国各苏丹和酋长的公开叛变与出卖行为，对我国边疆官长来说，可以作为教训的例证，使他们认识到温和办法和一切和解精神的行为，都不能使亚细亚人一遇到适宜机会时不进行叛变，而且由于这种民族的粗暴和野蛮，只有用恐怖手段，才能使他们完全服从。古特科夫斯基大尉的远征队，也证实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原则，即对任何敌人，无论他是如何微不足道，都不可加以轻视。不遵守这一原则，曾经使我们在与中国人和中国所属的各边区外族发生武装冲突时，不止一次地遭到许多可悲的意外事故，关于这一点我将在适当场合详加叙述。可是，我国边区官长却显然以绝对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国中亚细亚的敌人。例如，一个唯一忠于我国政府的、年已衰老的大汗国苏丹休基·阿勃莱汉诺夫曾经警告说，不要信赖吉尔吉斯人，在部队中要有只有经过考验

的、完全可靠的和忠于我国的人们，而古特科夫斯基大尉对这个警告想必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最后，如果假定说，我国派遣队官长已经知道大汗国和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之间早已存在的敌对关系，知道他从后者这方面很快会得到支持，而不是遭到反抗，那么令人不解的是：他为什么不在从托乌楚别克堡垒撤退之前，决定使哥萨克快速队突击最近的吉尔吉斯人村庄。这种大胆的突击一定会诱引大群吉尔吉斯人离开我国部队，从而使部队能畅行无阻地退往伊犁河。可以保证说，这种袭击将成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完全毁灭伊犁河盆地的吉尔吉斯人村庄的信号，因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在大汗国已不服从俄国政府从而失去了受到保卫和庇护的权利时，必将赶快利用这种真正有利的机会。可以确证这一点的，是大约在这个时期，吉科卡门人对伊犁河盆地最近的吉尔吉斯人村庄曾进行袭击，而且从那里赶走了九百匹马。此外，吉科卡门人同时还对浩罕国皮什彼克堡垒进行了勇敢的袭击，该堡垒因浩罕军出发去增援托乌楚别克堡垒卫戍军而已经没有防卫力量。浩罕人得悉吉科卡门人向皮什彼克出动，不得不从中途折回皮什彼克。

我国远征军在伊犁河彼岸的不利结局，鼓舞了浩罕人，他们开始使托乌楚别克堡垒具有更好的防卫力量。同时吉尔吉斯的各区尽力保持互相联合，在它们所派出的先头岗哨保护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显然吉尔吉斯人已经决定，在我国对伊犁河彼岸有新的动作时，如果我国派遣队人数很少，即对俄国人实行抵抗，或者退入浩罕国境。

第二年，即1851年，新任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接管了军队和边区时，那时曾经决定采取坚决行动，攻击托乌楚别克堡垒。

开往伊犁河彼岸的由更坚强组成的远征部队，在哥萨克上校卡尔宾切夫领导下，攻占并拆毁了托乌楚别克堡垒。

为了彻底确立我国对大汗国和吉科卡门汗国吉尔吉斯人的政

权，认为必须在外伊犁边区设有巩固的据点，并在该处移住武装居民。为达此目的，曾于1854年在阿拉图山麓阿拉木图河岸建立了维尔内堡垒，现为维尔内城，并在该处附近于1855—1856年建立的大、小阿拉木图哥萨克村庄内，移住了两个哥萨克连。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只要楚河地方存在着浩罕国的堡垒，在外伊犁边区居住的吉尔吉斯人中的治安，就不可能巩固。浩罕人从这些堡垒中完全可能有时派出自己的密使，来煽动属于我国的大汗国和吉科卡门汗国的吉尔吉斯人，在这种充满宗教狂热的宣传成功时，就与他们联合起来行动，扰乱我国在外伊犁边区的新移民区。并且这个边区与谢米列奇之间由力量薄弱的哥萨克巡查队所占据的唯一的道路交通，也会蒙受危险。因此，加斯弗尔德在拆毁托乌楚别克堡垒、建立维尔内堡垒和在附近地方移住两个哥萨克连以后，认为必须准备物资来武装派遣队，以便占领楚河彼岸浩罕国的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堡垒，并且预定于1860年完成。

1860年冬季，我因职务关系留在彼得堡，在我往鄂木斯克之前曾接获陆军大臣恩·奥·苏霍扎涅特的公文，其中包括转交加斯弗尔德的密信。

在该密信中顺便通知说，军团司令官关于派遣远征军越过楚河去拆毁浩罕国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堡垒的拟议，已蒙皇帝批准，并蒙上谕指示：要做好派遣远征军的一切准备工作，但是只要浩罕国方面没有显露新的更加坚决的与我为敌的行动，不得开始实行。当经委派参谋本部阿波隆·埃尔涅斯托维奇·齐麦尔曼为外楚河远征军首长和外楚河派遣部队司令官。

阿波隆·埃尔涅斯托维奇因曾在高加索与我共同服务而与我相识，在往西伯利亚之前曾来我处会面，我因预定还要在彼得堡留一些时候，曾向他建议到鄂木斯克以后（当时在鄂木斯克没有好的旅馆），住在我的住所，到城内各处去可以使用我的马车。

齐麦尔曼很感激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初春的时候离开了彼得堡，经过鄂木斯克前往维尔内堡垒。

齐麦尔曼具有卓越的才能，受过优良的教育和培养，同时是很好交际的人。他既博览群书，又有特殊的记忆力，在不多几个朋友的小圈子里，他是个极有趣味的谈伴和出色的讲故事的人。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应当提到他译得很好的拉古兹斯基公爵的《莫尔蒙元帅回忆录》。此外，齐麦尔曼还写过几篇短文，发表在《高加索报》和他曾有一个时期担任过编辑的《北方蜜蜂》上。在这些短文中所引人注意的，是描写曾在格哈河右岸与山民斗争事件中，由于自己的异常勇敢而为高加索人所共知的松任前哨防线官长恩·普·斯列普佐夫将军的英勇牺牲事迹。齐麦尔曼作为这一光辉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所写的文章，曾在1852年《高加索报》第二号上发表。在第二年，1853年，因在我国高加索-土耳其国界上开始军事行动，齐麦尔曼被派往梯弗里斯省军政省长陆军中将安德罗尼科夫公爵所属的阿哈尔齐赫部队服务。1853年11月14日，齐麦尔曼在苏普利斯与土耳其人的战役中，表现了特别的功绩，经过战斗占领了坚强的敌人阵地。他因这种功绩曾蒙奖给四级圣乔治勋章。后来他转入克里米亚军，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著有功绩，曾经一度担任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军部队作业部主任职务。由于奇异的偶合，齐麦尔曼因军事行动中著有功绩和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曾经获得两个同样的奖赏：两柄英勇金佩刀。齐麦尔曼作为参谋本部的一个战斗武官，而被选拔为预定对浩罕人作战的外楚河派遣队官长，是完全适当的，这一点后来就出色地得到了证实。

在最近的土耳其战争中（1877—1878年），齐麦尔曼已经担任军团长的职务，也积极参加了战役，率领所属部队保卫多布罗加，抵抗土耳其军队的进攻，这大大地促进了在欧洲部分土耳其各战场上作战的胜利进行。齐麦尔曼于1881年在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内

逝世。但是齐麦尔曼在具有一切优点的同时，却是脾气暴躁，并且一般说来具有不稳定的性格。他在争论中的固执己见、尖锐的批评和讽刺的语言（由于自己的炽烈性格，不是常能抑制自己）都引起了粗鲁狂妄行为和令人惋惜的冲突，因而给自己招惹出来不少的敌人和仇视者。他在鄂木斯克居住期间，也没有避免争吵，关于此点将在下面详加叙述。

我来到鄂木斯克之后，即将带来的紧急通知送交加斯弗尔德将军，他在此后不久就离开鄂木斯克前往维尔内堡垒，以便就地指挥我国各派遣队的活动。在这些队伍当中，有两支部队早在初春时候就已经派到伊塞克湖南岸，来对抗三月初侵入我国所属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牧区的浩罕人，因为他们打算在那里建筑堡垒和征收赋税。但是看到我国部队向伊塞克湖西部和东部方面行动之后，浩罕人很快就从我国境内退出，越过天山前往纳伦河上游地方。我国部队从伊塞克湖南岸返回维尔内堡垒以后，受到了军团长的检阅，他发下各种命令，装备齐麦尔曼率领下的越过楚河的远征队。按照发给他的训令的意旨，他应当与楚河彼岸的部队采取行动，攻占和拆毁浩罕人的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两个堡垒，但是必须在浩罕人给与口实，即侵入我国境内的时候，才能实行。不久发现，我国向伊塞克湖的行动，并没有阻止浩罕人的敌对阴谋。六月末，他们的大群数达五千人之多在卡斯捷克堡垒（在维尔内迤西八十俄里）外围地方出现，但是被齐麦尔曼上校的部队追到吉连·埃格尔河，并被击溃。此后，齐麦尔曼因奉到上述命令，决定刻不容缓地越过楚河去攻占浩罕人的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堡垒。为此目的，在卡斯捷克地方集合的由六个步兵连、五个西伯利亚哥萨克连和野炮六门、山炮二门组成的，还带有炮兵和工兵修配队的我国部队，涉水越过楚河，突然在托克马克出现，经过短时间的攻击之后，托克马克就向齐麦尔曼上校投降了。这一战役，夺获旗帜一面、无

炮架的铁炮二门和少数堡垒枪械与兵刃。齐麦尔曼允许被占领堡垒内的卫戍队的请求，按照东方习惯将卸下的弹头一枚送给浩罕人，表示卫戍队的生命将是安全的。

我国部队拆毁托克马克堡垒的围墙以后，即向皮什彼克前进，于8月30日到达。经过五天的包围，皮什彼克于9月4日投降。

在这短期围攻的时候，在勇敢的和调度有方的军官奥布赫上尉的指挥下，通过炮兵连炮口发射的我国一门大炮曾经作出特别出色的射击。安置在皮什彼克炮楼上的敌人大炮，都被打毁，而且我国的一颗炮弹打入浩罕人五俄磅重炮弹的大炮炮膛里，紧紧地塞在里边。投降了的堡垒的战利品有：司令官阿塔别克·达哈的斧钺一把(加斯弗尔德称为残暴的阿塔别克斧子)、旗帜三面、铜炮五尊、小铁炮十一门，最后是堡垒的钥匙一把，看来完全不是当地的亚洲制品，而是最普通的、很简单的我国钥匙，似乎是在伊尔比次克市场上买来的。后来，在齐麦尔曼回到鄂木斯克之后，当知道了这把钥匙和上述其他战利品一起运到鄂木斯克后，在城内各街道运载而过，他大为愤怒。

齐麦尔曼从外楚河地区返回以后，在鄂木斯克作短时的逗留，鄂木斯克军界曾举行一系列的宴会和晚会，借此尽力为皮什彼克的征服者举行祝贺。遗憾的是，在一次宴会上，即在上校沙霍夫斯基公爵所举行的邀请齐麦尔曼参加的宴会上，竟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件，差一点以决斗作结局。在这次宴会上被邀请的人员当中有：参谋长金托夫特将军、派任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长官克林斯基将军、我和鄂木斯克高级社会的一些其他人员和夫人。

在客人中一开始就展开了关于不久以前楚河彼岸远征军的热烈谈话，谈到西伯利亚军团部队，包括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的参加。齐麦尔曼夸奖了步兵和炮兵，而对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的战斗品质则评价不好。齐麦尔曼作为曾经多次参与远征军与山区人作战，

和熟悉高加索边防哥萨克军的奋不顾身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高加索人，对于西伯利亚哥萨克军所表示的意见是相对而言的，即把他们同克鲁科夫斯基、斯列普佐夫、卡姆科夫等各首领领导下的、在高加索山中经过浴血战斗考验的高加索弟兄互相比较起来说的，无可争辩，高加索哥萨克军在战斗方面比西伯利亚哥萨克军优越得多了。

克林斯基将军听到这种对自己哥萨克兵令人不愉快的评语以后，充满着老骠骑兵的忿怒，扑向齐麦尔曼加以斥责：发生了一场大争大吵，在吵闹炽烈的时候，克林斯基向齐麦尔曼喊道：你怎敢对我这样无礼！立正！

这种语言对齐麦尔曼起了大为震惊的作用，因为他正在天天等候自己升为将官的命令。齐麦尔曼忘其所以，举起拳头奔向克林斯基，天晓得，如果不是金托夫特将军和我赶快把敌对的双方分开，这场混乱就不知如何结局了。克林斯基向主人沙霍夫斯基公爵道歉说，他不能留待进餐，说完就立刻回家去了。这种情景给了所有在场的人以沉重的影响。宴会是在沉默无言和不快的气氛中进行的，人们都急于等待散席，赶快离去。第二天，克林斯基将军派来的对齐麦尔曼决斗的见证人，来到了齐麦尔曼所居住的我的宿舍。但是由于加斯弗尔德的亲自干涉，决斗没有演成，在他那里进行了敌对双方的和解，尽管也许不是诚恳的，但至少是遵守了外表上的体面。但是，金托夫特却说，在加斯弗尔德那里作出这种解说时，齐麦尔曼曾处于如此激忿状态之中，几乎重演在沙霍夫斯基公爵住所所发生的同样情景。齐麦尔曼此后不久就升任为将官，离开了鄂木斯克。

齐麦尔曼以十分尖锐的方式对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公开表示的意见，引起我们大家极不愉快的印象，何况也是不公正的。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从由彼得堡到西伯利亚检查和视察部队人员、地方

官署和机关人员，以及在西伯利亚参观的学术旅行家和游览者们那里，听到过类似的没有根据的见解。

所有这些一听就明白的意见，归结起来说，大部分认为西伯利亚哥萨克军没有战斗的锻炼，在这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高加索的边防哥萨克军，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乌拉尔的哥萨克军。再者，还曾指出过，他们是懒惰的、漠不关心的和大部分都是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

我在西伯利亚继续服务的时期，有过充分机会来了解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的情况。因此，认为必须谈一谈这个问题（当然是极为概略的），并表示我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首先，我应当说，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的产生和得到进一步的战斗组织和社会安排，以及在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占有地区作为自己的居住地，是完全按照政府命令实行的。

在这方面说，它与顿河和乌拉尔的军队截然不同，顿河和乌拉尔军队是自由和自愿的人投效国家边区的运动自然组成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的核心，是由当地的城市和堡垒的哥萨克人，以及人们称之为西伯利亚农民的被召来的人，即在原有的西伯利亚前哨军事防线建筑堡垒和多面碉堡，而被派遣担任临时服务的人逐渐形成的。

十八世纪后半期，所有这些种类的哥萨克军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服役和勤务。例如，堡垒的哥萨克军，除堡垒的工作外，也从事于官家的农田工作，国库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而哥萨克人却陷于完全破产的状况。关于经营官家农田的意见，是西伯利亚前线长官金杰尔曼将军想出来的，他还有另一个计划：为了避免大女皇帝陛下国库的损失，关于东北部西伯利亚军队的粮食，用磨成细粉的白桦树皮来代替谷物。同时，为保卫我国西伯利亚防线而增加武装居民的需要逐渐增长起来了。因此，在1770—1799年时

期内，曾将下列人等编入哥萨克军：在波兰俘获的查波罗什人一百三十八名、俘获的波兰贵族党员、轻罪犯和当地兵士的子女约二千人。以后各年代，哥萨克人居民的增加主要是将农民编在其内。在二十年(1847—1866年)内，向军队中移入了男女四万多人，其中包括额尔齐斯河和所谓高尔基防线(阿克摩林斯克州北部地带)与哥萨克村庄邻近和交错的四十二个农村。

在五十年代，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已经由十个骑兵团和两个骑炮兵营组成。这些团与我国当时的龙骑兵团有许多共同之点，对于亚洲敌人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可惜，由于当时我国军队中盛行的关于兵士战斗训练和战斗操练目的的理解（对于轻微的过错加以最严厉的，可以说是最残酷的惩罚），这种良好的战斗材料有一半已经失去了它的优点。同样，在西伯利亚责打哥萨克人也曾使用：杖刑、军刀、倒立、树条抽打刑，有时不打到官长吸完几烟斗烟的时候不肯罢休。哥萨克妇女，而在往昔甚至还有军官，也不能免受这种刑罚。例如，佐洛托夫在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历史材料中曾提到说，一位指挥官(德国人)曾向西伯利亚防线长官金杰尔曼申请，要在小队面前用皮鞭严厉抽打某一少尉军衔的哥萨克军官，因该军官同一个正规军官发生争论时曾说，我是哥萨克少尉，你是陆军中尉，全是同样的自己军官兄弟。应当指出，当时正规军的军官不知何故被认为高于哥萨克的军官。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哥萨克军的各团长，对于哥萨克村的所有男女居民都曾造成恐惧，他们与其说对哥萨克人实行战斗训练，不如说实质上只是实行一种前线的严厉训练，从事产业经营，尽力节省饲料，按照当时的理解，都被认为是属于所谓问心无愧的收入。

各团长从这种收入中大发其财，例如，古利克维奇曾给自己积累了相当大的资本，数达八万卢布之多。

很明显，任何加强粮秣的节省，都给哥萨克马匹战地服务的适用性产生不良影响，使它们对连续的和迅速的动作，成为软弱无力的和能力很差的。加斯弗尔德亲自对我说过，他给科帕尔哥萨克军第十团讲马术时，曾对团长阿巴库莫夫上校就马匹的软弱无力和一般喂养不良状态提出意见，向他指出：在团队动作和编排队列中的迟慢性，而在构成骑兵基本战斗性能的战地冲锋时欠缺迅速性和急剧性。阿巴库莫夫曾以儿童般的幼稚的过于自信，对这一点答复说，这是由于马吃得过饱，天天得到很多的燕麦饲料，甚至超过实际需要而有多余，马匹真是发胖了，因此有些失去了它们所固有的就地迅速动作的能力。

哥萨克部队的司令官们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关于各官长愿意或甚至试图在哥萨克人军事生活中实行理智的原则，同时保存俄国民族性格所固有的特点，那都是谈不到的。

另一方面，对于在哥萨克军服务的毫无训练的外来分子，即农民的大量涌进军队，如上所述，已在西伯利亚军队中占有优势地位，并对哥萨克居民的战斗素质起了不良的影响。高加索哥萨克边防军则具有比较纯一的组成人员，从它最初建立的时候起，就有很多的哥萨克人骨干，后来又由小俄罗斯的和顿河的哥萨克人加强起来。

很明显，在这样的服务条件和内部生活条件下，在当时西伯利亚的哥萨克身上就不可能发展那种主要是由战斗实际经验而获得的素质。但是，同亚细亚敌人武装冲突的事件，当时一般说来是很稀少的，因此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就不能象高加索哥萨克边防军那样地得到战斗锻炼，因为高加索哥萨克边防军是在严酷的战斗环境中建立和成长的，并且是在同高加索山区人那样的狂暴敌人的不断战斗中经过了严格战斗考验的。

后来，中亚细亚象高加索一样成了我国军队的良好战斗学校，

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积极地参加了中亚细亚希瓦、布哈拉和浩罕各汗国境内的军事行动，在有经验和有才干的官长领导下，很快地适应了战斗环境，并逐渐具有了获得战争胜利重要条件的那种骑兵勇敢精神。

但是，早在这个时期以前，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的军事史上也有过一些情况，当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在与亚洲敌人的冲突中表现了英勇的功绩，而且在这些冲突中，我国哥萨克军差不多总是不得不以一小队来与吉尔吉斯人和其他亚洲匪帮成千上万结伙的大群进行战斗。在许多的这种功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哥萨克军少尉阿列克谢·雷托夫于1837年在肯尼萨尔叛乱时期的功绩。

苏丹肯尼萨尔·卡西莫夫是著名的吉尔吉斯苏丹阿勃莱的孙子。他想要在中汗国恢复汗的称号，为达此目的，公然对俄国及其在吉尔吉斯草原新建立的管理机关为敌。

肯尼萨尔具有行动果断、精力充沛、爱报复和对战败者残忍的特点，他在短时期内就把很大的一群人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肯尼萨尔总是讲究地穿着带有肩章的天鹅绒外衣，后面跟着旗手，由许多骑士和持有长矛的骑兵围护着，永远是耀武扬威地驰骋在他的许多扈从的前面。

据目睹的人们说，肯尼萨尔身材不高，面貌象卡尔梅克人的样子，细小的眼睛闪射出聪明、刚毅和调皮的光芒。肯尼萨尔在他的袭击中，象摧毁一切的风暴：他不在任何阻碍之前停止下来，并利用他的拥护者们无限的直至自我牺牲的忠诚。肯尼萨尔那种充满着不安和危险的漂泊无定的生活，结局是悲惨的。1847年，他向伊塞克湖山中盆地和楚河上游占有驻扎地点的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进行了侵袭。但是肯尼萨尔在这里遭到了不幸：他的五千人的先头部队，在胡代缅达·加津率领之下，被酋长阿尔曼所率领的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击溃。随后肯尼萨尔本人也被吉科卡门吉尔吉斯

人诱入麦陶山谷(现时托克马克附近),在该处被俘之后,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嘲弄,然后同他的两个兄弟、两个侄子和十五个苏丹一起被杀死了。

哥萨克军少尉雷托夫与肯尼萨尔本人指挥下的叛变的成千上万大群的吉尔吉斯人的战斗,是在1837年12月5日于下述情况下发生的:为了护送商队而派遣的以雷托夫少尉为首长的哥萨克部队(计有军士六人、医士一人和哥萨克兵士四十八人),在越过阿克托夫堡垒二百五十俄里处,留下了哥萨克兵士十九人和军士二人、医士一人,以便掩护粮食、饲料和笨重物品,而雷托夫本人和其余人护送商队向楚河方面更前进了五十俄里。当时大群吉尔吉斯人在肯尼萨尔的亲自率领下,突然向随同辎重留下的哥萨克人进行了袭击。经过顽强的防御以后,全部哥萨克人都被吉尔吉斯人打死了。

同时,哥萨克军少尉雷托夫护送商队越过荒瘠草原之后,关于留下保护辎重的哥萨克人的遭遇毫不知悉,于是就沿着通往阿克托夫堡垒的旧路返回。12月5日,在尚未到达留下哥萨克人地点的二十俄里处,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受到了肯尼萨尔率领的那些数达千人的大群吉尔吉斯人的袭击。这些吉尔吉斯人陶醉于刚刚获得胜利、受到了肯尼萨尔亲自参加的激励、准备为他作出任何流血牺牲,从各方面向人数很少的我国部队猛烈攻击。为数不多的我国哥萨克军,连续三日之久勇敢地抵住了对俄国人充满野蛮狂的憎恨与仇视的多数敌人的冲击。尽管兵力显著悬殊,我国哥萨克军以雷托夫少尉为首,奋力打击了吉尔吉斯人,而且把他们打出了鹿砦。在这次殊死的激战中,雷托夫少尉和军士三人、哥萨克兵士一人被打死,其余人中受伤的有军士一人和哥萨克兵士二十一人。人数很少的我国哥萨克军的这种勇敢打击,立刻制止了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为我国勇敢的哥萨克军的坚毅不屈和奋不顾身的英勇

精神所困惑，在发觉到从阿克托夫堡垒赶来援助的西蒙诺夫队长领导的部队已经接近以后，就没有再行进攻，迅即退入草原的深远地方去了。

为了奖励雷托夫少尉部队哥萨克兵士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皇帝曾颁给军功奖章七枚，发交最出色的人员佩戴。雷托夫少尉的这种英雄功绩可以作为显明的确证，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可以象他们的高加索优秀兄弟一样，表现出同样勇敢和自我牺牲的英勇行为。

为了进一步观察所提出的问题，即关于西伯利亚哥萨克人的不体面的癖性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问题，我认为必须说一说他们的内部生活和经济生活方式。可是，我应当附带声明说，下面所叙述的一切都是属于过去时期的，从而也只是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哥萨克军的职务，在往昔时代，即五十年代里，除了被派参加草原远征部队、保护商队、担任吉尔吉斯草原邮政驿站的巡查，以及在哥萨克村庄进行队列操练之外，还担任各团总务部门的其他服役和勤务。

例如，哥萨克人必须供应官家干草、浮运官家需用木材和沿额尔齐斯河在大木船上运送燕麦（尽管供给官家的燕麦在定价中是算入了运费的）。内勤人员，即年岁大的哥萨克人，都担任现已停闭的哥萨克军的工厂和制造厂的工作，并在各团长所设立的邮政驿站担任车夫职务。最后，幼年人和退伍的哥萨克人担任地方服役：修整桥梁和道路、护送被逮捕人、赶大车等等。由此可见，在往昔的艰难时期，所有的哥萨克居民几乎人人都在部队中服务，在哥萨克村庄进行队列操练和从事各团的总务与军需工作。哥萨克人在这种战地和内部服务的情况下，很难从事种田来维持自己的家庭经济。实际上，家庭经济得以维持，只是由于1861年前对军队男性居民曾发给官粮。但是根据1861年的法律规定，只供给三个团

的给养以代替十个团的给养，其余不在职的哥萨克人，都停止发给官粮。

很明显，这样骤然转而采用新办法，没有遵守在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少的逐步推行的原则，损害了哥萨克人极关重要的利益，因而不能不对哥萨克人的经济生活发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哥萨克人无论是否自愿，都必须在田间和家务中成为勤勉的工作者。但是要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如上所述，哥萨克人是经常地和差不多人人都处于服务之中，已经失去了农业劳动的技能，也没有教他们学手艺。因此，在这一时期，哥萨克人逐渐习惯于对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且，正如哥萨克阶层中的先进人物所认识到的，开始逐渐地甚至逃避需要付出体力的家务工作，而把这种工作交给同意以最少报酬来完成的吉尔吉斯-扎赫帕克(穷人)。但是，是否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哥萨克人呢？我可以认为，哥萨克人对于家务和一般经济劳动的漠不关心，以及随后所产生的经济上的削弱，不可能是由于一种任何原因偶然发生的，而是在几十年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不良的地方条件和情况的综合结果。

在这许多情况中，除上述差不多人人服务的情况以外，地方土壤和气候条件，也具有不少重要的意义。不要忘记，在西伯利亚，特别是在吉尔吉斯草原，找不到适宜于农业耕作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只有个别的地段，往往是与不毛的沙土和盐碱地交错分布的地方，可以从事农业劳动。

但是在较为肥沃的地方，例如，科克切托夫斯克县（实质上是托波尔斯克省库尔干斯克州著名土壤肥沃地带的延续），近来也开始连续发生歉收。因此曾有这样的事例，甚至迁入吉尔吉斯草原的自由移民，经过几年与不毛的土壤斗争以后，也抛弃了这种土地返回故乡，或者转入别的地方去了。在所谓额尔齐斯线的哥萨克

地区，缺乏水源、炎热和蝗虫毁害庄稼，使农民失去劳动活动能力。这就使哥萨克人不得不向托木斯克省农民购入粮食，并在距离哥萨克村庄八十至一百俄里的额尔齐斯河右岸森林地带，租赁他们的土地耕种。哥萨克人安排得如此不利的劳动，在市场遥远和运费昂贵的情况下，自然可以毁灭从事耕种的一切积极性和爱好。此后，难怪哥萨克人宁愿去从事与吉尔吉斯人的以货易货贸易，而只有一部分去从事畜牧业。

但是在正确进行这一部门的经济业务中，有些地方，例如，在高尔基线也遇到相当重大的困难。在这条线上由于几乎完全缺乏流动的淡水，用作家畜饮水处的，只有苦咸的有些地方已经腐坏的湖泊，因此在缺乏兽医检查的情况下，牲畜几乎不断发生倒毙。

可惜，往昔时期军队官长多注意服务的外表和形式方面，即多注意哥萨克人的队列组织和服装方面，一般来说，很少注意到居民的需要和利益。因此，哥萨克人内部日常生活和经济现象，就不为他们所注意了。其次，不能不说到这种情况，即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中的大部分改革，不是意在改善和鼓励哥萨克人各种经济部门的生产：耕作、畜牧、渔业、养蜂和工厂、作坊与家庭手工业等等，而是在于改善军官与文官的生活和加强他们的人员组织。同时，依照格·克拉斯诺夫的调查，西伯利亚军队中文官的百分比超过奥伦堡、库班斯克、后贝加尔和阿穆尔[①]等其他哥萨克军队中的百分比，因此也就需要更多的经费予以给养，而损害了军队的其他迫切需要，例如，损害了改善和发展哥萨克村庄和居民点的哥萨克儿童学校的需要。因此，按照弗·恩·乌索夫的调查，八十年代军队中哥萨克人识字的百分比低于1823年的百分比，而在1895年居民村的许多男教师和女教师，都因所获薪金极其微少，而开始辞去了自

① 即黑龙江。——译者

己的职务。

不容争辩，如果军队官长能用较多的精力和更加关心哥萨克居民的需要，并奖励较为爱好劳动的哥萨克人户主，哥萨克人的工业经济生活状况，就会获得另一种更为良好的趋势，而在这种趋势中，一定会给哥萨克人带来这种生活的提高和家庭经济方面的增长。随同物质福利的逐渐发展，哥萨克人在军队范围外的外勤服务的完整的装备，也会完全得到保证。

由此可见，上面所提到的有些人关于哥萨克人几乎人人懒惰的说法，是如何没有根据。如果在他们之中真也遇到对于家庭和农业劳动漠不关心的现象，那这只是个别情形，而且看来，与其说是根源在于他们本身，不如说，象上面已经详细叙明的，是许多地方条件和情况不良形成的结果。有些人怪罪哥萨克人的懒惰，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这些人责难说，他们有时甚至彼此之间用吉尔吉斯语讲话，不知何故认为这是不体面的。乍一看来，好象这种责怪也有些道理，但是如果对于问题加以深思，想到哥萨克人首先是武装居民，必须准备一经号召即去与敌人战斗，而且永远作为前驱，以便搜集关于地形，以及敌人兵力和分布情况的情报，那么所谈到的问题，就会得到完全另一种含意。

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占有吉尔吉斯草原的边区，也占有草原本身的一部分，作为他们的居住地点，自然而然地，应当是早已同吉尔吉斯人开始打交道，而且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游牧生活方式和语言，从而逐渐具有游牧人的精神影响。但是，哥萨克人具有一切西伯利亚人的共同的能力，能很快地了解东方民族和赞同他们的世界观和思想，这一点甚至连外国人，例如著名学者列克柳也注意到了的，他们反过来也在草原游牧居民之间促进了俄国人的思想和观点的传播。另一方面，被派往中国塔城和伊宁等城市充当我国驻该处领事馆护卫队的哥萨克人，也得到机会在实践中懂得中

国话，他们中有些人用中国话表达得很好。至于吉尔吉斯语言，他们是完全通晓的。因此，不仅同吉尔吉斯人谈话，而且同中国人谈话，都可以不用通过翻译人员。最后，因在军队中服务和参加草原的行军与远征，使西伯利亚哥萨克人有机会了解草原地形的特点，发展自己对地形目测的准确性，并完全习惯于草原的气候。由于哥萨克人的这种可以说是天赋的资质，他们就养成了在任何地形中和一切意外情况下确定方向的能力，而因懂得当地方言，也就能够到处适应起来，并同亚洲各外族人相处得很好，这毫无疑问在战争时期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军事角度来看，并注意到哥萨克人是在与中亚细亚草原和中国西部国界接壤的我国亚细亚边区服务的特殊条件，即各部队必须在不习惯的条件和很少了解或全不了解的居民中间相处，上述的责难就显得是片面的，它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而且不如说应该算作哥萨克人的功绩。

在到过西伯利亚和曾经发表自己意见论述西伯利亚哥萨克人与当地吉尔吉斯居民关系的学者旅行家中，应该谈一谈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的意见，他曾在一个特别记录中作过叙述，送交加斯弗尔德总督阅览。关于1857年的这个记录的重要意义，我将在下面作为一种评论那个时期的很有兴趣的材料来加以叙述。现在我只谈可敬的著者论及西伯利亚哥萨克人的那一部分，即关于巩固哥萨克人与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尽可能的良好关系问题。按照著者的意见："为达此目的，直到现时还作得不多，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种关系大都是掌握在巡哨军士到区段武官最低级的地方官长手中，难于从远处加以控制和指挥。要一下子消除这种关系中的一切个别的和细小的恶意行为，当然任何善意的高级官长都是办不到的，但是高级官长可以易于解决下述问题：有无最一般性的恶意根源、有无消除的方法。哥萨克人不尊重吉尔吉斯人的

权利和财产达到怎样高度的问题，他们的零星劫夺和强暴行为都是受当地哥萨克官长的庇护问题——这都是十分清楚的。巡哨的哥萨克人通常去猎捕吉尔吉斯人的牲畜，在这种情形下，有时发生冲突，也使没有武器的吉尔吉斯人成为保卫自己权利的牺牲者，这时当地的哥萨克官长却掩盖犯罪行为，不让总督知晓。在发生几起这种事件之后，当然也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即俄国人会成为牺牲者，因此不去仔细侦查和示范地惩罚犯罪人，而使全部事故真象更加模糊起来，并使犯罪人逍遥法外，这对哥萨克官长都是不利的，这样一来，对于俄国审判权的信任和对俄国法律追究的畏惧，就会在吉尔吉斯人中间破坏无余了。不再推论这种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我要尽力指出，何处可以找出恶行的根源。哥萨克军官的给养完全不能维持部队留驻草原时期的最普通的生活，而在防线上拨给他们的地亩，是虚无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加以利用，这是早为人所共知的。因此，军官与自己的良心或道德原则（如果这是教育给他启示的）进行或多或少的长期斗争以后，便认为不得不从另外的来源，即从吉尔吉斯人处，为自己获得政府所没有给足的东西。用这种独断专行的方法，为自己求得所需要的东西，当然，就很少有正当的经济意义。在把吉尔吉斯人的实物变为现款时，一半的价值便落入这种实物的购买者手中去了，而且为了这样图财谋利，军官对于执行自己意志的人，即哥萨克人的图财谋利，也就不能不装作视而不见。这样一来，军官所得到的每一个卢布的价值，吉尔吉斯牧民要花十个卢布才过得去。定居的哥萨克人同吉尔吉斯人相处的良好关系，是派遣队的哥萨克人所不能比拟的，因为他们的官长是以农业为保障的，他们本身也需要自己的吉尔吉斯人邻居，并尽力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

加斯弗尔德对于上述意见，从自己方面表示一些反对的看法，他从国家的观点出发，鲜明地表述了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加斯弗

尔德认为，为了消除吉尔吉斯人所受到的哥萨克人的压迫和欺侮，正在采取应有的办法，严厉训诫直接官长。这些压迫大部分是限于隐瞒官长赶走了绵羊和犍牛。但是消除吉尔吉斯人对哥萨克人的恐惧，未必对我有利，特别是考虑到为了保持五十万吉尔吉斯人的秩序和顺从，在草原地方只有一千五百到两千名哥萨克人。再则，吉尔吉斯人善于骑马，同马匹一起能忍受一切困难，他们是比哥萨克人更好的骑手，要使他们成为同样良好的兵士，只是缺乏枪械和没有消除一提到哥萨克人的名称时所感受的惊慌恐惧。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就不是我们给他们制定法律，而是他们给我们制定法律了。

对于哥萨克人作为武装居民与吉尔吉斯人的关系，持有这样意见的，还有加斯弗尔德的继任者杜加麦利。按照他的意见："当我们强有力时，吉尔吉斯人就会服从。但如果我们的威力受到极小的挫折，他们就会反对我们。"

加斯弗尔德和杜加麦利将军的上述意见，它的特点是以更加广泛的国家观点来看问题，应当认为是完全有理由的和值得特别注意的。我从自己方面要补充说，关于哥萨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发生冲突的问题，不能绝对地只怪罪一方，即怪罪哥萨克人，而不去仔细考察另一方的行为。不容怀疑，哥萨克人剥削吉尔吉斯人，同时在草原上也占据了较好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居住地点，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排挤了游牧人，对这些游牧人来说，按照生活方式，为了他们的畜群，确实需要广阔的牧地。但是，另一方面，吉尔吉斯人尽管按照现有牲畜数目的比例来说，这些牧地是足够应用的，他们还在吉尔吉斯草原本身界限之外扩大了他们的游牧区，带同自己的畜群前往托木斯克省沿边地方，甚至越过国界线前往中国境内。一般来说，吉尔吉斯人在他们与哥萨克人发生所有的冲突中，完全不是象许多人所说的，成为哥萨克人暴力的某种牺牲角色，而

是在每遇适宜的机会，就力图向哥萨克人实行报复，总是要做到以牙还牙的。在很远时期，吉尔吉斯人曾经掠夺和烧毁了草原邻近的哥萨克居民点，并强行掳去哥萨克妇女和儿童，这就不用去说它了。就是在最近的肯尼萨尔叛乱时期，吉尔吉斯人也差不多有过同样的行为，此外还对商人的商队征收了苛捐杂税，或者对他们全部掠夺，因此我们不得不在部队护卫之下派遣此种商队。甚至在八十年代，吉尔吉斯的盗马贼还给托波尔斯克省库尔干斯克州与吉尔吉斯草原邻近的各村庄造成恐惧。吉尔吉斯盗马贼把赶走马匹当作一种豪勇行为，事态曾经发展到这种程度，致使农民情愿对一个最勇猛和顽强的吉尔吉斯盗马贼付给一笔特别款项，只求免受他的盗贼侵害。

综合上述事实和用其他理由加以补充，应当说在定居的、有文化的民族同游牧部族邻接的时候，关于剥削的问题是双方相关的。

根据历史事实和认真研究东方历史人们的研究材料来更加全面考察问题时，就可以看出，游牧民族屈服于定居民族的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征收赋税的，他们自己不向国家交纳任何东西，而同时却从国家方面取得薪俸、赠品和宴饮之类的好处，从而在实质上是剥削了国家。这种剥削已经为吉尔吉斯苏丹中的某些人做到极点。例如，住在现时科克切托夫斯克县的苏丹瓦利伊，曾经能够从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时取得金钱补助。而且在定居国家可能显出衰弱、失败以及一般地遭遇困难时，游牧的属民就利用这种情况行动起来，好象从来没有受到誓言或其他义务的约束。在统治的国家恢复秩序时，游牧民族便又成为顺从的属民，而照旧剥削定居的国家。属于中国和俄国的游牧民族，都曾这样做过。

据著名的东方通格里果利耶夫教授说，剥削定居的民族被游牧民族认为是最方便的，甚至强大的游牧民族在认为不可能公然掠夺定居的国家时，也曾从事剥削。例如，与中国为邻的维吾尔族，

甚至在自己强盛的辉煌时代也承认是中国的属民。吉尔吉斯人接受俄罗斯国籍也是这样的，那时俄罗斯没有任何可能去征服他们，并使他们完全服从自己的政权。由此可见，在哥萨克人欺侮和压迫吉尔吉斯人的问题上，只怪罪哥萨克人，而不去同时考察和评定另一方面，即吉尔吉斯人方面的行为，那未必是公正的。何况吉尔吉斯人对于哥萨克人的那种控诉，按照吉尔吉斯人通常好夸大一切的癖性来说，在许多场合是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的。同样地，也不可怪罪哥萨克官长对于自己属下人等的纵容，因为官长的任何法律和命令，都不能达到完全消除西伯利亚人对外族人的一般剥削。按照对西伯利亚各外族生活进行多方面研究具有经验的人们的意见，只有一种真正的教育，即西伯利亚民族群众的道德上的和理智上的发展，才能消除这种恶行。一般来说，西伯利亚外族人的问题，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虽然正在开始产生，但是按照上述研究人员的公正意见，乃是将来的西伯利亚的问题。

为了总结我在上面关于哥萨克人的一切叙述，我认为必须补充说明，现在当吉尔吉斯草原已经成为帝国的内部一州，而且已经奠定了全部治安的时候，不可忘记这在许多方面都有赖于哥萨克人，他们在与吉尔吉斯人和中亚细亚其他外族的一切武装冲突中，总是作为前驱，自己承担起最初的攻击。可以说，从那时起直到今日，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是俄国在与中国接壤的遥远边疆地区内的坚强的和完全可靠的堡垒。

第 三 章

加斯弗尔德治理西西伯利亚的行政工作概要。 各界人士对这种工作的评价和关于这种工作最广泛的意见和评论。 加斯弗尔德离开鄂木斯克和鄂木斯克各界当时为他举行的庆祝会。

加斯弗尔德于1811年在交通学院毕业。在卫国战争之前，由于军事作业部的军官缺乏，有些工程军官包括加斯弗尔德在内，被调到参谋本部部队中服务。加斯弗尔德曾参加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尼古拉一世皇帝在位时期所有后来发生的战争。1844年到1846年，他曾统率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全部活动的步兵第五军团步兵第十三师，参加过高加索和黑海沿岸防线镇压山区部族的许多事务。1850年，他曾统率留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各公国的军队。

加斯弗尔德是一个聪明人和良好的行政管理人员。尽管在暮年，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有些怪念头和怪脾气。他从刚一就职时起，就力求了解边区的情况，特别是吉尔吉斯草原的情况，而他也的确已经很熟悉了。他对我国在吉尔吉斯草原的情况和我国对中国和中亚细亚各汗国的政治关系与通商关系，也有正确的看法。为了进一步考察加斯弗尔德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外伊犁边区的工作，必须加以回忆，在戈尔恰科夫公爵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最后时期，这个边区是处于何种状况。

上一章里已经详细叙述，在占领谢米列钦斯克边区和移驻武装居民以后，曾决定着手对外伊犁边区作同样的占领。戈尔恰科夫公爵完全认识到，政治上和商业上的考虑，以及我国事业的一般

利益，都坚决要求我们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直至中国西部、喀什噶尔或东土耳其斯坦和当时独立的中亚细亚各国境内，牢固地立定脚跟。在占领区建立俄国移民区和在吉尔吉斯人中奠定应有的秩序与治安，使商队贸易可以得到充分保证，免受草原游牧居民掠夺和抢劫以后，也就可以开始实现另一个目的：建立同中国西部、喀什噶尔和中亚细亚各汗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而这是政府付出巨大努力和关怀的事情。但是为了在实际上贯彻执行这种毫无疑义很有远见的预定行动计划，必须预先采取一系列的复杂的准备措施。这后一项任务，已经为戈尔恰科夫公爵有条不紊地和以他所固有的坚定性和顽强性在加以执行，尽管几乎每一步骤都曾遇到了相当重大的阻碍和困难。不可不注意到，在那个时候，即四十年代，在吉尔吉斯草原的广阔地域内，由于叛乱的苏丹肯尼萨尔·卡西莫夫伙帮对我国草原堡垒和哥萨克村庄进行粗鲁和凶猛的袭击，曾经发生经常的骚动和混乱。而在1846—1847年时，肯尼萨尔被我国在中汗国（现为阿克摩林斯克省）活动的部队驱入谢米列钦斯克边区，在大汗国内也发生了骚乱，肯尼萨尔与大汗国内有势力的各苏丹，如阿勃莱汗的后裔阿利·阿季列夫，是有着亲属关系的。大汗国吉尔吉斯人虽已接受俄国国籍，还承担了为肯尼萨尔服务的义务，并号召中汗国吉尔吉斯人予以协助。规定作为主要条件的：对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加以制服并使服从自己。如所共知，这种企图没有成功。但是大汗国内的吉尔吉斯人和吉科卡门的一部分吉尔吉斯人的骚乱，仍在继续下去，并由于浩罕人的教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古特科夫斯基大尉在伊犁河彼岸远征的失败和随后很快撤免戈尔恰科夫公爵所任边区主要长官的职务，使他不能将已经开始的占领伊犁河南面全部地方的事业进行到底。

进一步发展已经拟定的和一部分已为戈尔恰科夫公爵所采取

的各项措施，被加斯弗尔德非常积极地和顺利地继承下来了。例如，在他任内很成功地在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选定了哥萨克人和农民的居住地点，那里由于良好的气候和特别肥沃的土壤，已经形成了繁荣的移民区（当时称为谢米列钦斯克边区的是：由阿亚古斯河、列普萨河、阿克苏河、比因河、卡拉塔尔河、科克苏河和伊犁河灌溉的全部地方，而称为外伊犁边区的是从伊犁河南方到中国国界的全部地区）。属于这种地区的是：1854年建立的维尔内堡垒和1855年与1856年建立的大、小阿拉木图两个哥萨克村庄、1855年建立的列普辛斯克哥萨克村庄，塔尔加尔河的索非亚哥萨克村、伊塞克河的那杰日达哥萨克村、卡斯克连河的一个迁来的新村、卡拉塔尔河的科克苏哥萨克村和居民点。所有这些地方，一般来说全部楚河沿岸地方和伊塞克湖的山谷盆地，都已经被西伯利亚地形测量团的军官们用心地和熟练地测绘在地图上了。1859年，参谋本部戈卢别夫上尉在这个山区地方和外伊犁边区东南部所作的天文观测，能把作出的测量都加入地理图内，因此得以制成首创的和当时很完善的外伊犁边区的地图。

加斯弗尔德在管理初期，关于新占领区移民组织，以及改组吉尔吉斯草原行政管理所预定采取的一切办法，需要相当数额的国库支出。但是在当时，即在五十年代，克里米亚战争已经需要国家支出巨大的款项，要从国家金库抵补此项支出，是非常困难的。

使加斯弗尔德感到焦虑的这种情况，迫使他采取从所谓地方来源来筹措款项。后来加斯弗尔德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办法，并一遇适当的机会就表示自己功绩说，他尽力避免因所管边区的需要申请拨款而使财政部增加负担，尽管对于拨款，按照他的说法，是绝对需要的。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这只不过是尽力减少国库的支出而已。把这些支出归入地方来源，未必可以认为

是特别的功绩。如果情况需要支出款项，而此项花费已经实际支出，尽管没有申请拨款使主管各部增加负担，那么取得款项的来源，在这种场合就是地方来源，也不能作为论证节省经费，或不使国库本身有所负担的理由。往昔时代，一切所谓地方来源的款项，实质上都是构成同样的公款积储，都应汇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后来也正是这样做了的。但是当时对于这个重要的国家财务问题，曾经有过另外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1861年实行统一收支规则以前，我国在处理公款方面完全是各行其是的。一系列的国家收入部门集中在我国许多管理机关的手中。在改革前的那个时期，缺乏收支统一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是无效果地和无目的地保存公款，有时连续几年之久，不是象应当做的那样交入财政部金库，而是存在各种产业管理机关的大皮包里。例如，到1855年1月1日为止，在财政部金库里总共只存有七千五百万，而在其他各部的金库里 却存有 两亿以上。为清查一切款项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曾经揭露，各种机关所掌管的名目繁多的款项有二百九十三种，总额达五千七百万卢布。有时甚至利用这种款项，以不正当的方法从中获取收入。有时从国库中预先领取的或无任何需要而领取的公款，被存入社会救济厅和各种信贷机关，以便取得利息。我曾听说，尽管不能完全保证十分确实，加斯弗尔德为了弥补公家的需要，有时也曾采取这种方法。

有一次，下述的一个情况作为对这种款项进行投机行为的借口。为了建筑鄂木斯克战地粮秣委员会的房舍（现为州区军需管理处），曾以法定程序按照预先编定的预算书拨来款项。在实施建筑工程时，正象差不多常有的情况一样，这宗款项不敷应用。需要向陆军部请求新增加的预算外的特别信贷拨款。但是，在加斯弗尔德同当时陆军大臣侍从将军苏霍扎涅特处在不和睦关系的情况下，提出这种请求是不适宜的，尽管所请求的补充贷款 未必超过 三千

到五千卢布。当时，加斯弗尔德把军团部粮秣主任斯托伊科夫上校召来，了解到除军团各部队经常给养，即薪金、粮食、饲料等所必需的款项以外，战地粮秣管理处还有一笔很可观的库存现款，这是从以前公家拨款直到新拨款项为止大约一年期间的剩余所积累的，可以认为是完全空闲的金库资金，于是他就命令将此空闲款项存入托波尔斯克社会救济厅生息。这种利息后来足以弥补建筑战地粮秣委员会房舍的一切开支，从而避免了申请拨给预算外的贷款。

加斯弗尔德与陆军大臣苏霍扎涅特之间确实存在着彼此不睦的情形。但是不睦的原因，我却不晓得。由于这种紧张的关系，加斯弗尔德在同他打交道时，总是很小心谨慎。如上所述，对于部队的各项需要特别避免申请预算外的拨款，力求稍有可能就从地方来源弥补这种开支。但是苏霍扎涅特每遇加斯弗尔德方面的任何疏忽大意之处，却对他毫不客气。例如，由于按照加斯弗尔德的命令，曾在皇帝批准的鄂木斯克陆军医院计划中作出极小的不合之处，工程处的一件公文就用极严厉的词句对他擅自发下不正确的命令表示反对，这对自认为建筑艺术专家的加斯弗尔德的自尊心给了严厉的打击。这事使参谋长金托夫特很感为难，他久久不能决定，是否将陆军部的命令呈报加斯弗尔德，特别是在他年迈时，任何精神上的激动，都会触犯自尊心而感到压迫，影响身体，可能引起危害。

大概，这件公文也就因此而没有呈阅。

但是，加斯弗尔德尽管已届衰老之年，遇有任何适宜的机会，还是尽力夸耀自己的记忆力，并卖弄自己的博学多闻。

同时，属下人等的有时达到可耻程度的奉承，也发展了他的虚荣心，他自己可能并不察觉而入了迷，以至往往想入非非。这种情况的结果是：行政管理的差错和不正确的意见。

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说明他要在吉尔吉斯人中推行一种形式

稍有变更的伊斯兰教，作为向基督教过渡的宗教（加斯弗尔德把它称为中间宗教）的建议。

应该注意，如果吉尔吉斯人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徒，那他们是完全有赖于俄国当局。按照著名东方学家格里果利耶夫教授的说法，在上一世纪几乎所有的吉尔吉斯人都是萨满教徒，而且直至五十年代，即加斯弗尔德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时候，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仍旧是这种教徒。这个民族在名义上合并于俄罗斯国的时代，各汗国和各苏丹中，只有不多的人对于伊斯兰教义具有模糊的概念。在吉尔吉斯草原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堂，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士举行公共的伊斯兰教礼拜。如果从那时起，吉尔吉斯人真正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教化了，那么这只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伊斯兰教徒，并拨出巨款建筑伊斯兰教堂。向吉尔吉斯草原宣传伊斯兰教是由俄罗斯方面进行的这一点，下述情况可以作为无可争辩的证明，即在我国军事防线邻近游牧的吉尔吉斯人特别已经伊斯兰教化了，而当时在希瓦、布哈拉和从前浩罕国境，即在现时伊斯兰教国家邻近地区占有自己游牧区的吉尔吉斯人中，却还保存着萨满教。

但是除了加斯弗尔德所提出的在吉尔吉斯人中传播中间宗教的问题（此事在彼得堡上层行政人员中显然也已经知道，因为德·恩·托尔斯泰伯爵在他的记载中已经提到这一点）以外，关于加斯弗尔德在社会上总是流传着许多故事，尤其是他的边区出行，曾经有过很多的偶然事故和遭遇。我要指出在我记忆中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东西。

大家知道，大、中、小吉尔吉斯汗国往昔都是分裂的，每一个汗国分为几代，用自己首长或祖先的名字作为名称。由各代产生各氏族，由各氏族产生各支族、各分支等等。例如，中汗国（按照列夫申的说法）分为四代：阿尔根、奈曼、克普恰克和乌万·季列伊。阿尔

根一代分为下列各氏族：卡拉·基夏克、卡拉乌尔·基夏克、恰尔·吉蒂姆、江·朱尔、恰克昌、迪尔捷乌尔等等。显然，要将所有这些氏族的名称，以及他们的扎伊辽乌和吉斯塔乌，即夏季游牧地和冬季驻扎地，都保持在记忆中，未必是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正如列夫申已经正确指出的，必须有很大的耐心，或者是长久居住在吉尔吉斯人中间去加以了解熟悉。但是加斯弗尔德好象没有因此感到什么困难。他在接见代表人物时，曾向其中的吉尔吉斯苏丹说，请问朱锡·曼别特·托布克林县区的库楚克·阿尔恰雷、卡拉昌迪、伊金·布拉克和克兹尔·塔什各天然地区，是否照旧在游牧？是否越过托克拉乌·萨雷·苏和莫英图各河流，从前在那里好象是存在过阿尔滕·萨雷莫夫斯克和卡拉·季列耶夫斯克县区？他用这种和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使接见时在座的官长人员感到惊异，而且使各苏丹感到难以应付，各苏丹经过这种考试之后不由自主地会想到，边区长官真是样样都管到的。同样，在同我国驻中国西部塔城、伊宁各城市前来鄂木斯克的各领事，以及医士和其他专家谈话中，加斯弗尔德好象总是故意提出一些最不容易了解的专门问题。加斯弗尔德同驻伊宁总领事著名汉学家伊·伊·扎哈罗夫谈话时，一有机会就表现自己了解中国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各皇帝在位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些最突出的事件。

他曾同医士进行医学辩论，用自己的博学强记使人为难。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加斯弗尔德对于这些问题是预先准备好的。

例如，曾经有过这样事情。在加斯弗尔德来到一个草原堡垒，大概是维尔内堡垒之后，即按向例办法接见官长人等，其中也有当地神甫在内。接见以后，加斯弗尔德将神甫请到自己办公室内，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东正教会今日向哪些圣徒祝贺？神甫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没有准备，但是还是想到了和指出了二、三位圣徒。但是

加斯弗尔德似乎预先在教堂日历中早已查明了似的，向神甫说，他没有指出全部圣徒，因为今日除了神甫所指名的圣徒之外，还有一位圣徒应当祝贺，并指出了这位圣徒的名字，还作了适当的解释。可以想象到东正教神甫当时的处境，他在专属东正教会教规的事务方面，还要听取一个路得教徒的训诫。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结果是，这种专门性的并且完全突然提出的问题，有时可能是相关的。同日在总督的宴会上，被邀请的是官长人员，还有那个早晨犯了过错的神甫，谈话时讲到加斯弗尔德以前的各位总督。加斯弗尔德谈到他们的时候，指出了三位总督的姓名：普·姆·卡普采维奇（1822—1828年）、伊·阿·维利亚米诺夫（1828—1834年）和普·德·戈尔恰科夫公爵（1836—1850年）。当时神甫就向加斯弗尔德指出说，阁下漏掉了一位总督，即陆军中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苏黎穆，他是在维利亚米诺夫之后，于1834年被任命此职的，尽管是短期任职，但是到1836年也约有两年。这样，加斯弗尔德自己反过来也被捉住了，在他承认神甫是正确的时候，神甫忍不住补充说：看啊，阁下从您的四位前任之中漏掉一位，而我今日被责难的，也是漏掉一位，但只是从千人之中忘掉一位，这就有些差别了。加斯弗尔德说道，我向您道歉，神甫，我道歉，请认为是我的过错。

这是我个人关于加斯弗尔德的一些回忆，为了更全面地加以评定，我认为必须以彼·彼·谢苗诺夫和著名哥萨克将军格·伊·菲利普松的手稿和已经出版的关于他的记载加以补充。

谢苗诺夫的记载，特别有趣和有意义，因为据记载人的自己声明，这些记载是完全从旁观者和大公无私的观察作出的，是以善良和有益的愿望为指导的，而且对于西西伯利亚长官所给予的保护和协助，如果不是坦率的叙述高级长官的意旨是如何实行的，边区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边区产生什么新需要，那就不能更好地表示自己的感激。

谢苗诺夫的记载，尽管是鄂木斯克一些少数官长人员已经知悉的，在当时还是具有很大的趣味。作为历史资料，就在现时也没有丧失它的意义。这里我打算只限于这个记载中的摘录，其中叙述对加斯弗尔德作为边区首要长官的工作评价。

谢苗诺夫说，加斯弗尔德早从他管理西西伯利亚之初，就已认识到草原左翼（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全部意义。他推测到，我国势力向亚细亚内部发展的途径，可能就在这里，因为我国在这里的正确前进活动，不会在荒瘠草原或不毛沙漠之中遇到困难的不可克服的阻碍（象在右翼，即阿克摩林斯克省和奥伦堡边区所遇到的），而且我国在这里正确的和定居的前进活动，依靠在亚细亚高原山区地带的连续不断的许多繁荣移民区，可以毫无阻碍地逐步进行。这种认识曾经表现在发展边区历史中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使加斯弗尔德在西伯利亚历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这就是：（1）勇敢地和胜利地完成外伊犁边区的占领；（2）以连续不断的许多居民点，如乌尔贾尔斯克、列普辛斯克、科克苏伊斯克和其他预定的地点，把全部左翼地区联系起来。在加斯弗尔德管理时期，为使我国在草原左翼达到移民化，做了很多事情。建成了美丽的维尔内，它将是加斯弗尔德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永久纪念碑；还建立了乌尔贾尔斯克、上列普辛斯克居民村。正在建立的：科克苏伊斯克、塔尔加尔斯克、伊塞克斯克和其他居民村。为居民村所选定的所有地点，都是非常适宜的，他们的周围建筑和设施进行得都很好，大部分是高于任何评定的。拨给移住人的土地是优等的，收成非常好，值得对哥萨克人和他们的官长赞扬的是农业发展得很好。

菲利普松将军关于加斯弗尔德的意见则有些悲观。在他的回忆录中（见俄国档案，1883年）发表过对于加斯弗尔德的如下评定："我记得加斯弗尔德"，菲利普松写道，"1826年，他在第一军总司令

部是参谋本部的上校。他曾享有这个部门的优秀军官之一的声名。三十年代末期，他曾任第五步兵军团参谋长。1839年升任中将，并与第十五步兵师丹宁别尔格中将互调职位。他的年龄差不多比我大两倍。在青年时代，我个人并不认识他，在四十年代才遇到他，要给自己说明他从前的声名，是大伤脑筋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奥斯特泽伊斯克的德国人：按照外表、姿态、智能和性格来说，都是这样的。这全不是大事，但是很重要的，好象使人有所期待，尽管在这外表后面，除了善与人相处和利用自己的人情关系来滥用职权以外，并没有什么东西。他是一个鳏夫，但当已届晚年和几乎两目失明的时候，竟再度结婚，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当西西伯利亚终于摆脱了一位半独裁的地方总督戈尔恰科夫公爵的统治时，大家都曾猜测，谁将被任为总督，当知道加斯弗尔德将军被任命为这个需要很大毅力和地方知识的重要职位时，都曾感到惊异……”

格·伊凡诺夫在1893年第十二期《土耳其斯坦公报》上，关于加斯弗尔德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叙述到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同费·米·陀思妥也夫斯基会见时说，加斯弗尔德是一个思想有些守旧的人，同时也是个百科全书派，但不是说他是戈利德巴赫的信徒，只是说他是片断不全的学术知识的档案库。加斯弗尔德自命为学者，他对一切持有自己的看法，对于陀思妥也夫斯基为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皇帝逝世而作和献给皇妻亚历山大·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诗，他不认为是值得向皇后呈献的。他向关于此事提出呈请的驻西伯利亚第二十四步兵师师长阿·克·多米蒂将军带着谴责的口吻说道，作诗不是兵士的事，不应当奖励这种空谈，并且想入非非地竟至把文学称为坏事，把文学家称为坏蛋。

关于菲利普松所述加斯弗尔德娶一位很年轻的贵妇为妻一事，我听到过一个笑话，我要转述一下，当然是毫无保留。加斯弗尔

德在已经很年老的时候，要作新郎，曾给自己的未婚妻写信，当时有一种风习，写信要用有各种小花饰的特别讲究的信纸。但是由于鄂木斯克没有这种现成的信纸，所以加斯弗尔德请求确实具有很大绘画才能的当时在军团司令部服务的参谋本部上校波麦兰采夫，要他用水彩颜料来画小花饰。波麦兰采夫建议，从西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选出一些最生动的景色和特别幽美的地方，作为这种小花饰画的题材。但是加斯弗尔德没有同意这个建议，而向波麦兰采夫指示说，在这种场合，对于这种小花饰画最适宜的象征，是描绘“狮子陷入罗网”。

官员们滥用职权、作威作福和收受贿赂，在西伯利亚始终是非常普遍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早就说过，西伯利亚虽然很冷，但官员们的生活却是温暖的。

曾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枢密官恩·普·西涅利尼科夫证明，在他任职时，即在七十年代，东西伯利亚边区在受贿者掌握下仍然继续遭受着痛苦，西伯利亚人向伊尔库次克省、叶尼塞斯克省和外贝加尔斯克州、雅库特州行政当局所付出的非法勒索，已达六十七万七千卢布之多。在西西伯利亚也是一模一样，在加斯弗尔德任职时期，这种非法勒索曾经到处盛行。当然，当时在官吏众多、行政管理的集权、枯燥无味和死气沉沉的形式主义、缺乏加强社会法治的指导原则的情形下，一般地说，在我国国家和社会生活旧有制度中根深蒂固的许多其他不良情况的总和下，这种弊害是难以根绝的。但是减少这种弊害是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革除只靠情面派任职务的固有旧习，而力求选派具有坚定性格的能干的和诚实的人员。对于犯有过错的人，应当追究最严厉的责任，同时将他们所犯的营私舞弊行为，象东西伯利亚总督西涅利尼科夫后来所做的那样，由边区主管长官通令在地方公报上宣布。但是，在加斯弗尔德任内，遇有这种情事，只是限于撤换犯有过错的官员，由

另一人任其职位，而此人往往于到任之初，即急于追求发财致富。从当时流传的关于这种非法勒索事件的许多故事之中，我要指出下述两个故事。一个有权势的官僚收到了用一大瓶满盛甜酒作掩盖的贿赂，但是最初他显然是没有料到的。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收到这个礼物的那一天，正是他在宴请客人，他想在客人面前夸耀收到的甜酒，就命令把它拿到桌子上来。他启开了大玻璃瓶，把一个相当粗大的瓶塞轻轻地放在桌上，这个瓶塞乍一看来，好象是用各种颜色的花纸做成的。坐在比较靠近主人的几位客人都能仔细地看清楚这个粗大的瓶塞。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瓶塞是很精细地用若干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卷成的。

在吉尔吉斯草原各州追求发财致富，也是很盛行的。草原官员们在这方面的肆无忌惮行为曾经达到这样程度，竟有一人呈请谢米巴拉丁斯克军政省长，要求向呈文内指名的一些人追索钱款，因为这个官员曾把绵羊卖给他们。

不言而喻，他从来没有想买绵羊，而是在不同时间从吉尔吉斯人那里作为赠送礼物而获得的。

当时的谢米巴拉丁斯克军政省长潘诺夫将军在这个呈文上作了如下的批语："卖出绵羊，我们假定他是卖过了。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买进过绵羊？"对于加斯弗尔德可以责难的是，他十分冷淡地和以不可理解的漠不关心态度对待他的亲信五等文官波切库宁的极不体面行为。

这个文官从前是在东西伯利亚服务的。后来转职来到西西伯利亚服务，他很快地得到了加斯弗尔德的完全信任，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把事情办得如此巧妙，以致对于总督权限内的各种职务的派任，如吉尔吉斯草原的县警察局长、区长和其他职务，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曾有一种传说，似乎这些职位甚至都规定价格。同时，波切库宁毫无顾忌地对于提供款额多于定价的人，给予优先

待遇，而把允许按照定价交款的旧有候补人员排除掉。这种恶行一直存在着，直到派来新任总督亚·约·杜加麦利接替加斯弗尔德职位之时为止。杜加麦利就职之后，将波切库宁作为对于他的前任具有恶劣影响和使他在社会舆论中受到很大损害，立刻予以免职。关于这种情况，杜加麦利在1885年俄国档案杂志上发表的回忆录中，曾经有所叙述。

加斯弗尔德对于驻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所属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即驻科帕尔斯克和阿拉托夫斯克区的军队粮秣供应的调度无方和漠不关心态度，也是无法辩解的。按照谢苗诺夫在上述他的回忆录中所发表的意见："草原左翼（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农业进一步的发展，和从而获得良好定居与农业移民的整个前途，只有取决于对农业发展者的产品提供可靠的销路。没有这种办法，这些移民区的农业前途一开始就会衰落下去。用不着说，居民所生产的粮食，唯一的销路现时只能是直接供应公家需要的粮秣。需粮的数字现时还大大超过居民产粮的数字，但是只要以销售产粮的方法来奖励农业，两种数字很快地就会平衡起来。

"大家知道，不论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和在任何地方去采购粮食，国库给价总是高于它的价值。把这种多余部分用于搞好国家事业，即用于发展中的移民事业，难道不比使私人即供应人发财对政府更加有利吗？况且按照健全的经济规则来说，国库使自己与生产者（他们是由政府号召而生产的，因而是完全应受政府保护的）之间具有中间人，使中间人从同一生产者手中购买产品，只能使生产者获得他们承包价格的八分之一，这是否有利。这会使移民发生什么样的怨言和控诉！"

所引叙的谢苗诺夫的作为大公无私的观察家的意见，在这种场合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见很明显地揭露了军团部官长的命令是极端没有理由的。但是非常惋惜地应当承认，这种不正当的

粮秣供应办法，存在于加斯弗尔德统率军队的全部时期内，只是在他的继任者杜加麦利将军在管理军队和边区的第一年，才被废除了。“由于某种奇怪的反常”，杜加麦利在他的自传里说道，“在鄂木斯克实行了对于军队供应粮食的商业集市，并于托波尔斯克省现行粮食定价之外，对粮食供应人通常都加给这种粮食运往科帕尔和维尔内的运费，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在消费地购买粮食的。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商业交易，除了国库以外，所有的人们都从这种交易中取得了利益，而这种交易却是由国库负担费用来进行的。”

按照杜加麦利所发布的命令，派了代理人兹里亚霍夫校官前往当地，从第一手采购必需数量的粮食，不必订立合同，也不以任何手续拘束卖主，他们应当按照规定的价格将面粉送到粮店，立时就可领取钱款。

杜加麦利采用这种办法，在三年中比原来预算积存了十五万多卢布。

1860年秋季，加斯弗尔德大概已经决定请求免除他所担任的职务，开始准备前往彼得堡。这时，因他获得一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的奖赏，鄂木斯克各界在刚刚落成的贵族会堂举行盛大宴会，为加斯弗尔德祝贺。

宴会时，有几个祝贺的发言。我只引述军界和学术界代表所作的两个发言。由于同时期的人和属下人等总是倾向于夸大其辞，所以按照这种发言，并不能对加斯弗尔德在西伯利亚的服务活动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我还是要引叙这些发言，因为其中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加斯弗尔德在军政和民政方面国务活动的性质，以及地方各界以其首要人物为代表对于这些活动的当时的看法。参谋长金托夫特将军作了下述发言：“请允许我再一次祝贺阁下承蒙皇上奖给您一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我们在这个宝星上看到的十字交叉的宝剑，证明您的军事功绩从前已被奖给同类的低

级勋章。例如1813年，当拿破仑在德累斯顿集合自己军队后，可能把他的军队转向对他进攻的任何一个同盟国的威胁时，在肯尼格什滕破坏易北河上的桥梁，就成为阻碍这个著名统帅自由行动的必要措施之一，尽管只是在这一条道路上的。当时您还是一个青年人，正是精力充沛和大有作为的时候，自告奋勇去破坏这座桥梁，亲自装备了放火船，把它引来，点上了火。英勇的舍己忘生的行为获得了完全胜利，而缀有绦带花结的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就成了对您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奖赏。

“后来在1831年，追击罗马林诺部队的时候，您在奥波利耶、弗尔热洛维茨各次战役中立了功绩，并在领导尤泽弗瓦要塞战役时，实行猛攻占领，俘获七百人之多。这个二级勋章就成为对您在这些战役中表现调度有方和英勇坚决的奖赏。

“想起这两次您蒙奖给勋章的功绩，现在您又蒙皇上奖给这种一级勋章。为了计算对您的公务活动增辉的许多其他事迹，我应当追述从1812年起的我们祖国的战争历史，详细叙述您曾积极参加的六十个战役，从值得纪念的斯摩棱斯克战斗开始，到日尔曼什塔特的光辉撤退为止。这个城市在短短时期内有三次使您声名大振，1849年7月9日，您经过战斗把它占领了；20日，保卫这个城市和城内所留下的我国作战储备与粮食储备，在莱斯马尔克塔和缪连巴赫地方使匈牙利人遭受完全败北，夺获大炮三门、火箭炮车四辆、辎重车并俘虏一千一百七十人。三等乔治勋章是对这次光辉胜利的奖赏。经过四日以后，在这个日尔曼什塔特城内，您的部队遭到三倍强大的敌人在能干的将官别姆领导下的反攻，连续十一小时的战斗，顶住并击退了敌人最强烈的逼攻，同时掩护炮兵纵列、流动仓库和其他公家辎重，共有马车二千辆和俘虏约一千五百人，光荣地撤退到威斯特利村，完整地保全了辎重、俘虏和物资。

“这种典范的撤退，已经载入战争的史册，如果说在易北河上

我们是称颂一个驾驶带有放火船的小船去炸毁桥梁的勇敢青年，那么在特兰西瓦尼亚我们则是崇拜一个豪迈的统帅，他在因当地全部好勇逞斗的居民暴动而动荡不安的国家里单独行动，不仅要为所属部队的命运而操心，而且还要担负在这一国家行动的军队予以援助，有时支援奥地利人，有时支援利杰尔斯的部队。

“令人兴奋的是，正当我国君主大皇帝陛下为了奖赏您十年治理西西伯利亚和统率西伯利亚独立军团的功绩授给勋章的时候，我们勇敢的外伊犁部队取得了成绩。西伯利亚军团的部队早已由您作好了战斗准备。组成外伊犁部队的一部分部队能够证实，由于您对他们的关怀而表示感谢。

“这里在座的我们的勇敢弟兄们的卓越官长，遵照您的指示在卡斯切克打垮了侵入我国境内的浩罕人，而且为了惩罚狂妄的进犯，占领和拆毁了他们的堡垒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从拆毁堡垒的时候起，消除了浩罕人对吉科卡门吉尔吉斯各部族的权势，最后确立了我国在外伊犁边区的统治地位。

“指出外伊犁边区的名称时，我应该说清楚，我们所称的，是被您合并到俄罗斯国来的十万平方俄里的土地，是以气候优良和土壤肥沃而著称的十万平方俄里土地。在这样合并以后刚刚经过六年，在那个地方好象按照您的魔术般的命令那样成长起来了：堡垒二座、哥萨克村庄六个、哨所二十处，其中四处有居民点。俄罗斯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那样深入过中亚细亚。您没有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向众人和每个人宣示过您的真正国家功绩，但是并没有放过时间在该处移住哥萨克居民，使这个边区属于俄罗斯国所有。这种移民措施为这个边区的未来繁荣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就在现时，维尔内堡垒地方已在短时期内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将来可能成为中亚细亚的主要商业中心。您在这里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俄罗斯国将沿此道路把人类共同的利益、文明和科学输入给天山脚

下外伊犁地方的各原始部族。

“构成我国在吉尔吉斯草原优势地位主要支柱的西伯利亚边防哥萨克军队，经您按照社会完善组织的坚强原则加以改组，使这一阶层加强它的公民发展和富裕。在西西伯利亚的历史上，在您的管理时期奠定了这个广阔地区和所驻军队的幸福生活，将成为一个光辉的时期，对于各执政者是有教育意义的，对于祖国同胞是可喜悦的，他们正在诚恳地作出应有的贡献，来感谢为我们亲爱祖国的利益和光荣而出力的强有力的活动家。我们祝贺阁下荣获奖赏和对外伊犁人的胜利。”

教育界的代表，西西伯利亚学校总监督四等文官，前喀山大学蒙古语文系教授波波夫作了如下的发言：“衡量人的生命，不是看他活过了多少年，而是看他为社会福利或国家利益作出了多少理智活动。一个负起义务把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供献给祖国，并以某些重要功绩表现自己活动的人，他是幸福的。出现这样优秀卓越人物的社会或国家，也是幸福的。

“您，阁下，毕生致力于为祖国服务，已经获得居于国家首要活动家地位的权利。不是我这样一个和平的科学工作者应当来计算您的军事功绩的；这些功绩已经得到了我们仁慈的君主的应有评定，也是您的勇敢的战友们所知悉的；它们都将载入真实的历史史册。我也不敢妄谈您的民政功绩；您的管理措施雄辩地说明了这些功绩，属您管理的广大边区的完善组织就是这些措施的证明。

“请允许我，阁下，就对于我更接近的、更亲切的事物，即关于西西伯利亚有赖于您而兴办的智育和德育教育，关于国民幸福所由建立的奠基石，来说几句话。

“我们生活在我们祖国体育和德育力量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宽厚的君主亲身引导自己的人民走上国民繁荣昌盛的道路。为了实现正直的思想、高尚的感情、善良的事业，我们需要广阔的场所，

而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权威之手在极广大的规模内给我们开辟了这种场所。我们祖国大地的伟大任务——从愚昧的昏睡之中唤起人民群众——已经在阁下的心灵中得到了充分的同情。您始终对科学的意义作出很高的评价，您把自己一生的最好岁月献给科学，对您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的人类知识是陌生的。在这种珍贵的保证之下，西西伯利亚还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吗？

“国民教育还能不成为您首先关怀的对象吗？按照您的深思熟虑的预定计划，教学部门在皇上委任您管理的边区得到了新的组织：中等和初等学校，在数量上大大增加了，在内部组成人员上有了改善。您解除了学校的形式主义的沉重枷锁，为生动的、易于理解的语言开辟了自由的道路，现在陈腐的墨守成规的教育已经没有余地，它已经过时了。您把学校从可怜的故步自封的状态中引导出来，使它成为学术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环节。您使学校激发了对伟大使命的认识，因此增加了它的道德意义。父母的信任开始非常迅速地增长，现时男孩入学人数，已经达到三千之多。这样一个数字，十年以前似乎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阁下又面临着一个同样重要的关怀——在女性中间灌输教育。您深刻地确信，在道德上发达的母亲所生的子女，可能从自己的家庭中获得较好的生活原则的教育，并成为社会的有益成员。您忧心地看到西西伯利亚的妇女教育受到轻视，因此您决定设立妇女学校来消除这个缺点。所有各阶层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地响应了您的富于同情心的号召，人人为这种社会事业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现时已经有八个城市开办了这种学校，有六百个女孩受到了初等教育，而国库在供给上并不担负任何费用。

“您对西西伯利亚智育和德育发展的悉心关怀并不停留于此：您也没有忘怀外额尔齐斯河的游牧民族，他们已经几个世纪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您要通过有益的教育方法来使他们的粗野风习

趋于温和，灌输家庭的和国民的道德，并以此建成一个文明的社会。为达此目的，您拟定了吉尔吉斯人学校的计划，并应于1861年1月1日实施。

“在这种草率的概述中，远远没有说完您为国民教育事业利益所作出的一切。但是这已足以使您的名字为西西伯利亚永志不忘。请允许我，阁下，代表一切阶层人等向您表示诚恳的、深切的谢意，并为您的健康干杯。”

加斯弗尔德在答词中表示，他同样感谢所属人员的尽心竭力，没有他们的协助，在他们发言中所提到的那些成果是不可能得到的，作为西西伯利亚一切服务人员共同财富的那些成果，是他们之中人人有份的，也是有他一份的，然后他补充说：“已经仙逝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皇帝陛下，在匈牙利战役和我在多瑙河沿岸各王国统率军队之后，赐恩使我管理西西伯利亚，我没有在这里服务过，也从来没有到过这里，由于这个边区的辽阔、部族的众多和行政管理的繁杂，我曾经感到困难，是否能够完全无负于君主的最高委任，但是在我为君主和祖国服务的坚定意志之下，在你们各位经常尽力协助之下，一切困难好象自然而然地都已先后消失了，也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最初象是无法实现的东西，终于成为可能的了。在这十年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确实是很大的，在边区的完善建设和开发方面是这样的，在提高军队的教育和素质方面也是这样的。”

加斯弗尔德在宴会上，关于我国武力在外楚河远征中所获得的胜利，也说了几句话，他夸奖了外伊犁派遣部队和它的统率人齐麦尔曼上校的英勇，他总结说：“如果没有直接来自俄罗斯教导者至圣的君主的一切美德和光辉，为了边区的开发和对于其他各部门的管理，在我和诸位共同努力之下象你们诸位所说的那些成果，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大皇帝陛下的奖赏使我感受幸福，当然也以我为代表对于全部边区给予仁慈的关怀，表明对我们是满意的。圣上的恩惠我们都是报答不完的。因此我请求诸位，将来也要象迄今为止那样，以敬爱和忠诚为君主和祖国而服务，我首先举杯祝大皇帝陛下健康。”

第二篇

第一章

关于中国与西欧各国的武装冲突。 缔结《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期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概述。

占领浩罕国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堡垒，成为我国继续向中亚细亚深入的开端，这与同时在俄国亚洲部分极东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时代，是相巧合的。俄罗斯国有赖于自己国家人物，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伯爵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提耶夫的明智、毅力和卓越才能，雄强地屹立在太平洋海岸上，太平洋从今以后显然已经成为世界时事的中心。在欧洲各首要国家联合努力之下，中国人上千年的闭关自守主义失败了。差不多在自己的领域内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巨大帝国，从前对于我们各国曾经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不得不开始同西方各文明民族有更加密切的接近，并成为欧洲商业和文明完全可以达到的国家。要弄清1857到1860年中国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即英国和法国反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必须谈一谈在这个战争以前和引起欧洲两个强大海军国家与中国武装冲突的一些事件。

中国人与英国的初次武装冲突发生在1839年，当时双方曾经发生关于贸易问题的争执，主要是关于私卖鸦片问题。在这些冲突刚一开始，英国人通过自己的代表涅皮尔男爵，尤其是他的继任人鲁宾逊与艾利奥特①，遇有方便机会就尽力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

① 涅皮尔、鲁宾逊、艾利奥特过去也译为律劳卑、罗治臣、义律。——译者

的方法解决悬案。但是中国人把英国人的这种让步看成软弱无力，按照自己政策惯用的办法，支捂搪塞，千方百计拖延谈判，以便赢得时间，并从而获得机会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到受英国人威胁的地点。奇怪的是，中国人为了监视英国军舰的行动，曾在全部海岸布置了自己的侦察员，对他们发出了下述训令："大家注意！在远处出现夷人的船舶时，要更加严密监视。如果在船舶上卷起黑烟，你们可以安静下来，船舶将不来靠岸，而是在附近通过；如果相反，看到白烟，你们就要当心：夷人正在接近。"

最后，英国人在长期和无成效的谈判以及中国人方面任意拖延之后，就决意采取坚决行动。中国人在陆地上和海面上遭受几次连续的惨败以后，迫不得已开始了和平谈判，终于在1844年8月29日签订了著名的《南京条约》①。按照这个条约，中国人还要付给英国人二千一百万元赔款（合二千六百万卢布），并永久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各港口给各国通商。

为了全面概述中国人与欧洲国家的这种初次武装冲突，弄清这个战争所进行的极端特殊情况，不是没有趣味的。按照欧洲公认的意见，中国兵士在这个战争中显得是失去任何毅力和没有作战能力的真正胆小人。在最初射击之后，他们就扔掉武器开始急忙逃跑，象在绵羊群中爆发了一颗炸弹那样。著名的在中国游历的法国旅行家天主教教士丘克没有否认这种情况，但是认为中国人的行动不应受到绝对的指责。丘克说（见所著《中华帝国》第一卷，第十章，第452页），如果对中国人当时不得已所处的那种情况和环境加以深思，那么就应当得出结论，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为此应当将两交战国军队行动所使用的火力武器彼此对照比较。一方面是弓箭和落后的火枪，而另一方面是用现代技术在所有方面经过

① 本条约签订日期应为1842年8月29日，也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译者

改进制造出来的优良枪械和大炮，这种枪械和大炮的远距离摧毁力是很大的。彻底摧毁任何一个中国城市，对英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英国军舰在这种场合通常总是在望见城市之处停下来，发出系统的轰击，而他们却处于中国人枪枝和炮火射程范围之外，中国人在沿海堡垒和炮台中的那些可怜大炮所发出的炮弹，射程达不到海岸与威胁地停泊着英国军舰的一半距离。英国大炮的火力，对于这些可怜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可怕的超人类的东西，他们终于猜想到，他们是在与不可思议的神灵打交道。试问，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甚至中国人的最无所畏惧的勇敢精神能有什么用处呢？最后，英国人枪炮的优势使中国兵士没有任何可能接近英国军队，而英国军队则利用自己枪炮远距离射击的优越性，无情地扫射中国人，向他们暴雨般地撒下了炮弹、榴弹、霰弹和火箭。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无情地在歼灭另一方，丘克说道，中国人毫无办法，只有尽力设法逃避这种非常厉害的火力，而他们也就是用很大的本领、敏捷和迅速这样做了的。很明显，在这方面的全部罪责应该由中国政府完全承担，它派遣成千上万的几乎没有武器、没有可靠的防卫手段的人去战斗，这就已经预先注定了他们必然的而且也是无益的死亡。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1894—1895年中国与日本的最近战争，即在五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军队仍旧处在那种可怜的境地，没有前进一步，这也明显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守旧主义和闭关主义，以及他们完全厌恶一切新设施。例如，另一位天主教教士巴泰尔·法维耶1894年在里昂天主教会关于中国的军备作了如下的叙述。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欧洲任何人也不可能想到的：在那里谁也不会相信这种情况！在北京和它的郊区集中了十万兵士，他们处于无薪饷、无膳食的境地，在零下十度的严寒下穿着夏季衣

服，他们的武器装备是最稀奇古怪的，从弓箭、带有铁尖的粗木棒和十三世纪的长矛开始，到新式的枪械为止。这种枪械尽管是刚从仓库中拿到的，却已经锈得完全发了红，而且没有枪弹。这还不算，还有一些弹药枪，牌号是："波茨坦" 1801年，铁木耳时代的火枪和中世纪的军刀。这一切也令人失望地引起不少的惊惶。"

虽然于1844年在南京与英国人签订了和平条约，中国人还是按照自己政策的习惯办法行事，不想认真执行这个条约的一切规定。例如沿海城市广州，按照这个条约如上所述，应该开放通商。可是，它仍然是欧洲人所不能接近的。由于这种情况，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已经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武装冲突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846年 1 月15日，广州居民刊印了许多传单，张贴在城墙上，恶毒地对英国人作出下述的尖锐评述：

"广州是我们的家乡，这里住着我们的家，这里有我们祖先的坟墓。如果暴乱的夷人进入我们的城市，我们就不再承认皇帝的官员：我们要象一个人一样，一致奋起，抓住夷人，砍掉他们的头。我们熟悉英国夷人；我们知道，他们图谋的只是虚伪和欺骗。他们象不可驯服的野马，象贪食的山鹰和丝蚕；他们的罪行是擢发难数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啊！难道他们不是出生在教化之外的地方和离开教化地方遥远的万恶不赦的国家吗？离开中国越远，野蛮也就越甚。这一点从他们的狼性兽面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的城市，他们就刺探一切。他们不久就要统治我们。"

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互换电文、互相谈判和甚至互相争论继续数年之久，而终未达成任何协议。后来发生克里米亚战争，随后又爆发印度的变乱，阻碍了英国人的坚决行动。只是在1857年春季，中国领海上的英国海军才大大地加强了，但是陆军由于印度变乱还没有平息，不能前来参加作战。因此英国海军上将麦克尔·

西摩[1]决定：在军队从印度到来以前，暂缓陆地作战，先对中国海军加以致命的打击，并将南海水面交通和广州城市予以严格的封锁。从1857年5月25日到6月1日，在这个期间内有三条武装精良的和具有大批海军水手的中国帆船，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被英国人俘获了。

由于这些事件和当时孟加拉军队变乱最后得到平息，英国人在印度开始积极准备对中国的远征军。同时法国也不愿继续实行不干涉政策。在不久开始的关于对抗中国人的联合行动谈判以后，一支可观的备有海军陆战队的法国舰队，在海军上将里戈·德·热努利[2]率领下，于同年1857年在中国海面出现了。

驻在广州的广东广西两广总督叶名琛(英文写法是叶)决定保卫到底，尽管他已经从各方面受到威胁的危险：从海上受到英法舰队的封锁，从陆路有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逼近。可是，却不可不注意到一个极妙的事实，它证明中国人的作战方法较诸欧洲所采行的，是达到何种程度的特殊化。在广州处于严格封锁之中并遭受着惨重轰击，以及受到冲击威胁的时候，处在广州北方的为外国通商开放的其他海口城市的地方官员，却丝毫也不排斥住在该处的欧洲商人，而且丝毫也不阻碍他们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因此在中国南方，英国人和中国人得到自己政府的同意，进行了公开的战争，而同时在中国北方各港口，这些国家的代表仍旧保持极友好的关系，而各该国家的属民则进行着和平的贸易。到1857年底，孟加拉军队的变乱已被最后平息下去，英国人终于能够在与中国已开始的战争中也采取陆地战斗。同年12月29日，经过一昼夜的轰击，然后进行猛攻以后，广州落入了联军手中。

英法两国代表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在攻占广州以后，即决

① 过去也译为西马糜各厘。——译者

② 过去也译为吉诺里。——译者

定前往上海，预定在上海与俄罗斯国和北美合众国代表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和黎德① 进行协商，然后向北京政府致送联合照会，不久即已照办。

但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外交惯用伎俩，总是准备把任何事务作出无期限的拖延，对于这个照会给了支吾搪塞的答复，借口说中国政府大清皇帝已经发下命令，派遣谈判代表前往广州。但是联军各代表这次没有中中国人的诡计，按照互相协商，决定向北方白河口前进，1858年 4 月底，俄罗斯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也应当来到这里。

联军各代表前往北方，前往流经北京的白河河口，而当时奉委进行谈判的中国代表却是如上所述前往南方，前往广州，这就是纯粹中国作风的滑稽情节：双方代表准备进行谈判，可是却彼此背道而驰。应当注意，联军各代表从上海转往北方，转往白河口，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只有这种坚决的行动，才能迫使中国大清皇帝作出更多的让步，准备履行欧洲各国的要求，并签订持久的和有利的和约。最后，在北京附近出现欧洲和新大陆各一等强国的代表，在威严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护随之下，必定会对北京政府产生强烈的印象，向它说明，中国外交的任何诡计显然都不能防止日益面临的威胁。

但是中国人在这一次，仍旧企图在这个场合采取自己传统的观望政策的办法。

联军各代表来到白河口以后，两个中国委员来到了他们这里。尽管联军早在上海已经声明的要求，并已转达浙江和江苏两省总督以便送交北京，这些要求是说得清楚、确切和肯定的，但是中国委员故作不知而提出问题：欧洲人究竟要作什么？经过争论和交换

① 也译作列卫廉(William B.Reed)。——译者

电文，结果是联军向直隶总督宣布，他们将立即前往北京，并在那里与中国政府谈判。

因为白河口的入口处曾筑有堡垒防卫，当即决定先行占领，在开火后经过二个小时已经完成。1858年5月17日，联军向距离北京只有五十俄里的天津推进。占领天津之后不久，即5月22日，即有被授与广泛全权的国家高级大员充任中国委员来到天津。

5月27日英国和法国代表与中国各委员举行了首次会见，随后也就开始了谈判。6月1日首先与中国人签订条约的，是我国代表侍从将军普提雅廷。继他之后，北美合众国代表也与中国人签订了特别条约。又过几日，英国和法国代表：额尔金勋爵和布尔布隆签订了条约。

西方各国代表所签订的各条约，应当在下一年1858年① 实行批准。为此目的，新派公使卜鲁斯和布尔布隆于1859年6月来到了白河口（海河），以便经这一河道前往北京。

但是白河口有堡垒防卫，是不能通航的。由于对英国舰长当时所提的质问的答复，中国人没有如期送到，所以英国海军上将霍普② 将舰艇排列成战斗队形，驶近炮台，以便消除白河口的障碍物。当时中国人从堡垒中发出了强烈的火力射击，有五艘英国炮艇被击沉。企图从陆路占领堡垒也没有成功，联军不得不于受到损失以后退却。

后来，据中国人在自己稍晚的答复中声明，他们在白河口设置障碍物原来是专为防止武装起义军（太平天国军）进入河口。为了联军各代表的通行，指定堡垒北边的北塘河代替白河口。

当时美国的代表得以按照指定的道路通行。

就1858年白河口发生的不友好行动，中国皇帝表示愿意给予

① 应为1859年。——译者

② 过去也译作何伯。——译者

完全满意的处理，并请西方各国代表前来北京。但是英国人，随后还有法国人，共同决定这次也以武力开辟前往北京的道路。为达此目的，于1860年7月在北直隶湾集合了英法舰队的船舶和炮艇二百多艘。法国部队进行侦察以后，看出北塘河的炮台空虚无人。但是两个海军上将霍普和肖梅尔还是怀疑这时中国人有什么狡计和阴险行为，向完全空无一人的炮台开火，只打落了挂在炮台射击孔上的一些床单。

随后军队从舰艇上登陆，扑向人口众多和完全和平的北塘这个小地方，在留驻该处的十一天时间内，进行了掠夺和各种强暴行为。特别是妇女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强暴行为和痛苦折磨。7月31日，在所有军队登陆完毕之后，联军即向白河挺进。沿途分布着防御营垒，是中国人遗弃的，但是在营垒附近有蒙古骑兵队五千人，看到联军接近，即加以袭击，跑过刚能布成方形阵势的英国步兵，突破英国的骑兵，向英国的炮兵连突然猛扑。

蒙古骑兵除了钝笨的铁剑和弓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武器，受到英国步兵和炮兵的射击，不得不分散开来，对于联军并没有造成特别损害，尽管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曾认定蒙古人中有俄国军官。1860年8月9日攻占了白河口炮台。然后联军按照自己的习惯办法，掠夺了大沽口村镇，再度占领了天津，我国公使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不久也来到了这里。

在天津与前来此间的代表所开始的谈判，显然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联军一面不停止这种谈判，同时决定无论如何应向北京前进。

在这条道路上曾与中国人发生两次战斗：一次是在张家湾城，该城曾被英国军队劫掠一空，并在城内实行了最骇人听闻的破坏和最丑恶的暴行；另一次是在距离通州四俄里的八里桥。联军占领了八里桥，中国人即行逃跑，遗弃大炮四十余门。

八里桥战后，中国皇帝与军机处从北京逃往蒙古。在联军逼近北京以后，集合在北京郊区的中国军队都逃匿不见了。1860年9月24日，法军和英国非正规的骑兵毫无阻碍地占领了中国皇帝的城外皇宫——海淀。

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上校武官德·伊·罗曼诺夫，曾有充分可能搜集到联军占领后当时北京城内所发生事件的最确实消息，据他说，法国人争先恐后地抢劫了皇宫，经过四小时的洗劫以后，派人告知英国人，说他们已经发现巨大的财富，作为同伙弟兄，特来邀请他们共同分享。当时英国人即奔向前去，将法国人未及毁灭和夺取的一切东西，洗劫净尽。在这里攫取了外交档案，盗劫了不可计量的宝藏，其中有金制偶像、盘碟、花瓶和其他镶嵌宝石的工艺品，有珍珠首饰、珍珠项链、宝石、室内豪华陈设、木器家具、家庭用具、器皿、中国皇帝和宫中所用的衣柜，大量呢绒、绸缎等等，装满了许多房间和储藏室。

单是一种桌上座钟计有一百二十具，其中很多都饰有宝石和珍珠，兵士们用刺刀把它挖了下来。官长们不但不制止军队的劫掠，而是恰恰相反，竭力帮助他们干这种勾当。后来大家都很羡慕地指出法国的一个军官，他攫得了价值六十万法郎的各种物品。据说，蒙托班将军的儿子，作为总司令的儿子也能命令兵士替他抢掠，装满了几车，价值三十万法郎。一个法国兵士在掠夺以后说道，他不愿意服务了，哪怕提供雇佣兵四十人来代替自己，因为在他的腰包里已有了十二万法郎。

能抢到一万五千到二万法郎东西的人是很多的。许多军官都抱怨说，他们没有机会参加掠夺，因为与自己的队伍正在执行勤务。没有参加掠夺的英国两个团曾经发生了哗变。重新返回中国的额尔金勋爵命令每人给自己留下一件物品作纪念，所有其余的东西一律交到大本营，在那里公卖并将卖得的钱款给大家均分。不

言而喻，所交出的只有那些无法随身携带的东西。但是，就是这种东西也收集到如此之多，在卖出以后，军官和兵士都分得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款。曾经传说在被抢掠的物品中似有一把宝剑，金制的剑鞘镶有许多大钻石，是俄国使节伊兹麦洛夫带来赠送中国皇帝的礼品，也传说这把宝剑似拟作为赠送拿破仑皇帝的礼品。在海淀皇宫被掠夺、破坏和毁灭的全部宝藏计值六千万法郎之多。同时在围城大炮运来之后，联军曾准备轰击北京。也曾预定把城墙打开缺口，所以在下面埋了地雷。中国人方面，曾将自己的近卫军（阿尔巴津人①）布置保卫东北城的各城门，在其余的城墙上则是完全没有武器的二万五千名中国人。站在前排的人分发了白布手巾，命令他们在夷人接近城墙的时候挥动白手巾，这是因为白色作为派遣军使的颜色，可能在这种场合有所帮助。但是如果夷人置之不顾而爬墙，则命令从装有石灰的口袋中向他们撒石灰和从预先备置的木桶中浇热水。

但是中国人没有等到联军的进攻，于十月一日最后决定开放安定门，也就立刻被英法联军占领了。此后，联军在作出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向中国人坚持要求交出先后被俘的三十七名欧洲人，这已经得到照办。被交还的俘虏因曾受过痛苦折磨，疲惫不堪。据罗曼诺夫说，中国曾将俘虏的两手和两脚捆绑在一起，穿上木杠子，把木杠子两端抬在肩上，在这种悬吊状态中把他们抬行了二十八个小时，是些迂回的道路，因为从通州（在这里曾经俘获较多的俘虏）到北京的直接距离步行不超过五个小时。在北京和海淀的城外皇宫里，被俘虏的欧洲人都被结实地捆绑了手脚，使他们饥饿得疲倦不堪，白天使面向太阳置于酷热的阳光下，夜间就送入满是爬虫和飞虫的肮脏不堪臭气薰人的小屋中，在这里也是受拘束地把

① 即"雅克萨人"。——译者

两手捆向背后，挂在顶棚下。许多人由于上镣铐，手脚上长了满是蛆虫的脓伤。有些人因受这种残酷折磨，手脚失去了活动能力。

有些人们，包括英国翻译员帕克斯在内，曾经六次被送上断头台，并将头置入木枷中；帕克斯所以得救，是因为他会说很好的中国话，他曾声明说，他是俄国人，我国军队将要来到北京，将为他的死亡严厉报仇。最后，中国人交出的其余俘虏，是盛在棺中的死尸。在解剖尸体之后，欧洲医士们发现，大部分人是由于生理上的衰竭和困苦而死亡的。有些尸体的内脏被大老鼠和甚至猪给掏食了；有些尸体的手掌被大老鼠吃掉了。

尽管已经攻占了白河口堡垒和占领了天津与通州两个城市，西方各国代表最后也来到北京，联军的地位还不能认为是完全有保证的。北京各郊区的经济已经完全破坏和一片荒凉，居民都已逃跑了。法国人没有储备粮食，依靠采办和抢夺来得到粮食。英国人已经把带来的粮食用完了。军队处于对欧洲人充满恶感和深刻仇恨的广大居民之中。同时在北京城内，皇帝逃跑以后，已经没有任何政府了。

当时，我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于会见联军代表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之后，决定在10月4日进入北京，就住在我国馆舍内。不久曾有中国高级官员到他这里来并征求意见：在他们所处的这种不愉快局势之中，他们应当怎样办理。

随后我国公使收到留作国家执政人的中国皇帝御弟恭亲王来信，对于我国公使参加和调解与西欧各国代表的当前交涉事务，表示感谢之意。10月7日，我国公使再一次会见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得悉他们向中国人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原来他们要求对英国和法国每国付给赔款八百万两（合一千五百万卢布），总共为三千万，外加一百万两，作为在中国人处被俘受难人员和死者家属的赔偿。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于同日返回北京城内，经召集最重要的

中国官员前来，并且得以说服他们对西方各国代表给与迅速的和满意的答复。中国人赶快照办了，并将所拟定的答复文件送到我国馆舍交我国公使预先阅看。

后来也是这样，直到与西方各国公使已经开始谈判的时候，中国官员们在没有征求我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的意见和指示以前，就不采取任何措施。10月12日联军各代表进入北京。

当日和第二日，由额尔金勋爵、葛罗男爵和恭亲王在礼部衙门签订了续增条约①，然后也互换了1858年《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按照这个条约，英国人取得了一千五百万军事赔款和香港对岸大陆上的一块土地，并开放天津与其他城市通商。英国出兵中国所支出的费用如此巨大，以致从中国人所取得的赔款都不能全部抵补。光是一项运输费用，英国每月就需要支出一百万镑。

自10月19日起，法国军队从北京开始撤退，过些时候英国军队也撤退了。但是早在这次撤退之前，大约在10月12日，海淀的中国皇宫已被英国军队完全毁灭了：建筑物都被烧毁和破坏了，果园和花园的树木都被砍光了。许多宏丽的房屋已片瓦无存，而花木成荫的果园和花园则成了光地。

联军离去北京以后，皇弟恭亲王于10月29日亲临我国南馆访问我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祝贺恭亲王顺利结束与两个西方国家的棘手的事务，并乘机提出关于解决俄国与中国之间的悬案所作出的诺言。应当说，关于这种案件的谈判早于10月下半月已经在我国馆舍开始了。恭亲王已经派定瑞总管和林、鲍、陈各参赞来办理这些事务。在我国馆舍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各大臣对于某些条款，尤其是对于东部划分国界和陆路通商事项，表现得很固执。最后，于10月22日，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就一切条款都达成了

① 即《中俄续增条约》，于公元1860年11月14日签订，又名《中俄北京条约》。——译者

最后的协议。

10月31日，中国官员三人来到我国馆舍，头上顶着一个黄匣子，其中装有中国皇帝批准俄国代表与中国代表互相协议所作的条约草案的谕旨誊黄。谕旨誊黄是由恭亲王备有公文交给我国公使的。1860年11月2日下午四时，恭亲王身穿绣有象征皇族金龙的大礼服来到我国馆舍，携带着卓越的随员，其中有参加过谈判的大员。四点钟双方在条约上签了字，也在互换这个条约的议定书上签了字，为了使中国人不能避开中国皇帝的谕旨，而声称恭亲王是因错误和强迫签订了条约，这是很有必要的。新订条约曾经与英国和法国所订各项条约，以同样的程序和等级，加以批准和盖印。在我国公使离去前往俄国境内的时候，恭亲王对他给与同样的殷勤待遇，同他在北京居住时所享受的一样。按照特别的礼遇，他乘轿到张家口。为了在蒙古继续前进，集合了六千匹马和四千五百名乘马护送人。

从张家口到库伦的全部行程（三千五百俄里）用了八天时间。按照恭亲王的命令，将《北京条约》① 立即送往库伦城，并饬令于我国公使到达之前从速译成蒙文。同时叙明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对满洲政府所作出的重要功绩。显然可见，中国人认为，有赖于我国公使的明智、毅力和卓越的天赋外交才干，消除了北京可能受到极大流血灾难的重大纠纷。这种情况英国和法国代表以及其他外国人等，也都有过相当的评价。例如，法国大主教阿努伊利和穆利都曾祝福他尽力防止北京的流血灾难，喇嘛们为他祈祷，把他看作他们庙宇的不可侵犯的保护者，甚至库伦的呼图克图也向伊格纳提耶夫将军送来了感谢书。

---

① 即《中俄续增条约》，又名《中俄北京条约》。——译者

第 二 章

《北京条约》和它对于俄罗斯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重要意义。 执行这个条约的规定对于划分俄国与中国国界的关系。极东划界委员的会议和设置东方国界的界牌。 新任西西伯利亚总督亚·约·杜加麦利将军来到鄂木斯克。我被派任划定中国西部国界委员。

伊格纳提耶夫将军所签订的《北京条约》，按照所达到的成果的重要意义和我国公使在很短时期内使俄国在中国提到强有力的高度地位的卓越活动，可以说是我国与中国皇帝政府外交史上空前的范例。根据这个条约，首先是在中国西部确定了巩固的国界，这是前百年内与北京政府所订任何条约中都是不确定的。很明显，在东西伯利亚西南端从沙宾达巴哈到从前浩罕国领域这样广大距离的边界没有划定国界，在边界上曾迭次发生风波和混乱，也在国界附近游牧外族之间产生过掠夺和抢劫。这一切情况，都是引起两国边界当局之间和两国中央政府机关之间的不和睦关系的原因。随同俄国和中国这些边区国界的划定。上述的混乱状态自然消除，而除此以外，由于国家订约，中国迭次同我国争论的对大汗国和吉科卡门汗国吉尔吉斯人所占有的谢米列钦斯克与外伊犁边区东南部的全部土地，以及包括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下游富饶的库尔楚姆边区的所有权，得以永久划归俄国所有。

《北京条约》在划定我国东部国界方面，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如所共知，这个国界是1858年5月16日的《瑷珲条约》所确定的，只是沿阿穆尔河① 流域到它与乌苏里江汇流处为止。再行向

前，从乌苏里江直至海岸，无论按照这个条约，还是按照1858年6月1日在天津订的条约，都没有明确划定国界。根据《北京条约》，由中国政府郑重地确认的这两个条约，都作了补充和扩大，并详细规定了从乌苏里江口到兴凯湖和直到海岸的东部国界终点。

因此阿穆尔和乌苏里边区，包括太平洋沿岸，直到朝鲜，都已永久归俄罗斯所有。

再来研究《北京条约》的其他规定，应当谈到的，是关于交界各省和其他更加广阔接壤地区的官长之间以及东西伯利亚边区主要长官与北京高级政府机关之间进行政府交涉的程序的各项条款。为了估计这种规定的全部重要意义，应当注意，按照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俄罗斯国与中国之间的一切交涉事项，必须通过中介办理，即一方面通过当时管辖属于高级政府管理的一切事项的我国政府枢密院，另一方面通过北京理藩院，该院总管有关蒙古、满洲和其他对于中国本部来说被认为外藩的属地事务。在成立各局和后来设立各部之后，一切政治性的文件，或致送北京理藩院的所谓公文，尽管是在外交部亚洲司拟定的，但是其中都附带声明，指出文件是从俄国枢密院发送的。任何违反这种往来关系的方式，都曾引起中国人方面最无礼和最粗暴的抗议。例如在1732年，在中国使节从彼得堡返回北京时，我国国务大臣戈洛夫金伯爵交给该使节的答复文件中，没有写作“从俄国枢密院发”，而是写作“从国家外交部发”。北京理藩院在收到这个文件以后，曾把它送还我国枢密院，并通知说，这个文件“未经阅览，重新加封，即行送还，此后如果文件不是从俄国枢密院发送，不但禁止递送北京，而且禁止在国界上接受。”

首先为变更两国之间的政府交涉程序作了开端的，是东西伯

① 即黑龙江。——译者

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他开始用自己的名字直接与北京理藩院进行接洽。此后旧有的交涉程序，按照1858年的《天津条约》也有所变更。最后确定政府交涉的新程序的是《北京条约》。例如，按照这个条约，边界交涉权授予了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军政省长与黑龙江和吉林将军，以及恰克图边疆委员与扎尔固齐。后来按照《塔城条约》，也授予托木斯克省长和谢米巴拉丁斯克省军政省长同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进行交涉之权。遇有特别重要事宜，东西伯利亚总督有权与军机处和理藩院进行书面交涉。除了1851年《伊宁条约》所订有权在中国西部城市——塔城和伊宁设立俄国领事以外，按照《北京条约》也授权在蒙古北部库伦城，以及中国所属土耳其斯坦或小布哈拉地区位置在距离克什米尔三百五十俄里处的喀什噶尔城，设立领事馆和贸易站。设立所有这些领事馆，对于更加广泛扩大我国与蒙古和中亚细亚各汗国的贸易关系，毫无疑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北京条约》所订发展我国与中国陆路通商的许多办法中，应当提到授予俄国商人在中国内地陆路通商和在蒙古全部区域免税进行零售商业的权利。这种办法是对我国对华贸易的有力支持，扩大了商业交易范围，开辟了在中国内地产茶地区组织茶叶市场的道路。

最后，《北京条约》明确规定了商业人员或沿边居民之间可能产生的纠纷和争议的审理方法与程序，并确认《瑷珲条约》所订在阿穆尔和乌苏里边区全部地域的免税通商，以及松花江上的航行和贸易。

执行《北京条约》的规定，在划分两帝国间的国界方面，首先是在于根据条约和适应沿边地方地形性质，明确和详细地划定国界线，以及制成划界记录，将《北京条约》中只注明一般界线的国界作出详细的记载；其次是在于实行国界线的实地划分，即在各该地点

设置界牌。

我国与中国的东部国界，在它全部长度的大部分是以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明显天然界限表示的，只是在南部从兴凯湖到海岸地区需要更详细地划定。为了同中国人就划定这个极边地区国界进行商谈，我国方面派任的委员是：东西伯利亚滨海省军政省长海军少将卡杂克维赤和东西伯利亚部队总军需官布达果斯基上校。1861年5月30日，他们来到了兴凯湖的我国哨所土里罗格（牛角湾）地方。稍稍早些时候，中国委员们也已来到了乌萨奇河。6月1日，中国官员前来我国哨所，并声明说，中国各委员将于6月3日来到土里罗格。但是从已经来到的中国官员说明中得悉，我国哨所土里罗格位置所在的土尔河，中国人不承认是按照条约应当开始划界的白棱河，而指出湖的南部方面同一名称的北齐河。这种开端，显然，不是划界顺利进行的预兆，不但如此，我国委员与中国委员的会见也没有在他们所允诺的6月3日，而是在6月6日才进行，而且这还是在我国委员以坚决语调写成的书面声明送给中国委员之后才达到的。

在6月6日第一次会见时，我国代表与中国代表之间一开始就几乎对于应当商议的一切问题都发生了分歧。

例如，中国人肯定说，俄国属地的界线应该从乌苏里江河口向上行直至发源之处，而乌苏里江和海洋之间的地区应当认为是中立的，不能移住居民。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们借口说，在《北京条约》第一条所叙述的总地图上，这一部分界限没有以红线标明。接着中国人肯定说，我国哨所所在的那条河流，名为奎屯毕喇，这个名称与白棱河毫无相似之处。

中国人的这些毫无根据的强求，立即为我国委员所驳斥。然而，只是在经过极长时间的争议和辩论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渐渐相信，在他们自己的地图上，土里罗格哨所也是在白棱河上，奎屯毕

喇是在它附近流入兴凯湖的，而他们与白棱河混淆起来的北齐河(河是中国语，毕喇是满洲语表示河的意义)不是流入兴凯湖，而是流入莫河，而且是在离开兴凯湖有很大距离的地方。

然后在这次会见中曾经议定：为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误会和编制简明的边界记录，派遣帮办委员参谋本部杜尔宾大尉前往中国营垒，为与该帮办委员就此事进行协商将由中国委员委任专门的官员。

6月7日，杜尔宾大尉与中国官员进行会见。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中国人同意了按照我国要求作成全部边界记录，只是我国委员最初所提出的依松阿察和穆棱之间分水界直至白棱河上游进行划界的建议，作为例外。6月9日，中国官员将他们所编制的边界记录草案送到我国营垒。经过查阅之后，原来不仅没有消除一切旧有的误会，而且更产生了新的纠纷。例如，中国人在边界记录中记入：因重新划分国界而将原属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划归俄罗斯国领域之后，应准许中国官员照看留在该处的中国族系的居民。经过与中国官员争论这一问题以后，他们将自己的记录撤回。

6月10日，我国委员和中国委员在中国营垒举行了会见。在距离这个营垒二俄里处，准备了接待我国委员的特别帐篷。从远处已经看得见拥有帐篷二百个和许多马群的中国人的大营垒。据说，光是中国人的仆役就有一千五百人之多。在这次会见时，所有关于白棱河流域的一切旧有的意见分歧，又都重新发生了。中国人以其笨拙的顽强性力图坚持自己的旧有意见，同时不同意我国委员现场解决争论问题的建议，把这说成是完全白费力气。最后事情闹到了这种程度，我国委员看到关于在兴凯湖和海洋间划分国界问题从中国人方面不能得到任何积极的结果，就决定停止谈判，并从桌旁站了起来，以便退席。这时中国人开始劝告我国委员不要退席，并允诺一切按照我国愿望办理。在重新恢复谈判的时候，

又发生在地图上标注界限的问题。当我国委员标注了国界线，并将国界线的南方终点划定从白棱河河口行向瑚毕图河河口直至图们江的时候，中国人显系对此感到满意，并于我国委员离去之前，请求将我方以铅笔标出界线的地图留给他们，答应于第二天连同国界记录草案一并送还。

在我国委员和中国委员之间这样互相爱好和平的协商之后，似乎可以期待划界事务的迅速和完全顺利的结束。但是发现，要彻底消除中国人的笨拙顽强性和他们天生缺乏信任与根深蒂固地怀疑我们要尽量多地从他们那里夺取土地的心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的确，在第二天，即6月11日，中国人按照诺言，将我方的地图和国界记录草案送回来了。这个草案尽管是按照条约拟定的，但是中国人竟加入了我国委员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一些条件。

例如，中国人同时要求，不准许俄国人在接近国界二十华里即十俄里的地方落户居住。因此，又与中国官员重新发生了争议。经过长久辩论，费很大的力气，最后才算说服中国人从国界记录中删除他们所加入的上述条件。

后来，在中国人现有的地图上以红颜色标明国界线。在向他们出示准备互换的五俄里比例尺地图时，中国人坚决拒绝接受，借口说他们只能从我方接受与《北京条约》批准的和经中国皇帝御览和赞许的总地图一致的地图。为了避免一定会使谈判无限期拖延下去的新争论，并注意到，由于中国人完全不懂制图学，看不到有任何可能来劝告他们掌握更加详细和正确的地图，所以不得不制成四份与中国人现有总地图一致的比例尺缩小的地图，以便同他们互换。在这个地图上标注国界，责成杜尔宾大尉办理。但是也不是没有争论的，只是在经过七小时的热烈辩论以后，杜尔宾大尉才能在中国方面的地图上划出与我方完全相同的国界线。

在这以后，开始编制和翻译划界记录和国界记录的文字，以及复制地图和签署地图。

6月16日，在我国哨所土里罗格进行了记录、地图和国界记录的互换。同日也在白棱河河口我国哨所的对面，设置了第一个界牌。其他界牌的设置，责成杜尔宾大尉会同中国官员办理，并决定托嘱我国武官照顾中国官员和工作人等。在互相交换赠品之后，中国委员已经急忙撤除自己的营垒，显然是要赶快离开国界。原因是他们已经从热河得到咸丰皇帝病重的消息。

6月19日，在兴凯湖与穆棱河之间的分水界上设置了第二个界牌，当经决定：由杜尔宾大尉巡视边界，以便实行测量沿边地带和设置界牌，同时派定地形测绘员三人、通译员一人、工人二十二人和马十八匹连同二十二天的食粮，归他指挥。

6月23日，我国各委员也从土里罗格出发了，他们也预定巡视国界，同时与杜尔宾大尉保持经常接触。不久以后，海军少将卡杂克维赤必须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①，他是由于执行管理边区和统率舰队的职务而前往的。但是，杜尔宾大尉在巡视国界的时候，没有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中国官员。

后来得悉，他们因为没有随带备用的粮食，由这一家房子到那一家房子乱窜，以极不能容忍的方法从居民那里为自己取得食物。我国委员在7月2日才得悉中国官员已经前往莫河上游卓明塔以兹（“愉快梦景”）住家地方。当时已经到达瑚毕图河河口绥芬河的布达果斯基上校，有三个星期之久没有得到关于杜尔宾大尉的任何消息，便决定从瑚毕图河河口营垒轻装出发前往莫河上游，以便亲自在分水界设置界牌。但是在来到“愉快梦景”住家以后，他没有遇到中国官员，只是在第二天即7月24日，才遇到二十四个中国

① 即海参崴。——译者

人正在八道河的另一所房子里休息，从那里把他们带到了瑚毕图河的我国营垒。

据这些中国人的陈述，得悉他们没有同我方取得协议，擅自在尼扬河上游国界线的一边设置了界牌。布达果斯基上校向中国人指出他们的行为是没有根据的，声明他们所设置的界牌必须拆除，随后中国人会同所派遣的由低级官员组成的我国工作人员，在特拉佩兹尼柯夫下级准尉指挥之下，拆除了界牌。

7月27日，在长时间缺席之后，杜尔宾大尉来到了我们的营垒。原来是，下了一个月的雨把他阻住了，也阻碍了地形测绘，土地泥泞不堪，使驮运变得非常困难。两匹马由于过度疲劳已经倒毙，第三匹由于露营被老虎咬死。我国的人员都是些西伯利亚人，对于克服当地的一些困难是较为习惯的，但是对于中国人这却是有点可怕的。例如，在看到巨大的岩石把小绥芬河压挤成狭窄和阴暗的深沟时，中国人就拒绝向前进行，当我们的一匹走在前头的马从岩石上掉下来滚到河里时，他们坚决宣称不再前行，并建议把界牌设置在绥芬河岸上。结果是中国人的马匹由我国兵士牵住缰绳走过山岩。总而言之，差不多每天都要碰到中国人的偏见、习惯和陈旧的理解，这种情形使勘界事务大大地迟慢下来了。而且，为首的中国官员纪某由于鸦片烟瘾很重，已经精疲力尽，请求容许他前往宁古塔城，显然是为了要在那里重新备办这种东西。当时决定允许纪某的请求，但预先取得了他的具结，声明一切界牌都是根据国界记录设置在各该地点的。纪某表示同意以后，答应到我国在珲春河的考察团会合。布达果斯基上校和杜尔宾大尉从瑚毕图河和珲春河上游分水界出发，沿珲春河下行，预定随后直接转向图们江，以便在该河口附近设置界牌。在边界委员会官员行进的路上，有一个由珲春集镇（中国称为珲春地方）官长派来的官员追上了他们。这个官员态度傲慢无礼，对于护送我国边界委员会的中

国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得他们也开始以有些高傲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个官员声明说，在波谢特湾早已没有我国的船舰了。同来到此间的中国人进一步私下交谈中得悉，珲春的官长对于俄国人心怀仇恨，他正是那个曾建议中国政府在波谢特湾拔除我国哨所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曾命令违背《北京条约》擅自在图们江河口设置界牌，而按照《北京条约》，国界线应在图们江入海处二十华里（十俄里）以上的地方。同时，边界委员会已经获悉一种极为流行的传闻，在珲春河和邻近各河流域居住的中国人正在企图发动反对满洲人的某种敌视行动，势必要发生冲突了事。很明显，如果这种传闻在实际上得到证实，在东方与中国人划界这种重要事务的继续进行就会发生停顿。因此布达果斯基上校决定不放过时间，采取一切办法赶快完成定界工作。杜尔宾大尉为此被立刻派往图们江河口设置最末的一个界牌，而布达果斯基上校本人立即前往波谢特湾，以便从我国的一条快速帆船上取得一些武装的划船，该快速帆船按照与海军少将卡杂克维赤的商定，必须在波谢特湾等待我国委员。用这些武装划船，预定借口输送粮食驶入图们江，借此预防沿边界地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和纠纷。8月21日，布达果斯基上校来到了波谢特湾，在那里已经停泊着“强盗”号快速帆船，随后“格里坚”号三桅舰也开到了。第二天，布达果斯基上校所搭乘的“强盗”号快速帆船起锚驶入公海，但是由于逆风激起强烈的波浪，只是在第二天早晨才来到图们江边。从快速帆船上放下来的快艇，由于浅滩上的强烈浪潮不能驶入江内，迫不得已而在邻近海岸登陆的我国水手和武官，关于在图们江口附近工作的俄国人情况无法获悉。然而，在距离海岸很近地方出现俄国军舰，不能不被中国人发现，并对军舰引起应有的注意。8月26日，在快速帆船返回波谢特湾以后，杜尔宾大尉也就来到了这里。最末的一个界牌被他设置在距离图们江口二十二俄里的朝鲜城镇边梁子村对

面。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称为河口的，是淡水与咸水混合的地方。从这个地方起到海，就失去江河的名称，并总称为海河。经我国地形测绘员测量之后，发现海河从海面沿河向上有十二俄里之长。再向上就是图们江的本身，沿江在距离海河十俄里即二十华里处设置了界牌，中国人方面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在杜尔宾大尉为设置界牌而来到图们江以后不久，该江对岸城市的朝鲜官员就来到他那里。朝鲜人对于俄国人表现了友好的态度，邀请杜尔宾大尉参观他们的城市。看来，仇恨满洲人和中国人的朝鲜人很满意与我国成为新邻居，并愿意与波谢特湾我国哨所的官长进行牲畜贸易，以便供给太平洋我国舰队和"大彼得"海湾的各哨所。同时，在珲春河流域进行测量的我国地形测绘员，于8月20日完全出于意外地被一批二百名武装精良的中国人马队在山中包围了。他们宣布说，对于我们不做任何坏事，但是也不允许在他们之先走开，为的是不把这批人的行踪通知给居民，特别是通知给满洲人。经过三昼夜的同行以后，中国人在夜间把我国的地形测绘员锁闭在一个空房子里，而他们自己却于天刚发亮时向前进行了。这种情况指出，上述的关于满洲人准备与中国人战争的传闻是有根据的。的确，不久就得到关于这种战斗的更加详细的消息。结果是，中国人尽管具有相当人数，却被满洲人击溃，逃散到周围的山里去了，在战场上遗弃的尸体达一百具。按照布达果斯基上校的意见，这种对于满洲人的进攻可以看出，消灭满洲人的企图没有成功，只是将来更加坚决和更加广泛的变乱的开端。

这是暂且的假定，但是很快地将变为现实，因为据1842年的人口统计，在满洲每三万五千满洲人计有一百六十万中国人，他们都是深刻仇恨满洲人的。因此可以肯定说，现今的王朝一旦被赶出中国之后，在满洲也不能为自己找到避难之所。

在上面关于划定我国东部与中国国界的叙述中，我涉及了这

项事务进行中的一些细节，这是专为说明那种非常的和特殊的条件，我国委员不得不在其影响下进行活动。在谈判时，他们不得不坚持地和忍耐地与中国人的粗鲁愚昧和笨拙固执进行不断的斗争。至于设置界牌，则需要付出许多劳动和经受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对于杜尔宾大尉来说，他与属下的地形测绘员和工作人等必须在荒无人烟和艰苦的地方行进，在那里的森林是由坚硬多叶的树种，如橡树、枫树、椈树和榛树构成的，没有任何可能砍出通路。不得不清除枝条，只求马匹能够通过。所有这些困难都被我国委员勇敢地和坚定地克服了。各委员和他们的助手杜尔宾大尉在与中国人交涉中所获得的经验，很好地熟悉地点和沿边事务的一切情况，以及他们的坚定不移和不屈不挠的活动方式，毫无疑义促进了谈判的顺利终结，促进了勘界记录、地图和国界记录的迅速制成和互换，最后也促进了从兴凯湖至海岸地区的国界毫无迟延的就地划定。在这方面对我国委员的功绩致以应有的敬意时，还应当提到他们在国界上，即在白棱河(土尔)上，成功地选定了谈判的地点。这种情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于我国委员停止在白棱河，这就立即表明所占据的地点是在国界线内，我们认为不容怀疑是俄国的领土。中国人显然是了解到这一点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不止一次地企图使我们离去白棱河，以便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划界。但是所有这些企图都被我国委员坚决拒绝了，并迫使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强求。尽管东部国界的南段长度不大，只需设立七个界牌，以及尽管边界地方和太平洋沿岸一部分地区，由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努力和我国海军的优秀代表者——坚决和勇敢的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的忠诚勤劳，大部分已经作了很好的调查并制出地图，而划定这个国界的事务，如上所述，还是与中国人作了最顽强的争议和辩论的。尤其是在当前的西部国界谈判中，必须预期会与中国代表发生诸如此类的不

友好的冲突。在这里，因为国界极长，问题就复杂化了，这条国界在《北京条约》中，如上所述，只是作了大体的规定。由此可见，要划定西部国界的一切细节，还面临着再与中国人进行新的谈判，并决定究竟必须按照什么山脉和河流进行划界。不容怀疑，在这种谈判时，中国人会提出他们对于沿边界的吉尔吉斯人土地的要求，也会以一切办法对我国的国界草案提出争议，后来也正是这样发生了的。这个问题所以更加成为一项困难的任务，是因为按照我所拟定的国界草案，应当划归俄罗斯领域内的沿国界线的吉尔吉斯人土地，特别是斋桑和库尔楚姆区域的土地，大部分是很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调查并且没有制成地图的，因此关于同中国西部接壤的沿边区域一些地点，所有的地形材料都是很有限的，大部分是根据询问得来的材料。关于这一点我是确信的，因为我于1860年至1861年的冬季在加斯弗尔德将军前往彼得堡之后，即行从事搜集在鄂木斯克文卷档案中可能找到的有关与中国人进行边界交涉的材料。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作成一个详细的记录，在记录中根据我所搜集到的材料，拟定了一条国界线，从按照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在托木斯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边界所设置的沙宾达巴哈界牌开始，沿着分水线，即大、小阿尔泰山脉分水岭向斋桑湖前进，再沿阿拉塔夫斯克山前进，直至锡尔河（纳伦河）上游为止。这个记录我曾经在新任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将军于1861年春季来到鄂木斯克以后不久，呈送给他审阅。

杜加麦利将军在就任管理军队和边区之后，所发布的第一批命令，我在上文已经叙述过（免除波切库宁的职务，并整顿对外伊犁边区军队的粮食供应事务），对所有人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并对他引起普遍好感。杜加麦利无论就自己的博学多闻来说，或就行政管理的才能来说，都是属于出色的俄国活动家之列的。他精通

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他的法文在外交部内被认为是优美笔法的范例。他曾参加过1828—1831年的土耳其战役和波兰战役，以及1833年穆拉维约夫(后来任高加索军总司令)对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著名远征，都有功绩。此后，他曾占有重要的和负责的外交职位：驻亚历山大总领事、驻德黑兰公使、1848年和1849年任我国政府驻多瑙河沿岸各公国的总督、然后被任命为枢密官。1861年7月，杜加麦利将军接到外交部关于我国领土与中国西部之间划分国界一事将于来年开始进行的通知。在本年，1861年，预定只与中国委员约定1862年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为了执行此项委托，选定我为我国政府的委员以后，杜加麦利将军命令我从速前往塔城，据我国驻该处领事康斯坦丁·安德里昂诺维奇·斯卡奇科夫所通知的消息说，中国代表已在塔城等待俄国委员的到来。我被任为委员，除经杜加麦利总督亲自选定我担任这一重要和负责的职务以外，还有一个情况保证了这项任命，即陆军大臣德·阿·米留亭对于这个委任也表示同意，因为我在高加索军队中在他任内服务时，他是亲自知道我的。

第 三 章

离开鄂木斯克前往塔城。 我与中国委员初期谈判的详细叙述。 使我迫不得已停止这次谈判的原因。 离去塔城前往乌尔扎尔哥萨克村庄，然后经由谢尔基奥波利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城前往鄂木斯克。

7月底，我同派任给我的帮办安德烈耶夫大尉一起离开了鄂木斯克，前往塔城。我们的途程是顺着额尔齐斯河右岸，沿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村庄和居民点占据的所谓额尔齐斯河防线，直到谢米巴拉丁斯克。当时在鄂木斯克和谢米巴拉丁斯克之间还没有沿额尔齐斯河的轮船交通。因此，这个行程我们是乘驿马在十分平坦的道路上完成的，在七百俄里的途程中直到谢米巴拉丁斯克，没有遇到一条流入额尔齐斯河的小河。但是在谢米巴拉丁斯克附近，我们却必须非常困难地爬上沙土山岭，套驾在我们轻便马车上的三匹良好的精力充沛的马匹勉勉强强地总算爬了上去。后来，在八十年代，由于谢米巴拉丁斯克省军政省长阿·普·普罗岑科将军的竭力经营，才在这里修成了一条良好的道路。我们在谢米巴拉丁斯克渡过了额尔齐斯河，进入了吉尔吉斯草原境内。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到谢尔基奥波利，我们沿着极好的天然石路，在一昼夜之内完成了二百七十俄里的行程。从谢尔基奥波利，我们转向左方前往距离谢尔基奥波利一百二十俄里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的乌尔扎尔村庄。乌尔扎尔哥萨克村庄，当时在这个吉尔吉斯草原地区是最后的一个居民点，从这里经过一百俄里到塔城，没有遇到一个俄国居民点。尽管从自己的性格上说，我从来反对任何官方的

交际和应酬，但是在这里与中国为邻的地方，不得不抑制自己，服从必须遵守的一些礼节。例如，在乌尔扎尔曾经为我排列仪仗队，按照斯卡奇科夫领事的意见，这是必须有的，因为周围的吉尔吉斯人由于他们的轻浮和把长官到来的消息传遍草地的习性，必将把关于我的消息在领事本人知悉之前告知塔城的满洲官员。

在乌尔扎尔作不久的停留以后，我于8月9日在哥萨克骑兵二十五人护送之下从那里出发。从距离乌尔扎尔三十俄里我们曾在那里住宿过的卡尔加拉河，我转向科克·捷列克河，从那里向塔城派遣哥萨克人四名，将我来到该城的日期通知我国领事。从那里继续前进，我于8月10日当天来到预定距离中国边界七俄里的接近中国卡伦巴克图的地方住宿。在这里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塔城省长）派遣的校官级中国官员，在几个其他官员随从下前来见我，表示欢迎我们平安到来，并问候我和我的帮办健康。中国人请求我接受按照当地习惯以大臣名义送来的一袋面粉和两只绵羊的食品。我为了表示自己尊重他们的地方习惯，接受了这种物品，并邀请中国人到我的帐篷，请求他们转达我对参赞大臣的友好问候和感谢他的殷勤关切。同时，我嘱托来人通知大臣，我将于第二天早晨在哥萨克马队二十一人随从之下前往塔城，这是由于我所担任的我国政府的代表职位所必需的。8月11日凌晨，奉领事命令前来迎接我们的我国驻塔城领事馆秘书格·瓦尔杜金来到中国卡伦巴克图附近的我们的停留站。这一天的路程不远，大约二十俄里。因此，我们在早晨八时从住宿地启程，十时已经来到了塔城。

在我们所经行的地域，全部都是广阔起伏的平原，北方为海拔达九千呎高的塔尔巴哈台山脉所隔断。由于长时期的干旱，这里的草大部分都枯干了，我们只是在低洼地方靠近沟渠，即吉尔吉斯人和中国人为灌溉他们种植的黍子和小麦地而相当精巧地开通的灌溉沟渠，才能得到牧草饲料。我们在路途中所遇到的属于乌尔

扎尔河系统的大部分小河的水流，都被分成沟渠以便灌溉田地，因此我们是经过满是长石块的干涸多石的河道通行的。在哈滕·苏河彼岸开始是当时认为中国属民的白支吉特氏族吉尔吉斯人的牧地。白支吉特人的大部分，每年在这个季节在塔尔巴哈台山谷中都有他们的驻扎地点，只是在深秋到来的时候才下山来到盆地。越过莱河，我们看到了中国居民的村庄，房子都是非常精细地用泥土筑成的，并用同样的土墙围护起来。周围是一片精耕细作的田地，水由修建得很出色的沟渠网加以充分的浇灌，在村庄或小村附近有许多栽培各种菜蔬的大菜园。在这些田地、菜园和果园里，到处都有爱好劳动的中国人活动着，公正地说，应当承认他们是果园业和菜园业的行家。塔城位置在完全空旷的地方，同时四周都是果园，景色引人入胜。

在哥萨克马队二十五人护送之下，带着某种庄严色彩进入城市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的迎接。沿着城市街道，我们在中国人、鞑靼人和塔什干人为数众多的人群中继续前进，他们以鞠躬礼节，有些是以脱帽礼节向我们表示欢迎之意。一大群人在我们行经城市前往贸易站时，始终没有离开我们。但是中国人保持很有礼貌的态度：不截断道路、不在马匹附近奔跑，总而言之，一点也没有破坏我们行动的整齐性。我们继续作礼节上的游行，从具有三俄丈高墙壁的堡垒旁边走过，来到了现任领事任内建筑的美丽的贸易站，它当时是本城的一座点缀建筑。在贸易站内，把领事本人住宅中很好的房间拨给我们居住。在这里我有机会同我国驻塔城领事斯卡奇科夫和他的夫人更亲切地相识，他的夫人是英国人。好客的主人很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建立了我们在互相同情和互相尊敬之上的友谊关系，而且一直到斯卡奇科夫逝世为止。

在中国往昔时代，大家知道，关于会见他们当局的礼节，不进

行预先的有时是长久的协商，无论何时都是行不通的。

因此，在我来到塔城的当天，就有塔城的警官前来见我，并宣布说由于我长途疲劳，他今天不敢烦扰我，打算明天再来，请示我的意见：我要如何安排与乌里雅苏台明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哈布齐贤委员(在我们这里哈的名字更为著名)的会见。第二天在我指定的时间，上述的警官真是前来见我了，而且在他之后接着还来了参赞大臣派来的负有同样使命的人员。

我在我国领事的房舍接见了他们，并宣布说，我作为我国政府的委任人员，不认为自己的地位低于将军，但是尊重他年长，作为来到中国的俄国客人，我准备先去拜访他。警官回答说，将军正是期待得到这样的答复，他将很高兴，但是很抱歉，他不能在自己的住所接待我，因为住所是由一座城市庙宇划出来的房舍，由于住室狭窄和门户很低，不能安排同我的职位相称的正式接待。由于这种原因，将军打算在公房内(公务集会的地方，公厅)接见我们，届时其他二位委员也将来到那里。我回答说，同意这个建议，但是向他们指出，我愿意知道将军和其他委员将在何时向我回拜，我要坚决请求，这个回拜紧跟着在我的拜访第二天实行，不要在几天之后。

在这种场合，我所注意的是，获得回拜日期的通知后，我要把自己正式拜访订在前一天，这会完全符合双方代表的身分。派来的官员声明，他们要将我的答复转达给将军和大臣，并请求接受以他们官长的名义送来的各种食物。我嘱托他们谢谢将军和大臣的关切，第二天用红色礼轿向他们送去各种食物和糖果、糖渍水果、果脯等甜食品，以及酒类、砂糖和蜡烛。

所有这种馈赠品都由将军和大臣接受了。我们的关于会见中国委员的建议，明将军和其他各委员也同样欢迎接受了。

会议的日期订在8月15日，按照中国的历法是7月22日。到这

一天，我和领事及随从一起从我国的贸易站出发，由哥萨克马队二十五人照我们初次进城时所采取的办法列队护送。

来到城墙以后，我们通过外墙的大门进入城内，在上面有纯粹按中国样式建成的美观的高大城楼。我们在城内继续行进，在通向大臣住所道路两旁排列的塔城驻防军行列间走过。

为迎接我们所集合的兵士数目为四十人，主要是由满洲人组成的，从他们的服装上看，与其他的民众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人用长矛武装，除了通常的衣服之外，还穿有黄色短上衣（马褂），胸前有一“德”字（军人英勇精神）。其他的兵士备有各式各样的军刀和大曲尖刀。这种五光十色的军队的外表，以及不整齐的队形，显得完全缺乏威武精神，而同我国哥萨克兵士勇敢和健康的外貌、同我国兵士的漂亮服装，总而言之，同我国兵士动作的整齐和略带庄严的姿态，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要到达参赞大臣的房舍，必须通过以凯旋门彼此分开的两个院落。我们的马队在第一个大门前停了下来，我们乘马前进，在中国人看来，这算是特殊的荣誉。在我们后面行走的是：领事馆秘书瓦尔杜金、马队军官哥萨克大尉巴拉诺夫、军事地形测绘员团陆军少尉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四名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士挽着马勒缰绳牵引我们的马匹随行。

走过用颜料画的明朝时代对中国著有功勋的中国大臣蒋琪和蒋旿画像的第二个大门，我们走近了最后的第三个大门，公房（公务会议厅）是一个不大的独院，通过一个便门进入院内。这个便门已经不可能乘马而入，所以在这里车马总是停止下来。

在这里我们三个人：我、我的帮办安德烈耶夫大尉和领事都下了马，进入便门内，从这里在将军和参赞大臣全署官员行列之间走五、六步，我们来到公房的门口，乌里雅苏台明将军、参赞大臣和第三委员哈布齐贤都在这里外表恭敬和亲切地迎接了我们，并以表

示友好的握手欢迎了我们。此后将军就立即请我们入座，桌上摆满盛有中国小吃食品的许多盘碟，有从中国远方各省运来的干、鲜果品，也有以白面和大米制成的各种各样的点心。

我们的座位在桌子的一头，面对着坐在另一头的是将军和大臣，按照中国的惯例，这是同等的和同样地受到尊敬的荣誉。哈委员（哈布齐贤）坐在侧座，同我国领事所占的座位相等。领事馆秘书瓦尔杜金、哥萨克军少尉巴拉诺夫和陆军少尉斯特列利尼科夫，都站在我们身后。整个公房大厅站满了满洲军官、各种文官、翻译官等为数众多的扈从和一大群仆役人等。谈话是通过领事馆秘书和中国译员进行的，中国译员为了表示深刻尊敬将军和其他各委员的崇高地位，跪在那里传达我们的讲话。在敞开的公房中，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每一动作的各种职务的满洲人和他们的仆役多人集合之下进行这种公开的谈话，很象古典的往古时代，总而言之，按照其独特的情况来说，是使欧洲人感到极为惊异的。还没有等到向我们敬茶，我们首先认为必须向将军和参赞大臣问候，并对于他们的好客款待以及在我们进入塔城和贸易站时赠送食品表示谢意。我们补充说，我们很珍视他们的殷勤关切、他们的友好和亲切款待，这是完全符合于两大国间的友好关系的。满洲人代表对于这个问候词的答复说，按照他们国家的习惯，他们必须这样接待我们，把我们作为负有如此重要使命、从著名的与中国自古友好的邻国来到的人加以接待。我们的继续谈话，是表示互相礼让、建议为彼此相识而敬酒和请吃果品与鸡子。关于公务问题，中国委员谁都一字不提，看来他们是避免任何公务的谈话。

我们也完全没有涉及关于国界的谈论。在我们继续一个半小时的谈话终结时，我决定稍稍触及到公务问题，就向将军问道：他从北京方面有没有得到什么新闻？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国领事曾将中国信差来到塔城的消息通知了我。

将军回答说，他们这里来了信差，送到中国皇帝委任办理国界事务的上谕，这个上谕的内容将于明日通知我们。

确实，在 8 月18日，我们从参赞大臣衙门收到了所谓即公文的文件，其中满洲代表通知说，按照中国和俄国主管部的协定，双方代表于来年为勘查国界举行会议的地点，订为塔尔巴哈台，即塔城，会议的日期订为 6 月15日（1862年 6 月29日）。

我们与明将军和其他各委员的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在预定我们接待满洲各委员的那一天，曾经预先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符合中国款待客人的那种礼节和在公房对我们的相应的接待。为此目的，将我们现有的哥萨克兵士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站立在贸易站外面大门前；四个军士站立在悬有俄国贸易旗帜的第二个大门门楼前；其他哥萨克兵士都站在领事馆房舍的台阶上。准备接待中国委员的大厅，选定领事的房间，并以完全合于这种情形甚至稍带豪华的体面陈设装饰起来。此外另分一个房间招待随从将军、大臣和第三委员哈布齐贤（大家都简称为哈）的中国官员。

为了夸耀豪华和显示堂皇，将军不放过机会使自己前来我们这里的拜访作得尽量隆重。在预定的日子，早在约定时刻的前两个小时，当地的警官就在几个官员的随从之下来到我国的贸易站。到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到表明将军已经来到城堡的炮声，全部人马以仪仗列队形式向我国贸易站而来。

在前面，有表示他的（即将军的）权能的佩带黄色符号的六个官员乘马而行，紧跟着的是以弓箭武装起来的人数不多的乌里雅苏台守备队。

随后是用扎彩大轿（礼轿）抬着将军和参赞大臣，哈委员在他们的后面乘马而行。这班全部人马被大批满洲军官、塔尔巴哈台公署各部门官员组成的扈从和五光十色的仆役人群簇拥着。在来

到第二个门楼大门时，将军和大臣都下了大轿，改乘仆役所抬的小轿，前面由哥萨克军士四人引导，向领事馆房舍继续前进。

在中途，他们受到领事馆秘书瓦尔杜金和斯特列利尼科夫少尉的迎接，在门前下轿时是我和领事迎接。

我们作为他们已经相识的人，以友好地握手表示欢迎来宾，请他们进入大厅，厅内铺有红色呢子的桌上，摆着装有糖果、果酱、糖渍水果、果脯、布丁和其他食品的二十四个盘子。

在请饮茶水、咖啡和香槟酒并互相礼让之后，由于将军提出我们留住塔城的时间问题，谈话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公务性的。我们回答说，我们留住时间的长短，完全要看我们同他们约定来年会议地点的快慢，因为高级首长在这方面给我们作了指示。他们回答说，从北京方面没有这样的指示，关于此事很难与我们成立协定。他们补充说，在我们所奉到的皇帝上谕中关于此事一点也没有说到，应该从哪里开始划界，我们怎样能够讨论，再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们的全权证书？对于此点，我们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职位是钦差大臣，即全权代表，已被授予这种权能，可以自己审察和解决一些国界问题，无需每事等候北京的特别命令。同时，我们申明说，在现时我们还完全不是涉及划界问题的实质，而只是希望约定来年在何处开会，以便我们和他们可以因此预先作出必需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会议将只是涉及准备工作，关于办理此事，我们已经奉到我国高级长官西西伯利亚总督的命令委任，也奉到外交大臣根据我大俄罗斯国仁慈皇帝上谕的通知。我们继续说，相互的利益迫使我们利用与他们亲自会见的这个良好时机，来约定来年划界从何处开始，借以执行对我们所发给的训令，该项训令准备在译成鞑靼文后通知他们。尽管中国委员的回答全是支吾搪塞的，象是要在我们的这种公正要求中探求什么潜在的意义，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的理由，决定派遣哈委员来同我们协商，并补充

说，完全信任他，绝不背弃他所表示的意见。当经约定过一天即于8月18日开始商谈，我们很友好地同中国委员们告别了。

将军和大臣，看来是在很愉快的心情中离开我们这里，在告别时又说了许多客气话。我们自己也尽力在表示最亲切的礼貌方面不落后于他们。

在最初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同中国人谈判所必需的经验，我对中国各委员在接待我们时所采取的那种友好的态度和殷勤表示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难以作出任何肯定的结论。但是，我不能不注意到，在上述各次会见时一转到任何正式的谈话，将军尤其是大臣似乎总是间接参加了事务，看来是避免表示他们自己的意见，而请哈布齐贤来表示意见。哈布齐贤利用这种机会，持有极端骄傲和目空一切的态度。在同我们谈话中，他经常是采用肯定、片断和甚至也有些粗暴的言辞。他的生硬的面貌与年迈将军的平易近人的外貌，与年轻文弱的大臣的令人喜爱的面貌和文质彬彬的风度，正好是完全相反。后来我们得悉，哈委员是在伊宁出生和开始供职的，他曾任伊犁将军办公室的录事。由于办事才干和熟悉事务著称，逐渐提升了他的官职，1858年已经是协领（上校）的品级，被派到塔城，参加了我国驻伊宁总领事五等文官扎哈罗夫所进行的关于焚毁我国塔城贸易站案件的谈判。他用一切方法达到自己的升官，曾决定以金钱作帮助来求得荣誉。大家谈论，似乎为达此目的，他曾花费二千两银子（约合六千卢布），并取得一遇适当机会优先提升的许诺。《北京条约》签定以后，规定划分我国与中国西部的国界，就造成了这种机会，而哈布齐贤也就被任为第三委员派到塔城。在驻在塔城时期，哈布齐贤处处宣传他的大公无私和刚正不阿，也曾说，他能从事划界工作，并使中国得到很大好处来胜利完成任务。曾有一次，他在将军和参赞大臣面前表示，国界事务的进行，必须从塔城向西十二天路程的地方，即差不多是从谢米

巴拉丁斯克开始划分。

力图以类似的行为在人民中间获得影响，借此满足自己的功名心，哈布齐贤也不放过机会指摘大臣和将军本人，把他们的行为形容得不完全适当。我留住在塔城的初期，还不能判断哈布齐贤在人民中间享有何种程度的声望，但是大致可以推定，他在满洲人中间有较多的拥护者，而在中国人和鞑靼人方面，一般来说是很少受到尊敬的。在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的亲切协助下，我有机会也搜集到关于其他中国代表的，主要是关于他们的服务状况、行政才能和道德品质的很详细的材料。同时得悉，乌里雅苏台明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都是在北京开始任职的，其中前者是从很年轻的时代就开始任职，经过考试中了进士。后来接连在中国和蒙古各地供职，于1857年曾在库伦任职，被任命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过三年后，他获得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的新任命。刚到那里，明将军必须赶快回到塔城，因为他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即划分中国西部国界的代表。当时将军已经年届七旬，他具有温和的性格，对于自己的家属特别的依恋。他的主要弱点是嗜好饮酒。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每天几小时连续办公，他很熟悉公务，因为在中国各省长期供职的时候已经积累了经验。

将军对于划界问题，不仅从欧洲的观点，而且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大概都是不很熟悉的。据当时的传说，他在伊宁将获得伊犁将军的重要职位，也许获得北京部内大臣的要职，他在去年已经被赏授候补衔名了。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获得升官，更多有赖于一个偶然的情况，使他得以成为当今中国皇帝咸丰的皇弟恭亲王的家庭教师。他利用这种良好机会，没有经过预先考试就给自己谋得兰州府道台（省法官）的职位，从那里被任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即塔城省长。大臣年三十九岁，与其说他是属于办事官员一类，不如说是属

于交际界的满洲官员一类的。参赞大臣很谦恭、殷勤和在待人接物中特别具有使人感觉一些愉快的风度。

在事务方面他没有任何经验，因此感到苦恼，并尽力避免一切重要的事务。很可能，这种不通晓事务也就是他在兰州府充任审判官时把一个受审人错误地判处了死刑的原因。后来真正的犯罪人到案了，并自动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才发现了这种情况。按照中国法律，大臣因此应与无辜被处死刑的人受到同样的刑罚。在我留在塔城的时候，这一案件的结局还不明悉，大臣似欲利用恭亲王的庇护和送礼买通北京大理院来混过灾难。在来到塔城之后，于1859年3月，大臣曾与自己的前任，即派往乌里雅苏台的现任明将军发生过争吵。这种敌视状态在明将军被新任为代表来到塔城以后仍存在着。中国委员间的这种互相敌视关系，没有瞒住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互相憎恨，可能对于当前国界谈判的进行具有不良影响，因而曾经采取一切办法来使他们和解。他利用自己对将军的友谊，在很短的时期内调解了一切不和，并使敌对的人得到和解。因此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将军和大臣如果不是很好的朋友，那么至少是忘怀了他们从前的仇怨。对于哈布齐贤，他们二人都抱着相当高傲的态度，把他看为低级官职的人，并且同他处于不是完全友好的关系之中。他们有权对哈布齐贤表示愤懑，因为哈布齐贤抱着显示自己的功绩并达到升官和奖赏的沽名钓誉的目的，对他们曾有过侮辱性行为。

早在从伊宁来到塔城之初，哈布齐贤不同意接受大臣第二帮办的职位，已经引起将军的不满，他还曾使大臣激怒，把自己的拜谒推迟八天之久，按照中国惯例，他应该对大臣作为省长，在入城的当时就去拜谒。但是尽管对于哈布齐贤有所不满，将军也好，大臣也好，都重视他的办事才干和对事务的熟悉：在互相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谈到关于国界事务的一切问题的时候，将军

和大臣总是先看着哈布齐贤，好象希望预先知道他的想法。

哈布齐贤在自己方面，总是肯定地和很生硬地表示他的意见，而在困难的时候，就简单地用一句"没有话"（没有什么可说的）躲避过去。

中国委员们就是这样一些人物，我们面临着同他们进行谈判的，是关于从阿尔泰长白雪山到喀什噶尔或东土耳其斯坦广阔地域实行划界的这样繁难事务。考虑到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最顽强的不坦率和好观望行事的态度，我们当然不能用希望谈判迅速终结来迷惑自己。

8月21日，在决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这种推测被完全证实了。在这一天，哈布齐贤委员在塔城和乌里雅苏台的官员萨某和玉某随从下来到我们的贸易站。哈布齐贤受到我们种种表示敬重的接待，象我们从前接待将军和参赞大臣一样，被请入会议厅，中间设有摆上各种糖果的桌子。还没有开始商谈，哈布齐贤开始对于我们在会议桌旁安排座位的次序，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这似乎不合于他的身分。他的要求使我们吃惊：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哈布齐贤方面的意图，是在仗恃我们没有委任证书，要利用对我们的优越地位来进行谈判。这种情况，显然是预先想好了的，并为下述事实所表明，即随从哈布齐贤的官员曾经违反中国的惯例，与将军和大臣一样，乘马直到领事馆房舍的阶前，而这只有对哈布齐贤一个人才是许可的。但是希望快一点开始进行工作，我们甚至表明愿意在我们的公职地位所许可的程度上变更原来安排的座次。

哈布齐贤将军不满意这一点，坚持要自己坐在首席的高位，而把自己旁边的座位给两个九品的官员去坐。我们二人和领事都要坐在低级的座位。这样一来，这种座次不仅是我们要坐在低级座位的问题，而且也要使我们必须与两个官员进行商谈，他们参加会谈是没有预先作出任何约定和协议的。哈布齐贤将军显然是要借

此表明他自己和甚至两个随员萨某和玉某都居于某种高级地位。不容怀疑，假如我们接受了哈布齐贤的一点也不合于中国习惯的建议，那么作为政府的委任人员，因此就会失掉自己的身分，会很有害于谈判的进行，还会引起辱及俄国声名的街谈巷议。很明显，我们必须立刻制止哈布齐贤将军，否则他会利用我们的让步，以大多数中国官员所习惯的厚颜无耻态度，不可避免地在同我们谈判国界问题上会唱高调，而这显然是不能容许的。

因此哈布齐贤的一切坚决的主张都被我们驳斥了，尽管他宣布要从我们这里退席。后来，哈布齐贤和他的两个官员萨某和玉某向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作了为时不长但很激烈的说明以后，就离开了我国贸易站。我们同中国人发生的这种十分意外的冲突使我们相信，同哈布齐贤将军继续进行谈判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第二天我们就以特别文件（公文）向将军和参赞大臣交涉，叙明所发生的事故，建议他们与我们商订日期来商讨我们被委任办理的事项。过了八天之久，于8月29日，我们从将军那里收到了用喀什噶尔文写的答复文件。从这个文件的内容中，我们看出中国委员们听信哈布齐贤和他随从人等的陈述，对于我们说明这种情况的公正性无耻地表示怀疑。而他们对于我们约定会商日期的建议，则借口上述从北京奉到的上谕，最后宣布必须等到来年才能开始会商。这种完全符合中国政策的惯技——拖延任何事务的答复，一点也不能使我们满意。同时，我们被派前来的目的，是与中国各委员约定来年会议的地点和时间，这样也就不能达到了。为了无论如何力求得到中国人的较为肯定的答复，我们请求领事在第一次会见参赞大臣时，就答复内容的不明确和答复文件中所使用的词句的不体面，向他提出警告，并表示必须商定来年开始划界的地点。在向参赞大臣说明文件的时候，当他听到这个文件中使用了不体面的词句，很为吃惊，甚至感到难以为情，他向我国领事道歉，

并解释说，这种错误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塔尔巴哈台公署的通译员都是一些喀什噶尔人，他们对于中国文和鞑靼文都不够通晓，而在官员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审查他们的鞑靼文翻译。参赞大臣作了这样解释之后，建议领事通知他们，以便我们接受同一文件的满文译文，他完全保证满文译文的内容。在领事开始表示我们希望同中国各委员举行协商会议的时候，他坚决拒绝听取领事的话，推托说必须有将军在座才能传达这种说明。当时领事就请求参赞大臣同将军商谈此事，并无论如何派遣官员通知我们。

在9月2日，我们真的得到了将军和参赞大臣的答复，他们通知我们，哈布齐贤和那两个官员将来同我们会谈。命令被派来的人员同我们约定会见的礼节。这些条件是，会议要举行两次，一次在领事房舍举行，另一次在哈布齐贤房舍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哈布齐贤坐在比我们高的座位，两个官员坐在低级座位，第二次会议时，我们坐在比哈布齐贤高的座位，而官员们也坐在低级座位。我们表示完全同意这种约定条件。但是原订在9月5日举行的会见，因哈布齐贤突然患病未能举行。

9月11日和12日，到我们这里来的不是将军所允诺派来的官员，我们从将军那里收到了三件满文的文件，其中一件是答复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将军致中国各委员的前次文件，第二件是大臣所允诺的关于我们同哈布齐贤冲突问题的满文答复文件，其中已经没有喀什噶尔人译文中所存在的一切不体面词句；最后，第三件是叙述中国皇帝关于两国代表在塔尔巴哈台，即塔城举行双方会议的上谕文字。

9月13日，夜晚，有中国官员二人来到我国贸易站，并以将军和参赞大臣名义通过领事宣布，他们建议于9月15日下午二时同我们举行会议。但是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中国人邀请我们不是在公房里，而是在将军住宅里会谈，他们请求原谅说，会见可能不超

过半小时，并且对我们的招待要比平常简单一些。这种稀奇古怪的条件使我们有些惊异，第二天我国领事从参赞大臣公署秘密取得关于中国咸丰皇帝逝世的上谕抄件时，才弄清楚了。

这时我们开始了解到，将军和参赞大臣已服重丧，只是出于友好关系才同意接待我们，按照中国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不敢在公房为我们外国人举行正式接待。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这个建议是很有理由的，立刻派人答复他们说，我们同意于15日依照他们所提出的条件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见时，经过首先的寒暄以后，我们请求我国领事将选定来年会议地点和约定会议时间的问题传达给中国各委员。最初我们坚持在沙宾达巴哈界牌处举行会议，主要是因为要在根据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国界已经明确规定的那个地点开始划界，而且应当从这里沿着小阿尔泰山中的分水线前进，在这里比起塔城附近的平坦和开旷地方来，关于国界线进行的方向大概不会发生什么争执和纠纷。关于会议的地点，中国委员向我们声明说，他们关于此事现有从北京发下的严格训令。根据这些训令，会议不应订在什么别的地方，而应订在塔尔巴哈台城内（中国名称是塔城），时间是在来年6月15日，按照我国历法是1862年6月29日。中国人补充说，这是按照北京政府与我国外交部的互相协议办理的。中国委员们说，在这以后我们能否允诺在沙宾达巴哈举行会议？除此以外，他们继续说，我们必须在塔尔巴哈台举行会议，也是因为要遵守我们所提出的训令，同意按照地图所应采取的国界方向，只有在这种协议之后才能在实际上实行，即在各该地点实行定界。我们对这一点指出说，根据《北京条约》按照地图约定国界方向现在也可以实行，不必拖延到来年，到那时就可以直接开始设置界牌。但是中国委员们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即划界的事务必须缓到来年——1862年，借口说，他们没有得到北京相应的训令，而这种训令可以对《北京条约》所述各项规定作出详细解释，没

有这种训令，中国委员们肯定说，我们无论何时不能作出所希望的协议，而且我们将在自己政府面前担负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塔城。在我们所处在的那种不利条件下，至少在我们看来，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我们没有国际交涉进行谈判所规定的全权证书，但是已经能够达到同中国各委员商谈国界事宜。同时我们在草拟《北京条约》所订国界线方向的细节方面，以及在就地确定国界方面，都曾尽力利用一切方便的机会，就地了解当前事项的许多详情细节。我所搜集的材料对于补充我所作的关于中国边界的记录是一项宝贵的资料，我打算在从塔城返回鄂木斯克以后完成对它的最后整理。

如上所述，在将军住宅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们向他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宣布，我们预定明天离开塔城，感谢他们的友好款待，并且希望来年会见时将仍然是这样友好的朋友。中国委员们对于我们这样快的离去似乎感到惊异，并说有些公务使他们不能亲自给我们送行，对此表示抱歉，但请求不要拒绝他们的官员们的送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作为城市的主人，请求我们接受路上所必需的食品。我们感谢他们对于我们的关怀，接受了他们的亲切请求，为了对于他们的盛情关切不致疏忽怠慢，认为必须按照中国习惯向中国人赠送礼品，这种礼品在我们离去以前已经交给我国领事，以便送交中国各委员。

第 四 章

我在塔城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那里短期居留的成果。根据住在塔城时期的个人观察和我在斯卡奇科夫图书室所找到的著作以及他的指示和讲解，我对中国的初步了解。 阅读这些著作对我产生的印象。 当时在学术界和群众中对中国看法的主要分歧。 关于十七世纪我国向中国派遣的大使。 柯罗文大使的详细分析和迫使他将从来不属于中国的达呼尔与阿尔巴津城① 让给中国人的情况。

斯卡奇科夫在塔城的图书，成为我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我所担负的外交任务，毫无疑义不仅要求很好了解托木斯克省和与中国西部国境接壤的吉尔吉斯草原各州谢米巴拉丁斯克与谢米列钦斯克的全部边区地方，而且要尽可能地全面了解俄国与中国的外交交涉的进行情况。在一开始着手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在最初时期就完全确信，我对中国和中亚细亚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应当承认，在我的时代即五十年代，不仅在中等学校而且在各高等院校，对于认真研究我国亚洲边区，以及接壤各国如中国和中亚细亚希瓦、布哈拉和浩罕等汗国，都很少注意。只是我在陆军大学的最后一年，即1853年，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研究的必要，并按照当时我国军事统计学教授米留亭（后为伯爵和陆军大臣）的倡议，责成参谋本部上校格杰奥诺夫开课，讲授奥伦堡边区和为在锡尔河与咸海建立据点已经预定的从奥伦堡防线方面进行草原考察的

① 即雅克萨城。——译者

情况。按照这些讲稿编成了奥伦堡边区的记录，在记录中首先叙明边区的地理状况、行政区划、地形概要和地形条件对居民的组成和生活的影响。随后叙述奥伦堡军事边防线和奥伦堡主管或小汗国所属的吉尔吉斯人。以下简明叙述，为制止吉尔吉斯人的妄动，以及由于受辱亡命的苏丹如肯尼萨尔·卡西莫夫(1838—1841年①)的煽动或从邻近的中亚细亚汗国暗中派来的叛乱者的煽动，而发生大量群众的敌对行为，派遣部队前往草原的一般规则。同时指明根据从前草地远征经验所制成的关于部队组成与实力、部队供应、部队在草原集合地点、出动、行军、配置和动作时间的规则。

最后，还简明和扼要地探讨了相邻的中亚细亚各汗国对于俄国的军事意义。同时，肯定地指出了，在开展反对希瓦、浩罕或布哈拉的军事行动时，主要的问题不是在于集合多数的军队，而是在于要使不拘多少的军队到达那里。已经到达敌人境内的部队，就可能指望获得完全胜利。

当时，我们关于亚洲与俄国接壤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的知识，是不够充分的，并且一般说是不够全面的，尤其是关于中国。甚至在世界史的著作中，一般来说也很少占有地位。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现时也前进得不多。据谢·米·格奥尔基耶夫斯基说，在1882年出版的《简明学术百科辞典》里，关于中国历史只有四行字的叙述。在第十二版伊洛瓦伊斯基的《世界通史教程》中，中国历史竟付缺如。在塞诺勃所著《文明史》中，也毫未说到中国。

这样看来，如果说在现时，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些问题还是没有弄清楚，或者是很少涉及，一些作者把中国描写为半野蛮的国家、生活停滞和僵化在自己的方式中；而另一些作者则表示完全相反的看法，肯定说中国是高等文明的国家，那么就不能不承认

① 应为1847年。——译者

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对于中国的概念还存在过较大的混乱。另一方面，我国当时的新闻出版界，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国家生活和日常生活状况，看来也没有避免摇摆不定的看法。例如，奥·伊·森科夫斯基在《读者文库》上对雅金甫① 的一篇标题为《中国、中国人民、习俗及其他》的出色论著发表详细评论的文章，他对于著者在中国学研究上的多方面知识给了完全公正的评价，同时却使自己的学术评论文章采取了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其外表下每一步都透露出精细的而有的地方并且是刻薄的讽刺。我要从这篇评论文章中引叙一小段，尤其是森科夫斯基当时不仅是俄国而且也是欧洲最早的东方学家和东方通之一。

在上述雅金甫的论著问世之后，森科夫斯基以他的内容丰富的论文作了评论，在论文中顺便说道："在三千五百年间顶住了一切风暴、曾使一切相邻的各好战民族服从自己政权的一个国家，除了滑稽的传单以外，却找不到其他的武器抵抗三营的英国军队，眼看着当时一千三百九十三名的欧洲兵士，以突击的方式攻占了有很高城墙围护的、配备着很厉害的大炮的、由驻防军五万人防守的、居民人数和财富等于巴黎的巨大城市(广州)；眼看着当时一只火轮船烧毁这个三亿六千二百万人的民族所有的军舰；眼看着当时一个大尉强迫八十万居民的城市付给他三千二百万卢布的赔款；一个上校穿着红色军装俘虏住五万兵士，而这个被俘虏的军队拿着卷起的旗帜列队行走，却是手中持有武器在他们的战胜者八百四十人中间走过，简直是把帽子投出去也可以把这些胜利者压倒的；在这些闻所未闻的、难于置信的和不可能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候——现时或者不管什么时候都应当问一问最受尊敬的神父雅金甫，他所敬爱的这些中国人是些什么人呀。"

---

① 系俄国东正教僧侣"夏真特·俾丘林"的华名。——译者

森科夫斯基随后把这些显然是从外国报纸上借用来的材料同上述的雅金甫关于中国的著作加以对照说："这个著名的帝国是某种纸糊的、彩画的和油漆的国家，用一根蜡烛就可以把它烧掉的。否则就不能说明广州所发生的情事。想在我们中国学家的著作中找到对这种不可理解的事实的说明是徒劳无益的：你越多读它，它就越使你相信，中国——是地球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是最智慧的、聪明的、模范的、治理有方的、有远见的、有作为的、不可战胜的国家。如果按照这些判断，那么中国人是人类一切美德的理想。"森科夫斯基继续挖苦说道："我甚至也看不到，他是胆小人或收受贿赂的人：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过得很好，一切都是这样一丝不苟地遵循既定的秩序，法律是得到这样好的贯彻执行，他们的执政人是这样尽心竭力，他们的官员是这样的完美无瑕，道德是这样的纯洁，甚至哲学也是这样的高深，使人阅读雅金甫神父的著作时，不能不对中国感到惊奇和羡慕。"

森科夫斯基又继续说："雅金甫神父要使我们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欧洲，而我们按照他的著作在这极美好的中国所看到的却多于真正的亚洲——看到了一个被夸大了的、最亚细亚式的亚洲，这种亚洲只有用欧洲人那种想象力才能想象到。"

据森科夫斯基说："这就证明，这本书无论就叙述的方法来说，或者就其中的内容事实来说，都会使人感到非常奇异，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与著者基本思想正好相反的结论。"

在了解中国方面，当时在群众中还存在着和产生着对于研究中国的完全漠不关心态度，不利条件就是这样。这些不利条件由于下述的重要情况而更加严重，即甚至在象什洛谢尔和维别尔这样一些第一流的欧洲学者的历史著作中，据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指出，中国也被认为是完全没有变动和停滞不前的王国，是一种历史上的化石。据什洛谢尔说："中国在实质上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

是一个广大的警察机关。帝国是依靠儿童时代背诵的道德格言、官阶的诱饵和杖责的刑罚来支持和进行治理的。”

“在中国一切都是按照祖先遗留下来的法律和制度为根据而一次制定的秩序，并由警察予以强力支持来办事的。”同时应当指出，什洛谢尔对于中国国家和民族生活这种没有变动和停滞不前的原因问题，却同样没有加以研究。然而如果对于问题作更加深入的探讨，并详细了解关于中国人的更加确切的、最近的调查研究材料，那么就一定会得出另一种结论。首先是，在这个停滞的王国许多工业部门，例如颜料、布匹染色、磁器、丝织品、漆器，据恩·亚·丹尼列夫斯基说，都是处于欧洲工厂制造业望尘莫及的完善程度。中国的农业，毫无疑义，在地球上占有第一位。据著名学者利比赫证明，这是唯一合理化的农业。关于果园业也是可以这样说的。他们的风景画式的花园，据旅行家们的记述，是丰富多彩和登峰造极的。据贡鲍利特说，当彗星使古希腊人产生迷信恐怖的时候，中国人的天文家就已经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了。

据克拉斯诺夫教授证明说，中国人借助于特制的原始的日晷器具，早在基督降生前一千一百年就已经测定了太阳的高度。总而言之，可以说中国人的民政、工业以及一部分学术发展的高度，在许多方面把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明抛在自己的后面。学问和知识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受到象在中国那样崇高的尊重。

有些观察中国生活和习惯的作家推崇更甚。例如，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他的著名著作《中国生活原则》中，顺便叙述说，在这个国家里有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这使得每一国民都能公开地评论政府的措施和办法，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接受某一种宗教。协会和组合在中国已经达到了完全多种多样的程度，这在欧洲还是想都想不到的。银行业务发展到了这样程度，以致政府放弃了它的发行纸币和贵金属货币的专利权。最后，这个国家的形

式上的专制君主政权，它显示出来所受到的限制，比起西方立宪国家来还要多些。格奥尔基耶夫斯基说道："有鉴于这一切情况，我们应不应当相信，中国是最自由的和最先进的国家。"

按照《新时代》记者季姆的说法，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是中国的《京报》(《京城通报》)，计已存在一千多年。"在中国文学享有完全的出版自由，没有出版检查，任何人都可以出版他所要出版的东西，并发表最革命的意见，只要这是符合于公认的要求。否则，他的书籍就没有读者——这是对著者最公正的惩罚。"然后，顺便来考察一下最近时期我国其他旅行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意见，那就不能不谈谈埃·埃·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完全合理的意见。"关于任何一个国家"，他说，"未必会发生比关于中国更有两重性的意见。它的整个民族气质对于欧洲来说，是极有兴味的，特别是注意到在天国广大的土地上居住着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类，他们带有最原始状态的烙印，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和道德家都不应当漠视这样无数居民的命运，这些居民早已为自己造成许多文化生活的条件，这些居民在自己的性格上更形成着最使人惊奇的矛盾：有着出色的优点，同时具有最使人厌恶的缺点。德国的哲学家们从黑格尔开始，一般来说，都轻视天国，认为它是静止不变的原始状态。按照他们的意见，以中国为代表，蒙古的露珠达到了它发展的尽可能的高度，由于它自己的天性，再前进一步似乎已不可能，成为留在历史这一青枝绿叶树木上的枯枝。正象差不多把一切外国的东西长期看成野蛮的那些希腊人一样，广大的中国人都以十分轻蔑的态度对待西方，而把自己的生活制度，把自己许多世纪的文明成果，认为是全世界的模范。

"格尔杰尔把天国看成是以文字装饰的、裹上绸缎的、施上防腐剂的木乃伊。另一些思想家在这个广大的国家里看到的只是睡眠和麻痹状态，把它比作泥潭，预言中国不久就会解体和灭亡。

“急忙作出结论说，似乎孔夫子的祖国是由痴呆的野蛮民族居住的（据托克维利的断定），那是完全不公正的；自满地确信我们各方面无疑地都比它优越，也同样是不公正的。中国人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得很正常，遵循着使他们国家组织充满崇高精神的坚强的从古遗留下来的原则：看不到有任何衰败和老朽的征兆。”

看来，上述欧洲的历史学作家，既不懂得中国语文，并且根本没有掌握中国学方面的专门材料，求解此中的秘奥，所以也就不能深入到这么多世纪地域广阔的中国历史生活现象范围内，而从欧洲的观点对这些现象作出了估计。同时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全部世界观、一切思想、概念、需要，总而言之，整个精神气质，彼此是这样的截然不同，因此不可能加以等量齐观。

在对中国人的这种看法下，欧洲的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甚至往往矛盾百出，概念混乱，完全把读者弄糊涂了。

据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意见，关于中国问题的这种判断上的和意见上的分歧，可能正是因为中国学作为一门已经建立的学科，还不存在，现时甚至在中国学家的本身中间，对于中国生活的某些现象，例如孔子学说的本质，不仅可能遇到不同的意见，而且也会遇到截然相反的观点。

尽管我住在塔城的时候，可以说同中国人是面对面相处的，我本来可以在实践中对这个民族及其生活稍加了解，但是由于我必须把全部时间用于执行职务，而很少闲暇，我又不懂语文、不知新情况和它的特性，这种了解顶多也只能是很肤浅的。为了充分和全面研究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生活的中国，即研究与它密切相联的社会情况和一切现象，也即研究它的生活、风习和内部状况等等，就必须花费多年的时间。显然，我是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划

定同中国西部接壤的国界的我国政府代表，在这种处境下我最关心的，是俄国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的记述，主要是外交关系的记述，这种记述对在审查和讨论当前划界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可能成为我的指路线索。我已经充分认识到，历史是很好的教师。

从这个根据出发，并想起按照思想继承性的规律，现在的东西不可能同它与之保持着经常联系的过去的东西完全分开，并且由于这种联系，现今的政治界的现象和一般政治性的事件，只能用使它们获得思想准备，并导致它们实现的以前的进化来加以说明。因此，既往时期历史的指示，不容怀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迫使我特别尽心竭力就现有的私人和公家材料来着手研究我国大使与中国的交涉。对我来说，这种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可资借镜的。它使我得到机会，不仅了解中国政策的独特方式，而且在每次产生新问题时，我可以想起或者找到相应的历史事例。所以我在大多数的场合，没有发生措手不及的情形，没有遇到误解，没有陷入死胡同里，而是在我迄今十分不了解的事务中，能够立刻确定方向和勇敢地、有信心地、毫不动摇地行动起来。

在成为我的真正财宝的斯卡奇科夫的图书室里，我找到很多叙述我国和外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和各该使团代表与中国人所进行的谈判的俄文和法文著作。例如，读了叶·弗·季姆科夫斯基(1820和1821年)和叶·彼·科瓦列夫斯基(1853年)的通过蒙古前往中国的旅行记，我可以了解到我国派往中国的大使，虽然不是完全详细的，但是得悉一般情况的：巴伊科夫1653年，斯帕法利1675年，柯罗文1689年，伊兹麦洛夫1720年，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伯爵1727年，克罗波托夫(1762—1768年)和戈洛夫金伯爵1806年。最近派遣的大使：普提雅廷伯爵和伊格纳提耶夫将军，我从官方消息和当时俄国与外国的刊物中都已很清楚地知道了。

从斯卡奇科夫现有的关于中国的法文著作中，我也了解到外国派驻中国的大使和他们的成果，即1793和1794年的英国大使马卡尔季斯勋爵、1795年的荷兰大使勃拉昂和英国第二任大使埃姆格尔斯特勋爵。在阅读对这些大使的记述的时候，最使我惊异的是，他们在实质上全都没有能够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中国人以最傲慢的、粗暴的和笨拙的顽强性，千方百计坚持中国的闭关主义，并在一切方便的时候，表示显然不愿与欧洲人往来。例如在八十七年内（从1755到1842年），广州城是允许欧洲船舶可以进入的唯一港口。只是在中英战争（1840—1842年）之后，才为欧洲通商开放了四个新的港口：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我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是同样情形，只能在恰克图进行，虽然按照《恰克图条约》所确认的《尼布楚条约》，我国是有权向北京派遣商队的。除了上述关于中国的著作以外，我在斯卡奇科夫的图书室里还发现了著名中国学家雅金甫的著作，列昂季耶夫1779年关于中国与准噶尔人从前战争的报道，利波夫采夫1821年关于准噶尔的记述，各修士大司祭等如索弗罗尼和巴拉第的著作，刊载在北京俄国教会会员著作集中的高尔斯基和扎哈罗夫关于中国的有趣味的论文，瓦·巴·瓦西里耶夫院士和教授的各种论文，杜·哈尔德关于中华帝国的叙述，德·霍逊所著蒙古史，克拉普罗斯的亚洲关系回忆录，胡克所著中华帝国等等。阅读这些著作（我在某些场合曾经作过摘录）使我有机会能初步地、当然是肤浅地，也可以说是抽象地了解到中国人的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特点，了解到中国政治史上最突出的事件，主要是与俄国有关的事件，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即从1644年中国的本族朝代明朝覆灭和新的满洲朝代清朝或大清皇帝顺治（在中国的君主不是按自己的本名来称呼，而是按照统治的年号来称呼）于1644年到1661年在位时期开始，直到他的继任各皇帝：康熙（1662—1723年）、雍正（1723—1736年）、乾隆（1736—1799

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咸丰(1850—1861年)、同治(1861—1875年)①。

在我所读过的关于中国的一切著作中，使我感到印象最深的是早夭的中国学青年学者高尔斯基的《满洲皇帝开始和初期情况》和《现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始祖和满洲民族名称的起源》、扎哈罗夫所著《中国居民人口的历史评论》、修士大司祭巴拉第所著：《佛的传记》、《古代佛教史概要》。后来，在我来到鄂木斯克之后，我赶快了解有关大使与中国交往关系的学者著作，即科学院出版的名为《每月论文》的学术文学杂志所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和西伯利亚历史学家密勒的著作，即：

(一)关于最初的俄国旅行和向中国派遣大使，1755年6月。

(二)1689年俄国和中国划定国界时所有疑义的说明。

(三)在俄国统属时期阿穆尔河沿岸各地方的历史。

阅读这些著作和其他关于俄国与中国国际关系的论著，以及鄂木斯克档案库的旧档案，使我有机会全面了解在由乌拉尔到太平洋广大地域上，我国这样迅速占有西伯利亚的丰功伟绩中的许多历史细节。比我青年时代从当时俄文世界史论著中所获得知识，有些历史事件在我眼里有了完全另一种说明。例如了解到我国大使柯罗文与中国人在涅尔琴斯克谈判进行情况，我不能不注意到这个重要事件值得细加分析的一些突出情况，并来略加论述。

按照1689年《尼布楚条约》，大家知道，我国曾将所谓达呼尔即阿穆尔地方让给中国人。根据我当时所有的资料，如密勒、费舍尔、斯洛弗佐夫和谢·米·索洛维约夫等的著作，在熟悉了这个事件的文献以后，我必须作出结论说，关于我们失去达呼尔的问题存

---

① 各朝起迄年代应为：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乾隆(1736—1795年)、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咸丰(1851—1861年)、同治(1862—1874年)。——译者

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些研究家认为，在我国大使柯罗文当时所处的情况下，他与中国人进行谈判时已尽到了他的一切力量行事，不能有别的办法。按照密勒和班蒂什·卡缅斯基所引用的档案文件，以及根据后来我有机会了解到的格里果利耶夫和马尔丁斯两教授的东方史著作所持的意见，柯罗文对于中国人表现了过度的和平愿望和不必要的让步，致使中国人获得了对我国的外交胜利。

如果为了阐明这种情况，而尽可能细致地加以观察，并将《尼布楚条约》缔结前双方的行动彼此对照，那么中国人的经过巧妙考虑和出色地执行了的行动计划，不能不使他们取得优胜。

中国人的目的是无论如何要把俄国人从阿穆尔河排挤出去，因为该处的外族人被我国哥萨克人和工业人等征了实物税，而使中国人失去了一宗大批的收入，更不用说我国人员在阿穆尔地方所进行的掠夺和抢劫了，但是他们不是一下子就采取坚决行动的。在阿穆尔河出现俄国人的时候，中国人最初由于国内当时发生了国家政变，没有能力阻止我国进一步占有达呼尔。满洲人在1644年占领了中国，并使自己的君主朝代登上了中国的帝位以后，当时最关心的事情，是要使广大帝国的一切地方服从自己的统治和把被征服的民族控制在自己的政权之下。看来满洲人了解得很清楚，这件事实际上比起征服敌国来有时要困难得多。但是，除了必须在国家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建立秩序以外，满洲政府对当时对外政策事宜方面也是很关怀的。必须阻止准噶尔统治者噶尔丹（按照我国史记为布图赫图汗）日益增长的威力，因为他力图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同准噶尔人毗邻的蒙古部族，阻止他们与满洲人结成同盟。

因此，满洲（清朝）朝代一个最著名的皇帝康熙曾与噶尔丹进行了长期的流血战争。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满洲政府在大清朝

第一个皇帝顺治在位时期（1644—1662年），对于北方强大邻国的加强并没有表现任何的抵抗。甚至在顺治皇帝承继人康熙皇帝在位的初年，据1675年曾驻中国的我国公使斯帕法利根据留在北京的我国背叛分子的供述，曾证明说，中国皇帝当时曾经大为不安：他对我国哥萨克人是很恐惧的，此外，还因中国南方各省的叛乱而极为焦虑。只是在镇压了吴三桂所领导的这种叛乱以后，康熙皇帝才最后决定采取坚决行动从阿穆尔河把我们驱逐出去。为达此目的，根据中国政府的命令，于1685年向阿穆尔河出动了大量的军队。在受到长期围困之后，我国在阿穆尔河所建筑的只有力量微弱的卫戍军保卫的堡垒城市阿尔巴津，只得向中国人投降。在中国人破坏了阿尔巴津城而退往瑷珲的时候，我国哥萨克人又占领了阿尔巴津城。在第二年，1686年，中国人又包围了阿尔巴津城，于1687年撤除包围，中国人从阿尔巴津城撤退。这种突然的撤退，是因奉到康熙皇帝的上谕而实行的，当时曾经获得消息说，以御前侍臣柯罗文为首的我国大使团不久即将来到国界，因此中国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达到这个目的，即将阿尔巴津城交给他们。为了迫使我国在当前的谈判中作更多的让步，并已预先得到确实消息（下文将详细叙述），我国大使没有同中国当时的强敌准噶尔统治者噶尔丹达成协议，因为这是中国人非常害怕的事情，他们就向我国国界按三个方向派遣了军队：沿阿穆尔河一路有船舶七十六艘；陆路向额尔古纳河前进；一路作为护送大使从北京出发通过蒙古前往克鲁伦河，再向涅尔琴斯克城前进。

按照耶稣会教士徐日升和张诚[1]的意见，中国人在涅尔琴斯克地方总共集合了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备有强大的炮兵队，而为了迅速组成骑兵队，中国人预先设法赶来了八百匹马。

---

① 徐日升和张诚为别列依拉和热尔比利昂的华名。——译者

在中国军队利用他们对我国的优势，从各方面包围了涅尔琴斯克，使它处于封锁中时，按照我国史记的语言加以表达，显然是要“在涅尔琴斯克作出军事作业”，按照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和煽惑诱引，一大群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包围了色楞格斯克并威胁乌金斯克。同时中国人千方百计企图使归向我国的西伯利亚各外族人，如布里亚特人、鄂伦春人、通古斯人和蒙古人实行叛变。由于这种教唆，在俄国领域内占有沿边地点作为自己居住地的我国属下的蒙古人，开始转向中国人，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诱使涅尔琴斯克区域的通古斯人和其他缴纳皮毛实物税的外族人走同样的道路。这一切都使中国人更加自信对俄国人所占的优势，而在当前谈判的进行中对于我国发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中国人在这次谈判时的蛮横无礼已经达到这样程度，他们开始肯定说，似乎阿穆尔从亚历山大·马其顿时代起就已经是属于他们的。

然而，柯罗文可以支配的，只有在莫斯科、托波尔斯克和其他西伯利亚城市调集来的弓箭手、龙骑兵和哥萨克兵三千人。我国兵力的寡弱、可能得到增援的地方距离辽远，这一切都使柯罗文的处境极为困难。在柯罗文察觉到中国使臣完全倾向于战争，并确信他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他决定把阿穆尔全部地方让给中国人并拆毁阿尔巴津城，以便用这种让步来开辟迅速订立和约的道路。

研究我国在涅尔琴斯克进行谈判以前的行动，应当承认是没有预见性的，也没有能够正确估计和利用西伯利亚沿边地区和相邻的蒙古地方对我国的有利情况。首先不可了解的，是柯罗文从莫斯科前往中国国界和与中国人进行当前谈判的准备工作，竟需要长达三年的原因。柯罗文于1686年1月26日从莫斯科出发，取道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维尔霍图雷、图林斯克和秋明前往托波尔斯克，于3月24日到达该处，5月29日从该处出发，取道苏尔

古特、那雷姆、克茨基和马科夫斯基村镇前往叶尼塞斯克。他于9月28日来到雷宾斯克村镇，在这里过了冬。第二年，1687年，5月15日启程前往布拉茨克村镇、伊尔库次克和乌金斯克，然后前往色楞格斯克，于10月25日来到该处。

此后，又经过一年半，而对于事务并没有任何特别显著的利益，只是在1689年下半年，于柯罗文从莫斯科出发后的第四年，才在涅尔琴斯克举行了双方代表会议。

柯罗文的这种不可理解的迟慢行动，甚至中国人也看得出来，他们本是善于拖延每一事务的专家，但也不能自制地在他们的一个文件(公文)中，对于柯罗文没有任何事务而长期留在色楞格斯克讽刺地表示惊异。其实，这个时间显然可以用来预先告知在阿尔巴津的中国人，正是要选定这个城市，而不是选定涅尔琴斯克作为我国与中国代表谈判划界的会议地点。在给柯罗文的训令中也曾指示说：尽力争取，要使阿穆尔河上的阿尔巴津城成为国界，迅速进行取得顺利成功。后来在1687年11月29日所颁发的最高命令中，又重申说：该大使等要迅速前往阿尔巴津，不得在任何地方、为任何事务、在任何短暂时间内有所停留。

最后，在沙皇伊凡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致中国皇帝的国书里也曾坚决说明，柯罗文大使和随员人等是被派往阿尔巴津开会的。可见，在莫斯科很清楚地了解到这个属于俄国并由俄国军队占领的、曾为当时整个阿穆尔地区锁钥的、作为阿穆尔边区据点的阿尔巴津城的重要战略意义。阿尔巴津当时已经有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于1684年赏给该城的徽章，上面绘有一只雄鹰，两翅展开，右爪抓住一弓，左爪抓住一箭。这一切都明白指出，会议的最适当的地点正是阿尔巴津城，也正是在这里应当分出国界并从这里开始划界，即设置界牌。另一位我国大使拉古津斯基伯爵，象下文将详细叙述的，就是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在距离恰克图

十俄里的布连河布置了自己的营垒以后，拉古津斯基向中国人坚定声明，国界就是应该在这个地方通过和开始设置界牌，我国委员和中国委员也就照办了。

真奇怪，柯罗文自己，据密勒说，也认识到阿尔巴津城在与中国人当前谈判中的重要意义，并且希望在显然是俄国边界地方的阿尔巴津城举行会议，但是何故迟迟不前，没有预先由我国军队占领阿尔巴津城并借此警告中国人。看来，他早在1687年秋季或1688年春季就有充分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回想起，中国人曾于1687年8月30日完全撤出了阿尔巴津城，而柯罗文却在同年8月1日到了伊尔库次克，从1686年9月29日到1687年5月15日，在通古斯河的雷宾斯克村镇度过了整个秋季、冬季和春季，那么柯罗文如果从伊尔库次克毫无停留地前往阿尔巴津城，就能够在1687年秋季来到那里。再说，只有带同军队来到阿尔巴津城之后，柯罗文才应向北京通知他已来到国界，并坚定不移地选定阿尔巴津城为两国代表的会议地点。但柯罗文从乌金斯克出发前往涅尔琴斯克，在路上得到消息说，中国人已经从阿尔巴津城撤退，就决定返回乌金斯克，从那里前往色楞格斯克。然后，从色楞格斯克只是在1687年11月19日，柯罗文才派遣大使馆人员贵族科洛文前往北京，声明他已经来到，并通知说选定会议地点听凭中国人自愿，这显然是直接违反了上述莫斯科的严格命令：在阿尔巴津城。中国人立刻明白了，这是在跟谁打交道，巧妙地利用我们的错误，选定涅尔琴斯克作为会议地点，对于他们是不可能更适宜的地方了。

到下一年1689年，中国人向阿穆尔出动了大量的军队，要占领阿尔巴津城就成为不可能了。时机已经失去，尽管柯罗文在知道中国人乘船沿阿穆尔河溯流而上以后，曾向阿尔巴津城卫戍司令官拜顿发出命令去阻止他们前进，但是拜顿的一切坚决要求都没有成功。中国人利用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对于我国的抗议毫不

理睬，并以无所畏惧的蛮横和自信，水路乘七十六艘船舶沿阿穆尔河继续前进，陆路通过额尔古纳村镇直接前往涅尔琴斯克。

中国人以这种行动为当前的涅尔琴斯克谈判的胜利作了准备，迫使我国大使在对我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开始谈判。

除了已经引叙的意见外，还不可理解的是，柯罗文究竟为什么看到中国人在涅尔琴斯克显然敌对我国的行为而毫不打算与噶尔丹订立协定，何况按照档案文件来判断，中国人是非常畏惧这种协定的。看来，我国大使和西伯利亚地方边区官长，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当时在蒙古沿边地区和准噶尔发生的事件对于俄国的重要意义，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从这种事件中我国当时可能得到的利益。必须记起，在当时即柯罗文在涅尔琴斯克时，准噶尔的强大统治者噶尔丹在击溃西蒙古以后，已经来到流入色楞格河支流鄂尔浑河的图拉河。由于中国人的阴谋已经脱离我国的边区蒙古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赶快清除了我国的国界。由此可见，噶尔丹在西蒙古的行动对边区的外族人曾出现了有利于我国的影响。我国也正应当利用这种情况，不失时机，赶快促使噶尔丹在我方支持下，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来反对中国属下的蒙古人和甚至反对中国人，使他们的军队撤离涅尔琴斯克。在政策上，正直不可能是必须遵守的，尤其在对抗中国人的行动中，他们的每一步骤都证明这个规则的正确性。他们在涅尔琴斯克的一切行为，乃是集虚伪、欺骗、狡猾、极尽奸诈伪善和对我无礼侮辱的大成。例如，对于柯罗文提出不要勾引我国纳皮毛实物税的外族人归向中国的要求，中国人含笑答复说，他们没有勾引他们，让柯罗文自己去同他们办理一下；命令自己的军人去制服他们。中国人挖苦地嘲笑，他们知道柯罗文的军队很少，而叛变者的人数要大得多。

最后，康熙皇帝本人可以作为对我们有教训意义的例证：他同噶尔丹的一切交涉，据列昂季耶夫和雅金甫说，是一系列的各式各

样的狡猾手段和极其卑鄙的骗局。在这种情况下和由于中国使臣，如上所述，显然倾向于战争，柯罗文有充分的理由来同噶尔丹订立协定，以便采取联合行动对抗中国人。有利于这种办法的重要情况，是噶尔丹恰好在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图拉河，即占领了同西伯利亚交界的蒙古西北部，据密勒说，噶尔丹自己也曾力求与俄国人订立协定，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来对抗中国人。这种协定能取得胜利成功是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从雅金甫的著作：《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要》可以看出，准噶尔的统治者从噶尔丹开始，就曾力求同俄国结成同盟，以便对抗中国人和蒙古人。噶尔丹于1693年同我国使臣尤金会见时，甚至表示完全愿意协助俄国人把从来不属于中国的阿尔巴津收回来。

另一方面，中国人最怕这种联盟，毫不放松地监视准噶尔人与我国接近的一切企图，并竭尽全力阻止其实现。现在也是这样，中国人由于固有的好疑，在他们代表前来涅尔琴斯克谈判和向那里派遣中国军队的同时，也向噶尔丹派遣了使节，以便在某种表面上良好意图的借口下，来探知噶尔丹的意图，主要是：他是否同俄国人订立了秘密条约。被派的使节是清朝的一个大官，曾被准噶尔人捉住，并送交噶尔丹。噶尔丹对他加以详细讯问，得悉按照中国政府的命令已经派遣使团前往俄国进行关于国界问题的和平谈判，就释放了这个大官。中国人从他身上得悉，俄国人没有同准噶尔人订立同盟，感到极为喜悦。

后来的全部时期，直到准噶尔的灭亡，也都是这样，中国人对于准噶尔统治者与俄国同盟的任何传说，始终是抱着高度敏感和猜疑态度。例如在1690年，在北京得到消息说，噶尔丹已经派马队四万人来到蒙古西北部，此外还打算向俄国请求派遣援军，康熙皇帝命令向当时驻在北京谈判边界事务的贵族大臣的儿子洛夏宁诺夫宣告，如果从俄国派遣援军给噶尔丹的传说确属真实，那么俄国的

这种行为违反了1689年在涅尔琴斯克签订的和平条约。后来在1696年，当北京从蒙古边界得到消息说，噶尔丹自己现有马队二万人，还在等待从俄国前来的援军六万人，这个消息曾经引起中国各大臣如此的恐惧，以致他们请求已经带同军队前往蒙古的中国皇帝返回北京。当噶尔丹的继任人策妄阿拉布坦准备与中国战争，要求中国割让哈密省和承认蒙古独立的同时，曾经派遣特别使团请求彼得一世皇帝协助，而且得到了好意安慰和卫护，这种消息很快就被到处都有自己谍报人员的中国人知道了，中国各大臣以不愉快的心情将这事告知1722年驻在北京的我国特派员兰格。中国人通知他说：接待自己敌人的使团，而且同它订立了攻守同盟，这是多么不正当的事情。

再来研究中国人反对准噶尔人的行动，应当指出，在满洲朝代康熙、雍正和乾隆最初一些有才干的皇帝在位时期，中国人遵守自己的渐进行事办法，以精细的和有远见的政策做到了使全部蒙古东部归属于自己的政权，并使西藏脱离准噶尔人的统治。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决定以全部力量猛攻准噶尔人，并把他们歼灭，在乾隆皇帝在位时已经这样做了。决定进行这种战争的时候，中国人预先着手采取能够保证在准噶尔作战胜利的各种准备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就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人向我国政府以及我国所属卡尔梅克阿玉奇汗所派遣的使团。在中国政府出名的自高自大和傲慢无礼的情况下，它当时未曾向任何一个欧洲和亚洲君主派遣自己的使团，可是却向阿玉奇汗派了使团，而阿玉奇汗并非独立的君主，乃是臣属于俄国的，这可以说违反了中国的惯例，是一个极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很明显，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中国人在击溃准噶尔的行动中，不仅对于俄国而且对于卡尔梅克阿玉奇汗的可能参加，都认为有很大的意义，阿玉奇的曾祖霍鄂尔勒克曾于1636年带同他的所有属民投向俄

国，当经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收容入籍，并在伏尔加河下游两侧地区得到牧地。尽管在1712年发给派向阿玉奇汗的中国使臣的训令中，完全没有提到请求在对准噶尔的战争中协助中国，但是这个使团的专门目的却保守秘密，毫无疑义在于促使阿玉奇袭击同中国人处于战争中的准噶尔人。这种情况的确实性，已经当时驻北京的我国委员胡贾科夫以及我国大使拉古津斯基伯爵加以确认。据他声明说，中国使臣曾请求阿玉奇，要他向珲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宣战，原因是他不愿制止自己对中国属下的蒙古人施加侮辱和毁灭。但是机警的阿玉奇借口说他是俄国君主的臣属，拒绝了这个建议。

雍正皇帝于1731年和1732年派往俄国的其他两个使团，是庆贺彼得二世皇帝的即位，后来是庆贺安娜·伊凡诺夫娜的即位。但是这两次派遣使团的主要专门目的，都是在于取得同盟的保证，或者至少得到我国政府在当前对准噶尔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由于中国人所惯有的好疑和支吾搪塞，他们的使臣曾得到命令，口头上向我国政府声明，如果中国军队在开始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以后，那么将在我国国界附近作战，所以认为必须预先通知我国政府，以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没有任何敌对我国的意图，不致发生丝毫怀疑。在中国人征服准噶尔之后，如果我国政府愿意取得同俄国接壤的准噶尔土地，那么就告知大使，而这些土地也将让给俄国方面。关于此事曾经命令大使说，所有与中国政府的协定事宜，应俟中国人最后占领准噶尔之后，再行办理。

由此可见，当时在亚洲边区我国行动的缓慢、寡断和动摇，不善于估计和利用由于蒙古发生混乱和不安而造成的我国当时对中国关系的有利形势，最后，以及我国所采取的显然是不干涉的办法，这一切使中国人完全放手去进行他们对准噶尔人的战争。

再回溯到柯罗文大使的时期，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优柔寡断和不干涉办法，也大大地便利了中国人执行他们的任务，特别是当他们得到确实消息，知道在柯罗文和噶尔丹之间没有任何关于采取联合行动反对他们共同敌人的秘密协定。其实，如果存在这种协定，如果柯罗文能巧妙灵活地相机行事，并利用对于我国有利的情况，那么中国人在国界上的处境就会感到困难。已经来到图拉河的噶尔丹，本来可以迅速行动到达克鲁伦河，进入中国人背后而威胁他们的交通。这种情况可能迫使中国人从涅尔琴斯克撤退。如果中国人对噶尔丹的迂回运动置之不理，继续留在涅尔琴斯克，那么柯罗文就可以集合他手下现有的全部军队，而为了加强这个军队，达呼尔龙骑兵团恰好当时从俄国来到了，这就可以威胁中国人，准备随时推进同噶尔丹会合。噶尔丹自己也这样行动起来，在图拉河同俄国结成同盟和与我国军队会合而威胁了蒙古人。噶尔丹的这种威胁所产生的精神上的影响如此之大，使中国大使没有大队骑兵作为荣誉护卫与他同行，就不敢通过蒙古前往涅尔琴斯克。最后，我国所采取的威胁，对于中国人在涅尔琴斯克公然反对我国的敌对行为，就会是一种回答。担心这种威胁的失败，甚至在他们与中国人实行武装冲突时，看来，也是没有根据的。根据格里果利耶夫教授的看法，特别是如果注意到为征服一个无关重要的阿尔巴津小城镇，中国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力量。中国民族，按照我国大使拉古津斯基的公正意见："是不能作战的，因为他们是一些没有战斗精神的人。"科学院院士和教授密勒在他的关于与中国人作战计划的论断中说道："一个持有火力武器的俄国兵士可以作为抵抗十名中国武装兵士的英雄。"也应当注意到，如果事情真是达到与中国人武装冲突的地步，那么柯罗文在这种场合也丝毫没有逾越自己的权限。在给他的训令里曾经顺便指出说："如果在这样情况下（即以阿尔巴津城为国界和在阿穆尔河、吉流伊河与结

雅河[1] 可以渔猎），中国人不愿意达成和平，那么该大使等应依全权的训示办理，即以战斗办法力求达成一切。”在这种场合，柯罗文始终可以指望噶尔丹亲自率领下的准噶尔军队的协助。我国的这种坚决和勇敢行为，一定会使中国人在涅尔琴斯克所取得的对我国的优势地位转到我国方面来，而两国代表的作用也就会完全发生变化。那时柯罗文利用这种情况，就可以坚持要求中国军队从国界上从速撤退，因为留驻军队不能证明有什么必要，由于举行代表会议是为了和平谈判和确立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尤其应当认为是适宜的。如果中国人不同意这一点，柯罗文就有充分理由向他们宣布说，按照发给他的训令，谈判即将停止，并且只有在一个不可变更的条件下，即在阿尔巴津城举行会议，谈判才能重新举行，阿尔巴津城和达呼尔全部地方都不应退让而留在俄国领域之内。这样来提出已经成为事实的不需要再作商谈的阿尔巴津问题，柯罗文一定会得到当时西伯利亚全部俄国居民的充分同情和支持，因为俄国居民逃往达呼尔境内的阿穆尔地区，从1653年开始规模已经很大。据奥格洛勃林的说法，这种逃亡行动的原因应当归咎于西伯利亚边区服役的繁重和将军的滥用职权。为了逃避这种服役和当地边区官长的一切压迫，居民曾经组成所谓窃盗团，以便不担任国家职务。不仅在俄国占领时期的阿穆尔，还是在1689年订立《尼布楚条约》以后，都因传说达呼尔地方富足和生活自由而无法制止继续吸引俄国人到那里去。好象是有过某种注定的自然力量，吸引了我国人在那遥远的时代前往阿穆尔地区，中国的边防军队由于人数不足不能制止这种力量，只限于向我国政府抱怨。阿穆尔地区在我国占领四十年（1650—1689年）之后，在民间已经成为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在阿尔巴津城拆毁和让给中国人以后经过

① 即精奇里江。——译者

十有余年，又企图加以占领，就是一种明证。对于此事应当补充说，为了占领阿穆尔地区和短期保持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俄国曾经在金钱上和人力上遭受很大的损失。我完全认识到，在我这本回忆录中，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些想法，要更加详细地研究我国失去达呼尔的问题和必须归罪于柯罗文，那会是不适宜的。但是我认为应当涉及与订立《尼布楚条约》同时发生的情况，也可以说是顺便涉及，以便表明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而这个问题在俄国与东亚各国的外交历史上，看来还是一个空白点，并且可以作为以后较全面地进行研究的题目。格里果利耶夫教授也曾指出这个问题在政治关系上的意义，他认为我国将阿穆尔河让给中国人并无任何特别的必要，这样一来通向太平洋的最便利的途径就被封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这是由于我们不善于估计中国在蒙古和准噶尔的情况，我国在对中国的关系上不止一次所处的有利情况。因此也就不能利用这种情况。机警的中国人看出了应当怎样行事，毫不让步并坚持了自己的主张。“要是我们善能”，格里果利耶夫教授说道，“在满洲人与准噶尔人所纠缠的持续战争中巧妙地相机行事，我们就会迫使北京政府让步”。总而言之，在观察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初期东亚的事件时，不可不注意到一种不可理解的注定的倾向，即我国方面总是避开同准噶尔人的联盟，而准噶尔人却不容置疑会给中国人在蒙古西部政治威力和影响的发展造成强大的对抗力量。准噶尔问题当时对于我国在极东利益的重要意义，显然是被忽略了。这一切导致了上百万的准噶尔人民被中国人全部消灭了。这种政治事变是在与俄国亚洲部分接壤的地方发生的，并且在这以后的长时期内是西欧所不知道的，正如萨普·德奥特罗什在他的西伯利亚旅行记中所叙述的那样。从斯卡奇科夫图书室里所看到的关于我国后来派往中国各大使的记载中，我曾特别有兴趣地考察了拉古津斯基大使的情况。我国大使很称职。他从

一开始就特别小心谨慎，外交上极有分寸，尽管中国人步步给他造成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后终于同他们达成了协议。在情况需要的那些场合，拉古津斯基的行动是坚定果断的。例如，他充分认识到从谈判一开始就坚持，按照我国意图国界线必须通过的这个边界地点的全部重要性。

为达此目的，曾经选定距色楞格斯克城一百俄里和距恰克图十俄里的布连河作为会议地点，在这里设置了营垒，于我国大使即将到来的时候，即1727年6月14日，以荣誉护卫的名义向营垒调集了军队。拉古津斯基好象用这种具有高度理由的亲自选定会议和谈判地点的做法指明，正是在这个地方应该确定国界和开始划界。也在国界上的中国大臣们显然是不满意我国大使的这种办法，曾经加以争论，并表示愿意在距离国界四十俄里的苏布赫图天然界线地区举行会议。但是尽管如此，会议是在布连河举行了，在这个地方经过1727年6月、7月、8月的八次会议后所订立的条约，就以布连的名称为名。中国大臣们曾用尽了他们的狡猾和恫吓，力求欺骗我国大使。他们曾要求我国领域内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至额尔古纳河的许多土地。中国人的这一切争论和坚持，继续了两个月之久，受到我国大使方面的坚决反击，他最后迫不得已曾以战争威胁中国人。中国人看到了我国国界在迅速加强起来，已经由布赫戈利茨上校建筑了堡垒和哨所，已在沿边各据点建立了围栏和其他障碍物，托波尔斯克卫戍兵团来到了国界，在国界上充当志愿民军的我国纳皮毛实物税的外族人都很忠诚，以及我国大使本人对于一切情况的不断警惕，这一切迫使显然不愿战争的中国人害怕与我们决裂。这种害怕最后使中国人不得不接受我国所提出的国界草案，从俄国、中国和准噶尔国界汇合地点的沙宾达巴哈起，向东方到额尔古纳河。总而言之，对于拉古津斯基伯爵的外交才干、耐性和有分寸不能不给予应有的尊敬，他在留居中国的三年

时间内，曾经迭次受到中国官员方面各种各样的甚至以饥饿来折磨他的侮辱，只是在经过五十八次最使人厌烦的会议（其中有八次是在布连）以后，拉古津斯基终于能够在北京与中国人订立总条约，于1728年6月14日在恰克图互换，并以《恰克图条约》名称而著名了。1727年8月20日俄国和中国代表在布连河所签订的著名的《布连斯奇条约》，也完全加入这个条约之内。根据这个条约就实现了从恰克图起确定国界，一方面向西到沙宾达巴哈，另一方面向东到额尔古纳河。

拉古津斯基居住边区和北京的全部时期，与柯罗文相反，利用一切机会来全面了解边疆事务的情况。阅读他从中国国界发送的报告，对我国大使孜孜不倦的活动应该感到惊异，他能在较短的时间查明国界事务的当时形势，并对中国和它的邻近地区蒙古所发生的政治性事件作出正确的估计。例如，他曾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档案库中，找到蒙古统治者阿勒坦汗和他的儿子洛赞于1634年臣属俄国条款的抄本。这个重要文件使我国大使在同中国人谈判国界时，能够驳斥他们对于俄国所属蒙古民族各部族所占的属于俄国的沿边土地的一切无理要求。最后，拉古津斯基对准噶尔与俄国关系的政治意义曾有正确的看法。拉古津斯基在他从中国国界发出的一个报告（1727年5月10日战斗报告）里说道："珲台吉（策妄阿拉布坦）曾以频繁的袭击毁灭大量中国人，这个邻居将来可能脱离中国人而成为俄国的藩篱和最有益的同盟者，那么对他保持友善关系不是坏事情。"

看来，彼得大帝对于我国与准噶尔的关系也有同样的看法，据格里果利耶夫教授说，彼得大帝曾在1722年亲自派遣文科夫斯基大尉为大使前往策妄阿拉布坦处，以便确实了解准噶尔事务的形势，从这些事实中就应当作出这个结论。继拉古津斯基之后，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我国派往中国的其他两位大使，即1763年

和1768年所派遣的克罗波托夫和1805年所派遣的戈洛夫金伯爵，都没有特别可资借鉴之处。两位大使都曾受到中国人的最屈辱的要求，而且克罗波托夫甚至死在中国国界上，戈洛夫金伯爵曾从国界上的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行经二百六十俄里到达库伦，然后返回俄国，而派遣大使的目的则未曾达到。但是据马尔丁斯教授的意见，戈洛夫金伯爵的离去曾使北京政府产生强烈的印象，它立刻召还向我国大使提出屈辱要求的有关省长和其他人员，同时公文的语调也比较客气。

在我居住塔城我国贸易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在斯卡奇科夫的图书室有上述很好选阅关于中国的书籍以外，我在漫长的秋日夜晚同敬爱的斯卡奇科夫的私人谈话也给我很大的益处。从斯卡奇科夫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很好地掌握了文学的语言，而且还具有能作出明晰和使人信服的说明与论述的才能。听到他的关于中国的细致的和有趣味的论述，我常感到十分高兴。斯卡奇科夫在北京作为我国驻该处的教会成员，过了差不多十年之久。设立这个教会是我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事务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教会成为培养后来在学术界知名的或因有功绩而著名的人物的养成所，在中国担任了我国代表的重要职务。按照马尔丁斯教授的公正意见，我国的北京教会曾为俄国和中国政府间经常联系的机构，甚至在两国之间发生纠葛时也是如此。它使中国人注意到他们这个强大的邻邦，并成为全面研究中国的增进学问的机关，我国政府从这个来源可以获得关于中国的最确实的和最新的材料。

最后，到了我离开塔城的一天，我在这里同可敬的斯卡奇科夫交际中度过的时光，对我来说获益非浅，在他家里我曾受到他们夫妻双方的热诚款待。在告别的时候，我们曾彼此约定积极互相通信，这就使我可能获得对我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中国委员的最新

消息，因为我在下一年即1862年要重新前往塔城，与中国人谈判国界的问题。

第 五 章

来到鄂木斯克和整理我所收集的关于中国国界的材料。
动身去彼得堡，留居彼得堡。　返回西伯利亚。

来到鄂木斯克以后，在我谒见杜加麦利总督的时候，他向我表示，在塔城同中国人谈判时我对仪式过分重视是无益的，以此暗示我与哈布齐贤的冲突。因此，在彼得堡认为谈判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回答说，我是按照我的起码理智行事，并且在我当时所处的那种情况之下，大概是不能有别的办法的。在人所共知的中国人的高傲情况下，必须立即制止哈布齐贤提出的无礼要求，主要是因为任何一种忍让和一般爱好和平的做法，都会有害于当前关于国界谈判的进行：中国人看到我方肯让步，就会认为是软弱的表现，而必将利用这种情况，对于按照《北京条约》已划归俄国领有的土地提出过分的要求。

至于说到谈判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结局，则不可不注意到，我们前往塔城是为了同中国委员约定来年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除了总督的一项命令以外，我们没有受到执行这种委托事项的应有的全权委任，因而对于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加以争取，在我国领事协助之下，终于能够达到同中国委员的会见。而且正如后来得悉，在我们前往塔城的同时，我国驻北京公使已经与中国大臣关于规定来年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达成协议，关于此事是我们从中国委员方面首先得悉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出于意料的事情。因此，我们塔城之行实质上成为对中国委员的礼节性拜访。由此可见，谈判的结

局完全不是决定于我们，而是由于对我们被委派的事宜已经在北京成立协定的毫不知悉情况下的自然结果。杜加麦利听取了我的说明以后，看来已经完全满意于此，并允将一切情况呈报彼得堡。同时他要我准备前往彼得堡，以便亲自说明与中国的划界事宜。因此，我急忙利用冬季道路通行以前的空闲时间，将我的中国国界记录用最近前往塔城所搜集的新的资料加以补充。还必须了解一下我国往昔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大使关系的其他材料，这是我在上述密勒院士的论著中所发现的，以及在鄂木斯克1765年起的档案中所找到的。我重新编成的关于中国西部国界的记录（其中也拟定了国界线），曾经详细地呈报给杜加麦利总督，他完全赞许这个记录，认为必须送交陆军部和外交部，以便最后审查和批准国界线。但是，为了使选定的国界的走向的正确性更为可靠，这个草案曾经按照我的呈请，由杜加麦利将军送往我国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鉴定，因为他完全熟悉中国西部地方即塔城和伊宁两省（中国称为塔尔巴哈台和伊犁）的地方情况。扎哈罗夫完全赞同国界的总的走向，只是指出，如果中国人同意，希望能变更伊宁省方面和斋桑湖地方的部分走向。除了关于中国国界的记录以外，同时我向杜加麦利呈送了关于改组我从前曾在其中担任参谋长职务的第二十四步兵师的另一个意见书。这个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指出了师部参谋处设在托波尔斯克，即设在师部各部队所分驻的面积超过二百万平方俄里的广大地区的一个角落，具有极大不便之处。很明显，管理分驻在西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这样广大地区的军队是非常困难的。属于师的组成部分和分驻在阿克摩林斯克与谢米巴拉丁斯克各草原州区的各战斗营，在战斗关系上应服从各该州的军政州长管辖，而在经济关系上则应服从第二十四师师长管辖，即在实质上好象是有了两个师部长官，这一重要情况使得这种不便之处更加复杂化了。这种分权曾造成许多不便，甚至

使滥用职权制造借口。曾有这样的情事，营长因自己的呈请没有如愿地得到师长的许可，曾就同一问题再向该州军政州长提出呈请而得到肯定的批准。结果是，所提出的同一问题好象有了两种决定。

为了消除所有这种不便之处，我曾拟定计划：完全撤销第二十四步兵师师部，将草原地区的各战斗营在战斗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一律服从阿克摩林斯克州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各军政州长，实行师长权限的管辖，而分驻在西西伯利亚各省的地方部队，则归属新设立的西伯利亚内部保卫军区长官管辖。在赞同这个意见书中所叙述的一切以后，杜加麦利命令按照法定程序作成相应的呈请。我从鄂木斯克起程前往彼得堡，携带着我在当地所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国界的大批材料，也随身携带呈送陆军部的外伊犁边区的地形地图，这是我在西伯利亚地形测绘员费多罗夫协助下，按照高加索同样地图的样式制成的；关于制成这种地图的方法和详情细节，我是在梯弗里斯高加索军总司令部服务时期熟悉的。

来到彼得堡之后，我应当谒见两个大臣：陆军部大臣和外交部大臣。首先我应当前往参谋总部亚洲局。幸运的是，我所遇到的这个局的首长，是我在高加索共事过的善良和诚恳待我的同僚德米特里·伊里奇·罗曼诺夫斯基，我们在1853—1854年在著名高加索将军弗·奥·别布托夫公爵领导下的驻高加索-土耳其边界作战军团司令部共同服务的时候，我同他已经相识了。罗曼诺夫斯基比我早一年在陆军大学毕业，因为曾与罗曼诺夫斯基同期在陆军大学毕业的近卫军乌兰斯基团部骑兵大尉涅伊德加尔特决斗，被降职为兵士，并被派往高加索军中服役。来到梯弗里斯之后不久，他被派往1853年秋季向亚洲土耳其境内出动的别布托夫公爵军团。因在巴什·卡迪克利亚尔战役中有功，罗曼诺夫斯基被升为准尉。因1854年7月24日在库鲁克·达拉战役中立功，又因

1855年战争时期在尼·尼·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总司令统率下的作战军团军务和战斗中立功，罗曼诺夫斯基连续不断地获得了他所失去的一切官衔，而且在战事结束以后，他已经成为参谋本部的陆军中校了。在任命巴里亚京斯基公爵为高加索军总司令以后，罗曼诺夫斯基被派往彼得堡，作为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公爵亲自知悉的人物，被任命为公爵作战办公室军务处长。看来，罗曼诺夫斯基在高加索是官运亨通的。但是这一次的运气背叛了他，由于同巴里亚京斯基公爵发生了误会，他不得不离开高加索。来到彼得堡以后，不久他即被派任参谋总部亚洲局长，我来到之后就在局内遇到了他。有赖于罗曼诺夫斯基特别是斯加隆的协助，杜加麦利总督关于当前同中国西部划界事宜，以及关于在边区进行天文工作和地形测量工作的一切呈请，都依法定程序进行得很迅速。斯加隆和参谋总部作战总参谋阿·伊·维里金，在我向他们呈阅的时候，对我的关于中国国界的记录和我所制成的外伊犁边区的地形地图，都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我从陆军大臣米留亭伯爵和亚洲司长伊格纳提耶夫伯爵方面，也受到了同样的温暖和同情的接待。其中第一人，当我在陆军大学和在高加索在他的领导下服务时，就已经亲自知道我的。

在这种谒见时，我曾就中国国界问题按照专门为此特别制成的地图，作了详细的报告。在这以后，我即将外伊犁边区的地形地图呈交米留亭和伊格纳提耶夫。陆军大臣命令我，要在所定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随身携带地形地图，以便恭呈御览。在所定的那一天，早晨9时我来到了冬宫，同时地形测绘员费多罗夫也将地形地图带来。不久陆军大臣米留亭伯爵也来到了。他命令我在会客厅等候，不久我即被召唤到皇帝办公室，承蒙亲自赐予接见。随后我将地形地图拿到办公室，并在皇帝御临和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与陆军大臣出席之下，作了简要的陈述。皇帝在阅览地形

地图的时候，注意到了伊塞克湖的山区盆地和周围的山区地方。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说道："那里就是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这两个不大的浩罕国堡垒，由于不久以前齐麦尔曼将军曾向外楚伊斯克进军，当时已经著名了。然后，皇帝陛下对于我国部队从维尔内堡垒出发向皮什彼克的进军活动，以及屏障楚伊斯克盆地的山岭高度，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同时对于制成地形地图表示了圣上的感谢，就令我退出。陆军大臣在他陈奏以后，从皇帝办公室退出，命令我在指定的日期再来冬宫，届时将在皇帝亲自主持之下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和拨给所需经费事宜。按照杜加麦利总督的委托，关于西西伯利亚的几项事宜，我还应当谒见管理当时所设西伯利亚事务委员会的国务卿三等文官伊·伊·布特科夫。接见是很亲切的，布特科夫请我转达杜加麦利，凡是送到西伯利亚事务委员会的他所提出的一切呈请，均将及时处理。然后，正如应当预料到的，谈到了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问题。布特科夫并且表示意见说，对于派往国家边疆去执行需要毅力和机智的特别重要事宜，应该尽可能是青年，并且必须是未婚的人。在布特科夫之后，我认为也应该谒见前亚洲司长枢密大臣科瓦列夫斯基，我从前有一次从西伯利亚前来彼得堡曾有机会同他相识。科瓦列夫斯基是在学术界和行政管理方面具有重要功绩而著名的卓越俄国活动家之一。他在非洲内部、黑山国和中国的旅行记的出版，使他获得了有才干的著作家和东方通的光荣声名。1847年，科瓦列夫斯基应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邀请，为了寻找金矿曾去努比亚地区进行考察，到达了青尼罗的法特佐格洛地方。1849年，科瓦列夫斯基护送我国教会人员前往北京，曾以自己的影响加以协助，使教会人员在蒙古境内沿商路前往北京，这条道路较诸通过阿尔戛朗沙漠以前的道路，是无可比拟地更便于通行，而中国官员曾故意引导我国教会人员走这条道路，并且每次按照不同方向进

行，为了使我们迷失通过蒙古前往北京的直接和最短的道路。1851年，科瓦列夫斯基曾与中国政府代表在伊宁签订了著名的《伊宁条约》，根据该项条约开放中国西部城市塔城和伊宁与俄国通商，并在各该城市设立俄国领事馆。这个条约的成功签订，科瓦列夫斯基仿佛以此指出了，我国巩固占领外伊犁边区和在大汗国与吉科卡门汗国吉尔吉斯人中间建立应有的治安秩序的迫切必要性，因为这种治安秩序将能保证各商队通过各该吉尔吉斯人所占有的中国西部境内畅行无阻。从这个观点来看，《伊宁条约》不仅是在商业关系上，而且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成为深入中亚细亚继续进攻活动的强有力的动机，这种活动是公爵戈尔恰科夫将军所开始的，他是西西伯利亚各总督中首先对我国占有外伊犁边区打下基础的人，也是向政府和学术界提供关于我们祖国这一个别边区的初次情报的人。1853年，科瓦列夫斯基曾被派往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而在1856年获得了亚洲司长的重要和负责职位的任命。派遣我国代表前往喀什噶尔，以及必须立即在塔什干组成军事管理中心来管理土耳其斯坦边区的意见，也是科瓦列夫斯基提出的。科瓦列夫斯基象对待一个已经相识的人一样接见了我，非常亲切地，而且很多地、很详细地询问了关于中国国界和在塔城与中国谈判的情况。他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和指示，都是具有非常正确的看法，我以深切感激的心情加以接受。后来我们的谈话因回忆过去而活跃起来，顺便也涉及到派遣代表前往喀什噶尔的问题，加斯弗尔德为此而选定的是吉尔吉斯人中间的青年军官卓堪·瓦利哈诺夫。我应当在这里作一个不大的间断，谈一谈派任瓦利哈诺夫前往喀什噶尔的经过情形。

卓堪·成吉卓维奇·瓦利哈诺夫出身于中汗国吉尔吉斯人苏丹的家庭，即贵族的家庭，是著名的阿勃莱汗的曾孙。

他于1853年在西伯利亚陆军中学毕业成为骑兵少尉之后，即

被派往加斯弗尔德总督处担任特别差遣职务，显然总督赏识这个年轻和机警的吉尔吉斯人。西伯利亚吉尔吉斯州副军政州长古特科夫斯基上校对于瓦利哈诺夫也给予同样的优待。当外交部根据科瓦列夫斯基的意见，提出派遣我国代表前往喀什噶尔的有益和必须的问题时，加斯弗尔德就选定了瓦利哈诺夫。派遣的目的，是在于搜集政治性的，以及有关地方地理和从我国境内通往喀什噶尔的商业道路状况的情报。

严格说来，瓦利哈诺夫对于责成他这样重要的委托是没有准备的，从当时的观点来看，也是不完全符合于这种派遣的要求。例如，据尼·米·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意见，按照他的丰富经验和优越的事务知识，可以认为是在组织向远方亚细亚各地旅行的最有权威的人士，作为派往中亚细亚旅行家的人员必须符合下述条件：强壮的身体、坚强的肌肉、有毅力、有决心。同时必须有学术上的造就，哪怕是具有不多的专门知识也好。再有——对于旅行的天生爱好、奋不顾身的热衷于自己的事业。旅行家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射击手，不应该厌恶任何粗笨的工作，如装驮骆驼、备马鞍等等。

瓦利哈诺夫几乎不具备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他的体格是相当弱的；不用说专门的教育，就是他在陆军中学完成一年级一半课业所获得的普通教育，也可以说是肤浅的。何况瓦利哈诺夫作为一个天生的吉尔吉斯人，不能不具有亚洲的世界观，因而自然也就会从亚洲的观点来看周围的一切事物。后来这一切也都反映在他的旅行报告的编写上，据当时在鄂木斯克的风传，该项报告是在瓦利哈诺夫患病时，由古特科夫斯基按照他的口述，在加斯弗尔德亲自校核下编成的。在这个记录里，地理统计一章显然应该构成它的重要部分，但由于叙述一些其他作品中已经报道过的多余的政治性细节，就大大地冲淡了。此外，所经道路的地图也好，喀什噶尔和它附近地区的平面图也好，都是当时最感兴趣的，反而没

有附入这个报告中去，因为在启程前往喀什噶尔的时候，瓦利哈诺夫没有随身携带目力观测器，不但没有普通的地形测量器，而且甚至没有罗盘仪。再有，瓦利哈诺夫住在喀什噶尔的全部时间内都是留在城市里，甚至在近郊地区也没有去游览。

可惜的是，在当时以及甚至在最近时期，正如我国著名的作家和政论家尔·阿·法捷耶夫所公正指出的，在我国的军官团里完全没有很好培养出来的纯粹俄国人的东方通人才。因此，在中亚细亚也好，在高加索也好，都不得不借助于当地人。在现在的场合也是这样，何况瓦利哈诺夫尽管按照出身来说是吉尔吉斯人，但是按照他实际上通晓鞑靼语言、他在陆军中学受过教育和特别具有才能与观察智力来说，就成为这次派遣的最适当的人员了。在瓦利哈诺夫前往喀什噶尔的时候，按照加斯弗尔德的命令，曾经装备了一个在塔什干人头目布卡什管理下的特别商队，布卡什曾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居住过，后来是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和谢尔基奥波利之间的阿尔克茨克哨所地方居住。瓦利哈诺夫曾作为布卡什的亲属加入商队。1858年6月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出发，商队向谢尔基奥波利城、科帕尔和维尔内堡垒等处前进，从此去奇利克河到梅尔卡河，然后经由桑·塔什通道前往流入伊塞克湖东方尽头处的图普河。往后，商队经由扎乌金斯克通道进入天山山脉，向通往库尔特卡堡垒处的纳伦河谷，再沿恰蒂尔湖并经由捷列克特山岭通道前往喀什噶尔。从维尔内堡垒到喀什噶尔全部行经的道路，长达七百俄里。

在外交部内曾以可以理解的焦急心情和强烈的好奇心，等待瓦利哈诺夫前往邻接印度和距离克什米尔三百五十俄里的素不熟悉的喀什噶尔送来关于旅行的详细报告。科瓦列夫斯基作为此事的倡议人和以东方学为职志的人，更加关心于此。关于我国代表驻在喀什噶尔和他搜集东土耳其斯坦或小布哈拉有趣情报的消

息，由于科瓦列夫斯基与勃鲁多夫伯爵亲近相识，也传入了彼得堡的上层社会。所产生的印象还由于一个情况而加强起来，即外交部已经得悉英国代表著名的阿道尔夫·什拉金特维特也已由印度出发前往喀什噶尔，但他后来在喀什噶尔被杀死了。

同时，编校瓦利哈诺夫的报告需要很多时间。因此呈送得很迟慢，在收到报告的时候，关于喀什噶尔和瓦利哈诺夫，人们已经谈论过了，后来正象常有的情况那样，人们也就忘怀了。

由于很明显的原因，这一切都对科瓦列夫斯基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在我上一次从西伯利亚来到彼得堡谒见他的时候，他曾表示自己对于加斯弗尔德的不满，因为加斯弗尔德呈送报告的时候，我国代表前往喀什噶尔的成功的旅行（与英国代表前往该处旅行的悲惨结局相反）所产生的印象已经冷淡下来和逐渐被忘却了。

总而言之，我所能看到的，在科瓦列夫斯基与加斯弗尔德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而后者有时不得不从亚洲司接到电报，其中通过表面客气的语调显明地透露出，对加斯弗尔德的某些边疆事务的命令的讽刺意见。大概，引起这些不满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但是看来，多少是加斯弗尔德本人咎由自取的。扎哈罗夫向我说，他是曾目睹发生这种事情的人。1851年，在伊宁与中国人谈判结束以后，关于中国西部开放正常商业关系一事，如上所述，曾经签订《伊宁条约》，科瓦列夫斯基当时曾任矿业工程学校上校，还没有担任亚洲司长职位，他从伊宁出发经由科帕尔、谢米巴拉丁斯克和鄂木斯克前往彼得堡。科瓦列夫斯基在参加对中国人谈判的人员随从下（其中有此后不久即被任命为伊宁和塔城领事的扎哈罗夫和塔塔林诺夫）来到了科帕尔，那时正好刚被任命为西西伯利亚总督的加斯弗尔德也来到了此地。

科瓦列夫斯基带同参加伊宁交涉使团的全体人员，认为应该谒见加斯弗尔德。因此，就同他们在为一般接见科帕尔全体军事

和民政官长人员，以及大汗国吉尔吉斯苏丹、头目和享有荣誉的人等所预先规定的时间，前往为总督所安排的行辕。来到加斯弗尔德那里的时候，所有前来谒见的人员都已集合一堂了，交涉使团的成员谦逊地坐在他们的后面，希望加斯弗尔德在看到科瓦列夫斯基的时候，会给他优先机会，在其他谒见人员之前来接见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加斯弗尔德开始接见之后，就不急不忙地继续进行接见，虽然可以设想他没有看见，或者不知道在谒见人员中也有交涉使团的成员在内，但这是不能容忍的。在接见终了以后，加斯弗尔德忽然惊异地向科瓦列夫斯基叫道："啊！是你呀，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显然，这种问候使他为难，也有些使他发窘，何况这是十分突然的，而且对于交涉使团的所有成员都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科瓦列夫斯基这次不得不自行克制，大概他很懊悔没有听从扎哈罗夫和其他人等的劝告，因为他们都曾向他建议，谒见加斯弗尔德不要在共同接见的时间，要单独地特别谒见。这样的特别谒见是最适合于科瓦列夫斯基的地位，他是我国政府的代表，这样辉煌地完成了委任给他的使命，他能够详详细细地向加斯弗尔德传述不少的情报，这在商业关系上和政治关系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首先对于西西伯利亚，即对于归他所管辖的边区会带来好处。

为了结束关于瓦利哈诺夫的叙述，我应当补充说明，在他前往喀什噶尔旅行的报告最后脱稿和加斯弗尔德决定将该项报告呈送外交部以后，瓦利哈诺夫被派往彼得堡。科瓦列夫斯基对于深入中亚细亚完成胜利旅行的青年吉尔吉斯人很感兴趣，同时把他作为他的同人当中的出色人员，主要是作为一个曾经到过喀什噶尔（当时关于它的情报是极为模糊的）的人推荐给勃鲁多夫伯爵。总而言之，瓦利哈诺夫在彼得堡最初是很走运的。但是不久那里的气候很有害地影响了他的健康，所以他决定返回鄂木斯克。瓦利

哈诺夫从那里前往自己家乡的草地，在那里与捷泽克·努拉利耶夫苏丹的女儿结了婚。他在1864年因肺结核病死亡，年仅三十一岁。瓦利哈诺夫的论著有：《准噶尔的概况和南路中国东部六个城市的状况》，曾在1861年《地理学会论丛》上发表，他从扎乌金斯克山口到喀什噶尔的旅行论文曾在1868年《地理学会学报》上发表。

1862年1月，举行了由大皇帝陛下亲自主持的关于中国事务的特别会议，有陆军部、外交部和财政部参加，伊格纳提耶夫伯爵和科瓦列夫斯基出席了会议。根据陆军大臣的命令，我在这一天也来到了冬宫，以便觐见皇帝。

在皇帝办公室举行的会议结束以后，皇帝陛下对我恩赐接见。同时承蒙垂询我在高加索过去担任的职务，然后谕示，已批准我为同中国划分国界的全权委员，并谕令财政大臣拨发当前划界事宜所必需的经费。在我蒙圣主惠赐接见结束之后，留在会客厅的陆军大臣曾向我宣示，因为制成外伊犁边区的地形地图，君主已经赏给我刻有花字组成圣上名讳的宝石戒指。总参谋部大尉戈卢别夫被派任为我的划界事务帮办，即第二委员。在派任他的时候，主要是注意到那种情况，即戈卢别夫作为一个大地测量学家，于1858年充任派往外伊犁边区的天文考察团团长时已经有很卓越的表现，在当前的划定国界时，也必能确定紧靠沿边地带的各地点的地理位置，同时测定连接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的地形。这种情况使能在地图上加入所作出的地形测量，同时也就使制成边疆地区地图大为容易了。

在划界使团中具有通晓中国语文，特别是满洲语文的知识人员，在与中国委员进行文件交涉时具有重要意义，我曾呈请委派著名的中国通和熟悉中国西部情况的我国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为第三委员。这个呈请曾蒙圣上批准。克·弗·司徒卢威被任命为使团的事务长，他是著名天文学家和普尔科夫天文台台长瓦·雅·

司徒卢威的儿子。克·弗·司徒卢威除从事使团的文书工作外，还应该进行国界地方的天文测定。

办完公务以后，我必须赶紧离开彼得堡前往西伯利亚，以便在途中不碰上泥泞的道路。在离去之前，我认为应该谒见我所尊敬的各位长官：米留亭、伊格纳提耶夫和斯加隆。这些高级长官方面对于我所担负的使命，表示显然的好意关怀和准备给予尽量协助，这使我深受感动，同时也鼓励了我，激发了我的毅力去从事我所面临的在塔城与中国人谈判和一般在中国西部国界的紧张活动。在我行前谒见伊格纳提耶夫伯爵的时候，他将根据双方协定划定俄国和中国西部国界事宜与中国人进行谈判程序的外交部训令转交给我。

同时他表示意见说，这个训令只是在大体上规定出行动的方向和计划，是与中国人当前谈判中主要应该掌握的。“但是，这个训令”，伊格纳提耶夫补充说，“不言而喻是不可能包括和涉及事务的一切细节，尤其是不可能预见到经常突然发生的一切偶然事故。总而言之，授予你完全的行动自由、极广泛的主动权，但是在失败时也必须负起最严肃的责任。因此，发给你的训令你也可以留在鄂木斯克，不必带往塔城。在任何场合，”伊格纳提耶夫说，“你始终可以得到我的协助和支持。”

此后不久，伊格纳提耶夫伯爵推荐我去谒见外交大臣、国务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他差不多对我说了同样的话。我是第一次见到戈尔恰科夫公爵。他是一位已经上了年岁的人，外表非常使人喜欢，待人彬彬有礼，使人感到一种纯粹的贵族大臣的印象。

他在当时，即在六十年代初，正处于他威望的极盛时代。所有的人对拥有实力的国务大臣都表示崇敬，他的周围有许多聪明和有才干的人员，其中占首要地位之一的，是伊格纳提耶夫伯爵。

戈尔恰科夫公爵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顺便说道，为了执

行我所担任的使命而选定的是专门熟悉事务的人员，因此对于他们作任何详细的指示显然都是多余的。“况且你已经从伊格纳提耶夫伯爵那里得到了必要的说明，他当然已使你对于我国外交部对当前划界事宜的意见有所了解。你要自己把这些指示以及在给你的训令中所表明的各项加以发挥，要酌量所遇到的情况和所处的环境办事。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这样重要的事务中和在这样辽远的国家边区内，丝毫也不拘束你的行动自由。”然后，作为俏皮话，戈尔恰科夫公爵补充说：“我想这是最好的。”我回答说，我很感谢殿下对我的信任，我要尽到自己的一切力量和能力，不辜负这种信任，并在当前与中国划分国界时达到美满的结果。

我向陆军部和外交部的一切官长人员告别，也与我在彼得堡所遇到的巴甫洛夫陆军中学的同学们辞行后，受到了他们诚恳祝愿一路平安和划界事宜胜利完成，于1862年2月离开了彼得堡。我乘坐火车到达弗拉基米尔城，再往前直到鄂木斯克，不得不搭乘长途大车。同时，已经开始出现泥泞道路，我很困难地在伏尔加河上通过从尼日尼到喀山这一段途程，在伏尔加河上的冰有时在我的重载大车下压出窟窿，但是一切都平安过去了，3月初我已经在鄂木斯克了。

第 三 篇

第 一 章

西伯利亚边界从额尔齐斯河向吉尔吉斯草原南部边区逐渐移动的历史概述。《北京条约》所订与中国西部接壤的国界的地形概要。

在俄国与中国所签订的边界条约中，即1689年《尼布楚条约》、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1728年《恰克图条约》和1858年《天津条约》中，关于中国西部各省与俄国毗邻领土的两国国界没有任何的肯定规定。《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的我国与中国接壤的东部国界，是到西方的沙宾达巴哈界牌为止。再向前进，俄国在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时期的领土，是与当时，即十八世纪初期为独立领地的准噶尔交界的。它的界限可以大致确定如下：在东方以科穆尔和哈密各城的经线为界；在西方以恰尔·古尔班河至其发源地、成吉思·套山东头、巴卡纳斯河下游和巴尔喀什湖北岸为界。准噶尔西部与恰尔·古尔班河流域中汗国吉尔吉斯人土地的这种分界的遗迹，直至现时还以下列的天然界线的名称保持下来：巴什哨所（上哨所），在恰尔·古尔班河上游与卡拉索尔湖对面；乌尔塔哨所和阿雅克哨所，彼此靠近，位置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到谢尔基奥波利大道上与阿希·库利斯克护桩相对处。在南方，准噶尔人的领地越过伊犁河，包括早在1683年准噶尔人所征服的东土耳其斯坦或小布哈拉在内（沙普·德奥特罗什著：《西伯利亚旅行记》，291

页)。

至于与西伯利亚邻接的北方国界，准噶尔的占有者经常向我国提出声明，要求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之间的土地，认为此处的国界是鄂木河，从河口到它的上游再往前向东直到鄂毕河为止。

由此可见，当我国与中国的东方国界早在1689年就已为《尼布楚条约》和后来在1727年为《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时，在西方的额尔齐斯河与阿尔泰之间同准噶尔的国界则还完全没有确定。这种不确定状况，已成为边境关系中的重大不便之处，在彼得大帝在位时由于一个完全偶然的情况，虽然没完全消除，但是已经消除了一部分。传闻在小布哈拉叶尔羌城郊区有大量的金矿，使彼得大帝为了寻找这些金矿而装备了以布赫戈列茨上校和利哈列夫将军为首的两个考察团。后者乘船越过斋桑湖，在流入斋桑湖东端的黑额尔齐斯河上游八十俄里处登了陆。不顾准噶尔人的抗议，甚至武装抵抗，这两个考察团行动的结果，于1716年至1719年由我国占领了额尔齐斯河沿线，并从鄂木斯克至石山口建立了堡垒与前哨。因此，从这个时候起额尔齐斯河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与准噶尔的实际国界，俄国在自己西伯利亚领土的南方已经获得了巩固的边界线。这样轻而易举地占领准噶尔人大部分土地，象我国于十七世纪初期迅速占有阿穆尔地方一样，它之所以能够作到，是由于当时中国人与准噶尔正在进行血战，它把中国人吸引开阿穆尔河，而把准噶尔人吸离开额尔齐斯河。利用这种情况，我国政府看来当时就决定在完全便于作为天然界线的面积广大的额尔齐斯河上固定下来。

额尔齐斯河按照它的地理位置来说，具有防线的一切优点，可以保卫我国西伯利亚南部国界，防止吉尔吉斯人的侵袭和防止准噶尔人的敌对破坏行动。同时，额尔齐斯河及分布其上的碉堡与堡垒，乃是向准噶尔与吉尔吉斯草原深入进军的可靠基地。

我国政府把额尔齐斯河掌握在自己权力之下，作为以后进攻行动的牢固基础的愿望，从1725年给我国驻中国公使拉古津斯基伯爵的训令中就可以看出，在该训令中写道："中国人早已向伊兹麦洛夫公使宣称，他们打算在额尔齐斯河建立堡垒和驻扎军队。如果现在他们再提出这一点，就要向他们宣告，额尔齐斯河自古以来就为俄罗斯帝国所有，在那里建有西伯利亚城市托波尔斯克，并建立其他许多堡垒与村镇。因此，大女皇帝陛下无论如何不能容许他们中国人在俄罗斯帝国领域内建立堡垒。"

从额尔齐斯河起在布赫塔马河河口，先与准噶尔然后与中国开始的国界，向东北方向伸展至沙宾达巴哈界牌，以山岭折断线或小阿尔泰山脉分水岭为假定标志，把鄂毕河上游河流地域与上叶尼塞河水系分别开来。

我国占有额尔齐斯河防线和在该线建立碉堡与堡垒，以及在这一军事防线设立俄国居民点，不能不使准噶尔占有者感到忧虑。这种情况更使他们感到恐危的一个情况是：他们看到，我国居民正以何等样的速度向南方推进，可以说已经突入了他们的领土。由于这种情况所发生的谈判，没有达成过关于国界的任何协议。

准噶尔人当时向我国提出的实质要求在于：按照他们的意见，往昔时代俄国与准噶尔之间的国界，曾经定为沿额尔齐斯河至鄂木河河口，然后沿鄂木河向上至鄂毕河。在这个地方似乎曾经设有鹿砦。从鄂毕河起在库兹涅茨克县附近，国界沿鄂毕河右面支流乌叶皮河（英尼亚河）或黑鄂木河向东进行。同时已经明定，双方不得逾越此地前进，似乎在这些地方都住有他们的人（准噶尔人）。但是从俄国方面越过了这些国界，然后建立了城市：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以及额尔齐斯河上的堡垒和工厂。

我国方面对于此事曾向准噶尔人指明，在这些地方从来都没有国界、鹿砦以及任何界牌。否则就会保存下来划界的字据和文

件。但是并没有这种文件，而且对它也没有任何需要，因为首先由哥萨克人和猎人，然后由政府本身占领西伯利亚南部以后，立即建立了往昔称为城堡的城市，而所有周围的外族人等都曾缴纳了皮毛实物税，按照当时的习惯，这就是完全顺从的表示。这样，俄国的领域就逐渐扩展到了鄂毕河的上游。从而也就没有任何需要在这些地方设立人为的国界，因为这里的界限是天然性的，可以说是以额尔齐斯河自然标明的，而在阿尔泰山则是以分水线标明的。至于说到在这些地方居住的外族游牧人等，准噶尔人要求对他们有管属权一节，那么这些外族人等的族长与准噶尔占有者只是处于从属关系，他们利用准噶尔占有者的衰弱，每遇适宜机会就脱离出来，宣誓加入俄罗斯国籍，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顺从，曾向我国当时的边界各城市派来人质：库兹涅茨克、托木斯克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因此，准噶尔人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没有理由的。相反，我国方面曾迭次向准噶尔人指出，他们接受从伏尔加河逃出的属于俄罗斯国籍的一万五千帐篷的卡尔梅克人进入自己境内，就已经提供了互不满意的口实。

但是准噶尔占有者对于这种说明并不满意，而且仍旧通过自己的使节继续要求让给所争议的土地。

我国方面也派出大使前往准噶尔，以便向准噶尔的统治者说明这些事情。例如，1722年曾派炮兵大尉文科夫斯基往谒我国当时公文中称为珲台吉的准噶尔占有者策妄阿拉布坦。在给文科夫斯基的训令中顺便说道，如果珲台吉象阿玉奇汗一样，愿意带同他的全部属民接受俄罗斯皇帝的国籍，或者处于他的保护之下，那么在这种场合，珲台吉可以指望它的协助，以反对中国人方面的任何敌对侵犯，不仅是以外交的方法，而且如果情况需要，也以武力协助。

1722年，准噶尔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中国康熙皇帝逝世，破坏

了这个计划。

继任皇帝雍正的政策虽然还没有最后明确，但是他大概已经决定，至少是在初期维持与准噶尔人的和平关系。为此目的，曾派遣中国使节携带和平建议往谒策妄阿拉布坦。

另一方面，在策妄阿拉布坦的亲信人员中形成了两派：一派愿意同俄罗斯国结成密切同盟，另一派以珲台吉·噶尔丹策零的长子和继承人为首，反对同俄国亲近。因此文科夫斯基使团，尽管作了很好的安排，而且住了很久(1722—1724年)，在政治方面实质上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

总之应当看到，我国使节同准噶尔人关于边界问题交涉的不能令人满意，是因准噶尔人在同我国交涉时采取了不信任、怀疑、不坦率和甚至是无耻欺骗的态度。这一切都使我国使节的地位极为困难。

要达到任何积极的结果，尤其是签订书面条约，在这些亚洲式两面性外交的独特方法情况下，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可能的。①

但是不能认为文科夫斯基使节的派遣，对于我国进一步与准噶尔人和中国人进行交涉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文科夫斯基本人和使团其他成员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有极为良好的作用。首先文科夫斯基查明了在准噶尔的我国被俘人数和他们的处境。在他所作的记事簿中，记录了关于准噶尔人的许多有趣的报道，这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性格和内部生活。记事簿中还附有极能满足当时要求的地图。②

1725年，彼得大帝逝世，而经过两年于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使我国与准噶尔人的往来发生中断，直至1732年，这时认为

---

① 维谢洛夫斯基：《向珲台吉派遣的文科夫斯基使团》，第46页。

② 文科夫斯基记事簿及其一切有趣味的附录的出版，我们应当感激维谢洛夫斯基教授。

必须再派我国使节往谒当时准噶尔统治者噶尔丹策零。人选定为乌格柳莫夫少校。

给他的命令是要求交还俄国从伏尔加逃出的卡尔梅克人，已经不是一万五千帐篷，而是两万帐篷了。乌格柳莫夫所进行的谈判看来并没有停止争论，也没有制止准噶尔当局对于西伯利亚边界土地的旧日要求。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这些争论和误会尖锐到了这样程度，以至按照智能和才干来说成为准噶尔卓越统治人之一的并在对蒙古人与中国人战争中获得几次胜利而著名的噶尔丹策零，开始要求我国拆毁石山口的堡垒。后来，看到他的一切强求毫无效果，便开始武装起来，以便侵入我国境内。为了抵抗准噶尔人的这种入侵，加强了分布在西伯利亚的我国军队，并任命金杰尔曼少将为西伯利亚所有防线的长官。

在我国与准噶尔的国界上的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没有继续很久：由于1745年噶尔丹策零的死亡而停止了。但是，准噶尔人关于拆除我国在额尔齐斯河所建立的并形成所谓额尔齐斯河防线的碉堡与堡垒的无理要求，在噶尔丹策零的各继承人中间也继续下来了。为了观察金星通过太阳，于1760年按照巴黎科学院的命令派往西伯利亚的阿巴特·萨普·德奥特罗什，在他的西伯利亚旅行论文中叙述说，他于1761年即中国人彻底击溃准噶尔以后，曾在托波尔斯克看到两个使节人员，那是在准噶尔最后统治者阿穆尔萨纳的一个前任者的时候被派往彼得堡的，他们的使命是要求拆毁我国在额尔齐斯河防线上的一切堡垒。

总而言之，我国与准噶尔人关于国界问题的一切争论和误会，都没有任何的实际结果，主要是由于准噶尔人不管如何迭次企图以武力支持自己的要求，但他们由于与自己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中国人的频繁战争，就经常放弃了这种企图。因此，我国与准噶尔人之间所产生的一切纠纷，不仅没有导致我国同他们的完全

决裂，而且使他们甚至需要请求我国与他们达成协定，象第二篇已经详细叙述的，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来对抗中国人。

1757—1758年，中国人与准噶尔人的最后一次战争，如所共知，差不多把准噶尔人全部消灭了。只有几千人得以逃避中国人的血腥复仇，进入我国境内。一部分人被迁往伏尔加河，同他们的同族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合在一起。另一部分人愿意信奉东正教的，被安置在斯塔夫罗波尔城（现为萨马尔斯克省）附近，与在该处落户的已经领受洗礼的卡尔梅克人同住。旧日繁盛的准噶尔差不多变成完全荒漠了，准噶尔合并入中华帝国后被称为西部边区（西域）。

这个以完全毁灭一个在某时曾强有力的中亚细亚国家为结局的巨大政治事变，曾经发生在我国西伯利亚边区附近，即发生在与俄罗斯领土接壤的地方，也可以说在我们目睹之下发生，可是在我们这里却好象是完全没有看到似的。

毫无疑义，关于这个政治事变由于逃到我国的准噶尔人的传说，在西伯利亚已经很快地人所共知了。但是在彼得堡对于这个事件却相当冷淡，我们未能在政治关系上从这个政治事变中取得任何重大的利益。在西欧方面，关于准噶尔人所遭遇的命运是很晚才知道的。

萨普·德奥特罗什关于这个事件是这样描写的："在那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里）发生了巨大的事件，而我们却还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准噶尔的政治事变是一个使人惊异的例证。这个民族占有广阔的土地，幅员之大超过法国，在连续十年几乎未曾间断的战争以后，于1757年被中国人消灭了。这个事件于1761年才为人所共知，而在1762年12月14日才在彼得堡公布。"

象欧洲的其他部分一样，我对于这个政治事变也少有了解，我是在西伯利亚旅行时从卡尔梅克人那里得悉的，他们逃脱了中国

人以及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俄国人的残酷迫害(萨普·德奥特罗什：《卡尔梅克人—准噶尔人的革命》,第一卷,第290—314页)。

不容怀疑,为了准备与准噶尔的战争,中国乾隆皇帝为了使这个重要事业达到顺利的结局,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所面临的艰难任务却大大减轻了，因为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在准噶尔发生了内讧，中国人得以巧妙地加以利用。

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述和当时若干官方情报来判断,无法否认,如果没有这些内讧，看来中国人是不可能战胜准噶尔人的。

在征服了准噶尔人之后，中国人得以摆脱了曾与之进行如此长期血腥战争的不安分的邻人，立即注意到对重新合并的边疆进行组织,保障它的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在这些打算下,乾隆皇帝发下了西部边区垦殖和武装保卫国界的命令。全部地方在天山北面的称为北疆(天山北路)，另一方面的称为南疆(天山南路)。在伊犁河上准噶尔汗木棚所在之处,建立了惠远城或伊犁城(现时的伊宁城),随后在乌尔·雅尔地方贴近现时的乌尔扎尔哥萨克村庄处,也出现了塔尔巴哈台城,后来被迁到往东一百二十俄里的现在这个地方。成立两个管辖区:伊犁区和塔尔巴哈台区,各设有行政管理中心：伊犁(伊宁)和塔尔巴哈台(塔城)。在这些管辖区的西部边区,沿着与吉尔吉斯人土地的假定国界线,建立了常设卡伦线(常设哨所),在伊犁管辖区内沿着该线出现了察哈尔人、锡伯人、索伦人、后来也有卡尔梅克人等的军人居住点。随同准噶尔的被征服和移归中国政权之下，在我国与准噶尔人之间迭次发生的一切争论、误会和不安,仿佛是应该停息了。但是,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在中国人成为我们的邻居以后,这些争论和误会不仅没有停息,反而更加严重了，超过了我们与准噶尔统治者策妄阿拉布坦，尤其是噶尔丹策零所发生过的一切纷争。中国人则陶醉于对准噶尔人从前的骇人力量获得的胜利和感到兴高采烈，在他们领土的西部

也同我国成为邻居后，就立刻以极端自高自大和傲慢的态度声明自己的几项边界问题的要求。这样，就象准噶尔统治者时期所曾发生过的那样，又开始了新的边界争端与不和。

首先是中国人直接向政府枢密院致送文件(公文)，援引《布连斯奇条约》关于逃犯的条款为理由，要求我国交出逃入俄国的准噶尔最后汗王阿穆尔萨纳和一切贵族人等。对此，我国方面向他们申明，《布连斯奇条约》的该项条款乃是对中国人中的逃犯而言的。因而该准噶尔人等系在中国最后征服以前进入我国境内，从而当时还没有成为中国的属民，所以对于他们不能适用该项条款的规定。而在1731年中国使节住在彼得堡的时候，关于此事也没有缔结任何约定。但是，对于此事尽管已经作出公正的驳复，以及已经把因患天花在托波尔斯克死亡的阿穆尔萨纳汗的遗骨运至恰克图给中国人验看，他们并没有停止对我国的极不公正的和侮辱性的要求。例如，在关于边界问题的文件中，每遇适当的机会，他们就尽力对中汗国和大汗国吉尔吉斯人所占有的土地和对这一民族的管属权提出自己的要求，声言吉尔吉斯汗阿勃莱已经带同所属的中汗国吉尔吉斯人自愿地归顺为中国的属民。实际上，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吉尔吉斯人接受了背叛中国人的准噶尔的最后一个汗王阿穆尔萨纳的保护之后，这种行为自然就引起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因此，为了惩罚阿勃莱汗属下的吉尔吉斯人，就向草原派遣了中国军队。阿勃莱汗被这些军队连续几次的击败以后，为了避免彻底崩溃，不顾自己归入俄国属民的誓言，决定转为中国的属民，因此这种归属与其说象中国人向我国所声明的那样是自愿的，不如说是强迫的。总而言之，应当看到，中国人在征服准噶尔人以后，不久就竭尽全力来扩大和巩固对于吉尔吉斯人的统治。为了最快地达到预定目的，中国人千方百计地力图诱引主要的吉尔吉斯人族长归向自己，毫不吝惜地赠予礼物和荣誉衔名。例如，在

中国以勇敢闻名的大汗国苏丹埃拉利，大约于1770年曾由中国乾隆皇帝处获得“御前勇士”的头衔。率领自己部落在阿亚古斯河游牧的苏丹萨尔特·尤仁，曾经获得公的称号，即中华帝国王公的爵位。

可是，于1734年尚为我国属民的中汗国吉尔吉斯人各苏丹和显贵们，也曾从我国政府获得俸金和赠品，也依我国政府的选拔任为汗王，发给汗王爵位的证书。中国人从自己方面也将吉尔吉斯人认作自己的属民，将他们所选定的苏丹升任为汗王，尽管如此，这些苏丹差不多于同时都派遣代表团到彼得堡，表示对于俄罗斯国的顺从。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人把这些吉尔吉斯苏丹升任为汗王，他们表示了同意，而毫不顾及他们同时已经我国政府的委任担任了公职。

例如，1824年被任命为科克切托夫区苏丹长的哈贝杜拉·瓦利哈诺夫，曾经前往巴彦村，因为中国军队在那里宣布他为中汗国汗王。因此必须派遣哥萨克队伍前往巴彦村，以便驱逐中国人和捕捉哈贝杜拉，这些也都实行了。

从上述的情形可以看出，尽管从1734年起吉尔吉斯人已经成为俄国属民，但是在他们中实行应有的制度和管理以及征收赋税以前，实际上他们只是我国名义上的属民。

吉尔吉斯的各苏丹利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表示表面上服从俄罗斯国，同时却是中国的公开拥护者。因此吉尔吉斯人的国籍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实质上是骗人的幌子。不但如此：吉尔吉斯民族的两面性统治者，在为中国政府服务时，同时却领取俄国政府的津贴，频繁地劫掠派往塔什干的我国商队，例如曾经住在科克切托夫区的瓦利伊汗就是这样的一个。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避免过早地采取过份严厉的办法去反对吉尔吉斯人的这种背信弃义行为，因为在幅员广阔草地上

的吉尔吉斯人牧区里，我们在当时还没有任何的根据地。同时，采用这种坚决的办法，我们会在上百万全部吉尔吉斯人中间激起仇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同时避免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尽管他们还是照旧提出对吉尔吉斯人土地的要求。我们不可不注意到，如果这种冲突采取很大规模的时候，经验证明，所发生的纠纷就会不可避免地有害于给国库带来千百万关税收入的我国恰克图通商。此外，保持当时同中国的和平关系，还会大大便于在最近的将来实现我国政府的企图，同中国西部各城市塔城和伊宁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也会给国库带来巨额的关税收入，正如后来已经证实了的。因此决定在行动中遵循一些渐进步骤和慎重态度，不去惊扰中国人，但是同时必须贯彻始终地、可以说是渐渐地使他们理会到额尔齐斯河彼岸的一切土地，沿阿亚古斯、列普萨、科克佩克丁斯克各河流，并继续向前到斋桑湖，直至中国卡伦线，都是属于俄国的。为了实现这种企图，根据1831年12月和1832年1月举行的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的讨论决议，曾决定同时向西西伯利亚总督发命令："（1）仍旧在科克佩克特天然界线和阿亚古斯区域的原来地点保持我国驻扎部队，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向中国卡伦线移动；（2）如果中国人想用武力迫使我们放弃这些地点，则应把这种行为不看做是政府的行动，而是地方官长的擅自行为，坚决向他表示，既然同中国处于和平友好关系之中，我国地方守卫部队奉到严格命令，一方面无论如何不得破坏这种和平，另一方面没有经过两国政府之间的互相正式交涉，不得退出这些地点。如果这种办法毫无效果，则非在优势武力之下不得退出。"

很明显，所有这些具有暂时性质的办法，实质上都是过渡性的。为了最终地巩固我国对吉尔吉斯人的统治权和势力，我们在草原本身必须有坚固的立足点，因此也就必须在草原内建立许多据点，使武装居民，即哥萨克人落户居住。为这一点打下基础的，

是根据1822年所颁行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这是按照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伯爵的意见和直接指示所制定的），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了所谓外围区。各区的建立是逐渐进行的，在1824年到1839年时期，建立了科克切托夫、卡尔卡拉林斯克、巴彦村，以及阿亚古斯和科克佩克特各区。从建立这些区域的时候起，假定的国界线从额尔齐斯河立刻就向南方推进，一方面达到楚河，另一方面达到流入斋桑湖的科克佩克丁斯克河，而从阿亚古斯河则转向列普萨河，并渐渐向南推进达到卡拉塔尔河。从当时的西伯利亚高尔基和额尔齐斯河边界线向南推进的这种国界线的移动，是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第316条所规定的，该条明定："西伯利亚边界线在防卫的意义上不是永久的设施；但是随着吉尔吉斯人所占土地上秩序的普遍建立，这种防卫可以向前推进，最后应该在实际的国界线上建立经常的设施为止。"

从建立科帕尔堡垒和在这个地方使比斯克防线移来的二百名哥萨克人落户时起，假定国界线更向前推进，即已经达到了伊犁河。这样一来，在1846年到1847年时期，我国已经最终地占领了所谓谢米列钦斯克边区，这个名称是按照灌溉它的七条河流而取得的，即：阿亚古斯河、列普萨河、阿克苏河、巴斯坎河、科克斯河、卡拉塔尔河和伊犁河。然后，就要越过伊犁河向南推进到伊塞克湖，在富饶的外伊犁边区固定下来。可是，中国人仍旧继续监视我国向草原内部前进活动的每一步骤，并千方百计地尽力阻碍这种活动。例如，中国人曾经提出抗议，反对我国占领沿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的防线，而从自己方面却尽力把卡伦向吉尔吉斯土地的内部推进，即从他们的常设卡伦线向西推进。这样就形成了前列卡伦线，后来中国人就主张按这条线来划分国界，而违反了《北京条约》的规定。1825年，在卡拉塔尔河上建筑了一所供忠于俄国的吉尔吉斯苏丹休基·阿勃莱汉诺夫居住的房屋，为此曾派遣由舒宾上校

率领的部队前往该处。由于中国人的抗议，我国于第二年拆除了这些建筑。1846年占领科帕尔地方，也不是没有遇到中国人方面的抗议。伊犁边区（伊宁边区）的地方官员，由于中国人所常有的永远多疑的习性，以及英国代表的教唆，曾经企图阻碍我国进一步向伊犁河前进和占领伊犁河盆地。英国政治代表阿特金森装作学者旅行家的样子（实际上他从来也不是学者旅行家），于四十年代也曾访问过我国当时在科帕尔所建立的居民点。阿特金森也到过伊宁，在那里大概是尽力在中国和俄国地方当局之间散布不和的种子。有一个情况可以确证这一点，那就是：大约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十分突然地想起对于我国占领科帕尔地方和在似乎并非属于我国的土地上建筑堡垒与哥萨克村庄提出抗议。关于此事彼得堡曾经收到北京理藩院致枢密院的质问书。

外交部认为，中国人对我国皇帝属民吉尔吉斯人游牧的谢米列钦斯克边区提出要求，当然从我国方面不应当承认是有根据的：没有任何条约规定在该处有中国的国界。中国卡伦线由于没有其他最明显的界线，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有一条线可以认为边界线。我国在谢米列钦斯克边区科帕尔地方所建筑的堡垒，距离他们的卡伦线是很远的。考虑到这一点，我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中国人所提出的要求，本来可以立即声明他们的强求完全没有根据，并作出坚决的答复。但是，我国外交部由于各种考虑，认为最好初次以作不确定的答复为限，这是为了争取时间并有机会准备应付各种意外事故。

基于这种考虑，曾向西西伯利亚总督将军戈尔恰科夫公爵传下皇帝的谕旨，要特别注意与中国领土毗连的我国草原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在中国人方面将来有任何敌对破坏行为的时候，保证草原的安全。尽管外交部认为当时这种破坏行为是不会有的，而且大概一切事故都应当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但是也同样认为

采取必要的慎重办法，不动声色、不给中国人以任何合情合理的借口，是明智的。我国与浩罕人的问题，看来可能成为必需采取处理的这种合理借口，而使人毫不怀疑它的真实目的。

戈尔恰科夫公爵赶快采取适应草原地区地方方式的审慎的命令办法：1850年将科帕尔堡垒作成防卫状况，并在接近中国国界的各据点充实了粮食储备，并加强了军队。

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适应当时情况的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尤其是当时在部里已注意到派遣我国代表前往伊宁，以便同中国人进行关于与中国西部各城市建立正常通商关系的谈判。

实现有利于草原地区和全部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政府这些重要企图迟缓的原因，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最后完成伊犁盆地的占领和在草原上游牧的大汗国吉尔吉斯人中间建立应有的秩序和治安，而没有秩序和治安，在草原上进行正常的商业往来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人对我国向中亚细亚各地的前进活动，以及对占领谢米列钦斯克边区和后来占领外伊犁边区的干涉，都经由外交途径加以消除了。根据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在吉尔吉斯草原各处设立外围区，甚至没有经过同中国人的任何预先交涉就实行了。下述的情况也促成了这一点，即在四十年代中国政权对吉尔吉斯人的旧日吸引力，不仅在中汗国而且在大汗国都已经开始显著地减弱，而逐渐转到了浩罕人方面。利用浩罕人的协助和庇护，自称为穆罕默德后代的哈治人侵入了隶属于中国的东土耳其斯坦，并在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居民中间鼓动起反对中国人的不满情绪。这些事件强烈地动摇了中国政权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威信，使伊宁官长对于几乎同时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所发生的事件转移了注意力。

同时不仅在中国边区，而且在北京本身也显然暴露了当时中

国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的最初迹象，在道光皇帝在位时期(1820—1850年)就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在帝国各地发生了由遍布于国内的秘密会社所组织的叛乱和起义。据伦敦传教会的成员麦高恩[1]说，其中最大的秘密会是"三合会"，曾在中国道光皇帝继承人青年皇帝咸丰在位时期发生的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推翻全国不满的大清王朝。起义获得了惊人的胜利。1853年叛军占领了南京，作为起义者的主要中心和首都。

叛军没有遇到政府军方面的强烈抵抗，向北方移动，渡过黄河，到达天津，威胁了北京本身。但是，太平天国军采取了掠夺和强暴行为，从而削弱了自己，政府军利用了这一点得以战胜太平天国军，并收复南京。但是在中国内部，惊扰不安的情况并没有很快平息下来。最后同英国，随后同法国的战争和付出巨额的赔款，都大大地削弱了中国，它是在这些事件的老早以前就已经由于同准噶尔人的血腥战争而受到震荡的。在乾隆皇帝在位时期，击溃准噶尔曾经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并耗费巨额的金钱，据中国人自己说，这是由从前高度强盛转向逐渐衰落的开始。乾隆(1736—1796年)的继承皇帝：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0—1850年)、咸丰(1850—1861年)和同治(1861—1875年)，都没有满洲朝代最初各位皇帝的智能与才干，不能为中国回复已经失去的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作用。这一切情况都在某种程度上便利了我国向伊犁河彼岸和深入中亚细亚进行攻击活动。尽管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遇到浩罕人方面的一些抵抗，但是在占领了他们所占据的堡垒和在无掩蔽的田野里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以后，浩罕国军队就完全被消灭了。这一切情况就使我们占领了外楚伊斯克地区，然后也征服了全部土耳其斯坦。

---

① 《俄罗斯导报》，1898年，第5卷。

把我国西伯利亚国界从额尔齐斯河推向中亚细亚内部的所有政治性事件的前后进程，就是这样。我认为应当把这些事件预先作出简明的历史概述，以便阐明我所应当积极参加的同中国人的划界事宜中后来的进展。

从占领外伊犁边区和伊塞克湖山间盆地的时候起，我们已经进入中亚细亚高原地带的北部地区，这时当然要发生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停止下来？

早在1864年，前任外交大臣、国务大臣戈尔恰科夫就已经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在同年11月21日他的著名通令中说，文明国家的活动，当他们象俄国那样，必须同半野蛮的、迁移无定的、没有社会组织的各民族接触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在于善于停止下来。

如果专就中国西部考察这个问题，那么从上述由额尔齐斯河逐渐向南移动的西伯利亚边界线的历史概况来看，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从占领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时候起，俄罗斯的领域在吉尔吉斯草原的东南部已经密接阿拉套山脉，而在南部已经密接中亚细亚的巨大山脉之一的天山，关于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停止下来的问题，可以说是已经自然解决了。把俄罗斯领域推向这些壮阔的自然界线的时间和情况，明显地指出这是同中国西部接壤的可靠国界的最适合的条件。剩下的工作，是要把我国实际上已经占领的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土地，通过庄严的国际条约归并入俄罗斯的领域。这个目的由伊格纳提耶夫伯爵于1860年成功地缔结了《北京条约》而圆满地达到了，根据该项条约，初次规定了俄国与中国西部之间的国界。

1860年缔结这个条约之所以成功，说到时间是最凑巧不过了，因为这是同上面所详细叙述过的俄国在外伊犁边区建立巩固政权和从我国领域内彻底逐出了浩罕人的时期恰好是相吻合的。

我们在帝国的这个地区获得如此光辉的成果，应当归功于外交部所发指令的根据充足，也应归功于西西伯利亚主要官长在当地认真坚定的执行。

有赖于西西伯利亚前任各总督卡普采维奇将军、维利亚米诺夫将军、公爵戈尔恰科夫将军，以及后任总督加斯弗尔德将军的智慧、坚定、毅力和对于事业的远大的国家观点，外交部在我们深入中亚细亚的前进活动上所经常指示的应当采取渐进行动和审慎行事的原则，得到了确切的和特别审慎的遵守。这种政策对于我们必须作出行动时的那些情况和环境是再适合不过了。从额尔齐斯河越过边界向南方前进，必须一步一步地逐渐占有据点、移入武装居民和建立防卫线，在防线上逐步准备继续前进活动的工具和物质资料。从比斯克防线迁到科帕尔的哥萨克人，在草原落户的初期，同当地的吉尔吉斯人游牧居民是格格不入的，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因此某些畜牧业产品从来都可以从吉尔吉斯人手中即在当地获得的，却要从几百俄里以外的额尔齐斯河运来。在建筑私人和公家房屋时，最初时期也曾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大部分的建筑材料，都是费很大力量从内地各省运来的。石灰是从谢米巴拉丁斯克运来的，麻刀是从秋明省运来的，甚至木料也要从额尔齐斯河运来。在科帕尔地方，这些材料是价格很昂贵的。从额尔齐斯河到伊塞克湖的途程很远，长达一千五百俄里，当时的草原差不多都是沙漠性质的，迁入草原的俄国居民对边区的地方条件以及吉尔吉斯人的游牧生活习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的忠诚不是完全可靠的），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急剧前进的活动和迅速占据地区，都是极端困难的，而且在实质上甚至是无益的。这会需要耗费巨额的钱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中国人的不安，而在中国人和浩罕人方面的教唆之下，会激起大汗国和吉科卡门汗国吉尔吉斯人的风潮。

这一切原可使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次要活动，而离开主要目的。可是，我们尽力遵循与中国人的和平政策，却能在当时以巧妙的方法逐渐消除他们对于吉尔吉斯人问题的一切干涉活动。

对《北京条约》缔结以前的事件的前后进程，作了简明的概述后，现在我来叙述该项条约所规定的同中国西部的国界。

根据《北京条约》，俄国与中国西部之间的界线方向，其大部分是以鲜明的天然界限标明的。在北部从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的沙宾达巴哈界牌的地方开始，在这里现时正是托木斯克和叶尼塞省与中国交界之处，直至布赫塔马河的上游为止，国界应当沿着小阿尔泰山脉的山岭折断线或分水岭进行，这些以非正式名称而著名的山岭是：塔斯克拉、坎捷基林、赛留格木、桑久尔、萨彦和其他等等。从布赫塔马河上游起，差不多直至天山山脉，国界只是在一处形成天然界限，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国界是沿着高大的阿拉套山脉山脊进行的。在国界线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有中国常设卡伦线标明的那些地段，它都是以人为性质为主。

只是在那些国界地段才出现与这种主要性质不大的倾斜，即国界在该处是沿着次要山脉的山顶进行的：塔尔巴哈台山（从布尔古苏台山到哈巴尔·阿苏山口）和格根河上游的捷麦尔利克山，以及深入山间河流图尔根、达拉图和纳伦等处。最后，在最后的南部国界地段，国界是以中亚细亚最大山脉之一的天山来标明的，那些地方大大地超过了永恒积雪的界线。

这个山脉所标明的国界线，在西部止于当时原来的浩罕国界（为现时土耳其斯坦总督管辖的东部边区），而与天山南部线（天山南路）以东土耳其斯坦或小布哈拉名称而著名的中国西南部领土相接壤。

从上面所引叙的中国西部国界的简明地形概述可以看出，在某些地段，特别是在极北部和南部，国界线是以巨大山脉的山脊来

标明的，象一堵巨大的墙壁一样，天然地耸立在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国家之间。另一方面，在这些国界山脉发源的和流向两个相反方向的各河流，清楚地和明显地标志着它们所灌溉的土地归属于这一或那一国家。因此，这个天然界线同时构成了划分两国领域的山志学和水文学上的界限。

但是除了上述地形性质的良好条件以外，从沙宾达巴哈到布赫塔马河上游的国界北部地段在防卫方面具有重大的优点，在缔结《北京条约》时代，这些地方的防卫是完全不存在的。也许，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界，象在俄国和中国遥远边区内所存在的那样，享有这种比较安宁的状态，而同时也不需要任何的武装防卫。我国的著名旅行家普·奇哈切夫曾于1843年访问过阿尔泰边区，著有题为《东方阿尔泰地方的学术旅行》的卓越记述，是这样说的："大概在这些从来不能成为外交辩论对象或战场的地方，从来也没有被守卫岗哨来破坏这里的宁静状态。在这些旷无人烟的沙漠里失去了一切细小的人类差异；在这里没有法庭，也没有民族；在这里直接赞美着宇宙的伟大主宰者本身，除了刻画在造物主各种物品上的形象以外，不知道别的形象。"

奇哈切夫关于中国东方国界的意义的意见也同样具有充分的理由，它可以完全适用于以鲜明天然界限标明的那一部分中国西部国界。

奇哈切夫说道："如果在两种关系上来观察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国界，即从它的天然巩固性和稳定性方面观察，以及在沿边居住的外族人的自然性质方面观察，那就不能不确信，也许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如此巨大长度的国界，在它的安全和稳定关系上会具备这样良好的条件。"

第 二 章

关于分布在西部国界上的中国卡伦线。 中国人视察国界和在国界上派驻我国部队的必要性。 我从鄂木斯克出发前往中国国界。 为使中国部队撤离其常设卡伦线退入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地区所采取的办法。 哈布齐贤企图在外伊犁边区东南部潜入我国境内，被普罗岑科大尉所率领的参谋本部队伍所阻止，被迫离去中国常设卡伦线。

从以上所述《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可以看出，从布赫塔马河上游至阿拉套岭向南，以及从南端至特穆尔里克河发源处的那一部分国界，都没有形成连续不断的天然界限，而只是有些地方沿着次要的山岭支脉和河流的方向进行。这一段国界在它的大部分面积上是以中国的卡伦线标明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帝国西部境内建立卡伦线，是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准噶尔被他们征服以后实行的。准噶尔人领域的西部边区，在它后面是中汗国吉尔吉斯人的土地，如上所述，大体上是以恰尔·古尔班河流域、卡尔宾斯克山岭西部支脉、成吉思·套山东部边区和巴尔喀什湖北岸标明的。吉尔吉斯人利用乾隆皇帝准许在巴尔喀什湖东部游牧，开始将自己的牧区逐渐向更东的方向扩展。为了阻止吉尔吉斯部族向东前进的活动，制止他们转向西部边区即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地区，同时并为保卫边区内的安全和治安，中国政府认为必须在自己领域的西部境内设置哨所或卡伦，由地方部队占用。所有的卡伦分为两类：

（1）边界卡伦，按照它的方向进行国界的巡查或视察。这种卡伦对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政府似乎就是用它们来为自己的帝国划定西部国界。因此这种卡伦就称为常设卡伦，并且从来也不从这一个地点移往其他的地点。

（2）移动卡伦或可撤卡伦，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纪初为了暂时在某一个偏僻地点进行监视，或为占领吉尔吉斯人所属草原地区的一些地点而设置的，因此这些卡伦也就突出于常设卡伦线之外。显然，移动卡伦正如其本身的名称所指出的，是从一个地点移往另一地点，或者是只在一定的季节时期，例如为夏季设置的，过后就撤除了。因此在常设卡伦的前面形成了一连串新的前列卡伦。这种双重的卡伦线，特别是在同中国西部国界接壤的那一部分边疆地区最为显著，它形成了斋桑地区的国界，即形成了位置在斋桑湖北部和南部的地点。这样，从塔城向北就有两条卡伦线：一条卡伦线从什伯图和波利齐尔经过布尔古苏台山口，在塔尔巴哈台山岭中一直向北经过下列卡伦：乌兰布拉克（奇利克蒂）、察罕鄂博、奥顿河（乌伊杰涅）、库拉曼（乌利雅苏图）、甘·奇甘·莫多（科斯·阿加奇）和奥兰·布拉克（基兹利·卡英）直至黑额尔齐斯河，在玛尼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卡伦处横渡过去，然后向东北方向进行，顺序如下：哈尔卓尔·巴什、塔本·波利齐尔、昌吉思台、乌尔鲁、增达哈图、乌凯克、哈鲁图、奥伊霍尔、索约克和科克。从昌吉思台向西分布的前列或移动的卡伦有下列各处：纳伦、库兰·阿奇尔哈、霍尼·麦拉胡（在额尔齐斯河右岸）和霍伊·麦拉胡（在额尔齐斯河左岸相对立）。

看来，塔城的中国地方长官早在很早的时期，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已经决定建立前列的卡伦连锁，这条连锁从塔尔巴哈台山脉向西北进行，从西面环绕斋桑湖和白额尔齐斯河或下额尔齐斯河，在下列各卡伦处横渡过去：霍伊·麦拉胡（塔尔巴哈台管区）和

霍尼·麦拉胡(科布多管区)。前列卡伦连锁然后转向纳伦河盆地和布赫塔马河上游，与昌吉思台卡伦处的常设卡伦线联结起来。在上述方向建立前列卡伦之后，在签订《北京条约》时原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内的现时科克佩克丁斯克州东部地区，就划归中国领土了。

早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中国人为了确定自己对这些土地的权利和巩固自己对当地吉尔吉斯人的势力，已经开始每年视察国界，这种视察不是按照常设卡伦的方向进行，而是按照前列卡伦方向进行的。为此，每到春季的时候，中国部队就在地方参赞大臣的率领下，从科布多、塔城和伊宁各城市出动，沿着前列卡伦线甚至更向西进行，并且这些部队的进行路线形成了一条特别的边界线，把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东部地区都包括进去了。各该部队在自己管区的交界地点会合时，向例是交换表报。后来，由于俄国在吉尔吉斯草原的统治和势力日益扩大，已经建立了科帕尔(1847年)和维尔内(1855年)堡垒，中国人虽然仍旧继续派出部队视察国界，但已不能从卡伦线向西进入我国领域。这是因为他们每次企图越过卡伦线进行，以及同时将自己的前列卡伦移向吉尔吉斯土地内部时，就立即向由参赞大臣或其他高级官员护卫队组成的中国边疆队伍派出我国哥萨克部队，他们阻止了中国人的进行，不放他们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在进行长时间的反对、争吵和各种辩论之后，就返回自己境内。

因此，这样的国界视察久而久之渐渐地只成了一种形式，有时甚至完全不进行了。

但是从1862年起，在我国和中国委员应该在塔城举行谈判的时候，中国人又以前所未有的坚持和毅力，从斋桑湖至伊塞克湖在全部的边界地带恢复了国界视察。根据所得到的情报，从1862年春初起，中国人的大批部队，其中有些部队如伊宁部队中国人数达

八百名之多，沿途又有吉尔吉斯骑手数百人归附一起，从塔城和伊宁各城市出发，向我国境内前进。看来，中国人是打算借口视察国界，表示自己对吉尔吉斯人大部分土地的权利，并将国界从中国西部两个主要行政中心塔城和伊宁尽量向西方最远的地方推进。他们在吉尔吉斯人土地上的活动，是希望表现自己对这一民族的权利和势力，使它倾向到自己方面来。为了最迅速地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人同时派遣了自己的秘密代表前往吉尔吉斯游牧区，在大汗国各苏丹和吉科卡门汗国各大牧主之间大量地散发了传单。为了同样目的，早在1862年冬季，伊犁(伊宁)官长曾经准许大汗国吉尔吉斯人阿特班部族在伊犁河北方、甚至越过霍尔果斯城向伊宁城东方，以及在伊犁河南方越过察林河等处进行游牧，这是过去从来都是不许可的。除此以外，伊犁的官长尽力使自己属下的卡尔梅克人在特克斯河上游地方居住，并且将早在伊宁城郊区落户的卡尔梅克人也遣送到那里去，而从前特克斯河上游地方向来是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勃沽部族的牧区，卡尔梅克人是在更向东的地方游牧的。我国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所送到的关于中国人这种活动的报告，是与阿拉托夫地区和大汗国吉尔吉斯官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上校的同样密报相一致的。按照他的命令，为了监视中国人，曾派出哥萨克部队驻在国界附近的卡尔卡尔河岸，由勃留门塔利上尉统率。

由于从中国国界方面获得这种纷扰不安的消息，我赶快于1862年春初从鄂木斯克出发前往中国国界地方，以便就地指导进行地形测量工作和在国界上最有利地布置部队。我这次经行的道路是通过谢米巴拉丁斯克和谢尔基奥波利前往科帕尔。我打算从这里直接前往中国国界地方，在该处附近，在科克苏伊斯克的边区哥萨克人居民村(距离鄂木斯克一千四百俄里)，按照互相预先的约定，我应当同我国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会见。沿途上，我看到

迎接我的吉尔吉斯各苏丹和显要人物在同我谈话时，有一些矜持之意，这也确证了上述关于中国人在沿边吉尔吉斯人中间进行阴谋活动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占领边界已经完全必要了。我们应当及时用军队占领沿边地带最重要的地点，这是我们所必须保持的按照《北京条约》应当划归俄国的领土。

此外，由于借口视察国界而在我国领土内出现大批的中国部队，必须不让中国人越过他们的常设卡伦线，根据是按照《北京条约》，这条卡伦线的本身就用来标明国界的。因此，我们有某些根据把越过常设卡伦线认为是侵犯俄国领土。但是在命令我国军队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州①，即从斋桑湖至伊塞克湖在与中国西部的全部国界上布置以前，按照伊犁将军命令从伊宁派出的中国军队已经一方面侵入了伊塞克湖，另一方面侵入了卡拉塔尔河，打算向维尔内和科帕尔堡垒处前进。中国各部队的行动，其中一个部队曾经联合有三百名武装的卡尔梅克人，是公然敌对的。这些部队中，有一个部队是由上述1861年在塔城谈判时因同我发生冲突而闻名的哈布齐贤将军率领的，其侵入我国境内的企图，被参谋本部普罗岑科大尉所统率的我国部队用理智的和坚决的行动阻止住了。该武官制止了中国官长的粗鲁无礼的顽强态度，并且未发一枪而迫使大批的中国部队离开我国境内。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普罗岑科大尉的部队在外伊犁边区东南部靠近伊塞克湖地方所有的行动，应当说，在1862年春初，哈布齐贤带领的部队人数达八百名之多，越过中国的常设卡伦线，前往卡尔卡尔河地方，如所共知，这条河流与格根河合流后形成察林河。驻在卡尔卡尔河的勃留门塔利上尉所统率的我国少数部队，曾被大批的中国部队包围。中国人诱引了阿德班诺夫斯基部族首领萨乌鲁克归顺自己后，强迫他武

① 现时的全部谢米列钦斯克州，在当时，也包括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区域内。

装了二百名吉尔吉斯人，占据了我国部队所占阵地附近的一切冲要地点。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截夺邮件，并劫取为供给我国和平的吉尔吉斯人而向我国部队运来的粮食。最后，中国人得悉我国部队中有大汗国和吉科卡门汗国吉尔吉斯人的各苏丹和显要人物，曾迭次企图从各方面包围部队，捕捉苏丹捷泽克和大牧主萨尔佩克。但是这种企图都没有成功，中国人得到情报，知道我国军队正向卡尔卡尔河出动，去支援驻在该处的勃留门塔利上尉的部队，就从他们所占据的阵地上撤退，并且沿着卡尔卡尔河向上前往山区，然后陡然转向库穆尔奇和特克斯地方而去。前往支援勃留门塔利上尉部队的军队，组成了普罗岑科大尉的部队。

普罗岑科大尉带同所属部队沿伊塞克湖北岸前进时，得到情报说，在卡尔卡尔河上的勃留门塔利上尉部队处于困难状态，在中国人退去之后，该部队正从卡尔卡尔河向伊塞克湖前进。5月18日，两个部队在卡拉巴特帕克河汇合了。普罗岑科大尉在这里得到侦察员的情报说，向国界推进的全部中国军队也经由桑·塔什山口向伊塞克湖前进，并且已经驻在流入库克·库鲁松角迤北的伊塞克湖东端的图普河地方。我国部队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从卡拉巴特帕克河上撤除营垒，前往桑·塔什地方。在部队到达预定过夜的钦·塔尔河的时候，在部队的侧翼发现了从附近山谷出动的一批武装的中国人。派哥萨克少尉格里亚兹诺夫带领一连哥萨克兵士前去捕捉中国人，很快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并将他们带到我国营垒，立刻把他们解除了武装。据这些被俘人员供述，他们为数二十人，有三名武官带领，被派遣来搜集关于俄国部队究在什么地方的情报。经过进一步讯问得悉，中国部队兵力为一千人，其中中国人八百名，吉尔吉斯人二百名，是在著名的将军哈布齐贤率领下从伊宁派往我国境内的。

5月20日，还在天亮以前，我们的部队由二连哥萨克人、山炮

二门、火箭炮队和骑兵队组成，会同勃留门塔利上尉的部队一起出动对抗中国人。不久我国部队就发现了中国的大、小两个营垒。马匹和骆驼群就在两侧平静地放牧。从一切情况看来，中国人是没有料及我们到来的。在我国部队整齐和密集地向最近的中国营垒直接挺进的时候，中国人赶快集合马群，派出了一个不大的侦察班前来，而在接近我国部队的时候，又立刻退回去了。

总而言之，我国部队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中国营垒中的忙乱。普罗岑科大尉利用这种情况，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以最坚决的行动对抗中国人，不给他们有思索的余地，同时惩罚他们对待勃留门塔利上尉部队的蛮横无礼的行为。为达此目的，预定越过中国营垒线，绕到它的背后，然后迅速展开战斗动作打击中国人，这样来解决问题。

这种行动计划也还有那样重要的好处，即插入中国人的背后，占据中国人通过桑·塔什山口与伊宁的唯一交通便利的道路，我国部队这样就完全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同时我国部队自己却通过这种调动而占有与维尔内堡垒最便利的交通。

我国部队的这种使中国人大惑不解的侧面行动，是完全在秩序井然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行军的队列中，二连哥萨克兵士走在前面，随后是山炮队和火箭炮队，再有辎重、马步兵和勃留门塔利上尉的哥萨克部队。我国部队在行军中所形成的很长行列、部队的辎重、在我国军队中有捷泽克苏丹和萨尔佩克大牧主所属的很多的吉尔吉斯人，这一切情况综合起来，都使俄国部队显示出很大的威力。当全部行军部队陡然转向右方并迅速向中国营垒正面快步展开的时候，所产生的印象就更为加强了。在第一线上，配置了二连西伯利亚哥萨克士兵，布成展开的队形，在山炮队和火箭炮队间都有一定的间隔。在第二线上，有马步兵、勃留门塔利上尉的哥萨克部队和吉尔吉斯人。然后，按照军号声音，战斗的行列整齐地向

着中国人前进。在营垒前混乱地集合起来的阿德班诺夫斯基族长萨乌鲁克和其他族长所属的占有最接近的小营垒的吉尔吉斯人，在我国部队面前很快就撤退了。俄国战斗队列在军号声中从左翼越过遗下的营垒，并按照信号在距离大约六十俄丈的中国大营垒面前停止下来，而且从炮车上卸下大炮和火箭炮准备立即开火。随后中国方面派来了通译人员，从他与我国翻译勃罗金中尉的解释中，得悉中国人对俄国人没有任何敌对的意图。当时普罗岑科大尉立即要求交出投向中国人的阿德班诺夫斯基族长萨乌鲁克和其他族长属下的吉尔吉斯人。中国人答称，他们愿意照办，但是可惜萨乌鲁克和他的吉尔吉斯人已经从营垒中逃跑了。

后来，在俄国部队和中国部队官长开始谈判之前，曾经约定，所有中国人听到俄国军号声音一律下马，他们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国哥萨克兵士则是听到第二次号声才下了马。同时，普罗岑科大尉、勃留门塔利上尉、部队的所有军官和被邀请的贵宾吉尔吉斯人捷泽克·努拉利耶夫、萨尔佩克和其他人等，以及中国军队各官长哈布齐贤与大臣霍多尔和所有随从人员，都集合在中国营垒和我国部队所占阵地的中间地带。普罗岑科大尉向哈布齐贤声明说，中国人擅自进入俄国境内，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同俄罗斯国的友好关系，虽然本来应当把中国部队解除武装，但是在这一次，他认为可以只限于一个要求，即刻不容缓地在我国部队的目睹之下撤除自己的营垒，并经由桑·塔什山口返回自己境内。当时哈布齐贤要求给予证明文件，证明普罗岑科大尉确系按照俄国政府的意志行事和这些土地确实认为是俄国所有。普罗岑科大尉立刻表示自己同意这一点要求，同时坚决向中国人声明，必须立刻退出我国境内。哈布齐贤关于派员前往伊宁请示和延缓撤退哪怕一昼夜或只是几小时的一切请求，都被坚决拒绝了。中国人当时看到，除了立刻撤退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摆脱他们困难处境的出路，就开

始撤除自己的营垒，然后通过我国军队的面前向桑·塔什方面转移了。我国军队在歌唱和号角声中差不多是紧跟在中国人的后面行进。

我国部队就是这样跟随中国人员直至桑·塔什山口的入口地方，当看出中国人不停留地准备通过山口的时候，我国部队就在那里停止下来。我国部队在桑·塔什山口停止下来之后，所有的吉尔吉斯人无论是在我国部队中的，还是从邻近的吉尔吉斯村庄前来的，以及从萨尔佩克州区前来的曾经准备按照中国人的阴谋进行反对俄国人的敌对行动的，都来到我国部队官长面前，表示欢迎和忠顺俄国政府之意。

我们在中亚细亚内地对中国人所获得的军事政治胜利的结果就是这样。我国部队官长的这种不发一枪地迫使中国人退出了我国境内的做法，由于即将在塔城举行确定同中国西部国界的和平谈判，是最适合于当时局势的，并得到了外交部的完全赞许。

为了视察国界而从塔城和伊宁派出的越过常设卡伦线很远的中国其他部队的行动，也没有获得成功。例如，4 月 4 日从塔城派出的部队，兵力达七十人，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帮办博勒果苏率领下，沿途曾有白支吉特和克扎耶夫族吉尔吉斯人二百五十名附从，向南方前往阿拉湖地方。为了阻止这个中国部队前进和不许它进入我国境内，由乌尔扎尔村派出了人数不多的一支哥萨克部队，由哥萨克军大尉巴拉诺夫率领。中国部队转向北方以后，在我国哥萨克军跟随之下向哈滕·苏河前进，在该处博勒果苏大臣曾经表示希望越过该河和在乌尔扎尔村稍事停留。但是我国部队官长哥萨克军大尉巴拉诺夫坚决声明，没有我国长官的许可他不能放他们继续前进。这种坚决的反对虽然是博勒果苏大臣所不喜悦的，但是他没有坚持多久，就带领了自己的部队在我国部队跟随下前往塔城附近的巴克图卡伦地方去了。中国人这样停留了几天之

后，就越过塔尔巴哈台山前往斋桑湖，据获得的情报说，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周围的吉尔吉斯人的不友好的接待。5月25日，该部队从斋桑湖返回了塔城。

在从塔城出发视察之后经过一个月，另一支为数五十五人的中国部队，在将军官衔的池进直统率之下，从伊宁出发向科克苏河前进。为了指示地点，在途中有我国属下的大汗国阿德班诺夫斯基和苏凡诺夫斯基部族吉尔吉斯人九名参加了这个部队。渡过科克苏河，在我国同名称哨所之下十六俄里处，中国人来到了卡拉塔尔河。但是在这里被我国从科帕尔派出的和从附近各哨所集合的哥萨克军阻止住了，并迫使退回到科克苏彼岸，然后从尤根塔什山口和鲍罗胡吉尔河返回自己境内。

第 三 章

1862年春季在塔城同中国人开始谈判前国界上的情况。为了预防中国人越过常设卡伦线侵入我国境内的新企图，必须加强派驻国界上的我国部队。 杜加麦利总督对于我的武装占领国界方案的意见。 我向杜加麦利将军呈述对他所提意见的说明。 我在科克苏边界上哥萨克村同我国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的会见。 我从该村出发前往乌尔扎尔边界哥萨克村庄和继续前往塔城。

前章所述中国部队借口视察国界侵入我国境内，使得国界事宜复杂化了，并使我确信，单靠在塔城与中国人进行外交谈判，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坚决办法，以便制止中国人借口视察国界再行越过常设卡伦线侵入我国境内的任何企图。这种办法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在于不让中国人越过此线，我们这就如向他们指明，按照《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我们认为这条线就是国界线。要求我国部队占领边界地点，这是不容置疑的另一种情况，问题在于必须特别敏锐地监视吉尔吉斯人，以便在必要情况下随时能够及时制止他们的任意行为，并经常使其严格服从俄国政权。这一点是更加必要的，因为中国人一遇方便机会，就尽力使吉尔吉斯人起来反抗俄国人，并诱引他们归向自己方面。

1862年 6 月初，我得到情报说，中国人从伊宁地区方面重新集合向我国国境移动。为了阻止中国人通过尤根塔什或阿勒滕·伊麦利山口进到距离国界最近的科克苏哨所地方（而这里只有哥萨克兵士十四人），我为了争取时间，就直接同驻在科帕尔城军队的

司令官接洽，请求他从科帕尔城派遣步兵一连和哥萨克骑炮兵一排前往科克苏哨所。为了搜集关于中国人的情报，我派遣了一名哥萨克侦察员前往尤根塔什山口。中国人向我国境移动的情报一经证实，我打算随同上述部队从科克苏哨所出发前往尤根塔什。分布在尤根塔什的我国部队，距离科克苏居民点三十俄里，是在最便利的阵地上，富有森林、饮用水和良好的牧草，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它使我们能够阻止中国人通过尤根塔什山口的最捷便的道路，越过他们的常设卡伦线，在这里侵入我国国境的任何企图，并能监视边界的吉尔吉斯人，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他们的绝对顺从是不可靠的。最后，在尤根塔什有了我国的武装力量，我们可以从该处威胁伊宁本身，这对于当前的国界谈判也是有利的。这最后的一个情况已为下述情报所证实，即普罗岑科大尉部队向伊塞克湖附近的图普河地方迅速行动，据领事扎哈罗夫通知我说，曾使伊宁当局发生惊恐，他们最初开始集合警察部队，但是后来安定下来了，决定保卫住分布在鲍罗胡吉尔卡伦通向伊宁的由索伦武装居民已经占领的地方。普罗岑科大尉部队在伊塞克湖东面的成功行动，使中国人相信我国占领这个边界地方不是假装的，而是真实的。因此，我认为必须使这种思想在中国人中间更加深入，使普罗岑科大尉的部队越过察林河并驻在格根河，绝对不容许中国人来到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地方，借口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由我国属下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勃沽部族的牧区所占有。实际上，这对我国所以必需，是为了在这个地区使国界扩充到相当大的范围，然后实际占领此地，借此向中国表示，我们认为根据《北京条约》它是划归俄罗斯领域的地方。但是注意到外伊犁边区东南部的这种情况，也必须在斋桑边区，特别是从斋桑湖向东在黑额尔齐斯河盆地至预定的国界线，即在此处从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向南至塔尔巴哈台山脉进行的国界线上，严格保持相适应的行动方式。为此

目的，我认为必须先由我国军队占领从斋桑湖向东在黑额尔齐斯河下游盆地的地方，以便预先使中国人知道，这些地方是位置在中国常设卡伦线以西的，我们认为，根据《北京条约》是属于俄国的。

为了实现这些企图，我认为有益的是：再从科克佩克特调动半个连的步兵去斋桑湖，支援我已经派往黑额尔齐斯河的哥萨克部队。最后，我也认为必要的是：在各委员来到塔城的同时，向距离塔城七俄里的乌奇·卡塔河调动步兵一个连、哥萨克兵半个连和哥萨克炮兵一个排。我把这个部队分布在中国常设卡伦线附近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人表明，在我国部队后方的全部土地，即在他们卡伦线以西的土地，我们认为都是按照《北京条约》划归俄国领域的。1727年，我国大使拉古津斯基伯爵在布连河所作的处理，对我来说是我国方面这种行为的有教训意义的例证，关于这一点已经在上文详细叙明了。如果中国人对于我国部队几乎布置在塔城城垣之下提出抗议的话，我请求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向中国人解释说，我国部队是随同我国各委员前来塔城的，并且是他们的仪仗队。斯卡奇科夫与扎哈罗夫相反，他始终是武装占据国界的坚强反对者，答复我说，要我命令我国部队官长不得越过乌奇·卡塔河一俄尺，以便不使中国人发生惊恐，因为他们对于拥有炮兵的我国部队是认为有威胁意义的。

关于上述我的一切决定，都是属于军事部分的，我详细地报告了军团司令部长官，不久就从他那里得到通知说，上述部队将按照我的第一次请求向我所指出的地点出动。在这种坚决的答复以后，似乎可以预料，在以我所指出的根据来防卫中国国界免受中国人的敌对阴谋破坏，是完全得到地方长官赞同的。然而，几乎是同时我十分突然地接到边区主要长官杜加麦利的精神完全相反的来信，我的一切决定都被歪曲了，并且几乎绝对地被驳斥了。结果是，鄂木斯克军团司令部赞同了我的决定，而当时驻在谢米巴拉丁斯

克的边区主要长官，却认为是不正确的。对于同一事务的这种意见上的矛盾，使我得到的结论是，杜加麦利给我写的信，看来不是出于自己的动机，而是受到驻谢米巴拉丁斯克地方军政省长潘诺夫将军给他所作呈报的影响。关于潘诺夫我应当说，在他具有自己的一切优点如经验丰富、诚恳老实和善良意图的同时，却是已经陈旧过时的文牍主义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大部分命令中占有优势的官僚主义气质，把需要迅速和坚决处理的一切急迫的事务都迟慢下来了。因此，向中国国界进军时，在草原边区距离遥远和迫切需要刻不容缓地行动的情形下，我必须直接与本地军队官长接洽，而于同时将我所作出的处理通知潘诺夫，只是为了请他备案，预料这些处理办法无论如何总会得到西西伯利亚主要地方长官的赞同。看来，潘诺夫不喜欢我的独自处理，而且他在原则上也不赞同这种处理，认为武装占领国界是完全多此一举，并随之而来的是很大的困难和花费。

大概，在杜加麦利来到谢米巴拉丁斯克的时候，潘诺夫把我用我国部队占领中国国界的一切处理办法以完全错误的看法向他呈报了。杜加麦利自己由于刚就任管理军队和边区，还没有能够全面了解同中国西部国境接壤的我国草原边区的地方特点和游牧居民的独特生活情况，在最初时候不得不以信任的态度对待潘诺夫将军，认为他是有良好企图的和有经验的行政官员。看来，他们二人把我的关于武装占领国界的主张，说成是迷恋于侵略中国土地的政策。按照他们的意见，我的这种行为一定会引起同中国人的敌对冲突。杜加麦利认为，我们在当时不仅要避免在中国西部国界上的任何纠纷，而且应当放弃甚至对于浩罕国的征服的意图。因此，按照他的意见，我们毫无必要为了占领麦尔凯、阿乌利埃塔及其他浩罕国堡垒而向楚河彼岸出动军队。由此可见，杜加麦利按照他的政治观点，按照他的可以说是职务地位，既坚决反对我们深

入中亚细亚进军中采取的军事行动，又一般地反对任何取得土地的做法，认为这都是不合于俄国的真正利益的。这种意见，正如齐麦尔曼将军从彼得堡给我来信所说的，杜加麦利于前往西伯利亚以前，在一次有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帝参加的关于中亚细亚事宜的最高委员会议上，也没有顾虑地表示出来。事情弄到这种程度，致使皇帝不得不阻止杜加麦利，向他指出，他还没有到过那个边区，也没有就地了解它的情况，就已经决定表示这种判断。后来，在动身去西伯利亚前觐见皇帝的时候，杜加麦利又重复同样的意见，并且表示说，如果在他管理西西伯利亚的全部时期，不把任何一步土地合并到我国领域，他将是很幸运的。杜加麦利既对我国中亚细亚政策最高任务具有这种观点，他很快也就与潘诺夫的意见合一了，并且得到确信，认为两国代表在塔城进行和平外交谈判的时候，我国部队占领中国国界将是完全不适宜的。

可是，杜加麦利虽然信任潘诺夫将军，但并没有完全放弃一种想法，即不给我作为与中国划界的首席委员对此事表示我个人意见的权利，就预先撤销我所作的关于在国界布置部队的一切处理办法，那会是不公正的。因此，我获得的指示不是绝对命令的方式，而是书面意见的方式，指出我应当如何在国界上进行活动。这个信件的内容如下：

“谢米巴拉丁斯克，1862年7月20日。5月30日，我从鄂木斯克出发视察托木斯克省和戈尔诺扎沃茨克地区，现时经由谢米巴拉丁斯克返回鄂木斯克，本月25日将来到该处。

“在这全部时期内，我没有收到任何情报，说明划界问题是处于何种状况之中，我甚至也不知道乌里雅苏台明将军是否如期来到了塔城。

“按照《北京条约》而发生的划界事宜，是一项纯粹的外交事务，应该和平地并以互让的方法达到圆满的结果。为达此目的而

采取军事示威的方法，我认为是不适宜的，何况以一个或两个连队所举行的示威，未必能够吓倒谁，而且对于中国人不会起显著的影响。由于这种原因，我还在鄂木斯克时就这样认为，并向您函达，没有极端的必要，不应使乌尔扎尔的部队向巴克图国界地方移动，部队在那里的粮食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从您与潘诺夫少将的往来文件中，我看到您的处理办法，好象我们正在面临着与中国人进行战斗，要求把一个步兵排连同测量组从斋桑湖南岸前进到黑额尔齐斯河，并使辅助部队、后备队集中在谢尔基奥波利城。这最后的一个呈请是完全不能实行的，因为阁下您很熟悉，在谢尔基奥波利也好，在科克佩克特也好，我们的军队都很少。说到步兵排向黑额尔齐斯调动，也是有不少不便之处的。

“总而言之，我绝对不愿意我们陷入象中国人于春初以武装力量侵入我国国境所造成的那种错误之中。这种无礼入侵的结果，是我们迎头出动了我国部队，把他们赶回老家去了。但是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从我国方面作出同样行动的一种理由。一言以蔽之，阁下，我恳切请求您这样地执行给您的委任，即要在和平的谈判中不在两国之间产生任何不愉快的冲突，而在不可能说服中国各委员对待我国的公正要求时，最好把关于划界争论问题的某些部分保持现状，但是要把执行《北京条约》关于划分中国西部国界的责任完全由中国各委员担负。”

我阅读了这个信件之后，认为杜加麦利对我所表示的一切意见，都应当属于一般的误解。我很清楚，杜加麦利对于同中国人在西部划界的问题持有不正确的看法。按照他的意见，这纯粹是外交问题，应当通过和平协商和互让精神的途径达成良好的结局。我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方式，如果我们是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打交道，也许还可能行得通。但是对中国人采取这种政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证明是正确的。中国人正如所有亚洲人一样，对于

我国方面的任何小小让步，一定会看成是软弱无力，而千方百计地尽力把自己置于可以说是优越地位来对待我们。我们从一开始就应当以完全相反的精神进行活动，向中国人声明，根据《北京条约》进行国界问题的谈判，我们不可能向他们作出任何微小的让步，并坚定不移地把这个原则坚持到底，而我们也就是这样执行了的。

至于说到潘诺夫，那么他对于与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接壤的中国各省的当时状况，如对塔尔巴哈台和伊犁两省的政治关系，以及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特点和特殊性格，根本很少了解。当时西伯利亚的地方当局对于这种事物很少注意，只凭某些事实来判断，甚至对俄国所属的吉尔吉斯草原的游牧居民生活情况，也只有些表面的了解。

例如，格里果利耶夫教授在他的一篇关于中亚细亚的论文里，指出下列的完全确实的情事："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伯利亚公署还曾向奥伦堡公署请求向它说明'绑架牲口'① 是什么意思，虽然从吉尔吉斯人成为属民的时候起，几乎每天每日都在公文中使用这个专门名词，也就是说，一百二十年来经常在谈论这个没有明白了解的名词。"

杜加麦利和潘诺夫在对于同中国划界事宜的全部详细情节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形成了与我完全分歧的一种特别见解。例如，在杜加麦利来信中指出，在国界上出动部队和以一个连进行示威，乃是无益之举的这个指示，我的意见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示威行动在欧洲的国界上确实是不适宜的。但是在亚洲的国界上，特别是对付中国人的行动中（他们永远是对强力让步，而对软弱的敌人才逞勇），一个连的步兵和一个哥萨克连、两个或四个炮队，就是

---

① 从前流行于各游牧民族中的一种报复行为，目的是要失主付出代价，赔偿他曾对绑架者所作的侮辱或损失。——译者

一种威力，这一点后来在下一年在那个国界上同中国人发生流血冲突时，就完全得到了证实。

关于向黑额尔齐斯河出动部队毫无益处的意见，在同样程度上也是不正确的。

用我国部队来占领这个地点，我始终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扎哈罗夫领事也同意这个意见，他甚至主张加强我所规定的我国部队的数额。斋桑湖可以说是构成了与中国西部划界全部事业的重心，关于这一点在下文叙述塔城举行谈判时将要详加阐明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不仅把斋桑湖掌握在自己的权力之下，而且还要掌握这个水库北面和南面的全部地区。我国部队分布在斋桑湖的东面，在黑额尔齐斯河流域下游部分的盆地，其目的是要向中国人表明，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按照《北京条约》已经划归俄国所有，同时也为了掩护在斋桑边区进行地形测量工作的我国地形测量组，因为该边区的现有地图因系按照片断的访询材料所制成的，不能使人完全相信。

总而言之，我国所以要用武力占领边界，除了上述各节以外，也还有其他政治性的考虑。在面临的塔城谈判中，我们首先必须拟定与中国在西部的地理上的稳定的国界。这种国界一经拟定，同时就要使中国人知道，我们不仅决定在塔城与他们谈判时坚持这条国界，而且也将在实际上、事实上加以坚持。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用我国部队占领全部国界线上的各战略据点，而自己并不越过中国的常设卡伦线，这样就有充分根据要求中国人也这样办理。这一切是意在逐渐地、慢慢地使中国人意识到，常设卡伦所在的那些地方的这条界线，实质上也就是国界。最后，我国部队分布在国界上的这一事实明确地向中国人表示，我们有充分的可能随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在这种场合，军队是外交的后盾，而这种情况首先无疑地在当

前谈判进程中对我们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也可防止沿边吉尔吉斯人的一切敌对破坏阴谋。根据这种理由，尊敬的杜加麦利认为我国与中国人在塔城的谈判，以及总而言之进行划分中国西部国界问题乃是纯粹外交事宜的意见，未必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吉尔吉斯人，杜加麦利将军在他的来信中完全没有提到。看来，当时他不认为他们有特别的意义。

但是，按照我的意见，我们以武力占领国界对于沿边界的吉尔吉斯人甚至比起对中国人来，未必没有更大的意义。后来，在杜加麦利很好地熟悉了边区情况以后，他在自己的遗著中对于吉尔吉斯民族在政治关系上的意义，曾经表示了下述的意见：

“不应当不注意到那种情况，即由于定居居民的增加，为了放牧畜群需要广大牧地的游牧民在他们的生存手段上越来越受到排挤。这种情况成为两个部族（俄罗斯的和吉尔吉斯人的）之间经常仇恨的原因，也必须把他们联合成一个整体。如果对于因此而发生的利益分歧，再加上宗教信仰的分歧，那么就很明显，不可能期待吉尔吉斯人的忠诚，虽然他们很喜爱作出忠心耿耿的声明。

“在我们强而有力的时候，吉尔吉斯人就会顺从。但是假如我们的强盛稍受挫折，他们就会来反对我们。”

由此可见，按照杜加麦利的说法，如果在草原治安状况一般良好的时候，吉尔吉斯人的忠诚是不可靠的，那么在1862年春季由于中国人的阴谋，在吉尔吉斯人中间已经显然暴露人心激动的征象，在国界上处于纷乱状况的时候，就更加是不可靠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国界上布置我国部队对于维护边区应有的秩序和治安，以及对抗中国人傲慢无礼的阴谋，乃是最好的方法。为了说明关于武装占领国界所产生的问题，我决定在如下的信件中，向杜加麦利说出我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奉到7月20日阁下来信，我敬谨呈报，在我来到科克苏居民

点，了解了国界事宜的情况以后，曾与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和阿拉托夫斯克州官长科尔帕科夫斯基上校进行协商，并向军团司令部迅速密报，在目前的情况下加强国界上一些部队是有益的。这个呈请曾经得到批准，那时当即把部队向尤根塔什山口的格根河和斋桑湖推进。同时谨向阁下陈明，经过考虑必须在国界上留驻我国军队的实际情况。

“中国人借口视察国界侵入我国境内，可以认为是按西部边区长官的命令实行的。但是，中国人严密地掩盖了这种视察的真实目的，这一点从他们部队官长的支吾搪塞和自相矛盾的答复中就可以作出断定。

“考虑到中国人这些和其他过去的行动，可以作出一些概然性的断定，他们是打算预先按照自己的意图划定国界：对于他们十分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对于这种措施是怎样看法和我们打算保持哪些地方。也可以预料，中国人害怕我国方面提出大量的要求，决定对于边区的大部分土地表示自己的权利，以便能够坚持占有最靠近伊宁和塔城的地方，并尽量把国界从西部边区这两个中心城市向前扩展。他们想用在吉尔吉斯土地上的行动来表示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权势，使它倾向到自己方面来。为达此目的，正如阁下所洞悉的，他们曾派遣使节到吉尔吉斯人牧区，在大汗国各苏丹和吉科卡门汗国各大牧主之间广泛进行宣传。除此以外，他们还曾向鲍金斯基牧区发送通告，要苏丹和牧主抛弃牧区。

“中国人的所有这些阴谋，都已按照阁下的指示，经布置在国界上的各部队及时地加以制止了。考虑到边区吉尔吉斯各部族的现时状况，他们当中还不是全都承认是俄国的正式属民，不可否认在中国人方面更加巧妙和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之下，他们的企图是会有所成功的。吉尔吉斯人的著名轻信和缺乏对于义务的一致概念，给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开放了广阔的余地，可能在斋桑湖到伊

塞克湖地区的一切沿边游牧居民之间引起风潮。同时吉尔吉斯人始终觉得，他们承认属于中国权力之下，在实质上则是完全独立的，从而很快地会找到一些方法在草原上进行猖狂放肆和绑架牲口，这是他们所癖好的，因为这些半野蛮的游牧民族还没有忘记关于野蛮的自由和独立的古老传说。从这一点容易说明在中国的各部队里存在大量吉尔吉斯人的原因。在图普河冲突时期所发生的这种吉尔吉斯人的转向我国方面和他们的公然谴责中国人，表明吉尔吉斯人也同所有的亚洲人一样，总是投向更加强有力的方面的。在这种理解之下和由于中国人的新的阴谋，我国兵力驻在国界上就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就能够把吉尔吉斯人保持在服从于俄国政权范围之内，并易于监督中国人尽力诱引到自己方面来的那些最有权势阶层人物的意向。这就可以期望吉尔吉斯人自己会害怕反抗我国的任何背叛行为，他们知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制止他们任意妄为的背叛冲动。

“叙述了所以必须在国界上布置我国部队的主要情况，并以其他的考虑补充这种意见时，我认为应向阁下陈明，虽然中国人在草原上没有设置任何堡垒据点，不可能成为我国的很危险的邻国，虽然他们已经有机会确信，不可能完全依靠吉尔吉斯人的忠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部队的在场向他们表明，我们是以更加实际的方式来占领草原的，并且完全准备好在发生新的越界企图时加以维护。在这种武装准备之下，中国人会很快地了解到，以动摇吉尔吉斯人对俄国的忠顺为目的，在他们之间发动新的示威活动，是完全无益之举。最后，我国部队的在场，无论他们的人数是怎样不多，对于中国人也是一种很大的威力，其所以有利，也还因为这将表明我国坚决按照《北京条约》应属俄国的边区土地权利的决心，对于当前谈判的进行也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在中国卡伦的这一方面沿着国界布置我国的部队，在任何场

合都不能认为是违反国际公法和友好关系的：所有这些部队是布置在臣属俄国的吉尔吉斯人的土地上，按照阁下的指示，奉有决不越过中国的常设卡伦线的严格命令。在这种场合，我国的行动具有消极防卫的性质，是具有必须保卫臣属俄国的吉尔吉斯人土地，反对中国人可能重复强力侵入的完全正当的理由。基于所陈明的考虑，敢于请阁下准将国界上各部队留驻到谈判终结之时为止。这些部队现时布置在下列各地方：

（1）在格根河上，目的是要向中国人表明，从察林河向东到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的全部地域，都是俄国所有的土地，因为俄皇所属的吉尔吉斯人现在该处游牧。

（2）在克斯肯·捷列克河，驻在尤根塔什山口这一方面，为了监视中国人行动和影响沿边的吉尔吉斯人。

（3）在塔城对面巴克图河前面，拟定布置部队一个连的步兵、半个哥萨克连和炮二门，将护送谈判委员从乌尔扎尔村出发。

（4）除了这些部队以外，从科克佩克特向斋桑湖出动部队一个排和哥萨克兵士二十人。我已命令这个部队通过斋桑湖南岸到黑额尔齐斯河口，有可能时，就沿该河向上前进，在看得见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的地方停止。”

杜加麦利对这个信件向我答复说，他准许按照我在上述信件中所叙明的申请，在国界上布置部队，但是我拟定向黑额尔齐斯河出动的部队除外。因此，我申请的我所坚决主张的主要部分，已经杜加麦利加以拒绝。看来，他没有设想到，我们能够达到使中国人将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的一部分让归我国。因此，杜加麦利完全没有根据地把这个地方算作中国领土，认为在我们自己抗议中国人的这种行动时，没有理由把我国部队派往外国境内。同时，杜加麦利忽略了哈布齐贤将军曾经带同自己的部队出现在伊塞克湖附近的图普河地方，侵入了绝对应当认为俄国领土的边区。其实，全

部斋桑地方和黑额尔齐斯河下游部分处于中国常设卡伦线 迤 西，根据《北京条约》无论如何应该归属俄国领土之内。要求从黑额尔齐斯河撤回我国部队的这种不正确的对待事物的观点，使我关于在这个地方进行正确的和迫不及待的地形测量工作的一切布置不能付诸执行，象在下文所将详加叙述的。我与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会见的地点，如上所述，曾经选定科克苏哥萨克居民点。在这里，在这遥远的俄国边区，在中国国界的大门口，我初次会见了扎哈罗夫，他当时已经享有完全应得的我国的中国通学者的声名。我见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的、体格矮壮的人，看来是正处于身强力壮的时期。他的晒黑了的脸，配着一双聪明和有洞察力的眼睛，给人以信任之感，虽然只要细看一下这双眼睛，就不能不看到它具有精细的，可以说外交上的色调。扎哈罗夫在中国居住过二十年，看来这对他起了强烈的影响，并在他身上留下了某种特别的烙印。他的姿势、举止、动作和步法，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穿着欧洲服装的纯粹血统的中国人。

扎哈罗夫通晓中国语文，尤其是满洲语文，而且完善掌 握 了它。大家知道，通晓语文是研究某一国家和居民的强有力的工具，它使扎哈罗夫能够充分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西部各省。担任驻伊宁总领事的艰巨和责任重大的职务，扎哈罗夫在那里任职的全部时期内，神圣地保卫了俄国的尊严。

由于中国人烧毁了我国塔城贸易站，在 1858年与中国人进行谈判时，扎哈罗夫表现出是一个对于中国事务熟练的和有才干的外交家。根据他与中国人所订的条约，中国人因烧毁我国贸易站应赔偿我国三十万卢布。这个款额系用茶叶偿付，该项茶叶已经全部运到斯卡奇科夫领事任内重新建筑的我国的塔城贸易站。

从我与扎哈罗夫相识的第一天起，我们彼此之间就建立了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差不多一直到1885年他逝世的时候都没有间断

过。在塔城谈判结束之后，扎哈罗夫到彼得堡去了，我们经常地彼此通信。在我留居科克苏伊斯克居民点的全部时间内，我每日都与扎哈罗夫就当前同中国西部划定国界事宜进行协商。这种交换意见和我们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长时间的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获益非浅和大有教益的。在这方面，我从扎哈罗夫方面受到的关切和照顾，象去年斯卡奇科夫所给我的一样。所差别的只是，扎哈罗夫的指示比起斯卡奇科夫那些可以说具有理论色彩的指示来，要更加切合实际。作为外交家来说，我认为扎哈罗夫比斯卡奇科夫高明一些。扎哈罗夫是一个积极的外交家，勇往直前地坚决奔向所预定的目标。斯卡奇科夫的外交是较为消极的。他的行动是小心谨慎和考虑周详的，他对每一步骤都加以衡量和思考，尽力以友好协议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外交部选定这些熟悉中国人并通晓中国语文的有才干人员来担任驻中国领事这样艰巨和负有重大责任的职务，应该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他们二人都是俄国驻中国西部的称职代表，正直地维护了俄国的利益，并受到中国地方当局的共同敬重。斯卡奇科夫的消极的和爱好和平的外交，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与我关于同中国西部划界事宜的通信中。早在彼得堡的时候，我就将我的关于划界事宜的考虑，以及我打算在塔城同中国人当前谈判中所要坚持的计划，都通知了斯卡奇科夫。这个计划的内容，是坚持作到使中国人接受我国的应当如何进行划界的建议。我接到斯卡奇科夫对这个信件的答复，他在复信中顺便通知我说，我所表示的当前行动的直接纲领，看来不会有特别的困难。“有着《北京条约》这样明白表示的依据材料”，斯卡奇科夫写道，“我们的主张将不会是一种强求，而只是我国合法权利的证明。但是我又想起从前的事情：满洲人看到我们的地图，会装作感到莫名其妙，甚至如果也相信我们的地图，听到我们这次已经不按《北京条约》所明定的和所列举的界

线而坚持把那些土地划归自己的强求，那么就需要用许多巧妙办法来雄辩地说服中国人。就北京政府的现时状况来看，要它接受与《北京条约》不相符合的国界线，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相信它不会让自己的委员随意变更这个有利于我国的界线。单是出于不致在自己的正当事务中表示轻易让步的自尊心，也不会给予这种随意变更的自由，因为在1860—1861年的许多让步以后，它也已看到自己是受到不再让步的拘束的，正象一个挥霍放荡的少年人受到突然而来的监护人的拘束一样。还可能想起一些在举行划定国界线和其他事项的谈判时可能发生的阻碍，但是我们可以不管这些，希望英国人在北京日甚一日的影响，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在塔城的活动，正象他们没有干预阿穆尔地区的划界事宜那样。您认为中国各委员将竭尽全力尽速结束谈判事宜，以便不受到北京的申斥，因为在北京可能把谈判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无能。但是我认为将是另一种情况。我认为中国各委员将只是尽力在不犯违反自己训令的条件下来结束谈判事宜，他们知道否则就会暴露自己的无能，因而将受到北京方面的严厉申斥。我看不到，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必要需要急忙终结划界事宜？我认为他们在谈判中一遇到我国方面的障碍时，即在一遇到他们的训令没有向他们说明的难题时，他们将向北京发送呈报，等候北京的答复，而这种答复要经过五十天才能来到塔城，中国各委员或者将向我们声明，他们在等候新的训令，或者也可能他们认为保持沉默是有益的，这样一来就会把会议事务的进行推迟到未时① 以外，或者声称他们之中某人有病，因此我们想在对他们认为是需要的以前达到早些会见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对此可以有权要求。而我们也就这样来要

① 中国人是用特殊的标号计算时间。例如，下半天 12—1 时表明为午时，2 — 3 时为未时，4 — 5 时为申时，6 — 7 时为酉时，8 — 9 时为戌时，10—11 时为亥时。我们与中国人的会议定为 2 时，即未时。

求，但是这只不过同他们作些无益的文件往还或同他们的官员会见。可是在实际上怎样促使他们从速办理：要知道我们不是给他们发号施令的人！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处于他们的地位，我们也是要从杜加麦利将军或亚洲司那里来给予答复。当然在获得所期待的答复以前，中国人的任何花言巧语也不能使我们在我们无权同意的问题上来同意中国各委员的主张。没有话（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也就算完了！我了解到，您对这些说法会答复我说：我们带有两门大炮的军队呢！是的，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巴赫京斯基的军队会有它的重要意义，但是这只不过有重要意义而已。巴赫京斯基的军队将很好地证明，我们，大员们，是君主的委任人员，没有别的意义。您同意吗，我们能不能在中国各委员面前以威胁的意思提一下我国的军队呢？这在领事扎哈罗夫在这里对中国人完全有各责的事件进行谈判的时候是很适宜的。也许，还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即有某种不能预见的情况迫使俄国各代表以巴赫京斯基军队的威胁性质提醒中国各代表，甚至假定说，这种威胁会迫使他们卷起袖子并签订我们所准备的议定书。而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会产生的结果是，他们在俄国火药的气味中以自己的签字来完成和平制定的《北京条约》！如果我们是中国的真正监护人，那么这种事还能做得过去，但是要想到现时中国人有很强大的监护人——英国人，他们对俄国人在中亚细亚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很敏感，而我们在北京未必是主要监护人！这就是说，在现今的这种情况之下，远非1858年我国领事扎哈罗夫在这里进行谈判的时期可比，我认为能坐在会议席上吃几杯茶，友好地进行一切事宜的商谈，那是最好不过了！！”

斯卡奇科夫领事对于同中国划界事宜和我国武装占据国界的意见，就是这样的。他在后一种关系上的拘泥曾经达到这样程度，以致在1862年我来到塔城之前，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如下的

一段：

“您甚至要把自己的炮队带到巴克图卡伦。劳驾，请给部队的各军官们发出极严格的命令，使我国的兵士和大炮甚至连一俄尺也不要越过国界线。在这种场合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恶劣的后果。这一周内，在城市里，在参赞大臣那里只是由于听到一种消息，说俄国人已经来到莫多·巴尔鲁克卡伦和似乎要设立界桩，就已经忙乱不堪了。今天我向警官说明，在那里是我国非常和气的地形测量人员。也请您警诫各军官们，要使兵士和哥萨克人在国界上很好地约束自己，在任何情形下不要欺侮中国人。”

也许可尊敬的斯卡奇科夫从自己的观点上说是对的。但是我当时认为，从我国地形测量人员和哥萨克人方面，未必会在任何时候造成与中国人发生冲突的口实。相反，他们却始终是对我们抱着傲慢的、轻蔑的和无赖的态度。根据我的信念，我们应当结束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以及从古以来不知因何确定的对于中国人的殷勤和逢迎态度。我国方面的这种作法，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利益，可是却发展了中国人方面在同我国交涉中的自高自大和傲慢无礼。扎哈罗夫由于没有获得彼得堡的委任，没有可能与我同时前往塔城参加同中国人的谈判，他曾劝告我从验核全权证书开始，由我一人举行谈判。据他的说法，中国人可能有两种全权证书：没有授予什么事权的小证书和全权的大证书。在事务进行顺利的时候，扎哈罗夫认为必须遵循一个充分准备好的计划，即尽可能多要求一些。我不可长久留住在科克苏伊斯克居民点，因为订于7月1日举行的两国委员塔城会议的日期已经接近了。因此，我从科克苏伊斯克居民点出发，沿着通往科帕尔和谢尔基奥波利各城市的直接大道前往乌尔扎尔村，于6月20日来到那里。在这里我得到消息说，为护送委员所派定的部队，由一个连的步兵、半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的哥萨克骑兵炮队组成，已经向哈滕·苏河出动

了。6月28日，我同划界委员会的其余成员：阿·弗·戈卢别夫和克·弗·司徒卢威一起来到了距离塔城六十五俄里的哈滕·苏河。委员会在这里受到一部分在塔城郊外和黑额尔齐斯河附近游牧的白支吉特、克扎耶夫和卡拉·季列耶夫各部族吉尔吉斯人中一些苏丹、头目和显要人物的欢迎。对于吉尔吉斯民族各代表，我劝告他们说，要与自己的同族人和平生活，避免彼此之间发生任何可以记载的仇恨，要协助商队，并补充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草原上奠定公共的安宁秩序。最后我说，他们作为俄国保护之下的属民，从而可以获得君主大皇帝陛下最高关怀的权利。所有这些，看来已被吉尔吉斯人以充分信任的态度接受了，他们表示愿意忠实地为俄国政府服务和服从我国的地方官员。然后，我把礼品分赠给有权势的人员，按照当地习惯，邀请他们参加为他们举办的宴会。当天晚上我举行了部队的操练和演习，全部的吉尔吉斯人代表团都在场观看。第二天，我同部队出发前往塔城，6月30日，在巴克图河彼岸六俄里和距离塔城十七俄里，接近中国卡伦线的地方停下来。虽然在这条线和巴克图河之间设立了中国的养畜场，但是我认为必须带同所有的部队越过该养畜场，尽可能地接近卡伦线，以便从第一步就开始向中国人声明，我国认为他们的卡伦线是国界。由于在前面没有找到良好的牧草和饮水，部队不可能再向前了。但是我命令部队官长哥萨克大尉巴拉诺夫去寻找便于驻扎部队的地方，并立即向靠近该卡伦的地方前进。从这个阵地，我向巴克图河彼岸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发出通知，声明划界委员会到达塔城的日期和随从人员的人数。因此，第二天就有参赞大臣派遣的官员前来，欢迎各委员的平安到达，并请求接受以参赞大臣名义送来的食物礼品。我接见了派来官员中的首长人员，向他们宣布，各委员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来到塔城，并请转达对参赞大臣的友好之意，并对于他的关怀表示感谢。送走了中国官员以

后，我同委员会成员在领事馆秘书姆·弗·瓦尔杜金和三十名哥萨克骑兵护送之下向塔城进发，7月1日早晨仪式隆重地乘马入城。在入城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的迎接，然后平安地进入我国贸易站。

第 四 章

1862年7月在塔城同中国人举行的谈判。 我国委员向中国代表提出的被接受为编制中国西部国界线草案基础的意见。 中国人的过分要求。 迫使我们终止谈判和离去塔城的情况。 1862年举行的谈判所达到的成果。

我们来到塔城后不久，中国的首席委员明谊将军也来到了那里。可惜，明将军的疾病阻碍了立即开始谈判。因此，第一次会议只是到7月17日才能举行。在这个会议厅（公房）所举行的会议上，我们向中国委员出示了我们的全权证书，他们也出示了北京军机处的命令，盖有军机处大印，任命乌里雅苏台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为划分俄国与中国西部国界的委员。当时就约定将来继续谈判也在公房进行。在此以后，中国人表示愿在7月19日拜访我们。但是阴雨的天气使他们把这个拜访推迟到21日。7月21日的访问只是专诚拜会的性质，只是在拜访将结束时，根据双方同意决定第二天开会来进行划界事宜的实际谈判。

在叙述塔城谈判的经过情形之前，我认为必须把我国委员打算在编制同中国西部国界草案时，以及在与中国代表商讨划界问题时所遵循的意见，先说明其内容。在编制同中国西部国界的草案时，作为我国委员的指导性指示的是：《北京条约》和外交部所颁发的由国务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签署的训令。但是在这个训令中说明，由于塔城的预备谈判极为重要，它的成功关系到全部事宜的良好结局，该委员等必须首先向中国代表声明，我国政府在决定国界

问题中的愿望只是一丝不苟地执行《北京条约》。同时中国代表应当确信，我们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交涉无论在什么地方举行：在中国首都，还是在边疆地方，作为交涉依据的只是条约。

然后应该在这种意义上解释《北京条约》的第二条，即新的国界要沿着迄今没有肯定下来的，但似乎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假定国界的现有中国常设卡伦线来进行。在训令中继续指出，据悉中国人不顾常设卡伦线，曾经迭次把它的临时卡伦向前推进。为了避免我国与中国边疆当局之间的不愉快的说明，我们对此大都没有予以特别注意，尤其是在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决定只是中国地方当局之所为，而北京最高政府是不知悉的。如果能够说服中国各委员，使他们在划定国界时接受以常设卡伦线为基础，那么通过这一点，全部划界问题获得良好结果的主要障碍，毫无疑义是会消除的。因此，外交部要我国委员对这种情况加以特别的注意和坚持。

从所引叙的训令指示可以看出，关于常设卡伦的问题成为全部划界事宜的重点。一句话，这个问题成了定而不可改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仅不可能同中国人达成协定，而且甚至连谈判本身也不能举行。

训令中对于斋桑湖问题指出，这个问题对于我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保持对这个湖泊的专有是我们的愿望。甚至如果中国各委员也同意在划分国界线时，把遵循常设卡伦线作为共同的原则，那么毫无疑问，在靠近斋桑湖划分国界时，他们会尽力避开这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建议我国委员沿着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然后沿着这后一河流到它的流入额尔齐斯河处实行划界。再沿额尔齐斯河，要这样进行：该河右岸到它从斋桑湖发源处可留给中国所有，而左岸则要划归俄国所有。从这里，贴近该湖北岸前进，从东侧绕过该湖到黑额尔齐斯河河口，然后国界可以通向中国常设卡伦线到奥顿·戈尔卡伦。如果中国人拒绝这个建

议，那么必须预先声明，至少是斋桑湖留归两国共有，并给俄国人享有在湖上捕鱼和航行的权利。

关于在外伊犁边区东南部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地方进行划界对我国最为有利的问题，在训令中说道，根据外交部现有的情报，在这个地方某一时期曾有过中国的临时卡伦，但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受到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的排挤，中国人已将自己的国界后撤，因此现在连该项卡伦的遗迹也没有了。

中国人掌握在自己权力之下的只是通过积雪的天山山脉的"冰达坂"(穆扎尔特)，贴近伊宁经线的他们的卡伦线通向该处。位置在穆扎尔特西面的两个最近的山口，是无人占据的。这两个山口和察林河水系是维尔内城和小布哈拉的繁荣城市喀什噶尔、和田等等之间最便利的交通道路。因此必须把这全部地方认定是属于俄国所有，要使位置在两个并行山脉之间的山口和高原保留在我国手中。

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根据驻伊宁总领事扎哈罗夫向他所提出的情报，认为在外伊犁边区东南部在上述方向实行划分国界，在下述关系上可能遇到相当重大的困难，即属于俄国的勃沽部族的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早从1861年起就已经离去了他们从古以来在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地方所占有的牧地，而受到中国官员的坚持。因此，在当前谈判中，我国委员对于当时俄属吉尔吉斯人没有占据的国界地段同中国人争论，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但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应当不可避免地预期，要中国人同意我国所草拟的上述国界线，将会遇到他们这方面的顽强抗拒，理由如下：

(1) 这些土地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已经被中国人从准噶尔人手中夺得，并且在这些土地上已经迁入厄鲁特卡尔梅克人大群落户居住；

(2)在乔卡尔山南部有铅矿，这是伊宁长官所素悉的；

(3)卡拉套山，从格根河向南地区，对于满洲人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他们纪念对准噶尔达瓦齐汗在这些地方所获得的胜利；

(4)所草拟的国界线距离伊宁为一天半的乘马途程，这无论如何会引起中国人对于我国觊觎伊犁边区的企图怀有强烈的疑虑。根据这种理由，杜加麦利将军认为，如果确实不能使中国人达成协议，就准许我国委员沿察林河划定国界线，然后沿卡尔卡尔河向上到罕腾格里山，再由此处前进，沿天山支脉到当时的浩罕国领域。

对于有关这一问题所作的报告，外交部通知杜加麦利将军说，在给我国各委员的训令中所规定的国界线，它主要是以那种想法为指针的，这就是要使在贸易上尤其是在军事关系上重要的桑·塔什山口留归我国所有。在沿察林河和卡尔卡尔河划界时，虽然桑·塔什山口也会归入我国境内，但是在这种场合必须沿着察林河左岸而过，并通过梅尔卡三个河流的深远峡谷，这里对重载运输特别是炮队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外交部认为，在完全不能说服中国人按原定计划实行划界时，应当绝对坚持要使国界先沿特穆尔里克河——察林河支流而行，然后前往特克斯河，再向罕腾格里山前进。这样铅矿和卡拉套山系都会留在中国领域之内。我国委员从自己方面在全面讨论这个问题以后，认为我们国家的重大利益坚决需要把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的全部地方合并于我国领域，这出于许多的考虑，而主要是要使通往东土耳其斯坦的所有通路掌握在我国权力之内，这些通路是从我国境内经由天山山脉的山口通行的，位置在穆扎尔特的西方，沿着这些道路经由最短的途径通往小布哈拉的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城市。因此拟定，在当前的谈判中坚决要求中国人，要使外伊犁边区东南部的国界从伊犁河一直向南，不是沿着察林河，而是从该河向东前往中国春济卡伦，再沿从东方包括察林河全部水系地域的分水岭前进，应当全部归入俄国领域。从在南方屏障格根河盆地的山岭下来，按所编

定的草案，国界向特克斯河前进，在纳伦河河口处横越该河，再沿该河上行，在接近罕腾格里巨大山岭高耸地方（海拔二万四千呎），到天山雪顶为止。同时，富有优良牧地的特克斯河上游的全部盆地也归俄国所有。从罕腾格里山起，按照《北京条约》规定，国界是沿着天山的南部支脉到过去的浩罕国领域。

在这最后的一段国界上，从罕腾格里山脉向西到苏约克山口，在这里国界陡转向南，处在通过天山的十四个山口处，从这些山口可以打开从我国领域这一边区前往东土耳其斯坦或小布哈拉的通行道路。从这十四个山口中，后来按照1881年《彼得堡条约》规定，利用下列各山口作为两国属民相互贸易之用：别叠里、帖列克第、图鲁噶尔特和苏约克。通往帖列克第和图鲁噶尔特山口的道路，从托克马克城经过纳伦堡垒，而且到该堡垒的全部途程都是可以行车的道路。

从这里再继续前进到喀什噶尔时，有通过帖列克第和图鲁噶尔特山口的两条道路，后一条道路差不多全长都是行车道路。①

别叠里山口是卡拉科尔城通往乌什、阿克苏、和田和喀什噶尔等城市的通路。据我国著名的中亚细亚旅行家尼·米·普尔热瓦利斯基说，经行别叠里山口的交通往来是很热闹的，从卡拉科尔、托克马克和伊宁等城市出发，可以骑马和骆驼全年通行。从卡拉科尔到俄国村庄斯利夫金娜娅（克兹尔·苏）一路都是便于行车的十分平坦的地方。再向前进，道路是穿过扎乌卡河和卡什卡·苏河的峡谷② 通行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上面所详细叙明的我国委员所草拟的外伊犁边区东南部的国界线，大部分长度都是沿着山岭的折断处或分水岭而行的，具有巩固持久的国界的特性。同时，归入俄国领

① 科斯岑科：《土耳其斯坦边区》，第1卷，第46页。

② 普尔热瓦利斯基：《中亚细亚的道路》，第84—88，491页。

域的有察林河和特克斯河上游的全部河流地域，以及从我国境内通过位在穆扎尔特山口迤西天山主脉的各山口前往东土耳其斯坦的最便利的通行道路。留在中国权力之下作为伊宁省与喀什噶尔的交通道路的，只有一个名为"冰达坂"穆扎尔特山口，正象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这是天山中最不便利的一个山口。这一山口从伊犁盆地通过南面山隘的冰海。这个冰海长十二俄里，宽约八俄里。冰海的尽头是砍成阶梯的阶地。马匹和驮运是用绳子牵着走下这一阶地的。由于用这种方法牲畜很难登上，从伊犁盆地出发的商队只走一次直接的道路，返回的道路则选定通过别叠里[①]山口行走，该山口的北面出口是在俄国境内，从而是在我国权力之下的。

上述的划分国界线，在这一关系上对我国也有极其重大的利益，即这个国界从南方起把勃沽和沙雷巴什部族的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的全部牧区都包括进来，而且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差不多把该部族全部保持在俄国属管之下。因此，这些游牧部族，他们大多数特别是沙雷巴什部族当时是以凶恶癖性著称的，终于同中国人分离并永远脱离他们的势力范围，而这却大大便利了我们对他们进行监视。

关于与中国人讨论划分国界问题谈判时，我国方面所应掌握的行动方法，曾经按照上述训令的指示拟定，向中国代表声明只有在确切根据《北京条约》划定国界的条件下谈判才能举行，然后坚持按照中国的常设卡伦线实行划界。如果中国人按照自己政策的习惯办法拖延谈判，那么就确切根据《北京条约》和外交部上述训令编成国界线草案，向中国委员提出并请求作出绝对的答复：他们是否同意接受我们所提出的国界草案。

这样提出问题对于我们在下述关系上具有极为重大的利益，

① 科斯岑科：《土耳其斯坦边区》，第1卷，第47页。

即使中国人对于我们的要求无法避开直接的和坚决的回答，并避免无益的拖延谈判，而且在停止谈判的时候，责任也就完全落在中国人一方。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同意继续谈判，那么他们也只有在同意接受我国向他们提出的国界草案情况下，才能举行。我国委员所编成的国界线草案，是把《北京条约》中只作大体规定的国界方向作出详细的发展补充。很明显，在象《北京条约》这样重要的国家文件中，不可能把国界全面详细明定，确切指出国界所应经行的一切地方天然界线的确切名称。这种在地图上详细标明国界，以及然后按照自古所定下来的公认的原则实地设定的责职，从来都是责成对边区地方条件和地形测量性质特点完全了解的两国委员来担负。在现时的情形下也是这样，我国委员在详细全面地审察并仔细讨论了有关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一切情况以后，选定了这个国界的经行方向，它是完全符合《北京条约》规定的。同时我国委员深信，它会在帝国的这个边区促进俄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和巩固。

在编定上述国界草案时，我国委员面临的是首先需要阐明一个问题：对于条约中所提到的现有的中国卡伦线应当作怎样的理解。如果这些卡伦只是构成一条封锁中国西部领土的连续不断的界线，那么在国界应当沿着中国卡伦线而行的那些地方国界如何标明的问题，可以说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但是，遗憾的是，实际上中国在西部的卡伦，象在前一章已经详细叙述过的，不是布置在一条线上，而是在几条线上。因此，当然发生了新的问题：这些线当中的哪一条线应该作为国界？

委员们全面讨论了这一重要问题，并联系现有的来源于中国的有关国界卡伦的材料加以考虑之后，发现原来在条约中所提到的卡伦线，更正确些是应当认为是中国军队经常占据的那个卡伦线（常驻卡伦）。在这条线以西分布的所谓前列卡伦或外线卡伦

(前界),不是根据北京政府命令而是按照地方当局命令设置的,而且是有一定时期的并经常由一处迁往另一处的,显而易见,它们无论如何是不能表明国界的。它们既保持特有的流动性质,因此没有任何的固定性和稳定性,从而也就不能成为确定巩固的国界的支点。由此可见,只有自古以来设在同一地点的常设卡伦线,才应当在实质上成为真正的国界,何况早在乾隆皇帝在位时代(1736—1796年)开始建立常设卡伦线的时候,中国政府自己似系已经预先表明以这些卡伦作为中华帝国西部领域的国界线。但是,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西部国界必须无条件地按中国常设卡伦线划定,乃是《北京条约》的中文本条文。据校对过这一条约的俄文本和中文本的领事扎哈罗夫声称,其中在表达上有些不相吻合之处,这应当归咎于在最初制定时核对条约的两种文字上的疏忽大意。

据扎哈罗夫说,在这种关系上对于外交上的文件往来,最适宜的不是汉文而是满文,在塔城谈判时期,我国委员在同中国委员的一切交涉中也就使用了满文。 根据扎哈罗夫从中文原本的译文,《北京条约》第二条的文字如下:"西部的界线迄今尚未确定。此后应当沿着山岭、大河和中国现有的常设卡伦(常驻卡伦)线,即经常居住的卡伦线实行划定。它应当从1728年或雍正六年在沙宾达巴哈所设立的最后一个界牌处开始,直接向西至斋桑湖。

"从此处往西南,沿着特穆尔图淖尔湖(伊塞克湖)迤南的天山山脉前进至浩罕领域,构成国界。"

把这个条文同俄文本第二条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俄文本中没有"常设"字样,它应当加入在"现有的"字样之后。但是对我们来说,由于中国委员完全不懂俄文,这种情况在当前的谈判中并没有特别的不便之处。引证规定国界应该沿着常设卡伦线划定的《北京条约》第二条的中国文本,我们始终具有充分的可能在中国委员面前坚持国界线正是应当按照这个方向划定。一句话,条约

第二条中文本的用语："常设卡伦"（常驻卡伦），不能引起丝毫的疑义，在当前的谈判中使我们完全可以得心应手。根据上述的考虑，我们决定在当前的国际会议中尽力坚持沿着中国常设卡伦线划分国界，警告中国委员说，正是应当在这种名称之下来理解《北京条约》第二条所叙述的卡伦线。

这样沿着中国常设卡伦线来标明国界，对于我国来说，还在下述关系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在同斋桑湖接壤的地方奉行这个条件时，由于该处的常设卡伦线是从塔尔巴哈台山一直北行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再向前进至昌吉思台，因此富饶的库尔楚姆边区和拥有斋桑湖的斋桑边区，以及黑额尔齐斯河的下游，都应当归入俄国领域之内。应当指出，虽然在《北京条约》订立以前斋桑湖始终在中国的版图内，但是我国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利用中国人的爱好和平，自由地在斋桑湖上和黑额尔齐斯河上捕鱼。为了说明这种有趣味的情况，我要离开一些本题，说一说斋桑湖上捕鱼的开创和不断的发展。①

在从斋桑湖西端流出的白额尔齐斯河上和湖的本身上，捕鱼业的开创是在1798年，当时曾经颁发上谕，将为享有布赫塔尔明斯基堡垒以上沿额尔齐斯河捕鱼的权利而缴纳的款项，拨归石山口和布赫塔尔明斯基堡垒之间修整道路的经费。为此曾在托波尔斯克省和西伯利亚沿线召募志愿包揽额尔齐斯河上捕鱼为业的人们。由于没有志愿人应召前来，在该河捕鱼的权利曾授予西伯利亚的边防哥萨克军队，同时担负修整石山口和布赫塔尔明斯基堡垒之间的道路的义务。捕鱼是从1803年开始的，最初只有哥萨克人，后来也准许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去捕。在这个开始时期，捕鱼是在布赫塔尔明斯基堡垒以上至那雷姆河河口沿额尔齐斯河进行

① 这些材料都引自前任布赫塔尔明斯基渔场监督涅多列佐夫中尉的记载。

的。后来我国的捕鱼人逐渐沿额尔齐斯河向上移动至巴托夫斯基各卡伦(中国称为:霍伊·麦拉胡,霍尼·麦拉胡),最后还暗中达到当时属于中国领域的斋桑湖。据西伯利亚的老住户说,当时,即在十九世纪初期,在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内鱼类如此丰富,捕鱼人用五百个捕鱼钓竿一昼夜就捕到了鳇鱼和鲟鱼一千条。从1803年到1845年这个时期,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上的渔业给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的军事经费收入了五十万零四千八百八十八个卢布。

在这里完全表现出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善于适应地方和情况,并很快同地方的当地居民友好相处的本领。对这一点有很多帮助的是,差不多所有的哥萨克人都懂得吉尔吉斯语,有些人还懂得蒙古语以及中国口语。大家知道,通晓语言是充分了解民族的内部生活、风俗和习惯的最可靠的工具。

由于西伯利亚哥萨克人所特有的天生的灵活性和敏捷性,他们很快地能够利用良好的情况,而他们的捕鱼组合在达到斋桑湖之后,就沿湖前进,进入黑额尔齐斯河河口。

这里原来是鱼量最丰富的地方,鱼在这些地方的河湾里找到了隐蔽的栖身之所。据布赫塔尔明斯基军用渔场前任监督人涅多列佐夫中尉证明说,在黑额尔齐斯河河口捕鱼,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西西伯利亚总督卡普采维奇将军任内就已经进行了。在三十年代,我国的捕鱼人曾沿黑额尔齐斯河向上直至卡利吉尔河河口,而在四十年代,则已达到卡巴河,有时还继续向前达到布尔楚姆河和克兰河。

同时,我国哥萨克人也曾与中国属下的当地外族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土尔扈特人和乌梁海人进行零星货物的交换贸易。我国的哥萨克人居留在如此辽远的黑额尔齐斯河流域,看来丝毫也没有使他们不安。俄国人所固有的对于外地人的温厚和同情,以及我在上述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善于在每一处新地方了解情况,

并很快地同亚细亚内部当地居民相处，最后是处在外国境内必须遵守行为上应有的小心谨慎态度，这一切都促进了同中国人和中国所属外族人等的友睦关系的建立。在这些当地居民与我国哥萨克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相互的不满和争吵，更没有发生敌对的冲突，当时在中国的这个遥远边区充满了安宁气氛。

看来，西伯利亚哥萨克人所固有的这种品质，以及中国人的爱好和平关系，也就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地方长官能够容许我们不仅在当时属于中国的斋桑湖内，而且也在黑额尔齐斯河上游差不多三百俄里的地方自由享有捕鱼业的原因。促成对于我们有利局势的还有一个情况，即布赫塔尔明斯基军用渔场的监督人，多数场合都是委派善于很快了解中国人风俗习惯的、同中国人交往中具有修养和经验的、并得到中国人信任的哥萨克军官充任。

在我国捕鱼人们留居中国领域的时候，以及渔场监督与中国西部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两省长官人员会见的时候，这一切情况对我们在同中国官员的频繁交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会见是于每年九月在卡利吉尔卡伦（在卡利吉尔河）和六月初在白额尔齐斯河或下额尔齐斯河的巴托夫斯基卡伦（霍伊·麦拉胡）举行。在参赞大臣来到以前，佩有弓、箭和军刀的卡伦守卫十人到四十人，排成步兵式的一个横列，由卡伦兵士官长的一个军官在前领导。参赞大臣来到队形面前下马，在他接近时，全部排列的仪仗队不待命令立刻屈膝请安，然后起立保持原来的一个横列形式。这时参赞大臣就视察武器，询问兵士有何请求，全部的检阅仪式以此结束。为欢迎参赞大臣前来，吉尔吉斯首长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富丽堂皇的苏丹帐篷，在帐篷前面的一个不大的高处插着龙旗。同时，渔场监督人得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代表已经从塔城来到巴克图（霍伊·麦拉胡）卡伦以后，即派遣哥萨克军士往见卓尔干（参赞大臣的副官），请求通知大臣可以接见我国军官的日期。

在约定的日期，渔场监督人身穿礼服在翻译、哥萨克军士和为搬运礼物（每年从哥萨克军队款项中拨出二百卢布所购买的）而特别派遣的哥萨克人随从下，首先前往卡伦长官处，然后我国全部代表团在中国卡伦长或哈勒代护送之下进入帐篷，会见副官，副官预先视察礼物后，即带同监督人和他的全部护从人员前往参赞大臣所住的帐篷，谒见参赞大臣，这时，参赞大臣的三十人左右的随从人员在帐篷前面排成夹道列队。在我国渔场监督人进入帐篷的时候，参赞大臣从坐椅上起身，以友好的握手来欢迎他，请他坐下，问候我国君主和西西伯利亚各主要长官的健康，最后祝愿俄罗斯国家的昌盛，并问及我国渔业人员曾否受到中国属下的外族人的任何侮辱和压迫。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得到愉快的答复以后，参赞大臣这时就表示自己对于军官的满意，并诚恳希望这种友好关系将来还要继续下去，尤其是两个强大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

在此以后，我国哥萨克人向参赞大臣献上礼物，他按照中国的礼节最初加以拒绝，但是这只是做做样子，然后就收下礼物，并向渔场监督表示谢意，请他就座，这时桌上已经摆上各种中国食品。在宴请之后将告别的时候，人们把参赞大臣的礼物——一块一块的中国绸缎和棉织品、茶叶和中国零星物品送给监督人。除送给参赞大臣的礼物以外，还给他的副官赠送了为数八百尾的鲟鱼。

在1808年创立的布赫塔尔明斯基渔场，是最初的和最大的一项军队收入。从1808年到1876年的六十八年内，这个渔场给军队提供了五十万卢布以上的收入。

从上述布赫塔尔明斯基渔场的概况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来说，占有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下游乃是一种迫切的需要。现时在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上发展渔业，对于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以及

对于斋桑边区和石山口县的全部周围居民，一般来说，在经济关系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一切也就促使我国委员在面临的谈判中全力强求并坚决保持住斋桑湖地方，要把它和黑额尔齐斯河的全部下游地带归入俄国领土之内。但是实现这个目的在实际上却是很困难的。首先我国委员在这个场合必须协调两个相反的要求：尽可能地把斋桑湖全部掌握在我国权力之下，同时恰好把这个湖安排在国界上，象《北京条约》第二条所要求的那样，该条明定国界应当直接抵达斋桑湖。我国委员在仔细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重要问题之后，决定使国界采取这样的方向，即使它的一点顶到斋桑湖的东端，然后绕过黑额尔齐斯河的三角洲，沿该河右岸东行到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吉尔吉斯人称为阿克求别）。从这里陡转向南，向塔尔巴哈台山岭前进。因此，国界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弯曲线，它的出发点顶住斋桑湖的东端。

由此可见，国界向斋桑湖的东面边区而行，是确遵《北京条约》第二条的合理的必然结果。

不论多么希望避免国界在斋桑湖处的这种转折，使它采取较直的方向，即国界从大阿尔泰山降下以后，直接向黑额尔齐斯河盆地前进到玛尼图噶图勒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把国界向斋桑湖东面延展，不以斋桑湖为凭倚，这等于超越授予各委员的全权，并成为直接违反《北京条约》行为。采取这种违反条约的办法，无论对于我国如何有利，意味着动摇条约的本身，从而给中国人提供借口，在他们认为对于自己有利的时候也来违反条约。其实，《北京条约》的意义，在它的全部内容上说，包括俄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贸易利益，是如此之大，因此任何微小的违背条约的行为，都会对于我国成功签订《北京条约》所取得的现实利益产生不良的影响。除了上述各点以外，关于我国占有斋桑湖和在这个水库附

近相应地划分国界问题，也还由于一个重要情况而复杂化了，这就是规定国界的这个方向的《北京条约》的中文本与俄文本是不相符合的。在俄文本中规定，“西方的国界线至今未曾规定，现在应当通过沙宾达巴哈最后界牌西南行直至斋桑湖。”按照中文本《北京条约》第二条的字面意义，国界从沙宾达巴哈起应当向西行直至斋桑湖。尽管一看地图就会发现，这样的标示国界是不合适的，但应当预料到中国委员一定会坚持按照《北京条约》中文本的字面意义办事，并尽力辩驳我国所设计的向斋桑湖东端进行的国界线的方向。

在这种情势下和由于上述的斋桑湖在经济关系上对于我国的重要意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我国独占这个水库的必要性，我国委员决定在当前的谈判中坚决向中国人声明，对于我国根据《北京条约》在斋桑地方所拟定的国界线，不可能作出任何一点微小的让步。我们打算使这个地方的国界从大阿尔泰山向西南在哈莫图两个河流之间向斋桑湖的东北端而行。在这样标明国界时，按照《北京条约》第二条的规定，国界虽然也是引向斋桑，但是斋桑湖的本身却因此完全归入了俄国领域之内。

因此就很明显，变更国界的这个方向并给以另一种划法，使它从斋桑湖向东延伸，只有在《北京条约》第二条也作出相应的修改时才有可能。

后来，在1881年与中国人缔结新的条约，即《彼得堡条约》时，这一条由于想象到的不便，确曾作了修改，而国界既然从斋桑湖向东方延伸，也就取得了一个新的较直线的划分，关于这一点将在适当之处详加叙述。

接着转到考察同中国西部接壤的边疆地区居住的各族人民的问题时，我国委员讨论了下述的想法：在国界毗邻各地区居住的所有外族人，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智力发展和内部生活来说，都处

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属于游牧部族，而一部分还属于游猎部族，他们的猎兽业居于畜牧业之上。吉尔吉斯人应归于第一类，即归于游牧外族，而属于蒙古族的曾被称为“两属人”的阿尔泰乌梁海人则应归入第二类。这些乌梁海人在捷列茨克湖附近地区有他们的驻扎地点，在中国人那里是以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的名称而为人们所知。吉尔吉斯人的夏季牧场（贾伊利亚乌），按照游牧民族游牧生活的本来条件，如所共知，没有任何的稳定性，时常变换着，特别是在牧草不丰收的时候。至于冬季的牧场（克斯套），则主要是选定便于冬季放牧的地方，即选定能避开大风和大风雪的地方，例如深谷、山麓、森林附近等等。但是由于这样的地方在草原上不多，所以吉尔吉斯人珍视他们的过冬地方，比起贾伊利亚乌来变换较少。但是除了吉尔吉斯牧区的这些经常变更以外，还可以看到边区吉尔吉斯人有某种共同的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从西向东的移动，从某一点来说是“向东突进”。

这种移动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在中国人征服准噶尔人以后不久，当时吉尔吉斯人利用乾隆皇帝允许在巴尔喀什湖外游牧，就曾擅自越过前列或外边卡伦线（前界），并逐渐开始把自己的牧区向常设卡伦推进。从本世纪初期起，利用中国政权在西部边区的软弱无力，沿边的吉尔吉斯人开始大胆地扩张自己的游牧区，甚至越过了常设卡伦线，排挤在中国常设卡伦线附近居住的卡尔梅克人和其他外族人。在吉尔吉斯人这种前进运动中为首的是：白支吉特人、克扎耶夫人和卡拉·季列耶夫人。后者在十八世纪中叶在现时科克佩克丁斯克区内游牧，曾把自己的牧地移过中国常设卡伦线差不多有五百俄里之多。原在巴尔鲁克山中游牧的克扎耶夫人也是这样，他们不仅越过了这些山岭，而且越过了巨大的阿拉套岭，下到博罗塔拉河盆地。大汗国的阿德巴诺夫吉尔吉斯人也越过了阿尔滕·伊麦利山岭，占据了直至奎屯河的伊犁盆地，

而苏瓦诺夫部族的吉尔吉斯人则把自己的游牧地区扩大到切齐村。

尽管吉尔吉斯人出现于中国边界卡伦以内，破坏了规定任何一个外国人不得侵入中国境内的中华帝国的根本法律，但是地方当局却没有足够的办法，只限于向边界卡伦的下级官员发出一些饬令，不准吉尔吉斯人越过卡伦线。但是要执行这种饬令，在卡伦守卫人员人少力薄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区域，除了私自变动以外，在上述各部族向东进入中国西部国境的前进运动的影响下，在草原边区的沿边部分也受到更加剧烈的根本变动。在草原或中国西部接壤各省发生风潮的时候，游牧区也受到这样的根本变动。例如在上述的肯尼萨尔叛乱时（1837—1839年），特别是东干[①]变乱时（1864—1867年），都有过这样事情。在塔城谈判终结时，爆发了这种变乱，当时具有充分自由的迁移游牧的我国沿边的吉尔吉斯人，利用中国西部无人管理和无政权状态，很大的一批帐篷涌到这里来了。显然，吉尔吉斯人各部的游牧地区，在这样巨大移动的情形下，不仅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而且也变得极端混乱了。

在这种情形下，按照外族游牧人所占据的土地来划分国界，同时根据经济上的考虑，即遵循各部族利用和占有的土地，即遵循以国界线来划分这一部族与另一部族游牧地区的愿望，由于上述这种外族人的游牧生活和捕猎生活的特殊地方条件，在实际上是完全行不通的。象某些完全不懂事的草原管理人员那样，要求国界按照《塔城议定书》把一个部族与另一部族或一代外族人与另一代外族人区别开来，那是意味着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情。甚至如果假定，我国委员用某种方法也算能够做到划分这样的国界，使它在某些

① 俄国把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回族通称为东干人。——译者

部分上也符合于民族经济的界线，即符合于把边疆游牧民族和捕猎民族划分部族和各代的界线，那么我国委员就会陷入非常错误的处境，因为在签订《塔城议定书》以后经过一年，当时沿边吉尔吉斯各部族的所有游牧地区，都因东干人的叛变而陷入极度的破坏和混乱中，在这种混乱中要分清楚是很困难的。在中国西部国界游牧的草原外族人的土地问题当时混乱状况的真实图景，科斯岑科在他的《准噶尔的军事统计概要》中曾有所叙述。据他说(第97页)："经常性的内讧压力、各种部族的斗争、这一部族对另一部族的统治的更迭，都成为准噶尔人口逐渐减少的原因。战败的部族在两、三年内被砍死和消灭掉的不只是几万人，而甚至是几十万人之多。现时，当准噶尔地方刚刚恢复中国统治权之后，不仅难以断定该地方全部人口的数目，而且也不能准确找到各种部族所居住的地方。"除此以外，在东干人叛乱以后不久，中国所属的外族人还大量地进入我国境内。例如，在伊宁边区移交中国人以后，该边区的大部分居民数达五万六千七百二十人的塔兰奇人和东干人迁入了俄国境内。后来从1867—1877年的十年内，据官方统计，光是一个土耳其斯坦边区，即谢米列钦斯克州，就从它的东部和南部国界独立地区以及从邻近的草原各州，迁来了吉尔吉斯人男女四万人之多。

在国界外的外族人这样大量迁移到草原边区情况下，在草原边区移入武装居民和俄国农民，以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主要是在牧草歉收的时候，我国吉尔吉斯人进入中国实行垦殖和侨居，最后，在吉尔吉斯人从这一州迁到另一州的时候，吉尔吉斯草原上土地的利用和占有问题受到不断的变动，显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稳定性。从上述考虑的观点来说，应当得到结论，在游牧部族或捕猎人所占据的土地上划分国界，由于它们的特殊地方条件和特点，必须预先专门研究这些条件，而同时采取某种谨慎和周密的态度。

所有这些，我国委员都尽可能地作到了。但是不可忽视，他们

因接到训令，首先必须在草拟国界线的时候坚定不移地遵循《北京条约》的规定，即只是根据地方的地形测量性质和天然条件办事。在这种场合，要考虑沿边游牧外族人的土地所有，是没有根据的。

不应该把从阿尔泰山到中亚细亚最高山脉之一的天山这样漫长面积上划定国界线的主要和重大问题，同沿边吉尔吉斯各部族土地利用和占有这种次要的、显然是完全不相干的，可以说是偶然的问题，连在一起。在这种关系上，我国委员应该遵循国家的考虑，主要是注意到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应该服从国家利益，加之吉尔吉斯人所占有的那些土地，按照法律认为是国家所有的。因此严格来说，就是违反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情形，在这种场合也不能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

由此可见，在各游牧部族所占据的土地上划定一种按照地形特性符合于巩固天然界限的条件，并在地形的意义上具有一切便利，同时还要适合游牧居民经济需要的国界线，这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最适宜的国界，特别是在亚洲地方，由于它所包括的地域广大，认为是沿着显明的天然界限（主要的山脉或宽广和深浚的河流）而行的国界。但是，在游牧部族之间，这种界线同截然划分沿边部族并适应他们经济与生活方式的民族国界，并不是始终相符合的。

沿着主要山脉按山岭折断线或分水岭进行分界，虽在地形关系上有利，但会使游牧民族经济生活上受到拘束，因为他们为了放牧自己的畜群需要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而在这种迁移情况下，牧区的界限要以牧草的丰歉为转移，自然要发生变动，从而就会形成移动线。捕猎人也象游牧部族一样，追逐构成他们生存的唯一手段的野兽时，在捕猎不顺利的场合，不知不觉地就会从山岭的这面斜坡跨到那一面去，横越分水岭，从而侵犯了国界，因为

在山岭地方国界是与分水线相合的。这种天然的国界，专就捕猎民族来说，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现有的经济生活环境下，将显然是不利的，尽管它是符合于巩固的国界的一切条件。

上述的考虑，在游牧民族和定居务农民族的生活比较中也得到明显的证实。据阿·斯·霍米亚科夫理由充分的意见说："牧人和猎人不重视自己的家乡。土壤不是经过他们的劳动而得到改良的，稠密的森林地方不是经过他们同自然界的不倦斗争而造成的。他们没有那种把人同他所出生和居住的土地联系起来的链条。在敌对的部族进攻时，游牧人和捕猎人就起来战斗，在战败时，就甘愿逃奔异乡。凡是有牧场和草地、有森林可以捕猎的地方，他们处处都好。农业民族的命运则完全不同。已经到了社会教化把他们结合成为牢不可破的群体的时候。游牧的野蛮人的侵犯袭击遭到粉碎，成功的抵抗逐渐地扩大着永远受到威胁的国界。俄国和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他们都是以和平的耕犁战胜了邻近各部族的刀剑。"①

适应吉尔吉斯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经济生活需要，最适宜的国界可以是荒漠的和干燥的高地，这种高地不能吸引游牧人而是无人占据的。

但是这种国界不能形成接连不断的行列，它是以地段延伸的，永远不能符合分水线，在地形方面是不适宜的。最后，如果容许能在我国亚洲的东方边区，使国界采取把极边区的吉尔吉斯人游牧区与中国属下蒙古部族的土地占有完全划分开来的方向，那么在这种相邻关系中和两个民族人所共知的许多世纪的仇恨下，难以期待国界上的安宁秩序会彻底地和持久地巩固下来。所以这种国界，尽管符合于民族的条件，可是更要求它用作保卫和经常维持其

① 阿·斯·霍米亚科夫，第五卷，第94—95页。

应有秩序和治安的手段。

更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得出最后的结论，在游牧部族之间实行划界的时候，要使这个国界既能充分保证草原游牧居民的经济利益，同时又完全满足国家的利益，是很难遵守的。国界的方向应以政治上的考虑为转移，由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必要时必须牺牲地方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沿边居民的利益。在这种关系上用国界把吉尔吉斯部族分开，无论在经济方面看来是如何不适宜，而由于政治上的必要性，却是不可避免的。制定吉尔吉斯部族各州管理条例的草原事务委员会也正是作出这种结论的。按照委员会的结论，由哥萨克人占居我国与中国西部交接的国界，使我国属下的吉尔吉斯人与他们在外国领域的同一部族分离开来，在政治关系上是重要的。从上述的考虑可以看出，我国委员由于颁发给他们的委任训令，必须考虑到地方性质及其自然条件来确定持久稳定的国界，因此完全不可能对沿边外族同时既充分遵循民族的要求，又遵循经济上的要求。

各委员在全面讨论国界附近居住的各民族问题以后得出结论，认为在当前的谈判时，我国方面最好是不同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何况这种做法是完全符合上述颁给我国各委员的指示的。如果中国人方面就边界外族人的国籍问题提出声明，那么就向他们宣告，我国方面认为应当拟定一项原则，在划界时土地归入哪一国家，在该地方居住的各民族也应该归属那个国家。这种决定被认为是可以彻底解决沿边各外族人的问题的。

我国委员在与中国人的当前谈判中以及在编制准备向中国代表提出的国界草案时作为基础的指导原则，就是这样的。按照这个计划，我国与中国西部交接的国界，从沙宾达巴哈界牌开始，沿小阿尔泰山顶峰而行，直至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上游。从这里起，国界从山岭下到平原后，就向西南行，并以斋桑湖的东北端为

支点，然后向东，沿黑额尔齐斯河上行，至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国界从这里起陡转向南，走向塔尔巴哈台山脉。

国界达到塔尔巴哈台山岭之后，在通过布尔古苏台山口时转向西方，沿塔尔巴哈台山前进到哈巴尔·阿苏山口。在这里国界又向南方陡转，前往巴克图卡伦，并向前沿中国常设卡伦线到阿拉套山主脉北端，再向前进沿着这个山脊到它的西南端。国界从阿拉套山下到平原后，沿图尔根河而行，并进一步向南沿着中国的常设卡伦线到达伊犁河，在伊犁河齐钦卡伦处横渡该河，然后直接南行到春济卡伦，再由此处到特穆尔里克河发源的地方。从这里起，国界通过特穆尔里克山岭到格根河发源之处，然后转向西南沿卡拉套山和达拉图河而行到特克斯河。过特克斯河，国界沿纳伦河（中国称为纳伦·哈尔加）上行，在这里靠住了天山山脉。再向前进，国界达到葱岭，即从前的浩罕(现时的土耳其斯坦)的国界。

把这个草案与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和杜加麦利所编制的那些草案加以对照，就看出这两个草案与我们的草案有本质上的不同，主要是在标明与斋桑湖接壤的边区各地方区域的国界方面。按照加斯弗尔德的草案，国界从纳伦河河口沿额尔齐斯河上行，到它从斋桑湖的出口处，从西方和南方绕过这个湖泊到吉梅阿拉尔小河汇合处。因此，该湖的全部西南岸到该小河的汇合处，都应当归俄国所有，以便不仅在该湖内而且也在黑额尔齐斯河内享有捕鱼的完全自由，这是加斯弗尔德所打算的，虽然他所草拟的国界不仅没有达到黑额尔齐斯河，而且也没有达到斋桑湖的东岸。加斯弗尔德将军打算从吉梅阿拉尔河河口把国界引向哈巴尔·阿苏，再向前行，沿中国常设卡伦线顺阿拉套山主要山脉到乌安·塔什山口，从这里国界应当走向伊犁河与察林河河口相对处，沿察林河继续前进到格根河口，然后走向特克斯河上游，并从这里向南到天山山脉。

按照杜加麦利将军的草案，打算把斋桑湖分为两部分，或者是作为中立的湖泊，不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对于两国人民都可以进行自由捕鱼活动。

此外，杜加麦利将军反对上述我国委员所编制的国界草案，打算把外伊犁东南方的土地向中国人作若干让步。按照杜加麦利的意见，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把格根河盆地让给我们，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供给附近一切居民食盐的湖泊和银铅矿，是他们正在开发的，要把中国领域的这块土地合并到我们帝国，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必须诉诸武力，而这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政策的企图的。因此，杜加麦利将军认为，我国国界从伊犁河向南应当不是象我国委员所设计的沿着中国常设卡伦线而行，而是应当从该线向西沿察林河和大卡尔卡拉河，即沿着我国所有地图上作为假定国界所标明的方向而行。因此，桑·塔什山口和通往伊塞克湖的道路都留在我国手中，据杜加麦利的意见，这就很够了。此外，杜加麦利将军认为距离塔城十五俄里来划定国界线，一定会造成将来引起各种冲突的口实，应当注意到尽可能使这个国界更向西挪得远点。

从上述加斯弗尔德总督和杜加麦利总督所提出的国界方案可以看出，这个国界不只把一个斋桑湖，而且还把同它毗连的土地斋桑边区和库尔楚姆边区都留在中国领域之内。按照我国委员的草案，则国界所采取的方向，使我们把该湖和所有斋桑与库尔楚姆边区坚决留归我国所有。我国委员所草拟的国界在外伊犁东南部也是这样的，即不仅把格根河上游划归俄国所有，而且把察林河的全部流域也划归俄国所有。

向中国委员提出我方的国界草案更有必要，因为在7月2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中国人知道在我国地图上所标明的国界是沿着他们的常设卡伦线划分以后，就向我们声明自己的广泛而毫无理由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大汗国吉尔吉斯人所占有的土地，而且

还要求中汗国吉尔吉斯人的土地。同时中国代表否定了《北京条约》第二条和第三条的效力，借口因伊犁将军奏明哈布齐贤将军的中国部队被迫离开伊塞克湖附近地区而从北京所奉到的上谕。最后，中国人建议我们请示外交部的新训令，我们对这一点向中国人指出他们的要求完全没有根据，尤其是关于《北京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无效。我们向中国委员说明，《北京条约》在关于国界的谈判中应当成为两国的主要根据，尤其是在该条约中已经明白规定必须严格遵守。最初中国人同意了这种说明，并转而讨论"常设卡伦"的意义。我们举出了昌吉思台和巴克图作为这种卡伦的例证。中国人同意我们关于前者的意见，而把巴克图称为国内卡伦，并补充说，我国城市谢尔基奥波利、列普辛斯克等等应该认为是外部卡伦。对于这一点，我们按照中文本详细确切地向中国委员说明了"现有的常设卡伦"的确实意义。

在短暂的休息以后，中国委员这时彼此进行了热烈的谈话，他们谈到民族问题，并且硬说所有吉尔吉斯人都是属于中国的。在这种声明以后，我们不知对何者感到惊异：是中国人的笨拙无知，还是他们的蛮横无礼。

很明显，这种声明被我们毫不费力地驳倒了，但是中国人没有收敛，他们又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把阿尔泰乌梁海人算作谁的属民？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答复他们说，对于沿唐努乌拉山游牧的乌梁海人部族，我们没有要求。但是当他们把居住在捷列茨克湖附近的，在我国以捷列乌特人而闻名的部族称为乌梁海人时，这时他们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扈从人员之一的科布多官员就完全肯定了我们的说法，同时又补充说，两旗的捷列乌特人，又称为两属人，都是属于他们的，而第三旗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声明是与1727年10月21日所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第三条完全相符的，该条约规

定："乌梁海人曾向某一方缴纳貂皮五张的，将来仍旧留归自己领主的属下，而缴纳貂皮一张的，从边界条约订立之日起，将来永远不再向他们征收，这样议定之后以约文为证，由双方各执一份。"由此可见，关于乌梁海人的国籍问题，早于1727年就已根据《恰克图条约》而得到解决，而《北京条约》只是对从前所定办法确认其拘束力而已。

此后，中国首席委员明将军又提出关于土地的问题，他说由于征服的权利准噶尔已属于中国，因此其中如果还有属于俄罗斯国的外族人居住，那么我们有权使他们迁往自己地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表示意见说，征服准噶尔之后，为了保卫他们的帝国西部国境，防止草原游牧居民方面的敌对阴谋，曾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所谓常设卡伦的防卫线，当时就有中国军队占据驻守。我们说，这条线也就构成了中国西部领域的国界。但是因为按照《北京条约》，国界应该沿着常设卡伦线划分，所以在这条线以西一切土地和地方的居民，都应该认为属于俄国所有。但是中国人以笨拙的顽固性和傲慢的自信对我们的意见继续进行争论，硬说现时的常设卡伦线是内线，而外线则应当理解为阿亚古斯(谢尔基奥波利)、列普辛斯克和其他等等。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这种过分要求，不得不向他们指出，他们所说的存在外卡伦线的地方，早已建立了我国的城市和村镇，因此关于这些地方都没有谈论的余地。

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明谊将军建议在下次讨论国界线的方向问题，要从三个主要部分进行审议：(一)从沙宾达巴哈界牌到斋桑湖；(二)从斋桑湖到伊犁地区；(三)到浩罕领域的国界其他部分。

从上述在第一次会议与中国人所进行的谈判中，可以看到中国委员在讨论国界线的方向时，也曾涉及一些国界上的细节，例如关于在国界地方居住的游牧外族人的问题。可是，在后来的各次

会议上，中国委员完全突如其来地声明说，他们受到北京军机处最高命令的委任，只是进行国界的谈判，但是他们对于国界不能有所决定，因为没有奉到对此的全权委任。中国人向我们所作的另外一个更加使人出于意料之外的声明是，他们不能根据《北京条约》进行谈判，所持的理由是，那个条约是不了解地方情况的北京大臣所签订的。因有中国边疆官长向北京的呈请，中国政府曾经命令他们考虑地方情况进行谈判。中国人也表示，凡是互相协商所谈到的一切，他们都应当呈报本国政府批准。

由此可见，作为我们进行国界谈判基础的指导原则，与中国人对于在中国西部划定国界问题的观点是完全分歧的。经皇上全权委任授予我们的权利，不仅是进行国界的谈判，而且也准许确定双方代表相互协商在塔城就地决定范围内的国界线，而中国人被授予的权利只是进行讨论。这种情况，以及中国委员公然否认《北京条约》对于他们的拘束力，引起我国委员对中国代表这种声明的正确性和他们的愿望发生怀疑：所有为谈判而草拟的国界条约条款都要送交北京政府审核，也许还要送交欧洲的各国公使。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委员确信在这种与我国相反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是无益的。但是，为了使中国人此后不能否认他们对我们所说过的，即他们无权确定国界，而必须预先呈报北京，还有他们在谈判时不能遵守《北京条约》，我们在彼此协商会议上，决定正式质问中国人关于北京政府发给他们全权证书的意义，同时向中国人指出我国全权证书的效力，以便在证明相互的同等效力的全权证书之后，能够按照《北京条约》第二条和第三条的确实意义就决定和划分国界迅速开始互相协商。

如果中国人提出否定的答复，即他们在谈判时不能遵照《北京条约》的规定，那么我们没有什么可作的，只有率直地讲明，即要向中国人作正式通知，声明在这种根据上不能继续举行谈判，我国委

员将迫不得已停止谈判并离开塔城。在我们得到的对于这个声明的答复中，中国委员尽管又硬说他们没有全权的名位，但是不能再说从前说过的话，即他们似乎只是被委任来解释国界问题，而在共同协商中的一切决议将来必须呈报北京批准。恰好相反，从这个答复中可以看出，他们被授权不仅关于国界问题进行谈判和作出决定，而且有更多的权限。中国政府现时已经命令他们：关于此后必须作出的一切处理，也应当在塔尔巴哈台的互相协商中加以决定。

从这种答复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最初打算根据《北京条约》进行划界事宜，但是由于伊犁将军的呈请，它就送来以黄色标明界线的地图，命令乌里雅苏台将军在谈判国界时遵循这个地图。由此可见，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发给中国委员的全权证书的意义问题，已经在肯定的意义上得到解决了。从中国委员的答复中我们得到证明，北京政府已经完全授权在塔尔巴哈台的自己代表来决定国界，并且是以《北京条约》为根据的。上述要求遵循北京送来的地图的命令，我们作为未经预先向我国政府申告的东西，而予以拒绝，并置之不理。在我们预定下次开会的日期，即8月12日，我们按照相互商定采取下列原则：一遇适当机会就使中国人了解，我国政府对于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问题并不很感兴趣。因此，我们于8月12日来到公房参加国际会议，认为最好在彼此寒暄之后，不首先开始谈论国界问题，而是一直等待中国委员开始谈到的时候，才向他们回答。但是中国人也同样想采取忍耐态度，沉默不语等待我们首先发言。这样沉默不语长达半小时以上。最后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首先开始谈论国界问题，他向我们声明，关于划定国界线的谈判，他们必须根据从北京得到的最高命令和附送的地图才能进行。他们不能根据《北京条约》来解释国界，因为常设卡伦构成内部卡伦线，并且距离他们的内地太近。同时，在这条线之

外向西还有另一条外卡伦线(前界)。据中国人说，往昔时代这条线构成准噶尔领域的西部边区，在这边区之外才开始是吉尔吉斯汗国所占有的土地。

后来，在乾隆皇帝在位时代，中国政府曾经准许吉尔吉斯人越过此线在前界与常设卡伦之间的地域游牧。中国人因给予吉尔吉斯人以自由游牧的权利，曾向他们收取了赋税——马匹。作为这一切说法的结论，中国人断定，在《北京条约》第二条明白规定："西部国界还没有划定"，这就意味着不可以说应当沿着常设卡伦线进行划界。因此需要商量一下：在哪里和如何进行划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我们在以前各次会议已经说明了的和在正式文件中已经通知过的，再向中国人重复一遍。我们声明的实质是，关于国界问题的谈判只有根据《北京条约》我们才能进行。他们从北京所奉到的最高命令，我们不认为对自己有拘束的效力，理由是这个命令预先没有通知我国政府，也没有经过它的同意。他们所说的地图，我们也不能予以考虑，因为据他们说，它是一百年以前制成的，所以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并按照《北京条约》第三条的规定，应在共同协商会议上共同决定，给我们制定最后确定国界的地图。他们所提出的沿常设卡伦划分国界由于距离他们内地接近而不适宜的意见，我们也同样不能加以考虑。我们说，中国政府在条约中决定沿着常设卡伦进行划分国界时，对问题是了解得很清楚的。如果它愿意使国界线沿着外部卡伦而行，那么在这种场合就会在条约中规定：沿着前界，而不是沿着常设卡伦划分国界。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权利改订条约，因为它是由两国政府批准的。

至于准噶尔的国界问题和现时在从前准噶尔土地国界毗邻地带游牧的吉尔吉斯人的问题，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当前的全部问题，是要按照当地的天然界限，即山岭、河流和常设卡伦线来划分国界。这时要去考虑吉尔

吉斯人和他们的游牧地方是没有理由的：不应该只是因为吉尔吉斯人在边区地方有他的牧民，而把关于划分国界的重大问题同不相干的、可以说是偶然的关于吉尔吉斯人的问题牵涉在一起。吉尔吉斯人在常设卡伦线以外所占据的一切土地都属于他们所有。在现时的谈判中，正当问题涉及两大国家划分土地的时候，关于吉尔吉斯人是不可能有讨论的余地。在按照两国委员的相互协议而将国界最后确定的时候，吉尔吉斯人现时正在游牧的土地，按国界线的指明归属哪个国家，他们也就可以说自然而然地随同自己的土地而归到那个国家去了。

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理由，大概对中国人产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影响。在会议将要结束时，他们比较让步了，并开始时常重复说，他们不敢说他们似乎要否定《北京条约》。因此，我们向中国人建议：彼此预先商量以后，将来开会讨论划定国界时，必须以《北京条约》为根据。下次会议我们原定在8月18日或19日举行。但是中国人请求延期到21日召开。这种延期的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委员向伊宁通知我国不同意根据所送到的地图进行谈判，因为关于该项划界草案是按照伊宁将军的意见作出的，而按照我国委员的意见，是与《北京条约》直接相抵触的。

中国委员答应我们在《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原则上进行谈判，使我们产生了预定在8月21日召开的下次会议上达到完全良好结果的希望。但是这种预测没有得到实现。明谊将军在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提及成为我们之间意见分歧的地图，建议根据《北京条约》进行谈判。

可是在继续讨论时，中国委员，特别是参赞大臣却避开了上述的自己声明，又重新开始证明，只有北京送来的地图才能成为划定国界时的指导，尽管那时他们没有肯定说不遵循《北京条约》。按照中国人的意见，划定国界应当从沙宾达巴哈界牌开始，这是

1728年恰克图国界所达到的最终点。中国人说，按照条约，国界应从这里一直向西行，到捷列茨克湖（中国称为：阿尔滕湖），这里住有中国所属的乌梁海人，再向前行，到卡屯河，中国沿边官长每年都沿该河巡回视察国界。在这些地方居住着蒙古人，从来也不是俄国的臣民，而是处于中国官员统治之下，并从中国政府取得薪俸和赠品。因此，中国人说，在讨论划分国界之时，不可不注意到居住在沿边各地的民族。按照中国委员的意见，这种种情况都清楚指明必须根据北京所送来的地图进行谈判。

由于他们所指出的他们的地图与我们的地图有不同和差异之处，必须每方派遣官员就地核对地图，然后再按照地图确定国界。按照条约要沿着山岭、河流和卡伦标明国界，而不知道究竟是哪些山岭、河流和卡伦，那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曾向中国人说明，把国界引向西行直到斋桑湖是不可能的，因为该湖对于沙宾达巴哈界牌的方向来说，不是向西而是向西南。同时，把国界引向西方，不但不能到斋桑湖，而且在这样划界时，就要把我国托木斯克省各城市比斯克等等归入中国。再说在条约中"直接"字样是安排在"向西"字样之后的，这就是说引向西方的国界应当直接凭借斋桑湖。因此，我们认真遵守《北京条约》，认为国界从沙宾达巴哈起必须向南沿唐努乌拉山分水岭线而行，再由此向西直到斋桑湖。至于乌梁海人，或所谓向两国纳贡的"两属人"，那么他们所居住的土地还没有最终划分开来。因此，这些外族人连同土地都应当归入我国。如乌梁海人和其他外族人愿意照旧承认你们的政权，那么就把他们迁移到你们那里。同时我们向中国指出，乌梁海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忠诚是不可靠的，这就是说，这些外族人由于自己的轻信，忽而承认这一国家的政权，忽而又承认那一国家的政权。

然后我们请中国人注意，因为按照《布连斯奇条约》，两属人是

属于两国的臣民，那么中国人就没有权利不预先同我国政府协商而委派自己的官员。中国人建议按照他们的地图进行划界，我们已经肯定地加以拒绝，因为这会同《北京条约》相抵触的。同时，中国的地图是一些对于制图学没有一点起码知识的人所制成的，不可能在办理现时的事务中加以遵循。为了确证中国人不会制作地图，我们向中国委员指出一种情况，即在康熙和乾隆皇帝在位时代，中国政府曾把制定帝国地图一事委托欧洲人办理。

关于现时派遣官员核对地图一事，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不容置辩，在广阔的国界地域内可能有些不够了解的地区，加以核对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是这种事情，可以在塔城会议确定国界和签订议定书以后，由被委就地定界的官员去作。因此在谈判的时候，在地域广阔的国界上核对地图是没有任何必要的，这只有在最靠近塔城的一些地区才是可行的。

最后，我们提请中国委员注意，按照他们的官员以委员的名义向我们所作的声明，在8月21日的会议上将不谈到北京送来的地图，关于定界问题的商谈将根据《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原则进行。明谊将军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也正是这样说的。

但是，在谈判的继续进行中，他们借口必须按照地图定界，这样就仍旧拒绝根据条约确定国界，换句话说，就是拒绝《北京条约》，我们向中国人说，你们这是否认条约。在这以后，我们应当告诉你们说，继续进行谈判将是无益的，我们应当解散会议。再就你们的地图来说，也不是与我们的地图那样不相类似，以致同它们毫无共同之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建议中国代表派遣他们的官员前来我国贸易站，我们将向他们提出从沙宾达巴哈到斋桑湖的山岭与河流名单作为例证，他们就会看到在他们的地图上也注有同样的名称。因此，他们是可以遵守《北京条约》，并同时对照自己

的地图来进行国界谈判和确定国界的。

从上述8月21日我们与中国人所进行的谈判中可以看出，这种谈判也是毫无成就的：中国委员不仅回避执行《北京条约》，而且在进行谈判的全部时期内尽力向我们表示，他们对于划界事宜完全不感兴趣，如果他们必须同我们分手，那似乎是很高兴的。

到第二天，尽管他们已经许下诺言，他们并没有派自己的官员到我们的贸易站来，以便把我们的阿尔泰边区山岭和河流的名称与中国的名称相对照。只是在次日才有些中国官员来到我们贸易站，当时就把注有满文名称的标明地方天然界限的地图给他们看，使他们把这些标注与中国地图上的标注作对照。但是中国官员们宣布说，没有预先得到他们参赞大臣的许可，他们不能把我们的地图拿去。此后，有两天之久，中国官员没有到我们这里作出答复。由此可见，从在塔城的国界谈判一开始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千方百计地拖延谈判，用各种各样的借口，而有时甚至没有任何理由，把原订的会议日期推迟到较长的时期。当我们派人去请他们的官员时，他们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才来到。

看来，中国委员自己同时在城内人民之间散布了极其荒谬的谣言，说为了迫使我们同意他们的建议，正在从兰州（距离三千多俄里）调动军队前来塔城，又说伊宁的地方官长已经命令出动军队来对抗我们，人数有五千多名兵士，最后传说在伊宁已经焚烧了我国贸易站。这一切谣言对于我们没有发生丝毫效果，不但如此，依据北京传来的消息，我们得悉中国所属的伊斯兰教徒在兰州发生了变乱，数达十万人之多。此后，中国人看到我们毫不为这些谣言所动，而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加以对待，又开始散布其他的谣言，似乎谈判之所以迟延，是他们正在等候北京的邮政来文决定：是根据条约按照我们的要求给予我们一切，还是完全拒绝。后一传说具有一些根据，因为按照我们所获得的情报，中国委员于7月10日在

哈布齐贤率领下的中国部队离去伊塞克湖之后，象上文已经详细叙述的，曾经向北京发出呈报，他们是正在等待对于这个呈报的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委员在共同的协商中决定：不使中国人看出我们关心于划界事宜，等待他们首先约请我们开会。但是此后，如果在9月15日以前，中国人不同意进行关于国界的讨论和根据《北京条约》确定国界，那么就停止谈判，并解散会议。在离去之前，用正式文件宣布，把不能举行谈判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委员。

我们同中国人后来的谈判，按照两方协议在9月5日举行。我们前往公房参加这次谈判的时候，按照互相协商打算，如果中国人仍旧千方百计避开根据《北京条约》讨论国界，就把这次会谈作为最后的会议。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就已经看出我们的预料是不错的。中国人引证两国政府之间的二百年的友好关系，声明说在谈判中不应当发生任何困难。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说必须注意到旧有的外线（前界），而不是常设卡伦线，因为在常设卡伦线之外居有向我国用马匹纳税的吉尔吉斯人和布鲁特人。中国人声明说，如果你们认为这些吉尔吉斯人是属于贵国的，那么浩罕人，也是同样的外族人，也不是你们的属民吗？如果你们硬说在我国常设卡伦线以外的土地，应当划归贵国所有，那我们就不能继续谈判。试问我们能否同你们进行谈判，当你们认为有属于我国的两旗乌梁海人居住的阿尔滕湖（捷列茨克湖）是在你们的国境之内，而天然界限列勃苏（列普辛斯克）和伊塞克湖不也认为是属于贵国的吗？你们责难我们说，我们不同意你们按常设卡伦线划分国界的意见，我们这样就是违反《北京条约》。但是我们是根据所奉到的上谕这样做的，这就是说不是我们违反条约，而是我国大皇帝陛下违反条约？如果我们不是违反《北京条约》，而只是同你们的意见有分歧，我们就重复说明，如果你们要坚决主张按照常设卡伦线来划分

国界线，那么我们必须预先奏明我国皇帝。我们自己没有那种象你们所有的权能。对此我们向中国人答复说，毫无疑义，在我们二百年的友好关系之下，国界是会容易划定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北京条约》来办事。

根据这个条约，在常设卡伦线以外，已经再没有你们的土地，也没有从前的沿边的即外线的土地（前界）。的确，在五十年以前，居住在常设卡伦线以外的吉尔吉斯人和布鲁特人曾经承认过你们的政权，我们当时没有干预你们对他们的关系。可是现在，当你们已丧失了自己对于他们的权力的时候，并且没有力量平定吉尔吉斯人，我国为了在草原上奠定为彼此国家所同样必要的秩序与治安，根据需要，必须自己着手来处理事情。因此，这些外族承认我国对于他们的政权，承认是我国的属民。至于我国对浩罕人的问题，则与你们没有关系，我国没有你们也对付得了他们。

阿尔滕湖从来就不是你们所有的，而是中立的，现时按照《北京条约》就应当归入俄国的领域。列普辛斯克天然界限位置在常设卡伦线以西，显然应归我国所有，何况我国所属的吉尔吉斯人是在那里游牧。硬说伊塞克湖属于你们，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然后，关于中国人声明说违反条约的不是他们，而似乎是他们的政府这一点，我们指出说，不管是哪种情况，归根结底总是违反了条约，但是我们将始终严格遵守它，不管你们是否同意划界，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在你们常设卡伦线以外的土地，根据条约都是属于我国的。因此，遇有必要在这些土地上设立哨所或建立我国居民点的时候，我国政府将不征询贵国政府的同意。为了避免彼此间进一步的误解和在同一事物的无尽无休和毫无益处的讨论上耗费时间，并为了使中国人对我们关于应该如何按照《北京条约》确切意义划分国界的意见，不致毫无所知，我们向中国人声明，我们将编成一个备忘录供他们阅览，其中将按照《北京条约》叙明划界

方向的草案。如果这个被送交中国委员的草案在审核之后，他们同意这个草案，那么我们请求他们在十日以内给我们答复。我们在声明中向中国人指出，他们答复说按照常设卡伦线划分必须专门呈请自己政府的许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具有自己政府的全权委任，并担任封疆大员的重要负责职务，因此就应当享有政府的特别信任，完全不应当每次遇有极小的不够理解之处就请示北京。虽然，我们为了把我们所编制的国界草案交给中国人，请求他们于第二日即9月6日派遣官员前来，他们也允诺实行我们的建议，但是，他们又拖延了事务，因而到第三日，由于我们再次召请才派来官员取去上述草案。在这个草案中根据本章前面已经详述的情形标明了国界方向。中国人收到了我们的国界草案，尽管是没有用正式公文发送，但中国委员认为必须以正式公文答复我们。中国代表在这方面也象在从前各次谈判的时候一模一样，关于标明国界线方面尽力避开《北京条约》。同时，中国人对于自己违反《北京条约》规定的行为的辩解表现得十分无力。按照一切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委员的这种作法是由他们政府的命令所决定的。北京政府显然是意在：或者真正避免执行条约第二条，主要是规定按照常设卡伦线划分国界的那一部分，而这是要把从前属于中国的土地让给俄国；或者是要在签订西部国界议定书之前，把过去的谈判呈送自己讨论。看来中国人借此希望推迟国界问题的最后解决，并从而掩盖自己在边疆外族人面前的软弱无力，因为这些外族人直至今日虽然在实质上和名义上都承认受中国政权的统治，但是由于《北京条约》却必须永远归属于俄国政权之下。

因此，在这个场合，问题是在于保全中国的表面尊严和延缓让步的时间。

我们对于中国委员的这种态度，按照共同协商，认为必须从自己方面也以同样的态度加以对待，因而在这一次我们又重申了从

前历次会议已经发表过的迭次论断，即坚决主张按照《北京条约》的涵义，国界必须象我们在自己的草案中所建议的那样加以划定，不能有别的划分方法；这样划分国界不仅看不到对于中国有何碍难之处，而且反而会有益处，最后，中国委员和他们的政府不同意我们的国界草案，只能表示拒绝执行《北京条约》的唯一愿望。作为结束语，我们在这种正式关系上说明，我们被授权只是根据这个条约来进行谈判。因为他们，中国委员，想要避开这个条约，对它作错误的解释，所以我们不能同他们继续就国界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我们终止了谈判，将于 9 月29日离去，请求他们在这个日期以前明确答复：对于我们的国界草案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确信同中国人继续谈判毫无益处，并由于严寒来临，我国部队不可能留在塔城，所以从 9 月30日起就开始逐渐离开塔城，而没有等待中国委员的答复，虽然他们也曾答应在我们离开之日以前送来答复。同时我们作了安排，让中国人的答复送交我国领事馆，以便转到鄂木斯克城送给我们。

从上面所叙述的1862年在塔城同中国人进行的最初谈判的详细叙述可以看出，关于划分国界问题在这几次谈判中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另一方面，所举行的会商弄清楚了中国人的要求，指明在将来为了顺利地达到目的应当掌握什么样的办法。这次谈判所达到的主要成果，在于我国委员已将划分国界这个问题以对我有利的方式提出，使将来继续协商划界问题不能以别的方式举行，而只能在中国人接受我们给他们建议的国界草案以后，因此，我们一下子就成为形势的主人，深知中国人将千方百计地力求恢复暂时中断的谈判。

我国委员对于国界问题的这样办理，得到了外交部的赞同，对此下文将详加叙述。

第 五 章

在中国国界进行地形测量工作的概要。 装备特别考察团前往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盆地的必要性。 关于1863年早春季节武装占领国界的命令。 戈卢别夫大尉在鲍罗胡吉尔河谷所进行的侦察。 在鲍罗胡吉尔卡伦中国人对我国军官和护送马队的背信攻击。 基什·穆伦斯基部队官长安东诺夫中尉的死亡。 从伊宁省南部边区出动的我国军队与中国军队的武装冲突。 这种冲突的结果。

在与中国人进行上述塔城谈判的同时，认为必须对毗邻中国西部国境的沿边地带，首先是对其中在地形测量方面很少调查的那些地方，进行一次用仪器的地形测量。应当说，在同中国人开始塔城谈判的时候，即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地形测量工作在西西伯利亚各省和西伯利亚管辖的吉尔吉斯草原各州都已获得充分的发展，并包括了这个远方地域的很大面积。例如，在托木斯克省早在1838年，以及从1842年到1847年就已实行了比例尺每吋二俄里的半仪器目测的地形测量。这种地形测量的东部区域包括了与中国西部国境接壤的库兹涅茨克和比斯克州区，长度是从沙宾达巴哈界牌到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至于西伯利亚属管吉尔吉斯草原的地形测量，则是1832年开始的。在那个时候，即在四十年代，当发生吉尔吉斯苏丹肯尼萨尔·卡西莫夫叛乱的时候，在草原上正确地不间断地进行地形测量工作，曾遇到相当重大的困难。我国的测量人员在当时不安定的形势下，必须经常担心吉尔吉斯盗匪的侵袭，因此，必须保持特别警惕。这一切情况都使地形测量人员

在他们的业务上受到极端的限制，并使地形测量工作不可能按照原订计划所预期的那个内容和范围来执行。

但是，早在1832年由布托夫斯基中校所开始的，而在1837—1839年，1842—1843年由上校西利维尔格利姆男爵继续进行的吉尔吉斯草原的侦察工作，已经有可能把从额尔齐斯河到楚河和巴尔喀什湖的全部吉尔吉斯草原地区进行观察并绘成地图。此后，在1851年，曾对从我国边区据点通往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阿亚古斯和科克佩克特堡垒至塔城的道路进行了视察。这次视察的目的，是要在邻近道路之处迁入武装居民，并借此协助维护草原上应有的秩序和治安，这是为了实现政府与中国西部各城市建立正常贸易交通的意图极为必要的。从阿亚古斯和科克佩克特到塔城的道路视察，责成参谋本部大尉古特科夫斯基进行，在他的领导下绘成了从阿亚古斯往塔城至巴克图河的路线。第二年在这条道路乌尔扎尔（中国称为尤里·亚利）天然界限处选定了作为哥萨克村庄的地点，不久就把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迁入该处居住。

因此，到1854年，在东部吉尔吉斯草原所实行的地形测量的南部界限，是以巴尔喀什湖和伊犁河下游来标明的。再向南方前进，在谢米列钦斯克边区境内剩有未曾绘成地图的地方：科帕尔州区的一部分和伊犁河与卡拉塔尔河之间的地区。但是，在当时吉尔吉斯东南部草原的形势下，根据政治性的考虑，我们必须彻底巩固我国在大汗国的统治和势力，参加浩罕国的事务，同时与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接近，因为前往喀什噶尔的道路是通过该牧区的。

用武装居民占领外伊犁河盆地，被认为是最符合于政府意图的办法。很明显，为了实现这一切打算，必须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地区内坚持进行已经开始了的侦察工作。因此，加斯弗尔德将军在他就任管理军队和边区之后不久，当已决定在外伊犁盆地彻底巩固起来的时候，就认为必须把谢米列钦斯克边区的地形测量

工作暂时搁置下来，而对外伊犁边区刻不容缓地进行军事地形侦察工作，并将这项工作扩大到天山山脉的北部支脉和楚河的上游。这个地形测量工作，是在1855年由军事地形测量团陆军上尉沃罗宁开始的。

此后，在外伊犁边区的分区地形测量工作，就在随后的七年时间内逐渐继续下来，最初是在外伊犁边区的东部，然后在它的西部进行，在西部就与五十年代所进行的旧有的地形测量衔接起来了。为了使这次地形测量同早已在谢米列钦斯克边区开始的那个地形测量工作联系起来，曾在1858年向伊犁河迤北沿着伊犁堡垒至科帕尔城和再往前至阿克苏河的主要大道的方向，实行了地形测量。在下一年，即1859年，军事地形测量团上尉尼凡季耶夫曾绘成下列地图：谢米列钦斯克边区的北部，在巴尔喀什湖与卡拉塔尔河之间至阿拉套山边界山岭，以及在北方至阿拉湖向巴尔喀什湖北端延伸的沙漠地带。

在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所进行的上述地形测量，对于编制草原全部东南边界地区的地图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但是为此首先必须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即充分数量的地理坐标的天文测定，借此可以把所进行的地形测量纳入地理网。为达此目的，于1859年曾装备了由参谋本部大尉戈卢别夫率领的外伊犁边区考察团。戈卢别夫在1859年春季和夏季测定了谢米列奇和外伊犁边区内十七个据点的地理位置，其中有中国西部的两个主要城市：塔城和伊宁。根据这些测定于1860年编成了比例尺每吋五十俄里的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地图。

到1847年为止，在西西伯利亚各省和吉尔吉斯草原所进行的地形测量，以及1843年天文学家费多罗夫在这个边区靠近各据点所作成的天文测定，对于编制西西伯利亚和西伯利亚所属吉尔吉斯草原的地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个地图于1847年在参谋本

部西伯利亚独立考察团制成，比例尺为每吋五十俄里，而在第二年于军事地形测量厂房内制了版。

后来，由于积累了1847年以后所进行的地形测量材料和戈卢别夫大尉所作成的地理坐标的天文测定材料，得以修改这个地图。这种修改工作曾经作过两次：1851年和1861年。在1861年也把西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的专门地图制成石版，比例尺为每吋十俄里，印出了130幅。在这个地图上多山地带是采用瑞士迪弗尔法绘制的。除了所有这些官版的地图以外，为了了解相邻的中国各省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即塔城和伊宁，以及吉尔吉斯草原同它接壤地带的地形性质，扎哈罗夫领事所编制的地图是极有益的参考材料，这个地图主要是依据中国方面的资料，即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在康熙皇帝在位时代所搜集的材料制成的。

在这个地图上第一次把城市、村落、山岭、河流和湖泊的中国名称用俄文正确地注明了。正确地用中国文传达地理上的名称，对于我国委员在塔城同中国人举行谈判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那时处处都必须知道，中国委员在何种名称下了解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这一或那一地点。

这个地图在下述关系上对我国委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即该图上相当正确地标明了常设卡伦线，按照该线的方向在若干地方标明了国界，在上述同中国人谈判时，我们正是顽强地坚持了这一点的。

这个地图的唯一缺点是在于没有数学基础。因此，有些地点在地图网内位置放得不正确。此外，从伊塞克湖向南的地方注得不确切，这同后来的地形测量一比较就可以看出。

在军事地形测量团内有才能的军官鲍亚尔斯基参加下制成的阿尔泰东南部地图，也是我国委员可以用来了解最北部地段的国界，即托木斯克省阿尔泰山区的东部边疆的有用材料。这个地图

曾附在1846年访问过阿尔泰的我国著名旅行家奇哈切夫关于阿尔泰的著作之后。

上述的地形测量和地图，于1862年举行谈判时成了我国委员的极好参考资料，借此得以相当确切和详细地标明国界线：这条国界线从最北部起到沙宾达巴哈界牌为止，向西南行，沿托木斯克省东部边区至上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而在国界的南段是沿着阿拉套山脉前往伊犁河，再往前一直向南至春济卡伦，然后走向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至天山山脉，再沿天山山顶至从前的浩罕国领域。在这两个边区地段之间的（北部的和南部的）中间地域，包括从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至塔尔巴哈台山脉的地域，在地形测量方面是勘查得最少的。这个区域可以分为两部分：斋桑区——从斋桑湖向南至塔尔巴哈台；库尔楚姆区——从该湖向北至那雷姆河。在《北京条约》缔结以前，这个区域的所有土地都认为是中国的领域，要进行地形测量工作是完全办不到的。因此，按照鄂木斯克州外围区域军事地形测量勘查计划，于1837年拟定地形测量工作只限于吉尔吉斯草原的东面部分，从布赫塔马堡垒至斋桑湖这一段，并附有条件说："如果没有遇到中国人方面的阻碍"，再前往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北岸。因此，在吉尔吉斯草原所进行的地形测量，完全没有涉及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

缺乏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地方的确切地形测量材料，自然就会影响到制成地图。

在著名的欧洲制图家，如丹维利等所出版的旧时亚洲较好的地图上，斋桑边区主要是按照中国方面的材料标明的。这样一来，丹维利编成中国鞑靼领域的两个总图，都是根据耶稣教传教士张诚、热尔图、弗列杰利、法勃拉等所搜集的材料。按照中国康熙皇帝1722年，即其在位末年的命令所刊印的这些材料，根据从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那里取得的访询情报来描绘哈密以西亚细亚内部

的全部地方，而且有些路线是不足信赖的。因此，在丹维利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对地方的地理测定方面的大量错误，对这一点，贡鲍利特早已指出过了。例如，斋桑湖在丹维利的地图上位置在哈密城子午线以东一度，而实际上该湖是在该城以西十一度。1822年出版的阿罗乌斯米特的地图上若干地方地理位置的差距，同耶稣教传教士加列尔什坦和菲利克斯·德阿罗什根据乾隆皇帝命令在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所作测定比较起来，据克拉普罗特的意见，达到1/2—6度。

最后，根据中国材料编制的和在1833年出版的克拉普罗特的大地图（中亚细亚地图），关于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那一部分，在1862年和1863年西伯利亚地形测量人员实行地形测量之后，已经失去了它从前的意义。这个地图的错误在于：（1）不正确地划出了斋桑湖的湖岸线和不正确地描绘了塔尔巴哈台山脉和山岭：曼拉卡、萨乌尔套及其他等等；（2）错误地标明下额尔齐斯河和白额尔齐斯河发源于斋桑湖的中部，而后来的地形测量证明是在该湖的西端；（3）过份地夸大了流入斋桑湖的水源，这些水源的大部分并没有达到该湖而形成干涸的河沟。1863年，我随同部队沿斋桑湖南岸向黑额尔齐斯河移动时已经证明了这种情况，此点，下文将详细叙述。

上一世纪中叶，我国所出版的许多亚洲地图的主要错误，是在于编制地图时对作为基础的材料没有作出正确的分类和评价。关于必须把材料的概述附入地图的意见，早在十八世纪已为欧洲地图学家所承认，据萨普·德奥特罗什（《西伯利亚旅行记》，第一卷，第349页）说，遵循这个原则的有：杰里利、比尤阿什·丹维利和其他等人。近来俄国的地图学家在这方面也有优秀的楷模，其中特别显著的是，亚·弗·哈内科夫所编著的对于咸海和希瓦汗国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图说明书。在编制地图采用了各种各样来源的材

料情况下，例如仪器地形测量、军事地形测量、各别的路线和访询材料，在地图中附入说明书是非常必要的。在编制西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比例尺每吋五十俄里的总图时（1848年出版的），就曾采用这类各种各样的材料作为基础。在这个地图上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的全部草原面积，都只是按照地形测量团沃罗宁中尉所得到的访询材料而列入地图的。而这些材料是沃罗宁从前任布赫塔尔明斯基的军用渔场监督涅多列佐夫那里（涅多列佐夫曾编过斋桑湖的地图手稿）以及从当地卡尔梅克人、我国渔业人员和布赫塔尔明斯克边区的逃亡农民那里得来的。不管沃罗宁怎样尽心竭力地搜集了所有这些材料，它们无论如何也离不了访询、考虑和猜测的范围。为了把上述包括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全部面积的我国地图上的缺陷加以弥补，必须立即开始把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边界地区的全部地方绘成地图。因此，经皇帝批准拟定的沿西部中国国界线的地形测量工作，于1862年春季在斋桑湖开始，并包括了这个水库以南至塔尔巴哈台山岭和更向前至阿拉套山北支脉的全部面积。

担任斋桑地段国界地形测量的军事地形测量团斯特列利尼科夫少尉，来到斋桑湖以后，由于大量的大、小蚊虫使马匹和驮运牲畜极端困惫，进行野外地形测量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他曾达到库扬达河，由该处转而向南，并沿巴扎尔卡河和布加斯河盆地继续进行已经开始了的地形测量工作。然后越过塔尔巴哈台山岭通过坦迪阿苏山口，该军官来到了当时在塔城对面乌奇·哈姆塔设营的我国部队。同时，已经在阿拉套山北部支脉开始工作的另一地形测量组在地形测量团尼凡季耶夫上尉带领下也于这时来到了塔城。因此，我把该两军官召到塔城，在审查了他们所进行的工作之后，我认为必须急速继续已经开始的地形测量工作。所以就委托斯特列利尼科夫少尉进行斋桑湖南部沿岸的地形测量工

作，从库扬达河向东至黑额尔齐斯河河口为止，如果可能，就沿该河更向上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然后转向南方，沿中国常设卡伦线前进至布尔古苏台通往塔尔巴哈台山的山口，开辟与尼凡季耶夫上尉的地形测量组的交通联络。后者曾被委托继续进行塔城迤北的地形测量工作，迎着斯特列利尼科夫测量组沿中国卡伦线向塔尔巴哈台山岭前进，一有机会就尽力开辟与他联络的交通。

由于斯特列利尼科夫测量组沿斋桑湖南岸和黑额尔齐斯河盆地进行地形测量工作，与我国派往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作为各部队根据地的科克佩克特城的极边支点相距遥远，认为从这时起(1862年)必须增强派往库扬达河到斋桑湖附近的一支不大的哥萨克部队，人数至少应为步兵半个连。8月1日，这半个连在科夫图诺夫大尉统率下从科克佩克特来到库扬达河。从它来到的时候起，哥萨克库扬达河部队就化整为零，直接掩护在库扬达河以东进行工作，逐渐向黑额尔齐斯河下游左岸盆地移动的地形测量组。为了更便于掩护在这个地方进行的地形测量工作，我命令科夫图诺夫大尉也前往黑额尔齐斯河，并在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附近停留下来，而不越过中国的卡伦线。我国部队来到黑额尔齐斯河不久，就有一名中国卡伦的守卫人员来见我国部队长，宣称他们的军官派他来询问我国部队前来的目的，我国部队官长是否具有中国官长的书面许可。又补充说，如果请他离去所占据的地方，科夫图诺夫大尉将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曾向中国官员宣布说，部队没有中国官员的许可书，因为是在自己的境内，遵照自己官长的命令来到此处，没有自己官长的准许不能离开所占据的地方。当时中国人以歉然的态度答复说，没有什么办法，应当向塔城呈送俄国人来到的报告。同时，驻在塔城的中国官长尽管毫无疑问也曾收到这种报告，但是他们的委员表现出自己是精细的外交家，一次也没有向我们声明这种情况。只有在塔城谈判时由将军和参赞大臣

派来的塔城商务员萨某，为了同我们约定会议的日期，在谈话中顺便地似乎偶然地表示，他们得悉在黑额尔齐斯河出现了俄国人。我们答复说，我国人员在那些地方，只是为了修改地图，该项地图在现时划分土地的时候，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都是必需有的，无论如何没有必要由此得出任何违反两国友好关系的结论。看来，中国官员满意这种答复，再也没有谈到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

但是，中国人尽管看来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我国地形测量组出现在与斋桑湖和从东方封锁斋桑盆地的中国常设卡伦线相邻接的黑额尔齐斯河地方一事，实际上，他们还是尽力通过边区的吉尔吉斯人，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国地形测量人员在黑额尔齐斯河和向它的南方沿中国卡伦线顺利地不停息地进行地形测量工作。不容置疑，在这种场合，对斋桑边区中国属下的一切头目都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吉尔吉斯匪徒曾企图对科夫图诺夫大尉的步兵部队在向黑额尔齐斯河移动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但是，由于我国部队对击退这种袭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这种企图没有任何成功。

可惜，科夫图诺夫大尉的步兵部队不可能长久留驻在黑额尔齐斯河下游盆地所占据的阵地。由于杜加麦利将军的坚决命令，我国部队被撤回科克佩克特。杜加麦利，象在第三章所叙述的，认为中国人永远不会决定，不仅把黑额尔齐斯河下游而且把全部的斋桑湖让给我国。因此，认为我国部队和我国地形测量人员来到斋桑边区，无异是侵犯中国的领土，何况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国以自己的军队占据这个边区，这种行为就陷入了中国人所犯过的同样的错误之中，当时哈布齐贤将军率领的中国部队曾出现在伊塞克湖而被普罗岑科大尉的部队阻止住，并被迫退回自己境内。

我认为必需讨论一下杜加麦利的这种意见，而首先应当说明，他过早的担心害怕是产生于对我国武装占领国界问题的片面观

点。看来，他忽视了我国部队和地形测量人员留在斋桑边区境内是根据我发给他们的命令，他们不越过中国的常设卡伦线，从而就是处在按照《北京条约》应当归入我国领域的那种地方范围之内。至于哈布齐贤不只是带领中国军队越过了常设卡伦线，而且带同部队来到伊塞克湖，实际上已经处在属于俄罗斯的外伊犁境界之内。

从黑额尔齐斯河撤去步兵队伍破坏了我的一切措施，并对于在该处进一步进行地形测量工作发生了极端不良的影响。沿边的吉尔吉斯人得悉步兵队伍撤去以后，对待我国地形测量人员时变得更加大胆和更加无赖，并且利用自己人多势众，他们甚至敢于同我国地形测量工作组中的哥萨克护卫打架，最后还以肆无忌惮的蛮横态度声明，他们将不容许在他们的牧区里进一步进行地形测量。

在吉尔吉斯人这种敌对情绪之下，受到中国官员教唆的沿边吉尔吉斯各地区，可以预期一定会发生普遍的叛乱，斯特列利尼科夫少尉和我国地形测量工作人员远离我国极边据点科克佩克特城在三百俄里以上，可以说完全与文明世界隔绝了，他们的处境是极端困难的。这一切情况迫使斯特列利尼科夫终止继续进行地形测量工作，而返回科克佩克特。

这样，要全面完成1862年所拟定的从斋桑湖起在斋桑边区全部地区和黑额尔齐斯河至塔尔巴哈台的地形测量工作，并使这项工作在东部与中国常设卡伦线连接起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因此，为了彻底进行全斋桑边区以及库尔楚姆边区的地形测量工作，必须在下一年即1863年装备一个特别考察团，在较有力的和完全独立的部队掩护下，前往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必须向黑额尔齐斯河出动这样的部队，不仅由于需要保证在上述沿边地区做好地形测量工作，而且也出于政治性的考虑。我们必须预先向中国人

表明，我国坚定不移地认为斋桑边区根据《北京条约》是属于俄国的。上述的考虑促使我积极从事于斋桑考察团的组织工作，并亲自参加了该团。1862年冬季—1863年，我作了一切准备措施，以便于1863年早春季节能够在斋桑湖迤北和迤南的全部边区地域开始地形测量工作，并同时带同更加独立的部队前往黑额尔齐斯河盆地至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在这许多办法之中，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沿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组织轮船的航行。商人别林斯的轮船曾经沿额尔齐斯河从鄂木斯克城至巴甫洛达尔城成功地运送过西西伯利亚第六战斗营的两连半兵士一事，提醒我要研究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是否可能沿着这个水路建立轮船交通。早在塔城，在同驻该处的我国领事斯卡奇科夫谈话时，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关于勘查并建立从俄国到塔城的最良好最便利的商路，以便发展我国同中国西部的贸易。由于当时产生了从彼尔姆到秋明铺设铁路的建议，已经有可能从下诺夫戈罗德差不多直到塔城沿人工道路运送货物，即沿伏尔加河、卡马河到彼尔姆，由该处沿铁路到秋明，然后沿西西伯利亚各河流：图拉、托波尔和额尔齐斯，最后沿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到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从这里到塔城只剩下八十俄里的商队途程。想起我同尊敬的斯卡奇科夫就这一专题进行的长久辩论，我决定刻不容缓地利用良好的情况来实现这个想法。首先，我向商人别林斯建议，在他所属的“万岁号”轮船上沿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进行试航。在我同别林斯长久解说之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只剩下请求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的准许。在这一次，杜加麦利特别注意地听取了我的报告，同意了我所提出的理由。因为在他支配下的担任特别差委的人员之中，恰好有一个从前曾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务过的兹利亚霍夫上校，所以杜加麦利命令我委任他在当前的航行中担任观察和指导，这是沿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轮船航行的初次试验，需要小

心谨慎。在石山口山岭和布赫塔尔明斯克之间的区段，遵守这种指示更加必要，因为在这里额尔齐斯河被高山压缩，有足以妨碍轮船航行的很大的激流。在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上出现轮船的同时，我曾预定带同部队沿斋桑湖南岸也向黑额尔齐斯河推进。1862年所开始的地形测量工作，曾打算扩大到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的北部到中布赫塔马和那雷姆地方。从西方起，这个地区地形测量工作的范围曾预定限于白额尔齐斯河或下额尔齐斯河流域，而从东方起则限于从布赫塔尔明斯克盆地向南至玛尼图噶图勒干的中国常设卡伦线。在这个地形测量区域内，预定要对从北方流入斋桑湖的哈莫图河流域进行特别勘查，因为曾预定使国界沿着这个河流而行，直到它的发源处，然后沿着划分布赫塔马河南部支流流域与黑额尔齐斯河右方支流河系的山脉而行。预定绘图的全部地域经我分为三个区段：（1）斋桑湖北岸盆地；（2）库尔楚姆河盆地；（3）中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左岸盆地。每一区段的地形测量工作，都经我委托地形测量中有经验的军官去做。在进行地形测量工作的同时，也预定进行斋桑湖各地点的天文测定。边疆事务委员会主任克·弗·司徒卢威负责担任了这项视察工作的进行。委员兼考察团天文家戈卢别夫大尉自己承担在从中国卡伦鲍罗胡吉尔至伊犁河、从伊犁河至格根河和继续向南的国界的南部地段，进行天文测定。

办完一切组织和装备的措施以后，斋桑考察团主要应当关心武装占领国界地方，以便使中国人看到，我国在实际上所占据的地方，根据《北京条约》应当属于俄国。1862年的过去经验表明，必须于早春季节在沿边地点配置部队，以便遇到中国人象1862年那样决定从塔城和伊宁出发来视察国界时，有可能对他们预先实行警告。在这种企图之下，早在三月中旬就发出最后命令把部队向国界调动。四月初，各部队已经向给他们指定的地点推进，其中有些

部队，如塔城队和斋桑队，已经在四月初占领了指定的阵地。各部队在国界上的分布情况如下：

（1）在格根河：步兵一个连、哥萨克兵一个连和山炮兵一个排；

（2）在埃达尔雷·库姆天然界限处，靠近伊犁河：哥萨克兵半个连，带有火箭炮车；

（3）别利·布拉克天然界限处，沿尤根塔什山口东侧：步兵一个连、哥萨克兵二十五人和哥萨克马炮兵一个排；

（4）在卡拉乌尔·求别山附近，中国卡伦阿鲁·茨希达尼扬处：哥萨克兵四十人组成的哨所；

（5）在巴克图河，与塔城相对处：步兵一个连、哥萨克兵半个连和哥萨克马炮兵一个排。从这个部队中布置哥萨克兵在哈巴尔·阿苏山口放哨；

（6）在科克佩克钦卡河左岸，斋桑湖西部终端处：步兵一个连、哥萨克兵一个半连和哥萨克马炮兵一个排。打算从这个部队中抽调一百人派往库尔楚姆边区掩护地形测量工作组；

（7）在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发源处：哥萨克兵二十人的哨所。在这个地方，我拟定设立储藏粮食的临时仓库和经常运输站，把粮食运到向库尔楚姆边区推进的地形测量工作组，并在斋桑部队向黑额尔齐斯河调动时，保持与科克佩克特的交通；

（8）在布赫塔马河右岸，与中国卡伦昌吉思台相对处：哥萨克兵四十人的哨所；

（9）在卡尔马奇哈河（布赫塔马河的右方支流）：哥萨克兵四十人的哨所。

从所有上述的各部队中，引起中国人最大恐惧的是布置在巴克图河、塔城相对处的和斋桑湖的我国部队。中国商务员萨某曾经几次来到巴克图部队请求撤退，哪怕撤至第一道河，他宣布说，

否则，塔城官长在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对我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时候，就不能制止他们。

实质上，中国人是尽力想动摇我国部队官长的坚定性和强固性，在稍有退让的场合，就表现为自己对于我国优越地位的事实。塔城官员的一切要求都被我国部队官长哥萨克大尉巴拉诺夫拒绝了，因为我预先就对该大尉给了相应的训令。虽然此后曾因我国在巴克图河驻扎部队而有不大的中国部队出现，但是按照巴拉诺夫大尉的要求就向后撤退，分布在自己的各卡伦。关于上述装备斋桑考察团和我国部队占据国界的一切措施，我曾通知侍从将军伊格纳提耶夫，他当时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我国部队在占据与伊犁州接壤的国界南段的上述各个阵地以后不久，我国军队曾与中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引起冲突的原因是下述的情况：1863年5月31日，我国委员戈卢别夫大尉打算在中国卡伦鲍罗胡吉尔进行天文观察，从天然界限埃达尔雷·库姆阵地向该处出动了哥萨克部队，然后他本人带同部队计有步兵一个连、哥萨克马炮兵一个排和哥萨克二十五人来到了该哨所。在当天，应中国官员的邀请，戈卢别夫大尉派遣安东诺夫中尉和哥萨克军少尉叶尔金带同炮兵九人前往，以便加以说明。该军官等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好接待，并被请进卡伦。但是我国军官在马兵护送下刚一进入卡伦，就十分突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攻击。这时，三个下级士兵留落该处，而其他中箭受伤的人冲了出来。其中部队长安东诺夫中尉是一个前途远大的青年能干军官，受到了八处箭伤，不久即死去。叶尔金少尉受重伤，下级士兵中有五人重伤、一人轻伤。中国人开火追击我国部队，迫使戈卢别夫大尉不得不进行还击。那时中国人停止了追击，我国部队秩序井然地到达基什·穆伦。过两个星期以后，中国人又向基什·穆伦采取了进攻，但是被我国军队击溃，受到的损失是死亡五十人，遗弃小炮十五门。此后，于6

月22日又与中国人发生新的冲突，原因是在部队官长列尔赫中校实行勘查的时候，中国人向我国部队开了火。这时中国人被驱出鲍罗胡吉尔卡伦，试图从侧翼包围我们的一伙中国人也被击散。这次中国人的损失，死伤达四百人之多。我国方面死一人伤二人。

国界上的敌对冲突断绝了我国与伊宁的交通，并使我国领事馆的地位变得不无危险。忍受着当地居民的压制，并得到流放者企图袭击我国贸易站的消息，署理领事馆事务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少尉科洛托夫金曾迭次向伊宁当局请求协助。这种请求甚至没有被伊宁政府所接受，这就迫使科洛托夫金少尉带同领事馆的哥萨克卫兵从伊宁撤退。中国部队追击了我们，但是已经到来的黑夜和强烈的暴风迫使中国人停止追击，而我国哥萨克人由于天生的勇敢和善能认定方向，得以冲过中国卡伦线，平安返回科帕尔。

6月22日，叶连斯基少校部队在卡尔卡尔河地方使中国人遭到另一次失败。因此，企图从格根河盆地通往伊塞克湖和除掉了由哥萨克兵三人组成的我国哨所的中国人，被迫返回自己境内，并退过了卡伦线。但是，拥有中国人、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达七千之多的这个部队，又向格根河盆地推进，并且到达了恰尔科迪·苏河，在这里驻有叶连斯基少校的部队。6月24日，我国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部队被中国军队从各方面包围起来，但是由于炮兵和射击手的成功作战，得以退入鲍罗达勃松湖附近的山谷。中国人从塔尔巴哈台州方面，从他们的常设卡伦线外向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的入侵，也没有成功。巴克图部队长哥萨克大尉巴拉诺夫把企图通过塔尔巴哈台山哈巴尔·阿苏山口到斋桑湖西端和再向前到下额尔齐斯河的数达一千八百人的中国军队阻止住了。同时，安德烈耶夫斯基哥萨克少尉带领一个不大的哥萨克部队把中国人从下额尔齐斯河上的霍尼·麦拉胡卡伦(巴克图)驱逐出去了。最后，在中国国界的极北部分，在塔尔巴哈台山区，在两属人卡尔梅克人

所占据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支人数不多的中国队伍。中国人向卡尔梅克人声明，他们将要按照条约归为中国属民，甚至在他们的土地上设置了分界木桩。中国人在边界地带的这个辽远北方边区的这一切阴谋诡计，由于托木斯克省长列尔赫和参谋本部上尉普林捷茨就地所采取的明智办法，都没有获得任何成功。

第 六 章

从斋桑湖至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的黑额尔齐斯河盆地的勘查。 1862年塔城谈判结束后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事宜的形势。 外交部对我国委员在过去谈判中关于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问题的意见。

我国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外伊犁边区东南部的武装冲突，需要作迅速和谨慎的处理，以便制止中国人将来任意侵入我国领域，这不容许我在早春季节前往黑额尔齐斯河，所以斋桑的考察也不得不推迟到夏末，当在取得杜加麦利将军准许前往中国国界以后，我就赶快离开鄂木斯克前往科克佩克特，8月1日就到达了那里。

我必须在这里耽搁几日，以便完成装备斋桑考察团的最后措施，搜集关于黑额尔齐斯河附近国界情况的情报，并争取当地居民中若干显要的和有势力的人物的协助。他们当中在沿边吉尔吉斯人中间特别享有很大权势的，是科克佩克特区的苏丹塔尼·特列米索夫，我把他召到科克佩克特城。塔尼使我了解中国相邻领域和黑额尔齐斯河迤南沿边地方的情况。他表示完全愿意尽力协助考察团，并允诺也推动其他部族的吉尔吉斯人来协助，保证我在他们的牧区内将受到完全可信赖的并符合于我的全权委员职位的荣誉。我从自己方面向塔尼表示完全相信他的协助，并允许说，他对于我国政府的功绩和忠诚将受到边区主要长官应有的重视。

后来，我派塔尼立即到在斋桑湖东和黑额尔齐斯河下游游牧的、还没臣服我国的吉尔吉斯人游牧地去，就在那里等我到来。

上面已经提到，有一支强大的中国部队从塔城出发视察国界、

曾打算经过哈巴尔·阿苏山口，越过塔尔巴哈台山，沿着中国参赞大臣往时每年从塔城出发所经行的通常道路，即经过斋桑湖西端向北至霍伊·麦拉胡(巴克图)卡伦的道路继续前进。后来，据我所得到的情报，原来这个部队在中国委员博勒果苏率领下，企图通过哈巴尔·阿苏山口越过山岭没有成功，即转向右方(即转向东方)，决定通过在中国常设卡伦线上的布尔古苏台(库勃松·阿苏)山口越过塔尔巴哈台山岭。从这里博勒果苏面临着在下额尔齐斯河走向霍伊·麦拉胡卡伦的两条道路：(1) 不经过斋桑湖的西端，即沿每年视察国界的道路而行；(2)经过黑额尔齐斯河前往库尔楚姆河盆地。中国人希望证实沿第一条道路是否能够通行，派出了自己的一名侦察员，他假装商人才潜入到斋桑湖以南的巴扎尔卡河。就地证实，科克佩克钦卡河的浅滩渡点，是不经过斋桑湖西端前往霍伊·麦拉胡卡伦的通行的最捷便的道路，已为我国带有炮兵的部队占领，而下额尔齐斯河上的一切渡船都被放送到这个河流的下游并处于我国权力之下，博勒果苏委员迫不得已放弃了他从斋桑湖西方通往下额尔齐斯河的企图。因此他带领自己的部队缓慢地前进，从塔尔巴哈台山岭向北前往黑额尔齐斯河，来到玛尼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卡伦。由于通过库尔楚姆山行动困难，并担心同为掩护地形测量工作组而驻在库尔楚姆边区军事地形测量团尼凡季耶夫上尉领导下的哥萨克骑兵连的其他部队发生冲突，他也决定不沿斋桑湖北岸再往前进。因此，博勒果苏在阿克求别停留一些时候以后，就经原来道路返回塔城。由此可见，我国部队预先并且完全适应国界上的情况与当时形势对截断通往斋桑湖道路上的重要地点的占领，阻碍了中国人采取他们往年所例行的从斋桑湖向西视察国界。这样，配置所有这些部队的目的虽然已经达到，即没有容许中国人越过常设卡伦线到我国方面来，但是由于不久以前我国部队与中国军队发生的流血冲突，在国界上的当时惊慌形

势之下，必须注意保证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轮船航行的安全，防止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和当地半野蛮居民的敌对行为，然后对于我国地形测量人员以及我国渔业人员给予更加坚强和充分可靠的保护，因为中国人对于他们也开始出现了敌对态度。

在实现上述一切考虑以前，我认为必须：在斋桑部队沿斋桑湖南岸移动的同时，向该湖北岸派出哥萨克骑兵一个连由尼凡季耶夫上尉率领。我对尼凡季耶夫发出命令：到达斋桑湖东北端之后，转向黑额尔齐斯河盆地，并在钦基利迪天然界限处渡到该河左岸，同我的部队会合，然后沿左岸前进到玛尼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卡伦，在这里在中国常设卡伦线的视野内停下来。据传说在这条线上驻有大量的卡尔梅克人部队。为了阻止他们企图越过此线潜入我国方面，我在来到有斋桑部队集中的科克佩克钦卡河的卡拉乌特库利斯克浅滩渡头以后，立即派遣为数一个连的第一批部队前往斋桑湖，我自己带同由哥萨克骑兵一个连和哥萨克炮兵马炮二门组成的第二批部队，于8月13日沿同一道路出发。

在两批部队汇合之后，我沿斋桑湖南岸向前行进，而我委派的哥萨克部队，早从昌吉思台天然界限向库尔楚姆河河口前进，这支部队是掩护进行库尔楚姆盆地地形测量工作的维亚佐夫斯基准尉的工作组的。因此，所有向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出动的部队，都得到了更加集中的配置。这种情况不仅有可能应付草原考察中如此经常遇到的任何突然事故有充分准备，而且在沿边中国外族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方面有任何敌对阴谋的时候，可以采取坚决行动。同时，我国各部队在斋桑湖两岸和随后在黑额尔齐斯河盆地上的活动，以及在中亚细亚东北部这个辽远地区的斋桑湖水面上初次突然出现我国的轮船（对于半野蛮的、游牧的沿岸居民是从来未见的发火船舶的奇观），使吉尔吉斯人产生了强烈的，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印象，同时也使中国人难以应付。看来，他们已经决定

放弃阻碍我国往黑额尔齐斯河盆地向他们的常设卡伦线推进的企图，这在后来在我来到流入斋桑湖东南端的杰尔穆河和肯杰尔利克河以后，就得到了证实。在这个离部队预定停驻地还很遥远的地方，我受到了白支吉特部族、朱尔姆克后代和各支族的吉尔吉斯各苏丹、头目和显贵人物塔乌克、塞布拉特、西蒂、科江、卡拉沙等以及托尔·托乌尔和科热姆别特各部族的隆重欢迎。

据吉尔吉斯人首长们陈述，1863年春季确实有过卡尔梅克人集结在国界的传闻，但是关于他们以及其他人等和中国军队越过常设卡伦线前来我国方面，却无任何肯定的情报。同样，斋桑部队从杰尔穆河和肯杰尔利克河继续向黑额尔齐斯河盆地移动时，我也曾多次受到吉尔吉斯苏丹和显贵人物的欢迎，因此我的部队在这个地方的行军很象一种凯旋的游行。吉尔吉斯人殷勤地把帐篷、马奶和绵羊让给我国部队。从我们这方面吉尔吉斯首长曾被邀请来吃茶、吃羊肉饭和各种糖果。这种招待和宴请，在可怕的差不多是热带炎热之下疲劳行军之后，使我疲累不堪，因此后来我不知怎样才能摆脱他们。很明显，处于我的地位要拒绝这种隆重的接待和与吉尔吉斯苏丹和显贵人物的谈话，出于许多的考虑是不可能的，而我只好迫不得已履行了这个繁重的义务。

部队这样继续作进一步的移动，于8月16日来到了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在部队沿斋桑湖南岸移动的时候，我有机会证实我国当时地图上注有几条流入斋桑湖的河流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只有两条河流：杰尔穆河和肯杰尔利克河，其他河流没有达到斋桑湖，已经形成干涸的河沟，我带有大炮的部队畅行无阻地渡了过去。稍作一些修整道路是需要的，这已经做了，毫不耽误部队的行动，只用一支不大的步兵小队乘骑马匹，带着军事工程工具，经常走在部队的前头就行了。我们来到黑额尔齐斯河不久，有一个中国官员从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前来我国部队，并宣布说，他是来祝贺俄国

部队官长平安到达黑额尔齐斯河。中国人在我们部队中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虽然不难猜到他被派前来是抱有了解俄国部队的力量和组织的专门目的。

早在向杰尔穆河进军的时候，我已经收到杜加麦利将军停止我的部队向黑额尔齐斯河继续前进的命令。杜加麦利认为斋桑部队的行动是完全多余和无益的，可能引起同中国人的新冲突，特别是由于我所搜集到的关于卡尔梅克人在国界上集结的情报已为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军政省长潘诺夫的密报所证实。在结束时，杜加麦利补充说，近日我收到外交部的紧急情报说，戈尔恰科夫公爵请求尽力避免同中国人发生敌对冲突。

看来，杜加麦利在上述我国军队同中国人不久以前所发生的流血冲突的影响下，在南部沿边地区内仍感觉到中国国界地平线上似乎有着某些黑影子。结合杜加麦利一般对于国界形势的意见来考虑已经发生的情况，我已确信他之所以担心害怕，都是基于多余的过份小心谨慎和预测我的部队同中国军队一定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在我当时所处的那种情况，而且一般说在当时的国界形势下，执行杜加麦利的命令是绝对不可能的。把部队停止下来，采取返回的调动，这在当时我已迫近黑额尔齐斯河的时候，就会意味着牺牲考察团的重大利益，表现自己的软弱，并在中国人特别是吉尔吉斯人的眼目中丧失自己的尊严，因为他们的苏丹和显贵人物早已等待我来到黑额尔齐斯河了。由于上述的考虑，我决定毫不停息地继续前进，并对杜加麦利给与支吾搪塞的答复，借口说不可能执行发给我的命令，是因为收到这个命令的时候，部队已经处于黑额尔齐斯河在中国卡伦线的视野内了。我来到黑额尔齐斯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之后不久，就对这个卡伦及其邻接地方直至阿克求别山岭进行了勘察。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当时位置在黑额尔齐斯河的支流上，距离该河流入斋桑湖处六十八俄里，是在一个低

洼的地方，上面有十分陡峭的山坡，使附近的河岸高耸起来。从这个山坡上展望，可以看到卡伦本身和在它对面的一个多林的小岛，以及被布科姆巴伊斯克山岭封闭起来的黑额尔齐斯河右岸的盆地。左岸的盆地围绕着西伯利亚杨树林带（地带），在东南方为毗连萨雷·切科和曼拉卡山岭的萨乌尔套雪山封闭起来。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的房屋是由两个独立的建筑物构成的，中间地面形成一个院落，以编织的篱笆围起来。为了与黑额尔齐斯河右岸保持经常的交通，在卡伦内有两只小船。在斋桑部队驻在黑额尔齐斯河的时候，完成了尼凡季耶夫上尉从1863年春季起在草原东北边区所进行的一切地形测量工作，绘成了从天然界限克拉到黑额尔齐斯河河口的斋桑湖北岸的地图，把工作扩大于该河右岸盆地到塔克尔河河口，并向北到库尔楚姆山脉南坡。同时，其他的地形测量员们也绘成了库尔楚姆河盆地的地图，在达到该河的发源处后，把地形测量工作转向马尔卡湖，从这里他们经过库尔楚姆河中部地方转到那雷姆河盆地。从那雷姆河发源处进行进一步的地形测量工作，一方面是向中国卡伦昌吉思台，另一方面是向下沿那雷姆河，然后沿额尔齐斯河向上到霍尼·麦拉胡卡伦（巴克图）。共计绘成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平方俄里的地图。除了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两岸的地形测量工作以外，还进行了上下额尔齐斯河航道的调查研究，以便沿着这些河流和它们流入水库斋桑湖处建立轮船交通。为此目的，如上所述，成立了在兹里亚霍夫上校领导下的一个特别河道考察团。5月30日，考察团乘"万岁号"轮船从鄂木斯克启航，在十分平安的航行以后，兹里亚霍夫上校来到黑额尔齐斯河的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1863年8月，兹里亚霍夫从这里返航，越过斋桑湖沿额尔齐斯河向下，顺便视察了库尔楚姆河和布康河的下游。这次航行的结果是：勘查了下额尔齐斯河和上额尔齐斯河的航道，选定了作为码头的地点，并编制了全部航程图。

结合斋桑湖迤北地方的地形测量工作，参加考察团的管理委员会主任克·弗·司徒卢威除了在这个地方和相邻的边区作了十八个其他的测定以外，还测定了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的地理位置。此外，曾将黑额尔齐斯河左岸盆地向西十俄里到阿克求别山岭进行了比例尺每吋二百俄丈的地形测量，并将黑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及其邻接地点编成了经过访询的地图。已经进行的地形测量工作提供了斋桑湖岸的确切轮廓，测定了它的形状和大小，而天文学上的测定第一次给予可能来确定该湖在地理网上的位置。这一切的综合构成了丰富的材料，以便编制更加正确的斋桑边区地图。斋桑考察团的成果就是这样。这种成果使能了解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的地形，这对于当前与中国人在塔城的谈判，以及对于政府的企图和学术目的，都无可争辩地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所搜集的关于边区和它的游牧居民的情报，使有可能为将来把前属中国领域内的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这个辽远边区建立行政组织逐渐准备充分数量的材料。最后，斋桑考察团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塔城举行的谈判中向中国人宣告，我们认为他们的常设卡伦线是两国之间的国界，我们必须不仅限于作这种可以说是口头的声明，而且还在实际上用我国的部队占领斋桑边区的沿边地点。在黑额尔齐斯河上威力强大的军事形势下，由于调动斋桑部队对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沿边地区所作的这种武装占领，以及陈兵于中国卡伦线视野内的玛尼图噶图勒干，无可争辩地对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且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斋桑湖和该湖以东到中国常设卡伦线的全部地方，作为我国实际上已经占领的地方，今后应该完全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然后根据《北京条约》并入我国领土。但是除此以外，我国方面在这种场合的这种做法，即武装占领斋桑边区，已经由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我国与中国东方国界完全同类事件中所掌握的那种

办法，对于我们极有教益的实例在很高程度上证明是正确的。他认为必须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我们外交上的要求。因此，阿穆尔河在根据1858年《瑷珲条约》成为俄国河流以前，由于早经我国军队差不多全部占领而在实际上已经属于俄国了。

在斋桑部队驻扎黑额尔齐斯河的全部时期，不仅从中国人方面，而且从1863年夏季盛传在斋桑边区国界上集结的卡尔梅克人方面，我出乎意外地都没有遇到任何敌对行动。

看来，这个原因是在于我国各部队在与伊宁地区接壤的斋桑边区沿边地方击溃中国军队一事，也影响到了草原的东北地区，而且无可争辩地对中国人和卡尔梅克人都引起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在中国西部当时不安定的形势之下。应当说，当中国西部的全部国界上存在着俄国部队的威胁力量，而从东方又面临东干人叛乱的另一种威胁的时候，中国人的处境是极端困难的，他们也就不可能想到对我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至于说到沿边的吉尔吉斯人，那么他们既已感到俄国的力量胜过自己，便按照亚细亚政策的习惯办法，开始表示注意和殷勤，而且一般地对我采取了完全信任的态度。

在斋桑边区的这种形势下，我得以完成所预定的一切地形测量工作，然后由于上述杜加麦利的命令，决定沿着同一道路，从那时起吉尔吉斯人开始称为乌卢斯·召利（俄国道路）的道路，返回科克佩克特。我来到科克佩克钦卡河的卡拉乌特库利斯克浅滩渡头以后，收到了杜加麦利将军的新命令：急速前往塔城，已从那里得到中国委员声明，愿意恢复上年即1862年中断了的谈判。因此，我在卡拉乌特库利同我国部队告别，并向他们尤其是向哥萨克兵士表示我的感谢之意，感谢他们的出色服务和模范秩序，这种秩序在向黑额尔齐斯河前进和归途行军的全部时期，以及在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停留时期，都是始终如一地遵守了的。然后我同从黑

额尔齐斯河送我前来的苏丹塔尼·特列米索夫和其他吉尔吉斯首长与显贵人物辞别。我劝告他们彼此和睦生活，并力求以发展草原经济这个最主要部门——畜牧业的方法来加强自己的福利。看来，吉尔吉斯人对我的话感到赞同，向我祝愿一路平安，并表示希望将来在这个地方看到我成为更加重要的官长。接着我就在人数不多的哥萨克马队护送下直接向南方出发了。远远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笼罩着轻雾的塔尔巴哈台山岭。在走到近处的时候，我们看到塔尔巴哈台山的高峰已经覆盖着白雪。必须利用晴朗的天气赶快越过山岭。因此，我选定最近的塞·阿苏山口。塔尔巴哈台山北面的山坡，形成缓慢的斜坡，在攀登时没有特别的困难。但是在继续前进必须通过塔尔巴哈台山顶积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克服相当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沿塔尔巴哈台山南面陡坡和梯段往下时就更为严重了。我们在下到塔城平原时，都感到好象是处在另一种气候了。经过我们在跨越塔尔巴哈台山时所受到的寒冷以后，来到塔城尽管已经到了九月中旬，还是遇到了差不多是热带的炎热。从塔尔巴哈台山到塔城的地形，构成一片广阔的平原，东面为乌尔卡恰尔和巴尔鲁克各山所隔断。在这个平原上行进，除了若干地方被灌溉沟渠切断以外，没有任何困难。来到塔城以后，我就从事编写斋桑考察团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随同地图一起呈送给侍从将军伊格纳提耶夫。在从塔城回到鄂木斯克以后，我收到了他的答复，内容如下：

“我很愉快地读过了您的来信，这信是您早在塔城谈判时期所写的，而我却在上月即十一月才收到。您送来的关于在斋桑湖东侧和黑额尔齐斯河沿岸进行成功勘查的情报，是很有兴趣的。这种情报已经摘要送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以便刊入年报，并成为您上年有益活动的良好证明。”

1862年在塔城举行谈判的结果曾经国务大臣呈送御览，伊格

纳提耶夫将军和戈尔恰科夫公爵遵照皇帝谕旨通知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说，我国委员离去塔城以后，按照外交部的意见，国界问题已经作了应有的处理。中国各代表没有能够完全驳倒《北京条约》所明白规定的国界应当沿中国的常设卡伦线而行的原则。尽管中国委员回避他们政府所应承担的义务，但是国界问题得到最后的和使我国满意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必须在现时的情况下保卫我们的国界，防止中国部队新的任意侵入。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我国意图的全部国界线，我们可以静待适当时候来恢复谈判。同时，在国界上布置我国部队，一方面可以在国界问题上协助支持我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得以监视吉尔吉斯人和草原上的治安。

外交部也认为，中国人在塔城进行谈判的方法，相当清楚地决定着我们应当加以特别注意的办法，以便在将来使国界事宜获得应有的方向。

在这种企图之下，国务大臣打算在某些时候对中国人不表示我国方面同意恢复划界谈判的决心，并为此避免对中国地方当局作出边界问题的任何说明。如果中国长官自己主动并以书面向我们提出恢复谈判，那么对于这种建议应当予以同意，但是必须在那种场合，即中国人方面将提出证明，恢复谈判将在条约规定所明白表示的基础上进行，即国界将沿中国的常设卡伦线而行，从而两国委员无需预先协商一般的国界方向，全部国界问题将按照我国代表所提出的方案解决。

在转入叙述1863年在塔城所举行的谈判之前，必须预先提一下北京对上年塔城谈判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结局和发生我国部队与中国军队多次流血冲突的最近国界事件的反映，以及北京政府对于这种事件的意见。这一切都将在下一章内叙述。

第 七 章

塔城谈判进行缓慢和我国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国界上的武装冲突在北京所产生的印象。 我国驻办公使与中国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因此所发生的交涉。 中国各大臣对我方国界草案的反对意见。 我国驻北京代办格林卡对这种反对意见的漂亮反驳。 我国青年外交家说服摄政王恭亲王和中国各大臣接受完全符合《北京条约》的我方国界草案。 中国各委员表示愿意举行谈判并约请我国委员前来塔城。 我国委员的到来和谈判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结局。

塔城谈判的进行缓慢，特别是我国部队与中国军队在斋桑边区东南部发生的流血冲突，在北京也反映出来了。中国委员向北京政府发送密报，经常埋怨俄国委员的过份要求。

伊犁军事统帅(伊宁将军)① 也从自己方面，在他向北京的密报中完全歪曲地申述了中国人对我国军官和哥萨克人在鲍罗胡吉尔卡伦的背信行为，而这是在没有我国方面的任何原因造成的，不可能以任何方法来辩解。

我国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国界发生的所有后来的流血冲突，中国地方官员也都是用这种不正确的说法来呈报的。在中国委员和伊犁地方官长作上述密报的同时，我国方面也将关于划分中国西部国界问题的详细周密的通知，送交我国驻北京的驻办公使巴留

① 作者所称伊犁军事统帅、伊宁将军、伊犁总司令，当时清朝正式官名为伊犁将军。——译者

捷克上校。

因此，杜加麦利将军按照我国委员的提请，请求巴留捷克上校对于划分中国西部的国界事宜，从自己方面给与尽力的协助，并同时叙明，看来我们必须在北京注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来应付法国人和英国人对划分中国西部国界问题可能有的干预。我国驻办公使对于此事通知杜加麦利将军说，在接到部发通知要使在划分西部国界时采取中国常设卡伦线作为基础以后，我为此会晤了中国外交部① 人员，并向他们宣布说，按照《北京条约》第二条的意思，在现有的中国卡伦线字义之下应当理解为中国常设卡伦线，而不是根据当地边界官长的命令，甚至不经中国政府知悉而移入我国境内的暂时性的卡伦，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这种暂时性的卡伦每次经过我国的要求总是撤除的。

中国各大员同意我国驻办公使的意见，同时衷心感谢巴留捷克上校，说他们对于西部国界毫不了解，但是答应命令自己的委员要注意上述的情况，并一般地要严格遵守《北京条约》第二条的意义。

毫无疑义，他们也命令自己的委员不要忽视本国的利益。据巴留捷克上校的意见，划界的顺利进行将有赖于我国委员善于博得被派划界的中国委员的同情，因为在北京关于此事无论说了什么，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在北京作出某种决定，使自己担负责任，并且早已把一切交由熟悉地方情况的自己委员考虑处理，而他们一定会坚持并支持自己委员的行为。

至于说到采取办法注视法国人和英国人可能在划分我国西部国界问题中帮助中国人出主意的活动这一点，那么巴留捷克上校认为：一则他不能阻止中国人接受任何人的劝告；二则按照他的意

① 应为理藩院，下同。——译者

见，外国代表比起中国各大员对于此事还更少了解，他们对于此事过去和现在都不感兴趣，未必会怀疑到这个国界还没有划定。如果现在或将来产生困难的话，则不会是任何欧洲阴谋的结果，而会是由于中国的倔强性而产生的。

认为杜加麦利的意见是正确的，中华帝国现时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中，尽管国内进行内战、财政破产和不可能估计有力量，但是这一切都丝毫不排除依靠权利的愿望和合法性，任何一个中国大员都会象欧洲人一样，如果他相信自己对于不论什么事物的权利并且不愿放弃它，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事情，而不需要任何旁人对此的支持。同时应当注意，无论大清帝国官员的地位有多高，但是对于忽视国家的利益，他要以自己的头颅向政府负责的。

最后，巴留捷克上校表示自己的意见说，在现时划分国界，中国将比任何时候都不容易让步。不可忽视，中国是由摄政王统理的，他将要向皇帝报告。因此恭亲王政府也不能象从前那样自主行动，因为很难预见皇帝将如何看待摄政王现时的一切行动，特别是关系到领土完整的问题，中国人是给予重大意义的，任何的让步都可能被守旧者认为是非法割让中国的领土。

引叙我国在北京的驻办公使巴留捷克上校对于划界问题的这种意见以后，我应当附带说明，他根据上述某些政治性的考虑所提出的意见，在后来的各个事件中没有得到证实，这将从进一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虽然我国委员和中国委员在塔城的谈判已经中断，但是中国委员与西西伯利亚总督之间，以及我国在北京的驻办公使与中国各大臣之间的外交关系仍是很积极地继续进行着。例如，1863年6月初间，我国驻北京代办格林卡在就任新职正式谒见中国大臣的时候，得悉中国大臣打算很快同他见面提出请求。确实，6月10日，格林卡收到中国大臣的通知，他们埋怨俄国军队占据了从阿尔

泰山到天山山岭的全部边界地方和我国从这些地方驱走了中国部队，以及我国委员的迟迟不来塔城谈判。随后，我国代办会晤了中国各大臣，他们头几句话就开始把谈话引到《北京条约》的解释。但是我国代办坚决拒绝了这一点，申明说，我国委员已充分辨明了作为划界根据的条文的真实意义，我国政府完全弄清了问题的实质，并确信我国委员的草案是按照《北京条约》编成的，因此，中国政府在它的西部领域划分国界时必须表示同意，以条约的直接意义，或意义相同的我国委员的草案作为基础，谈判才能恢复。但是，看来中国人想这样提出问题：国界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通过还有疑义，我国委员的要求太过份。对此，我国代办向中国各大臣指出，1862年谈判之所以破裂，是由于中国人不肯遵循条约的直接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委员不能推翻与条约中规定完全相符的我方国界草案，而把自己的一切论据主要建立在严格遵守条约将对中国不利的说法上。同时，格林卡向中国各大臣指出，既然按照两国政府的自愿协议而缔结了条约，就不宜考虑：条约的贯彻执行是否对于某一方有利。我国委员只是要求一丝不苟地执行条约，只因看到中国委员顽强地拒绝这样做，才离去了。

我国代办补充说，由此可见，有赖于中国大臣解决的问题是：在西部划界应当赶快实行，还是无期限地拖延下去。因此，要我国委员来到塔城详细定界，中国主管部门也必须向我国政府声明接受我国委员所提的国界草案时，才能实行。此后，我国代办又曾与中国各大臣会晤，最初是在外交部的房舍内，后来是在北京的我国南馆内。中国人在这些谈判时，一遇方便的机会又把谈话扯到自己所喜爱的题目，解释“直接向西至斋桑湖”的词句。我国代办没有答复这个问题，而请求他们说明，中国各委员是怎样解释这些词句的？达乌塞大臣有些感到难以措辞，说委员们往来文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吵架互骂，因此最好是把它丢在一旁。这时格林

卡就请他命令把这种往来文件拿来，因为他知道它的内容，他在其中并没有遇到特别不体面的词句，然后补充说，只能给我们指出我国委员的草案是划界时应当遵守的基础，以及中国委员自己认识到，从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的总的国界方向只能是西南的。

但是中国各大臣不同意把自己委员的报告给我国代办阅看。按照某些情况判断，在进行这些谈判的时期，可以根据某些问题得出结论，中国人不坚持在北京来决定问题，而是避免这样做。他们在这方面的用意是明显的。在北京他们不可能长久拖延事务，而应当作出肯定的答复。他们可以命令各委员不作让步，并以谈判正在进行尚未结束为借口，抗议我国军队武装占据国界，因为该项军队为此目的将向中国常设卡伦线移动。

在相反的场合，如果中国各大臣愿意对我国让步，那么就给自己委员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而嗣后在应当向摄政王报告的时候，就经常可以把这种让步归咎于实行划界的自己委员。中国大臣文寿作为个人的意见，向我国代办说，如果中国人预先知道条约对他们不利，那么他们是永远不会签订的。这表明，条约上关于西部国界的规定，他们不认为对自己是适宜的，看来已认识到过于仓促签订了显然对自己不利的《北京条约》。

1863年7月16日，中国外交部人员来到我国南馆，这一次我国代办得向中国人简要叙明划分西部国界的问题已讨论到了哪一步。我国驻北京代表向中国人宣布说，中国政府的反对意见涉及条约上的两点：一是直接向西一语，二是常设卡伦的意义。

关于这些词句不可能有任何的疑义。斋桑湖位置在沙宾达巴哈的西南，为了到达斋桑湖需要采取这个方向。这种词句是如此明确，因而他们的委员自己也承认采取西南方向是必需的。因此，在我国委员的草案中也是这样注明的。但是中国委员如果甚至不同意这个方向只应当是西南的，那么在俄文本的条文中说得很清楚，

"西方的国界线，迄今还没有划定，今后应当从最末后的沙宾达巴哈界牌起，沿着山岭、大河和现有的中国卡伦线的方向，向西南行……等等"。我国代办说道，中国人可能推诿不懂俄文，并硬说中文本是他们所应遵循的，尽管条约中已经明白指出，它是俄文本的译本。但是无论如何《北京条约》的俄文本是正本，俄国委员就是遵守这个正本的。在俄文本条约译成中文而抄写时，造成了明显的错误。委员明谊说，从沙宾达巴哈到斋桑湖的边界线不是很直的，而是弯弯曲曲的，这种反对意见极为软弱无力，并且只能表示想延长无益的辩论。按照条约，我国委员建议沿着山岭和大河的方向划分国界，而且很自然的，有些国界线的转折和弯曲，适应该处地方的折断，是不可避免的。在上述范围内的国界总的方向，是西南，正象俄国委员草案中所标明的。

"常设卡伦"这个词同样是非常明确的。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把自己的卡伦随便分为多少类，并且说明它所有的一切卡伦毫无例外都是常设的。但是在条约中仍是"常设卡伦"字样。很明显，它们之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有别于暂时设置的非经常的卡伦。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所有的卡伦都是经常的，那么让他们说一说，他们的非经常的卡伦在哪里?!! 问题不是在于如何更好地称呼各种卡伦，而在于究竟哪些卡伦比之暂时性的卡伦是经常的。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当有任何的意见分歧，因为只有一条常设卡伦线，这条线也就是在条约内所提到的。中国政府现在埋怨说，俄国政府没有答复中国上年的通知，是故意拖延划界。我国代办对这个意见向中国各大臣声明说，如果俄国使馆没有把它所知道的塔城谈判进行的一切情况转告北京内阁，那么一则是因为它自己不了解事务的全部详情，二则是因为国界问题是在国界上而不是在北京审议和决定的，从而中国各委员应该将塔城所发生的全部情况报告自己的政府。况且，据大臣们自己说，中国外交部也知道

双方所提出的国界线草案和两方委员的理由。它同样必须知道，我国委员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迫于去年中断谈判并离开塔城，以及西西伯利亚总督给将军明谊委员写了什么信件和必须中国委员表示同意接受俄国委员的草案，谈判才能恢复。俄国政府在仔细研究了全部案卷，包括中国主管部于1862年11月发送彼得堡的说明以后所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委员的草案是完全符合于《北京条约》的真实意义的。

同时我国代办向中国各大臣声明，他说的这些话不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而是表达俄国政府的最后意见。如果他们怀疑这些话的真实性，或者是希望俄国政府改变自己的意见，那么就让他们写信给外交大臣和重述他们已经向他说过的话吧。我国驻北京代表向中国人声明，对此他并不反对，但是他预告他们说，他们不可能得到另一种的答复。俄国政府过去和现在从来也不拒绝划分西部国界，但是它希望按照某次已经承担的义务来实行划界，并且不打算变更条约或容许对它的歪曲解释。

格林卡从两次同中国外交部人员的谈话中，没有能够得出中国政府愿意在上面所详细叙述的、我们所接受的基础上来恢复谈判的最后结论。中国政府主张在国界上恢复谈判，但是，看来没有表示正确解释条约的愿望。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们开会将是完全无益的，我国代办向中国各大臣声明，必须我国接到某种保证，担保划界能在实际上成功的时候，这个会议才能举行。我国代办除了亲自当面说明以外，还与中国外交部进行了经常的和极其频繁的文件往还。

由此可见，在塔城谈判时期我国委员与中国委员之间所发生的无尽无休的争论和误解，也在北京反映出来，因为在俄国代表与中国大臣举行的会议中，几乎一字不差地在那里重复了这些争论与误解。同时，中国皇帝的各大臣显然是在尽力支持自己的委员，

象他们一样，把《北京条约》第二条的意义作了完全歪曲的解释，而且还采取了中国外交的其他特别手法和诡计。把会议上和中国各大臣书面所表示的关于划分西部国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意见仔细加以研究时，不能不谈到下述一些极为突出的情况。

中国各大臣在说到《北京条约》第二条中文本和俄文本对照中所遇到的错误时指出，原订条约俄文原本的翻译是俄国政府做的，而不是中国政府。当时，即在签订条约的时候，曾有协议，所以在条约内明白写成："往西直至"……假如在条约的中国文本中说的是："往西南"，那么中国政府永远也不会签订这个条约。中国政府应当遵循中文本条文，何况翻译文字是俄国人作成的，必须每字每句同俄文相符，双方才能签字盖印。在国际关系中条约重于一切。而现在十分突然地说出"错误"的字样。如果这一点被其他国家知悉，那么它们可能把此事归于俄国人意图不遵守条约。中国各大臣写道，我们的愿望是贵国方面不要使用"错误"的字样，以便不致引起旁人的纷纷歪曲议论。然后转而分析"中国常设卡伦"字样的意义，中国各大臣为了摆脱他们所处的难堪境地，推诿按照常设卡伦划分国界，有如条约的中文本条文所规定的，想出了采取中国外交所惯用的特别手法来说明中国语"常"字的意义。中国人硬说"常"不是永远具有理解为"经常的"意义。最后，条约上的"也按常设卡伦"字样是指明，国界应该不是一般地都按照常设卡伦来划分，而是主要地按照山岭、大河的方向来划分，而按照常设卡伦也是可以的。同时中国人恶毒地补充说，例如按照霍伊·麦拉胡卡伦及其他等等。应当指出，国界趋向这个卡伦，是通过斋桑湖的西方进行的，而斋桑湖在这种情形下就应当完全归入中国领域之内。

中国各大臣随后声明，我国代办所转达的我国外交部答复的内容，似乎没有包含对条约的详细、公正和确切的说明。但是这个答复只限于说明俄国委员的草案完全符合于条约的第二条。中国

各大臣就我国武装占领国界一事提出意见说，从他们方面只是根据自古以来存在的办法采取了通常的视察国界。而且俄国军队的前来和强占土地，都是完全不法的。如果说，这些土地应该划分，那就应当等候进行划分，然后相互保卫国界。同时，条约要修改是不可能的，而是要遵守它来划定国界，并借此消除其他国家的不正确的议论。中国各大臣向我国代办写道，贵国的地方当局向国界进军和占据沿边地方，造成一种形势迫使中国官员也派出自己的部队前往国界。所有这种行为都可能破坏两国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我国代办对中国各大臣的上述一切抗议向中国外交部声明，由于1862年在塔城已经举行了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议，而这种会议的结果是我国委员提出如何划分国界的草案，那么自然而然地在这种情形下俄国政府就要这样来分析问题：这个草案是否符合于《北京条约》的真实意义而编制的，或者与《北京条约》有什么差异之处。俄国政府也就这样做了。它认为俄国委员在编制自己的草案时确切遵循了条约。然后我国代办向中国各大臣声明，他所作的而成为中国方面反对的主要目标的"往西南至斋桑湖"和"常设卡伦"字样的说明，是俄国政府答复的实质。

我国代办完全同意中国各大臣的意见，如果条约不能得到说明，国界也就不能划分。同时向中国人指出，在条约的说明上并没有丝毫困难，只要不是力求对它作出它所不包含的那种解释，而象它已经写成的那样来加以了解。为此目的，应当先看原文文字，然后根据原文来判断译文的词句具有什么意义。我国代办在他给中国各大臣的答复中通知说，俄国政府就是这样做的，我国外交部也曾反应说，《北京条约》第二条只能了解如下：首先提出字句："向西方的国界迄今未经划定，今后应当沿着山脉、大河和现有的中国卡伦线进行。"这是表明，在划定西部国界的时候，一般地采取天然界限，即山脉与河流作为基础，是最便利和最好确定国界的无可争议

的。随后加上的"现有的中国卡伦"字样，同时指明，山脉与河流不应当在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而应当采用距离常设卡伦不远的那些山岭与河流，而在没有遇到山岭或大河的场合，就沿着常设卡伦划分国界。

条约这样首先规定划分西部国界所应遵守的原则，然后就十分明确地规定在什么地点之间进行划界。

首先，从沙宾达巴哈向西南到斋桑湖，从这里到通过伊塞克湖南方的并称为腾格里山岭或天山南部（天山的南部支脉）的山脉，并沿此山脉到浩罕国的领域。然后我国代办向中国各大臣声明，他不能同意他们关于在条约的俄文本条文译成中文时出现错误的意见。在条约中确实是不容许错误的，但是这是就互换的条约的文本是用同一种文字写成的场合而言。某个条约是用一国的文字写成，而译成另一国的文字时，在这种场合在原本上自然是不能有错误的。而在译文中则可能有与原文不完全相符合之处，尽管翻译人员力求完全确切地表达全部约文。特别是在象中国文这样的文字中，这种困难就更加增大了。

在签订条约时，曾将原文的确切意义向中国各大臣作了口头上的说明，他们在译文上签了字自然是很好地知道它的真实意义的。如果中国各大臣现时认为对于这个意义可以给予别的解释，那么俄国政府从自己方面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作这种变更的。我国代办往下写道："只要问哪一方是对的，是拿原文来就能直接确定条约真实意义的一方，还是只拿译文来并给它以与原有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想遵守条约而完全改变它的意义的那一方呢？"

我国代办在他通知的结语中向中国人声明说："俄国政府不愿破坏友好关系，直到现时没有坚决主张立即划界，希望使中国各大臣有时间来深入考虑问题的一切详情细节，并按照条约决定划定国界。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容许贵国边疆官员利用问题还没

有得到解决的机会，不顾正在进行的谈判，而派出部队前往我国境内。如果我国官员现时采取办法来阻止贵国部队的继续前进，那么这是无可惊异的。如果这时将发生冲突，那么这将引起有害于我们多年友谊的不愉快的事情。”

上述关于划定西部国界在北京与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情形，包括由我国代办与中国各大臣所作的当面说明，以及我国代办与他们进行的广泛和频繁的文件往还，最后还有在此以前我国委员与中国委员于1862年在塔城进行的谈判和同样的文件往还，已经充分地、极为详尽地阐明了划界事宜，因此关于在中国西部划定国界的这个问题，看来也已经得到了详尽无遗的说明。

中国人经过这一切以后，本来应当可以说是在事实上得到确信，《北京条约》是俄国外交的胜利，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得不由于这个条约而向我国作出领土和其他的重大让步。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对于我们的划界草案还是迟迟不予确定的同意。只是经过最坚持的、勇敢的和坚决的努力以后，我国驻北京代办才能巧妙地使事情得到这样的方向，而使中国与俄国划分西部国界的问题获得我国所愿望的转变。中国各大臣最后确信，从他们方面作任何继续坚持，以图削弱或减轻按照条约对我国所作的让步，看来都是决不可能的。于是他们便决定向俄国的要求让步，并承认我国委员的草案是根据《北京条约》编成的。我国驻北京代办将此事通知杜加麦利将军，很有预见性地把他所取得的中国各大臣的通知原文也附入了自己的关于这个重要事宜的正式紧急情报里，以便在中国委员方面有任何新的要求时向他们出示这个文件。从北京所获得的上述正式通知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国委员的草案。但是由于我国草案第二款建议从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起有两个国界线的方向：一个是沿常设卡伦线，另一个是沿塔尔巴哈台山岭到哈巴尔·阿苏山口，所以从两个方向中采取哪一个

就听凭中国委员考虑选择。同时，中国政府命令首席委员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与西西伯利亚总督约定委员会议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按照我国代办与中国各大臣在北京的相互协议，这个会议应当一有可能就举行。中国各大臣在接受我国划界草案的通知中还涉及了两个问题：(1)关于沿边外族留在他们原来居住地方的问题；(2)关于我国部队继续占据国界的问题。

我国代办关于第一个问题向中国各大臣说明，俄国政府同意他们关于外族人的意见，从自己方面对于这些外族人留在原来居住地方没有感到任何妨碍之处。看来，中国人作出这个声明是在担心，要使沿边外族人以后不再进入中国领域之内，以及希望同他们不发生任何关系。对于第二个关于我国武装占据国界的问题，我国代办向中国各大臣说明，我国军队占据国界抱有和平的目的，而完全没有威胁的性质。但是中国人强求我国部队从他们在国界上所占据的阵地上完全撤去，退往他们的边区内部经常驻扎的地方。大概，中国人对我国代办之所以再三作这些要求，是因为在我国继续武装占据国界的情形下，中国人同意我国所建议的他们帝国西部领域划分国界的草案，就象是从他们方面作出迫不得已的让步。中国各大臣最初想要提出我国部队从国界上撤往边区内部作为他们接受我国划界草案的条件。但是我国代办坚决拒绝了中国人提出要对此给予书面的同意的强求。中国人接到坚决的拒绝后，满足于我国代办的口头诺言，请求本国政府从国界上撤退部队，如果那个国界已经被部队所占据。我国代办给予中国人以这种诺言，是注意到对这个诺言他并没有向中国人保证履行，所以无论如何对于我国不可能有拘束的力量。同时，格林卡认为把我国部队从国界上哪怕撤出若干距离也是有益的，这是为了不给中国人以借口，来谴责我们强占按照条约虽已属于我国而还没有完全正式划定的各地方。

关于中国人已经同意我国划界草案的通知，我是在带同部队从黑额尔齐斯河前往科克佩克钦卡河卡拉乌特库利斯克浅滩渡头返归时收到的。在经受了如此使人疲备不堪和忐忑不安的等待以后，得到这个可喜的消息，我所感到的满意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在这个通知的同时，我接到总督杜加麦利的命令，这个命令也象从他那里收到的所有从前的命令一样，是坚决不能执行的。在划界时期内我从尊敬的杜加麦利那里收到的一切命令的命运都是这样的。由于奇异的偶然性，在这些命令中没有一个命令我能在事实上完全加以执行。杜加麦利在这个命令中要求在同中国人举行的谈判中，向中国人差不多在全部国界上作出让步。特别明显的是对斋桑边区的让步，而为了把这个边区掌握在我国政权之下，在塔城举行过的谈判中我国委员曾尽到了一切努力。此外，曾经沿上、下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进行了特别的轮船航行，并装备了黑额尔齐斯河的特别考察团，由我亲自领导，其专门目的就是要占领邻接斋桑湖的地方，一劳永逸地使中国人了解，斋桑湖也好，全部周围地方也好，从今以后都无例外地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最后，在我国委员提交中国政府和经中国各大臣全面审查的草案中，国界凭依斋桑湖的东北角，然后陡转向东，按这个方向前进到玛尼图嘎图勒干卡伦，因此不只是斋桑湖，而且还有黑额尔齐斯河下游部分，都应当合并于俄国领土。很明显，如果中国政府表示自己同意我国的划界草案，那么以后已经谈不到从我国方面作任何领土的让步。因此，我接到杜加麦利的该项命令以后，只是限于用我们办公室的话说"查照备案"。

我在上文已经详细叙述迫使我们中断1862年谈判和离开塔城的原因。同时，我曾说到没有等待中国委员的答复，我们就发出命令，在收到这个答复之后，即行送交西西伯利亚总督。中国人所送出的这个答复在我们离开塔城以后不久，即在1862年10月在鄂木

斯克收到了。中国人在自己的答复文件(即公文)中，按照自己的常例详细叙明在塔城同我们当面协商中所讨论的一切事项，特别是指出了我国委员顽强地坚持要按照常设卡伦划分国界。不顾中国委员的一切反对意见，俄国委员似乎不仅是不听从他们的意见，而且甚至说如果国界不按照常设卡伦划分，那么俄国军队就会到来，占领卡伦线以外的所有沿边土地。“担心的是”，中国人写道，“在进一步的争论中不要发生什么不合理的事情而有害于两国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对于与俄国委员多次谈判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我们已经专折详细奏明中国大皇帝陛下，并请求指示：在国界谈判中应如何办理。在这个奏折发出后不久，我们收到贵国委员的国界草案。我们研究了这个草案以后，认为它是与条约不合的。”然后中国人在说明时顺便指出，俄国委员在自己的草案中把国界引到斋桑湖，不走向西南，而恰恰相反，写道应把国界转向东方，沿黑额尔齐斯河而行。“显而易见，从俄国委员方面来说”，中国人写道，“这只是一种借口，而在实际上他们是意图强占我国的沿边土地(库尔楚姆边区)，而且”，中国人挖苦地补充说，“反来责难我们，说我们拒绝接受条约。”

最后，中国委员请求西西伯利亚总督讨论在塔城所举行的双方谈判，并通知他们下年何月何日将派遣俄国委员前来塔城继续举行国界协商会议。杜加麦利将军对于这个通知曾于1862年11月20日答复中国人说，在仔细研究塔城所举行的划界谈判以后，他完全相信俄国委员的一切行动和他们所提出的国界草案都是完全符合《北京条约》规定的。虽然，尽管按照中国委员自己的请求，已经两次派遣俄国委员前往塔城以便谈判，而中国委员仍顽强坚持自己违反条约意义的要求，不同意俄国委员根据条约的建议。杜加麦利将军认为这样进行谈判，继续会议将白费时间，不认为可能与中国各委员商定来年1863年会议的地点，同样也不能派遣委员前

往塔城，除非中国委员方面先行表示完全同意按照已经通知他们的以《北京条约》规定为基础的草案实行划界。如果中国人同意接受我国的划界草案(按照这个草案，象我国委员已经宣布过的，从我国方面不可能作出任何的让步)，那么在这种场合，杜加麦利将军答应呈请派遣俄国代表去签订议定书和地图，以及设置界牌。在第二年，1863年，中国委员又请求西西伯利亚总督把他们请求前来塔城以便互相协议划界和友好解决此案的新邀请转达给我们。但是由于中国人在自己从前的通知中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同意接受我国的划界草案，所以我国方面认为更符合于事务情况的是，在收到他们同意接受上述草案的通知以前不起程前往。

1863年7月，中国人又重复自己的邀请，请求尽可能快些拟定仍旧在塔城举行会议的日期，以便解决国界问题。我们决定利用这次邀请，是推测中国人最后已愿意接受我国的划界草案，并急于前往塔城。这时我正带同部队驻在黑额尔齐斯河的玛尼图噶图勒干中国卡伦附近，因此，我把部队带到科克佩克钦卡河的卡拉乌特库利斯克浅滩渡头以后，就从该处出发，如上所述，采取直接通过塔尔巴哈台山岭的道路前往乌尔扎尔，于9月底来到该处。这时扎哈罗夫领事已经在乌尔扎尔等候我的到来，我们决定在我们进入塔城之前向中国委员书面声明，因为已经到了寒冷的秋季，我们同所有的随从人员必须快些返回，所以能在国界上居留的时间不超过十五天。但是，这个时间按照我们的意见也是足够解决问题的，因为在去年我们谈判之后，在我国代办与中国各大臣在北京举行协商会议之后，最后，在他们同西西伯利亚总督的文件往来以后，——在当前的会议上关于如何划分国界问题，已经不可能有许多的讨论了。因此，我们应当做的只是编制国界条约、互相签订和互相交换。最后，我们向中国人声明，在今年完成条约的互换，我们将节省来年的时间来进行划界的实际工作，即设置界牌并

借此使两国之间划界事宜顺利达到良好的结局。此后，得到消息说，中国首席委员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已经来到了塔城，我们决定从乌尔扎尔出发前往国界上所布置的我国部队那里，完全希望在路上还可以接到中国委员对于我们通知的答复。但是我们来到部队之后，在那里只遇到了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所派来的一些中国官员照例致以问候之意。我们向中国官员声明，在收到中国委员对于我们从乌尔扎尔发出的通知的答复以前，我们不进入塔城。

此后不久，即9月26日，我们收到了这个答复。中国人在其中照例重述了关于划界事宜的谈判和往来文件的经过以及他们方面对国界上出现我国部队而提出的要求，最后向我们写道："现在，你们，贵委员们，已经来到此地，并在我国卡伦以外等候我（将军明谊）来到塔城和会议日期的消息，你们，贵委员们，真正是以此从自己方面也表现了友好解决划界事宜的意图。因此我们敬请你们，贵委员们，按照上年的实例，带同你们的全部随从人员前来塔城，按照条约确定面谈的日期，迅速解决问题，以避免错误和破坏，而得以巩固良好的睦谊。"

9月27日，我们进入了塔城；28和29日用来作了相互拜访。中国各委员在这种彼此拜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了特别的礼貌和按照中国的理解非常细致的客气，这是在上年1862年我们从他们那里所没有遇到过的。

关于事务的本身在见面时谈得很少。但是，我们不止一次坚决肯定地向他们指出，在去年我们之间谈判以后，在北京和与西西伯利亚总督互相解释和文件往还以后，从我国方面比起去年更少有可能作出让步，再因秋季寒冷季节，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留在这里超过10月15日，在这一天一定要离开塔城，不管事情是否能办完。将军明谊对此赶快答复说，事情一定要在这十日之内办完。

然后将军向我们派来自己的官员，请求我们同意把他们的划

界草案送交我们审查，借此避免双方的当面争论和解释，因为这种争论和解释不会导致任何结果，而只能使他们在人民面前陷于难堪的地位。我们同意了这一点，但是再向他们坚决声明，要他们不要提出过分的和违反条约的要求，因为从我国方面是不可能有让步的。在我们同中国人继续进行交涉和在举行谈判的时候，中国人都象去年一样表现了很少的退让，并且一般地在自己与我们说明时表现得很矜持。他们在自己的声名狼藉的草案中，只是划出了国界线的一般的简单轮廓，而完全没有涉及它的细节。同时，中国人重复了条约中已经明白规定的东西，就是：（1）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使国界前往斋桑湖，直向霍伊·麦拉胡卡伦（沿斋桑湖西侧在下额尔齐斯河）；（2）从该处前往乌尔扎尔，斋桑湖的一小部分也不留在我国领域之内；（3）从乌尔扎尔向西南直至特穆尔图湖（伊塞克湖），至此为止。

中国人在这个草案中附有从北京外交部送来的地图。一看这个地图，难以想象会有什么更不合理和更无意义的东西，甚至按中国的意思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在塔城假造的。一句话，所举行的谈判没有使中国人对于我们建议的划界草案达成协议。但是，同时中国人对于我们表示前此未有的殷勤和客气态度，看来是企图在本年内不使划界事宜得到最后决定。

当我们把手下现有的上述中国外交部致我国驻北京代办的照会原本（在这个照会中对于我们的划界草案表示了完全同意）拿给他们看的时候，中国各委员措手不及，完全没有想到该项照会能够这样快地传到我们手里。于是他们便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现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编制和签订国界的议定书。但是中国人还是没有决定立刻着手编制国界议定书，借口他们还没有从北京收到中国政府同意我国划界草案的文件。他们把这种迟误解释成：最近中国的邮递从北京到塔城走一趟就需六十天的时间。中国

人的这个声明未必可以认为是对的，根据是，据扎哈罗夫领事声明说，从前有过的情形是，对于从塔城或伊宁发送去的呈报，要到第五十八天才有答复到来。另一方面，很可能是伊斯兰教武装反叛者在毗邻中国西部各省的叛乱，对于这些地方所发生的邮政交通迟误具有影响。无论如何，在发生上述种种情况之后，我们认为继续留在塔城是与我国政府的尊严不相容的，因为中国政府既然先以它所签订的特别条约承担义务而按照两缔约国的相互协定划分西部国界，然后再以自己对于我国划界草案的同意而确认了这个条约，可是中国各委员却以种种借口规避执行自己政府的命令。与随同我们前来的地形测量员和哥萨克兵士一起留在塔城过冬，由于房屋的陈旧和不便应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向中国委员致送了答复后，于10月13日离开塔城回俄国。

我们与中国代表于1863年继续举行谈判的结果就是这样。这次谈判象上年1862年那样是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从谈判一开始正确地安排事宜，于下一年使我国驻北京代表年轻有才干的外交家格林卡坚决从事，于最短的时期内达到了良好的结局。我国代办的这种功绩，在当时边界事宜由于我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在外伊犁边区东南部的流血冲突而大为复杂化的情形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划界事宜对我们有利的这种转变中，在塔城就地作最后解决，即实际上编制和签订议定书与地图，只是时间问题了。

综合回想一下上述1862—1863年在中国西部国界所发生的事件的进程，不可不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这些事件的特殊性质就在于各种各样的波折和意外，而这些波折和意外大都是十分突如其来的。在国界上引起了嗣后一系列流血冲突的中国人对我国军官和兵士在鲍罗胡吉尔卡伦的背信袭击，就是这样的。这些冲突和1862年所发生的那些冲突，都是由于中国人反对我们的不友好行

为所引起的。早在谈判开始以前，于1862年早春季节，中国就已借口视察国界向我国境内出动了相当强有力的部队。看来，中国人的行动计划就是要把国界推向他们的常设卡伦线以外，进入我国境内，尽可能地距离中国西部两个主要中心城市塔城和伊宁更远一些。中国部队为达此目的越过了他们的常设卡伦线，前往当时在若干地方(例如在斋桑边区)还存在的前列或暂时卡伦线，企图沿着前列卡伦线(前界)的方向视察国界。这样做，中国人是希望对于草原沿边地区和当地游牧居民表示自己的权利。同时，中国人在游牧居民中间广泛进行煽动性的宣传。在这种情势下，我国部队占据国界毫无疑问是必要的。我国部队一出现在国界上，中国人就被不发一枪地驱逐到他们的常设卡伦线那边去了。但是把中国人从我国境内驱逐出去以后，对于武装占据国界，我国委员根据许多理由也认为必要的。我们在实际上占据了接近常设卡伦线的地方，以此向中国代表们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这条线就是国界线。再者，武装占据国界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塔城谈判的顺利进行，并在沿边游牧居民之中维持治安。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于1860年也遵循过这种相同的办法。他不仅实际上占领了乌苏里江右岸，而且还命令撤除了江口的满洲卡伦。同样地，我国于同年占领了满洲东部海岸的南部直到朝鲜。

由此可见，杜加麦利认为我下命令武装占据中国西部国界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示威行动，而另一位总督在两年之前，却把这种在我国与中国东部国界的示威行动，认为是对于伊格纳提耶夫在北京进行谈判极为有利的。因此，在他以武装占领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军事防守线上，根据他特别颁布的命令，曾经作好准备在见到中国人和满洲人的时候，完全公开地开始军事活动。在后贝加尔和伊尔库次克故意散播流言，说我国军队春季一定越过国界，目

的是要使这种消息从各方面到达北京。所有这些命令和示威，象穆拉维约夫于1860年致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的信件中所说的，他认为对于后者在北京进行的谈判，以及考虑到我国与中国政府交涉的困难与将来的意外情形都是有利的。①

然后，转而观察1862年在塔城举行谈判的情况，应当指出，成为我国和中国人这次谈判的主要指导根据的，是《北京条约》。因此，我们方面的全部愿望，是坚持确切根据这个条约进行划界。但是中国各委员经常规避这一点，认识到确切遵守《北京条约》对他们是不利的。中国各大臣也持有这样的意见，正象一位高级中国大臣在同我国驻北京代办私下面谈的话中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政府预先知道《北京条约》对它是如何不利，它永远也不会决定签订它。"中国各代表没有可能完全否定《北京条约》的重要规定和我国委员的论据，便千方百计地力求拖延谈判，以便规避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看来是指望有某种意外情况会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困难。但是，同时意识到，他们迟早无论如何必须按照《北京条约》将中国西部境内和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游牧外族的广大地域的土地让给俄国，中国委员和中国政府本身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着在这伊斯兰教世界的边区将永远丧失自己旧有的政权和势力。因此，中国人采用一切办法力求推迟这种注定的必然性，并借此减弱由于中国人丧失土地对这些外族人一定会产生影响的那种不良印象。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只是在于保全帝国的哪怕是表面的尊严和对让步拖延时间。1862年在塔城进行的谈判，发现了中国人显然意图规避《北京条约》的执行，并以此为目的而拖延谈判以后，迫使我国委员这样地提出划界的问题，即谈判迟延进行的全部责任应完全由中国人一方来负担。因此，我国委员决定先将我国的划界草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89页。

案提交中国人，而停止了谈判。中国人因此必须给我们作出果断的答复，而且继续谈判也必须在中国人表示同意我国划界草案的时候，才能举行。

由此可见，在1862年关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事宜，虽然没有导致良好的结局，但是国界问题已经用适当的方式提出来了。这个问题的这样提出得到了外交部的完全赞同。另一方面，中国部队侵入我国境内，由于我国部队官长，特别是普罗岑科上尉的适当处理，归于失败。在下一年即1863年成立了斋桑考察团，同时我国部队沿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南岸前进，到达了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地方。同时从鄂木斯克启航的商人别林斯的轮船，完成了沿额尔齐斯河的平安航行后，也已进入斋桑湖，并沿黑额尔齐斯河溯流而上至距离河口八十俄里之处。集合在国界上的中国军队，大部分是由卡尔梅克人组成的，没有敢于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来对抗我国斋桑部队，在国界上居留不久之后，就分散到自己的驻扎地点去了。由此可见，在1862—1863年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的一切侵入我国境内的企图，不论是在国界南部伊塞克湖附近，还是在草原东北边区斋桑湖附近，都没有成功。与伊宁地区接壤的中部国界就不是那样了。在这里发生了与中国人流血冲突而著名的极可悲痛的事件。鲍罗胡吉尔卡伦的著名冲突是这种事件的开端。我国代办关于这种情况曾收到北京外交部的通知，从该项通知中得知，根据伊犁(伊宁)总司令呈报，俄国军队几次逼近鲍罗胡吉尔卡伦，用大炮开火，投发炸弹和火箭，致使中国人受到了损害。同时说，边界地方是用钱从中国人那里买得的。最后，管理外交部事务的中国大臣附带说道，在这种强力对待鲍罗胡吉尔卡伦和用大炮射击，可以看出是企图激起流血事件。中国人请求给他们答复说明上述情况。

我国代办答复中国各大臣说道，在他接到该项通知以后，由于

它的内容重要曾经特别注意地作了研究。格林卡向中国各大臣写道，不能不表示遗憾，在划界问题已经两国政府在北京解决并已成立协定现时应即执行的同时，而在国界上竟发生了武装冲突。西西伯利亚总督得悉鲍罗胡吉尔卡伦的事故以后，立即派遣代办官员前往该处，该官员在当地实行调查之后，已经充分详细地作了报告。从这个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兵士和他们官长自己造成了引起鲍罗胡吉尔卡伦流血冲突的原因。他们首先向被他们邀请进入卡伦的人数不多的我国人员实行袭击。当我国鲍罗胡吉尔部队为避免进一步的敌对冲突，撤离了原阵地开始向后退去，以便同布置在基什·穆伦的部队汇合的时候，中国人向他们开了火，我国方面对此便加以还击。此后，中国部队越过他们的常设卡伦线，又继续向基什·穆伦作进一步的进攻。这时我国基什·穆伦部队首长便向中国人迎上前去，他在中国人不愿自动返回自己境内的时候，迫不得已使用武力强迫他们回到他们的常设卡伦线以内。关于不知什么人所说的土地似乎是用钱买得的那些话，他并不认为这些话有什么可以见怪和值得重视，因为两国政府已经深悉在这些话里是没有丝毫确实性的。

因此，在中国国界东南部所发生的可悲痛事件，虽然我们完全不愿使它具有政治上的特别重大的意义，而认为具有单纯地方性的意义，在北京也得到了反映。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伊犁总司令在他向中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把国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作了十分虚假的呈报。在同伊宁边区接壤的沿边地区，我国部队使中国人遭到的惨败，引起了中国人的怨恨，并使他们担心俄国军队可能很快就会占领伊宁。当地中国居民中的惊惶不安的情绪，迫使我国总领事馆管理人员柯洛托夫金离开伊宁，赶快前往俄国。中国人对伊宁的俄国人的怨恨已经达到这样程度，被派遣去采购食品的领事馆护卫队哥萨克人曾被一群无知的人所包围，他们向他投掷

石块，威胁要放箭射击。我国领事馆秘书柯洛托夫金将贸易站的这种情况通知伊宁官长，没有发生任何效果。中国官员将我国派去的哥萨克人加以咒骂，逐出商务院落。这种情况，以及在鲍罗胡吉尔卡伦打死我国军官安东诺夫，掳去我国下级官员三人折磨至死，把他们的头颅示众辱骂，禁止向贸易站供应生活用品，无知人们特别是流刑犯的恫吓要在贸易站下面挖掘坑道，最后是伊宁地方当局的软弱无力，他们不但没有捕获杀死我国军官和下级官员三人的罪犯，而且好象赞许这种卑鄙行为，准许把被折磨死的我国三名兵士的人头示众辱骂，这一切都迫使领事馆秘书离去伊宁赶快前往俄国。拿伊犁官长在伊宁反对我国领事馆的这些敌对行为来判断，应当认为在鲍罗胡吉尔卡伦袭击我国军官的可能原因，是中国人的狡猾和恶意企图，诱引他们来作客，并在他们身上复仇泄愤。

总而言之，从包括与中国人在塔城进行谈判时期在内的三年期间中，1863年是发生与中国西部划界事宜具有直接联系的政治性事件最多的一年。由于这些在前章已经详细叙述的事件，占有突出地位的是中国政府最后同意接受我国委员的草案不作任何保留，并承认它是按照《北京条约》编成的。因此，到1863年，当伊宁地区西部边区与中国人的流血冲突于这种惊恐时期所引起的不安已经开始逐渐减弱，随后完全平息的时候，国界问题也因我国委员和我国驻北京代办的齐心努力而导致良好的结局。有赖于我国驻北京代表的外交艺术和勇敢的行为，善于灵活地利用当时的情况，俄国对中国人的外交获得了完全胜利。当时中国的内部状况是很少可以使人安慰的。中国在同欧洲头等海军强国的一系列的沉重和流血冲突之后，刚刚有些复原和恢复起国内治安的时候，1862年又爆发了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叛乱。这个叛乱在很短时期内就形成了使人惊恐不安的规模，象暴风雨的乌云一般，卷向中国西部领域

即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省。处于中国政府首要地位的人物，看来已经了解到在中国当时的形势下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战胜武装反叛者，迟早必须请求俄国的强大庇护和协助。这一点可以部分地说明，中国各大臣为什么对于我国的建议没有表示反抗，而是毫无变更地接受了我国的划界草案。

第 八 章

中国各委员通过西西伯利亚总督请求我国委员从速前来塔城。中国各代表显出非常急于结束西部划界事宜，并最后表示同意接受我国的划界草案。按照同中国人的相互协议用俄文和满文编成俄国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议定书。1864年9月24日，我们与中国委员的最后一次的隆重会议和在这次会议上互相签订议定书、地图和我们与中国委员互换这些文件。1864年《塔城议定书》作为《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的意义。

我们离开塔城以后不久，1863年10月，中国委员通知西西伯利亚总督说，他们已经从北京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命令，要尽可能地从速按照我国委员所建议的草案解决问题。中国人请求通知他们：打算于来年即1864年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月份举行两国委员会议，以便迅速和最后解决国界问题。

杜加麦利将军对于这个通知答复中国委员说，从自己方面考虑到那种情况，即1863年他们曾经三次请求迅速派遣我国代表，而当代表们已经来到的时候，中国人却对于划界问题仍旧违反《北京条约》的规定进行争论。“再者”，杜加麦利写道，“我不得不注意到贵国通知上如下的话：‘应当按照国界地方的情况，根据互相协商解决国界问题’，我从这些话中应当得出结论说，在你们收到自己政府对于我国划界草案表示完全同意的命令以后，在当前双方代表的会议上，你们还在打算仍旧继续就如何划界问题进行争论。从我国方面来说”，杜加麦利继续写道，“已经不止一次作了声明，我国委员所提出的国界草案是以《北京条约》的确切意义为根据的。

因此其中不可能作出任何变更。从而在当前的会议中，不论你们如何争论，我国全权委员不能同意作任何让步。”

最后，杜加麦利将军向中国委员声明说，如果他们打算在当前的会议中再来从事应当如何划分国界的争论，那么他认为这象1863年曾经有过的情形一样，派出我国委员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中国各代表在当前的会议中打算放弃无益的争论，而按照条约与地图直截了当地从事于编制国界地点议定书，并加以签字证明，然后着手设置界牌，而是在这样的情况，杜加麦利请求中国委员及早尽速予以答复。

“那时”，杜加麦利补充说，“我将申请尽速派遣我国委员仍旧前往塔城，以便最后解决问题和更加巩固我们两大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杜加麦利将军尽管在这个通知中已经向中国委员坚决地指出条件，必须具有这种条件两国代表的会议才能举行，但是中国人还是不肯甘心。他们在自己的答复中又硬说，在他们从北京所奉到的命令中指明，要在接受俄国委员的草案后，同他们共同商议办事。中国人不以此为满足，又想起对我们提出新的极端无礼的要求，甚至不以对《北京条约》的错误解释为根据。例如，中国人声明说，他们同意确定国界，如果我们：（1）将国界移至距离常设卡伦线一百里和甚至二百里（五十俄里至一百俄里）的地方；（2）比照1858年《瑷珲条约》第一条，规定在常设卡伦线以外居住的外族猎户和渔民仍为中国的属民；（3）居住在国界附近的四个盟的索伦人和其他外族人不破坏和平和不与他们邻近居住的俄属沿边外族发生争吵。

杜加麦利将军对于中国委员的这个声明，根据我国委员所提出的理由向中国人指出，他们要求将国界移至离开常设卡伦线向西一百俄里的要求是完全不正确的。“对于这种只能使人发笑的建

议，我要以一个问题答复你们”，杜加麦利写道，“如果我们向你们建议从常设卡伦线向东后退一百里或二百里，并在那里设置我们两国之间的国界，那你们会怎样说呢？”

中国人要求把居住在邻接中国的俄领边区的外族猎户和渔户留归中国属民，也是同样地没有根据的。这个建议与《北京条约》是直接抵触的，如果《瑷珲条约》缔结之时在东部国界上曾经容许这种例外的办法，那么这是因为中国属民暗中在阿穆尔河左岸上建立了不大的居民点，才这样做的。我们在缔结《瑷珲条约》的时候，因为不愿意把贫穷人们因迁回阿穆尔河右岸，即：迁回中国境内而使他们破产。同时，因尊重两国友好关系而他们留在原来居住地点，也没有看到对我国有什么害处，所以才容许他们留在原住地方并从事自己的职业。至于在这里，在西方的国界上，在常设卡伦线外向西，即在我国方面居住着的不是中国属民的民族和部族。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居住在阿尔泰山的北侧与捷列茨克湖（阿尔滕湖）相邻之处，被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或两属人，按照《北京条约》应当转入俄国国籍。另一些人如吉尔吉斯人和布鲁特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不在中国属下，而都承认属于俄国政府。然后向中国人指出他们所建议的办法，即把他们常设卡伦线以外的一切土地划归俄国，而将这些土地上的游牧住民转入中国国籍，是完全不适宜的，这将意味着在数千俄里的幅员之内仍旧没有确切划定的国界。

最后，关于四个盟的索伦人和其他外族人问题向中国人说明，所有这些外族人仍旧应当留在中国领土地域之内，从而没有丧失他们现时居住的土地。在俄国领域之内同他们相邻的土地，现时也是由吉尔吉斯人和布鲁特人占据的。因此，毫无根据来预测现在或将来在这些民族之间一定会产生争端和不睦。为使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将来也能保持下来，中国地方边界官长对于居住国界

附近的各外族必须在自己的行动中保持完全的善意，制止不安分的人，并同时力求保持同俄国的友好关系。但是，伊犁总司令于1863年却以完全相反的精神进行活动，在索伦人与其他中国外族之间散布谣言，没有任何需要而在他们中间煽起反对俄国的仇恨，另一方面向我国的忠诚属民吉尔吉斯人和布鲁特人发送内容煽动性的信件。然后杜加麦利向中国人表示说，按照他的意见(这种意见从前也曾向他们说明过)，双方的全权委员只应从事编制议定书和国界地图，并在双方签订这些文件以后着手设置界牌。最后杜加麦利请求中国委员尽可能地快些通知他：他们同意不同意执行自己政府的命令，不加变更地接受我国的划界草案。那时，要看这个答复的内容如何，才能作出适合于该项内容的决定，即或者是申请派遣我国全权委员前往塔城开会，或者是相反，呈请结束代表团，并停止划界事务。

中国人在对这个通知的答复中继续以厚颜无耻的顽固态度，对于按照《北京条约》应归俄国领有的沿边土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中国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强求，引用了一些没有根据的和虚伪的论据，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杜加麦利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要求完全没有根据，并补充说，中国代表们因此忘记了自己在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地位，竟敢认为自己政府同意我国委员所草拟的国界是不适当的处理，并决定改正自己政府的行为。然后杜加麦利也向中国委员指出，他们出于肆意妄为的习惯，擅自增加杜加麦利答复文件中所完全没有过的词语。在这个文件中只是说道："将呈请结束代表团，并停止划界事务。"中国人竟加入了："然后才约定划分国界。"

杜加麦利在结语中向中国委员写道，如果他们尊重两国关系的旧有的和良好的范例，根据自己政府的命令，愿意在共同的会议上确定俄国全权委员所草拟的国界，那么就应当送来答复文件，其

中应当简明叙述他们按照草案毫无变更地接受划界，在当前的会议中没有争论的企图，而只是从事于编制议定书和地图，并在互换以后着手设置界牌。那时才能发命令使我国委员从速前往塔尔巴哈台(塔城)。在相反的情况下，边界事务委员会将被结束，而国界谈判此后就不能恢复。在中国政府赞同俄国划界草案之后，我们认为国界事宜已经终结，而国界已经两国政府最后确定。在这一切经过之后，还要继续划界事宜的争论，那是无益的和违反各大臣的尊严的，因此，杜加麦利请求中国各委员不要象最近所发送的那样，再发送关于国界问题的文件。

在此以后，中国人在自己的通知中，对于同意我国方面所建议的和北京政府所赞同的国界，仍旧继续顽抗。中国人在这个场合的借口情况是，他们没有在全部内容上拒绝我国委员的整个草案，按照他们的意见，而是他们所建议的变更只是涉及似乎与条约不确切相合的那一部分。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见，中国代表们摆出一个事实，说条约中没有一条规定，早从征服准噶尔的时候起很久以来就属于中国国籍的蒙古人、吉尔吉斯人和布鲁特人，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草案从今以后应当转入俄罗斯国籍。在这个表现了中国委员的完全口是心非的外交上的巧妙手法以后，他们若无其事地在结束自己的这次答复时，象所有从前的答复一样，照例请求通知他们：什么时候重行开会解决问题。

杜加麦利总督对这个通知答复中国各委员说，由于他们方面继续顽固规避根据我国划界草案解决问题，他已命令终止谈判，并结束委员会。

中国各委员在我国方面的这种断然答复之后，最后了解到继续作进一步的强求，以便保持从前属于他们的中国西部境内的沿边土地，尤其是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以及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外族，都是徒劳无益的。于是他们又于1864年8月请求西西伯利亚

总督杜加麦利尽速派遣我国全权委员前往塔城，以便在同他们的共同会议上，根据我国方面所提出的划界草案编制国界地方的记录和地图，并于互换负责订立的条约以后，设置界牌，借以巩固两国之间的睦邻关系。杜加麦利将军通知中国各委员说，他们的请求即将照办，我国委员决定再一次前往塔城，以便签订国界议定书，并在自己给中国各委员的答复中向他们指出，要注意他们的通知中所说的，他们尊重两个邻国间旧有友好关系的范例和为了更加巩固彼此的睦谊，表示诚恳的愿望，要使已经成立的国界决议，按照两国政府所赞同的草案，在双方代表和被委任人员的会议上记入特别订立的条约，在互相签字和互换这些文件以后，即行着手设置界牌。因此，我们第三次前往塔城，好在此行已成了最后的一次。

我这次只同扎哈罗夫一人前往参加当前的会议。第三委员戈卢别夫由于患病健康失调（他从前也患过这个病症，在鲍罗胡吉尔卡伦同中国人的倒霉冲突以后大大地加重了）已经去彼得堡。在那里，戈卢别夫的病症更为严重了，他决定去意大利，在意大利过不多时，于1865年在索林托逝世了。我们于8月末从鄂木斯克出发，9月2日来到塔城。头几天我国代表和中国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帮办巴图鲁大臣博勒果苏之间，进行了互相访问。在嗣后举行的会议上，中国人又企图向我们争论根据《北京条约》和1862年我国向中国代表提出的国界草案应归俄国所有的土地。中国委员的一切论据，大部分是卑鄙的谎言和中国外交所惯用的狡猾手段，遭到了我们的坚决驳斥。那时乌里雅苏台将军最后确信，完全不可能从我们这里得到哪怕是极小的让步，才决定同意我们的一切要求。同时所收到的中国各大臣关于向我们让与土地的命令，完全使中国委员可以放手行事。他们以后永远有充分可能利用这个命令推诿说，

没有这样的命令，他们永远也不会决心同意无条件地一丝不差地接受我国草案。一言以蔽之，借口命令使中国各委员获得了在自己政府面前辩护让出土地的手段。为了避免在民间发生有害于中国自高自大的不体面的议论，在塔城散布了流言，说让与土地只是暂时的，过两年将从俄国人那里收回。中国人刚一表示同意我国的划界草案，我们就刻不容缓地着手编制议定书和地图。为此目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派遣了熟悉边区地方的四名专家官员查、艾、何和傅前来我国贸易站。这些官员立刻着手在预先准备好的四份每吋二十五俄里的边界地图上用墨笔在山岭、河流、湖泊、城市、村庄和其他地方事物的下面写上名称。到9月15日，中国人很确切地用满文在地图上作完了一切注写。然后就着手编制议定书和用俄文与满文抄写四份。在这个工作结束之后，于9月25日举行了我们同中国委员的最后一次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应当举行互相签订议定书和地图，并在我国和中国委员之间互换这些文件，所以从我国和中国方面都设法使这个会议具有一些庄严隆重的气氛。我们穿着制服出席了这个会议。中国代表从自己方面在他们的一大群官员扈从下，以高度的亲切和殷勤态度迎接了我们。我们在见面问候之后，分坐在与中国相对的单设的桌旁，然后起立把两份地图和每份附有俄文和满文的议定书送给他们。作为交换我们从中国代表那里取得了同样数目的议定书和地图。稍作休息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请我们吃东西以后，我们最后以最友好的态度与中国各委员告别，从他们方面我们受到最诚恳的临别祝愿，祝我们一路平安返回俄国。中国各委员用这种从来没有的亲切和殷勤态度，把我们送到公房的最后大门口（在那里有我们乘坐的马匹），这种态度使人极为感动，而开始使我们感到有些惊异。中国人对我们这种细微关切的原因（他们在这以前是非常自持，甚至是自大的），后来弄清楚了，那时我们得悉变乱的反对中国政府的中

国伊斯兰教徒已经占领了乌鲁木齐城，并且准备向中国西部领域前进，以便夺取塔城和伊宁各城市。中国西部各省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塔城和伊宁)的地方当局，很快认识到自己处于无援的状态，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手段来镇压叛乱。这时中国人明白了，只有俄国的强有力的庇护，才能挽救他们免于崩溃。

《塔城议定书》的意义在于它与《北京条约》具有密切的直接关系。根据签订的议定书十个条文所叙明的与中国人约定的条件，他们按照《北京条约》把整个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从河口到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是1863年我属下部队活动的终点)让给了我们。从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国界沿萨乌尔套山而行，并且位置在这个山岭迤西至塔尔巴哈台山的中国常设卡伦线，并入了俄国的领域。中国人根据《塔城议定书》第四条负有义务在一个月内把这些卡伦拆除，时间是从设置界牌的时候起算，这些卡伦应该由此拆迁。除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的一部分以外，合并到俄国领土的还有：库尔楚姆和斋桑边区、格根河和纳伦河盆地（锡尔河上游）至喀什噶尔即东土耳其斯坦或小布哈拉的境地。

第四篇

第一章

在中国伊斯兰教徒或东干人叛乱时期，不可能于1865年春季开始设置中国西部国界的界牌。　对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境内这次叛乱经过情形的叙述。

在1864年9月25日《塔城条约》签订以后，曾预定于1865年春季开始在现地与中国西部划定国界，即以设置界牌的方法在现地标明国界。但是中国伊斯兰教徒又称为东干人的叛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了整个中国西部，到1865年年终，该处的中国政权已经无影无踪了，这就妨碍了预定计划的实行。因此，划定中国西部国界必须推迟到比较适宜的时候。为了研究中国西部东干叛乱的经过情况，必须预先说明：东干人是谁、他属于哪个民族和在什么条件之下能够在中国发动政变，而这个政变对于同中国西部接壤的草原上的我国边疆的差不多全是游牧伊斯兰教居民，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在东干人的名称之下，应当了解为居住在中国各省的而主要是在北方和西方各省的伊斯兰教徒。据我国的中国学家瓦西里耶夫和扎哈罗夫的意见，东干人属于突厥系的维吾尔族，最初是佛教的信徒，只是后来才信奉了伊斯兰教。维吾尔人在唐朝时代（618—907年）被中国人征服了。中国人占领了他们的首都高昌（现时为东土耳其斯坦的卡拉萨尔城）以后，为了限制维吾尔人的继续反

抗，决定把他们迁到中国境内。为此目的，在唐朝时代迁移了大约一百万维吾尔人到中国西北部现今的陕西和甘肃各省。就是这些维吾尔人成为伊斯兰教徒的根源。后来，移住人——维吾尔人与中国北部当地原住人——属于西藏部族的唐古特人混合起来了。唐古特民族组成了自己独立的领地，其中主要的支柱是维吾尔人，而执政的朝代则是唐古特人。维吾尔唐古特王国保持自己政治的稳定达三百年之久，直到在中国建立了元或明的朝代（1206—1368年）。① 在这个朝代的时期，甚至在它灭亡后的若干时期内，维吾尔唐古特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② 据瓦西里耶夫教授说，在十六世纪，大约在1570年前后，在哈密还有佛教的庙宇。但是从哈密向西靠近吐鲁番地方，哈密人的同胞都是伊斯兰教徒。从这个时候起，按照中国的资料判断，伊斯兰教的宗教传播已经开始东渐，达到中国陕西和甘肃各省境内。瓦西里耶夫教授正是把这个时代，即十六世纪下半叶，认为是伊斯兰教徒在中国逐渐定居的开始。

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徒来源的维吾尔唐古特民族的双重名称，也反映在现时对中国这种人的不同名称上。例如，中国人把自己的伊斯兰教徒称为回回，这是中国口语把维吾尔字音读错了，而在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徒那里，他们是以东干人或栋干人为人所知悉的，这是唐古特字音在口语上不正确的变音。

从所引叙的历史材料可以看出，东干人的起源，溯及遥远时代并以假设为根据，是有些使人难以猜测的。

东干人完全保持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从他们的外表上看，与本来的中国人难以区别。只有有经验的眼光才能看出这种差别之处。应当说，东干人比起本来的中国人具有较结

---

① 元朝1271—1368年，明朝1368—1644年。——译者

② 瓦西里耶夫：《论中国伊斯兰教徒的运动》，第15页。

实的身体和较强的体力，这应当归功于他们过着有节制的生活和避免任何过度的东西。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徒的数目，在六十年代没有确实的材料。甚至在中国学家中间关于这个问题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例如斯卡奇科夫认定这个数目为两千万，而前任北京教会会长巴拉第大司祭则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徒的总数在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瓦西里耶夫教授认为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为数极多，虽然没有充分的根据来断定这个人口的数字为一千万、两千万或三千万人。

叛乱蔓延到了全国，而中国西部的出发点是乌鲁木齐城。1864年，这个具有边区重要商业中心意义的城市，被东干人攻占并烧毁了一部分。为这种胜利所鼓舞的东干人，向南方往东土耳其斯坦境内，并向西北沿库尔·卡拉乌苏的道路往伊宁推进。按照伊犁将军常清的命令，从这里派出军队抵抗武装反叛者，他们战败之后，退往塔尔金山口，而库尔·卡拉乌苏城则被东干人占领了。随着该城被占领和武装反叛活动在东土耳其斯坦卡拉萨尔、库车和阿克苏各地区的发展，在伊宁、塔城、喀什噶尔和北京之间方便的交通被截断了。那时，伊犁将军不得不通过我国境内并在我国驻北京公使帮助下向中国皇帝和各大臣发送自己的呈报。分驻在伊宁地区的中国军队，同中国内部失掉自己的交通以后，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伊宁东干人叛乱的先兆，是在塞拉姆湖周围地方出现了力量很大的他们的同教人。为了反抗他们，从伊宁派出了强有力的满洲部队，而这便大大削弱了驻扎在该处的军队。伊宁的东干人利用了这种情况。11月1日，他们占据了一个客店院落，打退前来反抗他们的满洲军队，把他们驱入了城砦，在那里禁闭着伊犁将军明绪，他不久以前还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和作为全权委员参加过同我在一起的关于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谈判。第二天，满洲人作了突围出击，但又被东干人击溃。在这个战斗中，1863年率

领中国军队布置在我国国界上的那个参赞大臣阵亡了。1866年1月20日，伊宁的城堡被东干人攻占，大部分满洲军被歼灭了。据吉尔吉斯人述说，伊犁将军明绪同与他亲信的几个官员，炸毁了自己的宅院，院落塌陷而死。城市的大部分，包括我国贸易站在内，被劫掠一空。

在塔城公开的叛乱是在1865年1月间爆发的。满洲人在这里也赶快避入城堡中。尽管开到了亲信的卡尔梅克人的援兵，城堡还是被东干人攻占了，而城市和我国贸易站都遭到了东干人和吉尔吉斯人劫掠。此后不久，所有的居民放弃了塔城，它只成了一座废墟。

上文已经说过，东干人在攻占乌鲁木齐之后，一方面向伊宁前进，另一方面向南，前往东土耳其斯坦境内。为了说明叛乱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经过情况，必须说一说伊斯兰教在这个地方的出现，以及集神权与君权于一身统治小布哈拉六大城市的和卓（伊斯兰教特权者）的政治和道德势力的确立。

在第九世纪，阿拉伯的传教士进入东土耳其斯坦，并在这个地方传播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义不能立即排除掉佛教和多神教。发生了以伊斯兰教的胜利而告终的流血战争。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应当认为是伊斯兰教在东土耳其斯坦最后确立的时代。全部地方在这个时期处于成吉思汗后裔的统治下，其中出现了小布哈拉的和卓阶层，即宗教职位的人，他们作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在整个中亚细亚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尊敬。在和卓阶层人们中间，在他们出现在小布哈拉以后不久，即在十六世纪，发生了纷争，形成了两个派别，名称是白山派和黑山派（或称白山宗和黑山宗），现时也还存在。和卓人的彼此不和起初带有宗教色彩，后来引起了政治上的分裂，把土耳其斯坦的全部居民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方面。准噶尔的噶尔丹汗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纷争。他侵

入了东土耳其斯坦以后，加入了白山派方面，很快地征服了全部地方。统治东土耳其斯坦的成吉思汗后裔各汗都被俘虏，而任用白山派的代表和卓阿纳克为噶尔丹的地方长官。这样，东土耳其斯坦就成了准噶尔的属地。这是1678年的事情。从这时起到1757年，即到中国人征服准噶尔，或者更正确些说，到1758年他们攻占叶尔羌城为止，和卓王朝把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据属辖权统治了全部东土耳其斯坦约达八十年之久。东土耳其斯坦的和卓政权，是在十八世纪中叶被消灭的，当时中国人在征服了准噶尔以后，也使小布哈拉服从自己的政权。这时大部分和卓都在争取自己独立的斗争中死了，其中只有一人得以幸免。这个和卓带同随他迁移的小布哈拉的流亡者，在中亚细亚的浩罕、布哈拉和其他伊斯兰教领域内，组成了强有力的一派。这个和卓名为萨雷姆萨克，他保持同东土耳其斯坦居民的联系，成为1763年由中亚细亚伊斯兰教领域组成的反抗中国同盟的创始人。虽然这个同盟没有恢复东土耳其斯坦的和卓王朝，但是因此阻止了中国乾隆皇帝打算征服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的黩武企图。反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同盟的另一个结果，是从这个时候起和卓开始提出渗入东土耳其斯坦的要求，引起当地居民反对中国的情绪，把这个地方的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在萨雷姆萨克的儿子著名的和卓张格尔时代，这种意图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于1827年在浩罕人和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的帮助下，实行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居民的叛变，占领了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和阿克苏等城市。中国的六万大军制止了张格尔的政权，他被出卖而遭捕获，并在北京被杀。和卓张格尔遗留下一个儿子布兹柳克汗，在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居民群众中始终享有崇高的威信。这种情况促使他积极参与后来在小布哈拉发生的事件。

1827年以后，浩罕国军队和和卓穆罕默德·优素福（和卓张格尔的哥哥）曾于1829，1830和1847年几次侵入了东土耳其斯坦。在

这些入侵行动中，浩罕国王穆罕默德·阿利汗都曾积极参加。在这个汗的时代，从东土耳其斯坦迁入浩罕国达七万户之多。

中国人深知造成东土耳其斯坦一切混乱的主要原因，是与这个地方当地居民有联系的和卓，他们以推翻满洲压迫为目的，尽力在那里制造风潮。因此，中国人向浩罕国穆罕默德·阿利汗建议，把在土耳其斯坦各城市所征收的商业税让给他，以不让和卓侵入中国领域为条件。穆罕默德·阿利同意了这个条件，并从此派遣浩罕国阿克萨季尔和帮办人员前往喀什噶尔，以便征收税款作为浩罕国汗的收益。尽管有这种条件，中国人利用在穆罕默德·阿利各继任人时期浩罕汗国内几乎经常发生的混乱，停止了付给商业税。这时浩罕国汗胡多亚尔又容许和卓侵入东土耳其斯坦。这是1857年的事情，当时和卓得以占领喀什噶尔，并在喀什噶尔人帮助下把中国人和拥护他们的城市居民隔绝了，差不多整个地方处于恐怖之中约有半年之久。在一得到中国强大军队行动的消息，和卓便跑回浩罕国境内，并且把帮助他们反对中国人的三万居民诱引而去。应当指出，参与和卓的事件最多的只有东土耳其斯坦的西部各城市：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和英吉沙。东方的各城市：库车、卡拉萨尔、哈密和库努·吐鲁番，也有伊斯兰教民族居民，没有协助和卓，大概是因为在不能成功的时候，他们要受到中国人的首先打击。

从所引叙的历史概述中自然会得到结论，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最近事件中一定有和卓人最积极的参加。真是这样：刚一得到消息说，东干人越过天山山脉占领了库车、阿克苏和叶尔羌各城市，在这里截断了满洲人，把政权移交给黑山派后裔和卓汗，而自己则立刻前往乌鲁木齐，上面已经说过的布兹柳克汗，就立即在勇敢坚决的阿古柏伯克（某时曾任1853年被俄国攻克的阿克清真寺炮台司令）护送之下进入了喀什噶尔。布兹柳克汗利用自己的声望，

毫不费力地鼓动起人民去反抗满洲人，使他们赶快避入城砦。当时布兹柳克汗包围了城砦，1865年秋，满洲卫戍队放下了武器。因此，在东土耳其斯坦是两个政权取得最高权力：东部各城市在东干人势力下由上述的和卓汗统治，阿古柏伯克则取得喀什噶尔的自治，他接受了巴达乌列特的称号，使软弱的和娇生惯养的布兹柳克汗离开了政权。阿克柏伯克剥夺了他的政权以后，使布兹柳克汗前往浩罕国，借口是到麦加旅行。到1867年末，阿古柏伯克得以确立了他对东土耳其斯坦各城市的权力。他不以此为满足，图谋占有全部准噶尔和占领乌鲁木齐城。但是1871年我国军队攻占伊宁阻止了阿古柏伯克的占领阴谋。他了解到，在进一步进攻时，他会遇到强大的邻国，他同它战斗显然力量不够。这种情况，以及住居天山北路的东干人反对他的敌对情绪，迫使阿古柏伯克安定下来，关心于把一个东土耳其斯坦保持在自己的政权之下，并同我国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1872年的通商条约，准许我国商人在他领域的全部地方自由贸易，并在布哈拉保持自己的代理人。

从所引叙的东干人在中国西部叛乱经过的概况可以看出，满洲政府的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没有相当手段进行如此危险斗争的狂热民众所击溃了。因此，东干人获得胜利的原因，不是在于他们的实力，而是在于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软弱、兵力的不足和把如此广阔辽远地方保持在自己权力下所必需的手段的不足，最后还在于中国西部极为不同的民族居民成员大部分是由敌视满洲政府的分子构成的。这个结论从研究保卫中国西部的旧有武力的成分和这个地方各部分民族居民的精神状态中很容易得到说明。

中国西部的兵力，在六十年代是由下列各部队组成的：

（1）满洲兵两团，约七千人。

（2）锡伯部队，由游牧的满洲部族锡伯人组成，有一千零三十九人。

（3）索伦部队，一千二百七十一人，分为两部分：索伦人本身的部队驻扎在同谢米列钦斯克州边区接壤的地方，靠近奎屯天然界限和其他地点；达胡尔斯基部队，在霍尔戈斯河占有居民点。

（4）察哈尔部队，由下列人等组成：（甲）在鲍拉塔尔河盆地和塞拉姆湖附近游牧的察哈尔人；（乙）与察哈尔人分开游牧的卡尔梅克人。

（5）厄鲁特部队，有一千九百零五人，占据伊犁河上游，即特克斯河和孔格斯河为自己的牧区。

（6）沙宾诺尔团，有六百一十四人，由1771年从俄国逃出的伏尔加卡尔梅克人组成。

（7）中国绿旗团，有一千八百零五人，驻扎在塞拉姆湖和伊犁河中间的地区。

由此可见，保卫中国的军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之谱。所有这些各种部族的军队，被分成小队分散在从阿尔泰到天山南部支脉的广大地区，占据分布在国界附近的常设卡伦和可移动卡伦。大部分中国军队的可怜样子，他们微不足道的武装和完全不懂军事艺术，使他们完全没有作战能力。有些部队，例如，中国绿旗团部队，差不多只是经营农业，而其余的部队由于官长的懒惰和地方当局的漠不关心，很少作队列和战斗演习的训练。甚至政府本身容许部队严重的不合秩序行为，责成兵士自己出钱购买枪械。除此以外，还有大老爷们的非法搜刮，象实行掠夺一样，使其余居民群众与官长人员处于敌对关系之中。

同时，军队很少或甚至完全不能得到任何给养，特别是驻扎在某些卡伦的人，处于最可怜的可以说是乞丐的境地。这一切对于军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产生着精神颓丧和不满情绪。

中华帝国西部边区内部软弱无力的另一原因，在于这个地方各种部族居民的精神状态。构成通古斯部族一部的占统治地位的

民族满洲人，当时主要分驻在各城市、城堡和卡伦。锡伯人和索伦人也属于满洲人部族，他们当时是中国较好的骑兵队伍，大部分是以弓箭武装起来的。编入当时第一和第二满洲军团的察哈尔人和蒙古人，是不够威武的。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属于那些在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发生混乱时期转入中国国籍的准噶人的后裔。最初他们被安置在满洲的热河地方，后来被迁往伊犁河上游方面，即迁往特克斯河和孔格斯河盆地。土尔扈特人和杜尔伯特人属于1771年从俄国逃出并在塔尔巴哈台、库尔·卡拉乌苏和卡拉萨尔地区定居的伏尔加卡尔梅克人的后裔。

中国人自己属于绿旗兵团，当时定居在伊宁城以东，大部分是由东干人组成的。他们的数目单是在伊宁周围已达六万户之多。除了东干人或回回以外，东土耳其斯坦的全部民族居民还由伊斯兰教徒，从前维吾尔人的后裔所组成。伊宁地区也有塔兰奇人或农人，对拨给他们土地要缴纳粮食税作为中国兵士的军粮。塔兰奇（从塔兰一语而来，意为黍类）是十八世纪中叶从东土耳其斯坦迁来的。他们的定居点分布在察林河迤东伊犁河左岸的盆地，位置在天山北部支脉的山麓。当时，即十八世纪，曾命令流刑罪犯定居在伊犁省。

最后，应当归入居住中国西部部族之列的，还有一部分吉尔吉斯人，他们任意往返，逾越我国和中国国界。

差不多所有这些各种不同的部族都处于彼此敌对的关系中，如果在某一点上意见一致起来的话，那就是他们对于满洲人这个统治部族的仇恨。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之间历来就存在仇恨而产生彼此劫夺。在卡尔梅克人和塔兰奇人之间存在着同样的敌对关系。中国政府对于在伊犁河上游游牧的卡尔梅克人，不但不能完全依靠，而且自己反而要关心保卫他们免受吉尔吉斯人方面的压迫和劫夺。例如，在上述东干人叛乱时期，卡尔梅克人对伊犁将

军发出支援伊宁的命令，就曾经坚决加以拒绝，表现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满洲人对卡尔梅克人请求援助他们对抗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的侵犯也曾持过这种态度。卡尔梅克人从自己方面为了报复这种侵犯，也不止一次掠夺了吉尔吉斯人的村庄，而且有许多县区整个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关于吉尔吉斯人，应当说他们只是在胜利的时候才可能加以帮助，而在失败的时候对于他们是完全不可指望的。厄鲁特人、杜尔伯特人和土尔扈特人构成卡尔梅克或蒙古民族的各部族，还没有忘记自己从前独立的传说，一般来说，对自己当时的地位都是感到苦恼的。从伏尔加逃跑出来的土尔扈特人，有好几次甚至声明愿意重回俄国去。有纳税重负的塔兰奇人的状况，也是同样困难的。

早在1864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由于年景歉收而越入我国境内，到大汗国和吉科卡门汗国的富裕吉尔吉斯人那里充当雇工。在东土耳其斯坦时常发生的叛乱很好地证明小布哈拉的伊斯兰教居民宁愿反对中国人而战，而不愿处于他们的旗帜之下。在中国西部民族居民和保卫该地军队的这种精神状态之下，东干人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顽强的抵抗，这是很自然的。在这方面倒是要对中国政府的幸运感到惊异，因为它能以极微不足道的经费在从南西伯利亚差不多到印度国境的广大地域内长久保持自己的政权。但是，西部边区的地方当局完全认识到自己内部的软弱无力。尽管中国人有习以为常的自高自大和骄傲，他们决定向俄国求援反对武装反叛者。1864年11月29日，由几个满洲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维尔内堡垒，带来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的信件，请求派俄国军队一千人，条件由我国方面提出。但是我国政府认为这个请求是不能执行的，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较为适宜的办法是不直接干预满洲人和东干人之间的斗争，而只是在为保障我国国境安全和安宁而需要时，或在东干人有反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时，才能使用我国军

队。根据这个理由曾向中国使者宣布说，没有获得北京政府的直接肯定的邀请，我们认为没有权利带同军队越过国界。此后，中国人又派遣了四个代表团来维尔内堡垒请求援助。伊犁将军看到我国对这个请求不便执行，便把对他答复的内容通知了北京政府。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向我国驻北京公使提出了关于援助的同样请求。弗兰加里少将答复说，他们的申请将呈报我国政府，他们可以相信，根据两国之间现有的许多世纪的友谊，对他们将给予可能的帮助。但是我国公使指出说，我国自己有内部的事务，有些是很困难的，需要相当的经费，使同情中国西部叛乱分子的我国游牧人等保持安定，对于满洲政府就是很大的帮助。公使补充说，不仅如此，我国在土耳其斯坦所占有的地位也不容许当地的伊斯兰教徒对伊犁边区的自己同教人给予任何的协助。

尽管中国各大臣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切意见，但是同时他们要求弗兰加里少将再把他们的请求转达到彼得堡。同时，在北京已经得到伊宁和塔城陷落的消息，这种消息使中国各大臣产生了难堪的印象，他们看来已经准备责难我国对他们没有给予任何援助。

中国西部的事件引起了北京政府的紧张活动。代替衰老的明谊将军，任命了某时曾任库伦参赞大臣的德贝子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派遣以通晓军务闻名的中国东部正规军团司令部富松前往归化城。任命前任阿尔巴津部队长穆隆阿为陕西省军队司令，代替以同样职位调往塔尔巴哈台的德兴阿。同时按照北京政府的命令，从中国内地出动军队分两路前往西部边区：前往乌里雅苏台和古城。这两城市被指定为中国皇帝军队镇压中国西部叛乱的集合地点。在古城预定组成应向乌鲁木齐出动的两个部队，而在乌里雅苏台组成一个部队，预定通过科布多到塔尔巴哈台地区，并从该处前往伊宁。曾在科帕尔居住的伊犁将军荣全前往这个去科布多的部队。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和科帕尔保存的中国全部银两五十万卢

布也都运往该处。

1867年，得到私人情报说，东干人向甘肃省巴尔克利城的进攻已被中国皇帝军队和民团击败。紧跟着，这些军队占领了叛乱分子所占据的哈密城。在两个战役中随同中国军队一起行动的，也有大部分由伊斯兰教徒组成的民团。这种情况表明，中国政府在西部边区的伊斯兰教徒中有自己的拥护者。这一切都有根据可以预测，在中国人所特有的忍耐和坚持下，北京政府将在帝国西部境内重新确立自己的政权。这种预测后来完全得到了证实，我将在适当的地方详加说明。

叙述了中国西部伊斯兰教叛乱的逐步经过情况以后，我认为还必须谈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发生的东干人的叛乱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也就是要说明这个叛乱是否由于东干人与太平天国军有联系而具有政治性质，或者具有伊斯兰教狂热所激起的宗教性质，最后，或者这个叛乱的指导原则是在于因满洲人享有特权而对他们普遍不满。如果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求之于我国的中国学家们，那么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不是经常彼此一致的。例如，扎哈罗夫曾写过1865年的东干人，他认为在那时还不能确切地解决这个问题。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不否认中国伊斯兰教徒叛乱的原因是东干人受中国官员的压迫和欺侮，但是他认为伊斯兰教徒在中国最近的运动中，不能认为只是仇恨和复仇感的表现。毫无疑义，中国叛乱分子的秘密挑拨行动，希望把活动场所移向西方，远离欧洲人的干涉，使用伊斯兰教居民行事，作为实现自己阴谋的工具。①

看来，瓦西里耶夫教授也同意这个看法。按照他的意见，在伊斯兰教具有一定的扩张发展的意向和中国伊斯兰教徒迭次企图

---

1) 巴拉第：《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北京俄国教会会员的著作，第四卷，第446页。

实现这种意向的情况之下，有理由认定他们会在某个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不容怀疑，伊斯兰教徒在中国的运动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何况中国人伊斯兰教徒，正如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献所证明的，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是成为佛教徒的继承人。据瓦西里耶夫教授的意见，这一切都给预测提供根据，中国将来可能成为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①

关于中国西部和中国内地相邻各省的东干人叛乱，在总的结论上应当说，这个叛乱无论从叛乱行动所包括的广大地区上看，还是从伊斯兰教徒叛乱分子与中国人进行血腥残酷斗争所造成的大量死亡上看，都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现象。在这个一人不留地毁灭了许多城市和州区的斗争中，最惊人的是人口大大减少。据波兹德涅耶夫教授说，在三次伊斯兰教战争时期，即五十年代的云南战争、六十年代的捻匪战争和七十年代的东干人战争，人口的减少达三千万人之多②。在中国内乱的这种实例面前，伟大的法兰西革命就显得是儿戏了。

激起两个民族的这种残酷斗争的原因，是中国伊斯兰教徒对满洲人的不可调和的仇恨。按照我国某些中国学家的意见，以及到中国旅行的我国学者的反映，这种仇恨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伊斯兰教徒受到满洲官员方面的压迫和欺侮。我们在普尔热瓦利斯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徒所受这种压迫的叙述，他于伊斯兰教徒叛乱正紧张的时候住在中国，曾有充分机会就地搜集关于东干人叛乱的可靠情报。据他说："无知的中国官员同落后的伊斯兰教徒一起，使自己的不人道行为、贪婪无厌和兽欲达到猖狂程度。再有中国军队驻在边区不是为了安定边区，而是成

---

① 瓦西里耶夫：《论中国伊斯兰教徒的运动》，第25页。

② 波兹德涅耶夫：《中国国家生活的基本潮流》，第20页。

为对当地居民进行劫夺和各种压迫的无尽无休的源泉。”普尔热瓦利斯基说道：“我们自己是使人激动的任意妄为情景的见证人，例如，中国的官员甚至他们的仆从夺取当地人的最后一头牲畜或别的财产、强奸妻女而几乎不避忌她们的亲属、对妇女加以体刑、兵士的公开劫夺等等。同时，对所有的农业居民都课以过分重的赋税，征收时绝不宽贷。”① 象东土耳其斯坦的居民一样，居住在中亚细亚水草地带和中国北部各省，尤其是甘肃和陕西的东干人，也充满着对满洲人的仇恨。普尔热瓦利斯基在他旅行伊斯兰教徒密集居住的西安城郊的时候，他经常听到他们对中国官员的不堪忍受的压迫的诉苦。对满洲人压迫中国伊斯兰教徒的这种记述，我们在著名的中国学家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据他说：“中国各省的地方当局想出各种办法向伊斯兰教徒收取苛捐杂税，并侮辱他们的宗教情感：有些人在伊斯兰教徒的村庄摆设公宴，使用猪肉，并建议两者择一：或者是食用他们教规所禁止的食物，或者是出钱赎免。”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徒和满洲人之间的仇恨的原因是很多的，而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紧张，以致遇有细故就可以成为伊斯兰教徒人人参加叛乱的信号，而且这些人都具有不安定的性格，并对一切侮辱怀恨在心。

因此，东干人的叛乱应当看作是中国内部生活的独特表现。“这种运动”，据波兹德涅耶夫教授的正确意见：“一遇到自己的良好时机，就完全突然地爆发起来，以自己的火焰蔓延到许多地区和省区，建立起反抗政府军队获得全胜的大军，在国内产生惊人的政变。这种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有一些运动甚至导致成立新的朝代，另一些运动平息下去是为了一遇适宜的时机，再重新爆发。”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陕西省爆发的叛乱曾以惊人的速度

① 普尔热瓦利斯基：《第四次的旅行》，第510页。

向西方扩展，很快蔓延到了全部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这是因为西部边区地方政权的软弱无力，以及中国军队的可怜状态，没有能力制止为宗教狂热和对自己压迫者满洲人仇恨所激发起来的大量东干人。

同时，东干人不只是在东土耳其斯坦，而且也在中国西部各城市遇到自己的同教人，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卫戍军是伊斯兰教徒。①再来研究东干人叛乱的政治意义，应当指出，在我国各中国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瓦西里耶夫教授认为，在东干人著名的宗教扩张主义意图下，没有根据否认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不追求同一的目的。同时达到这个目的是很容易的，因为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是与中国居民杂居的，与中国妇女结婚，具有中国人的风格，而在政府方面有不少的伊斯兰教徒的大官。在伊斯兰教徒叛乱的时候，这种情况能促进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国人看到伊斯兰教徒的力量和对待战败者的无情，差不多人人都转入了伊斯兰教。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认为，按照东干人于六十年代实行毁灭和屠杀时那种残酷性加以判断，可以想象在他们的叛乱之中，除了残暴以外没有别的目的。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达到重大的政治成果，因为在中国的居民中不能希望得到同情和支持。

确实，在这次叛乱中东干人没有达到任何特别重要的成果，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没有一个总的领导人来领导叛乱。因此形成了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独立分散行动的若干首长。据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意见："如果领导叛变的有一个总的领导人，决定推动东干人大众齐心协力越过黄河直捣北京，那么在北京的城垣下就可能最后解决伊斯兰教国家在亚洲东部独立存在的问题。"

东干人叛乱的不良结局，没有使中国伊斯兰教徒对半月宗教

---

① 瓦西里耶夫：《论中国伊斯兰教徒的运动》第23页。

在中国的未来胜利希望冷淡下来。中国居民是非常顽强反对其他一切宗教宣传的，归入伊斯兰教则比较容易。在一百年的过程中，当加入耶稣教的人数以万计的时候，而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人数按照最少的计算已达到二千五百万人到三千万人之多。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宣传的成功，尽管在不良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中国人镇压东干人叛乱时采取一切上述的残酷手段下，规模还是很大的。说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迅速推广，我认为必须谈一谈这个事件对俄国在政治关系上的意义的问题。从对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各种意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旅行家叶利谢耶夫的意见。他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以及在印度的传播，只能是合乎俄国的愿望的，因为大多数伊斯兰教徒，尤其是东干人都表示自己对俄国的公然向往，在那里他们的许多教胞过着如此良好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个意见已为其他的我国旅行家近来也注意到的许多伊斯兰教徒倾向俄国的情况所证实。例如，普尔热瓦利斯基多次在中亚细亚水草地带、伊斯兰教徒集居的西安城郊区旅行时，经常听到对中国官员压迫的申诉。已经被不久以前的长时期的斗争和许多地方的普遍屠杀所削弱的东干人，想要摆脱中国官员的压迫，没有外力的帮助肯定是不可能的。任何的这种企图都会引起更大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所以东干人把俄国邻居看做是自己可能的拯救者，至少是在反对中国人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可以保证，在我国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会在东干人中间找到最可靠的战友。现在他们就已经不止一次地问我们："俄国人是不是很快开始与中国人战争？"然后补充说："哪怕是只有一百个俄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立刻人人奋起反对中国人。"

普尔热瓦利斯基也从东土耳其斯坦中国军队中绝大部分的伊斯兰教徒兵士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话。很可能，对于我国的这种好感在中国北部各省当地的伊斯兰教徒中也存在着，只是程度较小

而已。

科斯岑科在他的《准噶尔军事统计材料概况》中，也表示了关于东干人的同样意见。据他说："迁入我国境内的东干人，对于俄国人来说真正是一种收获。他们加强了我国沿边各州的殖民成分，此外，在与中国战争的场合，将会是给与我国军队很大帮助的民团。"

第 二 章

西西伯利亚行政管理上的改革和设置土耳其斯坦总督。关于管理吉尔吉斯人的新情况。　这种革新对于吉尔吉斯草原游牧居民的意义。

从第三篇所详细叙述的我国深入中亚细亚的前进运动的经过情况可以看出，这个运动在西西伯利亚政治关系上不容争辩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走上一座非常高大的永久积雪的山脉——天山，它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连起来成为中亚细亚最高的地方。这种情况也使我国能够与东亚的一个一等国家——中国确定巩固的国界。因此，我们来到了某些时期曾是神秘莫测的喀什噶尔或东土耳其斯坦，并且在中国这个边区的主要城市——距离克什米尔三百五十俄里的喀什噶尔设立了俄国领事馆，可以说一下子就成为面对印度的正面了。

但是接受了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把它巩固起来，对所占边区的俄国当局赋以应有的力量和自主地位。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在这个中亚细亚边区从维尔内堡垒到建立在锡尔河的要塞广大地域，有一条强固的国防线。因此自然出现了将西伯利亚和奥伦堡两条防线迅速合并为一条国防线的问题，这条国防线在需要的时候，也能成为进攻行动的可靠基地。应当指出，关于合并上述防线的问题，我国政府早已认识到了。早在1854年，讨论我国中亚细亚边区军事管理组织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已认为合并西伯利亚和奥伦堡两防线是必要的。这个

建议虽然已经批准，但是正值东方战争的时候，没有付诸实行，而推迟到1864年，当时切尔尼亚耶夫上校从西西伯利亚出动，占领了浩罕国的阿乌利埃特堡垒；而维列夫金将军带同部队从奥伦堡边区出动，占领了土耳其斯坦。然后，又占领了切克缅特、塔什干而形成了所谓浩罕防线。

1864—1867年间，我国所采取的深入中亚细亚一系列的继续军事远征，带来了俄国武力的辉煌胜利，以从前浩罕汗国一部分土地合并于俄国而闻名，这部分土地连同浩罕防线前部地区构成了土耳其斯坦州。嗣后，由于土耳其斯坦州，作为同中国和中亚细亚各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接壤的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以及为了在新占领的边区奠定应有的完善组织，在中亚细亚巩固俄国的统治和势力，最后，为了对新占边区的我国军事基础提供一切所希望的力量和坚强程度，认为必须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职务。属于它所管辖的，是奥伦堡管区的土耳其斯坦州和塔尔巴哈台山南部的西伯利亚管区的谢米巴拉丁斯克州。这个新成立的边区的全部地区先分为两个州：谢米列钦斯克州和塞尔·达里英斯克州。

随同土耳其斯坦总督的设立，全部的吉尔吉斯草原，无论是奥伦堡所管辖的还是西伯利亚所管辖的，都已经成为帝国内部的州区了。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同较适合于草原边区情况的管理吉尔吉斯人的原有制度，是否能符合于促成这个边区最后合并于俄国的新的较现代的组织的需要。为了全面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在我国中亚细亚各边区就地调查，并起草西伯利亚与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人的新管理条例草案，设立了所谓草原事务委员会。派遣这个委员会委员前往吉尔吉斯草原的最高命令是 1865 年颁下的，1868年10月 31 日，皇帝批准了委员会所草拟的关于土耳其斯坦总督属辖各州，以及乌拉尔、图尔盖、阿克摩林斯克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暂行管理条例。因此，在管理西伯利亚和奥伦堡吉尔吉斯

人的组织上，发生了根本变革。为了研究这种变革对吉尔吉斯草原游牧居民的福利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必须把我国政府从前在吉尔吉斯草原实施的适当的组织和管理，作简明的历史概述。1822年，斯佩兰斯基伯爵颁布了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在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草原奠定了这种组织的基础。但是同时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问题，即在斯佩兰斯基以前，在1822年以前，我国关于管理吉尔吉斯人方面做了什么事情？从历史上来看，吉尔吉斯人于1734年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在位时代加入了俄国国籍。为了纪念这个入籍对吉尔吉斯汗曾颁给证书，表明接受他带同所有在他属下的吉尔吉斯-凯萨茨基民族加入俄罗斯国籍。这个证书由女皇于1734年7月10日签字，加盖国玺。吉尔吉斯人加入俄国国籍在差不多一百年之久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

我国的新属民在俄国商队经行吉尔吉斯草原的时候，照旧继续劫夺了他们。因此，为了保护这种商队必须派遣哥萨克部队随行。同时，吉尔吉斯人不只是侵袭草原上那些单独行动的人，而且还冲入我国附近的村落进行掠夺，并将居民作为俘虏带走。为了防止我国新属民的这种横行霸道，我们开始以防卫的状态来对付他们，从奥伦堡草原方面到亚伊克河，而从西伯利亚草原方面则到额尔齐斯河，设立几个防线保卫自己，并且这些防线上的各堡垒都驻有相当数量的卫戍兵。

但是经验表明，这还是不够的：加入我国国籍的吉尔吉斯人丝毫不受这种义务的约束，不仅继续掠夺防线附近的哥萨克村庄和前哨地方，而且越过额尔齐斯河，掠夺采矿工业居民点。为了避免吉尔吉斯人的这种横暴行为，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位时代指挥西伯利亚各防线的司令官什普林格尔少将想出了这样的办法：1765年，他向额尔齐斯河所有各堡垒的司令发出训令，要使吉尔吉斯人绝对不得带同自己的马群接近额尔齐斯河十俄里之处。这个

命令为我国决定使吉尔吉斯人离开我们的所谓十俄里的中立区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接受吉尔吉斯民族加入我国国籍，我们从中毫无所得。恰好相反，按照格里果利耶夫教授的公正意见，在吉尔吉斯人加入俄罗斯国籍之后，出现了一种任何欧洲国家的历史都未能想象到的情景：尽管有我国的全部力量和俄罗斯民族的强大，我们开始以驻有强大卫戍军的堡垒来保卫自己，防范自己的属民，我们不是同他们接近，而是不仅不容许他们在枪弹射程之内接近自己，而是甚至不容许接近到十俄里①。

后来，即1815年，由于准许吉尔吉斯人带同自己的畜群越界进入这个地带的地区，同时要求按照极为复杂的税率，每头角畜和每一马匹从一岁到四岁和更大的岁数缴纳所谓幼畜增殖税，这个命令被大大地削弱了。在准许吉尔吉斯人缴纳牲畜税而在额尔齐斯河右岸游牧的时候，哥萨克官长开始也从额尔齐斯河左岸附近十俄里以内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征收牲畜税。从1880年起废止了牲畜税。

到十九世纪初，对草原全部地域吉尔吉斯人的管理，已经授权给我国政府核定的继任的汗。

同时，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人所居住的草原，与十八世纪初所建立的所谓西伯利亚防线的西伯利亚内部省区托波尔斯克和托木斯克划分开来了。这个防线从托波尔河或兹维林诺戈洛夫斯克堡垒到上额尔齐斯河，分为两翼：右翼从兹维林诺戈洛夫斯克堡垒到鄂木斯克，称为高尔基防线；左翼从鄂木斯克到南部防线，以额尔齐斯河防线而闻名。在西伯利亚防线地区或邻接西伯利亚各省所属州（县）部分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约有一万一千人，处于边

① 格里果利耶夫。

区委员会管辖之下，该会有官员二人，直接隶属于驻在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独立军团司令官①。该委员会管理居住在防线或防线内的吉尔吉斯人事务。对于防线外的吉尔吉斯人它没有任何权力，只是与他们进行接洽，以便保证商队不受劫掠和在草原上自由行动②。

在这种情势之下，西伯利亚防线地区内存在着双重管理：属于边防军事官长按照地方情况管辖的，是分布在西伯利亚防线的一切堡垒和前哨，包括城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在内。该地区的县级城市以及分布在该地区的村庄，都属于民政管理。在各村落之间和差不多是在各县之内游牧的吉尔吉斯人数达一万一千人，审判和惩罚都在各堡垒内办理，民政官长不闻其事。

在这种制度下，可以想见沿边地区存在什么样的管理。管辖权限的混淆不清，以及对争端和双方要求审理的困难，在每一起盗窃和欺侮的案件需要两个官长会商的时候，就产生了连篇累牍的往来文件，并且不是涉及案件的实质，而是关于管辖权限和审理方式的问题③。

当十九世纪初叶，斯佩兰斯基伯爵必须着手起草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时，关于管理吉尔吉斯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很明显，在吉尔吉斯草原放荡不羁的、半野蛮的游牧居民中间施行应有的组织制度和管理，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尤其困难的是，吉尔吉斯人管理组织的这个问题的本身，在实际上不仅没有研究透彻，而且甚至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但是尽管遇到一切困难，斯佩兰斯基在他从高级国家管理事务中所获得的广泛见闻和经验，成为克服这一切困难的胜利者。他所制定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

① 《西伯利亚地方管理的主要原理概述》，第62—65页。
② 别利亚夫斯基：《西西伯利亚的材料》，第32—33页。
③ 《西伯利亚地方管理的主要原理概述》，第12页。

程成为具有巨大国家重要意义的文件，不仅由于它在吉尔吉斯人中实行应有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奠定了初步基础，而且也由于它在政治关系上的作用。它成为斯佩兰斯基伯爵透彻和远见智慧的辉煌遗作，可惜的是，按照姆·阿·科尔弗伯爵的话说，当时的人对它不够重视。

首先应当说，从按照斯佩兰斯基伯爵的计划，俄国在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草原实行管理，以及设立所谓外部州区起，中汗国的汗王政权就完全被废除了，而且没有引起任何的纠纷，促进这一点的情况是，在最后的汗王布凯于1819年和瓦利伊于1821年死亡以后，没有继续选任汗王。在中汗国废弃汗王制度，没有与中国政府作过任何预先的交涉，而中国政府在十九世纪的整个上半期经常向我国争论中汗国和大汗国吉尔吉斯人的管辖权。虽然吉尔吉斯各汗已经宣誓加入俄罗斯国籍，但是各汗的权力在汗国中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吉尔吉斯人的从属于我国也是虚伪的，他们在实际上是独立的。从按照斯佩兰斯基的计划在草原实行俄国管理的时候起，吉尔吉斯人的从属关系已经不是虚伪的，而是实际的，同时对吉尔吉斯人也课以赋税。最后，斯佩兰斯基在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中还拟定了中亚细亚将来的国界。在该项章程的第三百一十六条规定，占领西伯利亚防线的军队逐渐前进时，应当使自己经常驻扎在实际国界上为止。这个规定在外交部的直接领导和密切监察下，已经确实地执行了。我国深入中亚细亚的前进活动，把我们引向巨大的天山山脉，按照这个方向，根据《北京条约》也就最后确定了我国与中国的国界。

从颁行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的时候起，在嗣后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吉尔吉斯人的政治地位上，象上文已经详细叙述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完全丧失了自己对东南草原边区吉尔吉斯人的权力和影响。

这种权力转归了浩罕人。从六十年代占领楚河彼岸的堡垒以后，就最后确立了俄国对吉尔吉斯人和草原南部边区全部地域的权力和影响。但是吉尔吉斯人政治地位上的所有这些变化，并没有涉及吉尔吉斯草原地方游牧居民的内部状态，即没有涉及吉尔吉斯民族的民族风习、生活方式、风俗和习惯，这些东西仍旧保持着斯佩兰斯基当时的状况。他所制定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完全适宜于民族风习，其基本的基础仍旧是不可侵犯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保留了没有失去它旧日意义的斯佩兰斯基时期的民族原则。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第八条的内容，确证着这种情况，该条规定各州区由被认为同一氏族或后代已经习惯于共同生活的各县区，以及相邻的从而彼此成为亲属关系的各县所组成。

斯佩兰斯基关于管理吉尔吉斯人的改革，只涉及西伯利亚的草原。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草原的管理，是根据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毫无共同之处的另一些原则上实行的。由此可见，在管理同一民族所居住的所有的草原边区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致的。但是尽管按照两种截然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而管理同一民族，有许多不便之处，在1868年以前，我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两种管理吉尔吉斯人制度所产生的不便之处，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了，即往往对有关吉尔吉斯人的同一问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高级当局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历任各总督的经常更替，不仅不努力支持和实行他们前任所开始的改革，而且是在完全相反的精神上行事，在这种场合都是出于自己的个人考虑和意见。例如，奥伦堡总督苏赫捷连认为，吉尔吉斯人无论如何应当保持游牧状态。佩罗夫斯基伯爵持有同样的见解。他的继任人奥勃鲁乔夫却得到相反的信念，认为使吉尔吉斯定居是可能的和有益的，而在佩罗夫斯基重新被派接替奥勃鲁乔夫的时候，他就竭尽全力来坚

持自己的原来意见，即反对奥勃鲁乔夫的意见，而使吉尔吉斯人保留在游牧状态之中，并且为了这种企图，严厉禁止在草原上建筑窑洞和土房，以及总而言之各种经常居住的建筑物①。接替佩罗夫斯基的卡捷宁的看法，与他前任佩罗夫斯基的意见正相反，而倾向于奥勃鲁乔夫的意见。据托尔斯泰伯爵说，在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人处于外交部管辖之下时，对于他们的管理是合理的。该部力求使他们确信，归属俄国管辖对他们来说，比归向布哈拉和希瓦较为有利。当这个民族归入国家财产部管辖的时候，任何管理的意思都已消失了，而吉尔吉斯人事务也就陷入了我国主管司局的一般处理事务所特有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墨守成规之中。

为了了解各地方总督所发命令的逻辑性的混乱，托尔斯泰伯爵说道，只需说一说，例如佩罗夫斯基伯爵认为，准许吉尔吉斯人定居是有害的，而别扎克将军则认为，在他们中间实行1861年2月19日的农民条例是适宜的。西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1875—1881）认为最合于愿望的，是小心谨慎地不排除游牧居民，而使俄国居民与吉尔吉斯人接近起来，他指出必须吸引俄国农民前来吉尔吉斯草原②。阿克摩林斯克省长利文佐夫和草原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1883—1890)对于此事有着完全相反的意见，并肯定说阿克摩林斯克州不可能由俄国人落户定居，因为这里完全没有适合于耕种作物的土地，而且另一方面只有吉尔吉斯人在这里有土地权和能够适应地方条件。总督塔乌别与自己的前任科尔帕科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分歧，在正相反的方向上行事，即公然反对按科尔帕科夫斯基的命令行事。因此，塔乌别在自己来到边区以后不久，对于上述的科尔帕科夫斯基的意见毫不加以注意，认为

① 维谢洛夫斯基：《按照他的信件和著作来判断的弗·弗·格里果利耶夫》，第209页。

② 《西伯利亚的移民垦殖》，第201页。

准许在阿克摩林斯克州实行农民的移民垦殖是可能的，而且即刻命令在这个州的科克切托夫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两个县内移住男性农民约八千五百人之多①。

托尔斯泰伯爵为了在管理吉尔吉斯人的事务中恢复合理的方向，打算在解决地方利益上给地方官长以充分的行动自由，使主管部负有义务把这个民族引导到它自觉选择的目的。我支持托尔斯泰伯爵这种完全合理的意见，就我所了解到的是，在这种场合较适宜的是按照各该管部的协议预先制定大纲，这种大纲应当作为指导原则和指示，来系统地就地拟定西伯利亚和奥伦堡管区全部吉尔吉斯人的管理条例草案。因此，关于吉尔吉斯人生活习惯的同一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然后根据这种与一般的国家意图和政治性的考虑相符合的指导原则，来着手就地审查当时现有的关于管理吉尔吉斯人的法规，把它们统一起来，并施行对所有吉尔吉斯人共同一致的管理制度。起草新条例草案这个工作，由地方特别委员会在各总督的领导之下进行，委员会由各总督委任的人员组成，邀请充分熟悉吉尔吉斯草原和游牧居民民族生活条件的人员参加。这些措施，看来也完全符合政府对地方政权意义的当前观点，根据1903年2月26日的皇帝上谕，对地方政权已经赋予了广泛的自主地位。但是可惜，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对于这种问题存在过另一种意见。当时认为，审查和决定有关地方需要和专门性需求的各项问题，应当完全依靠中央机关，而不需边区地方政权直接参加。应当指出，在当时和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有时也听到过反对这种办法的孤独的呼声。

例如，格里果利耶夫教授早在1857年认为，我们应当首先要使我们有行动自由，要削弱中央集权的压迫，使各边疆的人能够以自

① 奥斯塔菲耶夫，《草原各州的移民垦殖》，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第十八卷，第二期，第11页。

己的聪明才智来考虑自己的需要，并采取专对他们有关的措施，而不要经过经济司和监护委员会的检查和监督①。

有些人为设立草原委员会辩解说，各委员有义务巡视吉尔吉斯各草原，从而委员会具有充分的可能，在实际上来了解民族的需要和需求。很好。但是同时产生一个问题，即在广阔的草原地域走马观花地进行巡视的时候，能不能了解该民族和研究他的特殊生活习惯？据通晓吉尔吉斯人生活习惯的著名专家列夫申说，为了弄清楚所有吉尔吉斯人的后代、氏族、支族和分支，必须长时期与吉尔吉斯人一起居住，不仅是在每一个支族中，而且也在每一个分支中②。据草原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根斯说，在我国官员没有在草原上住下来以前，在各总督没有开始呼吸草原空气和生活在吉尔吉斯人中间不由自主地研究他们以前③，我国当局是不会了解草原的。一句话，此事乃是长期和全面研究游牧居民民族习惯、生活和性质，以及充分了解整个民族生活的结果。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决定着手进行吉尔吉斯草原的改革，看来，那就应当谨慎从事，这是在还没有实际经验的任何新的事务中所必需的。据熟悉草原情况人们的意见，永远不应当以许多新措施来使吉尔吉斯人畏惧，这往往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任何的改善措施，尤其是在经济生活方面，只有在自主和自由地进行没有政府监督和带有强制办法的时候，才能得到成功。一般来说，不应当把甚至在俄国欧洲部分还处于原始状态的东西强加于吉尔吉斯人，也不应当对他们施行为定居居民所规定的行政管理方式。很明显，对于游牧居民完全采用这种方式，必须在吉尔吉斯人按照自己智力和道德上的发展能与原来

---

① 维谢洛夫斯基：《按照他的信件和著作来判断的弗·弗·格里果利耶夫》，第156页。

② 列夫申：《吉尔吉斯·凯萨茨基汗国和各草原的叙述》，第三卷，第6页。

③ 根斯：《文艺作品集》，第二卷，第68页。

的俄国人多少相等的时候，才可能成功。在这时以前，对吉尔吉斯人施行为定居居民所制定的制度和秩序，就为时过早，而且将如吉尔吉斯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所形容的，这等于我们不是使帽子适合于头，而是使头适合于帽子①。

格里果利耶夫教授也反对对吉尔吉斯人采取严厉和强制的办法②。

按照他的意见："谁也没有权利破坏民族的经济生活，不管预定的改革会有多么良好的效果。经验教导说，凡是强迫的，就是不巩固的，凡是不适时的，就是腐朽的。只有民族自己才是适时与否这个问题的判断人。当某种现象的基础已经形成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出来，并且是不可摧毁地产生出来。人为地激起这种现象，那就意味着拔苗助长。"

但是草原委员会，下文将更详细叙述的，认为必须立即对吉尔吉斯草原的管理实行根本的改革，认为委员会的任务在于改变草原生活的一切条件。这种向新制度的急遽转变和变更行政管理组织旧有方式的极端措施，在奥伦堡管区各草原实行新条例的最初时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草原的风波和不安。匆忙地和不适宜地施行草原委员会所制定的吉尔吉斯人管理条例，也助长了这种情况，据卡·阿·斯卡利科夫斯基说，人们曾把这个条例诙谐地称为吉尔吉斯宪法。它给与吉尔吉斯人以精神上的各种抽象权利，而把剥夺下来的一部分割草地拨给了哥萨克人，并限制了换地游牧的自由，但是对于游牧人来说，干草要比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更为重要③。无论如何，在奥伦堡边区乌拉尔州和图尔盖州仓促施行这个新条例，如上所述，曾在吉尔吉斯人中间引起了骚动和混乱。

① 柯捷利尼科夫：《俄国的外族问题》，见《观察家》，1897年6月。

② 维谢洛夫斯基：《按照他的信件和著作来判断的弗·弗·格里果利耶夫》，第212页。

③ 卡·阿·斯卡利科夫斯基：《我们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第191页。

据恩·格·扎列索夫说，各总督没有想到预先培养民族适应这种新体制管理，可是却不愿意推迟新条例的实施，因为按照新计划的人事编制，各总督的经费大大地增加了。各总督最初时期所建议的办法，丝毫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和所实行的这种根本改变管理吉尔吉斯人旧体制革新的重要意义。

扎列索夫当时担任奥伦堡区参谋长的重要职务，对于这一切情事是很清楚的。在他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实际资料，对这些资料的完全可靠和正确是不容有丝毫怀疑的。按照他所记述的在吉尔吉斯草原实行草原委员会所拟定的新条例时产生的混乱来判断，原来在需要向吉尔吉斯人宣布这个条例的时候，它还没有译成吉尔吉斯文，也没有在草原上传播开来。为了排印条例，在匆忙中没有送往备有吉尔吉斯文铅字的军区司令部，而是送往喀山去排印，而且当时应当向吉尔吉斯人宣布新条例的各官员已经准备前往草原去了。很清楚，当这个条例的吉尔吉斯译文从喀山来到奥伦堡的时候，草原上已经开始叛乱了。最有权势的阶层，如苏丹和伊斯兰教士出身的人中间的人心激动，也大大地加剧了。在他们参加下的讲解人，把新条例向吉尔吉斯人作了十分歪曲的说明。在草原游牧居民中的这种情绪下，已经开始表示公然不服从政权。因此，吉尔吉斯人直截了当地向官员们声明，他们不想听从他们，也不接受这个条例。官员的选任是非常成功的。

在彼得堡，据扎列索夫说，对草原上所发生的风潮没有特别予以重视。可是，在实际上吉尔吉斯人已经拿起了武器，而叛乱正逐步加强，决定采取广大的范围。这种不良的情况更加严重起来了，因为在奥伦堡草原地方，我们当时没有强固的据点和经常武装的居民，象在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人草原所做过的那样，那里早已建立了堡垒和住入了哥萨克居民。必须同时镇压叛变的吉尔吉斯人和在草原上建立新的堡垒。最初决定建立阿克求别和乌伊尔两

个新堡垒。同所有这些困难连在一起的，还有正规军队的极端不足，它只有三个营。在这种种情况下，哥萨克人帮了很大的忙。二个哥萨克连立即开往草原地方，尽管是在严寒的冬季，他们击退了吉尔吉斯匪帮，占领了与防线完全切断了的埃姆宾斯克堡垒。然后着手组成四个部队，准备于早春季节派往草原；为了建筑堡垒和为了在草原上镇压叛乱，紧急调哥萨克步兵一个营到奥伦堡来，以供差遣。被派往草原的部队，在中校什捷姆佩利、上校副官鲍尔赫伯爵、上校科马罗夫斯基伯爵和中校维列夫金率领下行动极为顺利：把叛乱者驱逐到乌尔塔山口。据扎列索夫的正确说法，在那里应当给叛乱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要做到这点是困难的，因为兵力感到不足，而主要是由于决定把部队推进到遥远的乌尔塔山口，希瓦在那里支持变乱的吉尔吉斯人。总而言之，要在草原地方奠定秩序和安宁光靠兵力是不够的。在这种事务中也须有民政官长的参加。可惜新的行政管理人员没有受到吉尔吉斯人的信任。因此，据扎列索夫证明说，草原远远没有平息下来，我们甚至不得不在随后的四年中，直到向希瓦派遣克·普·考夫曼的远征军，还经常从奥伦堡派遣部队到埃姆巴河彼岸去。

上面所引叙的在实施新条例时期内奥伦堡草原产生混乱和风潮的一切情况清楚表明，在编制草原条例草案时期也好，在实际施行时期也好，看来都没有遵循在草原游牧居民中实行这种改革时所必须有的逐渐进行和谨慎态度。著名的通晓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草原的专家格里果利耶夫教授经常指出了这种因素，他是著名的活动家和佩罗夫斯基伯爵和卡捷宁各位总督的亲近助手，他以奥伦堡边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担任过管理奥伦堡吉尔吉斯人的重要职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经常反对剧烈的和强迫的办法，始终坚定地认为对民族经济生活的直接行政干预，永远不会得到好处。但是如果能够保证人身安全和公平裁判，那么工业从而还

有物质福利都会自然而然发展起来①。

据维谢洛夫斯基说，格里果利耶夫看到对那个吉尔吉斯民族可以用小心谨慎和温和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可以确证这一点的，是向奥伦堡吉尔吉斯征收帐篷税，这种税是从1863年起逐渐在他们那里实施的。实行这种办法，没有引起任何的风潮和混乱.象违反千百年习惯和每个个人利益的新措施所经常产生的那样，这是有很重要意义的。格里果利耶夫是第一个想到使沿防线的吉尔吉斯人脱离苏丹统治者管理的人。但是，他认为应当使吉尔吉斯人比从前更直接地服从俄国政权，同时他看到还远非全部草原可能一下子适应和毫无震动地服从俄国官员的管理，来代替苏丹统治者，因此建议逐渐实现这种改革，以期事业的成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后来的事件指明了这种意见的完全有理由。关于这个问题，他早于1859年就作过呈报。但是可惜，对于格里果利耶夫的这些有充分理由和有教益意义的意见和指示，看来没有得到那些从来没有看到过草原而想使它民主化的那些晚近的改革家们应有的注意。按照维谢洛夫斯基的正确意见："时代的自由倾向也需要实行自由的改革。草原的变革和改组已经开始了，而随后发生了上述的1869年的叛变。在奥伦堡的民政管理中没有发现一个了解边区和通晓它的特点的人员，能够以自己的威望防止灾祸，扎列索夫也不否认这一点。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人民破产、牲畜灭绝，而平息草原使我国花费了好几百万。"②

在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草原，以及土耳其斯坦边区，实施新条例最初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也没有激起任何的不安和风潮。看来，其原因是在于采用新条例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吉尔吉斯人由于

---

① 维谢洛夫斯基：《按照他的信件和著作来判断的弗·弗·格里果利耶夫》，第221页。

② 同上，第224—225页。

当地行政管理当局预先向他们说明了该条例的内容而有所准备。同时这个改革也是慢慢地和渐渐地实施的。最后，我们在西伯利亚草原有许多集合点，其中住有武装居民。因此，我们永远具有充分的可能，遇有任何不服从政权的微小企图，一开始就能制止吉尔吉斯人的这种敌对表现。

由此可见，在西伯利亚草原内部住入武装居民和建筑作为据点的堡垒，在这种与草原委员会意见相反的情况下，不容争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草原委员会所制定的吉尔吉斯人管理条例中，认为必须对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和晚近各法规所规定的旧有管理办法作出下列的根本修改：（1）为了将草原边区逐渐合并于俄国，必须在该边区实行俄国的管理，比照帝国的一般机关，适应草原游牧居民特殊生活的特点作若干个别的变通；（2）消除草原上哥萨克人与当地人的两种管理办法。这种两种办法始终成为哥萨克居民与州区官署之间经常冲突的原因，而且有些类似上述产生民政官长与边防军事官署之间冲突的不便情况，正象斯佩兰斯基已经指出的。根据这一点，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都应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官长；（3）按照第一点所引叙的考虑，划分为区改作划分为县；（4）废除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所规定的官署，并以县长的一人专权代替现有的集议制管理；（5）据草原委员会的意见，人民法院的独立已为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所动摇。因此，认为必须授与吉尔吉斯人以按照地方习惯自行裁判的权利，并尽量扩大人民法院的权利；（6）废除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所规定的皮毛实物税，而代之以帐篷税。委员会认为根据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第134条所实行的皮毛实物税，除骆驼外，所有牲畜每百头抽一的做法，只有在理论上是完全对的。至于在实际上，富裕的吉尔吉斯人纳税较少，而贫穷的吉尔吉斯人往往缴纳多于他所应纳的税额。对帐篷税比皮毛实物税容易监察，

因为征收皮毛实物税，经常遇到要正确计算牲畜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所列举的草原委员会对旧有管理吉尔吉斯人的法规所作出的修改可以看出，这些修改涉及到吉尔吉斯人生活习惯的若干重要方面，并在其中作了根本的变革。因此，新的条例大大削弱了吉尔吉斯民族内部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氏族原则。

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应当说氏族原则在很远的时代在吉尔吉斯人那里就已经产生了，当时由于自卫的必要，汗国人曾按氏族和部族组成集团和群体。在那个时候，即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叶，吉尔吉斯人曾四面八方受到敌视他们的各民族的威胁：在东方有准噶尔人，在西方有巴什基尔人，而在南方一部分是准噶尔人，一部分是中亚细亚各汗国的伊斯兰教居民。这种自卫的必要性迫使吉尔吉斯人的各氏族按照所选任的领袖们的号召，非常迅速地从各方面集合起来共同击退自己的敌人。这样，集合在草原上具有中心地位的一个地点，记起团结就是力量，吉尔吉斯人准备迎接邻居游牧民族的侵袭。在这些邻居民族之中，吉尔吉斯人的最危险敌人，是大群的准噶尔人。

由此可见，吉尔吉斯人氏族和其他较大团体的联合，在往昔时代是由于意识到利益的共同性而得到支持和加强的，并由自卫的需要所决定的。后来，在1757年，准噶尔在中国人的打击下而灭亡的时候，草原的形势完全起了变化。爱好和平的中国政府之所作所为，与准噶尔人完全不同，吉尔吉斯人曾经乾隆皇帝准许在巴尔喀什湖彼岸游牧。

这个时期，即十八世纪下半叶和上一世纪上半叶，是吉尔吉斯人经济生活发展最广泛的时期。吉尔吉斯人在扩大自己的牧区上差不多不受任何的阻碍，他们在当时真正成了畜牧民族，如果由于俄国武装居民开始住入草原而受到一些排挤，那么在最初时期，吉尔吉斯人在占有土地上所受到的这种排挤一般说来是不大的。总

而言之，全部无边无际的草原都在吉尔吉斯人的专有利用之下，他们把它作为自己夏季和冬季的驻扎地点，随意占据地方，并且带同自己的畜群迁往广大的地区，不断向前扩展自己的牧区，主要是向东方，如上文已经叙述的，甚至远远越过中国的常设卡伦线。很明显，在这种良好条件之下，吉尔吉斯人遇到的到处都是富饶的牧场，得以高度发展自己的畜牧业。按照当时所认定的习惯，夏季驻扎地点是在共同领有的地方。冬季驻扎地点，他们是按氏族分组，每个氏族占有一定的地区。并且，富足的和有权势的族长同自己的亲属占据较为广阔的富于水草的地段。

这就是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前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草原的情况。从在中汗国实行俄国管理，主要是在草原住入武装居民以后，吉尔吉斯人从前使用牧场和其他耕种土地的自由，自然应当受到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实行俄国管理和在吉尔吉斯各草原发展俄国军人垦殖，不容争辩是大有助于草原上应有的秩序和治安的奠定。从这个时候起，在草原上劫夺商队、邻居部族的互相敌对和侵袭，以及氏族之间的内讧，开始显著地减少了，一般来说，草原上的风潮逐渐平息了。自从草原边区进入平静状态，确立了应有的治安以后，吉尔吉斯人已经没有必要联合成进行自卫的巨大团体，象在准噶尔人时期所有过的那样。这种情况和已经开始的草原移民垦殖，动摇了氏族的联合。对于他们的分裂也起有不少促成作用的，还有肯尼萨尔叛乱和东干人混乱时期的风潮，当时吉尔吉斯人醉心于掠夺，离开了自己的过冬地点，而在回来之后看到这些地点已被别的部族占领了。在草原进一步发展垦殖化时，最初是强制的，随后是自由的，吉尔吉斯人的驻扎地点，特别是过冬地点，已经不能占据从前的广大地区，把自己的驻扎地点让给了俄国的定居移民，由于需要，吉尔吉斯人应当在别处另找驻扎地点。因为这个缘故，氏族分散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旧有的稳定、联系和一致。应

当指出，按照斯佩兰斯基的计划，最初在吉尔吉斯草原实行应有的组织和管理时，政府认为保持氏族原则是可能的。这一点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章程第八条可以看出，根据这一条，如上所述，曾决定保持氏族的原则。

但是这种按照氏族原则划分乡的做法，草原委员会认为在行政管理上是不便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①。这是因为由各个氏族组成的乡，有时占据很大的地区，显得是不平衡的，而大氏族在一个族长的权力下可能特殊化起来，所以认为在政治方面是有害的。因此，从1868年在吉尔吉斯各草原实行新的行政管理制度时起，大部分乡的组成不是按照氏族占有土地，而是基于地域分布的原则，即按照帐篷的数目——每一千帐篷到两千帐篷为一乡，即在实际上是人为组成的。据奥斯塔菲耶夫说，在这种由几个氏族或几个分散了的氏族人为组成的乡里，应当违反历来的习惯，废弃历来的独自为政，放弃氏族团体的利益、风俗和习惯。氏族占有的土地分裂为极小的小块土地。例如，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县各半野蛮的乡，五个吉尔吉斯人村庄里计有九十六个氏族所有的过冬地点②。

由此可见，这些新组成的各乡不是氏族的团体，象从前那样，而是几个氏族的人为的联合，它掺杂和混淆到这样的程度，再要使他们恢复原状肯定是不可能了。很明显，在乡的这种条件之下，已经不能再冠有从前的氏族名称，而以他们所占据的地方作为名称来代替。另一方面，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吉尔吉斯草原已经成为帝国的内部州了，它犹如被包围圈围了起来，想要从那里出去比过去难得多了。从根据新条例把吉尔吉斯草原划分为具有确定的疆

① 奥斯塔菲耶夫：《关于牧业经济问题的草原各州垦殖化》，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第十八卷，第二期，第32页。

② 同上，第34页。

界各州以后，有些吉尔吉斯氏族被这种疆界分裂成这样的情形：一个氏族的一部分是在这个州里，而另一部分却在相邻的州里。

这种氏族的分散由于下述情况而加甚了，即由于实施新的条例，吉尔吉斯人应当尽可能地在自己的县境以内放牧，没有边区主要官长的许可，不许越界进入相邻的州区，尤其是不得越入别的总督管区。只有塞尔·达利英斯克的吉尔吉斯人例外，他们准许在夏季越入奥伦堡吉尔吉斯州。

所有上述情况导致一个结论，自吉尔吉斯人服从俄国政权以后，氏族原则的意义大大地动摇了。后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原则更加减弱了，当时按照草原委员会的计划实施管理吉尔吉斯人的新组织，大量移民进入了草原各州，而吉尔吉斯人把自己的驻扎地点让给俄国定居落户，自己由于需要，不得不在其他各地寻找驻扎地点，或者从哥萨克人那里租用土地①。

由此可见，草原委员会在关于吉尔吉斯草原行政管理制度的一系列条款中，一贯地力求废弃氏族原则。但是，不是草原边区一切主要官长都赞同这种意见。例如，草原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关于氏族问题曾表示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每一原始民族生活根本原则的保卫者是他的氏族生活习惯，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吉尔吉斯人的地方管理体制，作为最符合于他们利益的体制。根据这一点，他认为必须由一个氏族的各个分支组成吉尔吉斯人的各乡。科尔帕科夫斯基也不赞同草原委员会关于组成旧有氏族团体具有政治危险性的意见，作为俄国政权的代表者表示这种担心，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了解吉尔吉斯民族的和平性格和不相信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的他们的理智。在草原委员会所草拟的和

① 奥斯塔菲耶夫：《关于牧业经济问题的草原各州殖民化》，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第十八卷，第二期，第38页。

1868年条例所规定的许多办法中，科尔帕科夫斯基认为实施吉尔吉斯人完全陌生的选举规则，以及把这个规则运用到新设置的头目法庭也是不正确的。这个法庭的设置代替了作为民族法制观点维护者的旧有头目，据他的意见，已经破坏了吉尔吉斯人民族生活习惯的宗法基础。按照科尔帕科夫斯基的意见，总而言之，草原委员会所草拟的吉尔吉斯草原的新的管理组织是：（1）破坏了氏族原则的意义；（2）引起了乡的人为的行政划分；（3）实行了吉尔吉斯人所陌生的选举原则；（4）毁坏了吉尔吉斯人民族生活的伟大因素——他们的习惯审判。

由此可见，从上述关于吉尔吉斯人的氏族原则可以看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意见：草原委员会认为它无论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是在政治上考虑都是不便的，因此，认为用选举的办法代替氏族原则是比较适宜的。草原边区的主要官长中有些人则与此相反，认为必须尽力支持完全符合吉尔吉斯民族生活条件和草原游牧居民特点的氏族原则。

总起来说，应当得出结论，草原委员会关于吉尔吉斯草原许多问题的工作，没有引起一致的意见。恰好相反，这个委员会所制定的有关吉尔吉斯管理和法庭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法规，重新引起了意见分歧，并在实际应用上是不适宜的。

总而言之，草原委员会许诺的要提高游牧居民福利而制定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一次也导致了一些不良的结果，这是从上文所引叙的科尔帕科夫斯基所表明的意见可以看出。

但是，为了对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如何对待新条例，新条例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吉尔吉斯草原游牧居民的福利，以及它由于确立了完全符合于吉尔吉斯民族内部生活的正确管理制度而充分保证了民族的进一步的内部发展，作出最后的判断，看来应当听取在民族中更有权势和更密切了解事务的苏丹阶层出身的吉尔吉斯人

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在这方面，一位有权势的吉尔吉斯苏丹穆萨·切尔曼诺夫上校在草原上实施新条例以后不久，向西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所提出的意见，不是没有意义的。切尔曼诺夫在这个意见书中很有理由和很公正地指出，该条例中关于吉尔吉斯草原游牧居民的福利设施有着极其严重的缺点①。据切尔曼诺夫的意见，从吉尔吉斯人自愿归入俄国国籍的时候起，即在一百多年的时期内，他们在自己的智力和经济发展上丝毫没有得到前进。的确，在鄂木斯克设立西伯利亚武备中学以后，授权给各苏丹和显贵的吉尔吉斯人安置自己的子女入学，而且有些已经成绩很好地毕了业，并被派任为军官。但是使父母痛心的是，这些青年人中的大部分都在青年时代死亡了。原因在于吉尔吉斯人的男孩子进入了不公开的学校后，必须在他们所不习惯的环境中和对草原居民不利的卫生条件下生活。

为了防止所述的不便之处，切尔曼诺夫认为，应当把吉尔吉斯人子女在武备中学修完全部课程以后，派往家乡一年，在自己的本族人之间共同生活。此后，如果上述这种学生之中有人志愿担任军事职务，那就授予在经过一年使体力强壮以后免试进入首都武备学校的权利。切尔曼诺夫又指出了草原各州行政管理组织中的一个重大缺点，这就是各乡公所缺乏具有经验的和精通自己业务的办事员。为了建立办事员制度，切尔曼诺夫建议，使在当时所设的亚细亚学校中学习的吉尔吉斯男孩子毕业以后，不送还给他们的父母，而派往各县公署见习文牍事务。嗣后，他们可能成为县公署和乡公所的良好办事员。切尔曼诺夫在他的意见书中也涉及根据草原委员会所起草的新规则举行乡区管理员的选举程序。选举，正

① 后来我知道，这个意见书是按照切尔曼诺夫的意见和指示由他的子女的教师布蒂采夫写成的。这个意见书是用很好的文言文写的，而且在意思上和阐述上都值得充分注意。

如所发现的，在实际上是显然违反这些规则而举行的。切尔曼诺夫说道，最初好象是由吉尔吉斯人自己选出选举的十人长，但是可以肯定说，如果不是在所有的乡，但也不是处处如此，就是许多乡的人民几乎都不委任选举的十人长，而在这里是各村长为自己的利益尽力选出他所素知的同情者，因为村长的选举是由选举的十人长在乡管理员出席之下举行的，而乡管理员总是与村长协作，不与人民协作。然后，应当选举五十人长。在这里已经是乡管理员自己选举那些身心最忠实于他的人，而且主要是从极端自私自利和不诚实的人中选举出来的。当然，这样的选举不能不招致民怨和民愤，各乡管理员如果是富足的人们，就会以他们的势力很快平息这种怨愤。事情很清楚，这些当选的五十人长永远是选举庇护他们的乡管理员的。这种弊害已经深入在一切公职人员的选举之中。

在下述场合常有贿买的情形：如果对于乡管理员的职位出现竞争者，那时他们之间就产生各种各样的竞争，把一个乡分为最敌对的派别。这些派别尽力使用全部亚细亚式的狡猾手段，而在这种场合，各竞选人无论为了选举的五十人长，还是为了选举时到场者，都不惜作出任何的牺牲。在这里顺便叙述一下关于阿克摩林斯克州的一个县最近选举乡管理员的民间风传。据说，似乎在该州的这一乡有两位乡管理员职位的竞选人，其中一个人是很富裕的，而另一个是财富较少的，约有五百匹马和一千只绵羊。后者把它们变成现款，赠给出席的人而取得了最宝贵的诺言，说他将成为管理员。那个富裕的人听到自己对方的所作所为后，毫不思索地从自己的小匣子里数出一万现款，给出席的人作为意外赠送。不久他就被选为乡管理员，而前者失掉了牲畜，成了穷人，也没有取得已经得到许诺的和为他所愿望的职位。

上面已经说过，乡管理员贿买选举的五十人长，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卖力，他们也忠实地做到了，这有《谢米巴拉丁斯克

报》刊载过的确凿事实作为证明。但是在这里可以肯定说，各个乡管理员如果是贿买了选举人，那么他们在这种场合并不会吃亏。假定，如果乡管理员给了某些选举人钱款，那他会牢牢地记住的，在确定他为管理员之后，就尽力从这些选举人身上取得几倍多的数目，这是有各种机会的，而在吉尔吉斯人那里机会是非常之多的，那时乡管理员就作为独立自主的人员来行事，只要他是富裕的人。在这一切场合，真正的弊害自然而然地表现在吉尔吉斯人由于完全未受教育而产生的深刻愚昧之中。为了消除上述的弊害，切尔曼诺夫建议，以抽签这种较适合于吉尔吉斯人所处的低下智力和道德水平的办法，来代替条例所规定的选举程序。根据抽签办法，预定参加选举的人按照他们所轮到的次序，从票箱中抽出自己的签，这种抽签选举也就决定谁为乡管理员。采取这种办法，贿买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选举时在场的五十人长和必须出席的县公署人员都不积极参加。

由此可见，吉尔吉斯人本身不认为，草原委员会所制定的选举程序是适合于吉尔吉斯民族的性质和理解的。总之应当说，变更千百年历史途径所确定的民族生活条件，象变换舞台上的布景那样，显然是不可能的。按照科捷利尼科夫的公正意见，这意味着把游牧居民适用于不合于他们本性的、为定居居民所规定的那些行政管理制度，换句话说，也就是把人适用于一定的制度，而不是使制度适用于人。

上述切尔曼诺夫的意见，在谢米列钦斯克州军政省长的通令中得到极为显明的确证，从该项通令可以看出，在1895—1897的三年中，在选举当地管理人员时，有些县长对于进行选举是注意不够的。

由于对待选举的这种态度，在当选人中混入了人民根本没有选举过的人。至于各县长都是信任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常是以自

己派系的人代替真正当选的人的各乡管理员，而毫不检查选举当选人是否正确，甚至在他们已经收到控诉这种选举不正确的控告书时也不检查。这种具有冒名顶替的当选人的选举结果，不符合于派系多数人的真实愿望，由于一个县的两个乡的控告，不得不实行重新选举时，选出的却完全是另两个乡管理员，而不是第一次所选出的那些人，这种情况就充分地得到了证实。

因此，实施1868年新的草原条例后，在最初的时候曾经产生过意见分歧。我们已经知道，草原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反对草原委员会关于氏族原则的意见，曾经提出重要的反对意见。对于其他关于吉尔吉斯人管理组织的重要问题，即由于草原移民垦殖化而引起的吉尔吉斯人的领有土地问题。虽然草原委员会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象所愿望的那样，经过草原委员会的全面详细分析。

按照草原委员会的意见，草原内部的移民垦殖化已经采用哥萨克人落户的办法，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初步任务。然而，哥萨克人等级的闭关自守、授给他们的特殊权利和他们所担负的脱离家务服军役的义务，不能不有害于经济和农业的正常发展，并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因此，在现时，当这种移民垦殖化已经过了时的时候，继续加以实行是不会带来预期的好处的。

根据这种情况，委员会确信，俄国居民移住边区只应是自由的移民垦殖。但是确定适宜于俄国移民的土地数量，同时又不排挤吉尔吉斯人，没有预先实行经济上的土地测量，是不可能的，看来这种测量应当在具有耕种有利条件的科克切托夫斯克和谢米巴拉丁斯克两县来进行。其余的草原，按照委员会的意见，除了很少例外，都只适宜于畜牧业。

委员会关于移民垦殖问题的指示的全部内容，所引叙的材料已经说明得详尽无遗了。但是这个问题是与另一同样重要的吉尔

吉斯人领有土地问题密切相联系的，显然这两个问题需要合起来研究。草原委员会看来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只局限于指示要在吉尔吉斯草原若干地方进行经济上的土地测量。可是，除了土地测量以外，在草原移民垦殖的事业中，正如后来所突出表现的，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其他问题，涉及到吉尔吉斯人领有土地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委员会对于这些问题(下文将加以说明)没有作出任何指示供地方当局遵循。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指示是更加必要的，因为在俄国亚洲领域内正确分配移民的问题，不久就获得了头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修筑了西伯利亚铁路以后，从俄国欧洲部分各省向西伯利亚移民的运动已经大规模地在进行。可是地方当局却没有事先准备好毫不迟缓地接受和分配移民。一句话，地方官员措手不及，关于俄国移民垦殖边区没有任何的指导原则，完全不知道在吉尔吉斯草原内究竟哪些地段对于移民垦殖是空闲的、适宜的和必需的。如果这一切是事先就做好了，那么就不会发生那种匆忙和混乱，致使吉尔吉斯人领有的土地遭到了完全的破坏。在这种极不良好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查明吉尔吉斯草原的空闲土地，并在完全缺乏专门调查的情况下赶快把地段拨给移民，而且是在移民的浪潮已经冲击到吉尔吉斯草原的时候。对于移民不正确地处理拨给草原上的地段事宜，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吉尔吉斯人的土地领有形式毫无所知，以及不明了同时可能发生什么事故，这都引起了相当重大的困难和实际上的不便。例如，据索科洛夫·科斯特罗姆斯基说："在必须对移民拨给地段的时候，那就猛然想起怎样拨给：是不是包括吉尔吉斯人过冬地点在内？什么样的土地认为是吉尔吉斯人所必不可少的，或者全然不注意他们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指示。"① 但是对于这种种利益，看

① 索科洛夫·科斯特罗姆斯基：《西伯利亚移民垦殖记》，第58页。

来是很少关怀的。草原移民垦殖的新的改革家立刻就开始破坏千百年所确定的，并需要一些审慎与渐进行事的，以及尽可能不违反各草原当地居民游牧生活现代条件的现行的吉尔吉斯人的土地领有形式。

因此，随同移民垦殖事业的发展，行政管理当局从许多吉尔吉斯人手中夺取了土地，而没有给他们其他的地段，吉尔吉斯人开始迁往夏季驻扎地点，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过冬地点①。据诺西洛夫说："吉尔吉斯人对于要向他们那里移住农民，感到非常不安。这种由别的民族占住他们土地的事情正在实行，而对他们甚至不给也会拨给他们土地、他们不会成为没有小块土地的人的希望，而被当作无用的、懒惰的，并为我国所见外而忘记的和抛弃的人。"②

据充分了解此事并作过就地研究的人员证明，移民垦殖运动动摇了吉尔吉斯人的福利和经济，使吉尔吉斯人向内地落户定居③。

这一切必定使吉尔吉斯人的旧有情况和他们的经济生活向不良的方面变化，并违反了格里果利耶夫教授始终坚决表示的一个人所共知的真理。按照他的意见："如果一定的民族处在游牧生活之中，自己不改变这种生活为农业生活，那就意味着这种转变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对它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适时的。因此，使游牧人成为定居的，乃是一种强迫，按照我们的意见，任何当局都没有这种权利，而且更坏的是——强迫是不合算的，没有好处的。"④

上面所引叙的材料清楚地指明，移民垦殖问题预先详加研究

---

① 诺西洛夫：《西伯利亚公报》，1896年10月31日。

② 奥斯塔菲耶夫：《草原各州的移民垦殖》，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第38页。

③ 索科洛夫·科斯特罗姆斯基：《历史通报》，1904年，第2号，第766页。

④ 维谢洛夫斯基：《按照他的信件和著作来判断的弗·弗·格里果利耶夫》，第221页。

之所以极为必要，还由于地方行政管理当局中对于这一问题，象我们所看到的，存在着如下的各种各样意见：应当不应当使吉尔吉斯人保持游牧状态，或者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定居民族。对待草原移民垦殖化也是这样：有些人认为容许在吉尔吉斯草原自由移民垦殖是不适宜的，另一些人则认为移住是完全可能和合乎愿望的。看来，草原委员会应当把这些各种各样的意见统一起来，完全弄清楚这件事，对移民垦殖问题作出正确的处理，借此对政府在吉尔吉斯各草原进一步组织移民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主要是地方官员和草原当地居民事先准备接受移民，并拨给他们预先决定的移民地段，总的说，就是为准备建立移民垦殖打下基础。这样，关于草原各州的移民垦殖化是否适宜和可能的无尽无休的争论问题，便会在六十年代之末就告结束，而不致直到1889年当它有了法律的强制效力以前，还是悬而未决。在这时以前，对于草原移民垦殖化的意见分歧，甚至在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初期，简直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例如，总督卡兹纳科夫认为在吉尔吉斯人土地上成立农民居住点是有益处的，打算在阿克摩林斯克州，靠近邮政和商业大道，移住农户，此事一部分已见诸实行。嗣后，阿克摩林斯克省长利文佐夫认为这是不适宜的。据他的意见，适宜于耕种的地方只是位在草原大道以外，在侧面、在山前、在森林、沿着河岸和湖岸。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也是不适宜的，因为行政当局对它们进行监督，以及地方的充分安全都是不宜的，更不用说这种移民垦殖对吉尔吉斯居民的害处了①。

但是除了上述接待移民的措施以外，还必须制定并确切规定

---

① 奥斯塔菲耶夫：《草原各州的移民垦殖》。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1895年第十八卷，第二期，第11页。

吉尔吉斯人领有土地的定额，以便充分保证吉尔吉斯人的游牧经济。一句话，在实行草原移民垦殖化之前，必须象奥斯塔菲耶夫所正确指出的，预先研究吉尔吉斯人领有土地的方式、吉尔吉斯人对于这种领有土地的制度，然后根据地少或领有土地较少的情况，来断定草原边区的移民垦殖化的容量，即不排挤吉尔吉斯人而实行草原移民垦殖的可能性。正是关于这些问题，而主要是关于吉尔吉斯人领有土地和土地使用的问题，发现草原条例草案起草时的不完善和缺点。

例如，据很好研究过领有土地和移民垦殖化问题的奥斯塔菲耶夫的说法，草原委员会完全忽略了吉尔吉斯人的领有土地已经形成一定的制度，所草拟的规则在纸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却不可能适用于实际生活。所规定的全部领有土地制度，直到现在依然是一纸具文①。

委员会对于所谓十俄里地带土地的意见，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在上文，叙述当时西伯利亚各防线长官什普林格尔将军为保卫我国国界所采取的办法时，我已说明了情况，它是作为毗连西伯利亚各防线的全部草原地域建立十俄里地带的根据。后来把这个地域供给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暂时使用，在这个地域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向该军队缴纳所谓的牲畜税，作为军队的收入。

草原委员会在研究十俄里地带的问题时确信，建立这种地区最初具有使吉尔吉斯人与俄国村庄隔离的目的，但在现时要使吉尔吉斯人与俄国人接近的时候，已成了否定的条件了。因此，使吉尔吉斯人失去他们从前所使用的土地也是不公正的。

草原委员会根据这种理由决定：全部十俄里地带，除其中拨给

---

① 奥斯塔菲耶夫：《草原各州的移民垦殖》。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1895年第十八卷，第二期，第38页。

哥萨克人的份地地段作为将来落户地点以外，都交给吉尔吉斯人无偿使用。对于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在吉尔吉斯草原占有的土地权这种意见，不能认为是正确的。首先我应当说，在这种情况下，草原委员会给吉尔吉斯人以优先待遇，而忽视了哥萨克人的政治意义，他们在邻接中国和日本的辽远边区，无可争辩地构成了俄国坚强的和充分可靠的堡垒。因此，例如在现时①，当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在满洲战场上经受着难以置信的艰难和困苦，在同俄国的蛮横狡猾的敌人作斗争中牺牲生命的时候，而被免除了兵役的吉尔吉斯人，对他们征收不重的赋税，实际上好象是处于特殊权利的地位。在此以后，我觉得对下面的问题是无可犹疑的：在使用十俄里地带的土地时，应把优先权交给何人：哥萨克人或吉尔吉斯人——牧畜业人和在自己移住时已经无偿取得大量份地土地的农民——耕作人。实行保护哥萨克人的主要地方官长正是这样做了。由于草原边区官长所提出的有说服力的无可争辩的考虑，经皇帝批准的期望已久的国会决议早已公布了，按照该项决议，属于十俄里地带面积之内的所有土地都归西伯利亚哥萨克人永久和世袭占有。这个决议是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并表明了草原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在总结草原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时应当作出结论说，关于吉尔吉斯民族内部生活和草原领有土地的若干问题，委员会没有作出彻底的分析和充分的说明。委员会以根本改革旧有的吉尔吉斯人组织制度为目的，看来，忽视了这种办法在那个场合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在各方面充分和彻底了解吉尔吉斯草原以及游牧居民内部生活，并在多年实践上研究过这一切问题的人，例如格里果利耶夫教授和草原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都按照自己的经验始终反对在吉尔吉斯草原

① 指在1904—1905年写作的时候。

的既定秩序中采取急剧的办法和激烈的改革。格里果利耶夫只是把撤销妨害民族自由发展的桎梏的那些改革认为是有益的。据他的意见，如果要使吉尔吉斯人走向文明，那就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温和的和缓慢的方法①。这个想法现在已经在形成的观点中得到了证实，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和各个人的个人意志的结果；恰好相反，这种发展正如机体的发展一样，是按照严格的规律进行的，人的力量不可能推翻这种规律②。据我了解，草原委员会放弃对于问题的这种正确观点，不但丝毫没有消除关于吉尔吉斯人生活最根本性原则上的意见纷纭和矛盾，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没有导致意见一致。按照草原委员会制定的计划所拟订的关于管理吉尔吉斯人的改革，在实施以后不久，如上所述，就引起了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方面的有力反对，并且不是关于次要的问题，而是关于吉尔吉斯人生活的根本原则问题。

不容怀疑，草原委员会的委员都诚恳地希望，对于责成他们的事宜能带来力所能及的好处。但是在实践上来实现所建议的一切是极其困难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不能在预定时期内全面研究奥伦堡和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草原这样广阔的边区，以及草原上游牧居民的一切生活特点。看来，这一切也为根斯所承认了，他在自己的一个日记里顺便叙述说："我不满意在西伯利亚吉尔吉斯州的巡视，因为所得到的材料比预期的少。在科克切托夫斯克区内，瓦利哈诺夫提供了关于内部工业和商业的良好情报。在阿特巴萨尔斯克区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在阿克摩林斯克区所搜集到的情报也是很少的。在卡尔卡拉林斯克区也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在巴彦·阿乌利斯克区搜集的情报很充分。"但是已经搜集到

---

① 维谢洛夫斯基：《按照他的信件和著作来判断的弗·弗·格里果利耶夫》，第210页。

② 普拉托诺夫教授：《俄国历史讲义》，第361页。

的情报，显然需要用其他方法所搜集的情报加以对照检查。但是这一点看来是没有作到，这从根斯对于完全同类问题所表示意见的矛盾中，可以得出结论。例如，根斯在自己的文艺著作中的一处根据他所搜集的情报肯定说，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人那里，主要是奠定在同相邻的中亚细亚各汗国交通频繁便利的锡尔河两岸。因此该处吉尔吉斯人的宗教狂热、固执任性要大得多，并较少倾向于俄国人①。

然而，从中亚细亚东方通格里果利耶夫教授的说法中应当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却是完全相反的。据他说："无可辩驳地证明，从俄国方面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吉尔吉斯草原进行了伊斯兰教宣传的，是下述的情况，即伊斯兰教化了的特别是邻接我国各防线居住的吉尔吉斯人，而接近希瓦、布哈拉和浩罕领域，即现时伊斯兰教各国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中主要地直到现时② 还保持着古代的旧有的巫师教③。"

由此可见，根斯在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人中间传播的意见上与格里果利耶夫教授对于同一问题的意见，是完全分歧的。这两种意见是截然相反的。

同时，根斯的意见只是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在实际上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奇异的巧合，根斯自己证实了格里果利耶夫的意见，他说靠近波德普斯克哥萨克村在额尔齐斯河右岸斜坡地方，按照我国政府的命令，曾为阿勃莱汗的弟兄马麦-苏丹建成了一座设有清真寺的富丽小村庄(庄园)，其中附有保卫清真寺防止吉尔吉斯人的兵营!?

"看"，根斯感叹说，"当时他们对于伊斯兰教够多么忠诚。肯

---

① 根斯：《文艺作品集》，第一卷，第76—77页。

② 指1874年所写。

③ 格里果利耶夫：《俄国对中亚细亚的政策》，国家知识汇编，第一卷，第249页。

定说我们是穆罕默德教义的热烈宣传者。”①

根斯的这些话鲜明地驳斥了他自己以前表示过的上面所引叙的关于伊斯兰教在锡尔河吉尔吉斯人中间传播的意见。

根斯在自己文艺作品的另一个地方论到瓦利哈诺夫，说他曾被派带同塔什干人布卡什所装备的商队前往伊宁。商队头目穆萨·巴伊曾向根斯说，早在他们来到伊宁以前，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就向他们要求各种礼物，理由是商队是通过扎乌金斯克山口越过天山的。而在伊宁城，瓦利哈诺夫和穆萨·巴伊也是用礼物才摆脱了怀疑我国商人的中国官员。“瓦利哈诺夫由于这次旅行写出了卓越的报告，并成为缔结《塔尔巴哈台条约》和开设伊宁与塔城领事馆的主要原因”，这是科瓦列夫斯基向根斯所说的。

在这个1865年 9 月26日根斯日记（第一卷，第 353 页）的摘录中，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

首先注意到，商队是由塔什干人布卡什供给费用装备的，瓦利哈诺夫是作为一个代理人随行，并通过了向商队要求礼物的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牧区。同时，凡是对于俄国中亚细亚部分的吉尔吉斯草原稍有了解的人都很清楚，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是在沿伊塞克湖区域游牧的，从而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到伊宁的道路不能穿过他们的牧区，而是经行最初为中汗国所占据后来为大汗国所占据的各地方。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瓦利哈诺夫作为我国代理人所在的商队，不是被派往设有在扎哈罗夫管领下的我国总领事馆的伊宁。而是派往当时即 1858 年还没有我国领事馆的喀什噶尔。关于派遣瓦利哈诺夫为代理人前往喀什噶尔，我在本回忆录第一篇中已经详细叙述过了。

从这个叙述中很容易看出，派遣瓦利哈诺夫是在1858年的事。

---

① 根斯：《文艺作品集》，第一卷，第340页。

至于同中国人缔结俄国与中国西部通商和在塔城与伊宁设立我国领事馆的条约，是早在 1851 年瓦利哈诺夫还在鄂木斯克武备中学的时候，就已由科瓦列夫斯基签订的。这个条约按照签订的地点称为《伊宁条约》。因此把它称为《塔尔巴哈台条约》，尤其是把它归入1858年，硬说在这一年还是鄂木斯克武备中学学生的瓦利哈诺夫是按照 1851 年《伊宁条约》设立伊宁和塔城领事馆的主要原因，这显然与实际情形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暴露了对于事物的完全无知。如果草原委员会在巡视时也这样搜集关于吉尔吉斯草原的其他情报，也不加以全面研究，那么这一切自然会导致委员会和地方草原管理当局对于吉尔吉斯民族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

这种情况我在上文已经详细说明。同时我曾指出，按照草原边区主要官长的意见，草原委员会所制定的吉尔吉斯草原的新管理组织是：（1）破坏了氏族原则；（2）实行了乡的人为的行政管理区划；（3）提出了吉尔吉斯人所格格不入的选举原则；（4）摧毁了吉尔吉斯民族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的习惯审判。结果是吉尔吉斯人的问题，尽管有草原委员会的努力和百年的时光，很少有所前进。

说到草原委员会委员的搜集情报，我不能默然置之，即这些委员之中有些人，例如根斯，对从前组织管理草原和居民所作的一切，是以怀疑和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的。例如，按照斯佩兰斯基伯爵的指示所起草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章程，根据根斯的意见，是不多不少的胡说八道。他把加斯弗尔德称为疯子，因为他曾使科克佩克钦斯克和阿亚古斯哥萨克村庄变为城市。关于杜加麦利也给了不良的评论。但是从根斯那里受到最多攻击的，是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据他的意见，他们构成有害的制度，他借口波塔宁、乌索夫、亚德林采夫等都有牵连的著名的政治宣传，把哥萨克青年几

乎人人都加上了自由思想和政治上不可靠的罪名。根斯把西伯利亚哥萨克人说得极为恶劣，并且引证科尔帕科夫斯基曾向他说过的话，认为哥萨克人是对政府无益的骗子，对地方是有害的移民。

根斯分析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章程时作了以下的评论："斯佩兰斯基是草原章程（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章程）的骨干起草者，当然注意到了吉尔吉斯人的福利，但是他的意图依然只是一种意图，因为他所起草的法律是凭主观臆断编写的，只是从民族生活中稍微有所汲取。因此，它具有极为正直的意图和恶劣执行这种意图的痕迹；除了这种大杂烩以外，还到处露出天真的唯心主义和官僚的保守主义……和其他等等。"一句话，把斯佩兰斯基伯爵的著作攻击得体无完肤。

我认为，关于斯佩兰斯基伯爵在西伯利亚的立法活动，在我国或外国的刊物上，不论在什么时候，未必出现过这样严厉的而主要是不公平的批评。求之于这个事物的文献，即求之于斯洛夫佐夫、季赫麦涅夫、米留亭、巴尔捷涅夫（俄国档案），特别是瓦金和科尔弗伯爵的著作，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关于斯佩兰斯基在西伯利亚工作的许多重要和有益的指示。看来，根斯完全没有看过这些材料，而主要是忽视了在实际事务中，按照尤·弗·萨马林的极精当的和有高度论据的意见，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的。立法的任务在于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地方在这种条件下找出较好的办法。

我在本篇第一章已经根据这一点详细分析了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章程在当时和当时的情况下所具有的意义。同时我曾提到，我国著名的国务人员科尔弗伯爵已经作过正确评价，据他说："这种用一个书面章程和平征服草原也许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但历史不能不承认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①

---

① 科尔弗：《斯佩兰斯基伯爵》，第二卷，第232页。

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章程从它在1822年颁行的时候起，直到1868年对吉尔吉斯人一直是有效的。这个实行了四十年的章程，需要按照经验的指示、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新条件与现今行政管理的要求作一些修改，这是不可怀疑的。任何的法律不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成不变：它必然需要适合现时进步的新生需要加以修改。但是同时不可否认，1822年的章程，按照瓦金的公正意见①，已经充分尽到了职责。从章程实施的时候起，俄国的统治和势力在吉尔吉斯草原的全部地域内巩固起来了。从武装的哥萨克居民移住草原时起，消灭了草原上的无秩序和吉尔吉斯人中间的风潮。此外，草原的军事移民垦殖保证了商队在草原上的安全行动和我国侨民占据重要的商业交通道路。因此，逐渐地准备了手段和方法来与中国西部塔城和伊宁确立正常的通商关系，并在该处设立俄国领事馆。

按照斯佩兰斯基的指示，整顿改善吉尔吉斯草原所达到的成果的重要性，如果把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章程同与它同时的奥伦堡吉尔吉斯人管理法规对比一下，是特别明显的。在叙述了这一切之后，就可以得出结论，上面所引叙的根斯对斯佩兰斯基伯爵工作的评论，看来是一种以挑衅性的、十分不妥当的轻率态度所表示的大言不惭的词句的拼凑。

除了对斯佩兰斯基伯爵以外，根斯也以极端轻率和藐视的声调批评了杜加麦利总督。我记得，当时根斯的这种毫无礼貌和分寸的彼得堡装饰品，曾使我们西伯利亚外省人极端为难，并且完全不合于根斯作为委员会委员，负有重要职责，需要审慎和持有应有分寸的地位。

杜加麦利是取得土地的反对者，严格来说，不可在这一点上谴

① 《斯佩兰斯基伯爵在西伯利亚的活动》，第二卷，第269页。

责他。每个人对于一定的问题可以具有自己的个人信念和观点，对这些信念和观点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加以谴责是没有理由的。同时在杜加麦利身上证实了著名的格言，事件的力量克制住人的力量。尽管杜加麦利主张爱好和平的政策，但是在任何一个西西伯利亚总督任内，都没有作到象他任内那样多的取得土地。按照1864年的《塔城条约》，我国取得了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连同斋桑湖，以及格根和特克斯河上游的地方，这都是杜加麦利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经常劝告我，象在叙述塔城谈判的经过情形时已经说过的，要维持现状并尽力避免侵占中国土地。也正是在杜加麦利任内，他属下的由切尔尼亚耶夫所统率的西西伯利亚军队占据了浩罕汗国的北部土地，而且实现了早已期待的西伯利亚防线与奥伦堡防线合成一条前列的浩罕防线。

至于根斯所表示的似乎杜加麦利曾对瓦利哈诺夫加以阻碍的意见，那么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在杜加麦利任内，瓦利哈诺夫以带病之身从彼得堡返回，他在鄂木斯克住过一个短时期，就前往家乡。如果杜加麦利没有同意在科瓦列夫斯基的影响下，在彼得堡所得到的瓦利哈诺夫作为一个前往喀什噶尔的学者旅行家的才能和功绩的夸大意见，那么在这一点上未必可以谴责杜加麦利，正如从本回忆录第一篇所引叙的对瓦利哈诺夫的喀什噶尔考察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我多少记得，在彼得堡也有过不满意杜加麦利关于军事部分的一些命令。在这一点上怪罪杜加麦利，按照我的真诚的信念，也是不可能的。杜加麦利管理由托波尔斯克和鄂木斯克两个省以及谢米巴拉丁斯克和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草原两个州组成的广阔的西西伯利亚边区，当然应当在军事部分依靠他最亲近的同事克罗伊耶鲁斯将军。可惜，这个瑞典人的无才无能坏了事情，当然对杜加

麦利产生了不良影响，因为他有弱点，对克罗伊耶鲁斯的关于西西伯利亚军事部分的一些十分不需要或为时尚早的改革意见予以同意。

根斯在他对于西伯利亚高级当局作出没有分寸的批评之后，也曾涉及西伯利亚哥萨克人的政治和经济作用，对他们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描述，说出了一系列极不公正的和极重的罪名来反对他们。据根斯说，杜加麦利评论哥萨克人是政府的负担，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同样是没有益处的。潘诺夫和科尔帕科夫斯基似乎曾经骂过哥萨克人是强盗，是骗子。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这些首长人员由于我在职务上和他们长期相处，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所有他们这些人，特别是杜加麦利和潘诺夫都是很慎重的和很有分寸的。同时杜加麦利和科尔帕科夫斯基都被授予哥萨克军长官的荣誉称号，据我所知，他们对待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始终是抱着同情关切的态度，经常对他们表示明显的好感和完全愿意给予一切帮助。因此，未必可以推测出他们之中谁能对西伯利亚哥萨克人说出这种粗暴尖利的评论。这种情况是使人不解的，应当由根斯负责。政府给予哥萨克人的优待，据根斯的意见，没有使他们的福利和工作有所提高，而是恰恰相反，发展了他们的游手好闲和懒惰，使他们的经济衰落，造成对吉尔吉斯人进行系统的有组织的抢劫。在政治方面，哥萨克人没有给草原带来主观上所期待的益处。这种人，穿着吉尔吉斯人的长袍，同自己的子女说吉尔吉斯话，把从乌拉尔山那一边来的称为俄国人，而把自己称为哥萨克人，未必可能成为草原俄罗斯化的工具。

所引叙的根斯的意见，说哥萨克人在政治方面没有给草原带来益处和不能成为草原俄罗斯化的工具，甚至从理论观点来看，也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在吉尔吉斯草原移住武装居民，对于我国与根斯所说的相反，正是在政治方面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关于

这一点，我已经提到过杜加麦利总督的意见，他说："当我们强有力的时候，吉尔吉斯人就服从我们。但是，当我们的权力在草原上稍微削弱的时候，吉尔吉斯人就会按照差不多为所有亚洲人所惯用的他们两面性政策手法来反对我们。"成为杜加麦利这种指示的很好确证的，是上述奥伦堡管区吉尔吉斯草原的叛乱，在那里正是由于完全没有哥萨克居民而始终感到我们权力的薄弱。至于在西伯利亚草原，由于移住了武装居民，使我们在草原的基础得到应有程度的牢固、有力和安全，就没有发生这种叛乱。在这种关系上所达到的成果的重要性，在下述情况中得到了证实，即在奥伦堡草原实施草原条例的时候，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产生了不安和叛乱。为了加以镇压，需要向草原内部地区调去几支强有力的部队。在西伯利亚草原实施这种条例的时候，没有在吉尔吉斯居民中间引起任何混乱，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在草原上驻有哥萨克武装力量的时候，这种骚动必将立即被制止下去。上面所引叙的根斯关于西伯利亚哥萨克人政治上无能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在把它同草原委员会（根斯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关于这一问题所作出的结论加以对照时，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委员会认为，在斋桑边区沿边部分的哥萨克居民，把我国所属的吉尔吉斯人与住在外国境内的他们的同族隔离开来，在政治关系上是重要的。根斯关于哥萨克人侵占吉尔吉斯人土地的意见，也是不对的。这种意见与根斯作为草原委员会委员的另一种意见是相抵触的，该委员会曾经决定："吉尔吉斯牧区在草原上所占据的土地，应认为是国家所有制的。因此，草原上哥萨克人居民点应用的土地，这是为保卫边区所必需，应当无偿拨给。"如果吉尔吉斯人因此在自己的牧地上受到一些排挤的话，那么这种排挤不应当叫作侵占，象有势力的吉尔吉斯人在自己的同族人那里所作的那样。例如阿克摩林斯克州区的苏丹科努尔曾为自己个人利益侵占了四百平方俄里牧地的巨大牧区。

根斯给哥萨克人加上侵占吉尔吉斯人土地的罪名，还认为他们同吉尔吉斯人的关系一年比一年坏，认为他们未必能成为草原俄罗斯化的工具。这种意见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理由如下：如果吉尔吉斯人和哥萨克人之间不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那么这是由于同吉尔吉斯人日常生活特殊条件有联系的许多情况所产生。首先不能忽视，向草原移住武装居民和最近时期大规模的自由移民涌入草原，在使用牧地上排挤了吉尔吉斯人。这种情况涉及了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双方的利益，一定会激起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但是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别的情况使草原的当地游牧居民与俄国人分离开来。在这种关系上，宗教信仰不同和吉尔吉斯人需要频繁地从一个地方换牧到其他地方的畜牧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一种情况构成吉尔吉斯人与哥萨克人接近的重要障碍。例如，据现有的材料，吉尔吉斯人近来几乎没有加入东正教；例如1900年只有五十八人领洗，而教会却花费了27260卢布①。

在这种情势下和由于上述已形成的不利条件和情况，哥萨克人不可能成为吉尔吉斯草原上俄国文化的传播者。在这方面却看到一种完全相反的现象：哥萨克人学会了吉尔吉斯语言，说得十分流畅，仿效了一些吉尔吉斯人的风俗和习惯。但是根斯责备哥萨克人，说他们没有促进草原的俄罗斯化，看来是没有考虑到上述的一切情况，除此以外，也没有说明他的“俄罗斯化”一语是指什么说的。如果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钻研一下和求教于从事研究俄国外族问题的人，那么吉尔吉斯人俄罗斯化在它的正确合理的意义上，是一件较诸初看时所感到的要复杂得多的问题。在“俄罗斯化”一语之下，不可理解为只是接受俄国的风俗、习惯和一般俄国生活的外表。吉尔吉斯人的真正俄罗斯化只能通过在道德和智力上发展

① 戈洛瓦切夫：《西伯利亚》，第136页。

这个民族的途径来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是应当提高地方教育水平和广泛发展学校事业。但是，如果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实现草原的真正俄罗斯化，那么就不能使哥萨克人担负这种义务。在使当地居民得到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发展这个意义上的草原边区俄罗斯化，应当由地方官长和中央政府担负责任。从切尔曼诺夫的记录中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如何不够。只要说说下列情况就够了，例如，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关于设立吉尔吉斯乡村学校的问题，只是在1901年才产生的。在1904年这种学校的数目已经增长到二十四所。最后，只是在同一个1904年，在卡尔卡拉林斯克举行了久已期待的教育部直辖的第一个俄国吉尔吉斯的两级中学的开幕礼，设立该校的目的是培养吉尔吉斯乡村学校的师资①。这就是使俄国居民与草原居民接近的真正途径。如果这种措施是在接受吉尔吉斯人加入俄国国籍一百多年以后实施的，那么这同哥萨克人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而怪罪他们，说他们没有促成草原的俄罗斯化，象根斯所作的那样，显然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

根斯怪罪哥萨克人政治上不可靠，也是不对的。不能认为一个或者两个令人惋惜的现象赋予意义。换句话说，根斯抓住个别的情事来判断整个阶层，至少是令人惊异的，并且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极其公正的。

根斯对哥萨克人既持有这种看法，便作出结论说，不可信任他们，我们应当尽力限制哥萨克人的任意行为和哥萨克人的小团体作风。据他的意见，这一切都使人想到，应当使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归草原各州的总督管辖，而对总督授予哥萨克人长官的权利。这样，出于自己的意图而保持哥萨克人小团体特性的军队管理，就成

① 《谢米巴拉丁斯克报》，1904年11月26日，第261期。

为不需要了。作为统率各州军队的总督，可以附设参谋长，参谋长除执行其他职务外，还可以委托他管理哥萨克人的事务。在这以后，不是始终对国家有利的哥萨克人的小团体作风自然就会消失。同时如果认为需要，作为军队就可以负起所有自己从前的军事职务。据根斯的意见，在分配哥萨克人担任职务的事务中，在管理事务和哥萨克村庄经济的事务中，各州参谋长当然会比军管机关来得公正。这种办法也会节省得多，同时也便于政府对哥萨克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①。总而言之，按照根斯的这种计划，好象是对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在战斗部分和经济部分设定了一种非军队系统人员的行政管理上的监督。据根斯的意见，这种措施是必要的，是为了减弱那种不知何故他所不喜欢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小团体的特性。

根斯对哥萨克人的行政管理的这种观点，特别对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军队经济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使人感到惊异的，是给西伯利亚哥萨克人普遍加上了一个在政治上完全不可靠的罪名。如果假定说，一个人到处干坏事，那么这种坏事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只是哥萨克人管理的专有属性。它可能在任何其他的管理中，从而也可能在各州参谋部中都存在。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对哥萨克人事务的不适宜的管理，由于事务掌握在完全不懂哥萨克人管理和经济特点的人手中，向不良方面的倾向加强起来了。最后，把一个军队中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独立的管理，是一种极大的反常。军队的经济只有当它处于单一的掌握之中，即存在统一管理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但是如果说统一就是力量，那么分裂就会产生分歧。因此，军队经济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失去管理上的统一，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落。这些独立机关中的每一个

① 《缅科夫日记》，第三卷，第203页。

机关对于同一的经济问题，会有自己的个别意见，由于没有统一的因素，就会在对同类的经济性问题的处理上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能期待军队经济正确的、一贯的发展。但是除了所叙述的一切情况以外，在两个新的管理机关刚一成立时，立刻就开始不断地引起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产生很多的各种误会和困难，由于对于这种革新没有准备，有时使军队行政管理当局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

现在可能会使人感到惊异，这样的计划怎么能产生出来，而主要是怎么会获得法律的强制效力的。但是在当时的自由主义时代，一切都是可能的。在西西伯利亚阿克摩林斯克和谢米巴拉丁斯克草原各州撤销军队经济管理处，并成立两个经济管理处加以代替的消息，对哥萨克人，一般来说对了解这种事情和熟悉边区地方条件的人们，产生了非常惊人的印象。但这种情况继续得不久。根斯的计划不过是昙花一现：它刚一接触到实际的时候，就立刻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理由，而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因此，军队经济仍旧留归一个军队机关管理。这种情况很清楚表明，我们办公室的考虑常常是纸上空谈，脱离实际，而与实际毫无共同之处。

上面引叙的根斯对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差不多对人人所作的谴责，在当时的情形下尤其是可悲的，因为我们俄国人往往没有任何强有力和有根据的理由，而千方百计在社会舆论上贬低自己的同胞，而外国人却对这些人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以很大的同情和公正态度评论他们，例如著名的旅行家斯温·戈丁就是这样的。

第 三 章

东干人在中国西部叛乱所引起的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沿边地区的不安状况。 我来到谢米巴拉丁斯克和从那里出发前往中国国界。 就地调查我国所属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被察罕·克根属下中国卡尔梅克人毁灭的情况。我所采取的保卫国界的办法。

在签订《塔城条约》不久，中国西部产生骚动的开始，应当认为是当时蔓延于同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接壤的中国塔尔巴哈台和伊犁两省中国伊斯兰教徒或东干人的叛乱。这种叛乱，正如所预料到的，已经引起沿边吉尔吉斯人的慌乱，特别是剧烈地表现在草原东北部边区境界内。在这种不安状况中，我们必须迫不及待地立即把我国军队向国界推进。如果在进行塔城谈判时期，我国军队占据国界认为对于维护沿边吉尔吉斯人的秩序和安宁是有益的，那么现在当草原游牧居民中产生的骚乱已开始形成使人不安的规模，并且不久就引起我国与中国外族人之间的流血冲突的时候，武装占据国界就成为绝对必要了。可惜，西伯利亚地方当局从东干人叛乱一开始就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预料到它可能对草原沿边游牧居民产生的不良影响。因此，国界在东干人叛乱初期没有为我国军队所占据而是完全开放的。白支吉特、克扎耶夫和其他沿边部族的吉尔吉斯人利用这种机会和中国西部到处无人管理的情况，不承认在自己之上有任何权力，为他们所惯有的倾向于野蛮的自由和爆发抢劫致富的欲望所激动，便肆无忌惮地任意妄为起来。从塔城逃出来的满洲人和中国人，打算在草原掩藏起来，躲

避东干人的残暴灾难，大部分都被吉尔吉斯人劫掠或杀害了。这些吉尔吉斯人在塔城和郊区处处逞凶，据当时的传说，比东干人本身还厉害。我国所属的穆隆诺夫斯基、托戈西·白支吉特和其他各乡的吉尔吉斯人有些也曾参加过这一切的抢劫。但是毫无疑问，主要参加者是与中国西部塔尔巴哈台地区接壤的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游牧的白支吉特人和克扎耶夫人。白支吉特人和克扎耶夫人不仅在塔城及其近郊区进行抢劫，而且还侵袭了邻近的卡尔梅克村庄。被这种抢劫所激怒的卡尔梅克人从自己方面也决心一有适当机会就发泄他们的全部积愤。1865年10月，人数众多的卡尔梅克人大群侵入了分布在塔尔巴哈台山岭南部的白支吉特人村落，把这些村落洗劫一空。因此，居住博罗塔拉河盆地的不止一次劫掠了自己邻居察哈尔人的克扎耶夫人，受到了察哈尔人的残酷报复，只有来得及逃跑的那些克扎耶夫人幸免于难，其余的人大部分不分男女老少都遭到了杀害。除了同卡尔梅克人的这种冲突以外，在白支吉特人、克扎耶夫人和其他沿边吉尔吉斯人中间，其中包括属于我国国籍的，也发生了互相强劫和赶走牲畜的情形。一句话，1865年至1866年时期，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科克佩克钦斯克和谢尔基奥波利地区的边疆地方，即在斋桑边区和塔尔巴哈台山岭南部地区，处于完全无人管理的状态，以致有一个时期在草原上从石山口到科克佩克特和从谢尔基奥波利到乌尔扎尔的通行，要避开从各方面前来搜索的吉尔吉斯强盗，并不是毫无危险的。但是所有这些骚乱和1865年与1866年我国和中国的外族人的互相强劫，比起下一年即1867年在察罕·克根率领下的八千卡尔梅克人大群在斋桑边区所进行的大规模蹂躏暴行来，都成为无足轻重了，并退居于次要的地位。察罕·克根侵入我国境内成为一种新的确证，证明必须采取刻不容缓的坚决措施，以便绥靖新合并于我国领域的斋桑边区，并实施应有的制度和管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和就

地采取适合当时情况的办法，以便保卫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的国界，以及由于吉尔吉斯草原所产生的骚乱，西西伯利亚总督赫鲁晓夫认为必须派我前往中国国界地方，并委任我担任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军政省长和军队司令的职务。我的前任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因当时成立了土耳其斯坦总督署被任命为草原省长，并留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等候前往塔什干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

责成我担负的任务不论显得多么困难，我毫无动摇地接受了这个委托，我坚信能够在斋桑边区奠定应有秩序和充分安宁的事业带来力所能及的好处。这个边区是我所熟悉和全面详细研究过的。在塔城与中国人进行谈判四年之久，担任与中国划分国界全权委员的职务，主持当时在中国国界实行地形测量的工作，以及上述的斋桑考察团，我有过充分机会来了解地方和居民及有关同中国边界事宜的政治性的考虑。10月1日，我来到了谢米巴拉丁斯克，在这里停留下来等候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的来到，他是从我们共同在弗·奥·别布托夫公爵统率下的在高加索土耳其国界活动的军团中服务的时候起，就知道我的。考夫曼在谢米巴拉丁斯克逗留的时候，很关心察罕·克根不久以前在斋桑边区所进行的蹂躏的详情。指挥国界上我国部队行动的谢季宁大尉，以及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关于这个悲惨的事件作了说明。考夫曼对这些说明不满意，约来了驻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的中国大臣荣全。由于中国西部的东干人叛乱当时还没有平息下来，荣大臣是帝国西部国境内的中国政府的唯一代表。这种情况使人有理由推测，卡尔梅克人大群侵入斋桑地区劫掠我国所属吉尔吉斯人，未必不是受到荣某的暗示而为的。在考夫曼与荣某关于此事进行说明时，荣某对于向他所提出的关于察罕·克根劫掠我国吉尔吉斯人的一切问题，都按照中国政策的习惯手法给予支吾搪塞的答复，因此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

在这以后不久，考夫曼将军就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出发前往维尔内堡垒，再向塔什干前进。在告别时候，他向我说道，他在写给陆军大臣的信件中，表示确信我能顺利地和认真地执行责成给我的绥靖斋桑边区，以及调查卡尔梅克人大群在察罕·克根率领下掠夺白支吉特人村庄事件的任务。

在考夫曼将军和科尔帕科夫斯基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出发之后，我立即启程前往中国国界地方，预先召唤斋桑边区全部居民的所有苏丹、头目和显贵人物等来到科克佩克特。其中有许多人是从1863年斋桑考察团的时候起，我亲自知道的。从一开始向我表示完全信任的这些人那里，从讯问我国部队追踪察罕·克根的卡尔梅克人大群时所捕获的俘虏（大部分是中国人）中，我得到确信，在这个大群的成员中不只是一些卡尔梅克人，也有从伊宁和塔城逃出而得以避免东干人迫害的，并在卡尔梅克人村庄找到避难所的中国人。不容置疑，侵入我国境内是按照察罕·克根的命令实行的，其目的是掠夺我国的吉尔吉斯人。同时我获得情报，察罕·克根的大群已退往科鲍克河盆地，那里土尔扈特人的村庄通常安排在过冬驻扎的地方。

这种情况，以及寒冷季节到来，低级人员没有棉衣，完全缺乏牧草和燃料，都使部队继续驻在国界变得极为困难。因此，我命令各部队从他们所占据的各阵地上撤下来，而自己则立刻从科克佩克特出发前往中国国界，以便就地了解实际情况，特别是了解当地游牧居民中间，主要是在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中最有权势阶层的心情。检阅了返回科克佩克特城的各部队和巡视了边疆地区后，我有充分机会来询问边疆军队和地方官长，以及用其他方法彻底就地了解关于察罕·克根侵入我国境内的一切情况。在这次巡视的时候我确信，在不久以前按照《北京条约》归入我国国籍的斋桑边区沿边吉尔吉斯人当中，我国的势力由于察罕·克根的侵入大大

地动摇了，除此以外，这种侵入还使这些吉尔吉斯人对我国的不信任，而且还有使吉尔吉斯侨民大规模地从斋桑边区前往中国境内的危险。根据我所搜集的情报，已有可能说明这个复杂的问题，并向总督呈送关于察罕·克根侵入我国境内的一切情况的全面详细的说明。

把这件事调查完结并作了必要的处理以后，我又把斋桑边区沿边吉尔吉斯人的一切头目邀请到自己这里来，同时我向他们宣布，按照边区主要官长的呈请，对被卡尔梅克人劫掠的人，将根据他们向科克佩克钦斯克军区长官所呈报的损失受到补偿。当时我向吉尔吉斯人建议，不要擅自与卡尔梅克人成立不正当的协约，清算他们所夺去的牲畜，要制止民众与东干人进行任何交往，要和睦生活和避免争吵，尤其是要避免同邻居人的敌对冲突，特别是同卡拉·季列耶夫人等的冲突，因为他们曾经参加察罕·克根大群所进行的劫掠，白支吉特人当时已经准备对他们进行报复。然后，我指示白支吉特人必须保卫自己的村庄和畜群，用自己的侦察员监视国界，把所看到的一切情况密报给前方哥萨克部队官长。白支吉特人充分注意地听取了我的话以后，答应切实按照这些指示办事。结果表明，尽管吉尔吉斯人是多么轻率浮躁，在这个场合的行动却是完全信任我国政权的。关于察罕·克根再行侵入时保卫国界的措施是：在吉蒂·阿拉尔河驻扎由半个哥萨克连组成的特别部队，从该处向国界方面派出侦察班，他们应当在国界上同上面已经说过的吉尔吉斯侦察员取得联系。为此目的，我把全部国界地区划分为各个区段，分属于在该管区段附近有过冬处所的吉尔吉斯人的特别头目管辖。对前头部队和预备部队，即科克佩克钦斯克卫戍军全部军队遇卡尔梅克大群重新侵犯时，在特别训令中规定了予以击退的行动程序，并沿乔尔加河至科克佩克特大道，再从这里经直达捷径沿恰尔·古尔班河至谢米巴拉丁斯克，以便迅速传

达国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故，我于 1867 年 10 月末返回谢米巴拉丁斯克。

第 四 章

回到谢米巴拉丁斯克。 编写关于在新并入俄国领域的斋桑边区组织管理，以及保卫国界和移住武装居民的意见书。 按照赫鲁晓夫的命令，我所采取的在谢米巴拉丁斯克拘留中国大臣荣全的措施。 在我管理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时期所采取的关于民政部分的措施。 赫鲁晓夫将军委托我在斋桑湖南部斋桑边区边界地方选定应成为保卫国界驻军据点的地点。 我详细视察斋桑边区的沿边地点和建立嗣后改名为斋桑城的斋桑哨所。 因获得新任命而离开中国国界前往鄂木斯克城。

我来到谢米巴拉丁斯克之后，首先赶快从事于详细编写关于在按照《北京条约》并入俄国领域的、构成吉尔吉斯草原东北边区、位置在斋桑湖至那雷姆河迤北和该湖至塔尔巴哈台山岭迤南的各地方，实行俄国管理的意见书。这个边区以斋桑的名称而著名，是东方伊斯兰教地区的临界地带，为稠密的吉尔吉斯居民所占据。吉尔吉斯居民以自己的牧区占据着全部库尔楚姆河盆地和斋桑湖的全部东南区域。因此，黑额尔齐斯河上游各地成为吉尔吉斯民族牧区向极东延伸的界限。从这里起，使这些牧区与邻接的卡尔梅克人村庄分开的界线，大约沿着从南方屏障黑额尔齐斯河盆地的积雪的穆斯套山通过，并沿着萨雷·图姆斯克山和科楚尔山脉而行。由此可见，按照1864年《塔城条约》所规定的国界线，在种族的意义上说，不构成划分吉尔吉斯民族与中国所属蒙古各部族的界限。在吉尔吉斯草原这个边区内，国界是这样穿过沿边吉尔吉斯人牧区的，其中有些按照《塔城条约》已经划归俄国，而另一些仍旧

留归中国所有。并入俄国的全部土地面积约达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平方俄里，游牧居民六万四千人。

尽可能地对斋桑边区和邻接中国领域各地的边区吉尔吉斯人牧区分布情况进行了解以后，我确信，有些吉尔吉斯人氏族差不多应当全部归入中国，而另一小部分沿边吉尔吉斯人有些氏族的土地区域却被国界切断了。因此，同一氏族的一部分夏季和冬季居住地点在我国境内，而另一部分却在中国境内。要避免属于同民族的各部族被国界隔开的这种不正常情形，即使在一般欧洲国家间即各文明民族间确定国界时，也常是不可能的，此点下文将详加说明。至于在这个场合，即在划分中国西部国界时，这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必须在非定居的，而是从一处迁往一处的移动居民中间实行划界，并且氏族牧区场所的本身也不保持一定的界限，而是轮廓时常变动，以牧草的丰歉和相邻各氏族间的协商为转移。在对各问题就地进行密切了解和全面研究的时候发现，斋桑边区沿边吉尔吉斯人的氏族土地领有制，早在这以前的各年代就已经破坏了，现在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了。上文已经说过，由于躲避劫掠而逃往中国的吉尔吉斯侨民，抛弃了自己氏族的过冬处所，而这种处所立刻就被其他氏族占据了。在卡尔梅克人蹂躏的时候，吉尔吉斯人抛弃了自己的驻扎处所逃避灾难，也是同样情形。总而言之，所有沿边各氏族和分支是这样交错和混杂的，以致从前存在的氏族土地领有制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为了弄清这件事，特别是弄清已产生的土地争讼和纠纷，然后把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制的事宜在将来的巩固原则上建立起来，我认为首先必须查明，在归入俄国领土各地内的这些吉尔吉斯人过冬处所所占据的土地。对于在这种场合必然会产生的各种误会作可能的说明，以及讨论关于组织沿边吉尔吉斯人地方管理的一切情况和办法，我十分确信，可以通过归入俄国国籍的斋桑边区的所有氏族苏丹、头目和显贵人员会议

来达到。我打算把这种会议设在两个地方：（1）设在库尔楚姆河，专为在斋桑湖迤北到上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游牧的阿克·奈曼和其他各氏族而设；（2）设在预定在国界上建立防御工事的斋桑哨所地方。在这个地方，我打算把占据斋桑湖东部地域作为自己牧区的所有吉尔吉斯人头目，即白支吉特人、土尔扈特人和其他各氏族的头目集合在这个会议中，采用从前在这种场合的先例，我认为必须公开地和庄严地宣布，在斋桑湖两侧，从额尔齐斯河和塔梅尔塞克河至上布赫塔马、库尔楚姆、哈莫图，以及从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至肯杰尔利克河上游游牧的所有吉尔吉斯人，根据与中国人在北京签订的条约和补充该约的《塔城条约》，最终地被接受加入俄罗斯国籍，然后把草原委员会所草拟的西西伯利亚草原各州吉尔吉斯人的新管理条例，向他们作大体上的说明。在宣布所有这种法规之后，预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头目按照民族习惯举行宣誓，并对最有权势的人发给荣誉奖赏和赠品。

为了消除在我们不熟悉的边区中计算村庄和帐篷，以便确定正确征收帐篷税时可能产生的困难，我认为在这方面保持土耳其斯坦总督属下相邻的谢米列钦斯克州所规定的办法，是较为适宜的。对于这种办法，我在考夫曼将军和受委为他的办公室主任的根斯住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作了充分的了解。根据这一点，我打算设立检查委员会，它的活动范围和职务，打算以我亲自制定的特别训令加以规定。同时，根据谢米列钦斯克州所制定的办法组织各乡和各村，即按预定的数目一百到二百帐篷组成一个村，一千到二千帐篷组成一个乡，这项任务已由我于检查委员会的职务中排除，理由是执行这一切任务需要许多的时间，并会使各委员对他们的真正任务有所分心。除此以外，在我们最初同当地人接近的时候，必须避免任何过早地破坏旧有秩序，以期不致激起他们方面对我们的不信任。我打算设立四个这种委员会。其

中两个委员会应当搜集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即白支吉特人和土尔扈特人的情报，其他两个委员会搜集库尔楚姆边区在斋桑湖迤北至布赫塔马河和那雷姆河上游游牧的吉尔吉斯人的情报。我所拟就的关于在新并入我国领土的斋桑边区实施相应制度和管理意见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的。可是，在我从事研究关于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管理组织的上述意见和问题的时候，我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接到了总督的命令，无论如何要把暂时住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已经准备起身前往科布多的伊犁（乌里雅苏台）将军荣全扣留起来。这个命令使我感到非常为难，特别是这种扣留等于逮捕。逮捕重要的中国大员没有任何理由是不容易的。

赫鲁晓夫将军决定采取这种办法的原因，是由于荣某不仅否认自己参加组织察罕·克根所采取的对斋桑边区的袭击，以便劫掠白支吉特人村庄，而且甚至尽力证明这种行动是合法的。在发给我的关于此事的命令中顺便提到，由于预定限制使用保存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和科帕尔城的巨额中国银两，只准许中国人从此项银两中作出极端必需的开支，而禁止荣大臣离开谢米巴拉丁斯克，此点只在极其必要的场合才向他宣布。

对荣某的这种严厉办法，未必能用什么理由证明是正确的。看来，赫鲁晓夫在这个场合是按照军事办法粗暴行动的。这种办法在外交事务中不是永远适宜的。同时他还没有肯定地知道，荣某是不是真正参加过察罕·克根所组织的强盗式的侵袭。这种情况很快即在1868年，就已经查明了，当时曾在我国北京教会充任翻译官的著名中国学家和中国通波波夫，提供了从中国官方材料中摘出的关于此事的确切情报。原来，在伊宁陷落之后，于任命将军的同时，任命了北京人李云麟署理伊犁将军职务。有一段时期，他与荣全同时担任了这个职位。由于长时期准备援助伊宁而突然得到中国西部两个城市同时失陷的消息，中国政府便想要按照俄国人

的劝告采取进攻行动。李云麟在这一切准备工作中同察罕·克根担任了最主要的角色。同时，中国政府打算安置躲藏在俄国的自己侨民，以及移入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州区的其他移民，也许由于其他特别考虑，想要建筑新的城市并设置新的布伦海州。政府把新城市的建筑委托李云麟和察罕·克根办理，使前者为新城市的管理人。李云麟看来曾经不止一次参加过察罕·克根于1867年所组成的反对俄属白支吉特吉尔吉斯人的远征军，因此感到自己处境为难，便称病不出，但是强使他到任所视事。1868年7月，突然发生了李云麟从古城早先招募来的民警的变乱事件。他们与外来人联合起来袭击了察罕·克根的卡尔梅克人。当时李逃往科布多。因此李被罢免，并被召回北京，嗣后被判处发配到齐齐哈尔省。由此可见，真正参加察罕·克根远征军的，不是荣某而是李云麟，而且如果假设荣某是参加了的话，那么也只是间接的。

外交部接到赫鲁晓夫关于他对荣某处置的通知，正如所应预料到的，认为只能准许暂时扣留。公开扣留荣某，按照外交部的意见，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能决定，即如果他参加察罕·克根的侵袭为明显的和不可辩驳的证据所证实的。中国银两作为国家所有，由中国人自愿地和充分信任地交付我国保存，国务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认为，限制使用的办法是过早的。

尽管外交部也认为可以容许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公开扣留荣某，但是关于扣留他的问题实质上还是处于旧有的状况之下。认为无论如何要扣留荣某，但是同时不仅不向他宣布这一点，而且甚至也不能显示出要扣留他的样子。一句话，我是处于斯齐拉和哈里勃达两大困难之间。为了摆脱这种困难状况，我必须在某种合情合理的借口下，千方百计地延长荣某居住谢米巴拉丁斯克的时间，借此推迟他前往科布多。为此，首先需要了解荣某的私人生活方式和他所养成的习惯，以便可以使他发生兴趣，并使他住在谢米

巴拉丁斯克时期感到很愉快。为此目的，首先需要从通晓中国语言的俄国军官或文官中，派出一个特别委任人员去照顾他。要找到这样的人，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一次哥萨克人救了我。我想起来了，在与中国人谈判的时候，我在塔城与扎哈罗夫的多次谈话时，他曾向我推荐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军士弗拉索夫，需要时可以作为一个通晓中国语言的人员加以使用。弗拉索夫作为领事馆的一名护卫人员在伊宁已有数年之久，在扎哈罗夫本人领导之下和经常住在中国人中间，他得以很好地熟悉他们的口语，并善于同中国人交际。弗拉索夫这时已经成为军官，被我立刻召唤到谢米巴拉丁斯克，并委任在荣某处服务。我命令弗拉索夫千方百计地尽力获得荣某的充分信任，这在他通晓中国语言和他与中国人交际中取得的经验的情况下，他巧妙地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做到了。弗拉索夫带同荣某游览城市，进行访问，并为他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消遣方法。这一切逐渐使弗拉索夫同荣某接近起来，荣某开始以充分信任的态度来对待他。弗拉索夫整天整日留在荣某那里陪伴他，千方百计地尽力使他滞留在谢米巴拉丁斯克，按照我所给予的指示，劝告推迟前往科布多，至少是在春季之前，借口在严冬季节旅行困难，各山口已为深厚积雪所堵塞，沿草原而行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经常有大风雪和暴风雪在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到科布多途程中的各地方逞凶肆虐。同时这条道路也是不安全的，因为东干人匪帮已经窜入蒙古西部境内。使我能将荣某留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的良好情况下，顺便说一下，曾有过这样一件事。完全出乎意料，有一个前往土耳其斯坦过境的游行卖艺的变戏法人来到了谢米巴拉丁斯克，他具有非常灵巧的技术，以不可思议的迅速手法作出各种把戏。这个变戏法人来到谢米巴拉丁斯克是再凑巧不过了。我决定利用这个良好情况，使荣某再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留居一些时候。但是同时我已写信给赫鲁晓夫总督，说明继

续留住荣某是很困难的。然后我约请荣某前来我处参加晚会，我命令变戏法人也到场。变戏法人以这样的技巧在荣某面前变出了极其奥妙的戏法，使得中国大臣极为欣赏。他迭次表示赞许，并在辞别时非常感谢我使他感到愉快。在变戏法人留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的全部时间（按照我的命令曾延续较长的时间），荣某受到弗拉索夫的鼓舞，没有放过一次演出。

在上述荣某留住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的全部时间，1867—1868年的冬季，我时常同荣某见面，他乐意随随便便地来访问我，不拘任何的中国习惯和在这种场合所应有的礼节。这一切都不知不觉地促进了我们的相互尊敬并产生了彼此的好感。可是已经接近春季了，再要把荣某留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看来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了。这时我决定把所准备好的最后一着施展出来：用中国的办法来作用于中国大臣。想起在塔城进行谈判的时候，中国委员为了拖延这种谈判常常借口说，他们在选择吉利的日子来同我们会见，因此我命令弗拉索夫暗示荣某，他只能在按照我国历法的第一个吉利日子成行，并允许把这个日子赶快通知他，到那时还将把保存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的全部中国银两拨给他。在没有接到赫鲁晓夫对于上述我的关于荣某出境的申请作出答复以前，我不得不在这种借口下尽力推迟他从谢米巴拉丁斯克的行期。可是，荣某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起程，便向我声明，他已最后决定过几日就启程前往科布多。我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了。幸而，我不久收到了赫鲁晓夫答复的快信，根据这个信件，荣某离去谢米巴拉丁斯克一事，授权给我酌量办理。

在我与荣某辞别的时候，他尽管具有中国大臣们所习惯的矜持态度，可以看出是激动的，并用最诚恳的衷心的词句，感谢我对他在住居谢米巴拉丁斯克时期的一切关怀照顾。在我同荣某的辞别会见时，谈到由于持续未息的东干人叛乱而在国界上出现的不

安局势，我向荣某声明，从东干人叛乱刚一开始就在我国与中国西部国界上所产生的不安，如果设置了《塔城条约》所规定的国界线，那就会大大地减轻。“这种意见的正确性”，我向荣某说道，“已为一种情况所证实，即无论是我国的还是中国的外族人，在相互侵袭和掠夺的时候，自由地从我国国境越入中国境内，经常借口说，他们不知道划分俄国领土和中国领土的界限。”荣某仔细听取了我的这个声明以后答复说，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允诺把这种情况报告中国政府知悉。尽管当时我没有打算荣某的这个声明能在北京有什么意义，但是结果表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荣某的呈请看来是受到重视的。这从下述事实可以作出断定，即在同年中国政府提出设置《塔城条约》所规定的国界界牌问题，如果不是在全部国界地带，那么至少是从沙宾达巴哈界牌到塔尔巴哈台山脉，即在西西伯利亚总督管区境内。我国政府对于这个声明表示完全同意。因此，也就决定于次年1869年开始在上述的全部地区在中国西部国界地点设置界牌。在下一章我将详细叙述这条国界界牌的设置。

在与荣某辞别之后，由于中国西部邻接各省的不安局势（在那里东干人叛乱所引起的风波和骚动还没有平息下来），我应当刻不容缓地出发前往中国国界。传闻东干人当时曾打算侵入蒙古西部境内，前往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后来也果然实现了。这一切都迫使我亲自检查一下，是否严格遵守我早在1867年发下的关于保卫国界的训令，特别是关于由吉尔吉斯人自己在国界上严格执行守卫职务这一点，因为这样使用游牧人与哥萨克人共同担任这种保卫职务，在当时还是初次试验。

我来到国界以后，证明吉尔吉斯人完全符合于我的信任。哥萨克前头部队大尉卡拉切夫的尽心竭力和调度有方，西伯利亚哥萨克人由于他们天生的机智灵敏，能够很快地与当地居民投合起来并和睦相处，不容争辩是大有利于促进这一点的。在国界上，我

非常惊异地得悉，在东干人叛乱炽烈的时候，从我国境内逃往中国的吉尔吉斯人，大批地从中国西部返回我国。游牧居民这种意外的涌现在当时成了相当重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所抛弃的夏季驻扎处所，尤其是冬季住所，在他们逃往中国的时候，已经被其他吉尔吉斯氏族占据了。要把这些回国人安置在他们从前居住的地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必须从那里迁出已经占据这些地方数年之久的吉尔吉斯氏族，而这在吉尔吉斯人之间不引起争吵和冲突，是不可能的。为了审理和解决这种关于土地使用和土地占有的争讼，我设立了由享有民族信任的双方首长和头目组成的会议。经过不久时候，所有这些争讼和误会都在会议上友好地平息了，而吉尔吉斯人之间的继续争讼和误会，在我管理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其余期间内，再没有发生过。

一般来说，按照氏族习惯，由头目和其他显贵与有权势的人在会议上解决游牧人之间的各种争讼和互相控告，在多数的场合，是对案件作出可能正确和公平解决的可靠保证。但是除此以外，也大大地简化了和便利了法院诉讼的程序。我在短期管理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时间内，在一切适宜的场合都求助于这种方法，通过彼此自愿协议的途径使争讼的双方取得和解。很明显，这种方法只能审理和解决不大的民诉和争讼，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我没有遇到过特别的困难，主要是因为这种案件大部分是关于游牧居民的，而对于游牧居民，我在与中国人进行塔城谈判的四年期间内，经常巡行吉尔吉斯草原时，已经有过充分机会作了很好的了解。

在审理和解决一些刑事性质的案件时曾遇到极大困难，这是由于它们的复杂性和混乱性。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应当成为查明犯罪行为实质的指导线索的预审侦查，当时进行得非常肤浅，往往甚至是草率塞责的，而且在多数场合，不是由一个侦查员而是由几个侦查员进行的。因此，正确和合法的处理案件完全

有赖于薪俸极为有限的官员。同时一个侦查员所指出的犯罪动机，常为接替去职的原来侦查员而担任继续办案的其他侦查员所否定。总而言之，结果是造成混乱、迷惑，而没有任何的出路。如果预审侦查办得有条有理和公正无私，那么案件的合法合理的判决自然会产生的，可以说，只是全面审理诉讼案件的当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由于当时完全缺乏有经验的和有才能的司法工作者，侦查工作拖延经年，受审人疲惫于牢狱之中。我仔细审理这种案件之后，曾经确信，由于受委办理同一案件的侦查员意见分歧，比较适宜的办法是，把大部分受审人因为缺乏确凿的罪证而加以释放，何况这种受审人长期处于监禁之中，这在西伯利亚监狱的当时情况下，本身就是一件重大的刑罚。因此，我当时就发下命令开释受审人。州公署起初由于我的这种决定曾经感到为难，后来有些人在私人谈话中向我承认，他们当时对我的大胆感到惊异，并预言由于我似乎不正确判决一些诉讼案件而将负重大责任。但是他们的预言没有实现，而我没有由于我的判决受到任何处分。

当时改革前的司法家们对于刑事诉讼的实质，看来还没有养成正确的观点，这种诉讼的惩罚能力以及刑事侦查的成绩，从最近所公布的司法大臣穆拉维约夫的通令中可以看出，不是以登记了的犯罪和犯罪人的数目，而是以发现了的犯罪和揭露了的犯罪人的数量来评定的。同时在侦查中对被告的人身拘留应当不是一种常规，而是有确实根据的例外。我从中国国界回来以后，赶紧完成组织管理新合并于俄国领土的斋桑边区的吉尔吉斯人的计划。首先，必须在新合并的边区巩固我国的政权，扩大俄罗斯民族成分，发展当地游牧居民的物质福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从俄国人应当住在国家的边区的根据出发，最后由于在中国西部邻接各省当时的不安状况，也必须保卫边疆地区，防止中国外族方面的敌对侵犯，因此要在国界附近选出一个据点，使它成为全部管理斋桑边

区的中心和保卫国界军队的集合地点，以及俄国居民在帝国这个边区落户的根据地。为了说明在选定地点作为前头据点哨所和哥萨克人村庄时成为我的指导原则的动机和理由，必须先对同中国西部接壤的吉尔吉斯草原东北边区的沿边地方作出简明的地形概述。

吉尔吉斯草原的东北部，北界那雷姆河和布赫塔马河上游，西界额尔齐斯河和乔尔加河，南界塔尔巴哈台山脉——是在斋桑边区的总名称之下著名的。斋桑湖和它的东方支流黑额尔齐斯河或上额尔齐斯河把这个地方分为两部分，其中北方的在中间被库尔楚姆河切断的一部分，也称为库尔楚姆边区。黑额尔齐斯河是在两方面为永久积雪覆盖的崇山峻岭所屏障的广阔盆地上流过的。这种山岭中的一个，即北方山岭，在大阿尔泰山的名称下著名，并构成我国领域和中国领域之间的天然界限。从登切卡山脉起，在阿尔泰山西端分为两个支脉，一个支脉伸延在库尔楚姆河和那雷姆河之间，并在那雷姆山或长白雪山的名称下著名的。另一支脉构成库尔楚姆河和高山湖泊马尔卡湖之间的分水岭，名为库尔楚姆山脉。它们向西南而行（当地的名称是：萨雷套、多隆·卡拉和阿尔卡乌尔），逐渐与斋桑平原会合。在南方，黑额尔齐斯河盆地为穆斯套山（冰山）的雪峰所屏障。穆斯套山进入我国境内以后，在北方以陡峭的多石的山坡而终结，在塞坎山的名称下而著名；而在西方则在多林的萨乌尔套山岭的名称下著名的。萨乌尔套山与位置在附近的曼拉卡山为不大的波浪形的低山基奇金套（小山）相联结。在穆斯套山的西南有萨雷·图姆斯克和科楚尔山。从这些山岭发源的河流是：察罕鄂博和埃米利河。坎迪·苏河发源于基兹尔·奇利克蒂的广大沼泽地带（地下泉水形成的沼泽），位置在奇利克蒂高起的盆地上，四面为山岭所围：北面是曼拉卡山，东面是萨乌尔套山，南面和西面是塔尔巴哈台山和它的支脉。这个盆地

的内部面积长七十五俄里，宽三十俄里。坎迪·苏河（血水）在泥泞的河岸之间流过，渡河非常困难。沿着河岸延伸着稀疏的河柳灌木丛（地带），到河的上游就完全消失了，而以沼泽的土墩而终止。基兹尔·奇利克蒂沼泽地带的两岸，有许多盐碱地长满了一种植物科伊扎乌，是绵羊和骆驼的最好饲料。然而奇利克蒂盆地的特色是气候寒冷，缺少刈草地方，缺乏燃料，总而言之，缺乏土著移民的合用地段。这个盆地的西部是以空气干燥为特点的。

萨乌尔套山的北坡和西坡长满了密如鬃刷的针叶森林，主要是落叶松和松树。在这里发源的河流有肯杰尔利克河、帖列克第河、捷米尔·苏河、杰米尼河和乌伊杰涅河。后两河流从基奇金套山流出之后，分流成灌溉沟渠，很好地灌溉着周围的平原，这个平原由于土壤性质和水源丰富具有耕种土地的一切便利。

近处的森林、捕鱼和丰富的草地，使这个地点完全适合于落户居住。总而言之，从科克佩克特城到中国国界的全部斋桑平原南部地域上，这个地方是肥沃的和富于牧地的水草之乡，而且比黑额尔齐斯河沿岸盆地更为优越，因为那个沿岸盆地是以西伯利亚杨树丛林环绕而构成的沙土地带，按照土壤的特性根本不适宜于耕作。同时，在黑额尔齐斯河沿岸盆地上有些地方有沼泽和死水的河湾，在炎热季节散发出来的水蒸气是非常有害的，并繁殖大量的小虫与蚊子，使马匹和牛羊疲惫不堪。由此可见，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沿岸都不适宜于农业移民垦殖，其实利哈列夫少将早在1720年就已经指出了，他当时曾遵照彼得大帝的谕旨被派往西伯利亚，乘船沿黑额尔齐斯河向上航行了十二日。

斋桑湖迤北最适宜于落户居住的地方，是在库尔楚姆河盆地，按照这个盆地富于为自己适用的土地来说，甚至不亚于谢米列钦斯克州著名的卡拉塔尔河盆地。在库尔楚姆河上游，该河流经峡谷的地方，河谷上富于杨树、桦树、白杨、柳树和李树等形成的建筑

木材林。在库尔楚姆河的许多岛屿上，主要是在它的流域中部也都有森林。在下游部分河口附近，缺乏建筑木材林，但是库尔楚姆河下游盆地，却富于草地和耕地。

斋桑边区地方的自然条件和地形性质就是这样。对此，我已经有充分机会先是按照在塔城与中国人谈判时期所实行的地形测量和记述，可以说作了理论上的了解，然后在上述斋桑考察团时期，我带同部队到达中国卡伦黑额尔齐斯河上的玛尼图噶图勒干时作了实际的了解。但是要用肯定的语言说出，斋桑边区沿边部分的某一地点最适宜于建立堡垒哨所和哥萨克村庄，我必须自己视察这个地点，除此以外，还要从其他来源搜集一切可能的情报。在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想起了一个情况，在这个场合可以成为对我有教益的实例。1856年，我还在高加索服务的时候，有一次我必须沿格鲁吉亚军用道路从斯塔夫罗波尔前往梯弗里斯。来到科比站以后，我遇到了一位工程师，一位年老的高加索人。摆上了茶炊，我们谈论起来了。我们的谈论题目是当时大众所注意的问题：在高加索山中修筑通向米斯迪和古杜阿尔的新道路，它要绕过相邻地区的旧有道路，因为这条旧路年年遭受雪崩阻塞，往往长时期断绝交通。据工程军官的意见，曾经视察这个地点的人为了选择最捷便的道路方向，造成了失算，只凭一种走马观花的视察而计划出这种困难的山地方向。对我提出的根据他的意见应当如何办理的问题，他答复说，在这种场合，应当先向当地人搜集关于地方的情报，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于山中所有道路甚至很小的路都是知道得很确切的，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久我们就分别了。在此以后已经过了十二年，我在西伯利亚服务，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上述十分偶然的情况会在执行我所担负的在中国国界选定巩固哨所地点的重要委任时，对我成为有益的指示。想起上面所引叙的我与工程军官的谈话，我确信，必须预先从当地居民方面搜集

关于斋桑边区沿边各地最适宜于落户居住地点的最详细的情报。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守秘密，以便不以过早的传闻使沿边吉尔吉斯人惊慌不安。因为一般说来，他们由于必须让出自己土地给我国移住，对于俄国的移民垦殖一般是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请教于塔什干人布卡什，当时他住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到谢尔基奥波利道路上的阿尔克茨克哨所附近地方。在塔城谈判时期每年几次沿这条道路通行，我常在阿尔克茨克地方与布卡什相遇，同他作长时间的谈话。布卡什很了解中国西部领域沿边地区的地方情形，时常住在塔城和伊宁，还随同瓦利哈诺夫一起在喀什噶尔住过。这是一个充分可靠和忠于我国政府的人。我把布卡什召唤到谢米巴拉丁斯克来，这里有他自己的房舍。他来到以后不久，我就同他见面，我在见面时谈话中顺便涉及我从事研究的问题：斋桑边区的什么地点最适宜于移民垦殖。布卡什允许向我推荐一个鞑靼商人，他因自己的商业事务年年到这个边区的吉尔吉斯人牧区去，很熟悉沿边的地方条件。由于上述必须将此事保持秘密一点，我深夜化名来到布卡什那里，并从在布卡什处等候我的鞑靼人那里获得了所需要的情报。我优厚地奖赏了鞑靼人，同时威吓他说，在任何情形下，也不可泄露我们在布卡什家中的会见和谈话，以免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嗣后证明，这一切都确实办到了。按照我用这种方法所搜集的情报，可以看出，我国定居移民的最适宜的地点是在杰米尼河附近。这个地方的特点是，有非常适宜的气候、干燥的土壤、杰米尼河的好水，而在附近还有对于建筑完全合用的优等建筑木材林。最后，这个地方具有发展耕种和蕃殖园艺菜蔬的良好条件。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根据在该处占有自己耕地的吉尔吉斯人反映，在那里差不多从来没有过歉收。很明显，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情报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意义。只剩下了最仔细的就地检查。因此，我决定于早春季节出发前往斋桑边区国界

地方，视察为捷米尔·苏、杰米尼、肯杰尔利克和乌伊杰涅各河流所灌溉的斋桑平原的全部东方地区。早在我出发前往国界很早以前，我已将建设斋桑边区的所有进一步的意见呈送总督核阅。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编制在斋桑哨所预定建筑官家房屋的计划和预算，因为完全没有工程部分的任何资料。在这种令人为难的情况下，我借助于我在谢米巴拉丁斯克找到的一个工程司书，不休息地进行工作，才在规定的日期得以完成斋桑哨所建筑工程的一切必需的图样和预算。

我应当带同出发前往国界的部队，是由步兵一个连、哥萨克兵一个连和哥萨克马炮兵一个排组成的，在四月末，经我集合在当时曾为我国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极边据点的科克佩克特城。来到科克佩克特以后，我立刻带同部队出发前往国界，沿着斋桑考察团时期所熟悉的道路前进，即：前往科克佩克钦卡河上的卡拉乌特库利斯克浅滩渡头，然后越过布加斯河和巴扎尔卡河，从那里部队转向乔尔加河的东南方，通过伊塞克山口来到奇利克天然界限。我视察了气候严寒和完全缺乏燃料与建筑必需林木的奇利克蒂盆地以后，确信这个地方不适宜于落户定居。此后，我转向1867年察罕·克根的卡尔梅克人大群侵入斋桑边区时，我国部队曾驻扎过的捷米尔·苏河地方。我从这里带同一支不大的哥萨克快速部队出发，详细视察我预先拟定的沿边地区地点，包括捷米尔·苏、杰米尼、肯杰尔利克和乌伊杰涅的河流地域。详细勘察为这些河流所灌溉的斋桑平原，使我得到充分机会，实际上查核通过塔什干人布卡什（如上所述）对我所说的这个地方对于定居移住具有经济利益的情报。据我进行的调查可以看出，捷米尔·苏河的流量不大，有时甚至干涸。同时它流经粘质土，所以总是带有味道不好的混浊水。在肯杰尔利克河上建立居民点，乍一看来尽管有某些便利之处，但是肯杰尔利克河的春季涨水，特别是在这个河流的中游和下游，本身

就是重大的苦难。关于乌伊杰涅河上的地方也应当这样说，同时建筑用的林木离开那里距离很远。详细视察了曼拉卡以北的地方以后，我证实了这个地方的土壤是干燥的、坚硬的，并为砾石所覆盖，但是转向北方时，土壤变为松软的和黑土的，是便于耕种的。按照我所看到的通过盆地斜面向北从山岭开始在各方面的灌溉网来判断，应当作出结论说，在这个地方可以开辟大规模的耕地。清新适宜的空气，特别是在这个地方的高地部分，以及从雪山发源的河流中的良好饮水，都是非常便利，而且比起最接近上额尔齐斯河的平原地方具有更清新和更适宜的气候。我所看到的这个地方的灌溉或引水沟渠系统的遗迹，指明有可能灌溉将来的斋桑哥萨克村庄的菜圃和果园。在我们的面前在远处高耸起来萨乌尔套山岭，它的最近斜坡长满了密如鬃刷的优等建筑林木，主要是落叶松，可以从季米尔苏伊斯克峡谷运送出来。据吉尔吉斯人说，这个地方的冬季来得晚，降雪厚约四分之一俄尺；春季差不多总是来得很早，牲畜在整个冬季几乎可以靠牧草饲料饲养。由于上述的考虑，在详细视察了杰米尼河的全部盆地后，我最后在该河的左岸沿该河从基奇金套山流出处选定了建筑堡垒和将来的哥萨克村庄的地点。所选定的地方由于它地势高具有适宜的气候；草地的位置距离预定建筑堡垒的地点为八至十五俄里，优等的建筑木材林距离十二至二十俄里。可以建立渔场的黑额尔齐斯河，离杰米尼哨所不到四十俄里。在杰米尼、捷米尔·苏、帖列克蒂和肯杰尔利克各河流的上游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可以建立过冬处所或农庄，而在萨乌尔套山各森林中富有各种野兽，例如在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沿岸的苇丛中的熊、狐、旱獭和野猪，也可以成为当地居民的一种行业。

在军事方面，所选定的杰米尼哨所由于它的位置接近国界，具有军事行政管理中心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决定它在战略和经济方

面的意义的是，在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它将成为军队的可靠据点和根据地，那些军队将集合在划分斋桑东方边区与中国领土接壤的国界上。这个边区在它的北方和南方部分，除封闭奇利克蒂盆地和具有察罕·鄂博、克尔根·塔斯、巴伊穆里伊和布尔古苏台几处山口的不大的东南地段以外，形成难以通行的山地。斋桑（杰米尼）哨所在从中国进入我国领域的上述通道方面占有中心地位，使在那里集合的军队能够在中国人企图侵入我国境内经过上述的一个山口或萨乌尔套山北面的其他通路越过国界时，阻止他们前进。斋桑区东部地区中段贴近难以通行的沙土地带，从国界向东伸延，深入中国领土。因此，从中国进入斋桑地域的通路，除上述的各山口以外，还只有两个地方可以通行，形成宽约十五俄里的两个门户：（1）沿乌尔昆·乌拉斯塔河从它流出萨乌尔套山处通向平原，直至伸延在黑额尔齐斯河左岸的沙土地带；（2）从阿尔卡别克河河口向北至阿尔卡别克和别列泽克之间的沙土地带的终端。可以说，在大阿尔泰山至塔尔巴哈台山的全部地域内，新选定的斋桑哨所成为国界上的唯一堡垒，反抗从东方侵入斋桑边区境内，以便在得逞时即行占据我国通往维尔内交通线的中国人。根据上述的考虑，我最后决定在杰米尼河选出一个地点作为堡垒哨所，我把暂时分布在捷米尔·苏河的全部部队也调到这里。被派来由我指挥的工程军官沃伊采霍维奇也在这时来到部队。这个有才能的和可尊敬的军官从斋桑哨所开始奠基和我留在国界的全部时期内，都是我的积极的和有益的助手。在勘察了选定的哨所地点之后，立刻就决定开始街道设计，我提出在街道两旁必须栽上一行或两行树木，同时着手选定地点以供建造将来的教堂、花园和哥萨克村庄。

我从科克佩克特城出发带同全部部队在杰米尼河的选定地点集合之后不久，有一批察罕·克根管下的卡尔梅克人来到我国部

队。这一批人的长官声明说，他们从最接近我国国界的卡尔梅克村庄科鲍克前来，以便欢迎俄国官长平安来到国界。不容怀疑，卡尔梅克人前来我国部队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搜集关于我国部队实力的情报，以及了解是否准备越过国界，以便毁灭卡尔梅克人的村庄，以此对1867年掠夺我国白支吉特吉尔吉斯人的行为加以惩罚。但是卡尔梅克人留在我国部队的全部时间都表现得非常镇静，只是由于听到吉尔吉斯人说起这样大的部队在俄国大官统率之下来到国界而表示莫名其妙。按照我的命令，卡尔梅克人被邀请到为他们所特设的帐篷，其中摆设茶水，并备有酒席，计有各种小吃、羊肉饭，以及当地做法的甜食。为了送走这些不速之客，我命令拿出俄国烧酒给他们痛饮。同时，我们的哥萨克人是如此地尽力，乃至以酒精代替俄国烧酒宴请了卡尔梅克人。卡尔梅克人受到这样殷勤的宴请之后，当傍晚他们必须返回自己村庄的时候，好不容易骑稳了马，为了避免不幸事故，需要组织几个哥萨克人护送卡尔梅克人到他们最近的村庄科鲍克。我们的护送人从那里回来后说，由于看来善于适应自己乘骑者的卡尔梅克马匹的忍耐性和灵敏性，一切都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尽管卡尔梅克人返回自己的村庄时，很象被哥萨克人押送的俘虏，但是他们巧妙地脱出了这种双关意义的地位，宣布说，为了护送他们到国界，按俄国官长的命令从哥萨克人中派出了荣誉的骑兵护卫。

因萨乌尔套山中木材丰富，打算用木料建筑官家房舍，只有一部分采用泥土，即泥筑的。我嘱托沃伊采霍维奇特别注意，在第一年绝对不建筑木料房屋，而在初期只限于准备和运送木材，以便有时间使主要由落叶松构成的需要长期均匀干透的潮湿木材得以晒干。不遵守这个基本规则，落叶松木材很快就会出现裂缝，而成为不适用于建筑。至于打算留在斋桑哨所过冬的卫戍部队，我认为可以暂时安置在帐篷和土房里。在这个场合，我遵循了1854年建

筑维尔内堡垒的先例，那时这个堡垒的卫戍部队也是暂时安置在土房里的。

斋桑哨所的设计完成以后，我开始砍伐木材，并把这些木材逐渐运到建筑地点，也准备其他的建筑材料，以便尽可能在冬季到来以前完成这一切工作。在我选定地点建筑斋桑哨所的这一切热烈工作和支配调度正在最紧张进行的时候，我突然奉到赫鲁晓夫的命令，将职务交给新任接替我职位的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军政省长，而我应当前往鄂木斯克就任西西伯利亚军司令部参谋长职务，以代替因病应该离职的克罗伊耶鲁斯。

最使我痛心的情况是：没有我本身方面的任何原因，赫鲁晓夫使我离开了我多年来如此辛勤劳动、埋头苦干所从事的，并且得以充分了解和掌握了的事业。这个事业，早在1861年在塔城与中国人举行谈判我以全权委员职位参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1864年，签订了《塔城议定书》，按照《北京条约》划归俄国的斋桑边区，由于《塔城议定书》最后合并于我国领土。因此，勘定该项议定书所规定的国界和建设新合并的边区，在这种场合就成为逻辑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塔城谈判的结果。因此，我有一些理由认为，如果边疆事业从一开始就在我的掌握之中，那么最后完成这个事业也将委托给我。对这种意见，看来，赫鲁晓夫也是同意的。按照他的命令，在东干人叛乱最不安的时期派我来到中国国界，目的是要在为察罕·克根的蹂躏所破坏的边区奠定应有的秩序和治安，此事，我在上文已经叙述过了。除此以外，按照赫鲁晓夫的委托，我在杰米尼河上选定了应当作为国界支点和集中管理军队与边区的地点。砍伐林木和准备材料以供在该哨所建筑官家房舍，很快就开始了，而且毫无阻碍地进行了。由于采取了守卫办法，没有发生过中国外族方面对于我国部队的任何敌对侵犯。上述的一批卡尔梅克人来到我国斋桑部队，已经使他们相信，对我国领域采取任何凶恶的侵袭，

从他们方面来说，都将是极其危险的。除了所采取的守卫办法以外，我在同中国领土接壤的沿边各地拥有由鞑靼商人组成的特别侦探员，他们对我都很忠诚，并因在我作为首长的州里所进行的各种事务而对此有着利害关系。这种情况使我能够获得关于蒙古西北部和准噶尔所发生的一切事故的可靠情报，并且及时采取适合于情况的办法。在我管理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全部时期，没有发生过中国国界上的任何骚乱和不安，以及我国吉尔吉斯人向中国的移居运动。恰好相反，往时迁往中国游牧的我国吉尔吉斯人，象我们所看到的，开始返回我国境内的自己从前的游牧地点。在这种良好情况下，享有着有权势的吉尔吉斯人对我的信任，并有充分根据期待见闻广博的人和公职人员的协助，最后是拥有大量的丰富材料和边区情报，这种种都使我坚决确信，斋桑边区的吉尔吉斯人的土地领有制事业可以在牢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可惜，如上所述，由于派来别人担任我所担任的职务，所有这些意图和希望都命定不能实现了。应当说，正是在这以前核定了草原委员会所起草的草原各州管理机关的新编制，按照这个编制，各省长的薪俸比从前定为两倍以上。很明显，在彼得堡的军事官僚中出现了许多愿意任此职位的人员。正如在这种场合所常有的情况一样，开始了倾轧、阴谋和逢迎。赫鲁晓夫由于他的软弱性格上了这种圈套，虽然他曾经常赞同我对州内的边疆事务所采取的措施，并在一项特别命令中向我宣布过，感谢我管理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工作，但是却决定任命波尔托拉茨基担任我的职位，而此人当时由于陆军大臣米留亭对他的不满，正面临着离去在参谋总部所担任的职务①。因此，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某种使人奇怪的反常现象：我，一个在执行职务上为长官所满意的人，丢了职位；而相反地，一个

① 扎列索夫。

在执行职务上为长官所不满意的人，却取得了这个职位，而且，如上所述，正在巨额增加薪俸刚刚实行的时候。不容怀疑，我的继任人巧妙地利用了我在彼得堡没有任何的支持，只是依靠自己而不关心预先取得庇护的情况。赫鲁晓夫管理着他所完全不熟悉的边区，于是便以为也可以委任在实际上完全不了解边区地形和游牧外族居民生活特殊条件的人员，充任边区各州的管理人。换句话说，就是把管理边区的亚细亚地方的州区和管理俄国内部的省区等同起来。然而，按照格里果利耶夫[1]的公正和充分具有教益意义的意见："管理草原不能象管理省区那样，只是按照法律来进行管理；不了解地方情况可能造成许多错误"，这是后来所证实了的。总而言之，赫鲁晓夫在这种场合忽略了，在我国的亚洲边区选拔担任重要和负责职位的人员时，必须遵循另一种考虑，而首先是要注意到具有国家意义的政治性的地方任务。在这种场合，摆在第一位的应当是防卫中国国界和在边区维护应有的秩序和治安，因为这种秩序和治安已被东干人的叛乱与卡尔梅克人对斋桑边区的蹂躏所破坏了。

在赫鲁晓夫免去我的职务之后，看来我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向他说："谢谢，我没有料到"，然后永远离开西伯利亚的职务。但是很快我就应当，如果不是全然放弃这种意图，那么至少是暂缓离开西伯利亚，因为我接到从彼得堡的来信，得悉不久即将划定中国西部的国界。我曾以全权委员的名义参加与中国人在塔城的谈判，看来在当前在中国西部国界设置界牌时也有优先权保留这个职务。但是庇护、阴谋和倾轧的力量也可能在这一次从我手中夺去边疆事务。按照赫鲁晓夫对于划定国界问题的嗣后的一些行为（将在

---

[1] 维谢洛夫斯基：《按照他的信件和著作来判断的弗·弗·格里果利耶夫》，第208页。

下面详细说明）来判断，有根据推测，赫鲁晓夫免除我管理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职务以后，在我离去西伯利亚的时候，可能提出申请也任命我的接替者担任委员的职务，援引划分东部国界时的前例，当时沿海省军政省长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曾任委员职务。不得已只好在西伯利亚再留职若干时期，以便尽可能争取全权委员的职位，借此完成我早在1861年开始的和需要一切参加与中国人谈判的人员付出不少劳动和努力、保持耐心和顽强精神的边疆事业。赫鲁晓夫从自己方面，看来意识到他对待我是不公正的，便千方百计地尽力在表面上用甜言蜜语使我接受。他因我暂时管理谢米巴拉丁斯克事务曾格外给我请奖，并在克罗伊耶鲁斯患病后不久，就呈请任命我担任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的职务，当时按照米留亭的计划，刚才实行军区管理制度，这个职务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同时赫鲁晓夫曾向我说，他之所以调我担任另一种职务，是因为按照他的个人确信，我担任参谋长职务是更有才能的，担任这个职务对于工作也可能更为有利。在从我国驻北京公使收到关于中国人同意立刻开始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通知时，赫鲁晓夫呈请派我担任委员职务，并准许我预先启程前往彼得堡，以便在需要时向外交部亚洲司和参谋本部呈送关于我所受委任的应有的说明书，并从那里取得关于在中国西部领域划定国界事宜的指示。

同时，在我离去西伯利亚的时候，在那里反对我的新阴谋成熟了，而且从我这方面没有任何的原因。谢米巴拉丁斯克的权术家们，由于不能使我离去委员的职务，便决定使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事业毫无结果，甚至最后把它取消或推迟，借口说在东干人叛乱和混乱的不安时期，不可能实行这种划定，因为如果发生中国外族方面的敌对破坏，在中国国界上经常可能产生这种混乱的情况，虽然后来曾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只是在国界已经我最后划定的时候。关于此事所提出的呈请，得到了军州区司令部内以其长官克罗伊

耶鲁斯为代表的有力支持，他是以瑞典人精神竭尽全力来憎恨我的。赫鲁晓夫从自己方面这次也开始反对我，加入了他所绝对信任的谢米巴拉丁斯克的长官们这一方面。事情开始复杂化了，看来已经决定要发生不利于我的转变。但是谢米巴拉丁斯克的长官们这种轻举妄动的错误行为尽管得到赫鲁晓夫本人的支持，终究被外交部及时制止和最后拒绝了，详情将在下一章叙述。

第 五 章

科布多省长提出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问题。 我国政府和北京政府间关于此事所发生的交涉。 我国方面和中国方面任命划定国界的全权委员。 我前往彼得堡为实地进行划分与中国西部的国界事宜。 在彼得堡的逗留和起程前往鄂木斯克。 前往中国国界。 记述我从鄂木斯克前往中国卡伦乌科克的路途情况。 我来到乌科克和同中国委员的会见。 同中国代表荣全和奎昌的谈判迅速的和完全顺利的结束。 他们同意接受我所建议的在《塔城议定书》所详细规定的国界线上设置界牌的一切条件。 我与荣全在乌科克的最后一次会见。 我在乌兰·达巴至塔尔巴哈台山中哈巴尔·阿苏山口的全部中国国界设置界牌的叙述。 克兹尔·阿亚克对斋桑哨所的侵袭。

1864年 9 月25日签订《塔城条约》以后，最初预定双方委员于1865年 5 月齐集在预先约定的国界地点，以便按照该条约第六条设置界牌。但是由于东干人叛乱在中国西部所发生的骚扰和风波，在为叛乱所笼罩的边区设置界牌已经是不可能了。因此，《塔城条约》明确规定的国界就没有得到实地标明。但是，在与我国领域接壤的中国各省内当时惊慌的形势下，国界的不确定对于两国沿边游牧居民发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并引起了随之而来的掠夺、杀人和赶走牲畜的冲突。

在中国大臣荣全住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的时候，他同我会见时，如上一章所叙述的，我曾谈到这个问题，并表示意见说，为了消除成为两国边区地方当局不满的原因，并对我们的贸易有极端不良

影响的我国与中国外族之间的冲突事件，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设置界牌。在这时候，在我任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省长的时候，我与科布多地区中国地方当局之间，关于我国军队按照《北京条约》占据应当划归俄国领域各地所分布的中国各卡伦，曾经发生文件交涉。科布多参赞大臣在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通知中，首先提出必须迅速进行实地定界的问题，并且表示中国人的愿望——立刻着手设置界牌。我对于这个通知曾经向科布多参赞大臣和他的帮办发出了如下的答复："接获贵参赞大臣于贵国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来函内称，按照您从我国驻北京公使所收到的通知，两大国间的土地虽然已经实行划分，但是未曾以界牌标明国界。因此，俄国人来到霍伊·麦拉胡卡伦使您非常惊异，看来您将占据该处卡伦认为是我国方面的压迫。您的此种语言使我不得不重新审查我与贵国全权委员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和参赞大臣博勒果苏于1864年9月25日（贵国历法同治三年九月初七日）在塔城所签订的条约。当时发现，应当归属于我们伟大国家的不仅有霍伊·麦拉胡卡伦，而且还有乌科克和其他分布在我国方面的各卡伦。居住国界附近各民族游牧的地方，按照本条约应归属于某一国家，所有该地的人也与土地一并归属于那一国家，并由那一国家管理。

"此外，贵参赞大臣，我认为您的说法实在不合公正。如果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各地区按照贵国政府所赞同的《塔城条约》划归我国的一切土地，已经为我国军队所占领，那么对于科布多区域附近的土地为什么应当作出例外？而且这对于中国会有什么好处？您派人越过条约规定的国界线和进入构成大俄罗斯国领域的土地，是否多半应当认为是违反贵国最高政府指示的擅专处理，因为贵国政府遵循旧有的良好惯例，始终是尽力维持两大国间历来存在的友好关系的。同时，贵国边界官长破坏信义，向我国地方派来盗匪伙帮，蹂躏和平居民。在发生这种使人愤恨的和任意妄为的行

为以后，我为了在我所属辖的州区边界部分维护秩序和保卫治安，认为自己有责任不仅应向沿边地方派遣部队，而且于需要时还要把部队留在那里长久驻扎。只要这些部队没有越过《塔城条约》所规定的国界，对于您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相信您，贵参赞大臣，素具洞察能力，在这种关系上当能赞同我的见解，并同意为了两国相互利益必须维护国界上的秩序和安宁，约束不安分的和轻举妄动的人，借此巩固两国的相互友谊和善邻的和平关系。

“至于您表示愿望，请求我国方面派遣官员设置界牌一节，我已将此种情况呈报我的上峰西西伯利亚总督审核，确信此事将以符合两大帝国的相互利益加以解决，并将有助于永久巩固国界上的和平与安宁。

“为此亲笔签字并加盖印章奉复，请烦查照。1868年2月5日。谢米巴拉丁斯克。”

上述科布多参赞大臣提出关于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声明，经由西西伯利亚总督送往我国驻北京公使和外交部查核。此后不久，即在我国与中国政府之间成立了关于下一年即1869年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协议。同时决定：由于中国西部的继续不息的骚乱，在该处划定国界和设置界牌，应从北方当时处于中国武装叛乱分子行动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即从按照1728年①《布连斯奇条约》所设置的沙宾达巴哈界牌开始至塔尔巴哈台山脉中哈巴尔·阿苏山口。此外，我国外交部委托我国驻北京公使，在同中国各大臣谈判此事时向他们声明，中国委员和我国委员一起在国界上进行工作时，均将处于俄国部队的掩护之下，该部队负有义务保卫两国代表的人身安全。

因为委员的集会应于1869年举行，并且集会的时日和地点的

① 应为1727年。——译者

选定已经授权双方代表相互协议，所以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启程前往彼得堡，按照我的考虑，这对我是十分必要的。很明显，首先我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关于划定中国西部国界和预定同时沿国界线实行地形测量的一切重要问题的相应指示和说明。但是除此以外，在当前关于划定国界事宜同中国人的谈判中，也可能提出其他需要详细说明的问题。相应地和预先地了解这个问题，以及高级政府机关对于此事的意见，使我可以完全放手行事，在当前与中国委员的集会上，使我有充分可能独立活动，而不必请求指示和说明，这是我在委任给我的一切任务中始终尽力避免的。

1868年12月初，我从鄂木斯克出发了。我取道秋明、叶卡特林堡、喀山、下诺夫戈罗德、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前往。在这全部路程中，只有从尼日尼到彼得堡是当时唯一有铁路的，但是西伯利亚和彼尔姆省的雪橇道路都是很好的，所以尽管有严厉的寒冻，我还是很快地前往了。12月8日从鄂木斯克出发，14日我来到彼尔姆，17日到喀山，21日到了莫斯科。在喀山我遇见了在伊尔昭尔布哈拉人的战胜者我的老同伴罗曼诺夫斯基，我同他一起于1854年作为公爵别布托夫将军统率下的高加索土耳其国界上的作战军团的成员，参加了亚洲土耳其的远征。

12月23日早晨，我来到彼得堡。来到以后，我立刻前往参谋总部，以便谒见总参谋长戈登伯爵和他的帮办麦谢里诺夫和克卢根将军。克卢根是我在东方战争时期在高加索共同服务中早已相识的，他作为一个西伯利亚人向我询问了许多关于自己家乡的问题，并表示对有关西西伯利亚军事部分的一切事务决定给我最广泛的协助。然后我去见麦谢里诺夫。他非常亲切地接见了我，他很惊异我能这样快来到这里，甚至赶过了同中国划界的公文，因为该项公文是在我从鄂木斯克出发之日发送的，在彼得堡还没有收到。麦谢里诺夫询问我对于当时计划的彼尔姆至秋明的乌拉尔铁路的意

见。我向麦谢里诺夫报告说，据矿业工程师拉舍特的意见，根据许多重要理由，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把位置在通航河流卡马河和图拉河流域的彼尔姆至秋明的铁路联接起来。通过这一点将能确立俄国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巨大河流流域之间的连接不断的人工交通。按照拉舍特1861年所编定的计划，这条铁路全长五百五十四俄里，将通过国营乌拉尔矿山工厂区彼尔姆和戈罗勃拉戈达茨克地区，以及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杰米多夫和亚科夫列夫后裔的私营工厂区，然后继续向前，通过伊尔比特前往秋明。科科列夫公司于1862年按照这个计划作了勘测。1868年，由上校鲍格达诺维奇和米哈伊洛夫进行了从卡马河上的尼古拉·别廖佐夫码头、萨拉普尔河和奥萨河经过叶卡特林堡到秋明城的这种勘测，由柳比莫夫进行了从彼尔姆经过昆古尔、叶卡特林堡和沙德林斯克到托波尔河上的别洛泽尔斯基大村镇的勘测。在这种情形下，提出了为建筑预定的乌拉尔铁路选择方向的问题，这是当时还没有最后决定的。麦谢里诺夫充分注意地听取了我的这个报告以后，我们谈话转到了职务事宜，主要是涉及中国国界和当前同中国人的谈判，麦谢里诺夫关于此事向我问了很多。我从麦谢里诺夫那里出来后，就去见戈登伯爵，他穿着制服从办公室走出来迎接我。他急于前往皇宫，因此接见的时间不长，戈登伯爵只是告诉我说，要我就有关划界的一切问题向外交部接洽，要我在节日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到陆军大臣的住宅里去。我从参谋总部前往亚洲司，见到了司长普·恩·斯特列莫乌霍夫和中国事务科科长弗·尔·奥斯坦·萨肯，我同这位科长早在1862年被派往塔城同中国人进行国界谈判之前住在彼得堡的时期，就已经愉快地认识了。我受到了这些人员的极为同情的接待，他们对当前划定同中国西部国界的事宜完全准备给我一切协助。12月26日，我谒见陆军大臣米留亭。我去他那里的时候，随身带着中国国界地图，以备万一，结果是再凑巧也没有了。

关于按照《塔城条约》的国界线方向、关于我所选定的以供在中国国界上建立斋桑边区哨所和哥萨克居民点的地点，以及关于在新的国界上与中国人建立通商往来关系，米留亭都向我作了详细询问。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按照我所携带的地图提供了说明。陆军大臣听取了我的说明以后告诉我，要我就有关同中国划界的一切问题，向外交部和陆军部相应处所和人员接洽；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那就向他个人报告。关于同蒙古西部的通商问题，米留亭命令我去见财政大臣斯·斯·列伊捷尔恩，呈报关于此事的详细说明。总而言之，接见时是受到赏识的，对我产生了愉快的印象，使我有希望迅速和顺利地解决关于当前同中国西部划界的一切问题。在此以后，我与参谋总部地形测量局局长弗尔什将军见了面。我向他报告了我在国界线附近进行地形测量和大地测量工作的意图，他表示了完全同意，并答应派遣一个大地测量家军官归我指挥，以便在国界上最重要的地点进行天文测定。

1月5日，我觐见了大皇帝。这一天觐见的将军人数很少，我们都被请进皇帝办公室，而且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蒙恩赐谈话。我当时怎能想到，这一天就是我注定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我们的解放者沙皇和人类的友人！……

我住在彼得堡的全部时间，当我由于所受到的各种委托而几乎必须天天周旋于各部的司局和办公室时，我确信，为了顺利进行委托给我的事项，当面报告和申请是何等的重要。尽管我短期住在彼得堡，我用这种方法得以把关于划定国界和与划界有关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导致良好的结局。因为按照陆军部和外交部的协议，我被授权亲自与中国委员接洽商定1869年划定国界进行谈判的会议日期和地点，所以我呈请赫鲁晓夫总督，请他通知我国驻北京公使，按照我的意见，双方委员最好于5月10日在乌科克卡伦集合开会。作为我选定这个地点的指导理由的，是我从前在这种场合也

曾有过的考虑，即遵循我国大使拉古津斯基于1728年早已指出的实例，当时他曾在布连河上设置了营垒，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三篇中已经详细说明过了。应当作为设置界牌起点的中国卡伦乌科克，位置在国界线上。

这个情况所以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是因为使有机会在一开始时就明确认定国界线的方向，并借此在谈判一开始时就避免一切误解和中国人所习惯的争论。

我选定参谋本部少校穆罗姆采夫为自己的帮办，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军官，是我亲自知道的。委员会的翻译官，按照外交部命令，派定通晓中国语言的伊宁领事巴甫林诺夫充任。我同巴甫林诺夫也是在西伯利亚共同服务中很熟识的。这样选定我最亲近的同事人员，对我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很熟悉他们，我可以对他们充分信任，并指望他们的积极协助和合作，使委托给我的事宜获得胜利完成。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可以期待事宜得到良好结局的重要情况，这就是伊犁将军荣全被任为中国的首席委员，我同他曾在谢米巴拉丁斯克接近过，并同他处于最友好的关系中。科布多和布伦托海地区方面的划界委员任命了奎昌和文寿各大员。我希望在荣将军的盛情协助下，也同他们迅速接近起来。

按照从我国驻北京公使方面所获得的情报，中国政府已经责成荣将军和为划界而任命的其他大员于1869年5月10日（中国历法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在乌科克卡伦集合。同时中国各委员请求我国公使预先做好两国委员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以便消除双方委员在乌科克卡伦及时开会的任何阻碍。根据这一点，按照我的呈请，建议向乌科克卡伦调来由步兵一个连和哥萨克一个连组成的特别部队。边界委员会同中国委员约定当前工作的程序以后，应当分成两个组：一组向北行，沿萨彦和赛留格木山脉的山脊设置界牌，直至沙宾达巴哈界牌，另一组预定向西南行，沿大阿尔泰山山

脊向斋桑湖，再沿萨乌尔套山和塔尔巴哈台山东部，直至哈巴尔·阿苏山口。这个方案得到了外交部的完全同意。

因此，有关外交部分的一切问题，有赖于我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斯特列莫乌霍夫和崇敬的男爵奥斯坦·萨肯方面受到的盛意协助，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和结束。

关于我受委的事宜，我从我国驻北京公使弗兰加里方面也得到了同样的协助，他是这样的殷勤和周到，曾把查阅时我所需要的中国历书寄来给我，并将中国历法阴历每月的日数注明我国历法阳历每月的相当日数。此外，我从他那里收到了我国北京教会翻译波波夫用红色上等中国纸制成的注明我的姓名的拜客名片。波波夫的殷勤和关照达到这样程度，他在他所作的简明说明中叙述了如何使用这种名片，并附带在称呼某一地位崇高人员时，中国现行客套条件的一些注意和指示。

这一切指示对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使我具体了解了在会见地位崇高的人员时，应当遵守的中国礼节的某些精细的方法和程式。这还使我能够向中国各委员表示尊重他们的习惯，并借此在谈判开始之前的最初时候，使他们对我有良好的印象，这在后来得到了证实。

按照预算用于当前与中国划界事宜的拨款，最初从财政部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很快就在财政部和陆军部之间达成了协定。关于这种情况我曾向考夫曼作了解释，我同他是从前在高加索服务时相识的。我向考夫曼的亲自说明，大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愉快解决。但是，因为关于拨款的呈请必须通过陆军部办公厅，所以我关于此事曾向办公厅主任侍从将军莫尔德维诺夫和他的帮办雅基莫夫将军（我在巴甫洛夫斯克团共同服务的旧同事）加以解释。后者向我表示，他完全愿意使此事得到迅速进行。这样，由于我的亲自解释，所产生的一切误会都已经解决了。同一时期，我也解决了

在中国国界和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草原组织地形测量和天文测定一事上所产生的一切问题。然后，只须到内务和财政两部查询总督委托给我的几项事务。应当说，在当时内务部已经拟定，从秋明到托木斯克的运送罪犯，由轮船拖曳的平底船沿西西伯利亚河流航行，以代替沿主要运送流放犯的大路陆路押送的办法。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不将判服苦役的罪犯流送到东西伯利亚，而是流送到某个其他的边远地方。专为此项事务所设立的委员会决定将罪犯流送到萨哈林岛。对于当时充满各种罪犯的整个西伯利亚一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这项决定，我是从我在巴甫洛夫斯克陆军中学的同学警察司司长普·普·科萨科夫斯基和我旧日在该学校的矿物学教师阿·德·奥泽尔斯基（后来曾任托木斯克省长和阿尔泰矿区长官）得悉的。我当时就立即把这些情报通知参谋长，以便呈报赫鲁晓夫将军。

在当前实地划分中国西部国界所产生的许多问题中，关于同蒙古西部组织更加正常的通商关系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说，俄国与中国西部的通商，在中国西部国界的东北部以科什·阿加奇的名称而著名的地方，以及在与该地相邻的中国卡伦苏约克、塔鲍特等处，早已实行了，据当地商人的意见，是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实行了的。著名的阿尔泰旅行家奇哈切夫，在他的名著《阿尔泰旅行记》中看来是叙述关于这种商业详细情报的第一个人。根据这种情报，以及鄂木斯克军区司令部现有的关于参谋本部大尉普林捷茨在科布多旅行的官方往来文件，前任我国驻塔城领事斯卡奇科夫关于我国商业的很有根据和有理由的意见，最后是刊载在1862年《恰克图报》的各种人物关于中国商业的意见，我编写了呈送到陆军部和外交部的意见书。在这个意见书中，我叙述了如下的一些想法：

“不容怀疑，在我国与中国的商业的现时形势下，我们必须尽

一切方法力求加强同这一大国特别是它的西部领域的通商关系，并扩大新的市场来推销我国产品，主要是在我国商品不会受到外地竞争压力影响的那些地方。在东干人叛乱时期，停止塔城和伊宁的商业，造成了我国同西西伯利亚接壤的中国领域即蒙古西部和准噶尔的通商关系的停滞。这种停滞对于西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内部商业的进行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由此可见，必须尽可能地减弱这种停滞对我国造成的不良后果，并使我国西伯利亚商业为西西伯利亚东南边区和与它相邻的蒙古的经济需要所引起的自然的合法的进行。

“但是除此以外，应当注意到，我国与蒙古西部的通商是由我们俄国的和比斯克的商人进行的。单是这种情况就需要对它加以注意的一个重大事实。这个事实之所以值得注意，也还由于它尽管可惜是在我国与中国西部和中亚细亚的全部国界上唯一的但终归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在这里俄国自己的商人是稀有的客人，而全部商业都在塔什干人和鞑靼人的掌握之中，他们积攒了很大的资本。如上所述，由比斯克商人所进行的我国与蒙古西部的通商的特点，是在于我国商人不是与中国人作交易，而是与在沿边卡伦执行守卫职务的满洲人和蒙古人作交易。蒙古边防卫兵向我国商人销售的不仅是他们所领得的给养——茶砖和元宝（银块重五十个俄国佐洛特尼克。也有高价的元宝，价值一百四十五卢布），而且还有中国商人交给他们代销的其他货物。为此每年6月25日，即6月末，有蒙古马队一百人在满洲军官的统领下，在卡克湖卡伦附近越过我国国界：一部分前往视察国界，其余的就进入托木斯克省阿尔泰区内部，并在距离国界三十俄里的勃拉塔泉水地方与我国商人进行交易。过一个月后，即在7月末，在国界出勤守卫人员换班，前来换班的新的蒙古守卫人员又与俄国商人进行交易，但是已经在各卡伦进行了。由此可见，我国的托木斯克省与蒙古西部的通

商垄断权，当时实际上是掌握在中国边防军手中，他们不使本国商人直接参加贸易，为自己的利益剥削他们，取得代销的定额提成。大概，科布多当局在这种商业中也有它的份儿，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保留卡伦的权利，不仅在托木斯克省的东南部，而且甚至也在上布赫塔马河盆地，这是从上述的科布多参赞大臣给我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的。也不可不注意到，中国兵士把经营边区的全部商业攫取在自己手中，就肆无忌惮地在我国境内作威作福，不准我国商人与科布多中国商贩直接交易。由此可见，必须把商业从因循守旧的蒙古式的擅专中解放出来，使它得到合于它的合法意图的自然进行。这种意图在中国商人中确实是存在的，只须再来引证一下著名的阿尔泰旅行家奇哈切夫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早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曾经写道：

“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其他边区中国各省的居民不止一次地使我相信，他们曾试图前往国界，以便直接参加同比斯克商人的贸易，但是每次都被占据国界卡伦的兵士强力驱逐，他们很明显的原因是不关心竞争，而认为对自己最有益处的是从本国人身上取得代销的费用。在边区商业往来的这种办法下，受到损失的不仅是一些中国商贩，商业的不正规也使我国商人的营业受到不良的影响。对于分期付款赊给中国人的货物，边界的满洲军官总是很迟慢地、而且经常完全不与我国商人结算。原因是对边防军队从不按时发给薪饷。为了举例，只指出张家口卫戍军就足以说明了，他们于1862年曾计算政府欠发薪饷和米粮达三十三个月，差不多三年之久，假如这个卫戍军没有地亩，那就会饿死了。为了划定中国西部国界，根据《塔城条约》第四条，中国人应当拆除分布在国界线这一侧的所有自己的卡伦。这将部分地消除蒙古边防军方面对于商业的强迫压力。商业合于它的自然合法权利的进行，必须在中国人与我国成立协定，不仅在科布多开放商业，而且要在蒙古整个

西部开放的时候，才有可能。我国驻北京公使弗兰加里少将的巧妙和坚决的活动，已为此事打下了基础。由于他的坚决主张，中国政府曾经饬令科布多州区长官在1862年2月20日与中国签订的陆路通商章程范围内，不得阻碍我国属民贸易。可惜，中国政府所给予我国的和我们辛苦努力而带来的这一切让步，对于西西伯利亚国界只是成为纸上空谈。在那个时候，我国商人在东部国界上为了扩展俄国商业活动，不局限于从1861年起我国商队经常前往的单是蒙古东部境内，而且甚至想有机会渗入西藏，使这个不熟悉的地方为俄国商队开放，而我国比斯克商人直到今日还不仅难于运送货物深入蒙古西部，而且也不能到达沿边最邻近的牧民村庄。过多地定出与中国通商关系的规则，毫无疑义是害多利少的，因为这就给中国官员所爱好的吹毛求疵，造成了广泛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与中国人约定的任何国际义务，凡具有可以作广义解释的条约形式，都会对商业起良好的影响。因此，1851年在签订《伊宁条约》的时候，白毫茶叶通过西西伯利亚所有海关的运输，总值三十八万三千六百四十八卢布。经过三年，在1854年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卢布的巨额。光通过谢米巴拉丁斯克就运输了茶叶总值一百二十七万九千零九十四卢布。尽管不能预期我国与蒙古西部的贸易能象与塔城和伊宁那样的累进增长，但是应当看到，在一切不良的情况下托木斯克省和科布多地区国界上的贸易是年年增加的。1842年，我国批发商业在这一部分国界上，据奇哈切夫的情报达到一万八千五百卢布之谱，而经过二十年在1864年，全部商业的总额，按照前任托木斯克省长列尔赫的声明达到四十万卢布。1868年，据亚采维奇搜集的情报，这种商业已达一百万卢布之多。

“将来这种商业的周转额还要增加，特别是如果我国商人了解我们邻人的性格和需要，注意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与需求。地方长官预先传播蒙古人所首先需要的坚固和廉价的工艺品的情报，并

附有沿边地方的简明地理叙述，可以成为我国商人的有益参考资料。

“同上述的事实联系起来，应当作出结论说，我国与蒙古西部的通商需要政府方面的最坚决的协助。同时需要预先说明下列的问题：

“(1)已经在我国东部国界实施的1862年2月20日与中国缔定的陆路通商章程，是不是完全适用于西部国界，对该项章程作若干补充说明是不是有益的；

“(2)在蒙古西部哪怕是在最初的时候设立俄国领事馆，是不是认为是及时的。

“外交部经常特别关心搞好俄国同中国西部贸易的重要问题，认为当时要使我国西西伯利亚的商业兴盛起来，不可不注意蒙古西部对于商业活动所具有的广阔天地。从西西伯利亚方面，在这个国界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我国的比斯克商人所参加的通商往来。在那个时候，即在1869年，据外交部的意见，是使这种商业大加发展的最好的时机。在这些地方划定国界线，对于该地方的商业关系不能不有影响，其原因如下：按照《塔城条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北部沿边地带的若干部分已经划归俄国领域，中国人按照该约第四条的规定，应该拆除其分布在国界线我国一侧的一切卡伦。同时，正是在这些卡伦地方，在我国商人与沿边卡伦执行看守职务的蒙古人间直到现时进行着主要的交易。为了这种意图，外交部认为在该1869年派遣委任人员前往科布多，委托办理如下事项是有益的：(1)查明中国当局允诺俄国领事希什马廖夫公布条约规定，已否在全部蒙古西部确切执行；(2)关于在国界上对我国比斯克商人造成的压迫，应与中国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如果关于此事向西西伯利亚官长所呈送的申请在实地调查以后证明是值得注意的。总之，要仔细查明阻碍俄国商业在各该边区应有发展的原

因。

“我国与中国西部划界代表方面也向中国各大员同时声明，这将大大促进这种行动的成功。

“在实现这种派遣的时候，最好是托木斯克省的商业界这时已决定组成前往蒙古西部的商队，由我国驻科布多专员直接管辖，或者是在他的庇护之下。按照外交部的确信，所有这些办法对于繁荣我国西伯利亚的商业都会具有极其良好的影响，这种商业从上面所举出的实例可以看出，已经不止一次地试图渗入蒙古西部，但是经常遇到很大的困难。外交部的一切上述考虑已于1869年2月通知财政部审定。同时，财政部当时收到了派往西西伯利亚官员亚采维奇关于与蒙古西部通商关系的很详细的情报。财政部六等文官亚采维奇是被派往西西伯利亚去检查托波尔斯克省和托木斯克省的税务局的。亚采维奇在他给财政部长的报告中，也涉及在比斯克边区东南部科什·阿加奇地方同蒙古西部所进行的通商。同时，他很详细周密地描写了这种商业的当时情况。”

由于我呈送的关于当时与蒙古西部的通商状况的上述意见书，按照陆军部的命令，我应当也到财政部去，以便于需要时提出关于此事的相应说明。我在约定的那一天去谒见国务大臣列伊捷尔恩，他很关切地接见了我，并详细询问了我国与蒙古的通商情况和我对于六等文官亚采维奇上述报告的意见。我答复部长说，据我个人的信念，亚采维奇的报告写得非常认真，而且包括从当地比斯克商人和比斯克地区地方民政首长方面所搜集的极关重要的情报。亚采维奇指出了在同蒙古西部组织正常商业往来关系中当时存在的不便之处，主要是在于内阿尔泰山区的交通困难，提出了消除这种困难所采取办法的建议。在亚采维奇的意见书中，可以看出的唯一的缺点是忽略了政治因素，但是这不能归咎于他，因为财政部派遣他的专门目的是就地搜集同蒙古西部进行通商往来的情

报。亚采维奇在他的报告中顺便认为，为了在中国西部国界便利这种通商往来，必须把中国国界上的中国卡伦苏约克移到科什·阿加奇地方。这个办法在政治上是不方便的，因为按照《北京条约》在这个地方的国界是沿着中国常设卡伦线而行的，而苏约克也是属于常设卡伦之列的。把卡伦移入我国土地内部科什·阿加奇，我们这样办就无异于破坏国界，使它离开中国常设卡伦线，即与我国委员同中国人在塔城谈判时经常主张的原则作出相反的行动。

在此以后，我按照财政大臣的命令，就此事同工商司长斯·斯·叶尔马科夫博士交换了意见。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周到的协助，他十分愿意把一些关于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以及中国东部国界海关警察监督的必需的情报通知我。这些情报对我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并有机会切实了解后贝加尔军队哥萨克人保卫我国东方国界的办法。这种情况使我想到把这种保卫办法和海关监督制度，作为经过多年实践考验的，适用于斋桑边区方面的我国西部国界，同时为适应西部国界的地方条件和特点，加以若干修改。我所编写的关于此事的意见书的实质，在于把保卫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区方面的国界事务责成当地的武装居民担负。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迅速把哥萨克人移住到杰米尼河、肯杰尔利克河和库尔楚姆河去。在位置接近国界的前两处地方建立哥萨克村庄，使得能够实现必须在国界上具有俄国落户定居的著名原则，并尽可能使我国沿边的吉尔吉斯人与居住在相邻的中国领域的他们同族人分离开来。

我从1860年起成为地理学会的正式会员，因此认为必须也去谒见当时住在英吉利海岸街的副会长利特克伯爵。利特克伯爵正如应当预料到的，询问我最多的是关于斋桑边区的问题，并在我告别的时候表示，希望我在不久即将举行的一次学会会议上作关于斋桑边区和在杰米尼河建立斋桑哨所的报告。他还请求我在留

住中国国界的时期，在当前与中国划分国界时，把有关西西伯利亚沿边部分和邻接中国领域的吉尔吉斯草原的地理情报通知秘书奥斯坦·萨肯男爵，他说关于此事将给赫鲁晓夫将军写信。从利特克伯爵那里回来以后，我必须立刻着手编写关于斋桑边区的概要报告。这需要的时间不多，因为我熟悉斋桑边区的地形，而且手头有一切必需的材料。我在写完概要报告之后，照例预先在地理学会宣读，然后呈送参谋总长核准，不久也就得到了核准。我在地理学会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获得出席会员和其他到场人员的赞成通过。读完以后，曾向我提出关于吉尔吉斯草原特别是斋桑湖北面和南面对我国定居落户最适宜的移民垦殖地点问题。然后我把已经宣读的报告交给学会秘书奥斯坦·萨肯男爵，他当时向我声明说，我的斋桑边区的论文不久将在学会的刊物上发表。我来到彼得堡不久，曾访问共同参加与中国人在塔城谈判的我所尊敬的同伴扎哈罗夫，他当时担任彼得堡大学蒙古语文教授的职务。然后，在我继续留在彼得堡的时期，我经常同扎哈罗夫相见。他从大学下课回家的时候，有时前来马房街沃尔科夫旅馆同我会面，这里是我从西伯利亚来到彼得堡时经常居留的地方。在我们彼此这种会见中，热烈地进行了关于中国事务和当前划分国界的谈话。他劝告我谨慎行事，不要指望中国人，也不要相信他们。从扎哈罗夫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对我有趣的关于我国在中国和中亚细亚事务的当时情况的新闻。其中由于出于意料之外而使我最为惊奇的，是扎哈罗夫对我讲的关于他同一位枢密大臣就中国事务的谈话。扎哈罗夫曾非常惊异，听到他说我国没有任何需要来急忙签订《塔城条约》，如果完全不存在这个条约，事情都会保持原来状态，那就会好得多。总而言之，要使《北京条约》不在中国西部领域实行，看来在西部保持从前的国界不定状况是比较有利的。这种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新闻，使我极端惊异：我无论如何不能预料，彼得堡在

什么时候能有这种幕后的阴谋，尽管是直接指向《塔城议定书》，但是也是涉及《北京条约》。根斯可能是自觉地参加了这个阴谋的。这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联系到划分中国国界一事，我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我在彼得堡加紧活动中，关于职务上的不断奔走和周旋，谒见官长人员，访问各种司局、学会和办公室，时间过得非常快。春季已经到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道路泥泞。必须赶快利用最后的雪橇道路在下诺夫戈罗德到鄂木斯克的当前辽远的旅途中通过。辞别了长官，得到了他的关于当前划界事宜的最后教导和训示，我友好地同我所尊敬的朋友扎哈罗夫告别了。在告别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在当前的划分国界中只有一种危险：中国委员将如何办理事务，从他们方面会不会发生新的困难。

我于3月中旬来到了鄂木斯克，在到达以后不久，我很出于意外地得悉，当我不在鄂木斯克的时期，反对我这个《北京条约》执行者的新阴谋在这里已经成熟了，目的是无论如何要停止同中国西部划分国界。总而言之，要使《北京条约》和作为它的补充的《塔城议定书》不加执行而成为废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谢米巴拉丁斯克的边区长官在呈送给赫鲁晓夫的特别意见书中，叙述自己的考虑和于1869年建立《塔城议定书》所规定的国界的不便之处，因为当时中国西部处于不安状态之中，笼罩着一片混乱，而议定书还没有经过批准。在已经过去的1868年，中国人尽管自己提出了划定国界的问题，可是却没有派出自己的委员。由于中国人无力恢复他们在西部各省的政权，并在那里奠定秩序与治安，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参与这个事务，设法消灭在相邻各省所发生的混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打算在斋桑哨所集中由步兵两个连、哥萨克兵两个连和大炮四门所组成的部队，向建立堡垒的卡巴河或布尔楚姆河出动。我只将上述意见书中所引叙的最值得注意的下述情况加以分析：

（1）边区长官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坚持执行《塔城议定书》，即建立该项议定书所规定的国界，理由是这个议定书还没有经过批准，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按照第十条规定，《塔城议定书》应当附入《北京条约》作为它的补充规定。这个议定书附入两国政府已经批准的《北京条约》，显然应当认为等于这个议定书的批准；

（2）1868年的划界没有举行，并不是因为中国委员害怕受到东干人叛乱匪帮的袭击而没有到国界来，而是因为他们来到国界很晚，当时寒冻已经到来，不可能通过时常为深雪填塞的山口在大阿尔泰山着手设置界牌；

（3）按照边区长官的意见，我们没有必要坚持执行《塔城议定书》，也还因为中国西部毗邻的地方当时即1869年正是混乱盛行。在这方面首先应当指出，西伯利亚边区长官声明中国西方各省的混乱，显然是指毗邻我国西方边区的中国领域沿边部分和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当时所产生的不安和风波。位于塔尔巴哈台山脉南面的草原的其余东部地区，既然是直接属于土耳其斯坦长官管辖的，因此，也象同它的邻接的伊宁省一样，处于西伯利亚长官势力范围之外。在呈送给赫鲁晓夫将军的意见书中，断然地坚决地指出中国西部所产生的混乱时，边区长官为什么不肯详细说明：究竟是在中国西部领域的什么地方产生这种混乱，和这种混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意见书的本身，在说明所叙述的论据正确时，也没有举出任何的实际证据，而是空谈实际上只具有推测性质的考虑。总而言之，意见书是用一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大言不惭的词句写成的。然而，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论据是尤为必要的，因为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毗邻我国领域的中国准噶尔北部当时骚动和混乱的事实上的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作出这个声明之后不久，我因执行职务正是处在准噶尔的这一部分地方，在我被派划定国界的全部时期内，没有听到中国领域西北边区部

分有过骚动，也没有在那里遇到一个叛乱分子。

但是除此以外，西伯利亚边区长官还在1869年的自己意见书中指出，毗邻斋桑边区的中国领域沿边部分曾有骚动和混乱，而在第二年却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向有名的莫斯科商人特·斯·莫罗佐夫所作的声明中应当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他们声明说，可以在不大的哥萨克马队护送之下，派遣运载货物商队通过布伦托海，即通过黑额尔齐斯河盆地前往科布多。边区长官用这种声明可以说表示了保证商队在中国领域边区部分通行的安全。这种保证显然不能不认为等于证明在沿边地方当时没有大的骚动。同时，在这以前，即1869年，象我们所看到的，边区长官由于那里似乎曾经发生骚动和混乱，认为那个地方必须由我军占据和甚至建筑堡垒。在这以后，只能得出结论说，上面所引叙的两个声明，即在意见书中所叙述的声明和发给商人莫罗佐夫的声明，是彼此直接矛盾的，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在邻接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我国领域的准噶尔北部地区，在1869年完全没有大的风波。一开始曾席卷中国整个西部的东干人叛乱，当时即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已经开始逐渐减弱，而且不久就失去了自己旧有力量和意义。东土耳其斯坦当时已处于阿古柏伯克的权力之下，而在伊犁省则是与对东干人抱敌对态度的塔兰奇人占统治地位。无论如何，如果在中国西部就算存在混乱，象西伯利亚边区长官所肯定的，那么这只会对谢米列钦斯克国界有不良的影响，而绝不是对西西伯利亚国界有不良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后来已经完全证实了，并引起了土耳其斯坦军队占领全部伊宁地区，关于这一点将在适当的地方详细说明。如果把混乱理解为流浪在沿边各地的中国流亡匪帮的骚乱，那么要把这些匪帮从当时由强大部队所占据的我国西西伯利亚国界驱逐出去，是不会有特别困难的。由所谓克兹尔·阿亚克人组成的这些匪帮中的一个匪帮对斋桑哨所的突然侵袭（关于这一点

将在下文详细叙述），使有充分理由认为边区长官是不了解边区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事故的。西伯利亚边区长官不了解相邻的中国领域的情况和一般的对这种情况了解的摇摆不定，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同中国相邻各州的我国官长对有关中国西部情况的同一问题的看法，有时是彼此直接矛盾的。例如，当产生上述商人莫罗佐夫的商队（他装备这个商队不是从钱财上考虑，而是基于爱国精神要开辟我国与中国西部发展和巩固商业关系的道路①）沿着哪条道路前往中国西部的问题时，州区的西伯利亚边区长官没有劝告莫罗佐夫派遣商队前往伊宁，然后再往乌鲁木齐，认为这条道路是不安全的，而谢米列钦斯克州区长官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却不认为带同商队前往伊宁是危险的②。这两种相反的意见中，谢米列钦斯克长官即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处于优胜地位，他的根据是派遣商队前往伊宁，可以放心它的命运是安全的，因为当时已由我国军队占据的伊宁地区具有最充分的安全③。西伯利亚边区长官的声明很值得怀疑。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1871年11月曾派遣商人弗·普·库兹涅佐夫的运货商队从维尔内经过伊宁前往乌鲁木齐，从这个商队经常可以预先收到平安行动的情报。

同时，商人莫罗佐夫得到两个相反的声明后，在选定适当道路使商队前往中国境内一节上就陷入了困境。幸而我国驻伊宁领事巴甫林诺夫能够救助他，而莫罗佐夫也正是向他求教的。莫罗佐夫把两个声明呈送给巴甫林诺夫，请求他指出商队经行他认为最适宜的道路。这种完全应由边区长官负责的可悲事实表明，各商行有充分根据抱着一些不信任的态度对待地方边区当局的声

① 土耳其斯坦总督发给谢米列钦斯克军政省长的命令，1871年12月12日，第5409号。

② 莫罗佐夫致驻伊宁领事巴甫林诺夫的信。

③ 科尔帕科夫斯基致莫罗佐夫的信，1871年11月30日。

明，并时常放弃在中国西部经商，以致这种商业转入了当地商人的手中。

边区长官关于必须在卡巴河或布尔楚姆河，即在中国领域建筑堡垒的声明，也是同样使人惊异的。要理解建筑这种堡垒丝毫不能有助于绥靖吉尔吉斯草原的事业；这并不需要对吉尔吉斯草原具有很多知识。我们建筑堡垒只能借此占有我们所占据的地点。可是镇压草原上吉尔吉斯人风波，例如肯尼萨尔和其他叛变的经验已经指明，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草原的广阔地域上难以跟踪吉尔吉斯匪帮，他们象鸟儿一样飞散到各方面，并很快地转向很远的地方去了。同时，边区长官打算把在卡巴河所建筑的堡垒，在我国平定草原上的混乱以后移交给中国人。这种情况显然表明，蔑视历史教训，并助长中国人加强他们帝国西部境内的政权，我们也在亚洲继续作常言所说的为普鲁士国王工作。这种出头保护中国人利益的意图，未必能合乎我们的打算。难道说赫鲁晓夫不知道，我国经常干与他人的事务，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敏锐地影响了我国自己的利益。在现时的场合，中国总司令左宗棠① 的行为可以作为鲜明实证，他因与我国代表索斯诺夫斯基订立供给中国军队粮食的交易合同，曾向他作了巨大利润的许诺。当时依靠这种帮助，中国人最后在他们帝国的西部境内，即在中国整个西部和东土耳其斯坦奠定了自己的政权，左宗棠在后来即在八十年代，在我国与中国发生纠纷时却成了我们的最恶毒的敌人。由此可见，所引叙的边区长官关于中国准噶尔北部的骚乱和必须在卡巴河建筑堡垒的声明，只是根据一种推测，后来不仅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证明实际上是不对的。因此声明的本身也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更加使人痛心的是，看到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中所起的不体面作用。即使最

① 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1875年督办新疆军务。——译者

表面地了解一下边区长官所呈送给他的意见书，也不难看出它是没有任何确实根据的许多轻率的迷惑。总而言之，在中国国界上从西西伯利亚本身方面完全没有明显和直接可以威胁我国的纠纷。因此，使这种意见得逞，从而表示自己对于这种意见的充分支持，而且不分析问题和没有看到问题的温度是人为地提高的，这样一来，赫鲁晓夫就显出了对问题完全缺乏国家观点。可是，如果对此事多加思考和深入加以研究，那么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我国占据中国的一小块领土对俄国事业可能有何益处，这种政治措施是不是可以用某种特别重要的考虑来证明是正确的。最后，由于已经与中国政府成立了划分中国西部国界的爱好和平的协定，为了实行这个协定，我国和中国人已经作了一切预先的处置，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及时的和适宜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国界上采取既不符合我国利益，也不符合政府意图的军事措施。而且赫鲁晓夫深悉，中国各大臣曾经诚恳请求，通过我国驻北京公使弗兰加里将军，向他转达他们关于派遣俄国委员如期前往选定地点的极恳切的请求。如果处在赫鲁晓夫地位的是别的较为独立自主的边区长官，边境官长的这种虚构的呈报是不能不受处罚了事的。在这种场合，赫鲁晓夫显然应当退还这个意见书，并提出要求：或者是使人信服地和更加全面地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以实际事例加以补充，或者是完全拒绝所提出的呈请。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完全相同的场合就是这样做的。

事情是这样的。1856年，有一个采金矿业家知道科索戈尔湖附近有金矿，曾尽力说服伊尔库次克的地方当局，把这个湖泊并入我国领土将是真正的富源，而且由于1727年的条约也是很可能的。1857年，被派往就地了解边区情况的一个军官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但是这种完全微不足道的占据一小块中国领土的计划，没有

瞒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洞察眼光，而且当时正在准备办法最后占领阿穆尔地方和沿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划分国界，这种计划就被置之不理。由此可见，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与赫鲁晓夫相反，对于完全相同的事务作了不同的处理，从而不容争辩地显出了有才干的国家人物的卓越才能。但是赫鲁晓夫作为一个负有义务就地分析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估计并查明事物真理的边区主要长官，竟至没有认为必须详细研究这个问题的最主要部分，即它的政治方面，而只局限于提出一些专属军事部分的意见，就把全部问题送交陆军大臣去审查了。

由此可见，对这个政治性的复杂问题，赫鲁晓夫不加思索地匆忙决定了。这一切都说明，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我国所盛行的地方公务的统治阶层中对于国家问题的理解和意见的不可靠。边界事宜对我的这种十分突然的转变中，鄂木斯克城内已经形成共同的信念，认为预定在1869年划定国界不能举行。我徒劳无益地说服参谋长克罗伊耶鲁斯，使他相信设置界牌已经按照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互相协定得到批准，并向他申请以借款的方式给我拨发预支款，以便发给我属下的边界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使他们能够预先对于如此困难和遥远的旅行作出准备，——毫无效果。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来，直到赫鲁晓夫收到彼得堡的急电，拒绝边区长官关于在中国领土建筑堡垒的呈请，这种做法被外交部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为不适时的和不合宜的。因此，边区长官所采取的巧妙的一着已经失败了。赫鲁晓夫由于彼得堡的来电而感到难以为情，没有对我作出任何的阻难，我得以安然地从事一切安排来装备我属下的委员会，准备即将于早春季节刻不容缓地从鄂木斯克出发，前往中国国界上两国委员集会的地点乌科克卡伦。

这一次也象1863年斋桑考察团时期一样，我是全部事宜的唯一主持人，因我所受到的全权委任能够自主地行动。这种重要情

况，以及在塔城谈判时期（当时有曾任我国驻塔城和伊宁领事斯卡奇科夫和扎哈罗夫这样的中国通人物参加和对我的热诚协助，我有机会全面了解同中国人交际的性质和办法），我所获得的同中国人交涉的经验，使我能够期望，我将使委托给我的责任重大的边界事宜得到完全顺利的终结。在这种希望中，并摆脱了各种苦恼，而主要是避免了以推迟预定划界为目的而这样不公正地和轻举妄动地对我采取的攻击，我在作完当前前往中国国界旅行的一切准备以后，于5月1日从鄂木斯克出发，经由巴尔瑙尔前往布赫塔马盆地到乌科克。在巴尔瑙尔，我预定要了解一下，遵照大皇帝陛下办公室的命令在阿尔泰山区所进行的天文和地形测量工作，以及搜集其他为我所必需的关于阿尔泰的情报。在这方面，我受到了阿尔泰矿区主任弗列泽将军方面，以及表示完全愿意把所需情报通知我，并以自己有益的指示和意见予以协助的巴尔瑙尔社会上其他有学问的人员方面极表同情和亲切的帮助。按照弗列泽将军的盛情准许，阿尔泰区地形测量管理员格·梅因把阿尔泰区经过天文测定地点的清单送交给我，并出示了出色地制成的阿尔泰地形测量图版。在这种地形测量以前预先制成的天文图网，使能根据确切的数学原理以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工作。同时，所采取的地形测量进行办法也大大地便利了编制阿尔泰山区的地图。5月中旬，我来到布赫塔马河附近的昌吉思台天然界限地方，从这里沿该河向上行，到属于阿尔古特河流系和奎屯附近的大阿尔泰或南阿尔泰山前地带发源的阿拉哈河上游。我的道路是沿着从前的中国卡伦线而行，这条卡伦线当时因按照《北京条约》将上布赫塔马河全部盆地让给我国，而已经被中国人放弃了。

在昌吉思台附近，在布赫塔马河右岸距离切尔诺瓦亚河两个半俄里的地方，于1866年产生了一个俄国居民点——切尔诺瓦亚村，它是由彼尔姆省的移民男女六十人组成的。尽管新的移民当

时还来不及完全建成房屋和全村只由六所家屋，但是他们所占据的地方由于林木、草原和耕地的丰富，以及有发展养蜂的良好条件，使这个辽远的边区垦殖地方具有光辉的前途。除了切尔诺瓦亚以外，在布赫塔马河左岸盆地产生了两个较大的居民点：在切尔诺瓦亚下游五十俄里地方的麦德维德卡村和距离该村十二俄里在塔洛夫卡河的塔洛夫卡村，或叫索尔达托沃村。上布赫塔马河盆地以它的美丽如画的景色使旅行者震惊。大阿尔泰或南阿尔泰山的多林的山前地带，覆盖着丰富的高山植物，并冠有奇形怪状的岩石，处处是引人入胜的风景画。大阿尔泰山脉的北坡，从中国卡伦乌雷尔地方已经超过积雪线，因而达到九千呎的海拔，长满了落叶松、冷杉，有的地方是松树、白杨和桦树。在这些从山岭斜面下到布赫塔马河的森林中有大角鹿（西伯利亚鹿）、野山羊、枝角鹿、熊、狼、狐、貂、旱獭、獾、狼獾和水獭。在大阿尔泰南山南坡黑额尔齐斯河附近所遇到的骞驴和高鼻羚羊不到这里来。在毗邻大阿尔泰山的那雷姆和库尔楚姆山中很多的貂类，这里也是遇不到的。除了绒毛丰富的兽类以外，布赫塔马盆地直到乌雷尔，对农业移民垦殖具有许多良好的条件。据我当时所搜集的情报，可以作为建立我国定居移民落户地点的有下列各地：（1）在切尔诺瓦亚村和麦德维德卡村之间相距一半地方的萨雷姆萨克蒂河和科顿·卡拉盖天然界限处；（2）在布赫塔马河右岸沿别列佐夫卡河地方；（3）在亚泽夫卡河与别列利河汇流处。这后一个地方仍旧是在科尔马科夫村镇的名称之下而闻名的。据随送我的纳皮毛税的农民说，一百年以前曾有逃亡的龙骑兵科尔马科夫在亚泽夫卡河落户居住，不久他就死了，他所开始的移置俄国移民落户事业没有成功，因为从中国人方面遇到了阻碍。中国人当时曾把这一切地方直到卡图尼河都认为是自己的领土，用尽一切办法阻碍在上布赫塔马河盆地的俄国移民垦殖的进展。

从乌雷尔到成达哈图，再前进到乌科克，地势逐渐升高，由于它的高耸地势，已不适宜于农业耕作。虽然北阿尔泰或内阿尔泰有些村庄，例如上乌伊曼斯卡亚村，当时是在海拔三千一百四十四呎的高处进行耕种的，但是在那里所种植的庄稼常常枯死。至于上布赫塔马河盆地，在托巴塔和成达哈图天然界限附近地方，超过两个乌伊曼斯卡亚村以及科克塞山口和卡坦达村的卡图尼河盆地，对于春播庄稼的成熟也有很大的妨碍。

从托巴塔到成达哈图当时沿布赫塔马河两岸通行有两条道路。沿左岸的道路由于陡峭的河岸不很方便。但是，沿这条道路进行可以避免涉水渡过布赫塔马河。这种涉渡当时是在乌松·托巴塔天然界限以上二俄里处。一般来说，布赫塔马河的涉水是很深的，不仅是在四月间春泛涨水时期，而且也在五、六月间大阿尔泰或南阿尔泰山融雪发水的时候。从七月初起停止涨水，河水开始低落。距离成达哈图六俄里处，有二俄里多长的布赫塔马河的沼泽河岸，这里一条通行道路，布满了大石块。阿尔泰的这种沼泽地区是在多石沼泽的名称下而闻名的。其中形成的石块应属于逐渐风解的花岗石，在大气水分的经常作用下，分解着花岗石的体质，使它们彼此分裂开来。因此岩石的碎块，落到沼泽盆地的时候，有时布满了相当大的地域。连接布赫塔马河盆地的山岭，主要是由花岗石和粘土岩构成的。在昌吉思台的周围地区有燧石岩和滑石片岩、斑岩和石英，而据护送的向导人等向我传说，在距离二俄里的地方有煤炭矿床。

我们在成达哈图又渡到布赫塔马河左岸，该河发源于距成达哈图四俄里的布赫塔马湖。在这个地方，布赫塔马河从左侧接纳成达哈图河和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支流白布赫塔马河，白布赫塔马河是从大阿尔泰或南阿尔泰长白雪山北坡发源的，所以名为“白布赫塔马河”。白布赫塔马河的发源地在距离成达哈图天然界限二十

俄里处：它开始向北流，然后陡然转向西北，在流程中为发源于乌科克平原高地的湖泊和沼泽小河网加强起来，把自己的雪水急速地带入布赫塔马河，在中途形成瀑布，其中出色的一个瀑布在成达哈图附近。白布赫塔马河和成达哈图河的河口之间，距离不超过二百俄丈。根据在成达哈图所进行的一些观察，白布赫塔马河水的温度在气温六度强时达二又二分之一度，而在气温九度时上升到五度。差不多在我们留住在成达哈图的全部时间内，在五月末天上降雪，而地上经常覆盖着严霜。

从成达哈图前往乌科克的道路，沿白布赫塔马河右岸而行。从北面屏障这个河流狭窄盆地的山岭，是完全光秃的，在登上其中的一个山岭时，我发现了药材大黄，有几份被送往鄂木斯克和巴尔瑙尔药房去作试验。沿白布赫塔马河向上从成达哈图走十俄里，我们又进入了多石沼泽地带，我们的道路非常难走，使驮载行动缓慢，马匹在驮载的重量下十分困乏而精疲力尽。再走过五俄里，我们逐渐开始登上乌科克的平坦高地。在这个地方，覆盖南阿尔泰山北坡的森林完全没有了，让位给高山地带的植物。在我们面前展现出由小河和河谷中大块冰冻积雪所截断的广阔沼泽地区。

毗连乌科克高原的南阿尔泰山岭是不高的积雪丘陵，这就有根据推测，这个高原高出海平面不少于四千呎。乌科克平坦高地形成很显明的断面或分水岭，把布赫塔马河的上游与阿尔古特河源分开。这个高地好象是一种连接体，借此使南阿尔泰或大阿尔泰雪峰同属于北阿尔泰或内阿尔泰山系统的卡图阿尔卑斯山连接起来①。

由于上述边界委员会人员在沿山路从石山口到布赫塔尔明斯

---

① 我从鄂木斯克到中国卡伦乌科克的行程叙述，曾于1869年用信件通知奥斯坦·萨肯男爵，当时曾在《地理学会学报》上发表过，该项学报现已成为珍本。

克的行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在五月末才来到乌科克，在那里已经见到了中国代表荣全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而第三委员文寿还没有来到。我来到后不久，就与中国委员会见，并且受到他们特别是荣将军以一切极亲切的关注和好客的礼节接待。在先作寒暄之后，我同荣将军的谈话就因回忆过去而活跃起来了。他很有感情地对1867年我们在谢米巴拉丁斯克的共同居住生活，给以好评。我看到中国大员对我的这种友谊心情，便决定利用这种良好情况来使当前划定国界的事宜尽可能地迅速进行。因此 在 第二天，当中国委员来到我国营垒同我会见的时候，我得以说服他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关于设置界牌的谈判。在这种谈判中，我首先认为必须获得中国人的充分信任，为了这个意图，要千方百计地尽力避免足以使我被委任事宜的进行复杂化，并因此使设置界牌迟缓下来的细节要求，我预定于1869年冬季到来以前完成设置界牌，因为一到冬季，由于积雪堵塞山口将是极端困难的。我认为叙明国界可以不必直接引叙《塔城条约》的相应条款，象荣将军所主张的那样办理。排除这些细节的阻难，在中国的外交上有些场合是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一般来说，这一次我同中国人的谈判，在荣将军对我的友好关系和他对我的显然可见的好意和信任下，以及领事巴甫林诺夫积极和有益地参加这种谈判之下，只是继续了几天的时间，完全顺利地结束了。荣将军同意我所提出的划定国界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设置第一个界牌之后，分为两个组：北方组和南方组。在第一个组里应当由我的帮办穆罗姆佐夫大尉会同中国委员奎昌来 进 行，同他一起设置科布多地区方面的界牌，然后继续前进，会同荣将军特派前来的中国官员设置乌里雅苏台区方面的界牌，到沙宾达巴哈界牌处，在这里中国西部国界应当与东部国界连接起来。

我从自己方面，按照同中国委员已经达成的协议，应当向西南

行，前往布赫塔马河盆地，在那里等待从科布多地区北段返回的中国委员奎昌，同他一起继续划界，最初是在大阿尔泰山脉的山岭山口中，然后从山岭而下，按照《北京条约》从大阿尔泰山按西南方向前往斋桑湖，并从斋桑湖向东沿黑额尔齐斯河而上，到科布多地区的南部终端玛尼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卡伦地方。从阿克求别往南向塔尔巴哈台山脉和沿该山脉到哈巴尔·阿苏，即从布伦托海地区方面进一步划分国界，我应当等中国委员文寿来到国界以后，会同他一起进行。

在划界完成之后，在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布伦托海区接壤的每一个区段，打算编制记录四份，都用俄文和满文注明所设界牌的名称，在这些文件上签名并加盖各委员的印章以后，实行互换，然后按照规定程序各自呈送外交部。

中国人对于我们的信任特别是在设置第一个界牌的时候表现出来了，当时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同意执行我的一切要求，丝毫没有反对意见。这就大大地便利了我关于划定国界的进一步的处理。第一个界牌乌兰·达巴是6月7日设置在使阿尔古特河系统的卡尔古蒂河上游与科布多河流域左方支流分开的分水岭上。

在我所选定的地点建立起乌兰·达巴的界牌之后，科布多参赞大臣根据上述我国同中国委员在乌科克的协议，会同我的帮办穆罗姆佐夫大尉一起前往东北方面。翻译官巴甫林诺夫领事也是随同这一组前往的。巴甫林诺夫除了执行他的直接职务以外，还应当就地搜集关于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与我国托木斯克省比斯克通商关系的确切情报。据我从我国比斯克区地方当局所获得的情报，这种通商近来有些衰落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1864年，我国开始要求前来楚河天然界限科什·阿加奇地方的中国商贩提出过界护照，这种商贩人数就大大地减少了。但是除此以外，造成我国运到楚河的最重要的一宗交易的旱獭皮在伊尔比特市场上的

价格跌落，对于贸易额的缩减也有影响。

向北的一组离去以后不久，我同向南的一组成员开始准备从乌科克出发。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离开这个不欢迎客人的、荒野的和严寒的乌科克平原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受尽困苦。差不多在我留居乌科克的全部时期，都是极冷的天气，常常下雪，我们穿着皮外衣才能暖和。但是娇生惯养的中国大员们留居在乌科克是更加不习惯的，他们比我们更急于离开乌科克。

荣将军给了要出发的第一个预兆。他在凌晨，差不多是天刚发晓，很突然地前来同我告别。我不得不在我的小帐篷里穿着睡衣，即穿着外面缀上皮毛的西伯利亚式的两面皮毛的皮袄接待他，穿着这身衣服我看来象一只真正的大熊。这是我最后一次同荣将军的会见，这个会见没有继续多久时间。我向荣将军表示我的衷心感谢之意，谢谢他的亲切关注，特别是他在乌科克举行谈判的全部时期内经常对我表示的信任。荣将军从自己方面对我说了许多客气话，总而言之，我们的告别是具有最诚恳的、友好的性质的。走出我的帐篷之后，我送荣将军到一大群中国官员、仆役和蒙古马队所围起来的轿旁，并向他表示一路平安的诚恳祝愿。

荣将军离去以后不久，我带同向南的一组从乌科克出发，前往布赫塔马河盆地，沿着从前的道路从成达哈图到昌吉思台，于6月末来到该地。我打算从这里进行南阿尔泰或边界阿尔泰各山口的调查研究。我们在昌吉思台的停留地点接近从前中国在这里的卡伦地方，是在相当广阔的盆地上，南面为国界阿尔泰山岭所屏障，北面为利斯季亚加山脉所掩蔽，这个山脉的最高点，据格勃列尔的调查约为海拔七千五百呎。这个盆地底层是由泥沙的冲积土形成的，被流入布赫塔马河的昌吉思台小河所割断。昌吉思台迤南显出南阿尔泰山的令人神往的图画般的多林支脉，它的顶峰在这里不超过积雪，但是到达海拔八千呎。按照所进行的气压表的调查，

昌吉思台天然界限在海拔二千一百二十五呎高处，位置在纬度四十九度十分四十四秒半，相当于波尔塔瓦市和克列缅楚格市的位置。由于布赫塔马盆地的地势高，在昌吉思台的气候一般是温和的，这里没有强烈的暑热。边界委员会分为两个工作组以后，我担任的职务是在大阿尔泰山到塔尔巴哈台山脉广大地域设置界牌。在这个地区之内，从乌兰·达巴界牌开始，国界线按照《北京条约》应该沿海拔一万三千呎的大阿尔泰山岭而行。乌科克平原高地好象形成了南阿尔泰山与卡图阿尔卑斯山之间的连接体。它在阿拉哈河的子午线方向被截断了，该河的发源处是在卡纳斯的名称下闻名的，位置在南阿尔泰山的一个最大的雪峰奎屯山高耸的地方。从奎屯山向西到巴卡纳斯河河源，在从前的中国卡伦乌雷尔相对处，南阿尔泰山是由永恒积雪所覆盖的一系列连续的山峰组成的。因此，在为鲜明的天然界限所标明的国界的这一区段，没有设置界牌的必要。从巴卡纳斯河河源处起，南阿尔泰山逐渐减低向西，并连接于使它与库尔楚姆和那雷姆山相连的萨雷姆萨克蒂群山。在具有从属山山岭性质的这个低落山岭部分，主要是集中着从布赫塔马河盆地前往库尔楚姆河上游和黑额尔齐斯河的山口通路。最高的山口名为巴卡纳斯。从这里向西连续地分布着：萨尔纳科伊、布尔哈特、塔尔巴哈台和巴伊别尔迪各山口。所有这些山口都在昌吉思台附近，彼此的距离约八俄里。通过塔尔巴哈台山口的道路与布尔哈特山口相分离。这条道路有些地方形成相当难于攀登的山路，紧贴在深渊上面的山岭斜坡，陡峭地下降到昌吉思台。塔尔巴哈台山口是从昌吉思台天然界限到中国卡伦塔尔巴哈台的最捷便的道路。一般说来，这个山口只是对单行骑者才认为适宜的。驮运活动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雨季马匹沿泥滑的道路行走，每一步不小心都能造成危险。在同样程度上难以攀登的山口是：萨尔纳科伊山口，位置在布尔哈特山口迤东十五俄里的地方，特别是巴

卡纳斯山口。后者由于非常陡峭的上坡完全不适宜于驮运行走，只有大胆的骑手才能上去。在我留在上述山口山顶的全部时期，我们的视线久久不能离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细如带形的河流蜿蜒在布赫塔马盆地的美妙景色。远方出现了美丽的北阿尔泰山岭，其间高耸着蒙·勃兰阿尔泰山——别卢哈山，穿着永恒积雪的白色罩衣。我在山口山顶的时候，曾有机会仔细观察把布赫塔马河左方支流与黑额尔齐斯河右方支流系统分开的山岭折断面或分水岭的方向。这个折断面上显示出许多连续不断的沼泽和偶然的冰冻雪块地区，它们分布在山岭的北坡附近和距离封闭黑额尔齐斯河右岸盆地的南方山前地带相当遥远的地方。由于分水线的这种形势，在靠近布赫塔马河的地方，该河的所有左方支流，由山岭直接降下达到盆地以后，流经比较不大的地域。黑额尔齐斯河的右方支流就显出完全不同的性质，具有真正山岭河流的形状，急速地把自己的雪水带入黑额尔齐斯河，在流程中穿过形成南阿尔泰山系的一系列的平行山岭。这种特性显著地显示在构成卡巴河流域的成为黑额尔齐斯河强大支流之一的河流系统中。卡拉·卡巴河或索尔瓦河构成卡巴河的一个上游，发源于把萨雷·塔尔巴哈台与南阿尔泰主要山岭连结起来的交叉点的雪顶。

从山岭下降以后，卡拉·卡巴河流向西南，靠近萨雷·塔尔巴哈台山岭北面突出部分的山脚下，流经从对面为主要分水岭南支脉所围起的相当狭窄的盆地。卡拉·卡巴河一路上为山岭小河网加强起来，并从右方接纳了塔尔巴哈台河和塔乌·捷克利河以后，在塔乌·捷克利河河口附近转向东南，并在萨雷·塔尔巴哈台山与塔乌·捷克利山连接的地方从萨雷·塔尔巴哈台山穿流而过。卡拉·卡巴河在这里是在陡峭河岸之间的狭谷谷底流过，流出狭谷之后，又从右方接纳两个河流：克齐尔·克津和贾马纳·卡布。

我在南阿尔泰各山口所进行的勘察的结果就是这样的①。充分了解了这些山口和通过各该山口从布赫塔马河盆地到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的道路以后，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在这些山口设置界牌，没有科布多官署的中国官员参加，因为他们还没有随同奎昌大员从国界的北段地区来到。在这个场合，我预料奎昌大员在设置乌兰·达巴界牌时曾经对我表示充分信任，这次对我在大阿尔泰各山口预先选定设置界牌地点的正确性，也不会发生反对意见，后来也得到了证实。从在大阿尔泰各山口设置界牌的时候起，中国人所重视的布赫塔马河富饶的和美丽如画的盆地，应当最终牢固地归俄国所领有了。这个盆地对中国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东干人叛乱时期，在中国西部与北京之间经行乌鲁木齐和库尔·卡拉乌苏最捷便的交通已经截断的时候，这条道路就成为通过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前往中国首都的唯一的便利道路。

占领布赫塔马盆地以后，为俄国在这富有各种合用地亩的自由自在地方移民落户，为持久可靠地发展农业开辟了广泛的天地。布赫塔马盆地不可争辩地是俄国根据《北京条约》所得到的重要收获之一。这种情况由于同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各州区建立正常的通商关系（如上所述，这在当时是为外交部所特别注意的），使俄国在帝国这个边区的政治和商业势力最后巩固起来。我作完南阿尔泰山各山口的勘察工作之后不久，就得到情报说，科布多参赞大臣已经从他的北部国界地区返回到距离昌吉思台二十俄里处的乌雷尔地方。嗣后，于7月5日早晨，中国官员来到昌吉思台天然界限处的我国营垒，并用参赞大臣奎昌的名义请求我在昌吉思台河我国营垒附近安置下来，对于这一点，我很愿意地同意了。

---

① 南阿尔泰山各山口的更详细的记述刊载于1869年和1870年的《地理学会学报》上。

当日晚间，我会见了在来到以后立刻就来拜访我的科布多参赞大臣。在这次会见的时候，我们约定了在大阿尔泰山中和往下在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设置界牌的进一步工作计划。我向中国委员声明，在勘察各山口之后，我已经在一些山口设置了界牌，并请求他让自己的官员视察各山口和在我所选定的地点沿分水岭设置界牌。中国大员立刻同意了这一点，并于第二日，7月6日，科布多官署的中国官员来到我国营垒，当时即同他们在巴伊别尔迪、布尔哈特、萨尔纳科伊和巴卡纳斯各山口着手设置界牌。7月9日，在上述一切山口设置界牌已经完成。第二日，我到他的营垒里访问了科布多参赞大臣，受到他很周到的关切和非常好客的接待。在这一天举行的关于我们进一步划界工作的会议上，中国大员向我声明，由于我们面临的大阿尔泰山中道路的艰难，他在年迈体衰之际，要同我们一起越过山岭前往黑额尔齐斯河是极端困难的。奎昌请我带领科布多官署官员前往，他已经以充分的信任，把他们派归我指挥。因为确信刚从长途旅行归来到达科布多省北部卡克湖的衰老的参赞大臣，越岭攀山是十分困难的，我答复说，注意到他的老迈年龄和山路行程艰难，我不仅情愿同意他的请求，而且把它看成对我这个曾经参加签订《塔城条约》的委员给予特别信任，表示加以接受。中国大员显然因我表示同意而感到高兴。同奎昌委员一起前来的委员会翻译官巴甫林诺夫领事，我也准许留在昌吉思台，他在这里可以在空闲时候把科布多区的国界纪录译成满文，我答应在阿克求别山岭即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附近设置最后的界牌以后，把国界记录送交给他。

由此可见，两个中国委员荣全和奎昌都以充分的信任对待我，把全部边界事宜交付我的手中，同时还委派了中国官员归我指挥。在这种良好情况之下，进一步划定国界有了充分的保证。

从上述中国大员由国界回归科布多城的时候起，如上所述，我

成为全部边界事宜的一个全权支配者，在我管辖之下，既有俄国官员，也有中国官员，实质上我不只是俄国的委员，而且是代行中国委员职务的委员。这一切都能指望中国官员在设置界牌的时候，确切遵循我的指示，毫无反对意见，这后来也就得到了证实。

在事情的这样良好转变之下，我决定在上述同科布多参赞大臣最末一次会见以后，不失时机立即在南阿尔泰山中继续划定国界，按照西南方向前往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

向大阿尔泰山前进时，我特别力求从最接近俄国居民点的国界上的老住户农民中和充分了解边区地形的当地人中，找到有经验的向导人。在这个场合，我又想起了老高加索人地方工程师的劝告和教导，我同他相识，如上所述，是在格鲁吉亚军用道路上，他的指示使我已经如此成功地和有益地在选择地点建筑斋桑哨所的事务上实际加以应用。借助各种访询和调查，我终于从吉尔吉斯人中和俄国人中找到了熟悉边区情况的、很善良的和对我极忠诚的当地人作为勘察员。俄国人员中特别出色的是：白村农民叶戈尔·巴尔苏科夫和拉里昂·扎捷耶夫。在吉尔吉斯人的向导人中熟悉边区地形的人有：托巴克·巴伊贾宾、巴楚拉·马缅捷科夫头目、麦缅泰·卡拉梅索夫、伊萨·萨尔卡尔迪克和卡尔梅克人阿拉塔伊·马特麦乔科夫。后者参加了考察团的北方组，虽然他有很大的财产和商业事务，也随同委员会从乌科克到沙宾达巴哈，并因自己通晓居住国界附近所有部族的地方语言、习惯和全部边区地形，对考察团的北方组是很有益的。俄国农民巴尔苏科夫和扎捷耶夫，差不多走遍了全部的南阿尔泰，主要是卡巴河上游各地方，他们也有当地方言的知识。在这种向导人特别是随我工作的有经验的地形测量员马图索夫斯基少尉的协助下，我能够很快地掌握了边界地方地形的一切特点和正确地按照山岭折断线或分水岭确定国界的方向，这在最初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项很不容易的任

务。上述农民巴尔苏科夫和扎捷耶夫和有些吉尔吉斯人，也给我充当了勘察员。为此目的，他们以狩猎为借口进入了国界线毗连的地区，把从当地人得来的所见所闻立刻报告给我知悉。这种情况使我有充分机会获悉国界线两侧二十俄里地区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并根据这种情况采取应有的办法。

在完成当前山区考察的一切准备工作以后，我就沿着我所熟悉的道路，从布赫塔马盆地通过南阿尔泰或边界阿尔泰北部或分水岭的低山岭，前往中国卡伦塔尔巴哈台。这个卡伦位置在流入卡拉·卡巴河的塔尔巴哈台急流河左岸的山间盆地上。我从这里越过捷克利山口前往库尔楚姆河上游。在固洛木拜河河口附近渡过库尔楚姆河，并从固洛木拜·阿苏山口越过库尔楚姆山岭，我达到了美丽如画的马尔卡湖。

然后我的道路是向西南，朝着分开库尔楚姆河左翼各支流与马尔卡湖、卡利吉尔河北部和西部流域各河流的该处山岭折断面的方向而行。7月19日，我越过了高达海拔九千呎的萨雷套山最高点。

然后我沿吉利套山岭前进，绕过萨尔肯·捷卡山，经过麦·捷列克天然界限，达到了构成边界阿尔泰山南部支脉最后段丘布科姆巴伊高地。从这些高地下到斋桑平原后，我向黑额尔齐斯河前进，沿着该河在地方渔业主缅迪巴耶夫兄弟的协助下，登上了渔船，从马尼克天然界限处，即从该河分为形成三角洲的支流地方起，一直到从前的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

在这全部地域内，我设置了下列界牌：7月16日—库尔楚姆和帖列克第界牌，17日—固洛木拜界牌，18日—萨雷套界牌，19日—萨尔肯·捷卡界牌，20日—捷尔斯·埃雷克界牌，22日—阿乌利埃·布拉克界牌，23日—恰克利·麦斯界牌，最后，在科布多州方面的最后一个界牌，是我于7月30日在黑额尔齐斯河左岸卡利吉

尔河河口相对处的阿克求别山上设置的。

我来到黑额尔齐斯河以后，在1863年斋桑考察团时我就已经熟悉的地方，我开始编写从科布多州方面与中国西部重新划分国界的记录。这种记录四份派人送往昌吉思台交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我应当从他那里取得同样份数的关于同一国界的满文记录。把俄文文字的记录译成满文的工作已经委托巴甫林诺夫办理，我给他写信说，由于这个记录的重要的国家意义，我将自己前来昌吉思台，以便亲自说明可能遇到的误解之处。

我在黑额尔齐斯河的时候，听到消息说，在我为斋桑哨所（现时为斋桑城）选定地方落户的新移民，已经尽心竭力地开始经营：耕种土地和栽培园艺，感到非常高兴。菜园里今年已经获得了优良黄瓜、西瓜和香瓜的好收成。据普遍的反映，气候是很好的，而所选定的地点是周围最好的地方。紧跟着，我得到消息说，我的帮办穆罗姆佐夫大尉已经完成了从乌里雅苏台州到沙宾达巴哈设置界牌的工作，不久即将来到斋桑哨所。因此，在沙宾达巴哈到黑额尔齐斯河的广大地域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已经得到完全顺利的结束。从黑额尔齐斯河向南到塔尔巴哈台，再沿这个山岭到哈巴尔·阿苏山口进一步设置界牌，由于第三委员文寿没有来到国界，未能进行。

因此，在这种误会得到说明之前，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重新通过大阿尔泰山，从黑额尔齐斯河盆地前往上布赫塔马河盆地到昌吉思台。这一次我取道西北，而且必须通过两个山岭：库尔楚姆山和那雷姆山。前者我是在萨雷套山迤西，沿着相当便利的山口（这个山口是从属于巴拉·卡利吉尔河上游的麦卡普恰盖河谷，在库莱·苏河河口处通往库尔楚姆河盆地）越过的。进一步向前是经过很大的困难完成的，原因是经常阴雨，在我通过那雷姆·阿尔卑斯山系的贾伊达克山岭的全部行程期间，没有过雨住天晴的日

子。因此，在走这段山程的时候，我有机会详细了解南阿尔泰山和同它衔接的山岭：库尔楚姆山和那雷姆山。

上述两次越过大阿尔泰山，我们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经过不经常见的雪地时，在夏季我们在山顶上常是冷得发抖。在被冰冻雪块所堵塞的或尖锐山石所散布的上坡和下坡之处，我们的马匹精疲力尽，而我们自己在马匹稍有不慎的步伐时也受到很大的危险。归途从黑额尔齐斯河翻山越岭到布赫塔马盆地，对我们是特别困难的，那时我们不得不在两昼夜的时间内，处于雨水、冰雹和降雪之下。在一次越过山岭时，我们在山中遇到了暴雨，有好几个小时我们处在黑云云块里，它象浓雾一样从各方面笼罩了我们，透过这种黑云的闪电好象在各个方向闪烁着。强烈的雷的轰隆声震得我们耳朵发聋，使人不由自主地发抖，雷声经久不息，从远处的山顶和峡谷散发出回响。我们一步一步地慢行，常是停止下来，全身都湿透了，在这种状态中最后达到下山之处，来到美丽如画的布赫塔马盆地。来到昌吉思台以后，我们在上述山岭行程时经受困苦之后，得以稍加休息。我从自己方面，在巴甫林诺夫协助下，赶快办完编写和与奎昌委员互换科布多州国界记录的事宜。办完这些事务以后，我因秋季已经到来，必须立即前往科克佩克特，在这里，我希望能收到赫鲁晓夫总督关于从布伦托海方面最后一段没有中国人参加而设置界牌的答复。除此以外，我打算在科克佩克特整理我在国界期间所搜集的情报，编制并向鄂木斯克和彼得堡长官以及我国驻北京公使发送报告。最后，必须张罗装备前往中国国界的新的考察团并储备粮食，因为粮食只能在科克佩克特购得，尽管数量是很少的。

在前往科克佩克特之前，我向我所尊敬的同事巴甫林诺夫告别，我准许他立即前往鄂木斯克，这既是由于他的健康失调，也是由于设置最后一段国界上的界牌打算没有中国人参加。我与巴甫

林诺夫的辞别是极为友好的：我向他表示了我的衷心感谢，谢谢他在乌科克与中国人进行谈判时的积极协作。由于他通晓中国语言和善能对待中国人，在乌科克与中国委员关于我所建议的设置界牌的程序作出预先协议，没有从中国人方面遇到任何阻碍和误会。我前往科克佩克特是走最近的途程，从昌吉思台经过科顿·卡拉盖、麦德维德卡村、塔洛夫卡、小那雷姆站和鞑靼村麦切奇。来到科克佩克特以后不久，就从邮局给我送来了所期待的关于不经中国人参加而在布伦托海地区设置界牌的许可。同时我还收到了我国驻北京代办公使的情报说，尽管布伦托海地区已经划归科布多州，但是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却规避了从布伦托海地区方面设置界牌。规避的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政府当时在布伦托海的政权还没有彻底恢复，而在克兹尔·阿亚克名称下更加著名的中国越界人在斋桑哨所对我们的不幸侵袭，看来使中国地方官长担心，中国官员在设置界牌时可能遭受什么意外事故。应当推测，科布多参赞大臣已将这种情况报告自己政府备案，并请求免去布伦托海地方委员的职务，这可能已经得到北京方面的准许，因为否则他不会决定规避划定布伦托海的国界。

9月4日，我离开科克佩克特前往中国国界，以便在国界的最后一段设置界牌。我委托我的帮办穆罗姆佐夫大尉在黑额尔齐斯河迤南到冰山（穆斯套）的不大一段国界上设置界牌，而我自己则从冰山到塔尔巴哈台山中的哈巴尔·阿苏山口进行进一步的划定国界。这一部分国界从构成冰山西部终端的萨乌尔套山开始向南，沿在斋桑边区东南形成我国与中国领土之间天然界限的萨雷·图姆斯克、科楚尔和塔尔巴哈台诸山岭而行。因此，在这全部地域内，我只在从斋桑高原和奇利克蒂盆地通往埃米利河盆地和科鲍克河上游的最主要的山口中设置了界牌。在萨雷·图姆斯克山岭中通往萨乌尔套山的最近的山口，是沿着察罕鄂博河的河谷

而行的。萨雷·图姆斯克山岭中的界牌，我设置在科鲍克河盆地的山口和沿着分开基兹尔·奇利克蒂东部流域与科鲍克河右翼支流系统的分水线上。从最接近该山口的萨雷·图姆斯克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分布在科鲍克河的和被稀疏的森林带环绕起来的土尔扈特人居民点。第二个界牌设置在克尔根·塔斯山口，该山口经过科楚尔山通往塔英达雷克盆地。从这个山上可以远远地望见乌尔卡恰尔山岭，它的前山和侧面峭壁在远处汇合起来，使它象多齿的墙壁。其他的界牌经我设置在巴伊·穆尔扎、布尔古苏台、布凯·阿苏和哈巴尔·阿苏各山口。上述各山口中最有重要意义的山口是：布尔古苏台和哈巴尔·阿苏。其中第一个，作不大的修建就可以完全适合于行车之用。在科克佩克特到塔城的直通道路上的哈巴尔·阿苏山口，只能作为驮运之用。这个山口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早在很久以前，它就已经成为主要的通商叉路，或者更正确地说，从西伯利亚前往东土耳其斯坦的商路，而在后来还有通往中国的西部城市：塔城和伊宁的商路，是通过它而行的。

在哈巴尔·阿苏山口设置了界牌，我就完成了预计在本年内从阿尔泰山雪峰到塔尔巴哈台山岭的全部划定国界工作。有赖于我从中国委员方面所遇到的充分信任，这事已在很短时期达到完全良好的结局，并受到了外交部的充分赞许。同时我应当叙明，这样胜利地完成了我所担任的对于西西伯利亚具有不可争辩的重要意义的任务，我有赖于我属下的边界委员会人员的尽心竭力和通晓业务，特别是地形测量团的官员，他们必须在最不良的环境下工作，并忍受种种艰难困苦。

在边界委员会南方组服务的五十人队伍中的哥萨克人，在这次行军中总计经行不下二千俄里，而且主要是在山岭地方，表现了为西伯利亚哥萨克人所固有的卓越品质。尽管他们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哥萨克人在这次行军的全部时期完全没有患病的人。他

们善能适应地方条件和环境，善于很快地同沿边的外族人和睦相处，以及他们完全通晓吉尔吉斯语言，在划分国界的全部时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一切之后，我只应衷心感谢哥萨克人和他们尊敬的官长茹科夫大尉，谢谢他们在国界上诚实的和尽心竭力的服务。

叙述了在中国西部领域的划定国界的前后经过以后，为了概述的全面性，还须提一下关于同蒙古西部建立正常通商关系时我与中国人所进行的谈判，以及在设置界牌时，在与中国西部接壤的沿边地方所进行的地形测量和天文测定工作。

上文已经叙述，外交部认为在同中国人进行国界谈判时，我作为与中国西部划界的代表从自己方面向中国各大员声明，请求他们方面协助尽可能地大大发展与蒙古西部的通商关系，是有益的。因此，我在国界上与中国委员会见时，一遇适当机会就力求涉及扩大俄国在蒙古西部的通商问题。由于从我方面作了这种声明，中国各大员表示完全愿意全部协助这种通商的发展。

例如，在我与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的一次会见中，中国大员答应对科布多城的我国商业给予充分的庇护。除此以外，他还写信给管理州务的自己帮办，使我国商人在科布多城毫无阻碍地经营商业，并希望俄国商贩在他从俄国境内回归时，随同他一起前往科布多。此后不久，就有我国商贩六人携带我国边界官长的法定证明书前往科布多城。

从上述情形可以看出，我曾与谈判的中国各大员已经确信，毗邻地方居民之间的相互贸易关系是有益的，并表示完全愿意在这种关系上给予一切合法的保护。按照我的意见，我们应当利用这种良好情况，并派遣委任人员前往蒙古西部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各城设立俄国领事的问题，是特别必要的。看来，外交部同意了这种意见，并且按照它所发布的命令，不久就派遣领事巴甫林诺夫前

往乌里雅苏台。他到乌里雅苏台以后，在那里遇到了荣将军，我在乌科克与中国各委员进行谈判时，他早已在那里相识的。看来这一切能使巴甫林诺夫所受到的委任得到良好的结果。但是可惜派遣巴甫林诺夫前往乌里雅苏台，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在我划定国界以后，即1869年立即实现，而是拖延到第二年，那时，正当巴甫林诺夫驻在那里，十分突然地发生了东干人对乌里雅苏台的侵袭。这种使人痛心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在那里已经顺利开始的组织我国与蒙古西部通商关系的事宜。刚一听到东干人接近的消息，中国卫戍军同荣将军赶快退出了乌里雅苏台。东干人烧毁了巴甫林诺夫同从前就在乌里雅苏台的俄国人所在的城堡。我们的人遇到了重大危险，但是得以脱出，当时巴甫林诺夫本人受了伤。巴甫林诺夫最后非常困难地并冒着生命危险从乌里雅苏台脱出以后，处于十分无援的状况中。郊区村庄的所有居民逃跑一空，以避免东干人的强暴和掠夺，巴甫林诺夫不得不在蒙古草原这一部分十分旷野、荒漠的地方流浪了一些时候。在这里他十分意外地遇到了谢米巴拉丁斯克商贩穆罕默德·加齐·费伊齐尔默克，在他的协助下，得以平安地经过科布多和科什·阿加奇来到比斯克城。巴甫林诺夫考察团的不利结局清楚地指出，关于在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城设立我国领事馆的问题，必须推迟到彻底平息东干人的叛乱和在中国西部以及蒙古西部邻接各地奠定应有的秩序和治安以后。除了同蒙古西部，主要是同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各城市建立上述的正常通商关系以外，我认为可以在我国西部国界实施1863年2月20日① 在北京签订的同中国的陆路通商章程。该项章程的主要内容是，在两国国界两侧一百华里(五十俄里)以内准许实行免税贸易，并且每一方有权适合自己的边区法令实行正常的监督。

① 应为1862年2月20日。——译者

实行小本经营的俄国商人，也有权在中国所属辖的全部蒙古设有中国官署的地方免税贸易。按照我的意见，在我国西部国界实施该项章程，可以说，乃是绝对必要的，而主要是因为，象我在上文已经叙述过的，贸易在实际上是已经存在了的。在苏约克、卡克湖和其他卡伦地方都已存在，而因此也就有了充分根据对于既存事实给予合法的意义，借此促进这种商业尽可能大的发展。最后，在我留在大阿尔泰山的全部时期，住在中国卡伦塔尔巴哈台时，我有机会确信，在卡拉·卡巴河游牧的吉尔吉斯氏族的吉尔吉斯人和布赫塔马各村庄的我国农民之间，已经建立了互相交换的贸易关系。我国纳皮毛实物税的农民前往国境以外的吉尔吉斯村庄，在那里以自己的农产品和其他为南阿尔泰山山民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换取牛羊。但是除了贸易交换所提供的利益以外，我国布赫塔马农民还深入到南阿尔泰山去猎取大角鹿(Cervus elaphus)，以及在马尔卡湖捕鱼。在《北京条约》缔订以前，那时全部布赫塔马盆地都属于中国人所有，我国猎户和渔民的这种搜捕，曾受到中国属下的吉尔吉斯人，尤其是也从事于同样猎取大角鹿业的乌梁海人方面的不少阻碍。由于划定国界，这些从北阿尔泰越界前来黑额尔齐斯河盆地的乌梁海人即卡尔梅克人，已经不再出现于南阿尔泰山岭的北坡了，因为按照条约这个山岭已经划归俄国领域。

当时在我国农民与中国外族之间所产生的贸易交换，如果在这种边界地方设立正常的贸易机构，是可能获得更加广泛的发展的。据1869年我留在国界时期所搜集到的情报，这种沿边贸易关系可以很有益地在下列各地方建立起来：(1)在斋桑湖的东南岸；(2)在布赫塔马河盆地。我打算选定科顿·卡拉盖天然界限附近为进行这种沿边交易的地点。这个地点位置在从石山口通过布赫塔尔明斯克前往中国科布多的大道上，也象与它相邻的昌吉思台天然界限一样，当时构成某种交叉点，从布赫塔尔明斯克各村庄：

谢那亚、塔洛夫卡、麦德维德卡和其他等处的道路都在这里汇合起来，然后从上述的巴伊别尔迪、塔尔巴哈台、布尔哈特、萨尔纳科伊和巴卡纳斯各山口越过南阿尔泰山岭前往中国境内。

这个沿边地方的这种良好的地形条件，是它从前成为我国布赫塔尔明斯克居民为经营商业而前往南阿尔泰山基列耶夫村的商业交叉道路的原因。

在沙宾达巴哈界牌迤北的国界其他地区，可以成为贸易地点的是中国从前各卡伦苏约克和尤斯蒂德，以及我国境内的科什·阿加奇天然界限处，最后是在中国境内的克姆奇克河、叶尼塞河支流地方。这后一处的贸易从后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已经开始了。参加这种贸易的有我国的商人、小市民、农民商贩、哥萨克人和沿边的外族人，从克姆奇克运出毡子或毯子、绵羊皮袄、熟羊皮、羊羔皮和牛羊，有时还有貂皮。所有这些商品在我国境内出售，商贩能获得很大利润。在上述各地方建立我国的外族和中国的外族之间的贸易关系，会比任何的行政命令更快地活跃和绥靖边区，消除邻居部族间的仇恨，扩大游牧居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福利。当时本可希望在这辽远的帝国边疆地区借此打下文明的基础。可惜，所有上述我的意图都沉没在办公室的文牍大海之中，而没有任何结果。

我认为必须表明，我在上面所叙述关于沿边贸易关系的一切，是1869年的情况。从这时起，时间和情况必然已经变更了当时存在的边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需求，因此上述的沿边贸易关系可能只具有历史上的意义，是为了全面叙述1869年设置界牌时国界上的一般状况而加以记载的。还应当叙述一下沿边地方的大地测量工作，以及在设置界牌的同时，于1869年所进行的山区调查研究。

1869年夏季，在中国西部国界所进行的大地测量工作，是在于天文和气压上的测定，以及地形的测量。大地测量家米罗什尼钦克中尉在上布赫塔尔明斯克盆地，然后从该处向北沿国界线到沙

宾达巴哈界牌，测定了二十一处的地理位置。同时在中国境内作了一些测定。除了两种坐标(经度和纬度)以外，米罗什尼钦克也测定了第三个坐标，即海平面高度。

中国境内的地形测量工作，是在乌科克天然界限处迤北和迤南地方进行的。在国界的北方组内，由两批人员进行了工作，其中一批在白阿拉哈河河源处，按东北方向向茹夫卢湖开展了国界的地形测量工作。同时测绘了属于科布多河系统的奥伊格尔和阿科尔河的盆地。这些工作是由测量团员费多罗夫中尉进行的。另一批人在茹夫卢湖附近开展了工作。这里全部地方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小湖连锁，其中有些小湖由于粘土壤上的泉水急流，有时改变水的颜色。然后，在中国境内的地形测量工作，是在克姆奇克和阿拉什河流域以及属于叶尼塞河上游的河域进行的。这次的地形测量工作也象上次一样，对于充分了解亚洲两个最大河流：鄂毕河和叶尼塞河的上游，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三批人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南阿尔泰山中。同时把在这以前很少了解的黑额尔齐斯河的一个主要和强大支流的卡巴河上游地方测绘了平面图。然后在被塔乌·捷克利山岭所切断的山区地方进行了地形测量工作，并越过萨雷套和吉利套山达到比什·捷列克天然界限地方。从这里起，地形测量工作转向黑额尔齐斯河左岸盆地，并继续进行从阿克求别山按照新定国界的方向到穆斯套山。除此以外，还沿着这个山岭的南面在察罕鄂博、塔英达雷克和克尔根·塔斯各山口中进行了地形测量工作。同时，也在地图上确定了从前很少知道的位置在察罕鄂博山口迤东十五俄里的土尔扈特人居民点。

山岭地区的调查，是由按照阿尔泰矿区主任的命令派往中国国界的矿务署官员马列夫斯基进行的。他编制了从乌科克卡伦到楚利奇河和楚雷什曼河上游地方的很好的大地测量记录，包括乌

兰·达巴界牌到苏尔·达巴界牌的阿尔泰区的全部沿边地区。马列夫斯基的旅行报告和所编制的视察地方的大地测量记录，都已在1870年《矿业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

我属下的考察团的设置界牌工作，以及进行地形测量与天文测定工作和山区调查工作，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实地搜集的材料，都需要详细研究。从中国国界回到鄂木斯克以后，我们也就立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在中国国界度过了整个夏季，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夏天，而始终是留在大阿尔泰山中，在那里必须从布满冰雪的广阔雪地和山岭盆地上越过。

我来到鄂木斯克之后不久，就收到了奥斯坦·萨肯男爵的几封信，后来过些时候还收到了伊格纳提耶夫伯爵的信件。尊敬的奥斯坦·萨肯男爵写给我的信中有如下的一些话：

"根据您的报告，我抱着特别热烈的同情态度注视了划界委员会的行动。应当给您以完全公正的评价，您很巧妙地办理了由于长久拖延《塔城议定书》的执行显得有些变坏和困难的事务。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很满意于您处理事务的方针。他说，您证明无须作无益的叫喊和喧哗就可以达到无比良好的结果。您能够同中国人达成协议，同时在我国利益需要之处，又不放过机会为我国取得有利的天然地点，例如，斋桑迤北的优良水泉，尤其是黑额尔齐斯河上作码头的地点。后一种情况最终地巩固了我国在斋桑流域的商业上和工业上的统治地位。

"我竭诚祝贺您胜利终结划界事宜。这事拖延得确实令人有理由担心它的胜利结局。我们的部（外交部）以极其赞许的态度把您的行动和所达成的结果转告了陆军部。"

伊格纳提耶夫伯爵的信件内容如下：

---

① 斯特列莫乌霍夫，当时任亚洲司司长。

“我以极大的兴趣了解到您在中国西部新国界上设置界牌，并完成我在签订《北京条约》时打下基础的事业的工作。您担任了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但是您完成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您的关怀，谢谢您7月8日的来信、送来的地图和关于东干人的有趣的记录。在深切同情您的工作时，我确信您的直接长官包括外交部在内，将相应地评价您的功绩。我现时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可惜因职务关系，不能满意地和能够证明您的有益工作，并为您向政府申请，象以前我对卡杂克维赤海军少将、塔塔林诺夫等等所作过的那样。”

从上述关于我在中国西部国界设置界牌工作的好评中，对我来说，最宝贵的和引以为荣的，是在外交舞台上以重要国家功勋而著名的、当时充任我国驻君士坦丁大使的头等中国政治事务通伊格纳提耶夫伯爵对我工作所作的评价。上述两个信件使我非常高兴，并对我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在最近时期，我所忍受的和经历的许多困难、焦急、苦恼、敌视和阴谋以后，我立刻感到一种内心的满足。在这种场合，长官的金玉良言永远会鼓舞并激起精力，使你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新的力量的旺盛和有利于进一步工作活动的精神特别高涨。

上述高级政府机关和人员的评语可以明显地证明，1869年划定国界的胜利终结是值得政府充分赞许的。但是，在我办理中国事务取得成绩的同时，产生了反对我的嫉妒和倾轧，其表现是传播最荒谬的流言，甚至见诸报刊，说1869年划分国界并入我国领域的土地，对我国是完全没有益处的和不需要的，因为都是由不毛之地构成的，好象按照《北京条约》设定国界的人员可以公然违反这个条约，按自己的意见把沿边的土地划归这一国家或那一国家。所有这些主要旨在反对《塔城条约》的意见，我将在下一章详加分析，并且说明当时关于1869年划分国界事宜所写和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反对者借此力求千方百计地否认和贬低所建立的国界的政治

和军事意义。在这里我应当说到，划分国界的胜利终结，特别使得地方边区长官很不喜欢，因为在他面前出现了最好的证据，证明上文已经引叙过的边区长官的声明，说在邻近的中国境内所发生的叛乱和风波，可能使划定国界和执行《北京条约》第四条难于实现，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顾一切要人确信中国西部国界发生骚乱和纷扰的说法，我带同很少的哥萨克人，毫无阻碍地通行了我国和中国接壤的领域的所有这些边区地方，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中国外族叛乱大群方面进行攻击的最小的企图或阴谋。可是，在克兹尔·阿亚克名称下著名的叛乱外族，却胆敢侵袭有强大部队占据的斋桑哨所，而且大可悲痛的是，在我们目睹之下，劫夺了我国属下的吉尔吉斯人的村庄，并且哨所的前列保卫者，西伯利亚哥萨克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害，据我所能了解到的，这是无法加以辩解的，正如下文将详细说明的那样。

还在大阿尔泰山中设置界牌时，我于8月末来到黑额尔齐斯河中国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的时候，就已经从自己的侦探员得到了关于这种侵袭的第一次情报。这次情报是极为表面的，并且是说法不一的。但是来到科克佩克特之后，我已经有充分机会了解此事的详情细节。据可以信任的人员述说，以及根据新闻通讯，特别是其中由当时传说曾经目睹的一个哥萨克军官涅斯捷罗夫所写的通讯，这个事件的情形如下。

说到克兹尔·阿亚克，首先应当说明在这个名称之下应当了解为，主要是由一伙从内部各省流遣到中国西部的从事强夺和劫掠的罪犯构成的各种部族的恶棍，在东干人叛乱时期，中国西部境内所产生的当时的骚乱情况，也相应地助长了他们的强夺。

克兹尔·阿亚克对斋桑哨所的侵袭，是在1869年5月30日晨5时发生的，而且是十分突然的。成群结伙到哨所逃避克兹尔·阿亚克人的劫掠，并请求援救的吉尔吉斯人给了我们第一次消息。

在这样早的清晨时刻，在哨所出现了受到克兹尔·阿亚克人的跟踪追击的被掠夺的吉尔吉斯人，当时自然发生了惊慌。组成斋桑哨所卫戍军的部队大部分都不在场：他们正在距离哨所二十俄里的地方砍伐森林和其他的哨所工作。总而言之，哨所以内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应付中国叛乱分子的敌对侵袭。因此，当克兹尔·阿亚克人追踪吉尔吉斯人已经突入哨所的时候，在那里才发出警报，而且这还是没有经过不相信边区盗匪前来侵袭的斋桑警卫长的同意的。因警报而集合起来的军队，是由哥萨克人二十名和不足数额的两个步兵连组成的。而且，由于马匹都在距离哨所十二俄里的牧场放牧，哥萨克人陷于无马可乘的境地。但是，哥萨克人没有惊慌失措，终于得以很快地骑上了首先来到的吉尔吉斯人的马匹，勇敢地打击了在斋桑哨所附近掠夺并打死我国吉尔吉斯人的强盗。尽管数达五百人之多的克兹尔·阿亚克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他们经不住我国哥萨克人的急速的和勇敢的打击，而把他们打出了哨所。在进行白刃战中，哥萨克人开头被打死二人，打伤七人。同时，赶到的步兵队已经来得及排好队伍并准备开火抵抗克兹尔·阿亚克人，但是被抱有与克兹尔·阿亚克人谈判意图的警卫长制止了。

哥萨克人从本身方面利用了那时已从牧场赶来的自己的马匹，开始追击克兹尔·阿亚克人，但是陷入了沼泽地，在进行的搏斗中，又受到死二人和伤四人的损失。然后哥萨克人同不足数额的步兵两个连一起出动，在警卫长率领下进一步追击已经来到距离哨所八俄里地方的克兹尔·阿亚克人。但是主要由步兵组成的部队已经不能追上迅速远飏的克兹尔·阿亚克人。因此警卫长决定，由哥萨克人和乘骑吉尔吉斯人马匹的步兵于第二日再行追击。但是这个办法也毫无效果：克兹尔·阿亚克人已经跑远了，追上他们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国部队于6月2日返回了斋桑哨所。在追

击克兹尔·阿亚克人的时候，6月1日，夺去了我方几枝枪械和劫去了几百只绵羊。

克兹尔·阿亚克人对斋桑哨所的突然的、完全出乎意料的袭击清楚地表明，斋桑的警卫长对于中国外族的敌对侵犯没有作出防卫哨所的任何措施。一句话，完全没有这种防卫。这个情况以及他的错误信念，认为在草原上不可能有任何的敌人，他对敌人持有轻视态度，忽视了在亚洲不可轻视任何的敌人，何况关于克兹尔·阿亚克人准备侵袭的确实情报，在发生侵袭的两天以前就已通知了警卫长。但是他对待这个消息持有不相信的态度，因此，想必也就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哨所的官长甚至也没有关心到布置在前列防卫的岗哨和守卫。还有一个情况也不可缄默不言，即赫鲁晓夫总督在克兹尔·阿亚克人侵袭斋桑哨所的两个星期以前，曾来到哨所并向斋桑警卫长提出问题：在中国叛乱分子侵袭哨所时，他打算怎么办？对于这一点警卫长答复说，他连这种侵袭的想法也不容许有。但是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故，那么强盗一定会被我国军队打退，总之，他保证哨所的安全。

这就是哥萨克军官涅斯捷罗夫所传有关克兹尔·阿亚克人侵袭斋桑哨所情况的情报。据我留在国界时期所听到的许多评论，上述的一切情报大体上是正确的。在我从中国国界返回鄂木斯克以后，我大吃一惊地从报纸上得悉，斋桑哨所军事官长对涅斯捷罗夫指出的一些事实，提出了许多反驳。在这种反驳中，克兹尔·阿亚克人侵袭斋桑哨所的事件被染上了另一种色彩。例如，反驳的人说，克兹尔·阿亚克人十分突然地来到斋桑哨所，因为这是特殊的地方条件和情况促成的。当时曾经占有黑额尔齐斯河盆地为自己牧地的基列耶夫氏族的吉尔吉斯人区域，只是在克兹尔·阿亚克人行动的前夜才迁往大阿尔泰山游牧。吉尔吉斯人离去之后，这个盆地就成为完全荒漠无人了。克兹尔·阿亚克人匪帮夜间从

这个荒漠无人的盆地通过，是没有人察觉的。但是不用说夜晚时刻，据反驳的人说，在这个地方所生长的高草在白天都能隐蔽骑马的人，也促成了这种秘密活动。

在被侵袭的那一天，组成保卫斋桑哨所的军队被分派在各警戒线工作，下级官员中有些人从岗哨回来以后就睡了。5月30日天刚亮时，克兹尔·阿亚克匪帮十分突然地出现在位在接近斋桑哨所的吉尔吉斯人村庄附近，开始夺取牲畜。当吉尔吉斯人为避免这种暴行而逃到斋桑哨所，并首先报告出现克兹尔·阿亚克人的时候，警卫长下令发出警报。可惜，无论是警卫长还是哥萨克人都没有自己的马匹，马匹都在马群中放牧，因此不得不为警卫长和哥萨克人取用吉尔吉斯人的马匹。哥萨克人在距离哨所半俄里的地方碰到克兹尔·阿亚克匪帮并打击了他们。但是在初次交锋中由于哥萨克人的枪不发火，两个哥萨克人被长矛刺死。这时扑向他们的人们向后转，有六个人受了伤。警卫长同其他的哥萨克人被击退到刚赶来的步兵线。警卫长的马匹受了伤，当时他向在那里的哥萨克军官请求借给马匹，受到了拒绝，因此该军官被逮捕。同时，被我步兵开火射击溃乱的克兹尔·阿亚克匪帮开始后退。这时步兵队向前挺进，警卫长则前往取马。至于哥萨克人，据警卫长照百人长的话声明说，由于他们的枪枝不良和马匹的软弱无力，不能在这时冲击已被步兵队火力击溃的克兹尔·阿亚克匪帮。因此，哥萨克人解散了队列，只以自己的火枪实行射击。在逃跑的时候，克兹尔·阿亚克匪帮陷入了沼泽地并被步兵队追上，这样连续了三次。据警卫长说，哥萨克人尽管他们尽到一切努力，但不能越过沼泽地，没有能够最后击败克兹尔·阿亚克人。所有从吉尔吉斯人处夺取的牲畜，都被我国军队夺回。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也还由于克兹尔·阿亚克匪帮为了自己逃命，不得不抛弃掉他们所夺取的牲畜。不这样办，他们便会被彻底歼灭。

上面已经说过，在克兹尔·阿亚克匪帮突然侵袭斋桑哨所的时候，我国哥萨克人没有能够立刻骑上自己的马匹，因为哥萨克人的马匹正在离开哨所很远地方的马群中放牧。在哨所附近没有放牧的地方。据反对的人说，哥萨克人的马匹所以必须在马群中放牧，因为哥萨克人在夏季开始时没有现成的饲料和预先备好与存入营房的干草。

在初步地、甚至最肤浅地研究上述斋桑哨所军事官长的反对意见时，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这只是涉及克兹尔·阿亚克匪帮侵袭斋桑哨所时发生的一些细节，而丝毫也不能说明涅斯捷罗夫所指事情的实质。一句话，主要的情况：没有采取保卫哨所的办法和没有惩罚克兹尔·阿亚克人的侵袭——没有被推翻。从而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由于我们的预防不周，斋桑哨所的军队对中国叛乱分子的敌对侵犯没有及时加以击退的准备。斋桑哨所在当时即5月30日的这种没有战斗准备的状态，反对的人所用来解释的却是克兹尔·阿亚克匪帮利用地方条件得以隐蔽地接近斋桑哨所。因此，他们的出现在那里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作为辩护，反而指控斋桑哨所官长有罪。如果说斋桑边区地方的特点和天然条件有利于克兹尔·阿亚克匪帮隐蔽自己的行动，象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所有这些情况反过来也就清楚地指出，在这种地方环境之下必须在国界上保持特别的小心谨慎，并采取严格的办法，以便警惕地保卫哨所，借以保证它的安全，避免任何突然事故，尤其是防止可能措手不及被擒。因此，斋桑的警卫长多少必须想一想，在中国叛乱分子侵入我国境内，劫掠我国吉尔吉斯人，并进行其他敌对破坏时，他应当如何办理。因此必然就迫切需要预先拟好应付这类事件的行动计划。首先应当采取预防的特别办法来警卫军队、哨所居民以及周围游牧人口，以防中国外族流动匪帮的突然侵犯。为此应当命令，根据通往哨所的各条道路，大约

在距离半俄里处夜间设岗放哨。岗哨以外，在道路两侧的侧面小路上，也应当派出潜伏哨和守卫哨，以便使小股匪帮和绑架牲畜的人不能突然冲入和钻进哨所内。对马群的保卫，特别是在夜间应该加强。为了检查潜伏哨和守卫哨的警惕性，应当派出巡逻队，此外为了检验总的保卫情况，有时要派出特别的军官。

最后，对于发生警报的场合，必须预先规定步兵和哥萨克人在哨所内的特别集合地点，此外还要规定全部卫戍军队在哨所外围地区的共同集合地点。如果计划已经预先制定好，一切情况都经过深思熟虑并预见到，那么这种准备就能令人相信自己的力量，振奋精神，有利于坚强地对付危险和在困难时刻保持安静和沉着的态度。一句话，官长那时就会有充分可能在任何突然情况下迅速确定方向。很明显，如果已经作了这一切，实质上在岗哨警卫方面构成最起码的军事预防规则的措施，官长人员和军队就会预先了解到自己的职责，而克兹尔·阿亚克匪帮的侵袭就不会造成哨所内的那样惊慌不安和仓皇失措。那样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在开始同克兹尔·阿亚克匪帮发生战斗的时候，于最初时刻就派出哥萨克人来给予决定性的打击。骑兵，尤其是哥萨克骑兵，大家知道，完成给敌人的打击，比起自己发动打击更有本领。在现时的这种情形下，所以更加不应当这样作，也还由于哥萨克人没有乘骑受过战场上战斗活动训练的自己马匹，而是乘骑吉尔吉斯人的半野性的、没有远行过的和胆小的马匹。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象我不止一次提到的，具有适合地方条件和情况的特别能力，在我看来，他们布成散兵线，是做得合理的，因为这使他们有充分可能去监视敌人，并同时掩护自己的步兵队伍。如果在开始战斗中，警卫长不是让哥萨克人于最初时刻就扑向克兹尔·阿亚克匪帮，而命令他们布置骑兵线包围敌人，然后边击边退，那么他们就会把中国人引到这时已经排好了战斗队形的我国步兵队方面。在接近步兵队以后，

哥萨克人迅速散离步兵队的正面，使它能够实行几次连续的排枪射击。我国步兵队在近距离的开火会立刻压住克兹尔·阿亚克匪帮的其势汹汹的气焰，必然会迫使他们后退。警卫长正是应当利用这种时机，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应派出哥萨克人，完成被我步兵队火力给克兹尔·阿亚克匪帮所导致的败退，然后坚决加以追击。

在哥萨克人对这类行动具有一定能力情形下的这样布置，在这种场合是较为相当的和适宜的。这样也就不会产生警卫长与哥萨克人一起被敌人击退到步兵队列的可悲痛的事件。据斋桑官长说，当时警卫长没有了马匹，便请求当时曾在那里的哥萨克军官把自己的马匹借给他，而遭到了拒绝，因而在这紧要的关头不得不自己前往找马匹。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警卫长在他属下军官中的威信程度。

但是，最可悲痛的是，按照《北京条约》随同所占土地一起从中国转入俄国国籍的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在加入我国国籍以后不久，两次受到了中国外族的掠夺：1867年受到察罕·克根管下的卡尔梅克人的掠夺，而在1869年则受到克兹尔·阿亚克人的掠夺。很明显，这种掠夺必然会动摇我国新属民对俄国政权的信任。在这个事件中另一个可悲痛的情况是，克兹尔·阿亚克匪帮虽然逃脱了我国追击，但毕竟被察罕·克根的卡尔梅克人在黑额尔齐斯河盆地上布伦托海附近追上，并被彻底击溃而逃散了。由此可见，中国人尽管在东干人叛乱时期在他们帝国的西部领域表现得完全软弱无力（当时在那里几乎没有他们政权的任何踪迹），但毕竟能够收拾克兹尔·阿亚克人。而我们尽管有占据斋桑哨所的比较强大的部队，却不仅没有能够彻底击溃克兹尔·阿亚克匪帮，反而在初次同他们武装冲突的时候，就使哥萨克人受到了死四人伤十一人的损失。这个情况清楚地证明，在这个事件中哥萨克人是前列的战士，斋桑卫戍军的全部军队中只有他们受了这样重大的损

失。可是，斋桑的官长却把克兹尔·阿亚克得以逍遥法外逃跑的大部分责任归罪于哥萨克人，说成是如果克兹尔·阿亚克匪帮迅速地逃出了斋桑哨所并得以避开我国部队的追击，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哥萨克人的枪械不良和马匹力弱，尽管警卫长尽一切努力都不能追上他们。但是如果哥萨克人没有良好的枪械和适合于持久与迅速动作的强壮耐劳的马匹，那么这种缺点应当归罪于官长，而决不能归罪于哥萨克人本身，因为他们从自己方面已经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不可忘记，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在这一次，象我们所看到的，也是中亚细亚草原上的前列战士。当时任何人也没有对这些死于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以身保卫斋桑哨所的人说一句好话。对这些由于他人过错和处理无方而在这个不幸的日子死去的我国勇敢的哥萨克人，光是凭正义感的要求，也不是加以谴责，而是应当予以夸奖。

第 六 章

对各种人等关于《北京条约》和《塔城议定书》的意义所持看法的详细分析。

我在前一章已经提到，在彼得堡有一派尽力阻挠以执行《北京条约》为己任的人。这一派人的存在应当认为是毫无疑义的，正如扎哈罗夫所转告给我的，他由于自己在外交部的职务和所担任的彼得堡大学教授的职位，对于中国和中亚细亚的事务是很熟悉的。他写信给我说，在一位枢密大臣的宴会上，当谈到与中国西部最后划分国界时，大家毫不客气地向他说，委员们不应当签订议定书，而应当拖延问题不使得到解决。

上述派别的拥护者是在民政机关担任高级职位的人员和一些军事部门的人员。在军事部门人员中，草原委员会委员根斯也在其内。根斯从他在吉尔吉斯草原的旅行返回彼得堡以后，勤恳地访问了枢密大臣克某，对常同他谈论我国在中国西部境内和中亚细亚事业的当时形势。在这些会见的时候，谈话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不久以前《塔城议定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很可能是，尽管我不能完全保证这一点，只是在这个时候根斯第一次得悉枢密大臣克某对《北京条约》和《塔城议定书》的意见。尽管详细划定《北京条约》所规定中国西部国界的问题完全与根斯没有关系，他作为草原委员会委员所有的职务是专门讨论和研究吉尔吉斯人问题，但是根斯看来一点也不受这个限制。他勇敢出头不仅是作为持有反对意见人的角色来反对《北京条约》，尽管多是用别人的口气，而且

在他所投交的意见书中，指出《塔城议定书》所定国界的不适宜，是气势凌人地设计了自己的中国西部国界以代替《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国界。根斯还把草原委员会的自己同事古特科夫斯基也诱引到自己方面。不久其他的人也同他联合在一起，于是大家就动起来了。外交部开始收到关于中国西部国界不适宜的意见书，写得非常肤浅和轻率，此点我在下文将详加说明。戈尔恰科夫公爵为了了结这件事情，尽管他有精细的外交家的全部沉着镇静，曾命令准备以坚决和绝对的方式驳斥对于中国西部国界这些不正确的和轻率的意见。

在本章和上面的第三章我曾提到，我国政府经常赞许我国委员在塔城的行动。例如在这种谈判开始以后的初期，外交部认为边界问题已经我国委员适当地提出，并将此点通知了我国驻北京的公使。后来进一步的谈判都是确实遵循部的指示进行的，最后终于达到完全良好的结局。但是有些人对于同中国西部划分国界问题，却持有与我国政府上述意见分歧的十分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们认为，根据《北京条约》和《塔城议定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也象东部国界一样，具有一些不适宜和不正常之处。对于同中国划分国界问题的这种意见抵触之所以产生，看来是由于持反对意见的人，没有能够根据官方文件来了解同中国人在塔城进行那些导致签订《塔城议定书》的谈判的经过情形。这种外交上的往来文件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的全部详细情节，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这就很清楚，在这个问题的政治性方面始终是各种意见、推测和猜度的广阔场所。在现在的这个场合也是这样。草原委员会委员根斯，上文已经提到，所具有的直接职务是参加该项委员会，而对于完全不了解与他全然无关的边界问题，却认为必须详细研究中国国界事宜的形势，并表示自己对于划定国界的意见。这种

情况使根斯撇开他的直接职务，对于研究草原条例也发生了不良的影响，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该项条例有不少的缺点。

根斯大概不知道古代预言者的一句名言："不要越俎代庖"。据克·普·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正确意见，分散心思到各方面，就会分散思想、减弱意志并妨碍在事务上集中精力。为了把事务做好，必须心无外务，聚精会神①。根斯对于按照《塔城议定书》划定中国西部国界问题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认为划界是不适宜的，同时设计了自己的中国西方国界方案来代替《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国界。不久古特科夫斯基、波尔托拉茨基和维纽科夫都附和了他。应当说，在当时即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关于西伯利亚可以随便说什么和写什么，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就广泛地利用了这种权利。在官方性质的各种记载中，以及报刊上发表的论著中，他们对于刚刚划定的西部和东部的中国国界进行指责。在这种关系上的兴致达到了这样程度，乃至有一个持反对意见的人在他所投送的意见书中，甚至指责我国委员在签订《塔城议定书》的时候，坚定不移地遵守了《北京条约》的规定。另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硬说，委员们不应当把问题达到最后的解决，即不应当签订《塔城议定书》。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违反外交部的训令行事，并悍然欺骗自己的政府。我完全确信，任何一种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善意的批评分析，一定会带来好处，有助于问题的全面阐明。但是为此必须遵守两条规则：(一)切实地知道所研究的问题；(二)始终注意到，加给的罪名越重大，举出来论证这种罪名的理由越是应当切实有力。可惜，我的持反对意见的人正是常常没有遵守这两条主要的指导规则，关于这一点在一般分析持反对意见人的意见时，将在适当之处详加说明。

上面我指出持反对意见的人对于按照《北京条约》划定中国国

---

① 克·普·波别多诺斯采夫：《莫斯科汇编》，1896年，第134—135页。

界的意见与我国政府对于此事的观点不相符合。因此，也就不需要把一切批评意见和对我国委员行动的严厉谴责一一加以反驳，因为从出现这些意见的时候起已经过了多年，所有这一切东西看来已经叫嚣完了，并失去了它过去的尖锐性。但是另一方面，持反对意见的人的批评意见曾经流传到政府各阶层内，而一部分还出现在报刊上。同时除了不多的个别例外，对一切关于《塔城议定书》和划分中国国界中不正常的意见，还没有作出包括相当详细的公开的完整的驳斥。如果不把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那么这种缄默不言，久而久之一定会提供根据作出各种推测，可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困惑不解。因此，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我作为接近中国国界事务的人，认为负有道义责任详细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按照荣誉的天职和为了公正和正义的利益，辨明对于同中国划分国界问题的十分不正确的和虚伪的意见，这是在阅读对《北京条约》和《塔城议定书》持反对意见的人和实行批评的人的各种论著和记述时一定会产生的。但是除此以外，珍视对我的划界工作同事和协作者扎哈罗夫和戈卢别夫的良好纪念，我也负有神圣义务说几句话，维护我们共同的和正义的事业。最后，如果持反对意见的人的宗旨是在审判我国委员的行为，那么他们作为受审人，为了公平起见，应该作出最后的发言，兼听则明。

由于上面所引叙的情况，我充分确信，在我所处的地位对于此事缄默不言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个理由，我应当表示我个人的意见，至于谁是谁非的问题，让社会舆论去决定吧。

转过来叙述我对《北京条约》和《塔城议定书》一切意见的看法，我认为必须预先把这些意见分为下列的五个部分，在每一部分中列入同类的意见：

（一）《塔城议定书》所规定的国界不符合于由氏族和共同使用土地联系起来的吉尔吉斯部族和氏族的民族划分；

(二)额尔齐斯河、埃米利河和伊犁河三大河流的盆地，为国界所横断，它们的上游都处于我国国境之外；

(三)斋桑湖平原是四通八达的；

(四)塔尔巴哈台与阿拉套山岭之间的国界是便于通行的，没有天然界限；

(五)在亚洲各地必须采取天然界限作为国界。为了这种意图，似应把中国西部的国界向东推移三百俄里到五百俄里，即深入中国准噶尔地方，使国界沿着从东方包围这全部地方，即从天山山脉向北到大阿尔泰山地域的中国伊犁、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各省的山岭而行。

一、《塔城议定书》所规定的国界不符合于由氏族和共同使用土地联系起来的吉尔吉斯部族和氏族的民族划分

在上面详细分析我国委员同中国人在塔城进行谈判以及编制国界线草案他们所应遵守的指导原则时，曾经提到我国委员根据颁发给他们的训令，在这一切场合必须严格遵守《北京条约》相应条款的规定。我国委员这样遵守该项规定已经证明是充分正确的，因为《北京条约》在政治、通商和其他方面都给我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优越地位，中国人方面也曾要求作相当的让步。中国人很明白《北京条约》的签订对他们显然不利，中国的一位大臣文寿曾向我国驻北京代办秘密告知这一点，并补充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预先见到《北京条约》对于中国是如何不利的，那么它永远也不会签订它。由此可见，在塔城所举行的谈判中和在编制与中国西部的国界线的计划时，严格地和无条件地遵守《北京条约》，对我国委员来说乃是必不可缺的条件。但是除此以外，任何的甚至稍不遵守《北京条约》，就会成为我国委员方面的重大政治错误。我们这样就会立刻使中国政府有口实，任意背弃《北京条约》，该条约所加给中国的，是对我国有利而对中国难堪的条件。我们要记住，根

据这个条约除了在中国西部国境获得广大地域的土地以外，还把日本海直到朝鲜海岸并入我国领域之内，准许在喀什噶尔开放俄国贸易，确定了我国与中国政府双方相互关系的稳固的和完全合理的制度。由此可见，上述的一个持反对意见的人(波尔托拉茨基)怪罪签订《塔城议定书》的我国委员确切遵守《北京条约》的规定的意见，表明是对于事情的最充分的无知。如果同中国人在塔城进行谈判是专为执行《北京条约》，而《塔城议定书》是这个条约的补充，那么为了执行条约而进行谈判，可不可以不根据该项条约呢？试问：我国委员在进行谈判时，究竟应当采取什么作为根据呢？如果他们应当作为根据的不是条约，而是自己的想法，那么也就应当容许中国委员在划定国界事宜中遵循自己个人的思考。我们从对塔城谈判的经过情形的详细叙述中已经看到，也应该遵守《北京条约》确切意义的中国委员，在这次谈判中曾经步步想要任意背离该条约，并向我们提出最离奇古怪的国界方案。因此，如果我们自己容许作出任何的甚至稍不遵守条约的行为，那么中国人的无理和傲慢要求会达到什么样程度呢。我国方面的这种做法一定会引起与中国委员的无尽无休的争论和吵闹。总而言之，我们会被引入迷宫，由此休想会有什么出路。结果我们不是解决边界问题，而只是把它复杂化了。

在计划国界的时候既采取了《北京条约》作为主要的根本指导，我国委员当然就应该按照该约第二条沿着山岭、大河和中国卡伦的方向标明国界。换句话说，在划分国界的时候，他们必须严格遵守地方的地形性质和自然条件，而在这个场合成为指标的是分水线和大河的河道。至于有些场合，如果不可能沿着分水线或大河河道划分国界的时候，那么按照《北京条约》的确切意义，应当使国界沿着中国常设卡伦线而行。我国委员也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样划定国界的时候，国界与吉尔吉斯人部

族和氏族的民族划分是不相符合的。由此应当作出结论说，按照持反对意见的人的意见，国界应该这样划分，以便使游牧的一些边区吉尔吉斯人氏族的各地区与相邻的另一些氏族的地区划分开来。总而言之，要使国界符合于划分这些氏族的民族线。但是按民族线划分国界，就意味着使它离开分水线和中国常设卡伦线，即离开《北京条约》中所严格规定的方向，这显然是直接违反该条约的。同时，在同中国人在塔城进行谈判的时候，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部分脱离《北京条约》和一般地离开条约规定的立场，对于我国委员来说，无论是由于颁给他们的训令，还是由于上面我已经叙述过的考虑，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管怎样希望按照民族线划分国界，直接违反《北京条约》来实现这种打算是不可能的。

但是除了上述一切以外，如果对于这个问题作深入一些考虑，那么就可以看出，按照民族界线划分国界，根据其他的考虑也是办不到的。首先应当看到，边区吉尔吉斯人各氏族游牧场所的地区，由于畜牧经济不可避免的牧业部族流动生活的特殊条件，几乎经常发生变动，而这些地区的整个边区形成活动的界线，时常有所变动，因此没有任何的固定性。但是如果吉尔吉斯牧地的地区形成轮廓时常变动的不正常的面积，而这些面积的整个地区乃是活动的界线，那么在划定区分邻接游牧边区氏族地区的民族线时，必须使这条线沿着各游牧地区的整个边区，即实质上沿活动的界线而行。因此，象持反对意见的人所要求的，要使国界不把氏族地区割断而使它们彼此完全区别开来，除了使国界适应民族线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如果这个界线，象我们所知道的，形成没有任何固定性的活动的界线，那么使国界与它相适应，就意味着使国界失掉它的主要优点：巩固和稳定，从而使它在各方面都是不适宜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持反对意见的人要求不使国界割断吉尔吉斯人氏族地区，而

使国界把它们彼此区别开来，其结果就是这样。这种意见的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持反对意见的人对《塔城议定书》作批评分析时，所遵循的是一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上的考虑，他们按照地图判断地形，而没有掌握关于边区外族居民生活和在流动的、游牧的和半野蛮的居民所占据的土地上划分国界时所必然产生的特殊条件的切实情报。因此，一切在理论上好象是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上却具有另一种意味，而失去持反对意见的人所给予的意义。同时我应当指出，使国界把吉尔吉斯人各氏族分裂开来的，只是在斋桑国界上的一些不大的地段内，这种情况在很长的全部中国西部国界上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作为偶然的现象将来一定会自然消灭。持反对意见的人以斋桑国界吉尔吉斯人利益维护者的角色出头主张，力求把这个情况作为重大的情况加以提出。但是我们各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些不同。他们意识到，在划分国界时候居于首要地位的应当是全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吉尔吉斯人的利益，吉尔吉斯人的利益作为具有私的性质的利益，在这个场合应当服从国家的考虑，何况吉尔吉斯人所占据的土地按照法律也应当认为是国家所有的。

最后，不能把国界使外族民族分离看做是中国西部国界上特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与中国东部的国界上也是存在的，并且范围更广，东部国界所分离的不是各个氏族，而是属于同一蒙古民族的整个部族，这就是把布利亚特人与他们同族的蒙古人分离开来。因此，在这里重复着对于蒙古人的同样现象，在中国西部国界上只是对待吉尔吉斯人所出现的现象。

对于民族因素的这种违反，在西欧各国的所有国界上都可以遇到。例如，1871年以前，法国的东部国界就是因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州并入法国领土而违反民族条件的，这两州从前是德属大公国并居住着德国部族，他们被国界与住在相邻德国领土的自己同族

人分离开来了。虽然按照《凡尔赛和约》和《法兰克福和约》，阿尔萨斯和洛林归入了德国版图，但是贝尔福城堡附近的一部分德国人仍旧留归法国国籍，因而还是被国界分离了。按照 1866 年 4 月 23日《巴黎和约》，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和戈尔什坦被并入普鲁士，而且随同德国居民一起归入普鲁士的有丹麦人十万人以上，这样，他们就与住在丹麦领土的自己同族分离了。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国界，把从前波兰王国的土地分割为三部分，分属于三个国家所有。在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划归奥地利的加利齐亚，其东方部分构成过去的切尔沃那亚罗斯的土地，居住着俄罗斯部族，他们曾与我国邻近各省沃伦斯克和波多利斯克的俄国居民被分离开来。瑞典和俄国在芬兰北部的国界线，大家知道，是以托尔涅奥河和它的支流穆奥尼奥标明的。这个国界尽管不长，还是使居住这些河流西岸的为数约三万人的一部分芬兰人分开了，他们是为了适合于天然国界而由我国交给瑞典的。

同样，在签订《塔城议定书》的时候，我国委员因为必须遵守《北京条约》和划定国界，考虑地方的地形性质，没有任何可能把吉尔吉斯人各氏族和部族中的一些氏族完全划归俄国，而另一些氏族完全划归中国。最后，如果容许国界把这一氏族和那一氏族分开来，那么这多半是一种治标的或临时的办法，而丝毫也不能有助于消除持反对意见的人所指出的不适宜之处。能不能保证各氏族之间永远不会发生足以破坏国界上的秩序和安宁的冲突，因此也破坏在边区所建立的吉尔吉斯人的土地领有制度。任何只要稍微了解吉尔吉斯草原的人都很清楚，在草原上永远存在相邻的各吉尔吉斯人氏族之间争取牧区的仇恨，这是这个民族的粗暴和野性的通常现象。不仅在东干人进行蹂躏时期，而且后来在较为安宁的时期，据科斯岑科说，在中国西部国界上，中国准噶尔的吉尔吉斯人与卡尔梅克人也经常敌对仇视，同时彼此之间进行无尽无休

的纷争。伊宁边区各个氏族之间的敌对关系，由于中国政权的疏忽大意，已经同从前一样的强烈恢复起来，一个氏族或部族最后毁灭了另一个氏族或部族①。同时，不仅难于断定这个地方全部人口的数目，而且甚至找到居住沿边地方的各种部族的定居地点，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情况对于持反对意见的人因中国西部国界分离了吉尔吉斯人各部族，而认为这条国界不正常的意见是鲜明的实际的反驳。结果，在国界把这一氏族与那一氏族分开来的时候，氏族之间的敌对关系还是永远可能发生的，从而使国界分开氏族，丝毫也不能有助于在邻接中国西部的沿边吉尔吉斯人地区内建立秩序和安宁。

在游牧部族所占据的地区划分国界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从所叙述的说明可以得出结论，在这种地区划分国界时完全遵守民族的条件，即不使沿边居民的各个氏族和部族分离开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在积极意义上得到解决，即作出不违反民族因素的解决，从而是会给地方游牧居民带来一些不便之处。我们看到，甚至在文化已经达到高度发展，并由于自己的历史悠久已经获得了民族统一权利的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国界上，要避免这种不便之处也是如何的困难。因此，在过着游牧生活方式并处于人类发展原始阶段的半野蛮居民所占据的土地上划分国界时，也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根据来要求遵守民族条件。在游牧民族所占据的土地上不仅在划分国界，甚至在划分内部界限时，要不违反氏族土地领有制都是很困难的。经验表明，关于划分这种国界的问题，在多数场合于时间和情况还没有指出适当的解决办法（虽然这种解决也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以前，多年内一直是悬而

① 科斯岑科：《准噶尔》，第313页。

未决的。

在上面第四章内说到向西伯利亚派遣草原委员会时，我曾顺便提及，从1868年在吉尔吉斯草原实施新的行政组织区划时起，各乡区不是按照氏族的土地领有，而是按照新的地区制度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完全废弃了氏族的原则。因此，社会氏族关系，特别是氏族的土地领有制，大大地动摇了。促成这一点的还有下述情况，即按照新条例，吉尔吉斯人必须尽可能地在自己的县境内游牧，不得越入相邻的州区，因此也就与自己的氏族被分离开来了。

由此可见，草原委员会曾有几个持反对意见的人(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作为它的组成人员，积极地参加了关于吉尔吉斯草原行政区划的一系列条款的制定，一贯地力求废除氏族的原则。根斯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写给《军政汇编》编辑人普·克·缅科夫的信件中说道："在吉尔吉斯人那里废除一切强力选举的政权，即把他们从贵族和氏族原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会是非常有益的和合理的。"①

在根斯曾经参加编写的1868年草原条例的说明书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在这个说明书中顺便说道："哥萨克人定居于我国与中国西部的国界，使我国属下的吉尔吉斯人与居住在外国境内的他们的同族分离开来，在政治关系上是重要的。"② 但是如果按照持反对意见的人的见解，《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是在分离吉尔吉斯人氏族，那么由此也就应当得出结论，这条国界正在执行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上述说明书中所说的沿边哥萨克人定居所执行的同样的政治性职能。在此以后令人莫解的是：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作为草原委员会委员，曾如此坚持和顽强主张必须

① 《普·克·缅科夫笔记》，第三卷，第198页。

② 《草原各州管理条例说明书》，第41页。

完全废除吉尔吉斯人的氏族原则，怎样会十分突然地转变到另一个阵营，开始反对废除氏族原则，在他们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国界的特别意见书中，因中国西部国界分离了吉尔吉斯人各氏族而表示惋惜呢。一句话，所表示的意见是与他们从前所说的正相反。但是除此以外，持反对意见的人不折不扣地按照他们意见在吉尔吉斯游牧部族所占土地划界时，做了所不应当做的事情。这种突出的矛盾尤其不能辩护的是，划分内部界限并没有在划分国界时一定会产生的那种困难，因为在那里两个彼此独立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互相冲突的，除此以外，还往往引起与划定国界事宜密切联系的其他问题。

从上述一切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如果在划分内部界限时不破坏氏族的土地领有，象我们在划分西伯利亚和奥伦堡吉尔吉斯人所占土地时，在吉尔吉斯各草原划定州区界限时所看到的那样，是极端困难的，并且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求在划定国界时，即在更加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上遵守这种条件，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除了上述的一切以外，如果对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那么就可以看出，在这个场合划分中国西部国界，实际上对沿边吉尔吉斯氏族的分离并没有任何影响。这种分离是由于一些与两国之间按照《北京条约》划分土地毫无直接关系的其他完全不相干的情况而发生的。为了说明这种理由，我们要想起在《塔城议定书》签订以后不久，在最后确定中国西部国界的时候，因爆发了东干人叛乱，在相邻的中国领域曾经产生骚乱。在这种形势下，《塔城议定书》的规定在中国西部领域内实际上不可能贯彻执行，而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国界在当时即在六十年代的中期，也没有以界牌实地标明，从而不可能破坏吉尔吉斯人的土地领有。如果实际上发生了这种破坏，那么把它硬加在划分中国西部国界身上，并使它在

分裂吉尔吉斯人民族土地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都是没有任何实际根据的。《塔城议定书》签订以后不久，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沿边地方所产生的破坏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不是国界(在实际上，象我们所看到的，也没有设置界牌)。而应当认为是由于东干人叛乱在中国西部所产生的骚乱和风波。在这种纷扰时期，我国沿边吉尔吉斯人利用当时中国西部的无人管理状态，曾经冲入这个地区，劫掠当地的中国居民。

因此，产生了我国吉尔吉斯人前往中国而后来中国外族也前来我国领土的出国运动。我国和中国属民这种从一国前往另一国的互相越界，伴随着对沿边游牧居民的掠夺、杀害和甚至完全毁灭，不可避免会破坏草原边区吉尔吉斯人的土地领有，据熟悉当时边区事宜形势的人证明，在边区地方所有的吉尔吉斯牧区都彼此混合了和紊乱了。由此可见，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中所产生的混乱和无组织现象，按照它的来龙去脉来说，与划分国界问题毫无关联和共同之处。显然，成为这种根源的是东干人的叛乱，它使我国与中国西部毗邻领域的沿边各地的吉尔吉斯人牧区解体了和混乱了。这就很明显，假如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这个问题当时全然没有提出，那么无论如何关于领有和使用耕地与牧地的权利的纠纷和争论，也一定会由于上述我国吉尔吉斯人的出国运动，以及同察罕·克根属下的卡尔梅克人发生敌对冲突时(在本篇第一章内我已详细叙述)草原游牧居民所受到的蹂躏和毁灭而产生出来。

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即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沿边部分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实质上就是这样的。及时消除沿边吉尔吉斯人土地生活中这一切纠纷，尽可能不破坏民族的和经济的条件，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这以前刚刚签定了《塔城议定书》，按照该议定书已经根据《北京条约》确定了我国与中国

西部的确切国界，因此当所有这种风波和骚乱在国界上平息的时候，我认为，为了对受到破坏的吉尔吉斯土地领有恢复秩序，设立一些所谓组织委员会是有必要的。

这种措施在土耳其斯坦总督署内被采取了，在施行这个边区吉尔吉斯人新管理条例的时候，就在该边区设立了好几个组织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在行政关系上和在经济关系上都带来很大的好处，使地方当局了解游牧居民和定居人口的困难和需要，了解他们的土地制度。不容争辩，如果这种措施在西西伯利亚加以采用，在组织位于中国国界附近的斋桑和石山口县区的各乡，那么在各该委员会熟悉事务和搜集关于草原土地生产力、促进畜牧业发展的各种合用土地数量、大量的水利、牲畜数目和人口密度的确实材料下，——在给加入新成立的乡区和县区组织的一切帐篷主单位户分配冬季驻扎地点和夏季牧场方面未必会产生困难。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有吉尔吉斯草原的广阔场所和宽大地方，在吉尔吉斯人都可以利用的按照《北京条约》新取得的土地极为充足的条件下，不容置疑，在这样良好情况下并吸引确实了解草原及其游牧居民的人来办理这种事务，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的问题，必将摆脱旧有的混乱状态，而在巩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如果沿边各乡的吉尔吉斯人中间由于冬季驻扎地点也会产生一些微小的争端，那么所有这种误会，都经常可以在按照吉尔吉斯人与自己同氏族的和睦协定而为此所设立的会议上，没有任何困难地加以解决。这种措施在我署理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务的时候，以及我的各前任潘诺夫将军和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都曾不止一次地采用过，而且始终是导致了良好的结果。最复杂的纷争问题没有特别困难、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参加就很快地和睦地解决了。为了和睦地解决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的各种争端和误会，吉尔吉斯人会议的好处和合适性，也为著名精通吉尔吉斯人生活和东方中亚细亚的格里果利

耶夫教授所发表的声明所证实。据他的意见，在吉尔吉斯草原奠定秩序和治安的一系列办法中，最主要的是消除造成草原骚乱和游牧居民破产的绑架牲畜行为，为此而设立的苏丹管理人会议是审理双方的要求，并按照民族习惯来和解敌对的氏族①。

总而言之，据格里果利耶夫的意见，在吉尔吉斯人那里，按照民族习惯由选任的头目办理诉讼，在许多场合比起对他们采用我国侦查和审理程序是较为适宜的，因为我国的侦查审理程序总是在外族人中惹起对我国政府的不满②。

在签订《北京条约》以前，我国领域与中国领域的假定国界，在斋桑湖至塔尔巴哈台的地域内曾是塔梅尔塞克河。这个河的西面即我国领域的地区内，自古以来就有穆伦诺夫斯克的吉尔吉斯人在游牧。但是穆伦诺夫人的民族人口逐渐增长起来，他们的牲畜数量也增多了，那时他们从前所领有的牧地就不够用了。因此，穆伦诺夫人提出呈请，要求与他们一起游牧的托哈斯氏族的白支吉特吉尔吉斯人离去。应当说，约有一半的托哈斯人，即五个氏族具有自己的夏季牧场，一部分还有冬季的牧场，以及在中国领域内向中国人纳税的牧场。同时，托哈斯族希望保有自古以来属于它的在穆伦诺夫人中的一部分过冬地点；表示志愿加入俄国国籍。托哈斯人的请求不可能完全执行，理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正向中国人纳税，这样也就承认了自己是中国的属民。除此以外，他们转入俄国国籍后，想必不会放弃自己在中国领域内的地方。因此，潘诺夫将军为了避免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决定呈请只接受专在我国领域内游牧的那些托哈斯人，即五个氏族加入俄国国籍。其余的托哈斯人在穆伦诺夫人之间有自己的过冬地点的，都被特派部队

① 维谢洛夫斯基：《按照他的信件和著作来判断的弗·弗·格里果利耶夫》，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09页。

驱逐出假定国界，即到塔梅尔塞克河彼岸。在被驱逐的托哈斯人中也有巴伊巴拉科夫人氏族。在加入我国国籍的托哈斯人的五个部族中，江塞古尔一族拒绝了国籍。当时按照潘诺夫将军的命令，由托哈斯人的其他四个氏族成立一个托哈斯民族乡，并在塔尔巴哈台山中与穆伦诺夫民族乡分开拨给过冬地点。对于穆伦诺夫人拨给了从前与托哈斯人所共同占有的包括巴伊巴拉科夫族过冬地点在内的所有地方，以抵补他们所让出的地方。

被我国部队驱逐到中国境内即塔梅尔塞克河彼岸的巴伊巴拉科夫人，如上所述，在那里留到 1860 年底，后来又来到我国领域内游牧，并在穆伦诺夫人返回夏季牧地之前，占据了自己在穆伦诺夫人中旧日的过冬地点。但是，巴伊巴拉科夫人害怕再被武力把他们驱逐到塔梅尔塞克河彼岸，并由于在该河彼岸没有合用的牧场，又呈请接受他们加入俄国国籍。潘诺夫将军从自己方面对于因我国穆伦诺夫吉尔吉斯人的需要，而将从古以来属于巴伊巴拉科夫氏族的土地无偿地夺取过来，不认为是很公正的，同时考虑到接受他们入籍并保有属于他们的过冬地点，对于穆伦诺夫氏族将过于拥挤，便建议吉尔吉斯人经由新成立的（如上所述）托哈斯氏族乡的直接首长，接受巴伊巴拉科夫人加入他们中间，把他们乡里打算划归已往中国游牧的江塞古尔氏族的那些过冬地点拨给他们。也向巴伊巴拉科夫人宣布说，他们可以接受在托哈斯乡内所拨给他们的地方，而他们在穆伦诺夫人游牧区内所占据的过冬地点，要让给穆伦诺夫人，同时严格拘束巴伊巴拉科夫人，使他们在夏季不再前往中国境内，而同托哈斯人一起在我国领域内各地方游牧。

巴伊巴拉科夫氏族的吉尔吉斯人同意了这个建议，随同这种同意也请求接受他们加入俄国国籍，不久就被批准了。

研究上述潘诺夫将军的处理，不能不认为这样处理是有理由的。首先，在按照他的指示所设定的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组织中

令人注意到一种情况，即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区长官在对于穆伦诺夫人声明他们的牧地不足而发布任何最后命令之前，尽力深入调查此事的一切详细情况，并将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无论这个问题乍一看来是如何困难和复杂，在直接了解了所有事务情况时，就被导致完全良好的结局。吉尔吉斯人绝对服从地执行了州区长官的要求和指示，采用了彼此和睦协助的办法。在潘诺夫关于此事的许多措施中，还令人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在准许巴伊巴拉科夫加入我国国籍的呈请以前，潘诺夫预先关心搜集可能在自己氏族当中安置这些吉尔吉斯人的情报，并且取得这些氏族对接受巴伊巴拉科夫人加入其中的同意。在斋桑边区的沿边地区拨给他们相当数量的牧地时，责成巴伊巴拉科夫人负有不越入中国国界的义务。

由此可见，关于可能制止吉尔吉斯人越过国界的问题，早在六十年代之初就已经提出，而且在预先制定适合游牧居民需要的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的正确组织条件下，已经解决了。同时，穆伦诺夫人关于在他们的牧区扩大牧地的请求，也完全如愿地得到了满足。

从上面所叙述的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关于国界使吉尔吉斯人氏族分离问题的一切意见的详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这种分离在实际上也存在的话，那么它不是因为划分中国西部国界而产生的。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的破坏，象我们所看到的，是因东干人的叛乱、卡尔梅克人的掠夺，特别是察罕·克根为首的卡尔梅克人大群对于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的毁灭所引起的。如果这种破坏对于沿边 吉尔吉斯人的经济生活有 了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一切不适宜之处都是预先可以见到的，并可以采取相应的办法来及时加以消除的。西西伯利亚官长也把斋桑边区同我国沿边吉尔吉斯人越入中国西部邻接地方游牧之事，归入根据《北京条

约》签订的《塔城议定书》中的中国西部国界的不正常现象之列。在吉尔吉斯人的任何这种出国运动中，边区官长总是说成这种运动是因《塔城议定书》所定国界的不适宜而引起的。为了详细分析这种对于《塔城议定书》的新指摘的正确程度和理由的充足程度问题，必须预先说明，推动我国吉尔吉斯人擅自越界前往中国境内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并于同时也指出消除这种出国运动的方法。

吉尔吉斯各村庄和各乡的换地游牧是草原上的通常现象。只有草原才能牧养牲畜，因此必须保持牲畜全年都有牧草，也就需要从一个地方移往另一个地方。因此，由需要所引起的换地游牧部族在畜牧经济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游牧活动只有在冬季到来以前，才可以畅行无阻，因为到了冬季，吉尔吉斯人由于必需应当停止自己的换地游牧，而在整个冬季安置在同一个地方，即冬季驻扎地点或过冬处所（克斯套）。由此可见，选作过冬处所的地方，必须具有在整个冬季从雪地下取得牧草，养育吉尔吉斯人牲畜的一切便利。如果过冬处所的土壤是有生产能力的，即在该处和附近的土地上具有良好的牧草，那么吉尔吉斯人在夏季就没有必要离开过冬处所换地游牧。反之，如果过冬处所的地方在冬季有适合于喂养牲畜的牧草，那么吉尔吉斯人由于需要，就不得不从冬季的驻扎地点移往夏季牧地。由此可见，游牧的活动是完全以过冬处所土壤的生产能力大小为转移的。这种情况在图尔盖斯克州和同它相邻的阿克摩林斯克州的吉尔吉斯人移动幅度中，得到了明显的确证。例如，据曾任图尔盖斯克州省长对于此事有充分机会确实了解的根斯说："该州伊列茨克县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县的吉尔吉斯人由于地方的出产能力大，整个夏季的移动游牧，离开自己的过冬处所不超过五十俄里。图尔盖斯克州南部各县的吉尔吉斯人，因为那些地方在酷暑的夏季成为郁闷的使人困倦的荒漠，每年换地游牧在一千俄里以上，为了在炎暑到来以前越过这个荒漠地带，他

们在二、三月间就开始离开冬季的驻扎地点”①。草原总督管辖的同它相邻的阿克摩林斯克州南部地方也是这样，在那里游牧的吉尔吉斯人每年越过楚河，前往土耳其斯坦边区的塞尔·达里英斯克州境内换地游牧，在那里为取得使用牧地的权利，对塞尔·达里英斯克的吉尔吉斯人约定按每百头大牲畜付给一定数目的绵羊，折合现款为五千到一万五千卢布②。政府本身认识到，这种换地游牧在游牧民族生活所特有的经济制度下，是吉尔吉斯草原的一种根本上不可避免的现象，违反了它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会使牲畜没有饲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草地居民破产。因此，政府认为可以准许吉尔吉斯人换地游牧，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远离过冬处所有很大距离的地方。例如，乌拉尔斯克、土尔盖斯克、阿克摩林斯克和谢米巴拉丁斯克各州管理条例（第218条附注）准许塞尔·达里英斯克吉尔吉斯人在夏季游牧时移入奥伦堡州。塞尔·达里英斯克人在这种换地游牧的时候，曾来到特罗伊茨克，即远离自己经常牧地——土耳其斯坦边区冬季驻扎地点二千俄国之处。

上述在我国境内所发生的远方换地游牧，属于内部游牧移动的范围。吉尔吉斯人采取这种换地游牧，如我们所见，是在草原游牧居民所占据的冬季驻扎地点生产不富足的时候。现在再来研究迫使我国吉尔吉斯人越过国界在中国境内游牧的情况。

在往昔时代，尽管当时有从乌拉尔到中国西部国界这样幅员广大的，并专为游牧居民所占据的吉尔吉斯各草原的辽阔地方，吉尔吉斯人无法遏止地趋向东方，好象有一种什么天然的力量在吸引似的。从我在上面详加叙述的这种运动可以看出，吉尔吉斯人

---

① 根斯：《文艺作品集》，第二卷，第569—571页。

② 什米德特：《西西伯利亚阿克摩林斯克州的吉尔吉斯草原概况》，地理学会报告，第十七卷，第二册，第119页。

在乾隆皇帝在位时代(1736—1796 年)，不难越过当时以中国常设卡伦的假定界限来标明的中国西部国界，并进入距离自己经常驻扎地点千百俄里的中国准噶尔内部。但是吉尔吉斯人这种发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大规模越过国界远距离的流动，到本世纪末叶已经减少了，如果还有这种事情，那么主要是因牧草歉收所引起的很难得的例外。

在东干人叛乱时期，我国沿边吉尔吉斯人的出国流入中国境内，如上所述，实质上是由吉尔吉斯人所固有的猖狂欲望和贪暴癖好所引起的。在物质方面，我们没有因为这种迁移游牧而失去什么东西。多数迁移游牧的人是按照《北京条约》刚刚归入我国国籍，还没有宣誓和没有纳税的沿边吉尔吉斯人。所有这些吉尔吉斯人差不多都已完全返回我国境内了。与吉尔吉斯人从我国境内越界游牧同时，在中国西部相邻各省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外族中，发生了出国流入我国境内的情形。例如，从 1867—1881 年土耳其斯坦总督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在1867—1877年时期，从边区出国游牧的有三千八百九十四个帐篷，而移入边区的有六千六百三十八个帐篷。

据报告说，所有这些出国游牧和入境游牧都具有偶然的性质，没有特别重要关系。对于吉尔吉斯人越界出国的这种看法，不能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从上面所引叙的关于吉尔吉斯人越界换地游牧的实际情报可以作出结论，在多数场合，吉尔吉斯人的这种换地游牧，是由于那种有时完全改变了吉尔吉斯草原的正常气候的不良天气和气象极端恶劣情况而陷入绝境所引起的特殊现象。有时由于炎热而发生全部草本植物毁灭的事情，据诺西洛夫说，1902年夏季有过这种情形，当时吉尔吉斯草原的炎热达到四十度以上，草原的土地热得象烧红了的石头，而草本植物象被火烧的一样枯萎了，干旱笼罩了直

到南阿尔泰山前的全部额尔齐斯广大地域。但是除了牧草歉收和天气干旱，象我们所看到的，引起吉尔吉斯人的越界游牧以外，看来他们在吉尔吉斯草原气候所固有的一般正常气象条件下，即在游牧地区主要是过冬处所的土壤产量很差的时候，也可能采取这种出国运动。这时，吉尔吉斯人常是迫不得已分用土尔盖斯克州和阿克摩林斯克州南部各县游牧居民的这种换地游牧地方。但是应当看到，这个情况对于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沿边部分是一种否定的条件，因为在这里没有这样广阔的，同时又是接连不断的无森林的空旷地域，象在上述两州南部各县所看到的那样，在那里的植物，据根斯说，处处是贫乏的和蔫萎的，主要是生长在洼地和林间隙地。酷暑的夏季在这种郁闷的和使人困倦的荒漠里，不仅人和畜群不能生活，而且甚至单独的骑士也不是经常在某些方面能安全地通过①。

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内，如果也遇有一些不大的出产贫乏的地区，那么它们是分散的，对远途游牧无论如何不会有任何影响。因此除了上面所引叙的非常情况外，即在草原上正常的气候气象条件下，沿边的谢米巴拉丁斯克吉尔吉斯人没有任何原因采取这种远途的换地游牧，尤其是越过国界在中国境内游牧。但是，如果这种换地游牧在实际上仍旧存在，而且是在草原气候正常的天气条件下，那末其原因就应当在那些不可抗拒地影响到这种换地游牧的、无休止地迫使我国吉尔吉斯人实行这种越界出国运动的其他旁的情况中去找寻。如果对问题作更加深入的思考，那么不可不讨论一下它与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制的联系。我在上面已经详细说明，在六十年代卡尔梅克人劫掠和东干人叛乱之后，斋桑边区的土地领有受到了完全的破坏。当这种骚乱平息下来，也

① 根斯：《文艺作品集》，第二卷，第569页。

已将同中国西部的国界按照《塔城议定书》确实地划定了的时候，我们始终是有充分的机会，在民众中最有权势和享有充分信任阶层的吉尔吉斯人的参加下，并借助于熟悉草原和居民的干练的公职人员来弄清这个问题。管理草原州区的潘诺夫和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就是这样做了的。经验证明，他们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和有根据的。

最后，在这种场合，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1868年吉尔吉斯草原各州管理条例明白地规定，为了在斋桑边区奠定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的坚强组织，应当如何办理。该项条例中一般规定的那些办法的详细发展，可以用那种象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以及根斯在同类场合所发布的特别训令来加以规定。这两个训令都可以成为在这类情况下加以遵循的有教益意义的范例。上述潘诺夫将军关于分拨牧畜地点给科克佩克钦斯克地区白支吉特氏族——穆伦诺夫人和巴伊巴拉科夫人等沿边吉尔吉斯人，并使他们负有义务不得越入中国境内游牧的命令，也应当承认是同样有教益意义的。但是尽管这种范例是如何有教益意义，对它们却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而且把吉尔吉斯人的事务也往往委托给不了解边区的人员办理。例如，在接受斋桑边区吉尔吉斯人归入俄国国籍，并在他们那里实行我国管理，以及在新合并的边区，正确组织在这个边区发生骚乱和风波时期所破坏的吉尔吉斯人的土地领有以后，这种有国家重要意义的事宜，竟交给了在这以前刚刚来到边区、不了解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草原的赫鲁晓夫这一班人们。可是，在这种场合，通晓事务的公职人员是可能提供很大好处的。根斯举出了彻底了解边区并全面研究吉尔吉斯人使用土地以及这个民族生活条件的人员，在吉尔吉斯人中间所具有的那种重要的权威意义的几个实例。这种人员在草原上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作为公断员，调解争讼的双方、阻止绑架牲畜并审理家庭案件。据根斯说，属于这种在奥伦

堡管区各草原享有民众充分信任和尊敬的人员有：土尔盖斯克县县长亚科夫列夫上校和彼得罗夫斯克县县长——邦恰·奥斯莫洛夫斯基（吉尔吉斯人为了审理争讼从希瓦和布哈拉来到彼得罗夫斯基要塞地方去见他，而奥斯莫洛夫斯基的判决和劝告，都为吉尔吉斯人断然地和最后地接受了）①。在西西伯利亚，在戈尔恰科夫公爵时期，享有这种声誉的是哥萨克军官纽哈洛夫，他同时是为吉尔吉斯盗匪所害怕的人。根斯还指出，在吉尔吉斯人分配夏季和冬季牧地时，即在吉尔吉斯人使用土地问题上，甚至在最困难的场合都能够把问题弄清楚。例如，据他说，土尔盖斯克州南部各县的吉尔吉斯人被迫于夏季向北方换地游牧，曾出现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伊列茨克各县的吉尔吉斯人牧区。从南方前来游牧的人，带同自己的畜群在伊列茨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吉尔吉斯人的过冬处所游牧，践踏了草地和耕地，毁灭已经割好的干草和夏季灌木。为了消除这种混乱，同时不损害前来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和维持行政管理秩序，根斯曾认为有益的办法是，各县长搜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详细的情报，并细致地询问了解情况的吉尔吉斯人，用什么办法可以保护伊列茨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吉尔吉斯人的过冬处所，避免外来畜群（有时是故意被赶向耕地、刈草地和草地）所造成的毁灭②。这种意见不能不认为是正确的，它提供充分机会找到合理的暂时的协议，并借此消除吉尔吉斯土地领有中的一切混乱现象。由此可见，西西伯利亚边区官长遵循上面已经详细叙述的理由，始终有机会把邻接斋桑边区中国国界上由于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的不正常情况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命令斋桑边区的吉尔吉斯人以和解的方法平息下来。

---

① 根斯：《文艺作品集》，第二卷，第606页。

② 同上书，第582页。

不容置疑，如果及时就边区吉尔吉斯人中间正确分配过冬地点的问题作出一切处理，并解决他们的一切土地争讼，在这些吉尔吉斯人中间就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和纠纷，以及出国游牧的情事。但是，如果出国换地游牧在实际上也发生了，而且是在草原气候的正常条件下，那么这应当归咎于那些最直接的边区行政管理人员不善于处理事务。可以说，边区官长不去采取及时的和应有的办法来千方百计地阻止吉尔吉斯人越过国界，就是自己造成了和引起了这种越界游牧。为了说明和确证这种情况，只须指出在1868—1875年时期接受中国吉尔吉斯人加入俄国国籍一事就足够了。1870年，土耳其斯坦总督曾呈请接受前来土耳其斯坦边区地区游牧的塞布拉特人四百个帐篷加入俄国国籍。塞布拉特人向土耳其斯坦长官提出这种请求以后，就离开了土耳其斯坦边区。结果，在考夫曼总督奉到皇帝批准塞布拉特人加入俄国国籍时，他们已经不在土耳其斯坦，而在斋桑县出现了。但是，如果塞布拉特人前往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草原换地游牧是任意进行的，没有经过土耳其斯坦边区和西西伯利亚主要长官之间的预先协议，那么把他们留在斋桑县居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应当打发这些游牧人返回土耳其斯坦边区，在那里的吉尔吉斯人中间居住，何况接受他们加入俄国国籍这个问题，就是土耳其斯坦长官所提出的，而塞布拉特人却被留在斋桑县内了。无论如何，在使塞布拉特人在这个县内居住之前，当地边区官长应当搜集情报：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吉尔吉斯人，从前他们在什么地方游牧，他们对我国政府的态度是怎样的，什么情况迫使他们请求接受加入俄国国籍，这种接受入籍是否违反与中国所订的现行条约，特别是《塔城议定书》第五条，而要紧的是，为了安置他们夏季牧场，尤其是冬季的驻扎地点，在斋桑县我国吉尔吉斯人的游牧份地内有没有空闲地方，斋桑县吉尔吉斯人是否同意接受塞布拉特人加入自己行列。看来，没有搜集这些情

报，而四百个帐篷的塞布拉特人就按照地方长官所发布的命令，被安置在斋桑县的吉尔吉斯人中间了。在这次安置之后，当地边区长官又准许接受约二百个帐篷的塞布拉特人加入俄国国籍。

在斋桑县区内使很大部分的塞布拉特吉尔吉斯人居住下来，而不在接受加入我国国籍的合法性上加以任何考虑，主要是考虑在我国边区吉尔吉斯人中间安置这些新属民的可能性，因为没有这种安置，吉尔吉斯人由于在国界上移入哥萨克人居民点，在自己领有的土地上就已经够拥挤的了，这样做从经济角度来看，未必能够证明是对的。这不可避免地会使我国吉尔吉斯人受到排挤，而由于禁止石山口县区的吉尔吉斯人在阿尔泰山区游牧，这种排挤更加重了。在自己的牧地上受到排挤，遇到牧草歉收和干旱的时候，吉尔吉斯人便自然而然地力求找寻广大的地域，并越过国界前往中国境内，在那里他们的一部分人借口我国牧地不够而开垦耕地，另一部分则从塔尔巴哈台山岭下来到埃米利河盆地，逐渐向东方移动，在中国准噶尔地区的贾阿尔河，即距离我国国界一百俄里的地方停留下来。

上述我国边区吉尔吉斯人出境前往中国领域游牧，具有双重不便之处。在各个村庄的每次这种出国游牧的时候，他们的地方立刻就被留在我国境内的吉尔吉斯人任意占据了，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牧群，为自己两三个帐篷而强占的地方面积足够安插整个村庄之用。这种情况也就成为吉尔吉斯人之间互相不满和冲突的原因。其次，出境前往中国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如后来所查明的，被中国当局课以重役。我国的吉尔吉斯人向我国缴纳帐篷税，向中国人缴付牧地使用费，最后如上所述，还要担负中国人对他们所课的赋役，当时犹如处于两属人的地位。

因此，六十年代之初，在斋桑边区存在完全不确定的国界时，大大地便利了我国吉尔吉斯人越过大致假定的国界线，前往中国

境内游牧，这种出国游牧没有在这样广大的范围内进行，象后来在七十年代所实行的。吉尔吉斯人出国的这样增加，看来是因我们自己预防不周而产生的。如果在刚一接受斋桑吉尔吉斯人加入我国国籍的时候，就在这个边区规定正确组织的游牧土地领有，那么非因极端困迫所引起的吉尔吉斯人的出境游牧，自然而然地就会消除。至于实行监督，使他们将来不再重复发生，那不会是困难的，因为在国界上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派设一整列的强力部队。经常地和坚定不移地追求这个目的，即不容许沿边吉尔吉斯人出境前往中国领域游牧，就会逐渐使他们养成可以在我国境内牧区范围之内进行游牧的思想。可是七十年代的边区官长对于此事持有另一种见解。尽管按照《北京条约》已经有大量的吉尔吉斯人归入我国国籍，我们还是用一切办法继续扩大这个数目，而不考虑当时的条件和斋桑吉尔吉斯人经济生活的要求。在这种关系上的数目扩大已经达到这样程度，当地州区长官曾于1871年呈请接受经常在中国境内游牧的基列耶夫吉尔吉斯人五百个帐篷加入俄国国籍。为了增加村庄的征税，而尽可能多地接受帐篷加入俄国国籍，看来只是追求目的，毫不考虑是否可能安置这样大量的新属民，而不排挤我国吉尔吉斯人按照产业的规模和牲畜数目去使用牧地，以及一般地不破坏他们的经济生活。这个目的，正如经验所表明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吉尔吉斯人一点也没有被集中起来，而且恰好相反，被驱散于我国国境之外。因此，在中国西部的国界上不能形成各外族与俄国人的密切关系，象在我国与中国的东部国界上好久以来就已经确立的那样。据完全熟悉边区并认真研究外族问题的人说，在东西伯利亚，地方长官能使外族依附自己。这种办法有好的一方面，即边区的外族永远是很好的皮毛实物税的缴纳人，而且经营农业。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东西伯利亚的外族同我们住惯了和交好了，并有整个氏族从蒙古转向我国方

面①。

例如在1730—1731年，曾有三千八百三十九户从蒙古迁到俄国来。这种蒙古人出国前来我国境内，在十八世纪之初规模极大，结果不得不阻止他们继续移住，因为在我国境内地区已经难于安置他们，尤其是接受他们加入俄国国籍，是直接违反我国与中国人签订的条约的。因此，东西伯利亚边区长官曾采取办法，使蒙古人返回中国境内。

当西西伯利亚的外族人被驱散和在他们之间形成隔离的时候，在东西伯利亚的一部分俄国居民却由外族中前来的人得到补充，他们逐渐与俄国人融合在一起了。分析上述一切加以考虑，关于吉尔吉斯人出境游牧，总起来说应当得出结论，这种运动是边区长官自己造成的，他没有关心在斋桑和库尔楚姆边区实施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和土地使用的正确组织。其次，在继续接受各种吉尔吉斯人氏族从外国归入我国国籍，并把他们安置在斋桑县地区时，没有注意到边区地方情况和经济性质的条件，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安置。

引起斋桑吉尔吉斯人在正常气候条件下出国游牧的主要和重大原因，就是这样。这种原因与划定中国西部国界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把这个国界说成是引起吉尔吉斯人出国游牧的主要原因，象持反对意见人所作的那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种意见甚至从理论观点来看，也是很奇怪的。在畜牧部族所居住地方划定确切的国界，除了非常的情况以外，应当使草原上的游牧居民不越出国界。无定的国界提供更广泛的自由场所和更多的原因，使人任意地和完全没有惩罚地越出国界，从一国前往他国，而且总是成为国界上发生骚乱的原因。

---

① 罗文斯基：《东西伯利亚概要。古代和新俄罗斯》，第73页。

最后，当地边区长官借口说，《北京条约》和《塔城议定书》所定国界线对于吉尔吉斯人出国游牧发生不便，显然不能成立。除了上面已经详细叙述的一切以外，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确证，即从前的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各位军政省长潘诺夫和科尔帕科夫斯基，从来没有提出中国西部国界的任何不便的意见。试问：为什么在1868年以后，在中国西部国界的情况看来并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却开始提出声明，说边区纠纷的原因是由《北京条约》所定国界的不便产生的。这种声明之不能成立，除了徒托空言和毫无论证以外，尤其是在于当时谢米列钦斯克州的长官没有提出关于中国西部国界不便的任何批评，尽管谢米列钦斯克州的国界比起斋桑的国界来，由于分裂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几个民族，而处于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在东干人叛乱时期，这些民族如东干人、塔兰奇人和吉尔吉斯人都被国界分离开来了，并且其中每一个民族的一部分留在中国境内，而另一部分却在俄国境内，可是并没有因此看到特别重要的不便。恰好相反，按照科斯岑科的公正意见，由于一部分属于中国的东干人（八千八百零九人）迁入我国境内，正如在上文已经详细说明的，我们甚至在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都得到了利益。这种情况清楚证明，谢米列钦斯克州的长官始终是充分认真地了解到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的边区地方条件，并很好地研究了游牧居民的生活与需要的。

从上述的关于吉尔吉斯人出国游牧的一切说明中，应当得出结论说，越界换地游牧是暂时的和偶然的现象。这是吉尔吉斯人游牧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因此任何力求制止或限制不仅是越出国界，而且从同一州的一些县前往另一些县的这种换地游牧，都会动摇吉尔吉斯人的经济生活，并造成他们的完全破产。据根斯说，任何禁止土尔盖斯克州南部各县的吉尔吉斯人于夏季越过县界，前往北部的伊列茨基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各县换地游牧，都等于向在

这部分草原过冬，而夏季不能喂养畜群的五万个帐篷和二十万游牧居民判处死刑。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切，所以它准许这种换地游牧，象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准许越出总督管区的界限去游牧。如果以合法的方式准许在我们本国境内的远方换地游牧，那么禁止或者阻碍我国吉尔吉斯人进行不是远距离的（哪怕是出国的）换地游牧，那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特别是在草原游牧居民由于非常干旱，牧草歉收，无法养育牲畜而陷入无出路的状况时。并且，所有因暂时需要利用国外牧地而曾往中国境内游牧的我国吉尔吉斯人，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总是返回我国境内的。在这种场合，问题由于那种情况而复杂化了，即按照过去的实例判断，在我国吉尔吉斯人越过国界之后，可能发生他们与中国外族之间的冲突，而这就会引起中国地方当局方面的抗议。为了防止这一点，可能采取的办法是，在我国草原边区由于牧草歉收和无法养育牲畜，吉尔吉斯人陷入无出路的境地，他们为了救护畜群必须无论如何要越入中国境内，以便利用该处牧地的时候，那么这种事情可以用外交方法与中国当地长官预先协商办理，并且必须经由我国驻塔城领事的中间介绍。至少，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当享有塔城参赞大臣锡霖无限信任和特别好感的尼·尼·巴尔卡申充任领事的时候，是可以与中国人达成一切所需要的事情的。因此，在中国境内的一定地区暂时拨出牧地供我国吉尔吉斯人使用，对此付给中常的报酬，是不会遇到任何困难的。阿克摩林斯克州的我国吉尔吉斯人预先付给一定的费用，在塞尔·达里英斯克州的吉尔吉斯人那里享有这样牧地，象我们所看到的，从很早时期起就已经定下来了，并且对于换地游牧也没有引起特别不便之处。如果持反对意见的人和当地长官对这种换地游牧赋予特殊的重要意义，那么这就表明很少了解吉尔吉斯民族的内部生活。不可不看到，吉尔吉斯人的生活是在完全另一种的天然条件和特点的影响下形成的，与文

明民族的生活截然不同。因此，在管理吉尔吉斯人的事务中，对于吉尔吉斯人生活的一些表现，从我们的观点来作出任何的判断，就会是错误的。例如，国界使吉尔吉斯人的一些家族分离开来（持反对意见的人始终指出这一点，并赋予重要意义），乍一看来，可能显得不正常，但是，这只是在理论上，而在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吉尔吉斯人那里认为是平平常常的，他们一点也不感到为难。

因此，甚至在现时，在根据1881年《彼得堡条约》确定国界以后，斋桑边区的吉尔吉斯人那里也往往遇到分离的家族。例如，父亲列入俄国，而儿子却在中国；一个弟兄在中国，而另一个则必须在俄国；有两个妻子的人——一个认为是中国属民，也就住在那里①。除此以外，在这里也看到具有非常特殊性质的其他现象，即在夏季的时候，两国的沿边吉尔吉斯人都集合在一起②。因此，要弄清楚从古以来在吉尔吉斯人那里已经形成的吉尔吉斯人越过国界和其他沿边违法行为，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因此就很清楚，上述中国国界上的不正常现象，是来源于许多世纪形成的吉尔吉斯人游牧生活的特殊的生活特点，这种不正常现象成为一种通常的现象，对于他们并没有什么困难和压迫，要把它比作对这些吉尔吉斯人好象负担极重的那样的不便，——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对于沿边的越界换地游牧，也同样不能赋予政治上的任何意义。卡兹纳科夫、麦谢里诺夫和科尔帕科夫斯基各位总督都认为，吉尔吉斯人的这种出国运动只具有地方意义。外交部始终同意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但是在赫鲁晓夫任内对于这一问题有了不同的看法。一切不正常现象、紊乱和纠纷，都认为是《塔城议定书》所定国界的不便所造成。总而言之，《塔城议定书》在所有这些场合都扮演了

① 《谢米巴拉丁斯克报》，1904年，第76号，《斋桑城》。

② 同上刊，第78号，《斋桑城》。

替死鬼的角色。我们已经看到，边区长官的这种意见是徒托空言和没有任何坚定的准则的。可以确证这一点的情况是，在新任总督卡兹纳科夫任内，对于我国与中国的国界事宜有正确的看法，他不容许所属的官长对于国界的不便，象上文所叙述的，有徒托空言和不加思索的呈报，这种现象立刻就消灭了，而且没有再发生，尽管国界上的情形比起从前的时候来一点也没有变化。只是这一种情况就足以很好地证明，西西伯利亚长官把《塔城议定书》看做我国吉尔吉斯人前往中国境内的出国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不正确的和轻率的。全面综合研究上述关于我国吉尔吉斯人越过国界的理由，应当得出结论说，我国吉尔吉斯人的这种前往中国境内的出国运动问题，是将来的问题。在草原上游牧居民生活方式已经开始的变化中，成为显明标志的突出事实，顺便说说，乃是由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石山口县信耶稣教的吉尔吉斯人组成的农业新村。

在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波钦"村最后建成的时候，迁来了三十五户吉尔吉斯人，住在该村作为农民，并拨给土地[①]。因此，我们就亲眼看见发生了吉尔吉斯人农业上的转变，对于草原游牧居民来说，从他们所习惯的畜牧经济转变为新的经济生活方式，不论是怎样困难，但是迟早它在逐渐改变游牧生活现时条件的现代进步强大动机的压力之下，必然要完成的。现时的移民运动和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就是这样的转变。

边区长官把从斋桑城前往库尔楚姆和布赫塔尔明斯克边区的通行困难，也归入《北京条约》所定中国国界的不便之列。这种困难是在于肯杰尔利克河的河水泛滥和必须渡过黑额尔齐斯河，而在继续前进的时候，到斋桑湖北部必须侵犯中国领土和越过大阿尔泰山。为了避免这种困难，斋桑区警卫长应当采取绕行斋桑湖

① 《谢米巴拉丁斯克报》，1904年，第78号，第3页。

西侧的环行道路。边区长官对于斋桑警卫长的这种令人感动的关怀，是不可理解的。首先应当说，如果政府对于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切服务人员赋予享受加给薪金的权利，以及职务上的其他优厚待遇，那么它就有充分理由，要求服务人员在我国亚洲各边区的辽远和荒漠地方，处处都可以遇到的不良气候和其他地方条件之下执行他们的职务。但是在这个场合，斋桑警卫长可以完成前往库尔楚姆边区的行程而没有任何困难，尤其是没有任何的困苦。为此，应当从斋桑采取直接道路前往黑额尔齐斯河，在那里乘小船或渡船渡到右岸，然后采取直接道路前往库尔楚姆边区。这时必须横越斋桑湖东端的不大一段宽约三十俄里的中国领土。如果州区长官把这三十俄里的通行认为是侵犯中国领土，那么这显然应当属于1881年以前时期的事。在1881年，大家知道，已经批准了《彼得堡条约》，按照该约，国界在这个地方已经从斋桑湖向东推移到阿尔卡别克河。因此从这个时候，即1881年起，斋桑警卫长从斋桑城前往库尔楚姆和布赫塔尔明斯克边区的全部行程，都是完全在我国领域地区内通过的，从而也就谈不到什么侵犯中国领土。但是，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深入分析一下，那么就会发现，就是在1881年以前，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侵犯中国领土的情形。在我国亚洲各边区的边界与西部欧洲各国之间的国界毫无共同之处。严格来说，不可把亚洲的国界与欧洲的国界相提并论，不可象我们看待德国和法国的国界，或者法国和比利时的国界那样来看它。违反亚洲国界的行为经常发生，成了通常的现象。在广阔无边的西伯利亚地域上，在长达一万二千俄里的我国与中国国界上，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这些边区分布的少数军队，要保卫国界和加以监视都是有重大困难的。因此，沿边的监视极为薄弱，有些地方差不多是没有监视的。在保卫国界的这种不良条件下，地方的空旷和荒野的性质下，以及沿边外族的粗暴和半野蛮状态中，越过国界前往中

国境内而又返回，是到处不断发生的。我国和中国边区当局尽管采取了一切办法加以禁止，在实际上却都是无能为力的。事情竟达到这样地步，在属于中国领域的叶尼塞河上游地方，早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俄国的采金业主。据官方所编制的调查报告，分布在谢斯达·克姆河流域的和在中国境内的各金矿，从1838年到1881年，曾采得砂金四百六十四普特二十一俄磅，总值九百五十万卢布。

我国斋桑国界于七十年代毫无阻碍越过国界前往中国境内这方面，也是完全处于同样条件之下。在与斋桑湖接壤的地方和黑额尔齐斯河左岸的盆地，从春季开始，当这些地方出现不可思议数量的小蚊和虫类的时候，周围的吉尔吉斯人都携带自己的财产和畜群前往南阿尔泰山，在该处一直停留到深秋。在往昔时候，在这个地方的科布多管区的旧日中国卡伦，也迁往南阿尔泰山。因此，在草原部分的中国国界上，据涅多列佐夫的说法，没有一个苍蝇不违反我国和中国所属这个遥远边区草原治安的。可以说，在那里一到夏季，除了少数保卫耕地免受野猪和鹤糟蹋的人员以外，是没有一个人留下来的①。

但是，除此以外，中国政府本身，象上文已经详细叙述的，始终准许我们在当时（即《北京条约》签订以前）绝对属于中国领域的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上享有渔业的充分自由。如果中国地方长官无条件地准许我国哥萨克人的许多捕鱼组合进入自己境内，使他们在这个河流上自由航行和当家作主，不仅溯流而上直到卡巴河和布尔楚姆河河口，而且更向前进，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地方当局会禁止我国官长人员，从斋桑城通过黑额尔齐斯河沿着几十俄里宽的中国领土前往库尔楚姆边区。而且，在这种场合连

① 涅多列佐夫：《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所属渔业的历史叙述》，手稿。

这种抗议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即1881年以前，在东干人叛乱十分炽烈的时候，不仅在与斋桑边区接壤的中国西部地方，而且在中国西部的全部地域，已经没有中国政权的任何踪迹了。试问，西西伯利亚沿边官长是怎样吓唬了群众和赫鲁晓夫的，说中国人方面因侵犯他们的领土可能提出抗议，既然在那时根本没有什么人去提抗议。在1869年划定国界的时候，我亲自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我正是必须在这个地方作几次通行，曾经不止一次地带同哥萨克部队渡过黑额尔齐斯河。所有这些在中国领土上的往来，都是毫无阻难地进行的。因此，斋桑警卫长面临通行的这个全部地方，可以完全认为象是中立的地方。中国人自己也没有隐讳在这个地方没有中国政权的任何踪迹。北京政府向我国公使所作的声明确证了这一点，该项声明说，中国政府从自己这方面对于俄国部队在必须追击沿边外族匪帮而越界进行时，没有阻碍之处。

最后，我应当提一下，州区边界长官提出的上述意见，说斋桑警卫长的越界通行是侵犯中国领土，乃是自相矛盾的。州区长官在一个意见书中，把中国境内地区三十俄里的通行说成是侵犯中国领土；而在另一个意见书中（上一章已经详细叙述），却认为可以在中国境内调动部队，甚至在那里建筑堡垒。试问：为什么在一个场合不可侵犯中国领土，而在另一个场合又可以下决心去占据这个领土，而且没有任何充分根据的理由。

上述一切导致一个结论，地方州区长官的该项声明，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理论上的推测，那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二、额尔齐斯河、埃米利河和伊犁河三大河流的盆地，为国界所横断，它们的上游都处于我国国境之外

从上文所述在塔城和北京的谈判经过情形的详细概况可以看出，我国委员必须确切遵循《北京条约》的规定，即沿中国常设卡伦线划界，没有任何理由违反该项条约，把国界向东推进，使之离开

上述常设卡伦深入中国准噶尔内部，以便占领额尔齐斯、埃米利和伊犁各河流的上游，以及在塔尔巴哈台山脉和阿拉套山岭之间的地域拥有天然的国界。不可忘记，由于按照中国常设卡伦线划界，在吉尔吉斯草原东部有属于中国的广大幅员的土地划入我国领域之内。因此，外交部嘱托我国委员特别注意和坚持竭尽全力说服中国代表，接受常设卡伦线作为划分国界的基础，它正确地认为，通过这一点，全部国界问题取得良好结局的主要障碍，毫无疑义将被消除。我国各委员已经确切执行了外交部的这个指示，他们在许多持续很久的和极度使人疲倦的会议之后，终于达到使中国人按照常设卡伦线划分国界，因此保证了全部国界事宜对于我国的进一步的良好结局。但是由于中国卡伦线从北到南差不多是直线的，并且横断黑额尔齐斯河、埃米利河和伊犁河，那么按照《北京条约》符合于常设卡伦线的国界自然也一定横断这些河流。由此可见，如果保持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的意见，划分国界要永远不横断沿边地区的河流，而保有它们的上游，那就必须把我国的所有国界，不仅是亚洲的，而且还有俄国在欧洲的国界，都加以改定。试举长达五千俄里以上的中国东部国界为例。在这个国界与西部国界相衔接的地方，即在接近沙宾达巴哈界牌处，它具有人为的性质，横断了叶尼塞河。应当说，这个国界在叶尼塞河上游是由1727年8月20日的《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的。两国委员根据这个条约划分了国界，然后编成记录，在我们这方面由委员御前大臣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科雷切夫签了字。

按照这个根据《布连斯奇条约》的国界记录，国界在克姆·克姆奇克·鲍姆天然界限附近横断叶尼塞河。因此，叶尼塞河上游的全部流域地方不容争辩地都留在中国领域之内。为了使这个国界具有天然性质，必须把它移到叶尼塞河的发源地方，即移至唐努乌拉山脉，并将叶尼塞河上游的全部流域划入俄国领域之内。

在另一个地方，同一个中国东部国界横断了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它们的上游也都在中国境内。在我们西欧的国界上也可以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形。这个国界横断涅曼河，使它的下游部分留在普鲁士。甚至有这样一些场合，国界把一个河流在几个地方切断，例如维斯拉河，在上游是被我国与奥地利的国界所横断，而在下游则被我国与普鲁士的国界所横断。

上面所举出的事实清楚证明，中国西部国界横断上述三大河流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现象，而是象我们所看到的，在俄国的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界上都可以遇到的。在这个场合，为了使我们在中国西部的国界成圆形突出，必须把它向东推移一百俄里。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全部的中国准噶尔划归我国领域之内。对于这样强占中国领土，我国各委员没有受到委任。占据中国准噶尔，看来也完全不合俄国的利益和意图，关于这一点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三、斋桑湖平原是四通八达的

四、塔尔巴哈台与阿拉套山岭之间的国界，是便于通行的，没有天然界限

从所引叙的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的意见中，应当得出结论说，包围斋桑平原以及塔尔巴哈台与阿拉套山岭之间地区的国界的不便之处，是在于它是敞开的和便于通行的，从而在战争的时候将为进入我国境内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按照当时地图来判断这些地方，那么斋桑和塔尔巴哈台与阿拉套山之间的两处国界地区，看来是完全开放的，而主要是易于通行的，但只是在地图上……实际上斋桑国界迤东通往古城道路的中国领域的这个全部地方，具有另一种的性质，并不那么容易达到和便于通行，如象乍一看来的那样。按照我国著名的中亚细亚和中国旅行家普尔热瓦利斯基和姆·维·彼夫佐夫的最新调查研究，这个全部地方在地方地理关系上已经有了充分的说明。从

他们所编写的中国准噶尔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从南阿尔泰山向南，有一个在“大戈壁”名称下著名的广阔的大沙漠。在西方，大戈壁分为两个部分，它的北部伸延到乌伦古河与萨乌尔套山岭之间，进入我国境内，在黑额尔齐斯河左岸盆地与卡巴、别列泽克、阿尔卡别克和卡利吉尔各河流河口相对处形成充满散沙的难于通行的地方。在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所指出的另一个地方，即在塔尔巴哈台与阿拉套山岭之间，这一部分沙漠也在乌尔卡恰尔和巴尔鲁克山岭之间形成一条狭窄的沙漠地颈而进入我国境内①。其次，按照普尔热瓦利斯基的证明，从萨乌尔套山、乌伦古尔湖和乌伦古河起向南直至天山山脉，展开着一片广阔的准噶尔沙漠。沙漠的地层差不多到处布满尖锐的碎石，并且往往被一些已经干涸的雨水沟所穿过。春季的野草只是四处分散地能看到一些，而且丝毫也改变不了沙漠上那种单调的肮脏的灰黄色的背景。只能以气候的极端来表明季节；夏季的不堪忍受的炎热代替着冬季的严寒。准噶尔沙漠的不能通行和它的荒野的令人不快的性质，非常鲜明地表现在下述的一个情况中，甚至于1878年夏季和秋季，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石山口县逃往中国境内的吉尔吉斯人，尽管最初打算从布伦托海采取直接的道路前往古城，但是沙漠甚至对于他们也是这样地不可通行，以至逃亡者们迫不得已返回了乌伦古河，在那里度过了1878—1879年的冬季，由于牲畜没有饲料而遭到了可怕的灾难。

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与我国领域接壤地方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是广阔的沙漠，它的荒野和凄凉的自然环境，按照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正确意见，是与文明生活相敌对的。

由此可见，广阔的准噶尔沙漠毗连我国的斋桑国界，象是在吉

---

① 彼夫佐夫：《蒙古旅行记》，第103页。

尔吉斯草原的东北部围护我国的领域，成为它的保卫和安全的良好保证。

深入一些研究在亚洲各地方确立坚固和稳定的国界问题，不能不得到确信，没有水、草的四通八达的沙漠草原，比山岭更好地保卫着国界，正如弗洛林斯基教授所正确指出的，对此下文将详细说明。奇怪的是，拿破仑一世皇帝某时也曾表示过同样的想法。在研究国界的战略意义时，他说，成为这种国界的：或者是山岭，或者是大河，或者是不毛之地和广阔的草原。后者构成最困难的阻碍，山岭次之，大河为末①。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认为《北京条约》和《塔城议定书》所规定的国界，如上所述，是不便的，因为它没有在它的全段形成天然的界限，而且有些地方，例如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是四通八达的，似乎是便于通行的，因而提出了自己的国界方案。按照他们的意见，这个国界应当从天山山脉向北，沿着在东面和南面屏障伊宁地区的山岭而行（该山岭东南面与阿拉套山汇合）。继续前进，国界应当沿阿拉套山而行，转向巴尔鲁克、奥尔霍琼和萨乌尔套山岭，然后靠住乌伦古尔湖。所计划的国界从黑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东部折转下来以后，就在北方与南阿尔泰山连接起来。

这样一来，使国界沿着上述的山岭而行，我们就会同中国在它的西部领域内具有紧密的天然国界。

但是为了设定这样的天然国界，必须首先把全部的中国准噶尔，即塔尔巴哈台和伊犁省也都合并到我国的领域来。看来，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使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感到为难，他们不加思索地突然地决定了这种复杂繁难的国际问题。按照新国界草案编写

---

① 《拿破仑关于军事艺术、军事史和军事业务的原则、思想和意见》，见《军事丛书》，第四卷，第229页。

人的意见，当时，即1866年，在中国西部东干人叛乱正在极其炽烈的时候，在上述天然国界所标志的范围内占据这个边区，只用极微不足道的力量，甚至不发一枪就可以办到。这都好得很。但是问题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如何能够掌握不在我国政治势力范围之内的全部中国准噶尔地方呢，因为到后来的时候，我们连那个不仅处于我国势力之下，而且在我国政权掌管之中十年（即1871年—1883年）以上，并且已经实行了俄国管理的伊宁地区，也不能最后保持住。持反对意见的人，看来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从意图到执行不是永远只有一步，而有时它们之间分隔着一条鸿沟，因此，占领敌人的地方和把它保持在自己的权力之下，并不是一回事情。1871年，我国迅速地占领了伊宁城，而随后也占领了全部伊宁地区，就是这种情况的鲜明确证。占领了好几年之久，看来具有充分机会在这些地方修整国界，把它推进到从东方围护伊宁地区的山岭，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而到后来不得不把中亚细亚的这个可珍贵的，用普尔热瓦利斯基的话来说是，对于领有者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贸易方面重要意义的地方归还中国人。不但如此，由于这种原因所产生的纠纷和中国皇帝政府的无礼拒绝批准《利瓦吉亚条约》，差点儿没有引起我国与中国人的战争。

打算不发一枪地占领全部中国准噶尔地方，持反对意见的人所希望的是，采取这种和平的强占，我们只是和一些中国人（看来根斯是把他们认为不足介意的）打交道。但是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全部如意算盘中，忽视了一个永远应当记住的其他重要情况，即在我国与中国的一切冲突中，在中国人背后总是站着英国人。一句话，从中国让出象全部准噶尔这样大部分领土，未必能够不受欧洲列强的干涉。而且作这种强占的时候，我们也就因此引起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和德国的同样行动。看来，我国政府在讨论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东西伯利亚总督卡尔萨科夫提出的：把蒙古和

满洲这两个中国省区置于俄国庇护之下的完全同类问题时，就曾持有这样的见解。政府认为，我国对于此事的任何参与都会遇到欧洲各国的反抗行动，并且可能迫使它们占领中国的某一部分，或者是占据与中国为邻的朝鲜。

再以其他考虑补充这种意思，我应当说，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主张以我国军队占据中国准噶尔，还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即为了占据象中国准噶尔这样广阔地方所必需的军队，我国当时在西西伯利亚是全然没有的。所有当时在西西伯利亚地区和西伯利亚所管吉尔吉斯草原的空闲军队，都被派往土耳其斯坦边区，加强在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统率下在浩罕国前线行动的军队。在西西伯利亚只留驻一些军队，仅够执行地方勤务和在吉尔吉斯草原占领据点，以便同武装的哥萨克居民一起，有可能防止沿边吉尔吉斯人发生任何的敌对破坏行为和自由行动，以及不服从俄国政权的企图。在当时整个中国西部，甚至东土耳其斯坦都为中国属下伊斯兰教居民的叛乱所笼罩的骚乱时期，这种不安和风波在吉尔吉斯草原始终是可能发生的。

在当时西西伯利亚驻有这样微不足道数量的军队，我们没有任何可能对中国人与东干人的战斗给予帮助，甚至如果我国政府认为，这种办法对于我国对中国西部的进一步的意图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调动军队前来中国西部国界，由于路程遥远和当时在西西伯利亚完全没有修筑铁路，是有很大困难的，并且需要花费许多时间与巨大的费用。

在西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这种不安形势下，那里在我国武力的许多辉煌胜利之后，我们不得不确立和巩固我国在浩罕王国的政权，而同时在我国中亚细亚领域的东南部又出现了，按照根斯自己的话说，东干人伊斯兰教国家的可怕的怪影，在这个时候又提出准噶尔问题，未必是及时和适宜的。不能不看到，我国政府在这

个时候正在操心于镇压波兰的叛乱和绥靖高加索。在当时我们所处的那种情况下主张占据准噶尔，象根斯所提出的那样，就意味着要求做不能做到的事情。

无论如何，如果甚至设想到，我国迟早必须占领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以便在东方扩大我国中亚细亚的领域，尤其是这些地方，按照我国所有旅行家（特别是普尔热瓦利斯基）的一致证明，具有归附俄国的显著倾向，那么这些地方的并入我国领域之内——乃是将来的问题。因此在六十年代，在当时的形势下，把这个企图推延到另一个更加良好的时期，会是更加适宜的。

正当根斯教训我们说，在亚洲各地方应当把山岭认为是较好的自然国界的时候，弗洛林斯基教授却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在从事研究天然国界中，什么样的国界在我国亚洲边区的地形关系上是最优越的和有利的这一问题时，他得出结论说，广阔的沙漠地域，例如象戈壁草原那样，在亚洲各地方甚至比起头等的山岭来也是更加适宜的国界。按照他的意见，在与相邻国家划定国界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战略的条件，然后考虑平时国际关系的条件（交通、贸易）。为了满足这种或那种条件，应力求按照某种天然分界线划分国界，例如按照大河或山岭的方向。这种条件在与中国划分界线时完全遵照办理了（阿尔泰和萨彦岭，额尔古纳、阿穆尔和乌苏里江各河流）。这种国界在欧洲可以认为是很好的，但是对于中国的关系而言，可能有其他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战略关系上必须摆在首要地位的，而在欧洲是无人知道的一个自然界草原。草原作为战略防线具有如何的意义，在我们草原行军前往希瓦和捷金斯基沙漠绿洲的时候，我们确信了这一点。它比较海洋和山岭更能防止人数众多的大军的侵入。

西西伯利亚境内的现时的中国国界，是从黑额尔齐斯河起沿

阿尔泰山，然后沿萨彦岭而行的。在这山脉之外的南方，还绵亘着一些或多或少与大阿尔泰山平行的山岭，两大山脉之间存在着富饶的和供水充裕的许多盆地，以后可以安置很多的居民，但是暂时还为一些人数极少的游牧外族（乌梁海人、达尔哈特人和卡尔梅克人）所占据。在阿尔泰山支脉的南部山岭外面，是真正的几乎不可通行的戈壁大沙漠的开端，在西方形成一个楔形插入伊宁和塔城山岭盆地之间，向东而行，在乌里雅苏台附近通过直至库伦，再向前进达到呼伦池。由此可见，这个草原的旱海可以构成人口稠密的中国各省与西伯利亚之间的最天然的和稳固的分界地带。

把上面所引叙的弗罗林斯基教授关于我国亚洲边区最适宜的国界的意见，与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关于同一问题的意见对照一下，可以看出不仅是山岭，而且还有亚洲内部的沙漠地域，都可以成为对亚洲各地国界的更加可靠的保卫。从这个角度上看，斋桑平原的边界地方，以及位置在它的南方的塔尔巴哈台和阿拉套之间的全部地域，严格地说，在是否便于敌人入侵的意义上，不能称为是四通八达的，象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由此可见，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的我国国界从塔尔巴哈台山岭的南北两侧，虽然没有山岭围护，但是按照属于全中亚细亚最荒野和旷漠之列的毗邻中国准噶尔部分的地方特点来说，敌人军队是难以侵入斋桑边区境内的。

最后，不可忽视，阻挡敌人进一步的进攻，而且敌人要加以占领需要作很大的努力的山岭作为天然的和防卫的界线，所具有的意义主要是在防卫战争中。但是就是在这种场合，山岭也只能在开始时阻挡和妨碍敌人，而不能使他们停止进攻。要越过山岭总是可以找到通路的。因此，这种天然的国界不可能阻止坚决的敌人进攻。而且除此以外，高山峻岭在防御敌人从斋桑和塔城平原侵入我国与中国西部四通八达的国界来说，不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难道可以设想，大量的中国军队下决心在斋桑边区或埃米利河盆地对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军队要达到我国在亚洲内部领域的这个边区地方，必须在西部草本植物不生，而有些地方还没有良好饮水的完全沙漠地带，完成一千俄里以上的草原行军。而且中国人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没有任何好处在这方面作战，因为在这方面地区内不能遇到在政治、军事或贸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任何行动目标。根据这种情况，大概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即斋桑平原或埃米利河盆地，我们将只是同分布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塔尔巴哈台各省的中国地方军队打交道。中国人用这些军队未必敢于采取进攻行动。但是如果仍然发生了这样事情，那么他们在旷野与我国军队刚一交锋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打击。这种推测的可能性的根据是，中国地方军队，据领事巴甫林诺夫的情报，甚至不敢与游荡在蒙古和逼近乌里雅苏台的微不足道的一批东干人进行战斗。中国军队没有等到东干人来到，急忙预先退出乌里雅苏台，同自己的官长们退入蒙古草地。一般来说，中国军队尽管受有欧洲指挥官的教练，并配备完善的武器，但并不能成为我们的可怕的敌人，因为按照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正确意见，这种军队中没有养成军队战斗准备的、强大动力的、如所共知的道义因素。但是在这种场合等待中国人的进攻，从我国方面来说，那将会是重大的错误。一则中国军队接近我国国界，可能对我国边区游牧居民产生有害我国的精神影响；二则在同亚洲人的战争中，象经验所表明的，永远应当采取进攻的行动。不容怀疑，我们在中国西部国界也正是将这样行动，何况这种行动的好处，已经为1901年与中国人最近一次战争的经验所确实证明了的。

这一次战争的经验表明，主要的打击应当指向北京。为此目的，必须在北直隶湾实行强大陆战队的登陆，并于同时占领满洲全部。因此，在中国西部国界的军事行动应当具有次要的性质。但

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在这个战场上也应当采取进攻的行动。根据这种理由，集中在谢米列钦斯克国界的军队应当进攻伊宁，而集合在斋桑城的军队应当进攻塔城。在占领伊宁和塔城之后，应当从斋桑城派遣哥萨克快速部队占领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以便监视蒙古西部的中国人的行动。

初次可以只限于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从塔城和伊宁向东深入中国准噶尔，未必会对于我国特别有益，因为在这种以荒野和旷漠而著称的辽远地方，并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具有意义的任何行动目标，可以算作例外的只有一个哈密城，它沿着乌苏、玛纳斯、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的道路距离塔城有一千三百八十七俄里，距离伊宁为一千六百零六俄里。我国军队占领哈密之后，从中国内地通往东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塔尔巴哈台、伊犁各省的唯一道路，将被切断。关于在西部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我们是不是应当只限于占领伊宁和塔城，而不采取进一步的进攻占领哈密的问题，可以考虑北直隶和满洲战场军事行动的作战情况加以决定。至于从戈壁沙漠开始地方的哈密向东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从上述打算在中国西部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约略评述中可以得出结论，被大沙漠与中国内地隔离开来几千俄里的中国西部国界，应当认为是防止大量中国军队侵犯的完全有保证的国界。因此，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这个国界因为在它的东北部有两个地方四通八达，从而便于敌人侵入，所以有不适宜之处的意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可能采取这种侵入行动的，只有集合在塔城和杜尔布尔真堡垒的中国军队。但是上面已经说明，我们自己必须在中国西部国界上采取进攻行动，并一开始占领塔城，那么在该两处地区的国界四通八达部分，在这种场合就没有任何意义。恰好相反，这个四通八达的国界地方对我国有极其重要的好处，因为它大大地

便利了越过国界迅速进入中国境内。

确切划定最适宜的国界是具有国家重要意义的大事。因此，每个国家都关心到以尽可能具有天然性质的国界，来保障自己毗邻外国领域的边区，因为这种国界比较牢固和稳定。但是每一国家不论怎样愿望具有天然的国界，特别是在自己的亚洲边区，并且在它的全部长度上，象根斯和古特科夫斯基在自己的意见书中所提出的，而要在实际上实现这种意图，由于外交谈判时必然产生的政治性的各种各样复杂条件，是困难的。而且在亚洲各地方除了政治性的考虑以外，对于此事有影响的还有其他的重要情况，即国界的极大长度。例如，我国与中国的东部国界长达五千俄里，而西部的中国国界长度超过七千俄里。由此可见，我国与中国的国界全部长度达一万二千俄里的巨大数字①。整个这条国界在它的大部分长度上是由鲜明的天然界限标明的。例如，中国西部国界北起阿尔泰山，南至天山或天山山脉，形成差不多联绵不断的天然国界。如果这个国界，象持反对意见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在斋桑湖附近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和塔尔巴哈台与阿拉套之间地区是四通八达的，那么这个四通八达地域，象我们所看到的，在东方是由差不多连续不断的难于通行的沙漠地带来围护的，一般来说，这种沙漠大多是具有荒野和旷漠性质的中国准噶尔这一部分地方。可以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国界都没有象我国同中国国界这样长，因此象根斯那样坚持主张要使它全部都以连续不断的天然界限来标明，这就意味着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情。

据根斯说，中国的最近事件，即东干人叛乱，在我国与中国西部的国界上建立了伊斯兰教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受到相当强烈的宗教狂热所激励的。东干人组成了强大的国家以后，未必会放弃

---

① 佐洛塔列夫：《俄国边区军事地理概要》，第222页。

使俄国对于信仰正教的吉尔吉斯人失掉政权的机会，如果东干人在他们中间进行秘密的宗教宣传，那么我国在草原的地位可能是远非有利的。

根斯的这种意见只是单纯理论性的一种推测，没有任何实际的根据，是完全不合实际的。随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实际上切实了解东干人问题的并就地作过研究的人们的意见，都证实了这个结论。例如，按照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意见，尽管由于中国军队的怕死和腐败，东干人可能得到中国内部各省伊斯兰教居民方面的巨大支持，与中国人作战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东干人的叛乱不能达到稳固的政治成果。原因在于东干人是分成小股分开活动的，掠夺的所得是他们的主要诱惑物。

东干人方面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他们不了解，如果把那些也是仇恨中国人的蒙古人联络到自己方面，他们在与中国人的战斗中将会取得多么大的利益。可是，东干人在叛变之初，也象对中国人一样地消灭蒙古人。

上述的伊斯兰教武装反抗分子对中国叛乱的成功，只有在统一的领导下才是可能的。但是东干人没有做到这一点。所引叙的综合情况，使北京政府得从初次打击的创伤中恢复起来，然后转入了攻势①。

按照科斯岑科的意见，迁入我国境内即吉尔吉斯草原的，从而与吉尔吉斯人共同居住的东干人，是一种真正收获。他们加强了我国边区各州的垦殖因素，除此以外，在与中国人战争的时候，将组成可靠的民警队，对我国军队给予很大的帮助②。由此可见，科斯岑科所表示的关于东干人的意见，与上面所引叙的根斯的声明

---

① 普尔热瓦利斯基。

② 科斯岑科：《准噶尔》，第99页。

正好相反。而且，科斯岑科的意见在这种场合是更有根据的，因为它具有实际意义，并为随后的事件完全证实了的。这些事件的经验表明，在与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我国领域毗邻的中国西部各地方，成立独立的伊斯兰教领域，但统治人变换无常，类似塔兰奇统治人阿季尔·奥格拉，甚至象喀什噶尔统治人阿古柏伯克那样，不能认为对我国是特别危险的。在居民的涣散组织下，在缺乏政治特殊化的任何意图下和领导者的软弱无力情况下，这种领域是不能长久存在的①，就象它的产生一样，以同样快的程度垮台，而不留任何遗迹。

强大的和人口众多的伊斯兰教国家能在中国成立，只有在下述场合，即如果假定有可能，象瓦西里耶夫教授所认为的，整个中国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对于任何宗教的宣传都抱有一定的淡漠态度，这只能在遥远的未来才能成立。据根斯的意见，我们可以说处在中国西部各省改组为伊斯兰教国家的前夜的六十年代，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可能从该处渗入吉尔吉斯草原，并激动草原上的我国游牧居民。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结论是很令人怀疑的，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假定可能在我国国界附近成立这种伊斯兰教的领域，那么由于它没有为自己的独立生存和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任何坚强的素质，对我们不可能是特别危险的。

从上面所引叙的对根斯认为《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是不适宜的，必须换成他所计划的天然国界的意见的详细研究中可以看出，这种意见在实质上是具有某种急就的空想，即兴作品性质的一系列的理论上的抽象议论。在那个时候，即六十年代，象我在上文已经说明过的，关于西伯利亚有许多可说和可写的东西。

---

① 科斯岑科：《准噶尔》，第318页。

可惜，根斯关于边区特别是关于中国国界所作的观察，好象是作为一个走马观花的游览者，坐在四轮马车里游行吉尔吉斯草原时从望远镜里来看的。因此，他的关于边疆事务和一般地关于政治性问题的有些看法，甚至在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例如，根斯把科瓦列夫斯基在伊宁所签订的条约称为《塔尔巴哈台条约》，即《塔城条约》，并且没有任何根据把签订《塔城议定书》说成是扎哈罗夫领事一人的事，而且说成是在伊宁。可是，该项议定书的名称本身已经明白指出，它是在塔城签订的，而且不是扎哈罗夫一个人。被任命为划界委员的是戈卢别夫和我。只是在后来，按照我向亚洲司司长伊格纳提耶夫伯爵的个人申请，才任命扎哈罗夫为第三委员，同我一起签订了《塔城议定书》。显而易见，根斯把两个条约的签订地点混乱了：关于同中国西部各城市通商的《伊宁条约》——根斯把它称为《塔城条约》，关于划分国界的《塔城条约》——根斯称为《伊宁条约》。但是除了上述的歪曲事实以外，根斯表现出对于毗邻我国领域的蒙古西部地方的完全无知，断言科布多城是在黑额尔齐斯河上。可是，它是位置在布彦图河广阔盆地上距离该河右岸一俄里之处的。

最后，我还应当叙述一下维纽科夫所提出的关于《北京条约》所定中国西部国界的意见。按照他的意见，在签订条约时，我们在察林河右侧和黑额尔齐斯河左侧取得了对我国全然无用和从来不属于我国的土地。我国代表在划界时自然认为这些土地应当划归俄国，因为是它的属民的牧地。但是，这对问题不够明白了解。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在特克斯河、格根河和黑额尔齐斯河上的牧地，从来也没有以什么假定的或者甚至天然的界限加以划分；它们的界限是活动的和很不规则的曲折线，界线位置由于牧草状况和各游牧民族之间的约定等等，而逐年发生变化。因此，决不能把这种界线选作为两国之间的经常界限。而且也没有谁询问过游牧民

族，他们的界线在哪里，因此也就发生，例如在黑额尔齐斯河上国界切断了好几个氏族的牧地，对他们和对我们都大为不便。

“国界的外形线对于守卫是不利的，因为距离直接线即最短线有很大的偏差。在这种意义上特别不便的是1869年所取得的斋桑湖南面的一部分领土，因为要从三方面来保卫它，必须在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部队，而这个地方什么也不出产，从而任何时候也不会容纳大量的定居人口，用来保卫边区和有助于军用粮食价格的减低。”所有这些意见，象从下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的，都是没有根据的。首先令人注意到，维纽科夫对我国委员所持的那种考虑，认为他们全然没有这一回事。例如，他认为在向察林河东面划界时，我国委员似乎醉心于想以国界来包围我国所属吉尔吉斯人的牧地，而忽视了这些牧地的界限都是活动的。

难道可以认为在划界的时候，象戈卢别夫和扎哈罗夫，他们发表过关于中亚细亚和中国西部的地理与地图的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很好了解边疆地区，特别是曾经多方面通行过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的人，甚至对那种使吉尔吉斯人牧地的界限成为活动线的吉尔吉斯人土地领有制和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条件，都没有起码的知识。维纽科夫的这种见解显然表明他对于边疆事务的不够了解。他说出这种意见的时候，忽略了在划定中国西部国界时，象上文已经不止一次说明的，我国委员必须遵循《北京条约》和外交部的训令办事。根据条约，国界应该沿中国常设卡伦线西行。象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不同意这一点，因为国界采取这种方向对于他们是不利的。最后，在持续几年之久的长久争论和吵闹之后，我国委员得以达到使中国人同意沿常设卡伦线划界。很明显，如果我们经常坚持这种情况，即沿常设卡伦标明国界，那么在外伊犁边区最后确定国界方向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在这个地方也坚持这个原则。委员们也就是这样做了的，使国界沿着通往察林河东面的卡伦线走

向中国春济卡伦。从这里国界一直向南到特穆尔里克山岭，继续前进通过特克斯河上游走向天山山脉的巨大群山罕腾格里。

由此可见，在这个方向实行划界，使吉科卡门汗国勃沽氏族的吉尔吉斯牧区统一起来，乃是《北京条约》规定的合理结果，因为如上所述，按照该约国界必须沿着常设卡伦的方向而行。这样的国界方向比起沿察林河标明国界，象在第三篇已经详细叙述的，具有下列极其重要的好处：

（一）沿着从东方围护卡尔卡拉河和格根河上游地方的山岭，国界在两国之间形成天然界限，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巩固性和稳定性。同时，察林河的全部流域以及特克斯河上游具有优良牧地的地方，都归俄国领有；

（二）在上述地区范围内，按照我国委员所搜集的情报，具有银矿、铅矿和铁矿。为了开采这些矿产，在格根河上游地方设有铁矿厂和中国人已经开采的金矿。在这个地方的特穆尔里克山中发现了大理石、煤和盐的产地。最后，使国界由察林河向东而行对我国之所以有利，也还因为国界包括察林河全部流域以后，能避免国界沿着河道而行的不便。很明显，占有该河的全部流域较诸占有它的一岸，对于我国要有利得多。在这个问题上这种意见的正确性，后来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现时，关于河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适宜的国界的问题，在我国刊物上已经不止一次地作了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在与中国的最近一次战争终结以后很快就发生了，在战争时期阿穆尔地方发生的经济上的纠葛，表明沿阿穆尔河划界有若干不便之处。看来，无论怎样，这条河流构成俄国与中国之间广大长度的极好的天然国界，但是在实际上，这个国界也有若干不便之处。这些不便之处在于，阿穆尔河右岸，尽管按照条约是不属于我国的，但是在经济上却是倾向我国的。一般来说，对任何河流的左右两岸可以作政治上的划分，但是在经济上它们永远只

是构成一个整体的两半个①。

从上述说明可以得出结论，使国界在外伊犁边区东南部向春济卡伦而行，是我国委员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作出的，但是绝对不是象维纽科夫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统一吉尔吉斯人的牧地。而且这样划分国界，使我国所能领有的不仅是察林河的一个左岸，而是这个河流的全部流域，这就不容争辩地给我国带来重大的利益。鲜明地证实了这一情况的，是在这个地方现时已经产生了我国的繁荣居民点：春济、波德戈尔内新村、奥霍特尼奇和卡尔卡拉河上的村庄。可是维纽科夫却认为这些地方从来不属于我国，我国从来不需要。原来，他是自己祖国的一个很坏的预言家。

维纽科夫说按照《北京条约》把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南面的土地划归俄国，对于我国没有益处的意见，也是同样没有根据的。上面已经说过，使国界向斋桑湖的东北角而行，是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所作出的，该约规定，国界应当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向西南行，到斋桑湖。然后自然应当把国界引向中国常设卡伦线，根据同一条约，在这个地方应以常设卡伦线来标明国界。因此，各委员就使国界从黑额尔齐斯河河口开始，沿该河而上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在这里国界被引向中国常设卡伦线。很明显，这种国界方向也是《北京条约》规定的合理结果。试问，在1869年划定国界的委员，如何能够把位置在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南面的所有土地从中国划出和并入我国领土，而且再加上，象维纽科夫所说的，这些土地是谁也不需要的。维纽科夫说出这种意见，看来是忽略了我国委员应该按照《北京条约》的确切意义为根据的《塔城议定书》。既然应当在划定国界时遵循条约办事，他们就没有根据去研究完全不相干的问题：这些土地对于我国有没有需要，因为这些土地应

① 《新时代》，第9531号，1902年。

属哪一国家，已由条约作了明确规定。

由此可见，各委员在他们1869年划定国界的时候，只不过是条约的规定，主要是《北京条约》规定的执行人。看来，维纽科夫象其他持反对意见的人一样，认为各委员具有全权按照自己的意见变更条约的规定。这种情况表明，维纽科夫是完全不晓事务的。任何的，哪怕是稍微的背离条约，象上文已经详细说明过的，都是我国委员方面的重大政治错误。但是除此以外，按照国际关系的公认程序，在签订两国国界条约之后应当划定国界，即以界牌就地标明国界。然后编制国界记录。在这种记录中，应当指出所有界牌的名称并注明设置地点。例如，拉古津斯基伯爵于1727年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以后，从恰克图向西至沙宾达巴哈，曾委派委员御前大臣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科雷切夫设置界牌；向东方至额尔古纳河，由委员伊凡·格拉祖诺夫设定界牌。在这以后，双方委员编成了国界记录，当时称为土地划界办法。

在签订《北京条约》以后也是一样，曾经设置界牌和编制记录。东部国界界牌是由委员布达果斯基和杜尔宾设置的，而西部界牌是由我和穆罗姆佐夫设置的。

由此可知，我国委员只是负有执行的义务，即在这个场合，只是执行条约中已经预先规定和明确指出的事项。离开条约，尤其是违反条约，擅自作出任何的土地取得，而且是我国完全不需要的土地，委员们是没有权能的。在这种场合怪罪委员，那就等于我们对某种法律或章程的执行人由于他们曾经确切执行了这个法律或章程而追究其责任。如果这样来看委员们的职务，象维纽科夫所认为的，那就也应当怪罪1727年勘定中国国界的我国委员御前大臣科雷切夫，因为他确切遵循《布连斯奇条约》的规定，使国界在克姆·克姆奇克·鲍姆地方把叶尼塞河切断，而没有把国界推向南方，沿唐努乌拉山脉而行，并将叶尼塞河上游的全部流域划归俄

国。但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到在这一点上来怪罪科雷切夫。如果叶尼塞河上游地方留在中国领域内，那么在这一点上多半应当归罪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的拉古津斯基伯爵，因为该约明白规定国界在克姆·克姆奇克·鲍姆地方切断叶尼塞河。所引叙的实际材料，有充分根据作出结论，我国委员在设置界牌时可能负的责任只在于：他们是不是正确地在现地运用了条约的规定。外交部认为，象我们已经知道的，我国委员在划定中国西部国界时运用《北京条约》是正确的，是完全通晓事务来执行的。由于政府关于我国委员于1869年划界时的行动有这样评论，维纽科夫的一切反对意见自然落空，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除了上述一切，维纽科夫说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南面的全部地方从来是我们所不需要的不正确意见，还应当以下述理由加以反驳。把黑额尔齐斯河全部下游地方保持在我国政权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借此可能保证我国在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的渔业，这种渔业，大家知道，构成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经费的一宗收入。在黑额尔齐斯河下游的捕鱼量始终是最丰富的，大家知道，因为，鱼类是隐藏在河流的拐弯和弯曲之处的。

由此可见，上面所引叙的维纽科夫的意见，说这个地方，即黑额尔齐斯河左岸盆地和同它邻接的位置在斋桑湖南面的平原地方，从来不属于我国，永远不会为我国所需要，这是一种误解。这种意见尤其没有根据的是，现时到处听到抱怨声，说由于从俄国欧洲部分内地各省向吉尔吉斯草原大量移民，排挤了吉尔吉斯人的土地领有，所以在任何场合，草原土地的任何过剩都不可能是不需要的，而恰恰相反，是极其合乎愿望的。现在已经人所共知，移民浪潮的汹涌而来，已经占据了吉尔吉斯草原的一切空闲地区。这个汹涌而来的浪潮，正象所看到的那样，已经波及到草原东北部与中国西部接壤的沿边各地方，按照格·什穆尔洛所进行的非常认

真的和完全通晓事务的调查，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切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的俄国人涌向卡巴河的潮流。例如在1890年，在美丽如画的卡巴河的边区各地，已经有了三个在卡宾斯克名称下闻名的我国居民点。其中最大的一个居民点，拥有一所教育部直辖的一班制中等学校①。移住人开始从卡巴河更向南方深入，直至阿尔卡别克河的国界地方②。一般来说，现时所看到的移住人向吉尔吉斯草原的迅速涌现，象移民垦殖的实践所表明的，其原因是移住西伯利亚森林区较诸移住草原不那么情愿。草原地方尽管距离遥远和供水不足，还是争先恐后地被挑选了。移住人的涌现大大超过了地段的登记。草原土地较诸森林地方的这种优先选择，是与按照出发地点分配移民有密切关系的。构成移民多数的是从小俄罗斯各省出身的人，他们未必能胜任地与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困难条件作斗争③。

认为1869年划分国界把斋桑边区合并于俄国有不便之处，维纽科夫说，占领斋桑边区，我们显然犯了错误，因为把国界防线延长了二百七十五俄里，同时所合并的地方也不能补偿占领的费用，因为除了很少的例外，这些地方都是沙漠、盐碱地、秃山和游牧沼泽。

在维纽科夫这样评定边区之后，可能以为，按照《北京条约》并入俄国的，包括很大面积的（北方以那雷姆和布赫塔马河上游为界，南方以塔尔巴哈台山岭为界，西方以下额尔齐斯河、乔尔加河和塔梅尔塞克河为界）这个边区几乎全是由沙漠、盐碱地和游牧沼泽构成的，一句话，只是由一些什么也不出产的，同文明生活绝缘的，甚至是完全无人居住的，全是蒙古沙漠的土地构成的。但是在

① 《谢米巴拉丁斯克报》，1905年，第28号。

② 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第二十五卷，第47页和62页。

③ 《俄罗斯残废者》，1904年，第58号，西伯利亚。

实际上，这个地方容纳着大量的游牧居民，看来维纽科夫对此故意一字不提，尽管在他所素悉的《塔城议定书》第五条中明白规定："居民所在地划归何国，那里的居民连同土地就一并归入该国管辖。"也不可忽视，斋桑边区这个全部面积约达两万五千九百六十平方俄里，住有六万四千游牧人口。从这个人口的征收赋税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额，弥补边区管理的经费还有剩余。因此，如果这个地方能够维持和养活游牧人的为数众多的畜群，那它未必可以称作毫无出产的。

维纽科夫力求以斋桑边区的沙漠、盐碱地和秃山吓唬人，是枉费心机的。任何人，凡是稍微了解吉尔吉斯草原所特有的特殊气候与土壤条件的，都会知道，这些凄凉的和单调的，沙漠的和盐碱性的草地平原地区布满着芨芨草、灰牧草、蒿子、盐碱地草，即盐沼地植物，在畜牧部族的游牧生活中起着不少重要的作用，为绵羊和骆驼提供优良的饲料。春季，当太阳开始温暖和草类出现的时候，由于冬季缺乏饲料而疲惫不堪的牲畜，由于饲料中主要是盐碱地植物中所含有大量的盐，很快地恢复起来。"夏季走过这种地方"，根斯说道，"周围的一切都被晒焦，因而看来已经失去任何生机的时候，未必会相信这个裂了缝的盐碱泥土，这些散沙可以养活成千上万的畜群。"① 据列瓦涅夫斯基说，在路上遇到盐碱地，你就会惊奇，在这种荒凉的地方，生命有时会沸腾起来。在咸湖岸上到处出现着单峰骆驼与双峰骆驼夹杂相间的躯体②。据吉尔吉斯人说，在盐碱地上有时会遇到药草，例如分泌松香能治马鼻疽病的大茴香(Ferula)③。

---

① 根斯：《文艺作品集》，第二卷，第577页。

② 列瓦涅夫斯基：《亚洲的俄国》，见《地理图册》，《在吉尔吉斯草原上》，第301页。

③ 切尔马克：《荒瘠草原上旅途记闻》，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第二十七卷，第4页。

最后，斋桑区一带的盐碱地，按照植物的成分来说，比起荒瘠草原的盐碱地要丰富得多，甚至可能比起里海沿岸地区的盐碱地，也是更加丰富和更为奇异。盐碱地在这里大都位于从山岭流往泥沙平原的河口；在那里丛生着各种猪毛菜，一部分是本地所有的，但是大部分在边区全部南方盐碱地也可以遇到；在这里可以遇到同样的盐碱地的各种灌木植物。斋桑附近的盐沼地是沿岸沙滩之间的低地；常是丛生着芨芨草和芦苇[1]。

由此可见，斋桑边区的沙漠地和盐碱地，实际上完全不是象维纽科夫所描写的那样可怕和不出产东西的。

维纽科夫说到斋桑边区游牧沼泽的时候，大概指的是巨大的水池，即由克兹尔·奇利克蒂的地下泉水形成的沼泽，位置在为曼拉卡、萨乌尔套和塔尔巴哈台山岭及其分支从各方面包围起来的奇利克蒂盆地。克兹尔·奇利克蒂的这个多沼泽地方，在吉尔吉斯人的游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灌溉奇利克蒂盆地的坎迪·苏河是在其中发源的。河流的水和丰富的饲草——生长在吉尔吉斯人以科伊·贾乌名称而著名的位于克兹尔·奇利克蒂沼泽两侧的盐沼地上——构成绵羊和骆驼的优良饲料，始终吸引着白支吉特人后裔：塞布拉特、卡拉沙、科让和萨蒂的许多村庄来到这个地方。由此可见，吉尔吉斯草原的这些沼泽和水池，对于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起有良好的作用，为灌溉草原游牧地区的河流发源地，湿润土壤，有助于为维持吉尔吉斯人畜牧业所极其必需的饲草的生长。在这个场合，奇利克蒂盆地所具有的这种优良气候和土壤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使上述白支吉特人的后裔在这个地方（尽管有广阔的克兹尔·奇利克蒂沼泽）度过从五月起到八月半的整个夏季。

---

1) 《俄罗斯》，见《我们祖国的全面地理记述》，第十八卷，《吉尔吉斯草原》，第112页。

从上述维纽科夫关于斋桑边区地形性质的意见来看（据他的意见这个边区是由沙漠、盐碱地、游牧沼泽和秃山构成的），可以设想，在那里完全遇不到斜坡上为森林所覆盖的山岭。但是，从我在称为斋桑哨所的边区沿边部分实地选择据点时，根据搜集材料所编写的斋桑边区记录（在第四篇第四章已经详细叙明）可以看出，萨乌尔套山的北坡和西坡覆盖着密如鬃刷的针叶森林，主要是落叶松，土壤宜于耕种，以及捕鱼区和富有草地，使这个地方成为完全适合于落户定居。

最后，维纽科夫说斋桑边区不出产东西和对我国无益，是没有看到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这种水路交通的巨大意义。如果水路具有便利的和较为廉价的交通意义，那么在远距离的情况下，象上、下额尔齐斯河与斋桑湖这样的水路交通命脉，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现时沿着这些河流和连接它们的斋桑湖所组成的轮船交通，建立了从黑额尔齐斯河至阿尔卡别克河口，沿西西伯利亚各河流至秋明，以及从下额尔齐斯河至鄂木斯克的连续不断的水路，这条水路在鄂木斯克与我国铁路交通总网联系起来了。因此，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北部的我国领域的这个遥远边区，已经以连续不断的路线与俄国欧洲部分内地各省最终地联系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与我最尊敬的中国事务方面的同事斯卡奇科夫之间，在1860年我留在塔城时期的一些漫长的秋夜里，曾经热烈地交换过意见。这些谈话对我是有高度教益的，第一次使我产生了组织斋桑考察团的想法。建立了斋桑边区的便利和廉价的交通，一定会产生同蒙古西部邻接各省和中国准噶尔的更加积极的贸易关系。上额尔齐斯河轮船航行和贸易公司积极地参加了这种贸易关系的组织工作。该公司从一开始就积极从事工作，并于最短期间内造成了好几条轮船。1901年4月底作了初次试航，当时谢米巴拉丁斯克商人

普列谢耶夫的轮船拖带平底船和以小麦为主的贸物来到斋桑湖①。此后不久，沿黑额尔齐斯河到阿尔卡别克河口，即到中国国界，建立了定期的轮船交通。

从黑额尔齐斯河轮船交通的终点——阿尔卡别克码头到科布多的往返，也可以沿着有许多山岭河流和良好牧场的地区开辟商队道路。

斋桑城在交通道路上所处的中心地位，使它具有贸易交叉道路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情况可以作为正在日益增长的边区贸易迅速发展进程的指标，这就是，斋桑和塔城的贸易数额不久以前还不超过五十万卢布，在1901年已经增长到五百万卢布之多②。将来可以期待这种贸易数额还要大大发展，特别是除了科布多和塔城以外，还要与乌鲁木齐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该轮船公司现时已经在所有这些城市里设有自己的代理商。按照署理我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务的伊·阿·鲍勃罗夫尼科夫的计划，从乌鲁木齐出发的商队可以沿下述道路而行：通过俄中金矿场，沿埃米利盆地西侧，通过布尔古苏台山口继续前进，在我国境内前往奇利克蒂和曼拉卡盆地，直至斋桑湖上的托波尔斯克角，在那里已设有上额尔齐斯河轮航和贸易的贸易站。由此可见，斋桑边区和同它邻接的布赫塔马盆地具有一切便利，来发展农业、渔业、养蜂业、开采煤矿，以及俄国移民垦殖，在最初时期已经具有极其辉煌的成果，它象是一个广阔的交叉点，俄国贸易通过斋桑城和黑额尔齐斯河流域，从西伯利亚和俄国内地渗入中国西部。斋桑边区在这种关系上无可争辩地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因此维纽科夫说这个边区从来不属于我国，我国什么时候也不需要的和不能补偿占领费用的意见，乃是

---

① 诺西洛夫：《从斋桑湖》，见《新时代》，1901年，第757号。

② 同上。

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应当说，维纽科夫从来没有到过斋桑边区，但是这种情况看来丝毫没有使他们感到为难；他陶醉于自己的权威，有时迅速地坚决地对于没有亲自看见的地方说出自己的意见。因此，他的关于地方情况的判断，显然只是一些推测和猜度。

维纽科夫的另一个意见说，国界从斋桑边区方面靠近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拐了弯，使国防线延长七百二十五俄里，并由于不是一条直线，不利于保卫，那么现时按照《彼得堡条约》，国界已从斋桑湖向东移到卡巴河和阿尔卡别克河上游，这个意见就不能再有任何意义了。

国界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弯曲，一直从南阿尔泰山向塔尔巴哈台山岭而行。在国界采取这种方向的情况下，维纽科夫说斋桑国界必须从三个方面去保卫的另一个意见，也失去了自己的意义。维纽科夫担心这个国界保卫困难和为了保卫国界必须驻有大量部队，显然是过分夸大了的，并且是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误解而说出来的。在这一段国界上，中国人在和平时期不抓到我国方面的任何口实，是从来不会下决心采取反对我国的敌对行为的，而为了从国界上驱逐绑架牲畜人或其他吉尔吉斯盗匪，在国界上布置任何部队是没有必要的。1867年到1868年的秋季和冬季，即在东干人叛乱最不安的时期，整个这条国界是由我和五十名哥萨克兵士来保卫的。中国人同我国和日本的最近战争，表明了中国军队是什么样的，因此特别担心中国人从这方面作任何侵袭，看来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至于讲到由当地武装居民来保卫斋桑国界，那就应当看到，这种居民，即居住在斋桑县各哥萨克村庄的哥萨克人（哥萨克村庄分布在与中国邻接的吉尔吉斯草原的边区地点，即在斋桑和科克佩克特各哥萨克村庄和附属于各该村庄的居民点肯杰尔利克和布康），早在1878年就已经达到男性一千三百二十人。而到现在，这种居民就更增多了，毫无疑义出动三百到五百哥萨克人是没

有特别困难的。如果遇有必要，这种数目的哥萨克人以自己当地武装居民的力量于开始时保卫国界，是完全足够的。

维纽科夫担心斋桑边区军队粮食价格可能很贵，这也是不必要的。按照官方关于1881年斋桑县粮食播种和收获数目的调查，在那里从定居和游牧居民收集了：黑麦一百七十一石、春小麦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一石、燕麦八千四百八十四石、大麦三百五十六石和其他粮产（主要是黍子）五千五百零一石。除此以外，在斋桑县打算用中国人那里得来的埃米利盆地的种籽实行冬小麦的播种试验。无论如何，当地粮食供给的不足，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可以用运输粮食，以及斋桑湖上汽船运输其他军需辅助品加以补充，按照斋桑湖和黑额尔齐斯河现有的轮船交通来说，在这一点上看来是不会遇到任何困难的。

由此可见，所引叙的维纽科夫说斋桑国界的保卫困难以及地方供给军粮的困难的意见，都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误解。

维纽科夫怪罪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各委员使国界具有种种不正常之处，同时对中国东部国界也是不满意的。据他的意见，这个国界在乌苏里边区已作了实地的划分和标明，可惜在战略、经济和民族关系上都不免有一些错误之处，这是因为在1859年对兴安岭外的地方认真调查不够充分，我国划界委员讨论问题不够成熟，象后来在准噶尔的国界上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在刊物上出现上述维纽科夫关于乌苏里国界不适宜之处的意见以后不久，布达果斯基委员认为必须表示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作为对于这种意见的回答。

按照布达果斯基的意见，在这些地方进行划界的各委员必须首先严格遵守《北京条约》的规定。维纽科夫愿望乌苏里边区有这样的天然屏障，邻居中国人如果不折断腿就不能侵入。维纽科夫的这种意见，据布达果斯基说，或者是表明他对于边区的完全无

知，或者是为了预先想定的结论而故意歪曲事实。这个意见尤其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全部的东方国界在《北京条约》中都已作了最明确的规定，甚至用俄文字母从А到У加以标明。而且国界的方向也在已经批准的地图中用红线标明了。这样就很清楚了，各委员没有权利违背条约和已经批准的地图行事，因而怪罪他们在战略、经济和其他方面犯了错误，象维纽科夫所作的那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把上述布达果斯基的反对意见与维纽科夫的意见加以对照，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个论战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双方彼此互相谴责不晓事务。但是在这个场合，在通晓地方形势和边界事务的一切情况上的优势，公正地说，应当属于中国东部国界的我国委员布达果斯基和杜尔宾，他们亲自参加划定国界，从而有充分机会仔细了解沿边地方的地形性质。在布达果斯基的领导下，从1857年起并由他亲自参加，早在该处还没有任何居民点的时候，就进行了阿穆尔河上的地形测量工作。他选定了作为哥萨克人村庄和居民村的地点。他编写和出版了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的地理图，这在当时是俄国唯一的标明航道的轮航河流的地图，按照该图，一切轮船当时可以航行三千俄里，不需引水人。1859年，布达果斯基根据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委任，沿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而上航行到兴凯湖，在该处没有找到中国委员，不得不单独经行无人知晓的地方前往海岸，以便在波谢特海湾于约定的日期同前往日本谈判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会见。布达果斯基经受千辛万苦通过这种不毛之地，得以考察了这个地方，编成了第一张地图，并在该图上指出了从穆棱河口至图们江的最有利的国界方向。在同总督会见以后，布达果斯基被派往北京，以便批准和与中国政府互换地图。同年布达果斯基编成了乌苏里江水上交通道路的地图，测量了航道，而在1860年，他

还编成并出版了阿穆尔地方全图。然而维纽科夫只是观察了乌苏里的一个盆地，自然不能象曾经就地实行划界的东部国界委员那样充分了解全部的乌苏里边区，因为这是需要认真了解这个边区的全部综合情况的。

1861年进行划定乌苏里国界的我国委员，显然具有充分机会全面详细地了解这个地方。据他们证明，从乌萨奇河上游至H字界牌，从宁古塔和三姓各城方面，山岭都被不能通行的森林所覆盖。在这个地方设置界牌是非常艰难困苦的。帮办委员参谋本部大尉杜尔宾带同地形测绘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在荒无人烟的、严寒的地方行走。在雨季的时候，边区地方对于地形测量队的出行有很大的困难。

位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北方的宁古塔和三姓方面乌苏里边区地方，也具有同样阴暗、忧郁和不好客的性质。从什列伊杰尔所作的这个地方记录可以看出，乌苏里原始森林所产生的印象，特别是当你"在自己家里"头一次看见的时候，是难以忘记的。"它的原始植物的形形色色、丰富多采和气概雄伟，与在欧洲俄国所时常看到的那些憔悴的、病态的森林毫无共同之处。特别使观者惊异的，是植物形态的出奇的丰富、多样和互相混杂。千百年的橡树、巨大的槭树、高大的雪松、整齐的松树、枝叶繁茂的核桃树、粗大的黄蘗树、甜樱桃树和冷杉树聚集在道路的周围，把它从各方面包围起来。我们必须时常越过无名的河沟和小河，爬上生长森林的山坡和山岭，下到谷地、沟壑和狭谷的底部。在我们面前有时出现巨大的山岭，有时耸立着长得茂密的不能穿行的森林的群山。"①

南乌苏里边区的国界，大家知道，是从哈巴罗夫斯克② 开始，

---

① 什列伊杰尔：《在乌苏里的原始森林里，亚洲的俄国》。

② 即伯力。——译者

最初沿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而行直至兴凯湖。然后，国界横断兴凯湖，沿肯捷·阿林山岭支脉向东南行至太平洋，并在图们江口终止。

国界的这样划分，据维纽科夫的意见，对于我国是很不利的，因为被国界和日本海岸所形成的兴凯湖以南的我国领域的细腰地带，在与中国人发生战争时，会受到很大的危险。中国人可以向这个细腰地带的我国一切居民点后方活动，甚至威胁符拉迪沃斯托克本身。

为了研究一下上述维纽科夫关于南乌苏里国界的不便之处，以及国界附近我国居民点似乎受到危险的意见根据充分的程度，必须预先说明，南乌苏里边区在政治关系上对于我国的意义，以及该边区并入俄国领域时所发生的情况，最后还必须对该边区的国界作出战略上的概述。

按照《北京条约》取得南乌苏里边区，不容争辩对俄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了这个边区，我国就向太平洋推进了，并在日本海沿岸占有了对发展我国海军具有极好条件的优良港口和海湾。同时，在这以前全俄罗斯没有一个靠近大洋的海岸据点。我国大部分海岸线都在北方靠近白海和冰洋，全年的大部分时期都不能航行。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入口和出口都在别的国家领域之内①。

在将来，南乌苏里边区还可以在经济和贸易关系上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移民垦殖有有利的条件，并拥有大量的天然财富②。例如，按照西伯利亚舰队船舶早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所实行的水文学调查可以看出，这个边区的海水域，或所谓大彼得海湾，乃是由六个个别的大海湾：亚美利加、东方、斯特列洛克、乌苏

---

① 《经济学家》，第三卷，第三册，第35和36页。

② 1883年7月5日阿穆尔事务协商会议主席侍从将军巴拉诺夫奏折。

里、阿穆尔和波谢特组成的，此外在长达二百五十浬的海岸线上有二十个良好的海港，在任何天气下和全年的任何季节都能掩蔽最大的军舰，因为这些港湾中有些港湾，例如亚美利加、帕特罗克尔和其他各港，都是永不封冻的①。

后来中国人深信，他们把满洲海岸地带让给我国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在这里也重复发生了在中国西部国界上出现过的同样的现象，在那里把斋桑湖和布赫塔马盆地让给我国的时候，据我们所知，中国人曾经坦白地向我国驻北京代办公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中国人按照《北京条约》把日本海沿岸地方让给我国，隔断了满洲东北部珲春、宁古塔、三姓和吉林各工商业城市的交通，显然是对于中国人有很重大的不便之处。他们经常强求改变这一段的国界线，意图占领波谢特海湾附近的日本海岸，就是这个缘故。强求交还萨维洛夫卡村庄在中国领域内所占的地方，他们表示必须变更国界，把波谢特海湾这个部分交还中国（好象我国是无理强占的），没有这个海湾，满洲的民间生活发展是不可能的。

后来，由于我国村庄萨维洛夫卡居民在中国领域内定居而进行谈判时，得悉中国人正式向我国提出的要求，不仅是对有争论的萨维洛夫卡，而且还对于全部的我国波谢特区域，他们公然声明说，为了满洲的繁荣，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国界移动到我国的波谢特海岸②。中国人这样顽强地坚持按照自己的意图变更南乌苏里国界，即将国界移到海洋，很好地证明，该处国界对于我国有利，而对于中国人则是不利的。

因此，变更对于我国有利的并在许多方面对于我国不容争辩地具有重要意义的国界，象维纽科夫所要求的那样，看来是没有理

---

① 《管理东西伯利亚最主要公文汇编》，第一卷，第一册，第278页。

② 同上。第二册，第323页。

由的。如果我们依从维纽科夫的意见，想要使国界具有对于我国更加有利的另一种方向，那么显然为此目的必须把国界更向西方推移，深入满洲内地。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人把三姓和吉林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即把那块被认为是中国当今统治王朝的发祥之地合并入我国领域之内。采取外交途径，即与中国人谈判的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但是我国意图中从来没有这个目的)，简直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不可不考虑到，如果我国要求向西移动国界直至兴安岭南部支脉，使国界具有天然的性质，即更加远离海洋，那么中国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求，把国界移至我国波谢特的海岸。一句话，两国具有同一的行动目标，即海洋，一定都会力求达到它，而彼此争论领有海岸的权利。在这种条件下，要确立一种相当的暂时协议，并协调俄国和中国彼此直接对立的利益，将是非常困难的。不可忽视，被一个狭窄地带与日本海隔离开来的中国，总是要力求在波谢特海湾为满洲找到通往大洋的出路的。根据这种理由，对于萨维洛夫卡村庄的边界争议，正确一些应当看做只是作为重新审查和改变国界的初步尝试和借口①。

最后，如果甚至假定，中国人在关于国界的谈判中将遭到外交上的失败，那么不容怀疑，在这种场合，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将等待适当机会用其他方法达到其预定的目的。维纽科夫徒然设想，只要愿意与中国人进行谈判是容易的，从他们那里得到让步是不难的。实际上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经验表明，与中国人谈判始终是很困难和费力的，同他们打交道要有坚强性、果断性和经验。我们已经看到不知多少的各种各样的阻碍：故意拖延、用高傲自大态度说出的明显谎言，我国委员在塔城举行谈判时都已经领教过了。但

① 《阿穆尔事务特别会议记录》，1883年6月18日，陆军大臣的意见。

是如果与我国代表在缔结《瑷珲条约》、《天津条约》，特别是《北京条约》时所遇到的那种巨大困难和拖延比起来，所有这些困难和不便之处，就显得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例如在签订《瑷珲条约》前进行谈判时，中国人对我国所提出的关于国界事宜的一切问题，表现了极其笨拙的顽固性。当我国向他们提出关于沿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图们江直至海洋划定国界，以及关于其他问题，如河流自由航行、居民相互通商往来、修改条约、派遣代表团、大使和信差等等的条约草案时，中国人千方百计地争论我国所起草的条约规定，提出自己的理由和反驳意见，有时是与事务完全无关的。关于修改旧有条约中贸易关系、与北京交通和其他等等的问题，他们借口没有这种全权，坚决拒绝讨论。其次，中国人请求从条约草案中取消"国界"字样，借口说中国的国界似乎已经由从前的条约确定了。除此以外，他们要求改变"为了两国的巨大光荣和利益"的词句，硬说没有提叙光荣的必要，因没有这个提法，中国就已经是够光荣的了。最后，中国人顽强地坚持要修改条约第一条关于乌苏里江至海洋的土地的规定。侍从将军穆拉维约夫确信中国人千方百计地力求拖延事务，并显然是在对我国的要求拒绝给予最后同意，就决定变更谈判的性质，使它来一个较强硬的和陡然的转变。为了这个目的，5月14日，他来到瑷珲城，作为最后通牒向中国人提出了他所起草的新的条约草案。但是中国人照旧开始争论这个草案，主要是借口说从乌苏里江至海洋的土地，总而言之，全部的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统治王朝的家乡，因此把它让给俄国就等于叛逆行为。但是中国人的所有反对意见都被穆拉维约夫驳倒了，他顺便向他们指出一个事实，即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乌苏里边区沿岸的最近的海上封锁显然证明，当时与中国处于友好关系中而与我国处于战争中的这些海军国家，认为这个边区不是中国的，而是俄国的。至于中国统治王朝的家乡，不是在乌苏里江流域，而是在宁古

塔河流域，我国远远没有涉及这个地方。中国代表宗室奕山和他的帮办瑷珲参赞大臣尽管一点也不能反驳穆拉维约夫总督的这种实际上正确的和公正的反驳意见，但是仍然不肯平静下来，大概想避免与我国达成最后协议，而且照旧继续顽强争论我国所草拟的条约规定。当时穆拉维约夫看出，想使中国代表同意的一切说服工作都是徒劳无益的，就从桌旁起立挽住宗室奕山将军和大臣的手，生气地对希什马廖夫说，请他告诉他们，他本人同他们还是朋友，但是他确信，与他们进行和平谈判是不可能了；他已经说了他所能说的一切，而现在已经是他们对于他的坚决和不可变更的建议加以讨论和同意的时候，为此给予他们的时间只是到明日为止。

穆拉维约夫的这种坚决的做法对中国代表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们确信，他所表示的有权占领乌苏里边区的论据是完全正确的，而主要的是我国始终具有充分的可能，以武力加强我们的要求。因此，中国人最后决定同意穆拉维约夫的最后通牒。中国代表之所以这样决定将阿穆尔边区让给我国，还由于下述一个情况，即不仅是他们，而且还有北京中央政府的本身都认识到，从阿穆尔河下游和阿穆尔河沿岸设立我国哨所，以及在阿穆尔河沿岸住入我国武装居民以后，我国已经采取坚决的办法来牢固地占领这个边区，我国既不愿意让步，也不愿意拖延下去，曾经告诉中国沿边官长，由于产生的误会不应当破坏同我国的二百年友好关系。这种答复一方面是穆拉维约夫高度切实的和有远见的处理的结果，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人获得情报，将有我国军舰七艘从喀琅施塔得前来中国海面。上面所引叙的穆拉维约夫预先以能干和远见所采取的事实上占领阿穆尔河边区的办法，按照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的正确意见，是穆拉维约夫的主要的和极重要的功绩，他很好了解，同中国的任何谈判，即同中国用外交方法进行交涉，没有武力

的后盾，会是毫无效果的①。

穆拉维约夫于5月15日在瑷珲城与中国代表宗室奕山举行谈判时，象我们所看到的，对于事务也完全适用了这种观点。因此，在第二日，穆拉维约夫作为最后通牒提出条约草案以后，中国大员就来到他那里，以便最后作出协议。中国大员只是用宗室奕山的名义恳切请求将乌苏里边区的国界字样改为：从乌苏里江上游至海洋的土地，在俄国皇帝和中国圣上御览以前仍然是没有划定界限的。中国人决定向穆拉维约夫提出的这种恳切请求，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了解乌苏里边区，看来还是担心他们统治王朝的发祥之地划入我国领域之内。穆拉维约夫认为奕山的这个请求是可以给予同意的。第二日，即5月16日举行了条约签字仪式，在签字以后，穆拉维约夫和宗室奕山互换了俄文和满文的签字本，并彼此互相祝贺。从以上所引叙的穆拉维约夫在瑷珲进行谈判的记述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人的呆板的顽固性和他们不仅对于条约草案中的措辞，而且也对于用语持有琐碎的和多疑的吹毛求疵态度，这种谈判不经过互相争论和吵闹以及各种困难和拖延，是对付不了的。只是有赖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坚强毅力，以及他的坚决性、预见性和善于对待中国人的本领，才得以签订值得纪念的《瑷珲条约》，使阿穆尔边区归入俄国领域。但是中国人把阿穆尔和乌苏里让给我国，据阿·马克西莫夫的正确意见，乃是推测到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坚决行动是以可怕的军队力量为后盾的，所以他们让步了，但是他们让步时怀着收还失地的意图和希望，他们让步时是带有对俄国外来人的恶意和仇恨。在缔结《天津条约》时，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也遇到了不下于此的困

---

① 《格·伊·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死后刊行的笔记》，第399页。从这里引叙了穆拉维约夫在瑷珲进行谈判的情报。

难和同中国人的冲突。首先是，中国人企图不允我国公使前往北京，借口说在他们那里当时(1857年)与俄国没有任何特别重要的事宜，值得象公使这样重要人物跋涉艰难和遥远的道路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对于普提雅廷伯爵请求放行进入北京的照会的答复，就是这样的。中国人对这个答复拖延了很久，普提雅廷始终留在恰克图作了徒劳无益的等候。最后，在长久的和徒劳的等候以后，他忍无可忍，便离开那里，到色楞格斯克时才收到答复。但是，尽管这个答复是否定性的，普提雅廷仍决定前往北京，只是不经由蒙古，而取道海洋。因此，他从恰克图返回以后，就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城①，再从那里乘坐巡航舰"亚美利加"号前往中国海岸。驶入北直隶湾以后，他于1857年7月24日到达白河，在那里与中国官员进行交涉。但是中国人宣称，不能接受普提雅廷的任何文件，借口说北直隶湾不接纳欧洲人，而与俄国谈判的地方是恰克图，中国政府已将此事通知我国枢密院，同时控告普提雅廷，说他违反条约侵入了对欧洲人封锁的地方。普提雅廷在白河的全部期间，中国人在长久争论和吵闹之后，费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接受他的文件。最后，只是在8月12日才接受了。9月4日收到了对于这些文件的答复，象从前一样，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时我国公使决定前往上海，希望在那里联合在英法强大舰队护送下来到的西欧海军国家和美国的全权代表，取得较为良好的结果。北京政府从自己方面认为，在上海研究阿穆尔问题是不适宜的，因为他们为了此事在阿穆尔有满洲总管大臣奕山作为特别代表，为了举行这种谈判应当向他接洽。因此，中国大皇帝政府请求从上海召还普提雅廷。我国公使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只是偶然形成的良好情况帮助他脱出这种不愉快的处境。来到上海时，普

① 即庙街。——译者

提雅廷在那里找到了英法舰队，这些舰队正在准备开往北直隶湾，以便在中国人不同意执行欧洲海军国家和美国的要求时，开始反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在这种形势下，普提雅廷认为可能和必须与北美合众国、英国和法国代表达成协议，联合行动反对中国。随后普提雅廷乘坐巡航舰"亚美利加"号与英法舰队一起开航进入北直隶湾。在联军占领白河口炮台和天津城以后，就打开了前往北京的道路。这时中国人了解到他们所受威胁的危险，派来了与外国各代表进行谈判的自己代表。普提雅廷利用这种情况，得以首先于1858年6月1日签订了以天津为名的著名条约。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象我们已经看到的，普提雅廷曾经不得不忍受一系列最难堪的和最侮辱的同中国人的冲突，以及各种各样大费时间的拖延。但是尽管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和普提雅廷伯爵与中国人谈判时遇到了一切困难，他们还没有那种高度紧张的性质，象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在北京进行的谈判那样，那时我国公使的处境有时是极端冒险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危险的和没有出路的。例如，有过这种场合：在与中国代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当他们与我国公使之间发生非常激烈的辩论时，举止放肆的、傲慢的中国大臣肃顺竟将提交给他的《瑷珲条约》草案摔到桌上，并很不客气地批评说，这个文件没有任何意义。当时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立刻从座位上起立并高声说，由于肃顺不能控制自己，竟然失态达到这样程度，在俄国全权代表出席之下，对于国际文件采取不恭敬态度，他停止会议，并立即补充说，他将请求军机处另派举止有礼的其他代表。最后的一点批评对肃顺来说，是一种重大的打击，因为对于中国的大官员来说，没有比指责他不知礼貌更大的侮辱①。但是在这以前，在谈判一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各代表肃顺和瑞常曾经无礼

① 布克斯格夫堅男爵：《俄国的中国》，第38页和39页。

的通知我国公使说，大皇帝得悉他来到北京的消息，感到惊异。然后中国人声称，大概我国公使由于误会没有收到在签订三天后已经批准《天津条约》的通知。在此以后，在北京已经没有未解决的俄国问题，大皇帝认为已来到的公使不久定将返回自己的祖国。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对于这一点尽力保持镇静地答复说，他前来北京是为根据瑷珲、天津和其他各条约办完应当解决的国界事宜。但是肃顺对此指出说，即使是关于这种问题，例如关于划定俄国与中国之间的东部国界问题，由于不了解边区地方条件，他们不能在北京谈论。他补充说，无论如何中国政府永远不会容许俄国在满洲有任何领土的侵占，哪怕是事态达到战争地步。关于在日本海沿岸的满洲各港口，据他的意见，中国看不到应当把它们让给俄国的理由，而不是让给任何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我国公使对于这一点提请中国人注意说，当时威胁他们的最大危险正是从英国方面而来，因为在大沽口装备有强大的远征舰队，英国人从那里一定要向北京推进。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占领满洲各港口，以便预先集中军队。从英国人方面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国的这种危险，只有在中国人把这些港口让给俄国人来巩固和保卫的情形下才能防止。当时中国人便宣布与《瑷珲条约》完全无关，认为它是无效的，因为签订这个条约的宗室奕山是既无全权又无印信的，我国公使反对说，如果中国大皇帝陛下认为奕山的签字是无效的，那么他也应当认为宣布奕山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谈判完满终结的自己谕旨是不对的。但是无论上述我国公使的理由是极端有论据和不可辩驳的，都没有使中国人感到难以为情，他们不知羞耻地继续照旧千方百计和纠缠不休地拒绝把乌苏里江让给我国。中国人在对我国公使所提出的对于已订条约六项补充条款的书面答复中声明，中国大皇帝政府绝对没有意思把乌苏里江和全部乌苏里边区让给我国永久领有，而只是准许暂时使用某些地段的中国土地。

中国人继续向我国公使写道："同时，刚刚批准了《天津条约》，你又来力求对它增加与这一问题无关的新条款。"最后，在公使的来文中顺便说道："似乎在国界上不能避免混乱和强占。就让这种事情发生吧，那时我国政府将立刻通知各大国说，俄国忘怀我国友谊，不顾我国刚刚所给予的很大让步，突然想来强占我国的土地。"① 这样，我国代表必须与之斗争的已经发生的困难，由于西欧国家可能干涉满洲港口并归俄国的问题，大大地复杂化了。其次。对于我国公使向军机处提出与肃顺和瑞常这样的代表进行谈判毫无益处，并请另派其他大员加以替换的控告，在答复中热烈地替被告人辩护，表示深信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因此在继续进行谈判时，还是那些大员肃顺和瑞常于约定的时候到场。他们两人在这一次是有礼貌和有分寸的。但是事情没有向前推进，因此，伊格纳提耶夫将军迫不得已两次控诉中国人的顽固性。此后谈判发生了三个月的间断。按照我国公使的坚决主张，继续谈判虽然也举行了，但参加的还是这些代表：肃顺和瑞常。

肃顺在这些谈判中是很有礼貌和殷勤的。他庄严地转交了军机处的公文，这个文件是对于上述我国公使迭次建议的支吾搪塞的答复，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只是通知说，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以恫吓的手段威胁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奕山也就照办了，但他是别有用意地做了这一点的，他的签字没有加盖印章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然而，后来得悉，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国大员曾经集会，并作出如下的决定，已奉中国大皇帝许可：不使对俄国人的交涉决裂和不使俄国与西欧各国联合，绝对不答应俄国的任何一个要求，如果与英法的战斗对中国不利，决定对俄国的某些要求给予让步，但以请求协助反对欧洲海军国家为条件。在相反情况下，如

① 布克斯格夫堅男爵：《俄国的中国》，第37页。

果在天津与英国和法国取得和议，则以此控诉俄国的侵略和贪得无厌。由此可见，我国公使的处境当时是很困难的，可以说是进退维谷的。远离彼得堡一万俄里之遥，同它接洽需要五个月之久（因为在我国极东地方还没有电报通讯），手下没有任何物质资料，看不到从任何地方可以得到支持，差不多是没有帮手的，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还必须与中国人的呆板的顽固性作斗争。同时，预期外国各大使于很快时期即将来到，我国必须在外国人到来以前，把同中国人的交涉事宜办完，因为中国人始终打算甚至向我们表明要依靠外国人的协助来对抗我国。但是我国公使深信，在当时要从中国人方面得到任何积极的结果，即答应我国的要求，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伊格纳提耶夫决定离京前往上海，尽管中国人千方百计地反对这个出行，他们担心我国代表由于同肃顺在北京所进行的谈判未能成功而感到愤恨，会转向英国和法国方面，并因很好了解北京而会给英法指出道路。伊格纳提耶夫在他离去之前，决定向中国人致送最后通牒，要求执行《瑷珲条约》和解决其他边界问题。军机处对于这种要求答复说，中国大皇帝拒绝我国公使的要求，并且不仅对于公使，而且也对于他的官员中的任何人绝对禁止出海。但是这种令人惊奇的禁止没有使伊格纳提耶夫放弃他的离去北京的意图。他在离京以前向军机处写了一个严厉的照会，向中国人声明说，他作为俄国的公使只能遵行本国君主的命令和意志。因此，他将不顾任何阻难离开北京，而且不是前往恰克图，正是取道海洋。——这种答复使中国大臣们大为吃惊，他们决定，在这种场合沉默是摆脱困难处境的最好出路。但是，中国人认为同时必须暗中监视公使的出行。以此为目的，城市守卫人员增加了一倍，禁止他们放行我国使馆人员。尽管只许公使通过蒙古前往恰克图，绝对不许取道海洋，伊格纳提耶夫还是平安地离开了北京，虽然是十分警惕的，没有被中国城市守卫人员辨认出

来。来到上海以后，伊格纳提耶夫赶快同美国公使华若翰[1]见面，公使住的房舍是美国的，同时也住着署理俄国领事哈尔德，我国公使应领事的邀请也住在这里。俄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促成了我国公使与美国公使的接近，而这也是完全符合于外交部的意图的。由于英法两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还没有来到上海，伊格纳提耶夫会见了联军总司令格兰特和蒙托班以及公使卜鲁斯和布尔布隆。英国和法国公使对待伊格纳提耶夫非常谨慎和冷淡。这种不愉快的处境由于一种情况而更加严重起来，即中国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薛焕来到上海，他是亲英派，并且是一个很敌视俄国的人物。但是我国公使以他所特有的外交上的灵活性，巧妙地度过了所产生的困难，顺利解决了同外国大使的一切误会。首先，他与法国大使葛罗男爵，特别是与法国军队总司令蒙托班将军接近，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充分信任。紧接着也同英国大使额尔金勋爵接近了。因此，在对中国人开始军事行动以前，与外国人的接洽关系已经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促成事情朝着对我有利方面转变的，还有接到外交部的电报，伊格纳提耶夫的一切行动得到了赞同，此外准许采取公使官衔，并通知已经命令组成特别舰队派往中国海面，最后，建议他在巡航舰"斯维特兰"号悬挂本国国旗。伊格纳提耶夫将军随同舰队开到北直隶湾，接着进入北京以后的进一步的行动，我已经在第二篇（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详细叙述过了。因此，我在这里应当只限于叙述导致签订《北京条约》的一些极主要的事件和情况。

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于1860年10月4日，即会晤了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以后的第二日来到北京，住在我国的馆舍。次日，即10月5日，中国官员来到他这里，并向他征询意见：在现时的非常情况

---

① 原名为 John E. Ward。——译者

下，他们应该怎么办[①]。

在来访人员中有上述代表瑞常。随后，伊格纳提耶夫接到了留京代理国务的中国皇帝御弟恭亲王的来信，表示感谢居间调停中国政府与西欧各国大使之间的事务。当中国人与各国代表之间开始直接谈判时，中国官员不预先征询我国公使的意见，便不采取什么办法[②]。最后，在解决了同外国人的一切问题以后，我国公使要求中国人结束俄国与中国的国界事宜。但是，在开始谈判的时候，问题不是没有经过与中国代表们的争论和吵闹的，他们在讨论划定东部国界，主要是乌苏里地区的国界问题时，不顾恭亲王已经答应容易地和迅速地办完国界事宜，特别表现了顽强的抗拒。然而所产生的一切误会，不久都得到了解决，我国公使所处的有势力的地位和他善于在极困难的情况中找出办法，对此起了许多促进作用。

10月9日，两国代表关于国界的一切问题最后作了约定，并决定将所编写的条约草案陈奏中国大皇帝批准盖印。10月31日，最后奉到中国大皇帝的批准条约草案的上谕，11月2日，庄严地举行了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和恭亲王对于值得纪念的《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按照这个条约确定了俄国领有日本海直至朝鲜的全部海岸。关于瑷珲、天津和北京谈判经过情形的上述概要明显地证明，同中国人进行谈判和从他们那里得到充分满意的结果，带着很大的困难，并始终需要忍耐、谨慎、坚持和极有分寸，以及特别善于对待他们。在上述谈判时期也是这样的，当时曾以巨大劳动和努力进行了工作，而且只是有赖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和伊格纳提耶夫这样有才干的国家人物的智慧、毅力和辉煌天才，我国才能从中国人那里取得把阿穆尔边区和日本海海岸让给我们的非常重大的让

---

① 罗曼诺夫：《中国的最近事件及其对俄国的意义》，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步。但是现时如果我们根据与中国人签订的条约已经在实际上领有了太平洋海岸，终于给自己开辟了进入大洋的出路，并占有日本海岸上的优良港口，那么看来是应当以此为满足的。不可不看到，按照《北京条约》从乌苏里边区方面确定东部的国界，我们的主要目的，即得到久已希望的通往大洋的自由出路，已经获得了最后的满足。所获成果的重要意义，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评论中得到了有权威的确证，据他说，《北京条约》最终地和合法地巩固了我国对优美的乌苏里边区的占有，成功地签订这个条约是我国政治上的胜利。至于主张取得进一步的让步和以此为目的把国界向西推移至兴安岭南方支脉，使稠密的满洲人口归入我国领域，而且使三姓、宁古塔、珲春和甚至是吉林等城市也出现在我国国界内，——这就意味着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于提起变更乌苏里国界的这个问题，也未必是我们的意图。我们要记得，中国人每次遇有方便的机会就千方百计地坚决主张变更乌苏里国界，以便占有波谢特港湾的全部地区。如果我国从自己方面也要求变更这个国界，破坏《北京条约》，反对所引叙的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意见，那就意味着为普鲁士国王效劳，即为中国人效劳而损害自己的利益。中国人为自己的意图力求变更乌苏里国界的方向所始终具有的坚持性，在因萨维洛夫卡村问题同他们发生误会的时候，很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国界据点萨维洛夫卡村位置在波谢特半岛西部的图们江与山岭之间距离波谢特湾的四俄里处。从前在这个村庄有三百所房子（家屋）。居民从事耕种，并于当时是俄国人与运来许多牛羊的朝鲜人进行贸易的媒介。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有这些居民都被驱入到了中国境内，前往塔加杰尼河盆地，在那里的图们江旁建立了两个村庄：塔加杰尼和桑加扎基。1881年8月间，突然有中国部队约四十人在劳金荣带领下来到萨维洛夫卡村，向驻在该地的我国哥萨克人宣布，要他们在过一个月以后向后撤退八俄里。

12月9日，中国大员吴成才要求立即把萨维洛夫卡村交还中国人，命令在该村内开始建筑卡伦房舍。同时中国人不仅表现了傲慢自大和独断独行，而且还表现出公然的敌对态度。中国人的蛮横无礼达到了这样程度，他们不仅在这毫无争议为我国占领七年以上的地方设立了自己的军事哨所，而且中国兵士还对我国军官加以侮辱，而满洲的一个中国高级大员，李鸿章的一个亲信，曾经亲手加以毒打。在关于修改国界的一切谈判中，中国人方面也耍了不少的无赖行为①。中国人以吴成才大员为代表，曾经正式向我国表示自己对于有争论的萨维洛夫卡村，以及对于无争论的我国波谢特地区的要求，公然声明，为了满洲的繁荣必须把自己的国界推进到我国的波谢特海岸②。我国有节制的做法是，派遣步兵两个连、山炮二门和一个后贝加尔哥萨克连，迫使中国人把自己的要求节制在相应的范围内。所引叙的事实明显地证明，中国人对于重新审查和改定南乌苏里国界的坚决强求，正是因为这个国界对我国有利，而对中国是不利的。因此，变更对我有利的国界，象维纽科夫所要求的那样，并为此而重新同中国人卷入谈判中（而要使谈判的结局对我有利，象上面已经详细说明的，是不能预先保证的），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从上面所举出的例证当中，维纽科夫本来似乎可以看出，同中国人进行谈判在多数场合是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和拖延的，如果他自己必须去进行这种谈判，尤其是同肃顺这样的老爷进行谈判，那他就会在实践上相信著名的“批评容易，艺术难”这句格言的正确性。最后，维纽科夫所指出的这个国界有受中国人威胁的危险性，在实际上也是虚构的。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必须把乌苏里国界作一个简明的战略上的概述，并指出从满洲经过

---

① 《阿穆尔事务特别会议记录》，1883年6月18日，列索夫斯基将军的意见。

② 《管理东西伯利亚最主要公文汇编》，第一卷，第二册，第323页。

国界进入我国境内的通路。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集结在满洲的中国军队，将以从营口到沈阳和吉林这个方向为根据地，主要是依靠具有十万人口处在交通枢纽和富有地方资源，从而为了建立基本战争根据地具备一切便利的吉林。这样在满洲东北部集中起来的中国军队，可能从南乌苏里边区沿着三个方向侵入我国境内：（1）从吉林城通过鄂木索，并从珲春城前往波谢特港湾；（2）从宁古塔城到绥芬河盆地前往波尔塔夫斯克卡伦；（3）从三姓城沿诺尔前往兴凯湖沿岸土里罗格。不容怀疑，乌苏里边区与满洲长达一千俄里的国界，据东西伯利亚长官的声明，在它的全部长度上都是容易通过的。因有这种情况，为了防止上述中国人侵入我国境内，为保卫乌苏里边区而集合的军队，显然不能保持等待状态，并局限于被动防守的行动。根据这种情况，当1880年与中国发生了伊宁问题的纠纷时，东西伯利亚长官认为必须：把这个边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作战军队的根据地（它按照自己的海上地位最适合于这种任务），采取积极防御行动。1880年所组成的委员会以海军上将列索夫斯基为主席，因交还伊宁问题与中国发生上述纠纷时，也作出了这种结论。在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说，在与中国决裂的时候，陆军作战必须坚决指向满洲的那些战略据点，占领这些据点，就可以使我国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交通线有充分的安全。在这种意图下，东西伯利亚主要长官认为，宣布战争以后应马上占领：珲春，距离诺沃基辅天然界限只有一站之路；宁古塔城，距离国界一百五十五俄里；三姓，远离国界二百七十五俄里。这种行动计划可使军队得到粮食，并由占领了的敌区供给运输车马，而主要是掩护和保证南乌苏里边区还没有巩固的居民点，防止不可避免的破坏①。但是在积极防卫行动所达到的这种最终目的以外，据海

① 《管理东西伯利亚最主要公文汇编》，第一卷，第二册，第143页。

军上将列索夫斯基委员会的结论，也不可放弃转入进攻作战，深入满洲，指向沈阳。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在当时与中国发生纠纷时，作为对中国人制定行动计划根据的考虑就是这样的。尽管当时我国在乌苏里边区可能集合的只有极少数量的军队，而中国人在吉林和三姓、宁古塔、珲春沿线却有四十五个以上的正规步兵和骑兵部队，每一部队人数达到三百七十人到八百人，而且具有优良的炮队①，但是他们不敢侵入与满洲邻接的我国领域。再有，我国与中国人最近战争的经验（当时我国军事行动不仅具有积极防御的性质，而且具有进攻的性质），充分证实了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想到，在那个时候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没有全线修成，因而在战场上迅速集中军队是困难的。尽管如此，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占领了北京。

在这次战争的全部期间内，没有看到中国军队侵犯南乌苏里边区我国居民点以及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任何敌对行为。现时我国掌握着满洲的铁路网，有了充分可能随时把所需数量的军队集中在选定的地点。但是，除此以外，被强大军队占领的满洲，现时既然处于我国政治和军事势力范围之内，从而也就完全从属于俄国政策的意图。由此可见，维纽科夫用来吓唬人的、威胁我国乌苏里边区居民点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本身的中国危险，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象我们所看到的，从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上面所引叙的维纽科夫的关于这种危险的看法，作为没有确实根据的意见，是空口无凭的和失去任何意义的。

所有上述关于中国东部国界的意见，总括起来得到的结论是，实地划界的我国委员真正执行了《北京条约》的规定，而且尽管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在不能通行的原始森林和沼泽中间设置界牌时，

① 巴拉巴什上校关于满洲的记录。

他们曾遇到非常的困难，而实地划界事宜的执行是以出色的成就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在帝国的这个遥远边区与中国划分国界所获成果的重要意义，东西伯利亚的主要地方长官以及最高政府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们认为我国委员的行为是正确和符合条约的。试问，维纽科夫有什么根据无缘无故地想要对按照政府指示确切执行《北京条约》的中国东部国界划界委员追究责任？在维纽科夫的这种行为中，显然透露出他有一种加罪我国委员的意图。他的一切意见，不是从对于事实的严格批判分析所作出的结论，而是对于他很少了解的地方所作出的一系列先人为主的完全任意的结论，因此，他的所有意见在多数场合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切导致一个结论，维纽科夫的批评不是对事而是对人，是在个人愤恨和憎恶以及极端偏颇和有成见看法的不良情感影响下行事的。因此，维纽科夫关于划分西部和东部国界的评论本身，更具有告密的形式，他要借此尽力地和恶意地使我国委员的劳动失去成效，并破坏对他们工作的信任。这种办法的道德品格，看来一点也没有使维纽科夫感到拘束，象他不止一次在其他场合所表现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在这里没有长篇大论的必要，我只是要说维纽科夫的这种做法，以及其他人对《塔城议定书》的反对意见，在我国文化界不能不引人注意，而且已经引起了我国驻塔城领事巴尔卡申方面的公正的反驳。据他的意见："1864年《塔城议定书》所规定的国界，使能在对贸易有重大便利的斋桑和巴克图设立军事岗哨，如果后来维纽科夫和其他人等对此加以责难，那就未必是正确的。为了承认短期内确定国界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功绩，值得深入研究一下，在进行划界时中国人所引起的困难。"①

---

① 巴尔卡申：《西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中国领域之间的贸易活动》，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记录，1881年，第三卷，第11页。

转而讨论国界的一般意义时不能不考虑到，国界在各民族的国家生活中不可争辩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从前时候，国家统治者们都曾力求以难于攀渡的高山和大河，一言以蔽之，即象中国万里长城那样明显的天然界限来保卫自己的领域。但是，如果这种墙也不能保卫中国内部，防止敌人的侵入，那么现时未必可以期待山岭能够阻止敌军的进攻。

在我们的世纪，在笼罩全世界的追求技术生产方面的改善和发明的进步倾向下，山岭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了。已经除了在便于达到山区地方的山口以外，现时甚至在头等的山岭中建筑着隧道。象苏伊士和巴拿马那样挖通地峡，把世界各大洲变成了巨大的岛屿。这些世界运河和巨大铁路如亚洲的西伯利亚铁路、巴格达铁路和美洲的太平洋铁路，已经连接了相邻的海面和遥远的大洋。国家的统治者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关心以不可超越的天然界限保卫自己的国土，而是恰好相反，尽力便利和保障畅行无阻的国际交通的一切可能。在现代进步的这种条件和要求下，各民族间的往来大大地加强了：在海洋上和大陆上，处处都可以看到发展和便利这种往来的意图。组成了远距离的不停开行的轮船航线和铁路快车。在英国于1904年开始建造长约四分之一俄里的新式远洋轮船，装备有七万马力的四个机器，这个庞然大物的航行速度每小时将达二十五浬。因此，乘这种轮船渡过大西洋所需要的时间，不超过五日①。在陆路交通上，蒸汽动力处处开始被电力排挤。完善的交通提供迅速完成旅行的充分可能。现时可以用三十三天绕行地球一周；从托波尔斯克出发前往北京，两个星期便可到达，而在1656年，我国大使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为了这种旅行曾需要花去一年又八个月之久②。

---

① 《新时代》，1904年，第10047号。

② 《俄罗斯残废者》，1904年，附录第3号。

世界进步的迅速增长和各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中近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能不影响到国界，使它逐渐开始失去自己旧有的闭关性。因此，对于国界所绝对必需的天然界限的意义的这种看法，甚至在亚洲各地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民族迅速发展的文化生活的现代条件和需要，在划定国界事务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意见。

在我国定期刊物上出现的关于讨论作为国界的阿穆尔河意义问题的热烈交换意见（对此我已经在上文详细叙述过了），就是这种情况的鲜明例证。原来，河流可以成为适宜的政治国界，而不能成为经济国界，象阿穆尔河所突出显示的那样，它的右岸虽然不属于我国，而在经济上是倾向于我国的。在这里河流国界的概念好象是分裂为二了，它失去了原来的固定性。

从上面所引叙的对《塔城议定书》持反对意见的人和加以责难的人所表示的意见中很容易看出，关于划定中国西部国界的问题，曾经发表了形形色色的而且是彼此矛盾的观点和意见。例如根斯，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认为必须把《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国界，由中国常设卡伦线更向东推进几百俄里，并将中国全部准噶尔划入俄国领域之内。维纽科夫则相反，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应当不是把《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从中国常设卡伦线向东推进，象根斯所要求的那样，而是从这个卡伦线向西移至下额尔齐斯河。然后，从西方绕过斋桑湖，把国界引向该湖的支流乔尔加河，再沿直线向南至塔尔巴哈台山脉。由此可见，维纽科夫认为，应当把签订《北京条约》以前作为我国与中国的假定国界的那条国界，认为是我国的最适宜的国界。因此，富饶的库尔楚姆边区和同样富饶的布赫塔马盆地，以及斋桑湖以南至塔尔巴哈台的地方，维纽科夫都完全留在中国人的权力之下了。

在根斯和维纽科夫把头等山岭和巨大河流作为我国亚洲国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时，弗洛林斯基教授，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却表

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在亚洲各地方在任何关系上只有无水的沙漠平原是最好的国界。

总起来说，《塔城议定书》的责难者们，在他们关于应当如何划分国界的意见上所表示的不是意见一致，而是完全对立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所计划的国界轮廓彼此完全不同。例如根斯主张国界应在中国常设卡伦线以东，而维纽科夫则主张应在该线以西。因此，《北京条约》所规定的沿中国常设卡伦线而行的国界方向，实质上是上述根斯和维纽科夫方案之间的中间界线，正好居于二者之间。它好象是把本章所详细叙述的两种国界方向的不便之处均衡起来。按照完全符合于《北京条约》的《塔城议定书》的这样划定的国界，得到了外交部的赞许，而最好的证明，它在帝国的这个边区是最能满足俄国政治和贸易的意图的。

第 七 章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中国西部国界的形势。　赫鲁晓夫将军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最后几年。

在详细叙述中国西部东干人叛乱的经过情形时，我曾顺便提到，中国人失去东土耳其斯坦以后，开始时在那里建立了三个独立管辖区：库车、阿克苏和叶尔羌，都在东干人的权力之下，受黄和卓的统治；和田与它的周围地区也承认了东干人领袖马福迪统治自己的权力，最后东土耳其斯坦的西部地方，即全部喀什噶尔本部地区，处于著名的阿古柏伯克的权力之下。在中国西部的伊犁省内，早从1867年起，战胜了自己同教的东干人的塔兰奇人，就已经占有统治地位，而且塔兰奇苏丹阿布特拉在这个边区的居民中间取得了统治权力。在同年，即1867年，上述的黄和卓和阿布特拉苏丹的管辖区也垮台了，在很短时期内在全部东土耳其斯坦确立了自己政权的阿古柏伯克占有了那些管辖区域。

由此可见，最初时期显出如此威力并蹂躏了中国许多省区，破坏了许多繁荣城市的东干人叛乱，并没有导致在中国西南边区成立伊斯兰教国家。这种叛乱的特点，象我在上文已经叙述过的，是在于东干领导人完全缺乏管理建设力量，因而这个武装反抗的本身，经常伴随着掠夺、骚乱、彼此不和与极端混乱。因此，在中国西部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没有任何独立自主的东干人领域。东干人当时分散在各地方，但主要是集合在天山山脉以北的地方和乌鲁木齐城及其周围。但是，陶醉于自己胜利的阿古柏伯克并不是没

有作为的。他占有了全部的东土耳其斯坦后，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扩张到天山北部地方，即中国准噶尔境内。1871年，喀什噶尔军队在他的率领下曾向乌鲁木齐推进。当时乌鲁木齐的东干人为了避免面临的阿古柏伯克方面的蹂躏，就只好逃往蒙古北部。由此可见，1871年东干人大群在蒙古出现，乃是喀什噶尔军队侵入中国准噶尔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东干人大群出现在蒙古北部，由于经过该地通行我国到中国的商路，可能危及我国与中国贸易的正常进行，以及库伦的领事馆。必须迫不及待地采取应有的办法来保护我国的贸易和领事馆，防止东干人方面的敌对破坏。转而详细研究这种办法时，必须预先说明我国在东干人叛乱中，在它发展的开始阶段所遵循的政治性的考虑。

我国政府从东干人叛乱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认为必须持不干涉的态度，不与中国人一起积极参加镇压这个叛乱。我国方面的这种做法所根据的考虑是，武装参加席卷全部中国西部的内乱，由于武装叛乱在中国边区各省的迅速发展和在很短时期已在那里消灭了中国政权的任何踪迹，认为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在这种形势下，可以预测，中国正遭受分裂的威胁，在中国西部领域内，在叛乱总领导人强大权力之下正在形成独立的东干伊斯兰教领域。作了这种预测，我国显然不应当与东干人结成仇恨，而合乎我国意图的，则应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这种行动计划，我国从1865年保持了六年之久。但是另一方面，在从沙宾达巴哈界牌到塔尔巴哈台山脉哈巴尔·阿苏山口的广大地区内，于1869年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与中国西部划分国界，提供一些根据可以推测，满洲人在中国准噶尔北部保持了自己的政权。这种情况促使始终特别注意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外交部作出组织蒙古西部各主要贸易中心：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的这种贸易关系的尝试，并且借此稍为补偿在东干人叛乱时期我国商业和工业所受的损失。可惜，这种打算

由于东干人大群突然出现在蒙古北部，甚至占据了乌里雅苏台，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由此可见，成为亚洲各地通常现象的迅速演变的事件的进程，指出了必须改变我国在东干人叛乱时期最初六年（1865—1871年）所遵循的办法，并制定在东干人问题上所应保持的新计划。

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我国军队占领伊宁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这应当成为将全部准噶尔交还中国人的第一步。可惜，这个为后来许多事件证明具有充分根据的计划被拒绝了。原因在于当时在中国西部的形势下，没有任何根据推定，中国人可能利用我国的帮助和在自己领域内奠定秩序。占据伊宁城和它的周围地区，在持久和经常占领这个地方的意义上说，不可能是当时的我国意图。因此，决定讨论我国当时的形势，并制定关于东干人问题的新计划，首先是要尽力支持中国人。在长达八千俄里的广阔地段上与中国接壤的我国，有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的邻居显然是较为有利的，我们同他们已经保持了二百年的友好关系。重新制定的我国在东干人问题上行动计划的实质在于：为了保证在蒙古的商队道路以及驻库伦的我国领事馆，防止东干人匪帮的侵袭，打算从恰克图方面出动一个独立部队，而不使这个部队的行动具有持久占领地方的性质，因为中国人久已怀疑我国有占领蒙古北部的意图。

当时认为必须委托我国驻北京公使与中国各大臣进行交涉，并向中国政府说明急速采取实际办法镇压东干人叛乱的一切好处，而且答应中国人除了已经命令从恰克图方面出动我国部队到蒙古北部以外，如果当地中国当局愿意的话，在中国西部领域还可以从我国方面得到一些协助。在东部国界上执行上述的一切命令，已经预定委任一个特别委员办理。

由于后来得到的关于蒙古进行武装叛乱的使人心中不安的新

消息，这个计划不得不加以变更。按照重新制定的计划打算：由于仍在中国西部的继续骚乱对于我国亚洲边区，尤其是对于我国的贸易起了不良的影响，这种贸易已经完全衰落，——采取向东干人的中心地区作武装推进。但是，在执行这个计划以前，决定必须经由我国驻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说明，我国对于中国西部事件的这种干预，目的是在于恢复被东干人叛乱所占据的中国边区各省的政权。为了这种意图，委托我国驻北京公使向中国大皇帝各大臣声明，在我国军队越过国界推进的同时，最好派遣中国大员带领部队随同出发，以便在占领某一据点以后，能够在那里自己进行管理。在这种条件下和在伊犁边区恢复治安后，我国方面曾向中国政府声明，我国军队将撤退回国。

按照新订计划，向中国西部的武装推进，应当于一开始就对东干地区的两个主要中心城市：伊宁和乌鲁木齐作军事占领。为此目的，打算向国外出动两个部队：一个部队从斋桑区出动，另一个部队从谢米列钦斯克州出动。但是由于与东南部吉尔吉斯草原我国领域接壤的中国西部各地方重新产生的事件，而这个计划也不可能执行。事情的开始是，塔兰奇的苏丹公然表示对我国的敌对情绪，拒绝执行谢米列钦斯克省长官的公正要求，主要是不肯交还逃入塔兰奇境内游牧的维尔年斯克县的我国吉尔吉斯人两千个帐篷。关于此事谢米列钦斯克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曾写信给苏丹阿布特拉，要求交还我国的吉尔吉斯人，并且预先警告说，如果在所定期限届满以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那么为了阻止逃跑的吉尔吉斯人将出动我国部队。对这个信件不仅没有收到答复，而且我国所派去的哥萨克人在来到塔兰奇的边界据点以后，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侮辱和暴行。最后，除此以外，阿布特拉经常排挤我国的贸易，不许我国商人前往伊宁，在自己领域内隐匿我国逃民和罪犯，而且对于按照《北京条约》构成我国与中国国界的鲍罗胡吉尔

提出了要求。

在塔兰奇苏丹方面采取了这种公然敌对的和傲慢的行为之后，和由于塔兰奇人大群对于布置在国界上的我国部队实行攻击，我国已经不能保持旧有的严格防卫的状况，而认为必须向中国西部境内采取武装行动和占领伊宁城，即执行象我们已经知道的土耳其斯坦边区主要长官考夫曼早在1870年所提出的计划。1871年春季，分布在谢米列钦斯克州东南部的我国部队，接到命令向选定的集合地点鲍罗胡吉尔卡伦前进，同预定作为攻击伊宁的主力部队联合起来。春济部队官长米哈洛夫斯基上校奉到命令，把集合在克特缅的塔兰奇人逐走，借此使叶连斯基中校所率领的我国天山部队便于从克特缅高山下到伊犁河左岸河谷，然后向鲍罗胡吉尔前进。但是天山部队官长得到情报说，塔兰奇人准备袭击在恰尔科迪·苏河盆地游牧的我国吉尔吉斯人，认为必须从克特缅高山下到这个盆地，迫使塔兰奇人让出该盆地，这一点已经实现了。天山部队击溃并驱散了塔兰奇人大群，把他们逐出国界以后，就向前进与米哈洛夫斯基上校的部队联合起来了。同时，我国的春济部队在向克特缅活动的时候，曾与塔兰奇人有几次接触，其中5月31日在克特缅的一次是最顽强的，塔兰奇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死亡五百人之多。春济部队和天山部队在克特缅联合之后，天山部队留在这个居民点内，春济部队向北推进，前往鲍罗胡吉尔，于6月6日来到那里，炮队和笨重物品在摆渡上平安地渡过了伊犁河。天山部队则向伊犁河左岸盆地杜邦地方移动。叶连斯基中校从这里奉到命令，派遣一部分部队并入主力部队内，而带领其余部队前往加强穆佐尔特部队，并担任该部队官长。

当我国部队从各方面向集合地点鲍罗胡吉尔集结的时候，布置在那里的在巴利茨基少校统率下的部队则被派往阿克·肯特。6月4日，塔兰奇人有三个大群扑向阿克·肯特我国部队所占据的

阵地，但是他们不管来得多么急速和顽强，没有能够长久抵住我国的枪械火力，在看到鲍罗胡吉尔部队接近阿克·肯特的时候，便抛弃自己在战场上的死者和伤者，开始迅速退去。

6月8日，全部远征部队都已集合到鲍罗胡吉尔，伊宁远征军官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本人也来到了这里。6月12日，部队从鲍罗胡吉尔出发，越过霍尔果斯河，在阿利姆图附近遇到了塔兰奇人四千人的大群，即被我军击溃，而抛弃了自己的营垒逃跑。在向伊宁继续挺进时，远征部队于6月18日在长岔河子堡垒地方又与塔兰奇人有过一次战斗。我国部队把敌人从阵地上打退了，占领了堡垒，而城市也被冲击攻陷。第二日，6月19日，塔兰奇人在绥定地方遭到新的挫败，绥定不战而降。占领绥定以后，便打开了通往伊宁的畅行无阻的道路，特别是塔兰奇人大群遭受三次失败以后，都逃散了。6月21日，我国部队来到布扬图以后，伊宁苏丹阿布特拉来见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并宣布说决定无条件投降作为战俘，在他属下的军队二千人将予解散。6月22日，伊宁城被我军占领。在城内发现了粮食和以铜炮、铁炮、小口径炮和要塞枪械构成的武器大仓库。土耳其斯坦军队占领伊宁完全改变了国界上的形势。不久收到我国驻北京公使的电报说，中国人不可能参加中国西部的远征，要求完全改变我国向东干人中心地区进攻行动的原订计划。因此，西西伯利亚远征部队的出国行动取消了，赫鲁晓夫将军命令谢米巴拉丁斯克边界官长停止预定远征的一切准备工作，而且土耳其斯坦总督认为自己没有协助西西伯利亚部队的任何必要。

但是谢米巴拉丁斯克边区长官认为不可能执行赫鲁晓夫的该项命令，并且认为必须将西西伯利亚远征部队向国外的埃米利河盆地推进。由于传说我国白支吉特吉尔吉斯人已经准备越入中国境内游牧，因为约请他们参加叛乱的东干苏丹叛乱已被截获；以及

传说东干人出动了三个部队，每队一万五千人，带有大炮，边区长官提出了必须保卫谢米巴拉丁斯克州沿边地区的治安，作为向中国境内作这种武装推进的动机。因为在我国国界附近没有任何敌人，而关于敌人的情报只是根据完全虚伪的传闻（下面将加以说明），所以边区长官被陷入了出动部队前往国外对抗不存在的敌人的奇异的境地，如果不说是可笑的境地。但是，地方长官看来还没有完全失掉希望去发现带有大炮的强有力的敌人，并责成军队官长哈尔杰耶夫去办理这件事。属于哈尔杰耶夫的部队是由步兵一个连、哥萨克兵士二个连和大炮二门组成，他们应当进入埃米利河盆地。到达亚马图哨所的时候，部队停止下来了，并派出了哥萨克兵士五十人去视察地形。在接近贾伊尔哨所时，这五十人的队伍受到了吉尔吉斯人大伙匪帮的袭击，被迫退却，在掩护射击之下来到亚马图的哈尔杰耶夫部队。尽管哈尔杰耶夫在自己率领下有装备炮兵的强有力的部队，但是他没有决定出动去彻底打垮曾使哥萨克人被迫撤退的吉尔吉斯匪帮，自己请求远征部队长官前来亚马图以防任何意外事故。因此，全部远征部队越过国界，向埃米利河盆地推进，尽管当时如上所述已经奉到赫鲁晓夫取消远征的命令。因为部队在自己出国行军中到达马拉尔·苏河，在任何地方也没有遇到任何的敌人，这也正象应当预料的那样，而担心我国吉尔吉斯人出国游牧是为时过早的，所以当地边区长官为了辩护他所采取的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益处的出国远征，提出了如下的情况：(一)没有象哈尔杰耶夫部队这样强有力的部队，可能对我国沿边吉尔吉斯人发生不良的影响；(二)向埃米利河推进，只是为了使预定将全部远征部队从马拉尔·苏河上的阵地解散延缓一些时期，在彻底查明情况后实行；最后，(三)解散已经集合的和完全准备出发的部队，可能产生不利的精神上的影响，而同时不大的行军可使军队习惯于出征作战的生活。

不需要有许多求知欲和理解问题的能力，就可以在上述边区长官的解释中看出空言的搪塞，这种空言搪塞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辩解的。显然，假如是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总督，象卡兹纳科夫或麦谢里诺夫那样的人物处在赫鲁晓夫的地位，西西伯利亚部队向国外的这种远征永远也不会有的。但是赫鲁晓夫对于边区长官有着充分的信任，认为他在亚洲事务中是有权威的，在这种场合表现了使人不可理解的宽容态度。尽管在收到边区长官的上述说明以后，他也认为所叙述的论据，不能成为可以引起武装进入中国境内的证明理由，不管皇帝的意旨和对此没有全权的边区主要长官，尽管有这种严厉的谴责，问题还是不了了之。不但如此，赫鲁晓夫还申请批准这种十分无益的，可以说是可笑的远征（实际上是我国部队离开国界走了一些途程，在这种蹓蹓跶跶以后便返回自己境内）的一切费用。可是这项远征费用却使国库花去了四万五千多卢布。

七十年代中期，在我国与中国西部国界的形势就是这样的。上面所引叙的关于中国西部东干人叛乱经过情形和我国对此所持态度的实际材料导致一个结论，我国在东干人问题上的行动是不坚决的，可以说是试探而行的。关于这一问题所拟定的一切计划，实质上是一系列的治标办法，在实际上全部实行这些办法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得不把在彼得堡制定的计划彻底变更并加以修改，从而失去了必需的坚定性和稳固性。看来，这一切情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我国在东干人叛乱地区没有可靠的和有经验的代表，正如我国驻北京公使弗兰加里所指出的。因此，例如西西伯利亚长官不得不相信亚洲人，并在国界上采取了这样的办法，这种办法后来证明是不相宜的和不符合中国西部与我国领域邻接各地方的当时形势的。由于很少了解东干人叛乱进程中当时所发生的作战机动，西西伯利亚长官的某些计划和建议，奇怪得真正使人感到惊异。例

如有一个这样的长官认为，为了镇压东干人叛乱应当采取武装行动，从西西伯利亚前往乌鲁木齐，以便迎头痛击东干人的叛乱，并且使位置在东部领域的科穆尔和皮昌从阿古柏伯克的统治下分离出来。幸而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行，而西西伯利亚方面的远征军，如上所述，已被取消。同时，实行这个计划就将成为我国方面的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已经知道，阿古柏伯克于1871年向乌鲁木齐的进军，曾使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向北逃窜，进入蒙古。东干人的这种逃入蒙古在1872年也发生过，当时他们被中国军队从甘肃省逐出，迫使他们起初奔向库伦，然后奔向乌里雅苏台。1873年，中国人在攻占肃州以后，东干人便逃往科布多和布伦托海。因此，在蒙古出现东干人的大群，就是当时他们所处境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他们当时从东方受到中国人的逼迫，从南方则受到阿古柏伯克的逼迫。

由此显然可见，如果在当时我国也向乌鲁木齐进军，那么就是从西方威胁东干人，我们便在他们已经从两方面受到包围后，从第三个方面形成一个包围圈。很明显，在这种紧要关头，他们只有一个出路：全部大群奔向北方。由此可见，我国向那个不知何故被认为是东干人地区中心的乌鲁木齐进军是完全没有益处的：这不仅不能制止北部和蒙古西部的骚乱，反而会使之加重起来，从而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不是预期的结果。

最后，我国为什么需要迎头痛击东干人，象西西伯利亚边区长官所主张的那样？难道说是为了讨好中国人？但是这种美德政策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人无可争辩地仅依赖于俄国得以镇压东干人的叛乱，并收复在中国边区被夺去的各省，而他们竟报之以无礼，狡猾地拒绝批准《利瓦吉亚条约》，并厚颜无耻地要求所答应交还的伊宁边区。

一句话，正如我国曾在欧洲拯救了别人的帝位，却毫无所得反

而是有所损失，这次在亚洲也差不多同样地重演了。而且东干人对待我国并不是敌对的。恰恰相反，据这样的中国外族权威专家普尔热瓦利斯基说，东干人把俄国看做是可以指望的救星，或者至少是与中国人作斗争的同盟者。看来由于西西伯利亚边区长官声明伊宁和乌鲁木齐是东干人地区的两个最主要的中心，当时在彼得堡官方范围内所形成的意见，也同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伊宁在当时，如上所述，不是在东干人的权力之下，而是在与东干人为敌的塔兰奇苏丹阿布特拉的权力之下，而乌鲁木齐城只是在东干人叛乱的开始阶段具有叛乱中心的意义。当时乌鲁木齐地区曾驻有中国绿旗兵团，据扎哈罗夫的情报，大部分是由东干人组成的。这个兵团的多数军官，以及兵团副司令本人都是东干人。在后者领导之下，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同绿旗兵团兵士一起，于1864年底在乌鲁木齐和它的郊区实行了反对满洲官员的叛乱，占领了这个城市，烧毁了和掠夺了这个城市。此后，东干人大群从乌鲁木齐出动，前往东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境内。留在那里的东干人由于面临阿古柏伯克的喀什噶尔军队的进攻，也准备离开那里。这一切都使人得出结论，在1871年的时候，乌鲁木齐也好，伊宁也好，无论如何都不能象西西伯利亚边区长官所认定的那样，认为是东干人占领地域的中心。当时东干人的领域不是构成一个紧密连续的地区，而是分散地分布在边区各地。例如，天山附近的东干人占据了：乌苏、玛纳斯、乌鲁木齐等地；南山附近的东干人占领了：肃州、甘州等地①。因此，边区长官这种完全任意的、没有经过事实证明的、具有普通声明形式的意见，是根本上无法证实的和无可争辩地错误的。但是这是完全公开地和过于自信地表示出来的。当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种情报的来源。事情达到这种程度，西西伯利亚

①普尔热瓦利斯基：《中亚细亚第四次旅行记》，第512页。

边区长官，如上所述，竟把西西伯利亚部队于1871年必须向国外出动的主要原因说成是：他们所收到的情报说，东干人出动了三个部队，每队一万五千人，备有大炮。同时也夸大了约请我国白支吉特吉尔吉斯人起来叛乱的东干苏丹的号召。然而，按照不久收到的当时谢米列钦斯克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送来的说明，所有上述东干人出动三个部队的情报都是完全不真实的。谢米列钦斯克州区长官终是比较熟悉中国西部情况的，并对于亚洲事务特别具有正确的观点，他曾向西西伯利亚长官阐明上述东干人叛乱，完全不是属于1871年的事，象谢米巴拉丁斯克长官所认定的那样，而是发生在1867年，这从号召书本身所注明的年月日也可以看出的。在截得的号召书上所指出的东干人部队兵力的数字，据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的意见，是标明玛纳斯和乌鲁木齐城可能出动的兵员数目，而不是实际上出动军队的数目，这个数目无疑是错误的。

对于东干人地区形势的不熟悉，如此不良地影响到关于对付东干人叛乱的计划，由此可以作出结论说，该项计划如果有土耳其斯坦和草原边区主要官长参加和指导，并在预先搜集东干人叛乱所占中国边区各地形势的最确实和最可靠的情报以后，在实地制定出来，就可能较为适当。这一点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亚洲各地一切政变中的事件是变化很快的，往往十分突然地发生同旧有形势截然相反的新情况。可惜，我国当时是过分的中央集权占优势地位，因此国家机器的一切极细小的发条都集中在彼得堡。所有的计划不是都在实际执行的地方，而是在彼得堡的办公室和专门委员会里草拟和制定。在各地方所制定的那些计划经常受到修订，经常发生重大的变更。例如，据顿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说，在叶尔莫洛夫和罗津时期，在高加索进行战争，各主要长官受有独立处理之权，事情就进行得很好。后来，出现了陆军部办公室制定的夺取和征服高加索的许多军事行动计划，这些计划传达给当时的

各军团长：戈洛文和涅伊哈尔特，他们必须赶快执行所提交的计划，——我国在高加索的事业就大大地动摇了①。

我国关于东干人问题的行动计划，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也是决定在彼得堡制定的。但是没有关于该项问题的确实和详细的情报（因为在东干人地区内我们没有代表）而来讨论问题，这是困难的。而且着手起草计划，必须预先查明与东干人问题密切有关的某些情况，以便有系统地制定关于这个问题的我国行动计划。但是由于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在一个草拟的计划中加入一项附带声明：计划中所叙明的某些规定，只有在收到向我国驻北京公使调取的情报以后，才能在当地付诸执行。然而，与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我国领域接壤的中国西部各地方，正在日益迫近的事件的迅速进程，迫使土耳其斯坦边区地方长官，象我们所看到的，不等待收到北京方面的这种情报就行动起来了，并刻不容缓地占领了伊宁。因此，在彼得堡所制定的第三个计划，由于它的全部内容在实际上完全不能执行，需要彻底加以修改。结果是事件的演进仍旧迫使我们按照地方的土耳其斯坦长官所制定的计划行动，他早在1871年就已经提出要占领伊宁。

这种情况显明地证明，我早已表示的必须把商讨这种政治性的边区事宜和制定行动计划让地方长官办理的意见。这种特权之所以需要，下述情况可以作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说明，即在我国辽远的土耳其斯坦和东西伯利亚各边区，地方总督们也被赋予政治职权。例如，土耳其斯坦总督曾经按照法律被授予同相邻地域办理外交的权利②。东西伯利亚总督也是一样，按照《北京条约》第九条授权他遇有特别重要事宜可以与北京军机处，或与理藩院进行

---

① 《守旧和维新》，第四卷，第44—47页。

② 《谢米列钦斯克和塞尔·达里英斯克州军民公署组织条例和人员编制的说明书》，第133页。

书面交涉。

当然，政治性的地方考虑在执行之前必须呈送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容争辩负有主要的政治指导义务，以便使这种地方性的考虑与总的国家政策方向适应和统一起来。上面所引叙的考虑也在1903年2月26日的上谕中得到证实，在该项谕旨中表示，必须提高地方政权的意义，使地方的主动精神有广泛的发展，使它成为强有力的和合于规律的，把问题交给地方去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使之符合地方的特殊条件。但是既然政府认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地方政权，特别是在国家的边区地方，那么显而易见，直接有关这些边区地方的政治性问题，也一定必须交给这个地方政权去商讨。不可忽视，在亚洲各地方特别是在混乱时期，迅速变化的政治性事件要求有敏锐的洞察力，以便经常注意到这些事件，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办法。地方行政管理当局具有较多的手段和方法来观察这种事件的进程，并作出正确的估计。至于中央机关由于远离我国的亚洲边区，不是经常能够提供正确的指示，而且作得及时。在地方上收到指示以后，事件已经变化，象我们所看到的，该项指示便往往成为与新发生的偶然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东西，而这种新发生的偶然情况有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能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完全另一种的办法，这显然只有地方行政管理当局才能就近知晓。1883年所设立的关于变更东西伯利亚行政管理组织问题的委员会，也持有同样的意见。委员会认为，由于特殊的地方条件，沿阿穆尔边区的行政管理需要很大的自主性。然而，阿穆尔和沿海州的军政省长按西伯利亚制度的实质来说，是没有这种自主性的，而且只是总督命令的执行者，而总督所驻在的地方距离各该州区的行政中心有几千俄里之遥，他就是较好地了解地方条件，也经常会命令执行一些全然没有考虑到有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偶然情况的办法，而这种情况是只有地方行政管理当局才能了解。上述各州的军政

省长被置于这样的一种处境，他们必须或者是执行总督的命令，尽管同时可能使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受到牺牲，或者是只限于形式上的执行。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州区的军政省长认为必须采取某种有益的办法，他们应当取得东西伯利亚主要长官的许可，而等待这种许可需要几个月之久，除此以外，也可能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需要采取另一种办法的时候，才得到许可①。

至于说到土耳其斯坦和西西伯利亚远征部队在中国西部国界的行动，那么，从如上所述的这些行动中和从它们之间的对比中，不能不对经过巧妙考虑的土耳其斯坦部队的军事行动给予优越评价。远征军首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把布置在国界上的各部队派往集合地点鲍罗胡吉尔卡伦，但是认为必须：向伊宁采取进攻行动之前，从两翼保证这个行动。因此，对在亚细亚战争中有才干和有经验的上校米哈洛夫斯基统率之下在右翼行动的部队，曾经命令肃清伊犁河左岸盆地全部沿边部分的塔兰奇人，这一点，象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但是为了保证这一翼防止一切意外事故，想到在亚洲战争中不可轻视任何的敌人，科尔帕科夫斯基加强了穆佐尔特部队，并把它委托给有经验的校官叶连斯基中校。左翼方面，主力部队由鲍罗塔利斯基部队加以保证，该部队后来就并入了主力部队。在两翼的全部地方已经肃清了塔兰奇人大群，并在阿克·肯特、阿利姆图、长岔河子和绥定等处给了他们几次连续不断的失败以后，主力部队向伊宁的推进已经完全得到保证，并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土耳其斯坦军队的击溃塔兰奇人大群和我国的占领伊宁，正象所应当期待的，使当地居民，不仅是伊宁地区的，而且还有伊宁地区境外的，即与西伯利亚管区吉尔吉斯草原接壤的中国准噶尔

① 《管理东西伯利亚最主要公文汇编》，第一卷，第一册，第265页。

北部地区的，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在这种形势之下，从西西伯利亚方面采取任何的前往中国境内的军事远征，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此，这个远征也就被取消了。尽管如此，西西伯利亚远征部队按照地方边区长官的命令，象我们所看到的，仍旧向国外前进。这样没有任何确实根据和违反皇帝上谕所采取的国外远征，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举妄动。在这种几千俄里的进军中，合乎理智的目的显然是没有的。带有大炮的东干人部队已经出动来反对我国，乃是一种虚构。进行侦察的前头部队除了吉尔吉斯匪帮以外，没有发现任何敌人，我国哥萨克人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哈尔杰耶夫部队的支持时，曾不得不在这些匪徒面前撤退。谁都明白，这个部队应当不必等待任何命令立刻向贾伊尔推进，以便驱散和消灭集合在那里的吉尔吉斯匪帮。但是在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是演出了很不体面的戏剧：不是我们赶走了吉尔吉斯人，而是他们迫使我国哥萨克人撤退，并且吉尔吉斯匪帮的这种行为没有受到惩罚，因而不容争辩地对我国吉尔吉斯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换句话说，产生了边区长官所最害怕的东西，因为他曾表示部队之所以必须向国外进军，是为了借此对我国吉尔吉斯人起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但是，在实际上适得其反：没有得到哈尔杰耶夫部队支持的我国哥萨克人的撤退，不能瞒过我国的沿边吉尔吉斯人，也不能不对他们产生恶劣的印象。

边区长官还用使兵士习惯于出征行军生活的说法，来辩解西西伯利亚部队向国外的进军。这一切说法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只是忽略了这一点，即这种短期的，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兵士行军生活训练，使国库花费的代价太昂贵了，即支出了四万五千多卢布。

总的结论是，从土耳其斯坦和西西伯利亚各远征部队在中国西部国界的上述行动的对比中，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部队中的第

一个部队获得了占领伊宁和在全部伊宁地区奠定充分秩序和治安的胜利结局。至于西西伯利亚部队则没有得到任何一点政治方面的重要实际结果。

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将近终了的时候，开始传说赫鲁晓夫将不再担任他所占有的职位，但是关于谁将被派任他的职务，还没有肯定的消息。西伯利亚人对于赫鲁晓夫的即将离任是漠不关心的。看来，为此痛心也是没有根据的。赫鲁晓夫离开西伯利亚一去而不复返，离开后没有在边区的民政管理中留下任何显著的突出的痕迹。他担任西西伯利亚总督的重要和负责的职位期间，在边区的经济生活方面和居民的理智与道义发展事业中，没有作出过对边区有利的任何特别突出的新措施和改良办法。一切如旧，一切还是一般的行政管理上的停滞不前。居于管理西西伯利亚和西伯利亚所属吉尔吉斯草原这样广阔边区首脑地位的人，必须具有毅力、坚强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可惜，赫鲁晓夫是缺乏这些的，他没有天生的行政管理的才能，不能被认为是完美的国家人物。这是一个忠实于军务的军人，军务是他爱好的事业。在这种事业范围内，他在1828年勃拉伊洛夫的土耳其战役时和1855年2月12日防卫塞瓦斯托波尔时，都以突出的功绩而著名。这一日的夜间，赫鲁晓夫属下的部队有四个沃伦斯克营和三个色楞格团，占领了基连和特罗伊茨克两山沟间的地方，以便在那里建筑多面堡垒，他们受到了法国精锐部队的攻击。经过一个小时的顽强的白刃战以后，法国人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在这次战斗时，有一个北非人的法国军官持着出鞘的军刀奔向赫鲁晓夫将军，但是团部的号兵巴甫洛夫打落了军官手中的这把军刀，兵士别洛乌索夫把他刺杀了。

赫鲁晓夫从少年时代起都在军事部门服务，在尼古拉耶夫时代的军事服务传统中，受到了教育并具有战斗的经验，不可争辩是可以作一个很好的师长、军长或俄国欧洲部分的军区军队司令的。

但是，作为一个遥远边区的长官，他是不得其所的。使一个人离开他终身从事的事业，离开他熟悉的和爱好的而且能够成为有益活动家的事业，那真是岂有此理的。但是，可惜，我们在任命高级职位的时候，据弗·普·亚诺夫斯基的公正意见，没有想到对于这种职位要预先造就①。对于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他没有这种造就，没有掌握有关边区历史、种族、经济状况，以及它的需要和需求的必要情报，也没有表现丝毫愿望用访询和与通晓人员谈话的方法来了解这些东西。不可争辩，赫鲁晓夫占有边区有权有势的地位，本可给予广泛的协助和支持，来搜集有关边区科学研究、边区地方问题和与发展密切相联系的材料，可是他在这一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西西伯利亚调查研究者学会，就是说明这一点的一个鲜明的确证。这个学会按照主管教育部的御前大臣杰梁诺夫1868年9月17日批准的章程，它的宗旨是：搜集、研究和传播关于西西伯利亚的地理、统计、人种、历史和自然界历史的情报。

按照章程，学会受总督的直接领导，总督按照自己的职位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学会在它存在的全部时期内只开过一次会。接受它的约请以来，没有跟着作过任何的调查研究，甚至关于它的昙花一现的存在，在记忆中也都已消失了②。

试问，不认识人所共知的一个古老真理，不知人民疾苦和不学习人民而去管理人民，是不合正当想法的行为，赫鲁晓夫如何能够研究、或者至少是了解边区呢。

赫鲁晓夫对于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草原的不了解，最初曾希望以巡视边区加以弥补。但是他所进行的对于广大西伯利亚地域的走马观花式的巡视，对事务毫无补益，何况同时他把大部分时间

---

① 《俄罗斯导报》，1903年，第四期，第626页。

② 亚德林采夫：《作为移民区的西伯利亚》，第395页。

用于视察军队、军事部门和机关。但是就是在这里，赫鲁晓夫这个爱好军事的军人的活动，可惜也没有能够找到可以发挥自己军事知识的适当场所。从成立土耳其斯坦总督署以后，在西西伯利亚军区只留下数目不多的现役军队，大部分都调到土耳其斯坦去了。在托波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省只留下一些地方军队，他们的任务是执行地方勤务，即在城市站岗放哨、护送被押人犯和在需要使用兵力的场合，一般协助地方民政长官。至于在这种巡视中对于民政部分的检查，则始终是处于第二位的。

要切实了解这个民政部分，必须就地坚持不懈地和埋头苦干地工作，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巡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卓越活动，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明证，他曾模范地管理和很好地了解西北边区，而并没有离开维利诺。但是赫鲁晓夫对于这种埋头苦干工作是力不胜任的。他就任管理边区时年已六十以上，即已达到了这样的年龄，这时大多数人不是进行服务活动，而是结束自己的服务活动了。

“春兰秋菊，物各有时。”

因此，赫鲁晓夫这个本质上是善良的，具有最良好的意图，并愿意为边区造福，但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博克有句著名的格言：最好的人有时会是很坏的管理人员。这在他的身上再现了。尽管在赫鲁晓夫就任管理军队和边区的最初时期，看来是可以期待他会坚决地把事情抓起来的，可是这种期待结果没有证实。例如，来到鄂木斯克以后不久，在接见军政和民政部门官长人员的时候，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严厉的讲话，其中特别着重指出，在签署对贿赂行为的严格判决时，他是不会手软发抖的。但是这种严厉的话也只是再一次证实了一句著名的意大利成语：言行之间，隔如大海。

在赫鲁晓夫任内，贿赂行为比起他的前任时期一点没有减少，差不多甚至超过了。赫鲁晓夫的这些话使我们大家产生了沉重的

印象。首先我们不了解，这种话是对谁说的，以严厉惩罚贪污盗窃来吓唬人，赫鲁晓夫所指望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这种话是对公益的违反人和纵容人说的，那么这种方法丝毫也不能使根深蒂固、顽强不改的和擅长故意拖延诡辩的咬文嚼字的官员们感到发窘或为难。要把这些先生们打倒，甚至最有经验的官老爷也是力有不足的。同样，单纯一种口头上的恫吓不仅不能根除，而且甚至不能减少营私舞弊行为。不容怀疑，西伯利亚受到了营私舞弊行为的害处，边区的辽远和西伯利亚地域的广阔无垠助长了这一点，使得没有任何可能进行监督的一切事物，特别是在面积超过西欧地域的闭塞和遥远的边区地方。在与这种舞弊行为作斗争中，甚至象普·德·戈尔恰科夫这样坚强和严厉的总督也是无能为力的，在他的任内，有些从事投机倒把的官员给自己积得了上百万的财富①。在赫鲁晓夫任内，对于减少营私舞弊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做。可是，他的前任杜加麦利没有说任何豪言壮语，在他就任管理边区之初，就免除了在前任加斯弗尔德时期有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行为的官员的职务。其次，依赖杜加麦利的理智和坚决的命令，在他就任管理军队和边区的第一年，曾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他的前任时期所确定的供应军队（分布在谢米列钦斯克州南部科帕尔和阿拉托夫地区的）粮食的办法。在这种办法中，象我在上文已经叙述的，除了国库以外，大家都给自己取得了利益而损害了公家的利益。杜加麦利所采取的办法，比起最初的预算节省了十五万卢布以上。按照他的首先提倡，在鄂木斯克省的营私舞弊行为也大大地减少了。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讲话中表示必须尽力反对贪污盗窃行为时，看来是忽视了这种营私舞弊行为不只是在西伯利亚存在，是不是能够保证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若干地方在同样规模或许更大规模

① 亚德林采夫：《作为移民区的西伯利亚》，第359页。

内没有这种事情。因此，赫鲁晓夫的就职词实际上成了无的放矢。虽然按照讲话内容可能得出结论说，他来到边区是抱着坚强的决心，要由自己完全自主地来进行管理，可惜他在最初的时候就不得不放弃他的意见。赫鲁晓夫对于民政部分没有任何准备就得到了新的任命，主持他所完全不熟悉的事情。就地了解这种事情和研究民政管理的一切详情细节，他已经力有不逮，因此在作最初一些报告的时候，他就象一个处在茂密森林中的人，不知如何走出去，可是他却有责任向大家指出道路。一句话，他从第一步起就陷入当地投机人们的掌握中，在实际上不是边区的主人而象是它的客人。西伯利亚的官员们利用这一点很快地就使赫鲁晓夫明白，他不了解民政管理的地方条件，没有他们是不行的。他们到他那里去，总是带着重甸甸的大皮包，一大批形形色色的错综复杂的案件，这种案件是总督兼军区主要长官和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派任哥萨克军长官的职务事宜的情况下，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执行所有这些职能，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困难的任务，他只好信任自己的从属人员。可惜的是，这种信任不是永远落到称职的和诚实对待自己职务的人员。结果是，边区在实际上是由享有赫鲁晓夫充分信任的人员来管理的，他自己却不知不觉地离开了主要事务，而从事于一些琐碎小事。赫鲁晓夫由于记忆力不好，往往就同一事签署完全相反的呈请。例如，在撤销了托波尔斯克鞑靼骑兵团和半个步兵营后，原来打算按照赫鲁晓夫的呈请把已撤销的部队的军官转入分布在托波尔斯克省的地方军队服务。这个呈请是向西西伯利亚总署即向它的哥萨克事务处作出的（该处出于异常的办法，主要管理属于军事部门的哥萨克军队，而设在西西伯利亚总署内）。在将此事通知军区司令部长官时，他作为托波尔斯克省地方军队的官长，显然不愿意在他的领导之下有已被撤销的鞑靼骑兵团的军官，因为他们之中多数人不仅不知道战列步兵勤务，而且甚

至也不懂俄国语言，因此请求赫鲁晓夫：不要把这些军官转入地方军队，而按照一般的办法留在编制之内。赫鲁晓夫同意了这个呈请，而忽略了在这以前他已经向总署即民政部门作过完全相反的提请。这样一来，就使彼得堡的中央部署陷入困难处境之中，因为关于同一问题收到了两个不同的呈请。

实际上赫鲁晓夫自己造成了这种矛盾的原因，因为他准许吉尔吉斯草原各州的军队司令和地方军事教育机关官长，即西伯利亚武备学校校长和军事初级中学校长，向他作军事系统的呈报。准许这种呈报是直接违法的，即违反在此不久以前所实施的军区管理条例的，因为按照该项条例，军事系统的呈报要送交军区管理公署的各部主管，即参谋长、炮兵和工兵长、军需长和军医主任。对于各师师长（在西伯利亚就是各州军队司令）尤其是军事教育机关官长没有授予这种亲自呈报的权利。但是赫鲁晓夫，看来是属于这样的一批人，他们否定或者至少是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按照陆军大臣米留亭伯爵的方案所施行的军区管理、废除军长职务以及一般地废除军队军团组织的制度。现时已经是任何人也不会否认，这种革新建立了以军队司令和在他主持下的军区会议为代表的地方实际监督，对于军队的完善组织和经济管理起了最有良好效果的影响。在象西伯利亚这样的国家边区实施军区制度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也还因为革新以前，在这里所存在的不是象在俄国欧洲部分那样的军事管理的中央集权，而是分散状态，而且范围如此广泛，以致陆军部本身没有掌握关于西伯利亚军粮管理业务的任何确实情报。这种不明情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对于分布在谢米列钦斯克州南部各区的军队，在供给粮食上有那种逍遥法外的舞弊行为发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详细叙述过了。

赫鲁晓夫由于不可理解的软弱，对于如上所述没有这种合法权利而向他提出呈报的官长人员持有宽容和迁就的态度。这种突

然的呈报差不多总是会得到赫鲁晓夫的批准，尽管确切根据军区管理条例这种呈报应当转交军区管理公署的该管部门，以便对于呈报中所提出的问题结合法律和从前文件加以考虑。有时发生赫鲁晓夫对上述官长人员的突然呈报所给予的准许，经过调查发现是不符合法律的和同他从前的命令相抵触的。很明显，这一切都造成了混乱，造成权力的分散，并破坏了军区管理的统一。而且除此以外还发生，送到该管部的关于重要问题的文件，特别是在最近时期，叙述得很肤浅、缺乏证据和常是需要加以补充说明。总而言之，一切办公室的工作大概都使得赫鲁晓夫疲惫不堪和特别为难，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力求加以避免。自己担负甚至不大的一部分工作，他认为是同他的品位不相符合的。有过这种情况，在我报告一个复杂混乱的事情时，我表示自己的意见说，此事在当地即在斋桑城去处理可能会作得快一些、简易一些和便利一些，因为在那里可以搜集一切必需的情报，而不必从事于文件的往返。根据这一点和由于赫鲁晓夫当前有斋桑之行，我请求准许把此事交到他的行营办公室，由办公室主任来到斋桑以后，就地搜集关于此事的必需情报，按照法定程序进一步处理此事。但是这种办法是赫鲁晓夫所不喜欢的，他以显然不满意的神气反驳我说："怎么？你想要我在自己旅行的时候还作调查工作吗？！"在这以后，我除了耸一耸肩以外，什么也不能说了，陷入无所措手足的境地。赫鲁晓夫的这种行为使我不得不把最迫切的事务象许多别的事务一样，沉没在文牍往来的汪洋大海之中。

有一次我带着一个容量很大的公文包去见赫鲁晓夫，他看到这个公文包的时候大为惊恐，并向我指出快到两点钟了，他在两点钟以后是不听取报告的。我赶快安慰他说，我拿来报告和签字的文件不多。在拿来的公文包里有些前几年的文件，我拿来是以防万一，如果他想要有原件的证明材料。

赫鲁晓夫晚间完全不办理事务，并且说“晚间是我的”，可是他忽略了，他把早晨也广泛地利用了。在我作各次报告时，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对于事务的实质没有什么意见可说，而是斤斤计较细节，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意见也是很不合理的。例如，在报告军区奖励的时候，我顺便申请给司令部的一些官员以金钱的奖励，这在当时即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是法律所许可的。当时赫鲁晓夫以不满意的态度向我指出，我所申请给予奖励的人员，多数被我列入发给金钱奖励之内了。“得了吧”，赫鲁晓夫说道，“这是对于勋章的轻视啊！”我回答说，这种呈请是合法的，没有构成任何违反现行法规之处，而要紧的是，我所呈请给予金钱奖励的人员大多数是结了婚的和有家属的，他们的薪金有限，又没有任何财产而处于很窘迫的状况之中。在这种条件下，因被奖给勋章而从薪金中作任何扣款，对他们都是真正的剥夺。关于对勋章的轻视是谈不到的，我敢用头颅来保证这一点。赫鲁晓夫对于勋章的这种见解之尤为奇怪的，还因为在我国，从尼基坚科院士和教授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发出了为从前任何一个朝代所没有过的那么多的官衔和勋章的奖赏。这是真正的多得不计其数。一位熟悉物品统计学的官员曾向亚历山大·瓦西利耶维奇·尼基坚科说，在尼古拉皇帝时代，通常的奖赏比例数字在全帝国每年构成四千至五千之多。在当时（1868年）这个数字每年达到一万和一万一千之多。最后，在我国旧日的报纸和杂志中可以看到不少的场合，证明不是轻视勋章，而是我们对于勋章的爱好。例如，在我国的一个定期刊物中曾经叙述如下的事情：在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乘车过石岛大街的时候，有一个走过街道的官员被压倒在马下，大公命令把马停下来，查明了这个官员没有受到任何严重伤害后，把他叫到自己面前。大公知悉他在枢密院服务和所得薪金甚微以后，命令他到宫中去见自己，届时他就去了。当大公得到报告说这

个文官已经来到的时候，殿下从办公室出来接见他，拿着装有许多钱的一个纸包，大公要把它交给官员，作为补偿对他所造成的骚扰。但是官员开始下跪，并以恳求的语气说道："请殿下开恩，最好是取得三级圣安娜勋章。"有了这样事情，未必可以同意赫鲁晓夫的说法：我国存在对于勋章的轻视。但是不仅是在我国，而且在各共和的国家里，也不存在对于勋章的完全轻视态度。大家知道，在格列维总统时期甚至发现法国人争逐勋章的舞弊行为。在北美合众国的公民之间也是一样，在那里根本不存在勋章，可是在那里同样遇到愿意佩带勋章的人们。例如，在一次杜尔里宫的跳舞会上，拿破仑三世看到一个来宾佩带从来没有见过的勋章。来宾是一个美国人，他所佩带的美丽勋章是他自己杜造的①。

赫鲁晓夫对于自己属下在边区占有高级职位的一些人员的态度，他之不善于公正估计他们的功绩，都以自己的偏颇性而使人感到惊异。有办事能力的和称职的行政管理人员都不得不辞去自己的职务，有时换上一些办事能力很差的人们。例如，由于同赫鲁晓夫的意见分歧，托波尔斯克省省长亚·伊·杰斯波奇-泽诺维奇曾不得不辞去职务。

莫斯科大学毕业生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泽诺维奇准备从事教授工作，但是由于情况变化，他改往东西伯利亚服务，在那里他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和毅力引起了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对他的注意。在先任恰克图边区委员的职位，后任恰克图城市长官时，他以极其切实和坚决的处理事务使自己的活动而著名。例如，他揭露了恰克图海关的营私舞弊行为，因此增加了国库收入每年达一百五十万之多。1863年，他被任为托波尔斯克省长的职位，受到杜加麦利总督的充分信任。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867年，给人们

① 卡·阿·斯卡利科夫斯基：《多事的人生》，见《新时代》，1905年，第10448号。

留下了有毅力和有才能行政管理人员的印象。泽诺维奇因自己多年的工作，根据托波尔斯克城社会各界的申请被授予托波尔斯克城荣誉公民的称号。泽诺维奇的去职，使所有的人，特别是托波尔斯克的住民，产生了极不愉快的印象。在内政部中也是大惑不解，因为泽诺维奇被认为是最有才能的省长之一。泽诺维奇的继任人，由于一种奇怪的可以说是笑话的误会，被委派对这个职务完全没有才能的切贝金将军充任，他任省长才几个月的时间，就按照赫鲁晓夫的申请，由他所熟悉的团长索洛古勃上校接替了。但是同时赫鲁晓夫没有看到，指挥一团军队时是不能取得民政管理业务的造就的。既然对于民政工作以及边区和西伯利亚地方管理的特点全不了解，索洛古勃担任这个职位是完全不适宜的。他不久在托波尔斯克同一个富有的女人结了婚，同她一起前往彼得堡，在那里自杀而死。这种突如其来的悲惨结局使我们非常大惑不解，可是为什么和怎样会发生这个事故，还是一个闷葫芦。一般来说，赫鲁晓夫对于边区相当重要职务的委任，在多数场合都是不成功的。有时由于庇护和旧日相识，对于事务全无才能的人取得了职位。这一切情况在赫鲁晓夫的继任人卡兹纳科夫任内，当所有这些人们被免除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时，就很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看来，赫鲁晓夫是把自己的职位看成为酬劳他的战功而取得的一种薪高而清闲的特别荣誉委任。但是对这些功绩和给予他的战斗职务的卓越称号，当时已经作了应有的评价。例如，服务的结果，他除了乔治三级和四级勋章以外，还得到了包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在内的一切别的勋章，有了陆军上将的官阶、侍从将军的称号和在波兰每年三千卢布的出租地亩。但是试问，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嗣后在华沙和维连斯克军区的军事服务中，赫鲁晓夫做了些什么呢？在总督职位上他没有表现出行政管理的才能，边区民政管理事务丝毫没有向前推进，而是恰恰相反，在这一方面看

到了后退的现象。例如，在他任内，欠缴税款于1867年开始形成，特别是在托波尔斯克省和托木斯克省，逐渐增长，最后达到百万的数字。地方行政管理当局把造成这种积欠的原因说成是：歉收、牲畜死亡、雹灾和其他人民灾难。在赫鲁晓夫的继任人卡兹纳科夫任内，坚决把这件事抓起来，并作了全面了解，结果发现，积欠税款之所以产生完全是由于另外的原因，即由于行政管理当局的调度无方，而一部分也由于地方民警低级官吏的营私舞弊。原来，在征收税款的时候，民警官员只是遵循对于欠税人偿付能力的个人意见，以及由于无暇及此和玩忽职责，或许是由于个人私利的意图，而任意使缴纳各种税款逐年延期。因此，法定程序被破坏了，财政预算紊乱达于极端，而真正的欠税人却看不到了。在这种混乱之下，农村居民看到有机会逃避（哪怕是暂时）纳税义务，就开始没有正当理由而拖延缴纳。新任的边区长官不得不向各省省长申明他们的征收税款职责，并指示追缴的法定程序和个别团体与个人确实无力缴纳税款时的办法①。

他在中国国界上的管理也是这样，由于过分相信地方边区长官，也发生过一系列的失败措施，这些措施或者是被高级政府制止了（在中国境内卡巴河上建筑堡垒），或者是没有产生任何对于边区稍为有利的结果（远征部队越过国界前往埃米利河）。在赫鲁晓夫时期在中国国界上所采取的这些军事远征行动，都是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产生的，不是基于国家的考虑，甚至象我们所看到的，是同政府的指示相违背的。后来赫鲁晓夫自己相信了这一点，但是可惜时机已经失去，要改正所造成的失策和上述州区长官在边界上的胡闹行为，已经困难了。

赫鲁晓夫的战功发展了他的浅薄的自尊心，而在某种程度上

① 《卡兹纳科夫总督奏折》，1874年，第7页和第8页。

还发展了虚荣心。授予他以总督的权利，对于自尊心是如此有诱惑力的，以致更加重了他的这种倾向。例如，他大概注意到，在一切私人的社团集会、跳舞会、歌舞会等等，也有一切官长人员在场，他都出席，尽管政府方面并不要求这样做。周围人们的这种趋奉和卑躬屈节颇使赫鲁晓夫感到兴趣。他还命令，要一切军事和民政部门的人员，凡是应该到总督面前报告和一般地因职务上的事情来谒见的，都必须身着制服来见他。凡是被邀请参加打牌晚会的人，也必须一律身着制服到场。这一切对我们都是非常受拘束的，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在新总督任内就被废除了。在赫鲁晓夫那里举行晚会，就是所有被邀请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喝一杯茶，就向预先按对称次序摆好的许多绿色小桌子旁边入座，开始打牌。十二点钟摆上晚餐，然后客人散去。说到赫鲁晓夫的这种晚会，我不能不说一下在伊尔库次克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所举行的招待会，在这种招待会上，被邀请的人有充分的自由：玩牌或者是闲谈。然而后者居多。在他的生气勃勃的客厅里，活跃地交换意见，发生辩论，涉及和讨论关于领有阿穆尔地方和太平洋海岸的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说到了中国、朝鲜、日本和美国的当时形势。当时，象我已经说过的，远东成为世界事件的舞台，除了俄国和美国以外，欧洲的头等海军国家也都积极参加了这个舞台上的竞争。很明显，当时伊尔库次克的知识界，其中有罗曼诺夫、米留亭、布达果斯基、司徒卢威、库克利、谢利斯基和其他许多人物，很关心俄国在亚洲东部边区所应占有的地位。穆拉维约夫伯爵自己往来应酬他的客人，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谈话。据米留亭说："穆拉维约夫伯爵具有使他所参加的任何团体活跃起来的可贵才能。国事的操心、个人的考虑都被推到一边去了。他是一个最愉快的谈话人，同一切人平等，他不使任何人感到拘束，不引起死气的沉默，不迫使人们专注于他和只听他的讲话。"

在得到关于伊格纳提耶夫将军成功地签订了成为我国与中国外交史上极其光辉一页的《北京条约》的可喜消息以后，穆拉维约夫伯爵为了表扬伊格纳提耶夫的功绩，在伊尔库次克为他举行了盛情的招待会。穆拉维约夫伯爵亲自到渡口迎接了他，把他接到自己公馆的大厅，本地上流社会在那里给他献了面包和盐；然后在另一个大厅里有主要的管理人员，即参议会和特别委任人员在那里等候。穆拉维约夫伯爵说："这是我的最亲近的参议们和同事们。他们同我一样，高度评价你给俄国特别是西伯利亚所作出的功绩。"然后举行了宴会、文艺晚会、业余的戏剧演出伴随着晚餐，最后是送别。开始是彬彬有礼的宴会和彬彬有礼的致词，可是后来就变样了，说了些别种性质的祝词，并以歌唱而终结。穆拉维约夫伯爵始终是平静的、愉快的：他的在场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拘束①。

在七十年代的鄂木斯克，以长官为榜样，打牌的风气大大地盛行起来了。全部的空闲时间都在俱乐部和私人家庭中充满许多白粉末的绿桌旁消磨了。甚至青年人也不厌恶以打牌为自娱，它似乎被提高到了为祖国服务的某种仪式。有些人的意见认为，玩牌也有它的好的方面，因为它使人丢开不许可的和有害的想法，以及一般地丢开所谓荒谬的思想。另一方面，当时的鄂木斯克上流社会的每天每日的单调生活，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归宿，使所有的人陷入了沉睡和淡漠之中。赫鲁晓夫本人在自己进行管理的近几年，显著地衰老了，正如一般说法，变了样了。他管理民政事务已经表面化了。

军政部分仍旧使他很忙。但是这一部分比起包括象西西伯利亚这样广阔边区的最重要的行政和经济利益的民政管理来，实际上是沧海一粟而已。这一切不能反映在作为边区管理主要行政中

① 巴尔苏科夫：《尼·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第一册，第609—610页。

心的鄂木斯克的社会生活上，而在这个中心是某种停滞和淡漠占有优势。尽管话说得很含蓄，但是人是要死亡的，而历史应当永远存在。我应该悲痛地说，当时的放任不羁已经达到这样程度，致使赫鲁晓夫早晨在他的花园游玩时，十分意外地碰到了一具不知被什么人放在花园墙根旁的棺材。另一种说法是，棺材是放在总督住宅的门道地方。谁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就这样成了闷葫芦。这个可悲的事件使我们大家产生了难堪的印象。赫鲁晓夫虽然具有种种缺点，实质上人是善良的和充满极其良好的意图。他的全部过错是在于他从事了力所不能胜任的事务。

赫鲁晓夫周围的人，即他所绝对信任的亲信人等给他许多的害处。我自己有时不得不听到赫鲁晓夫的意见，这是那样明显的，不难看出它的来源。所有使赫鲁晓夫知悉的传言，常把事情作出十分虚假不实的形容或作出歪曲的传达。亲信人等不懂人情激起了社会上的不满，看来是出现讽刺诗的原因，这种诗不知何人所作，并有许多份在城市传播。这种情况构成赫鲁晓夫时代的象征，因为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都是没有过的……

……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巴布科夫的记录在这里终结了。从死者手稿里所发现的笔记中，在第七章里打算叙述赫鲁晓夫离去鄂木斯克和任命新总督卡兹纳科夫侍从将军的情形，并对1875—1882年六年时间他的军政和民政活动与管理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的工作作一概述。在第八章，即最后一章里，打算叙述麦谢里诺夫的时期和巴布科夫被派为划界全权代表最后一次前往国界，划定从大阿尔泰山脉至萨乌尔山脉中穆斯套山的中国国界，执行修改《塔城议定书》所定国界的1881年《彼得堡条约》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

除了这个预定计划以外，在巴布科夫的手稿中，还发现关于卡兹纳科夫和麦谢里诺夫的笔记。我想这些记录对于读者将不无趣

味，因此，全部把它发表出来，关于卡兹纳科夫的记录如下：

聪明的才智、博学多识、优越的记忆力、在高级社会经常交际中所获得的沉着和有分寸的态度、雅致的风度、待人接物经常和蔼可亲与委婉客气，都是卡兹纳科夫的优良品质。如果对这一点再加上漂亮的和使人喜欢的外表，那么关于他可以说，是普洛米修斯神用最好的泥把他塑造出来的。卡兹纳科夫具有出色的才干，在军政和民政方面占有重要行政管理职位，他在开始管理军队和边区时，已经是一个完全定型的具有经验、业务知识和明确做法的国家人物。

卡兹纳科夫始终严格遵循一个实际上成为他的行动公式的规则。这是学识为了预见，而预见为了行动。因此，任何呈请许可的事宜，必须预先对全部详情，对各部分、成分和细节作出妥善的研究。所有县警察长人员必须随身携带他们管区的关于居民成分、动态、财产、文化教育、民间食粮、工业、商业、农业、畜牧业等等统计数字的总结。

总而言之，卡兹纳科夫千方百计地鼓励和协助关于边区行政管理问题的各种材料的搜集、仔细探讨和研究。

应当归入卡兹纳科夫的重要措施之列的，还有那种在他就任管理边区之初已经用来指导民政和军政一切事务的正确和合理的方针。这一点，我理解为使一切事项按照法定程序处理。乍一看来，这可能显得奇怪，因为日常的事项，无论民政事宜还是军政事宜，别的处理办法看来是没有的。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例如，从加斯弗尔德时期起，在边区主要长官署建立了一个所谓行营办公室。在长官巡视边区的时候，行营办公室办理很广泛的事务，不仅处理地方官员的各种呈报和申请事项，而且也准备送往彼得堡该管部的广泛报告。很明显，在边区主要长官巡视边区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办公室在多数场合是不行的。在这种巡视时，一定会

发生各种问题，坚决需要仔细的研究和考虑，也永远会收到许多呈请、呈报和申请。如果假定，所有这些事务都应当加以审核，有些也应当在行营办公室内就地解决，那么这就自然会引起一系列的事务。这种办事程序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实质上具有私设的，可以说家庭的性质，降低了该管政府机关的步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削弱对公务人员毅力的激励作用，因为在他们目睹之下，用公然破坏法定程序来审查和解决各种事项。而且在私设的机关中所执行的事项，只是嗣后才送交政府机关查照。但是除此以外，在巡视边区时期对于官长人员的突然呈报和申请，不在相应的政府机关把这些申请预先加以审查和考虑是否符合法律与前案，而作出任何的决定，都一定会引起处理中的抵触和各种各样的不妥当。赫鲁晓夫丝毫不受这个拘束，直接接受了他无权接受的官长人员向他所作的申请，而且往往立刻对于这种申请就地给予许可。新任边区长官认为这种由习惯产生的而非法律所定的呈请，是不对的，拒绝了它。这种呈报的不能成立和不正确，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关于谢米巴拉丁斯克州建筑新的和逐渐改善现有建筑物的问题上。州区官员说服了赫鲁晓夫，在吉尔吉斯草原边区建筑若干房屋，以及修建桥梁时，使用每年拨给边区主要军事长官不作报销处理的特别款项，而由军队采取招商包工的办法，就会使这种业务办理得较为迅速、简便，主要是较为价廉。总而言之，赫鲁晓夫按照私自的呈请，认为可把吉尔吉斯草原的若干建筑，不必经过工程部门，即实际上没有工程师的参加而加以实施。对于草原建筑这种意见的站不住脚不久就暴露出来了。采取招商包工建筑起来的房屋，在建成以后过不多久就需要修缮，而这种修缮既没有列入预算，因而也就没有列入最初请准的拨款。因此，需要有用于经常保持建筑物的新拨款，而所谓价廉就成为虚构了。

建筑桥梁发生了大笑话，据当时流行的传说是，桥梁的建筑人

认为可以用许多灌满大鹅卵石的木架建立桥基或桥墩。但是在春季的时候，在水的强大压力下，所有这些桥基都被冲毁和破坏了。在另一处山区河流上建筑桥梁的时候，不大高明的建筑家为了减低水的压力，决定把水引入在主流旁边所挖成的沟渠，而在主流之上建筑了桥梁。在春季的时候，河流不知何故忽然想要使大量的水不按主流河道，而按新掘成的渠道而流。因此，主流逐渐浅涸了，而桥梁成为不是架在河流上而是架在它的干涸的河道上。

这种情事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当地边区官长和赫鲁晓夫大概都是想入非非了，认为在建筑公家房舍和建造其他建筑物的时候，可以不用技术人员。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对头的，尤其是所有此类建筑物嗣后总是要移交给工程部门的。至于说到价廉一节，象我们所看到的，值得大大的怀疑。关于建筑房舍时技术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应当说官长始终具有预防这种舞弊行为并及时加以制止的手段和方法的。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显明确证的，是弗·阿·帕纳耶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所举出的克列英米赫利伯爵为消除建筑尼古拉耶夫斯克铁路时的舞弊行为所采取的坚决措施的实例。据帕纳耶夫说，由于铁路司所订立的不成话的合同，在距离铁路工程遥远的地方枕木每根作价四至五卢布，而当时的实际价值则不超过三十戈比。克列英米赫利不爱开玩笑，给了包工人以坚决的申斥，此后枕木的定价规定为一个卢布五十戈比，而不是五个卢布，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① 。

最后，如果我们设有特别部署，它的直接职务在于建筑公家房舍，那么越过这个部署和限制它的活动范围，从许多方面考虑都是不适宜的，首先是因为这种办法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甚至引起经济业务本身的衰落。可以作为这种确证的，是在帕纳耶夫的同一

① 《弗·阿·帕纳耶夫回忆录》，见《俄罗斯的旧时》，第七卷，第56页。

回忆录里所举出的实例，在缅希科夫任内从交通部把该部所掌管各种业务移交其他部门管理，这些业务也就由于自然的原因，后来趋于完全的衰落[①]。

在这种场合的活动越过专门的部门，是令人惊异的。在卡兹纳科夫任内边区的一切建筑都是在工程部门和民间技术人员参加之下进行的，而并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不便和重大舞弊行为。任何一种重要情况都逃不脱卡兹纳科夫对吉尔吉斯草原建筑公家房舍事宜的洞察力，而在赫鲁晓夫时期对此则没有加以任何注意。这件事的实质在于谢米巴拉丁斯克州的许多军队房舍，其中也包含没有工程部门参加建筑的，多数场合只是用作军队的暂时宿舍和经济房舍。因此，谢米巴拉丁斯克长官于1877年曾申请迫切需要在科顿·卡拉盖地方建筑供哥萨克兵士一个连应用的新营房，并应带有附属房屋和容纳一千五百俄石粮食的仓库。新任的州区长官于1880年认为所有这些建筑物的建造是完全多余的。这种建筑新的和改建已有的军队房舍的办法，不是根据经常的需要，只是根据短期的应用，用过之后大部分失去了它的作用。据卡兹纳科夫的意见，除了非生产性的花费以外，对于军队本身的物质福利也有不利的影响。由于这种办法，使军队失去在最可能经常驻扎的地点享受合理花费公款可能给他们营房配置的那种便利。为此对地方边区官长曾经指出这种经常分布军队的必要性，这将严格地符合地方服务的需要，主要是保卫国界和在草原游牧居民中间维护秩序和治安的需要。

卡兹纳科夫是一个很有头脑和抱有绝对正直意图的人。这是一个具有高尚思想、少有的能掌握分寸和善于把有才干的同事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

---

① 《弗·阿·帕纳耶夫回忆录》，见《俄罗斯的旧时》，第七卷，第65页。

卡兹纳科夫在那里所作的报告，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有高度的教益意义的。在作这些报告的时候，可以获得技能和掌握对于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正确合理的观点。这大有助于卡兹纳科夫善于集中思想于一定的事物，推测全部事务的主要速度和重心，能使事务得到最符合于实际情况的转变和解决。最后，他善能在事务中找出能够全面说明和提供相应细微含义的方面和细节。这一切综合起来大有助于事务的正确的和公正的解决。

卡兹纳科夫不倦地进行工作，还以自己的范例来吸引其他的人去进行工作。

我记得，有一个时期我曾担任五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委员会的责任是研究民政方面需要专门知识和经验的各种问题。尽管这种任务有一切的困难，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会得到边区主要长官方面的同情、关注和对于我们工作的正确估计……

在对边区管理各部门采取改善办法的时候，卡兹纳科夫总是预先力求全面了解事务情况，并加以研究。对于每一问题深入了解之后，他常在其中发现了新的途径和前程。这一切也就迫使官员们深入地思考问题，而不是浮于问题的表面，象从前所做过的那样……

明智政府的义务，据扬松教授说，应当认为是认识被统治的东西。这个真理被卡兹纳科夫和麦谢里诺夫完全掌握了。前者要求县警察局长编制关于各该县区行政管理和产业一切部门的完全统计情报。据我所记忆到的，他曾不止一次说过编辑汇编的意义，其中要列入关于县区人口的数目和动态、商业和工业进行情况、五谷和饲草收成及其他等等的一切材料。按照麦谢里诺夫的首倡，每年出版了西西伯利亚的年刊，列入关于西伯利亚的统计和民族的情报。这种年刊成为办公室内查考各种事情的有益的案头书籍。

在西西伯利亚的所有总督中，卡兹纳科夫比别的总督更多地理解到，政府对于这个地方的作用，只有在该地方得到很好的调查和研究，以及政府当局的代表掌握了充分了解西伯利亚和它的住民所需的一切必要材料的时候，才能是有成果的。

卡兹纳科夫善于把有才能的和各方面正派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也把有才能的、熟悉自己业务的和极认真的人安置在鄂木斯克警察机关的首脑地位。

麦谢里诺夫在严厉的外表掩盖下，具有内心上的良善，不由自主地吸引着一切很好了解他的人们。麦谢里诺夫管理边区的时期很短，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他为了边区的利益也付出了不少的劳动，并坚决地继续了卡兹纳科夫所开始的事业。

人名译名对照表

Абакумов 阿巴库莫夫
Абдулла-Амур 阿勃杜拉·阿穆尔
Аблай 阿勃莱
Аблайханов, Сюки 休基·阿勃莱汉诺夫
Адил-Огла 阿布拉特
Адрианович, Константин
康斯坦丁·阿德里昂诺维奇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ет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Али, Магамет 穆罕默德·阿利
Али-Адилев 阿利-阿季列夫
Алтын хан 阿勒坦汗
Амондт 阿蒙特
Амурсана 阿穆尔萨纳
Андреев 安德烈耶夫
Андреевский 安德烈耶夫斯基
Андроников 安德罗尼科夫
Андронкин 安德隆金
Аннак 阿纳克
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
Ануйль 阿奴伊利
Арман 阿尔曼
Арроусмит 阿罗乌斯米特
Атабек-Датха 阿塔别克-达哈
Аткинсон 阿特金森
Ачкей 阿奇凯
Аюк 阿玉奇

Бабков, И.Ф. 伊·费·巴布科夫
Байджабин, Тобак 托巴克·巴伊贾宾
Байков 巴伊科夫
Балицкий 巴利茨基
Балкашин, Н.Н. 尼·尼·巴尔卡申
Баллюзек 巴留泽克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班蒂什·卡缅斯基
Барабаш 巴拉巴什
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
Барсуков, Егор 叶戈尔·巴尔苏科夫
Бартенев 巴尔捷涅夫
Барятинский 巴里亚京斯基
Бахтинский 巴赫京斯基
Бебутов, В.О. 弗·奥·别布托夫
Безак 别扎克
Бейтон 拜顿
Белоусов 别洛乌索夫
Белявский 别利亚夫斯基
Бем 别姆
Беренс 别林斯
Блудов 勃鲁多夫
Бобровников, И.А.
伊·阿·鲍勃罗夫尼科夫
Богданович 鲍格达诺维奇
Бокль 博克
Болгосу 博勒果苏
Бонча-Осмоловский
邦恰·奥斯莫洛夫斯基
Бородин 鲍罗金
Боротальский 鲍罗塔利斯基
Борх 鲍尔赫
Боярский 鲍亚尔斯基
Браон 勃拉昂
Брюс 卜鲁斯
Будогоский 布达果斯基
Бузрюк-хан 布兹柳克汗
Букаш 布卡什
Букей 布凯
Буксгевден 布克斯格夫堡
Бурбулон 布尔布隆
Бутков, И.И. 伊·伊·布特科夫
Бутовский 布托夫斯基

Бутухту-хан 布图赫图汗
Бухгольц 布赫戈利茨

Вагин 瓦金
Валий 瓦利伊
Валиханов, Габайдулла
哈贝杜拉·瓦利哈诺夫
Валиханов, Ч.Ч. 卓·成·瓦利哈诺夫
Вардугин, Г. 格·瓦尔杜金
Вардугин, М.Ф. 姆·弗·瓦尔杜金
Васильев, В.П. 瓦·巴·瓦西里耶夫
Вебер 维别尔
Вельяминов, И.А.
伊·阿·维利亚米诺夫
Венюков 维纽科夫
Веревкин 维列夫金
Веригин, А.И. 阿·伊·维里金
Веселовский 维谢洛夫斯基
Вилькен, фон 维里肯
Вланган 弗兰加里
Власов 弗拉索夫
Войцехович 沃伊采霍维奇
Воронин 沃罗宁
Вэн-Шо 文寿
Вязовский 维亚佐夫斯基

Галдан 噶尔丹
Галдан-Цэрен 噶尔丹策零
Галлерштейн 加列尔什坦
Гартлинг 哈尔特林
Гасфорд, Г.Х. 古·赫·加斯弗尔德
Геблер 格勃列尔
Гегель 黑格尔
Гедеонов 格杰奥诺夫
Гейден 戈登
Гейнс 根斯
Генце 根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谢·米·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Гердер 格尔杰尔
Герди 哈尔德
Гинтовт 金托夫特
Глазунов, И. 伊凡·格拉祖诺夫
Глинка 格林卡
Головачев 戈洛瓦切夫
Головин, Ф.А. 费·阿·柯罗文
Головкин 戈洛夫金
Голубев, А.Ф. 阿·弗·戈卢别夫
Гольдбах 戈利德巴赫
Гоп 霍普
Горский 高尔斯基
Горчаков, А.М. 亚·米·戈尔恰科夫
Горчаков, П.Д. 普·德·戈尔恰科夫
Грант 格兰特
Гревь 格列维
Григорьев 格里果利耶夫
Гро 葛罗
Грязнов 格里亚兹诺夫
Гулькевич 古利克维奇
Гумбольдт 贡鲍利特
Гутковский 古特科夫斯基
Гюк 丘克

Даваци, хан 达瓦齐汗
Д'Анвиль, Бюаш 比尤阿什·丹维利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恩·亚·丹尼列夫斯基
Данненберг 丹宁别尔格
Дао-гуан 道光皇帝
Д'Арош, Фликс 菲利克斯·德阿罗什
Даусель 达乌塞
Дахурский 达胡尔斯基
Де-Граве 戴-格拉维
Делиль 杰里利
Делянов 杰梁诺夫
Демидов 杰米多夫
Де-сан-а 德兴阿
Деспоть-Зенович, А.И.
阿·伊·杰斯波奇-泽诺维奇
Джангар 张格尔

Джурмук 朱尔穆克
Дим 季姆
Домети, А.К. 阿·克·多米蒂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费·米·陀思妥也夫斯基
Д'Отрош, Аббат Шапп
阿巴特·萨普·德奥特罗什
Дундуков-Корсаков
顿杜科夫-科尔萨科夫
Дыфур 迪弗尔
Дэбэй-цзы 德贝子
Дюгамель, А.И. 亚·约·杜加麦利

Екатерина 叶卡特林娜
Елгин 叶尔金
Еленский 叶连斯基
Елисеев 叶利谢耶夫
Ермаков, С.С. 斯·斯·叶尔马科夫
Ермолов 叶尔莫洛夫

Женульи, Риго-де- 里戈-德-热努利
Жербильон 张诚
Жерту 热尔图
Жуй-Чан 瑞常
Жуков 茹科夫
Жун-цзю-ань 荣全

Залесов, Н.Г. 恩·格·扎列索夫
Затеев, Ларион 拉里昂·扎捷耶夫
Захаров, И.И. 伊·伊·扎哈罗夫
Золотарев 佐洛塔列夫
Золотов 佐洛托夫
Зряхов 兹里亚霍夫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雅金甫
Иванов, Г. 格·伊凡诺夫
Иванович, Алексан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
Ивановна, Анна 安娜·伊凡诺夫娜
Игнатьев, Н.П. 尼·巴·伊格纳提耶夫
Измайлов 伊兹麦洛夫
Иловайский 伊洛瓦伊斯基
Иоанн 伊凡
Иоанновна, Анна 安娜·伊凡诺夫娜
И-Шань 奕山

Казакевич 卡杂克维赤
Казнаков, Н.Г. 恩·格·卡兹纳科夫
Калачев 卡拉切夫
Камков 卡姆科夫
Кан-си 康熙皇帝
Капцевич, П.М. 普·姆·卡普采维奇
Карамысов, Майментай
麦缅泰·卡拉梅索夫
Караша 卡拉沙
Карбынчев 卡尔宾切夫
Карсаков 卡尔萨科夫
Катенин 卡捷宁
Кауфман, К.П. 克·普·考夫曼
Кенисар Касимов 肯尼萨尔·卡西莫夫
Киа-кинг 嘉庆皇帝
Киндерман 金杰尔曼
Клапрот 克拉普罗特
Клейнмихель 克列英米赫利
Клуген, Л.Н. 拉·尼·克卢根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П.
叶·彼·科瓦列夫斯基
Ковтунов 科夫图诺夫
Коджан 科江
Колотовкин 科洛托夫金
Колпаковский, Г.А.
格·阿·科尔帕科夫斯基
Колычев, С.Н. 斯·安·科雷切夫
Комаровский 科马罗夫斯基
Контайша 珲台吉
Конур 科努尔
Конфуция 孔夫子
Коровин 科洛文
Корф, М.А. 姆·阿·科尔弗
Коссаковский, П.П.

普·普·科萨科夫斯基

Костенко, Л.Ф 勒·弗·科斯岑科

Котельников 科捷利尼科夫

Краснов, Г. 格·克拉斯诺夫

Кринский 克林斯基

Кроиерус 克罗伊耶鲁斯

Кропотов 克罗波托夫

Круковский 克鲁科夫斯基

Круликевич 克鲁利克维奇

Кузнецов, В.П. 弗·普·库兹涅佐夫

Куйчан 奎昌

Кукель 库克利

Куланов, Гаким 加基姆·库拉诺夫

Кызыл-Аяк 克兹尔·阿亚克

Ланг 兰格

Лау-Зин-Юон 劳金荣

Леваневский 列瓦涅夫斯基

Левшин 列夫申

Леонтьев 列昂季耶夫

Лерхе 列尔赫

Лесовский 列索夫斯基

Либих 利比赫

Ливен, В.К. 维·卡·利文

Лизенцов 利文佐夫

Лидерс 利杰尔斯

Липовцев 利波夫采夫

Лятк 利特克

Лихарев 利哈列夫

Ли-хун-чанг 李鸿章

Ли-юнь-линь 李云麟

Лозан 洛赞

Лошанинов 洛夏宁诺夫

Магомет 穆罕默德

Макартис 马卡尔季斯

Макгован 麦高恩

Максимов, А. 阿·马克西莫夫

Малевский 马列夫斯基

Мамай-Султан 马麦-苏丹

Маментеков, Бачура

巴楚拉·马缅捷科夫

Мартенс 马尔丁斯

Матмечоков, Алатай

阿拉塔伊·马特麦乔科夫

Матусовский 马图索夫斯基

Мейен, Г. 格·梅因

Мендыбаев 缅迪巴耶夫

Меньков, П.К. 普·克·缅科夫

Меньшиков 缅希科夫

Мехмеда-Али 穆罕默德·阿里

Мещеринов, Г.В. 格·弗·麦谢里诺夫

Миллер 密勒

Милютин, Д.А. 德·阿·米留亭

Мин-банг-Мусульман-Кул

明·班格·穆苏利曼·库尔

Мин-И 明谊

Мирошниченко 米罗什尼钦科

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й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Михаловский 米哈洛夫斯基

Монтобан 蒙托班

Мордвинов 莫尔德维诺夫

Морозов, Т.С. 特·斯·莫罗佐夫

Мули 穆利

Му-лун-а 穆隆阿

Муравьев, М.Н. 米·尼·穆拉维约夫

Муравьев, Н.Н. 尼·尼·穆拉维约夫

Муравьев-Карсский, Н.Н.

尼·尼·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

Муромцов 穆罗姆佐夫

Мусса-Бай 穆萨·巴伊

Мухамеде-Али, хан 穆罕默德·阿里汗

Мухамед-Гази-Фейзилмек

穆罕默德·加齐·费伊齐尔默克

Наполеон 拿破仑

Невельской 涅维尔斯科伊

Недорезов 涅多列佐夫

Нейдгарт 涅伊德加尔特
Непир 涅皮尔
Нестеров 涅斯捷罗夫
Никитенко 尼基坚科
Николай I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о-Березов 尼古拉·别廖佐夫
Нифантьев 尼凡季耶夫
Нор-Мухамеде 诺尔·穆罕默德
Носилов 诺西洛夫
Нуралиев, Тезек 捷泽克·努拉利耶夫
Нюхалов 纽哈洛夫

Обручев 奥勃鲁乔夫
Обух 奥布赫
Оглоблин 奥格洛勃林
Озерский, А.Д. 阿·德·奥泽尔斯基
Остафьев 奥斯塔菲耶夫
Остен-Сакен, Ф.Р.
弗·罗·奥斯坦·萨肯

Павлинов 巴甫林诺夫
Павлов 巴甫洛夫
Павлович, Н. 尼·巴甫洛维奇
Палладий 巴拉第
Панаев, В.А. 弗·阿·帕纳耶夫
Панов 潘诺夫
Паркс 帕克斯
Певцов, М.В. 姆·维·彼夫佐夫
Перейра 徐日升
Перовский 佩罗夫斯基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彼得大帝
Платонов 普拉托诺夫
Плещеев 普列谢耶夫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П.
克·普·波别多诺斯采夫
Позднеев 波兹德涅耶夫
Полторацкий 波尔托拉茨基
Померанцев 波麦兰采夫
Попов 波波夫
Потанин 波塔宁

Почекунин 波切库宁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М.
尼·米·普尔热瓦利斯基
Принтец 普林捷茨
Проценко 普罗岑科
Путыцев 布蒂采夫
Путятин 普提雅廷

Рагузинский, С.В. 萨·伏·拉古津斯基
Рагузский 拉古兹斯基
Рашет 拉舍特
Рашид-Эддин 黄和卓
Рейтерн, С.С. 斯·斯·列伊捷尔恩
Реклю 列克柳
Ровинский 罗文斯基
Розен 罗津
Романов, Д.И. 德·伊·罗曼诺夫
Романовский, Д.И.
德·伊·罗曼诺夫斯基
Ромарино 罗马林诺
Рубинсон 鲁宾逊
Рустем 鲁斯捷姆
Рытов, А. 阿·雷托夫

Сайбулат 塞布拉特
Самарин, Ю.Ф. 尤·弗·萨马林
Саркалдык, И. 伊·萨尔卡尔迪克
Сарпек 萨尔佩克
Сарымсак 萨雷姆萨克
Саурук 萨乌鲁克
Свен-Гедин 斯温·戈丁
Сеймур, Майкель 麦克尔·西摩
Сельский 谢利斯基
Семенов, П.П. 彼·彼·谢苗诺夫
Сенковский, О.И. 奥·伊·森科夫斯基
Си-Вань 薛焕
Симонов 西蒙诺夫
Синельников, Н.П.
恩·普·西涅利尼科夫
Ситы 西蒂

Скалон, А.А. 安·安·斯加隆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К.А.
卡·阿·斯卡利科夫斯基
Скачков, К.А. 康·安·斯卡奇科夫
Слепцов, Н.П. 恩·普·斯列普佐夫
Словцов 斯洛夫佐夫
Соколов-Костромский
索科洛夫·科斯特罗姆斯基
Соловьев, С.М. 斯·米·索洛维约夫
Сологуб 索洛古勃
Сосновский 索斯诺夫斯基
Софроний 索弗罗尼
Спафарий 斯帕法利
Сперанский 斯佩兰斯基
Стойков 斯托伊科夫
Стрельников 斯特列利尼科夫
Стремоухов, П.Н.
彼·尼·斯特列莫乌霍夫
Строгонов 斯特罗戈诺夫
Струве, В.Я. 瓦·雅·司徒卢威
Струве, К.В. 克·弗·司徒卢威
Сулим, Н.С. 尼·谢·苏利穆
Сухозанет, Н.О. 恩·奥·苏霍扎涅特
Сухтелен 苏赫捷连
Су-шунь 肃顺
Сян-фын 咸丰皇帝

Тамерлан 铁木耳
Тани-Тлемисов 塔尼·特列米索夫
Татаринов, П.П. 普·普·塔塔林诺夫
Таубе 塔乌别
Тауке 塔乌克
Тимковский, Е.Ф.
叶·弗·季姆科夫斯基
Тихменев 季赫麦涅夫
Токвиль 托克维利
Толстой, Д.Н. 德·恩·托尔斯泰
Трапезников 特拉佩兹尼科夫
Тун-чжи 同治皇帝
Турбин 杜尔宾

Уард 华若翰
Угрюмов 乌格柳莫夫
Унковский 文科夫斯基
Усан-кей 吴三桂
Усов, Ф.Н. 弗·恩·乌索夫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埃·埃·乌赫托姆斯基
У-Чен-цай 吴成才

Фабра 法布拉
Фавье, П. 巴·法维耶
Фадеев, Р.А. 尔·阿·法捷耶夫
Федоров 费多罗夫
Феодосия 费奥多西亚
Феодоровна, А. 阿·费奥多罗夫娜
Филипсон, Г.И. 格·伊·菲利普松
Фишер 费舍尔
Флоринский 弗洛林斯基
Форш 弗尔什
Фределли 弗列杰利
Фрезе 弗列泽
Фридерикс 弗里得利克斯
Фридрих, фон 弗里得利赫
Фусон 富松

Хабиб-Оглу 乌福迪
Хабцисян 哈布齐贤
Халдеев 哈尔杰耶夫
Ханыков, Я.В. 亚·弗·哈内科夫
Ходор 霍多尔
Хомяков, А.С. 阿·斯·霍米亚科夫
Хоурлюк 霍鄂尔勒克
Хрущов 赫鲁晓夫
Худайменда Газин 胡代缅达·加津
Худояр 胡多亚尔
Худяков 胡贾科夫

Цзо-цзунь-тан 左宗棠
Цзя-цин 嘉庆皇帝

Цзянь-гуонь 蒋珙
Цзянь-лу 蒋庐
Цзянь-лунь 乾隆皇帝
Циммерман, А.Э. 阿·埃·齐麦尔曼
Цэван-Раптан 策妄阿拉布坦

Чан-цин 常清
Чебыкин 切贝金
Черманов, М. 穆·切尔曼诺夫
Черняев 切尔尼亚耶夫
Чиб-чжин-чи 池进直
Чингис-хан 成吉思汗
Чихачев, П. 普·奇哈切夫
Чоган-Кегень 察罕·克根

Шаховский 沙霍夫斯基
Шишмарев 希什马廖夫
Шлагинтвейт, Адольф
阿道尔夫·什拉金特维特
Шлоссер 什洛谢尔
Шмидт 什米德特
Шмурло, Г. 格·什穆尔洛
Шормер 肖梅尔
Шпрингер 什普林格尔
Шрейдер 什列伊杰尔
Штемпель 什捷姆佩利
Шубин 舒宾
Шунь-чжи 顺治皇帝

Щетинин 谢季宁

Эльгин 额尔金
Эмгерст 埃姆格尔斯特
Эрали 埃拉利

Юдин 尤金
Юнь-чжень 雍正皇帝
Юсуф, Могамет 穆罕默德·优素福

Ядринцев 亚德林采夫
Якимов 亚基莫夫
Яковлев 亚科夫列夫
Якуб-Бек 阿古柏伯克
Яновский, В.П. 弗·普·亚诺夫斯基
Янсон 扬松
Яцевич 亚采维奇

Du-Halde 杜·哈尔德
D'Hosson 德·霍逊
Huc 胡克
Klaproth 克拉普罗斯
Seignobos 塞诺勃

地名译名对照表

Австрия 奥地利
Айгун 瑷珲
Айдарлы-Кум 埃达尔雷·库姆
Ак-Кент 阿克·肯特
Аккол, р. 阿科尔河
Ак-мечеть 阿克清真寺
Акмолинск 阿克摩林斯克
Актов 阿克托夫
Аксу, г. 阿克苏城
Аксу, р. 阿克苏河
Ак-Тюбе 阿克求别
Ала-куль, о. 阿拉湖
Алатау, г. 阿拉套山脉
Алатовск, г. 阿拉托夫斯克山
Алатовский округ 阿拉托夫斯克州
Алату 阿拉图
Алаха, р. 阿拉哈河
Алаш, р. 阿拉什河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雅克萨）
Александрия 亚历山大
Алимту 阿利姆图
Алкабек 阿尔卡别克
Алмата 阿拉木图
Алтай 阿尔泰
Алтын-Имельские горы 阿尔滕·伊麦利山岭
Алтын-нор 阿尔滕湖
Алтын-Сарымовск 阿尔滕·萨雷莫夫斯克
Америка, залив 亚美利加湾
Амой 厦门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黑龙江）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阿穆尔省
Амурский залив 阿穆尔湾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边区
Англия 英国
Ань-динь-Минские ворота 安定门
Аральское море 咸海
Аргалинские пески 阿尔戛朗沙漠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河
Аргут, р. 阿尔古特河
Аркаул 阿尔卡乌尔
Арктск 阿尔克茨克
Ару-Цхиданянь 阿鲁·茨希达尼扬
Атбасарск 阿特巴萨尔斯克
Аулиэ-булак 阿乌利埃·布拉克
Аулиэт 阿乌利埃特
Ахалцыхе 阿哈尔齐赫
Ащи-кульск 阿希·库利斯克
Аягуз 阿亚古斯
Аяк-караул 阿亚克哨所

Багдад 巴格达
Базарка, р. 巴扎尔卡河
Байберды 巴伊别尔迪
Бай-мурза 巴伊·穆尔扎
Баймурьи 巴伊穆里伊
Баканас, р. 巴卡纳斯河
Бактах 巴克图
Бала-Кальджир, р. 巴拉·卡利吉尔河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Балхаш, о. 巴尔喀什湖
Бар-куль 巴里坤
Баркюль, г. 巴尔克利城
Барлыкские горы 巴尔鲁克山
Барнаул 巴尔瑙尔
Баскан, р. 巴斯坎河
Батовский 巴托夫斯基
Батыр 巴图鲁
Бахта 巴克图

Баш Кадыкляр 巴什·卡迪克利亚尔
Баян-аул 巴彦村
Баян-Аульск 巴彦·阿乌利斯克
Бедель 别叠里
Бейтон, р. 北塘河
Бейчи-Хэ 北齐河
Белая Алаха, р. 白阿拉哈河
Белая Бухтарма, р. 白布赫塔马河
Белезек 别列泽克
Белен-Хэ 白棱河
Белки Алтая 阿尔泰长白雪山
Белое море 白海
Белозерский 别洛泽尔斯基
Белуха, г. 别卢哈山
Белый Иртыш 白额尔齐斯河
Бель-булак 别利·布拉克
Бельгия 比利时
Бельфор 贝尔福
Бенгалия 孟加拉
Березовка, р. 别洛佐夫卡河
Берель, р. 别列利河
Биен, р. 比因河
Бижа, р. 比扎河
Бийск 比斯克
Биш Терек 比什·捷列克
Блюменталь 勃留门塔利
Богинск 鲍金斯克
Бокай-асу 布凯阿苏
Больцир 波利齐尔
Большая Каркара, р. 大卡尔卡拉河
Большая орда 大汗国
Большой Алтай, х. 大阿尔泰山脉
Боратал, р. 鲍拉塔尔河
Бородабсун, о. 鲍罗达勃松湖
Боротала, р. 博罗塔拉河
Борохуцзирский пикет 鲍罗胡吉尔卡伦
Босфор 博斯普鲁斯
Браилов 勃拉伊洛夫
Брата 勃拉塔
Братский 布拉茨克
Бугас, р. 布加斯河
Букомбай 布科姆巴伊
Букомбайск, г. 布科姆巴伊斯克山
Букон, р. 布康河
Булунь-Тохой 布伦托海
Бура, р. 布连河
Бургусутай 布尔古苏台
Бурхат 布尔哈特
Бурчум, р. 布尔楚姆河
Бухара ханство 布哈拉汗国
Бухтарма, р. 布赫塔马河
Бухтарминск 布赫塔尔明斯克
Буянту, р. 布彦图河
Быстрый, р. 吉流伊河
Бянь-лянь-чжи-чень 边梁子村

Валахия 瓦拉几亚
Варшава 华沙
Великая Гопи 大戈壁
Велик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Верненск 维尔年斯克
Верный 维尔内
Верхне-Уйманская 上乌伊曼斯卡亚
Верхняя Бухтарма, р. 上布赫塔马河
Верхотуры 维尔霍图雷
Вестль, с. 维斯特利村
Виленск 维连斯克
Вильно 维利诺
Висла, р. 维斯拉河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Владимир, г. 弗拉基米尔城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Вологда 沃洛格达
Волынск 沃伦斯克
Восток, з. 东方湾
Восточный океан 太平洋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东土耳其斯坦
Вржеловец 弗尔热洛维茨

Галиция 加利齐亚

Галчжор-баши 哈尔卓尔·巴什
Ган-су 甘肃
Ган-чиган-модо 甘·奇甘·莫多
Гань-Чжоу 甘州
Гао-чан 高昌
Гаруту 哈鲁图
Германия 德国
Германштадт 日耳曼什塔特
Геха, р. 格哈河
Гималаи, х. 喜马拉雅山脉
Гирин 吉林
Голодная степь 荒瘠草原
Голубой Нил 青尼罗
Голштейн 戈尔什坦
Горнозаводск 戈尔诺扎沃茨克
Гороблагодатск 戈罗勃拉戈达茨克
Грузия 格鲁吉亚
Гудуар 古杜阿尔
Гуй-хуа-чен 归化城
Гучен 古城

Дагу(Таку) 大沽
Далай-нор, о. 呼伦池
Дания 丹麦
Дарату, г. 达拉图山
Дарату, р. 达拉图河
Даурия 达呼尔
Денчека 登切卡
Джаар, р. 贾阿尔河
Джаир 贾伊尔
Джайдак, г. 贾伊达克山
Джамана-Кабу, р. 贾马纳·卡布河
Джемини, р. 杰米尼河
Джерму, р. 杰尔穆河
Джили-тау, х. 吉利套山
Джимыарал, р. 吉梅阿拉尔小河
Джирень-Айгыр, р. 吉连·埃格尔河
Джиты-арал, р. 吉蒂·阿拉尔河
Джонк 宗克
Джувла-куль, о. 茹夫卢湖
Джусь-манбет-Тобуклин 朱锡·曼别特·托布克林
Дикокаменная орда 吉科卡门汗国
Добруджа 多布罗加
Долон-кара 多隆卡拉
Дон, р. 顿河
Дрезден 德累斯顿
Дубун 杜邦
Дунай 多瑙河
Дурбурджин 杜尔布尔真

Египет 埃及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叶卡特林堡
Енисей, р. 叶尼塞河
Енисей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叶尼塞斯克省

Желтая река 黄河
Жехэ 热河

Забайкалье 后贝加尔
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后贝加尔斯克州
Заили 外伊犁
Заилийский край 外伊犁边区
Зайсан 斋桑
Заука, р. 扎乌卡河
Заукинск 扎乌金斯克
Зачуйск 外楚伊斯克
Звериного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兹维林诺戈洛夫斯克堡垒
Зея, р. 结雅河（精奇里江）
Зоме-тайз 卓明塔以兹
Зюнгария 准噶尔

Игин-Булак 伊金·布拉克
Илецк 伊列茨克
Или, р. 伊犁河
Или-бирай-цикин 伊犁河齐钦
Индия 印度
Инкоу 营口

Иння, р. 英尼亚河
Ирбит 伊尔比特
Ирбитск 伊尔比茨克
Ирджор 伊尔昭尔
Иркут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伊尔库次克省
Иртыш, р. 额尔齐斯河
Иссык-куль, о. 伊塞克湖
Иссыкск 伊塞克斯克
Италия 意大利

Каба, р. 卡巴河
Кабинск 卡宾斯克
Кавказ 高加索
Казань 喀山
Каинск 卡英斯克
Как-куль 卡克湖
Как-нор, о. 卡克湖
Калбинский хре. 卡尔宾斯克山岭
Калган 张家口
Калгуты, р. 卡尔古蒂河
Калмачха, р. 卡尔马奇哈河
Кальджир, р. 卡利吉尔河
Кама, р. 卡马河
Канас 卡纳斯
Канды-су 坎迪·苏河
Кантегиринский хре. 坎捷基林山脉
Кантон 广州
Карабатпак, р. 卡拉巴特帕克河
Кара-Каба, р. 卡拉·卡巴河
Кара-Киреевск 卡拉·季列耶夫斯克
Каракол, г. 卡拉科尔城
Карасор-куль, о. 卡拉索尔湖
Каратал, р. 卡拉塔尔河
Кара-тау, г. 卡拉套山
Караул-тюбе 卡拉乌尔·求别
Карауткуль 卡拉乌特湖
Карауткульск 卡拉乌特库利斯克
Карачанды 卡拉昌迪
Карашар 卡拉萨尔
Каргала, р. 卡尔加拉河
Каркара, р. 卡尔卡拉河
Каркаралинск 卡尔卡拉林斯克
Каскелен, р. 卡斯克连河
Кастек 卡斯捷克
Катанда 卡坦达
Катунские Альпы 卡图阿尔卑斯山
Катунь, р. 卡图尼河
Кашгар 喀什噶尔
Кашка-су, р. 卡什卡·苏河
Кашмир 克什米尔
Кеген, р. 格根河
Кем-Кемчик-Бом 克姆·克姆奇克·鲍姆
Кемчик, р. 克姆奇克河
Кендерлик, р. 肯杰尔利克河
Кенигштейн 肯尼格什滕
Кентей-Алинск 肯捷·阿林
Керген-тас 克尔根·塔斯
Керулен, р. 克鲁伦河
Кескен-Терек, р. 克斯肯·捷列克河
Кетмень 克特缅
Кетский 克茨基
Кизыл-Чиликты 基兹尔·奇利克蒂
Кизыль-каин 基兹利·卡英
Килен 基连
Киргиз 吉尔吉斯
Киргизская степь 吉尔吉斯草原
Киреев 基列耶夫
Кичкин-тау 基奇金套山
Киш-Мурун 基什·穆伦
Кла 克拉
Кобдо 科布多
Коби 科比
Кобок, р. 科鲍克河
Кожан 科让
Кой-джау 科伊·贾乌
Коканд 浩罕
Кок-Нор 科克湖
Кокпект 科克佩克特
Кокпектинка, р. 科克佩克钦卡河

Кокпектинск 科克佩克钦斯克
Коксу, р. 科克苏河
Коксуйск 科克苏伊斯克
Кок-терек, р. 科克·捷列克河
Кокчетов 科克切托夫
Кокчетовск 科克切托夫斯克
Колмаков 科尔马科夫
Коломбай, р. 固洛木拜河
Коломбай-асу 固洛木拜·阿苏
Колыванъ 科雷万
Комур 科穆尔
Ко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君士坦丁堡
Копал 科帕尔
Копальский округ 科帕尔斯克州
Корея 朝鲜
Кос-Агачь 科斯·阿加奇
Косогол 科索戈尔
Котон-Карагай 科顿·卡拉盖
Кочжур. г. 科楚尔山
Кош-Агач 科什·阿加奇
Кран, р. 克兰河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Кременчуг 克列缅楚格
Кронштадт 喀琅施塔得
Крым 克里米亚
Кубанск 库班斯克
Кубсун-асу 库勃松·阿苏
Кузнецк 库兹涅茨克
Куйтун-бира 奎屯·毕喇河
Куке-Кулусун, мыс 库克·库鲁松角
Кулай-су, р. 库莱·苏河
Кулан-ацзирха 库兰·阿奇尔哈
Кульджа 伊宁
Кумурчи 库穆尔奇
Кунгес, р. 孔格斯河
Кунгур 昆古尔
Куну-Турфан 库努·吐鲁番
Курган 库尔干
Кур-Караусу 库尔·卡拉乌苏
Куртка 库尔特卡
Курчум, г. 库尔楚姆山
Курчум. р. 库尔楚姆河
Курчумский край 库尔楚姆边区
Кууламан 库拉曼
Куча 库车
Кучук-арчалы 库楚克·阿尔恰雷
Куянда, р. 库扬达河
Кызил-Кезен, р. 克齐尔·克津河
Кызыл-су 克兹尔·苏
Кызыл-таш 克兹尔·塔什
Кыстау 克斯套
Кюрук-дара 库鲁克·达拉
Кяхта 恰克图

Лай, р. 莱河
Ланчжоу-фу 兰州府
Лебсу 列勃苏
Ледовитое море 冰洋
Лепса, р. 列普萨河
Лепсинск 列普辛斯克
Листьяга 利斯季亚加
Лотарингия 洛林
Любимов 柳比莫夫

Майкапчагай, р. 麦卡普恰盖河
Майтау 麦陶
Май-терек 麦·捷列克
Маковский 马科夫斯基
Малая Бухария 小布哈拉
Малонарым 小那雷姆
Малороссия 小俄罗斯
Малый Алтай 小阿尔泰山
Малый Суйфун, р. 小绥芬河
Манас 玛纳斯
Манике 马尼克
Маниту-гатул-хан, пикет 玛尼图嘎图勒干卡伦
Манрака 曼拉卡
Манчжурия 满洲
Марал-су, р. 马拉尔·苏河

Маринск 马林斯克（阔吞屯）
Марка-куль, о. 马尔卡湖
Медведка 麦德维德卡
Мекка 麦加
Мерка, р. 梅尔卡河
Меркэ 麦尔凯
Мечеть 麦切奇
Мисты 米斯迪
Мо, р. 莫河
Модо-Барлук 莫多·巴尔鲁克
Моинту, р. 莫英图河
Молдавия 摩尔达维亚
Мон-Блан Алтай 蒙·勃兰·阿尔泰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Музарт 穆扎尔特
Мукден 沈阳
Муонио, р. 穆奥尼奥河
Мурень 穆楼河
Муруновск 穆伦诺夫斯克
Мус-тау, г. 穆斯套山
Мюленбах 缪连巴赫

Надежда 那杰日达
Нарым 那雷姆
Нарымские Альпы 那雷姆·阿尔卑斯山
Нарын, р. 纳伦河
Небесный хребет 天山
Неман, р. 涅曼河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尼布楚）
Нижний 尼日尼
Нижний Иртыш 下额尔齐斯河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下诺夫戈罗德
Николаевск 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Нингпо 宁波
Нингута 宁古塔
Новокиевский 诺沃基辅
Новый Свет 新大陆
Нор, р. 诺尔河
Нор-Зайсан 斋桑湖
Нубия 努比亚
Нянь, р. 尼扬河

Обь, р. 鄂毕河
Огуз-Уткуль 奥古兹-乌特湖
Одесса 敖德萨
Одон-гол 奥顿河
Одон-гол, пикет 奥顿·戈尔卡伦
Ойгыр, р. 奥伊格尔河
Ойхор 奥伊霍尔
Олан-булак 奥兰·布拉克
Омосо 鄂木索
Омск 鄂木斯克
Омь, р. 鄂木河
Ополье 奥波利耶
Оренбург 奥伦堡
Орхон, р. 鄂尔浑河
Орхочунь, г. 奥尔霍琼山
Оса 奥萨
Остзейск 奥斯特泽伊斯克
Охотничий 奥霍特尼奇

Павлодар, г. 巴甫洛达尔城
Па-дао-хэ 八道河
Па-ли-цзяо 八里桥
Памир 帕米尔
Панама 巴拿马
Париж 巴黎
Патрокл, з. 帕特罗克尔湾
Пейхо 白河
Пекин 北京
Пермь 彼尔姆
Персия 波斯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з. 大彼得海湾
Петровск 彼得罗夫斯克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Печилийский залив 北直隶湾
Пичан 皮昌
Пишпек 皮什彼克

Подгорный 波德戈尔内
Подольск 波多利斯克
Подпуск 波德普斯克
Полтава 波尔塔瓦
Полтавск 波尔塔夫斯克
Польша 波兰
Посьета, з. 波谢特湾
Потсдам 波茨坦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滨海省
Пруссия 普鲁士

Раим 雷姆
Рейсмаркта 莱斯马尔克塔
Россия 俄罗斯
Рыбенск 雷宾斯克

Савеловка, д. 萨维洛夫卡村
Сай-асу 塞·阿苏（山口）
Сайкан, г. 塞坎山
Сайлюгемский хребет 赛留格木山脉
Сайрам, о. 塞拉姆湖
Салкын-чека, г. 萨尔肯·捷卡山
Самарск, г. 萨马尔斯克省
Самджюрский хребет 桑久尔山脉
Сангазаки 桑加扎基
Сан-Таш 桑·塔什
Сань-Син 三姓
Сарапул 萨拉普尔
Сарнакой 萨尔纳科伊
Сарымсакты 萨雷姆萨克蒂
Сары-су, р. 萨雷苏河
Сары-Тарбагатай 萨雷·塔尔巴哈台
Сары-тау 萨雷套
Сары-Тумск, г. 萨雷·图姆斯克山
Сары-Чеко 萨雷·切科
Саты 萨蒂
Саур, хребет 萨乌尔山脉
Саур-тау, р. 萨乌尔套山
Саянский хребет 萨彦岭
Севастополь 塞瓦斯托波尔

Селенги, р. 色楞格河
Селенгинск 色楞格斯克
Селенгу, р. 色楞格河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谢米巴拉丁斯克省
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谢米列钦斯克省
Семиречь 谢米列奇
Сенная 谢那亚
Сергиополь 谢尔基奥波利
Сесда-Кем, р. 谢斯达·克姆河
Сильвергельм 西利维尔格利姆
Си-ан 西安
Си-юй 西域
Сливкиная, д. 斯利夫金娜娅村
Смоленск 斯摩棱斯克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美利坚合众国
Соиок 索约克
Солдатово 索尔达托沃
Сорва, р. 索尔瓦河
Сорренто 索林托
София 索非亚
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中国
Срединное царство 中国
Ставрополь 斯塔夫罗波尔
Стрелок, залив 斯特列洛克湾
Субухту 苏布赫图
Суек 苏约克
Суйдун 绥定
Суйфун, р. 绥芬河
Сунгари, р. 松花江
Сунгача, р. 松阿察河
Сунжен 松任
Суплис 苏普利斯
Сургут 苏尔古特
Сур-Даба 苏尔·达巴
Су-чжоу 肃州
Суэц 苏伊士
Сцилла 斯齐拉

Сыр-Дарь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塞尔·达里英斯克州
Сыр-Дарья, р. 锡尔河

Табот 塔鲍特
Табэн-Больцир 塔本·波利奇尔
Тагадени, р. 塔加杰尼河
Тайндарык, р. 塔英达雷克河
Такыр, р. 塔克尔河
Талгар, р. 塔尔加尔河
Талгарск 塔尔加尔斯克
Талкинский горный проход
塔尔金山口
Таловка, р. 塔洛夫卡河
Тамырсык, р. 塔梅尔塞克河
Тадыасу, п. 坦迪阿苏山口
Танну-Олла, хребет 唐努乌拉山
Тарбагатай 塔尔巴哈台（即塔城）
Тарбагатайский хребет
塔尔巴哈台山
Таскылы, г. 塔斯克拉山脉
Татария 鞑靼
Тау-Текели, р. 塔乌·捷克利河
Ташкент 塔什干
Тегеран 德黑兰
Текелий 捷克利
Текес, р. 特克斯河
Текинский оазис 捷金斯基绿洲
Телецкое озеро 捷列茨克湖
Темерликский хребет 特穆尔里克山脉
Темир-су, р. 捷米尔·苏河
Темурлик, р. 特穆尔里克河
Темурту-нор 特穆尔图湖
Тенгри-шань 腾格里山
Терективский хребет 捷列克特山脉
Тереты 帖列克第
Терс-Айрык 捷尔斯·埃雷克
Тибет 西藏
Тимирсуйск 季米尔苏伊斯克
Тифлис 梯弗里斯
Тобата 托巴塔
Тобол, р. 托波尔河
Тобольск 托波尔斯克
Тогось-Байджигитовский, в.
托戈西·白支吉特乡
Тола, р. 图拉河
Токмак 托克马克
Токрау, р. 托克拉乌河
Томск 托木斯克
Торнео, р. 托尔涅奥河
Тоучубек 托乌楚别克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я 特兰西瓦尼亚
Троицк 特罗伊茨克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 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
Тумень, р. 图们江
Тумень-ула, р. 图们江
Тумынь-цзян 图们江
Тун-чжоу 通州
Туп, р. 图普河
Тур, речка 土尔毕喇河
Тура, р. 图拉河
Тургай 图尔盖
Тургайск 图尔盖斯克
Тургень, р. 图尔根河
Турий-рог 土里罗格
Туринск 图林斯克
Туркестан 土耳其斯坦
Тургарт 图鲁噶尔特
Турфан 吐鲁番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эмурту-нор, о. 特穆尔图湖
Тюильри 杜尔里宫
Тюмень 秋明
Тянь-Цзинь 天津
Тян-Шань 天山

Уан-Таш, проход 乌安·塔什山口
Удинск 乌金斯克
Уепи, р. 乌叶皮河
Уил 乌伊尔

Уйдене 乌伊杰涅河
Укек 乌科克
Укэк 乌科克
Улан-Даба 乌兰·达巴
Улан-Булак 乌兰·布拉克
Улеаборг 乌列阿玻尔格
Улкун-Уласта 乌尔昆·乌拉斯塔
Улюнгур, о. 乌伦古尔湖
Улясуту 乌里雅苏图
Урал 乌拉尔
Уральск 乌拉尔斯克
Урга 库伦
Урджарская станица 乌尔贾尔斯克村
Уркачалы, г. 乌尔卡恰雷山
Уркачар, г. 乌尔卡恰尔山
Уркашар, г. 乌尔卡恰尔山
Урлу 乌尔鲁
Урта-караул 乌尔塔哨所
Урумчи 乌鲁木齐
Урунгу, р. 乌伦古河
Урус-джоль 乌鲁斯·召利
Урыл 乌雷尔
Ур-Яр 乌尔·雅尔
Усачи, р. 乌萨奇河
Ус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залив 乌苏里湾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乌苏里边区
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 石山口
Усть-Коксы 科克塞山口
Усть-Урта 乌尔塔山口
Усун-Тобата 乌松·托巴塔
Учь-Катты, р. 乌奇·卡塔河
Учь-Турфан, г. 乌什城
Учь-Хамты, р. 乌奇·哈姆塔河

Фатцогло 法特佐格洛
Финляндия 芬兰
Фо-чжоу 福州
Франция 法国

Хабар-асу 哈巴尔·阿苏
Хабаровск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Хай-дянь 海淀
Хай-хе 海河
Хай-хэ 海河
Хами 哈密
Хамоту, р. 哈莫图河
Ханка, о. 兴凯湖
Хан-Тенгри, г. 罕腾格里山
Харибда 哈里勃达
Хатын-су, р. 哈滕·苏河
Хива ханство 希瓦汗国
Хинган 兴安岭
Хой-Майлаху 霍伊·麦拉胡
Хой-Юань, г. 惠远城
Хони-Майлаху 霍尼·麦拉胡
Хон-конг 香港
Хоргос, р. 霍尔果斯河
Хотан 和田
Хубиту, р. 瑚毕图河
Хун-чунь, р. 珲春河

Цжан-цзя-ван 张家湾
Цзянь-су 江苏
Циндагату 增达哈图
Цун-лин 葱岭

Чаган-Обо 察罕鄂博
Чакель-Месь 恰克利·麦斯
Чалкоды-су, р. 恰尔科迪·苏河
Чан-ча-хо-цзы 长岔河子
Чар-Гурбан, р. 恰尔·古尔班河
Чарын, р. 察林河
Чатыр-куль, о. 恰蒂尔湖
Чекмент 切克缅特
Червонная Русь 切尔沃那亚罗斯
Черновая, р. 切尔诺瓦亚河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ерный Иртыш, р. 黑额尔齐斯河
Чже-цзянь 浙江

Чилик, р. 奇利克河
Чиликты 奇利克蒂
Чингиз-тау, р. 成吉思·套山
Чингильды 钦基利迪
Чингистай 昌吉思台
Чиндагатуй 成达哈图
Чин-Тал, р. 钦·塔尔河
Чоган-Обо, р. 察罕鄂博河
Чокар, г. 乔卡尔山
Чорга, р. 乔尔加河
Чу, р. 楚河
Чугучак 塔城
Чулышман, р. 楚雷什曼河
Чульчь, р. 楚利奇河
Чун-чжи, пикет 春济卡伦
Чэдзи 切齐村

Шабин-Дабаг 沙宾达巴哈
Шабинор 沙宾诺尔
Шадринск 沙德林斯克
Шанхай 上海
Швеция 瑞典
Шен-си 陕西
Шиботу 什伯图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Шихо 苏乌
Шлезвиг 石勒苏益格

Экеблад 埃克勃拉特
Элет 厄鲁特
Эльба 易北河
Эльзас 阿尔萨斯
Эмба, р. 埃姆巴河
Эмбенск 埃姆宾斯克
Эмиль, р. 埃米利河

Югенташский проход 尤根塔什山口
Юзефова 尤泽弗瓦
Юн-нан 云南
Юрь-яль 尤里·亚利
Юстыд 尤斯蒂德

Язевка, р. 亚泽夫卡河
Яик, р. 亚伊克河
Яку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雅库特州
Ямату 亚马图
Янкишар 英吉沙
Япония 日本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本海
Яркенд, г. 叶尔羌城
Ярославль 雅罗斯拉夫尔

民族译名对照表

австрицы 奥地利人
адбановские киргизы
阿德巴诺夫吉尔吉斯人
Ак-Найман, род 阿克·奈曼族
Алтын-Норские Урянхайцы
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
Алгын, род 阿尔根族
Атбан, род 阿特班部族

башкиры 巴什基尔人
Белогорцы 白山派
Богу, род 勃沽族
буруты 布鲁特人
буряты 布里亚特人
бухарцы 布哈尔人

венгерцы 匈牙利人

греки 希腊人

дархаты 达尔哈特人
датчане 丹麦人
Джан-Джур, род 江·朱尔族
Джансыгул, род 江塞古尔族
дунгане 东干人（回族）
дурботы 杜尔伯特人
Дюртеул, род 迪尔捷乌尔族

запорожцы 查波罗什人
зенгорцы 准噶尔人

калмыки 卡尔梅克人
калмыки-торгоуты
卡尔梅克·土尔扈特人
каравул-кисяк 卡拉乌尔·基夏克
Кара-Киреевский, род
卡拉·基列耶夫族
кара-киреевцы 卡拉基列耶夫人
кара-кисяк 卡拉·基夏克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й народ
吉尔吉斯-凯萨茨基民族
киргизы 吉尔吉斯人
Кожембет, род 科热姆别特族
кореейцы 朝鲜人
кракусы 克拉库斯人
Кызаевский, род 克扎耶夫族
Кыпчак, род 克普恰克族

маньчжуры 满洲人
монголы 蒙古人
муруновцы 穆伦诺夫人

Наймань, род 奈曼族

ойраты 厄鲁特人
ононы 鄂伦春人

римляне 罗马人

сайбулатовцы 塞布拉特人
Сарыбашшь, род 沙雷巴什族
сибо 锡伯人
солоны 索伦人
Сувановский, род 苏瓦诺夫部族

тангуты 唐古特人
таранчи 塔兰奇人
татары 鞑靼人
ташкентцы 塔什干人
телеуты 捷列乌特人

Тибетское племя 西藏部族
Тогас, род 托哈斯族
тогасовцы 托哈斯人
торгоуты 土尔扈特人
Тор-Тоул, род 托尔·托乌尔族
тунганы 东干人
тунгузы 通古斯人
Тюрк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突厥系

Уван-Гирей, род 乌凡·季列伊族
уйгуры 维吾尔人
уйгуры-тангуты 维吾尔唐古特人
урянхайцы 乌梁海人
урянхи 乌梁海人

финны 芬兰人
хаджи 哈治人

Чакчан, род 恰克昌族
Чар-Джитым 恰尔·吉蒂姆族
чахары 察哈尔人
Черногорцы 黑山派
чжунгары 准噶尔人

шмерцы 什麦尔人

элиот 厄鲁特人
эллин 希腊人
элют 厄鲁特人

书籍、报刊译名对照表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е》《读者文库》
《Военн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окраин России》《俄国边区军事地理概要》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Чжунгарии》《准噶尔的军事统计概要》
《Горный журнал》《矿业杂志》
《Граф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Граф Сперанский》《斯佩兰斯基伯爵》
《Дзень-бао》《京报》
《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每月论文》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Будды》《佛的传记》
《Записк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地理学会论丛》
《Записки колонизатора Сибири》《西伯利亚移民垦殖记》
《Записки маршала Мормона》《莫尔蒙元帅回忆录》
《Записки Менькова》《缅科夫日记》
《Известия》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地理学会《通报》
《Инород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俄国的外族问题》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древнего буддизма》《古代佛教史概要》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я Китая》《中国居民人口的历史评论》
《Кавказ газета》《高加索报》
《Китай его жители, нравы и проч.》《中国、中国人民、习俗及其他》
《Колонизация Сибири》《西伯利亚的移民垦殖》
《Колонизация Степных областей》《草原各州的移民垦殖》
《Колонизация Степ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в связи с вопросом о кочевом хозяйстве》
《关于牧业经济问题的草原各州垦殖化》
《Краткая учеб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简明教学百科词典》
《Кяхтинский листок》《恰克图报》
《Лек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俄国历史讲义》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西西伯利亚材料》
《Мос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莫斯科汇编》
《Наблюдатель》《观察家》
《Начала и первые дел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дома》《满洲皇帝开始和初期情况》
《Наш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деятели》《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活动家》
《Новое Время》《新时代》
《Обозрение главных оснований мест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ибири》
《西伯利亚地方管理的主要原理概述》

«О движении магометан в Китае» «论中国伊斯兰教徒的运动»
«О магометанах в Китае» «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徒»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а ныне царствующей в Китае династии Цинь и имени народа Маньчжу»
«现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始祖和满洲民族名称的起源»
«Основания те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Китая» «中国国家生活的基本潮流»
«Очерки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Древняя и Новая Россия»
«东西伯利亚概要、古代和新俄罗斯»
«Очерки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тепи Акмол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п. Сиб.»
«西西伯利亚阿克摩林斯克州的吉尔吉斯草原概况»
«Очерки Чжунгарии и о состоянии шести восточных город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Нан-лу» «准噶尔概况和南路中国东部六个城市状况»
«Последние события в Китае и значение их для России»
«中国的最近事件及其对俄国的意义»
«Посольство Унковского к Контайша» «向珲台吉派遣文科夫斯基使团»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中国生活原则»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Монголии» «蒙古旅行记»
«Пу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中亚细亚的道路»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世界通史教程»
«Рус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对中亚细亚的俄国政策»
«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 «俄罗斯残废者»
«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 «北方蜜蜂»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ий листок» «谢米巴拉丁斯克报»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 озера Зайсана» «从斋桑湖»
«Старина и Новизна» «守旧和维新»
«Столичный Вестник» «京报»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土耳其斯坦公报»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край» «土耳其斯坦边区»
«Четверт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Центр-Азии» «中亚细亚第四次旅行记»
«Экономист» «经济学家»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中华帝国志叙述»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文明史»
Histoire des Mongols «蒙古史»
L'empire Chinois «中华帝国»
Memoires rélatifs à l'Asie «亚洲关系回忆录»
Revolution des Calmouk-Zongares «卡尔梅克-准噶尔人的革命»
Voyage scientifique dans L'Altai oriental «东方阿尔泰地方的学术旅行»
Voyage en Sibérie «西伯利亚旅行记»